

上下五千年

上古篇

春秋戰國篇

秦漢王朝篇

魏晉南北朝篇

隋唐五代篇

宋遼夏金元篇

明朝篇

前清篇

後清篇

民國篇

中華人民共和國篇

第四卷

科普教育与艺术修养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上下五千年

夏于全 常桦 主编

第四卷

魏晋南北朝篇目录

第一章 汉末群雄纷争和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第一节 东汉王朝的分裂	(1)
第二节 曹操集团的异军突起	(5)
一、曹氏集团的形成和发展	(5)
曹操在政治舞台上初露锋芒	(5)
争夺兖州	(11)
挟天子以令诸侯	(17)
屯田垦荒 充实军资	(21)
广纳贤才、经略徐淮	(24)
二、袁曹争霸和曹操统一北方	(30)
袁绍占据河北	(30)
袁绍进窥许都	(34)
白马、延津之战	(36)
官渡决战	(38)
平定三郡乌桓	(43)
降服鲜卑轲比能	(45)

第三节 孙、刘集团的崛起	(47)
一、孙策割据江东	(47)
平定刘繇	(47)
进击王朗	(49)
击败刘勋	(50)
打败黄祖	(51)
逼降华歆	(52)
二、刘备集团的崛起	(52)
刘备在群雄逐鹿中的惨淡经营	(52)
隆中对策	(57)
第四节 赤壁之战和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59)
一、赤壁之战	(59)
二、曹魏政权的建立	(62)
曹操袭取关中	(62)
曹魏的建立	(64)
三、蜀汉政权的建立	(68)
刘备攻占益州	(68)
刘备攻取汉中和蜀汉的建立	(73)
四、孙吴政权的建立	(76)
第五节 三国鼎立时期的政治形势	(78)
一、吴蜀夷陵之战	(78)
二、诸葛治蜀	(83)
厉行法治,任人唯贤	(83)
广开言路	(86)
平定南中	(88)

三、诸葛亮伐魏	(91)
四、魏吴东兴之战	(99)
五、曹魏司马氏专权	(101)
六、魏灭蜀	(106)
七、西晋的建立	(111)
八、晋灭吴	(112)

第二章 西晋的短期统一

第一节 太康盛世	(117)
第二节 政治腐化和奢侈之风的泛滥	(126)
第三节 八王之乱	(129)
第四节 流民起义浪潮的掀起	(139)
一、李特、李流等领导的流民起义	(139)
二、张昌、石冰等领导的流民起义	(146)
三、王如、杜弢等领导的流民起义	(151)
第五节 刘渊称汉反晋	(157)
第六节 永嘉之乱	(165)
第七节 北方的抗汉斗争及西晋王朝的灭亡	(169)

第三章 东晋王朝的政治偏安和江南经略

第一节 东晋的建立与“王马共天下”	(177)
第二节 东晋的门阀士族政治	(180)
一、门阀制度	(180)

二、东晋的士族政治	(183)
第三节 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	(187)
一、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及斗争	(187)
二、王敦之乱	(193)
三、苏峻之乱	(197)
四、桓玄篡晋	(201)
第四节 孙恩、卢循起义	(206)
第五节 北伐与偏安	(211)
一、祖逖北伐	(211)
二、桓温北伐	(213)
三、刘裕北伐	(216)
第一次北伐	(216)
第二次北伐	(219)

第四章 南朝政权的更迭

第一节 刘宋王朝的兴衰	(224)
一、寒人皇帝刘裕	(224)
二、宗室内乱及衰亡	(227)
第二节 南齐王朝的兴亡	(232)
一、南齐王朝的建立	(232)
宋宫廷政变和萧道成独揽大权	(232)
击灭沈攸之和萧道成代宋建齐	(234)
二、重蹈覆辙	(238)
三、萧衍的崛起	(239)

四、从雍州起兵到建康易帜	(245)
第三节 梁王朝的兴衰	(249)
一、梁武帝的佛教政治	(249)
二、“侯景之乱”	(251)
三、江陵的陷落	(255)
第四节 陈王朝的兴衰	(259)
一、陈王朝江南偏安	(259)
二、金陵王气黯然销	(261)
三、隋陈建康之战	(263)
第五节 南朝的政治经济	(267)
一、“寒人掌机要”的南朝政治	(267)
二、南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	(270)
农 业	(271)
手工业	(273)
商业及交通事业	(275)
第六节 南朝的社会危机	(276)
一、“土断”和“检籍”	(276)
二、“耕当问奴，织当访婢”	(280)
三、“亡命”和“山贼”的暴动	(282)
四、唐寓之起义	(286)

第五章 民族战乱和民族融合

第一节 五胡内迁	(288)
第二节 十六国春秋	(291)

- 一、汉和前赵 (291)
- 二、后赵的兴亡 (294)
- 三、冉魏的兴亡 (299)
- 四、前凉 (302)
- 五、前燕兴亡 (303)
- 前燕灭亡冉魏 (303)
- 枋头之战 (308)
- 六、前秦始末 (316)
- 前秦的兴起 (316)
- 东晋襄阳抗战 (318)
- 苻坚大举进攻东晋 (321)
- 洛涧战役 (324)
- 淝水之战 (327)
- 七、后燕的兴亡 (328)
- 后燕参合陂之战 (328)
- 中山决战 (334)
- 八、西燕始末 (341)
- 九、东晋灭南燕 (345)
- 十、后秦的兴亡 (350)
- 后秦的创立 (350)
- 东晋灭后秦 (353)
- 十一、后凉的兴亡 (361)
- 后凉的建国之战 (361)
- 后凉扩张 (363)
- 后凉的灭亡 (364)

十二、南凉、北凉、西凉	(367)
十三、西秦、夏	(369)
第三节 北魏的汉化改革	(371)
一、北魏的建立	(371)
沙漠汗之死	(371)
道武帝拓跋珪	(372)
北魏统一北方	(376)
二、北魏的汉化改革	(379)
北魏的“班禄”	(379)
“三长制”	(380)
“均田制”	(385)
孝文帝迁都与“文治”	(389)
第四节 北魏同南朝战争	(394)
一、北魏与刘宋之间的战争	(394)
北魏与刘宋争夺河南地区之战	(394)
北魏与刘宋河南淮南战役	(404)
二、北魏与南齐的战争	(409)
三、北魏与梁朝的战争	(422)
魏梁梁州争夺战	(422)
魏梁徐州、钟离争夺战	(424)
魏梁义阳三关争夺战	(432)
魏梁朐山争夺战	(434)
魏梁寿阳争夺战	(436)
魏梁益州争夺战	(436)
魏梁寿阳再争夺战	(437)

魏梁东益州争夺战	(439)
魏梁淮水南北地区争夺战	(440)
魏梁彭城、涡阳地区争夺战	(444)
魏梁中原争夺战	(445)
第五节 北魏的社会危机	(448)
一、北魏“新民”	(448)
二、盖吴起义	(451)
三、“争富”和“佞佛”	(455)
四、胡太后乱政	(458)
五、尔朱荣入洛	(462)
六、北魏末年各族人民起义	(467)
七、北魏灭亡	(470)
第六节 东魏、西魏、北周	(471)
一、东魏西魏邙山决战	(471)
二、北齐建立	(475)
三、北周的建立	(476)
四、北周伐北齐	(479)
五、北齐灭亡	(482)
第七节 北方的民族融合与经济的发展	(484)

第六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

第一节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潮流	(488)
一、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	(488)
名法思想的兴起	(488)

曹操、诸葛亮的名法思想	(490)
二、魏晋玄学思潮	(493)
玄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阶段	(494)
王弼的“贵无”论	(498)
嵇康、阮籍的“自然”论	(505)
裴頠的“崇有”论	(508)
郭象的“独化”论	(513)
三、反玄学思想	(517)
杨泉的《物理论》	(517)
欧阳建的《言尽意论》	(520)
四、魏晋南北朝的佛学思想	(523)
魏晋玄学与佛教“般若”学	(523)
僧肇的“般若”学	(526)
慧远的“法性不变”论	(531)
竺道生的“顿悟成佛”说	(532)
五、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思想	(534)
葛洪的道教神学理论体系	(535)
寇谦之和新天师道	(539)
陶弘景的道教思想	(541)
六、范缜的《神灭论》	(542)
七、魏晋时期的经学	(545)
魏晋经学	(545)
南朝经学	(548)
北朝经学	(551)
第二节 魏晋南北时期的科学与艺术	(555)

一、岁差的发现	(555)
二、《禹贡地域图》和《佛国记》	(559)
三、《抱朴子》与炼丹术及早期化学	(565)
四、《脉经》、《甲乙经》和《肘后方》	(571)
五、祖冲之与“祖率”	(575)
六、北朝地理学家酈道元	(577)
七、农学家贾思勰	(580)
八、南北朝时期的石窟艺术	(583)
九、顾恺之的“三绝”	(587)
十、书圣王羲之	(590)
第三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	(594)
一、诗 歌	(594)
二、散 文	(597)
三、初期小说	(601)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	(604)

魏
晋
南
北
朝
篇

第一章 汉末群雄纷争 和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第一节 东汉王朝的分裂

张角等牺牲之后，以灵帝为首的东汉统治集团又得意忘形，越发变本加厉地压迫剥削人民。中平二年，皇宫发生火灾，烧掉一部分宫殿。宦官张让等建议灵帝加征天下田每亩税 10 钱，作为修复宫室的费用。并责令太原、河东等地（今山西中南部）交纳木材石料，材料送来后，经办官员又复多方刁难，谋取暴利，宫室连年修不起来，老百姓的负担没完没了。甚至还规定官员升迁都要交纳“助军、修宫钱”，简直把宫廷火灾当成了他们的摇钱树。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又复激烈起来。灵帝命宦官赵忠主持封赏镇压黄巾军有功的将领，宦官张让等

12 人无功都得封侯，真正拚死力战的皇甫嵩、傅燮、卢植等反被贬官，比较正派的官僚士大夫深感失望。中平五年，灵帝为了对付日益加剧的武装起义，在首都设置西园八校尉，扩建八支近卫部队，袁绍、曹操等 7 人都得任校尉，各统一军。但却以宦官蹇硕任上军校尉兼为元帅，总领诸军，连大将军何进也得归他统管，宦官同外戚、官僚士大夫的矛盾又复尖锐起来。中平六年（公元 189 年）四月，灵帝死去，蹇硕打算杀死何进，拥立王贵人的儿子刘协，独揽大权。被何进察觉，便逃回军营拥兵自重，蹇硕才不敢轻动。于是何皇后的儿子刘辩得以继位，何太后临朝，何进辅政。何进与蹇硕利害冲突，势难并存，他也知道宦官专权乱政，很不得人心，便同官僚世家的代表人物袁绍等谋议铲除宦官。蹇硕狐疑不自安，又向赵忠等建议杀掉何进。赵忠等与何氏接近的宦官不赞成，反与何进通谋将蹇硕拘捕处死，何进便进一步接管了蹇硕率领的禁兵，成为独掌军权的实力人物。灵帝的生母董太后及其侄骠骑将军董重与何氏争权，有些宦官也想借重董氏牵制何氏。何进却先下手，于五月收捕董重，迫使他免官自杀，董太后忧愁恐惧，不久也去世了。

何进独揽大权之后，袁绍以窦武失败的教训劝他抓紧时机消灭宦官，并告戒他不可轻易进宫。何进向太后提出建议，要她尽罢中常侍等掌管政事的宦官，以政府官吏代替。太后不肯，说是汉王朝历来用宦官主持宫内事务，怎么可以废除？再说我也不好同士大夫一起商议国事。实际上何太后一家原是走宦官的门路上台的，她同刘协的生母王贵人争宠而毒死王贵人，惹得灵帝大怒，打算废掉她，又全靠宦官们说情送礼才

得保全下来。她同某些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何进无法改变她的成见，加以太后的母亲及弟弟何苗更经常接受宦官的贿赂，也反对何进诛锄宦官。于是袁绍又建议多召四方猛将及各地豪杰，叫他们领兵入京以胁迫太后，这样一个授权于人，必将引起争端而难以控制局势的错误意见竟然得到赞赏。何进便传召前将军董卓、东郡太守桥瑁、武猛都尉丁原等进屯洛阳附近，他们都提出了消灭宦官的建议。野心家董卓本是镇压羌族人民起家的凉州军阀，为了牢固掌握他那支军队，他曾两次违抗诏命，拒绝接受新官职。这回得到何进召唤，他看出是篡权的好机会，立即进兵洛阳，并上书要求惩办张让等以“清君侧”。何进又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王允为河南尹，以控制首都及邻近地方军政大权。何太后在军官威逼下被迫罢了张让等当权宦官，何进劝他们各回封国去享清福，宦官们却不肯自动下台，秘密策划反扑。

张让的儿媳是何太后的妹妹，通过她以及何太后母亲的关系，张让等又得悄悄溜进宫廷当差。八月，不知情况有变的何进入宫报告太后，请求诛杀张让等掌权的大宦官，反被张让等抓住。张让责问何进：国事一塌糊涂，也不能全怪我们。你说宦官秽浊，公卿大臣谁又是清廉公忠的呢？于是杀死何进，自行草拟诏书任命樊陵为司隶校尉、许相为河南尹，企图夺回要害部门重新掌权。但是，这时已不象从前皇室威信崇高，诏书通行无阻的局面了。尚书奉诏感到可疑，提出请何进出来商议。宦官们掷出何进的脑袋，宣称何进谋反已被杀掉，以为可以胁迫群臣听命。不料却引起何进部下强烈的仇恨，袁术等领兵攻打皇宫，放火焚烧宫门。袁绍带兵捕斩樊陵、许相、赵忠等

并尽杀宦官 2000 多人。张让等无法立足,只得挟持皇帝刘辩和他的弟弟刘协仓惶逃跑出城,百官都来不及跟随。河南尹王允派地方官吏追上,杀掉几名宦官,张让等被迫投河自杀,才算把皇帝救了回来。

驻扎在洛阳附近的董卓望见城中火光,领兵急进,正好赶上与百官共同奉迎皇帝回宫。他乘机收编何进部下诸军,成为京城拥有强兵的主要力量,升任司空。九月,董卓便胁迫何太后及公卿百官,废掉皇帝刘辩,另立其弟年方 9 岁的刘协,是为献帝。随即又废黜何太后并将她逼死,自封相国,独揽大权。董卓暴戾骄横,军纪败坏,在洛阳公开抢劫财物,掳掠妇女,甚至盗取汉灵帝坟墓中珍宝。此时首都洛阳战乱之后,物价昂贵,董卓又坏 5 铢钱改铸小钱,1 石粮食值钱数万,民不聊生。袁绍、袁术、曹操等纷纷逃回东方,图谋反抗董卓。

献帝初平元年(公元 190 年),东方部分州郡刺史太守 10 余人推袁绍为盟主起兵声讨董卓,他们各自统领数千以至上万军兵,驻扎在河内(治怀县,今河南武陟西)、颍川(治阳翟,今河南禹县)、酸枣(今河南延津西)等地。黄巾军余部白波军 10 余万人,此时也正纵横太原、河东,屡败董卓的大将牛辅。董卓害怕在洛阳腹背受敌,决定迁都长安。于是强迫洛阳一带居民数百万人西迁,竟使用军队驱赶民众上路,沿途饥饿疾病,死亡无数,尸体充塞道途。同时,他还放火烧毁洛阳的宫殿官府和民房,至使洛阳 200 里内荒无人烟。董卓如此倒行逆施,本来不难战胜。但是袁绍等人各怀私心,相互观望,谁也不敢奋进。只有曹操愤然率领所部单独西攻,又因兵力过于薄弱而败还。董卓迁到长安,继续胡作非为。初平三年四月,王允

策动吕布刺杀董卓，形势好像有了点转机。但由于善后处置失当，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铤而走险，收罗散兵游勇叛乱，攻占长安，杀死王允，掌握朝政。这些人更是愚蠢残暴，毫无政治才能，根本控制不了局势。其后不久，他们便争权夺利相互残杀，战乱不休，长安城中谷一石值钱 50 万，人民饿死无数，白骨堆积，臭秽满路。汉献帝徒具空名，东汉王朝已不成其为统一的王朝，各地将领乘势纷纷割据一方，纵横捭阖，图谋霸业，逐渐形成了长时间的分裂局面。

第二节 曹操集团的异军突起

一、曹氏集团的形成和发展

曹操在政治舞台上初露锋芒

在汉末割据的地主武装集团中，势力较大的是黄河中下游以北的袁绍和黄河中下游以南的曹操。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国相当于郡）谯县（今安徽亳县）人，155 年（永寿元年）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他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腾曾任中常侍，桓帝时封费亭侯，地位很显要。宦官本来是不能生儿育女的，但由于东汉后期宦官势力很大，顺帝便下令允许他们收养干儿子袭爵。曹腾死后，

曹嵩继承爵位，先后任司隶校尉、大司农等职。灵帝卖官时，曹嵩曾以 1 万万钱的巨款买得太尉的官职。宦官在当时社会上是被歧视的，出身名门的官僚士大夫就更看不起他们了。但在汉末宦官专权的几十年中，曹氏家族的势力却是相当大的。

少年时代的曹操，爱好飞鹰走狗，射箭比武，“游荡无度”，目无礼教，不受礼俗约束。一些有地位的士人自然看不惯，说他“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他叔父担心他不能继承家业，争列名门，经常在曹嵩面前说他的坏话，曹操仍一如既往。曹操行为虽然不合当时的礼俗，但他有治世的志向，在登泰华山时，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不戚年往，忧世不治。
存亡有命，虑之为蚩。

这表明曹操想改变东汉末年混乱的局面。为了实现这样的政治理想，他博览群书，尤其喜爱兵书。他收集了各家兵法，汇编成册，题名《接要》，还为《孙武子》作注。此注经过不断充实，曾传之于世，后来原书失传了。

曹操为了登上仕途，实现自己治世的抱负，很注意和名士交往，经过一番周折，总算得到了梁国桥玄和南阳何颙等大名士的赏识。桥玄赞扬曹操说：“看来天下将要大乱，不是治世之才是不能使天下安定的；能安定天下的就是你了。”他还鼓励曹操说：“你要好好努力。我已经老了，愿意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你。”为了让曹操取得名声，桥玄还劝他去结交许劭。

汉代选拔官吏主要采取察举、征辟的办法。舆论的评议，

对选拔官吏有很大影响。评论得好，名声好了，就有被推举做官的可能。东汉末年，品评人物的风气很盛。许劭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名士，很能品评人物，经常在每月初一，对一些人物进行评论，叫做“月旦评”。谁要是得到许劭的称赞，谁的身价就能抬高许多。经过名士桥玄的介绍，曹操见到了许劭。许劭有些看不起曹操，但又感到他与众不同，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人物，便给他下了这样一条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句话虽然带有侮辱性成分，但曹操听后却很得意。

曹操注意结交各种人物。在交游中，他对东汉的黑暗政治以及世家大族的奢侈腐化情况，了解得更多了，并且深为不满。袁绍、袁术的母亲死时，在家乡汝南举行豪奢的葬礼，参加者有 3 万人。曹操看到葬礼的情景，对好友王儒说：“天下将要大乱，罪魁必定是这两个人。要安济天下，为百姓免除痛苦，应该先除掉这两个人。”王儒说：“我赞同你的说法。安济天下的人，除了你还有谁？”说罢两人相对而笑。

174 年（熹平三年），曹操 20 岁的时候，以孝廉的身份被推举为郎，做了洛阳北部尉，踏上了仕途。洛阳有东西南北四部，每部设尉一人。尉的官职不算高，比县令还要低些。洛阳北部尉负责洛阳北部的治安。洛阳是首都，在皇帝脚下，权责又多，很不容易治理。曹操官职虽小，执法却很认真。他一上任，便在衙门左右各悬五色大棒 10 余根，申明禁令，凡有违犯者不避豪强权贵，一律用五色棒打死。宦官蹇硕的叔父依仗侄子的权势，根本不把曹操这个芝麻大的官放在眼里，违禁夜行，被曹操棒杀。于是“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治安情况大为好转。曹操虽然出身于宦官家庭，但对宦官专权，胡作非为、横行

不法的现象,是不满的,所以对宦官集团中犯法的人,也毫不客气。

由于曹操在初登政治舞台这段时期,表现了自己的才干和勇气,在政治上发生很大影响,所以一直不能忘怀。后来,当曹操晋封魏王时,还把当时推荐他作北部尉的京兆尹司马防请到邺城来,设酒款待,开玩笑说:“我今天还可以再去作尉吗?”司马防回答说:“过去我推举大王时,大王正适合作尉。”曹操听罢,哈哈大笑。

177年,曹操出任顿丘县令,不久征入朝廷为议郎。后来曹操的堂妹夫宋奇被宦官杀掉,曹操沾点亲戚关系,也被免职。180年2月,再次被征为议郎。曹操不顾自己安危,给灵帝上书,为10多年前在“党锢”事件中被宦官集团杀害的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等申冤鸣不平。灵帝置之不理。

184年,黄巾起义,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随皇甫嵩、朱儁镇压颖川的黄巾军,后迁任济南(今山东历城东)相。济南是王国,按东汉制度,被分封的王只能享受封区内的赋税收入,无行政权力。国相就是中央派到王国处理政事的官吏,如同郡守。济南所属十几个县,县官多数上通宦官权贵,下结地方豪强,依仗权势,狼狈为奸,鱼肉百姓,弄得地方上一塌糊涂。曹操上任后,一下子将县官奏免了8个。这样一来,大小官吏无不震恐,有的还逃入外郡,于是济南地区“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另外,济南这个地方,官僚地主立祠庙祭祀祖先的风气很盛。他们以此标榜祖宗“功德”,抬高自己的地位。官吏、商人利用祭祀,欺诈人民,骗取钱财,“奢侈日甚”,而“民坐贫穷”。对这种情况,历任的国相,没有一个敢去禁止。曹操到任后,把

这些祠庙都毁掉了，并禁止再搞这种祠祀。187年（中平四年），曹操被任命为东郡太守，在“权臣专朝，贵戚横恣”的情况下，他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志向，去迎合权贵；又因过去已经多次触犯了他们，再继续干下去，担心会连累全家，便托病不就，归还乡里。他在谯县城东50里的地方，盖了一所幽雅的住宅，读书行猎，自得其乐，想游离于东汉腐朽政局之外，等天下太平时，再出来大显身手。第二年，灵帝为了加强京城禁军的力量，成立了西园新军，设置八校尉统领。曹操被任为典军校尉，成为京师禁军首领之一。曹操的政治热情又重新燃烧起来，他感到掌握一部分军权，是发展自己势力的好机会，于是又到洛阳上任去了。

灵帝死，少帝继位后，曹操和袁绍都参与了外戚何进集团诛杀宦官的密谋。袁绍建议何进召董卓入京，尽诛宦官，曹操不同意。他说：“宦官是历来都有的，问题是君主把大权交给了他们，以致闹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要治他们的罪，应当诛杀首恶，只需一个执行的狱吏就够了，何必纷纷把外将召来呢？想尽诛宦官，事情必定泄露，我看是要失败的。”何进不听，果然被宦官杀害。董卓进京后，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拉拢曹操，任命他做骁骑校尉。曹操认为董卓是一时势盛，最终难免失败，便拒绝与他合作，在一个夜晚逃出洛阳。

曹操经过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借宿故友吕伯奢家，正赶上吕伯奢不在家，他儿子和几个同伴抢曹操的马匹和财物。曹操把他们杀死，继续东逃。来到中牟（今河南中牟）时，一个亭长发现他行迹可疑，把他扣留起来，送往县衙门。这时县令虽然已接到董卓追捕曹操的通缉令，但不知道送来的就是曹操。

县衙门的一个功曹知道送来的是曹操，但不说穿。他认为“世方乱，不宜拘天下雄俊”，便在县令面前说情，把曹操放了。

接着曹操去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准备起兵讨伐董卓。陈留郡太守张邈，原来是曹操的好友。陈留郡属兖州，兖州刺史刘岱是反董卓的。因此，曹操到达陈留之后，他们允许曹操在这里招募军队，积蓄力量。

曹家本来有一部分财产在兖州境内，曹操就用来作为训练军队的费用。陈留人卫兹也拿出家财帮助他。曹操共招兵5000人，并凭借这部分兵力，同关东诸军一起讨伐董卓。

后来曹操因孤军进攻董卓而失败，他感到要成就事业，光靠别人是不行的，必须依靠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于是便下扬州募兵。扬州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昕给他4000人。走到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这些人大部分叛逃了，余下的只有500人。这时他的堂弟曹洪带领家兵千余人到了龙亢，不久他自己又在铨县（今安徽宿县西南）等地收兵千余人，组成了基本武装队伍，其中家兵千人是这支队伍的骨干。于是，曹操再次北上。这次他不再到酸枣去受兖州军的节制了，而是独立成军，开赴河南前线。

曹操到河南前线后，直接与屯驻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的联军盟主袁绍接触。袁绍见到曹操后，曾问曹操：“如果我们讨伐董卓得不到成功，你看什么地方可以发展势力？”曹操反问他：“你有什么具体打算呢？”袁绍回答说：“我南面占据黄河，北面占据燕、代，联络乌桓，然后向南争夺天下，这样总可以成功了吧！”曹操明确表示自己意见说：“如果凭借山川之险，占据一方去发展势力是很不够的。我要任用天下有才能的

人，用合乎时宜的办法来引导他们，大业一定能成功。”

袁绍想使自己的势力有机会得到发展，同韩馥谋立幽州牧宗室刘虞做皇帝。曹操反对说：“我们大家起兵，是为了消除董卓的擅权和暴乱，所以得到了远近的响应；现在你们想要再立第二个皇帝，天下就要更乱，怎么收拾得了。诸君北面，我自西向。”明确表示要独立西向长安，剿灭董卓，维护汉家的统一天下。袁绍还给袁术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袁术阴谋自己称帝，也不同意拥立刘虞。袁绍、韩馥不顾别人的反对，派使者到刘虞处要他称帝。刘虞怒叱道：“现在天下崩乱，主上受难，我蒙受国恩，未能清雪国耻。你们各据州郡，应该共同戮力尽心王室，怎么能制造这种逆谋来相坑害呢！”坚决不同意称帝。袁绍等只得作罢。

这时，济北相鲍信向曹操建议说：“袁绍以盟主的资格，利用权力，发展个人势力，必将发生变乱，成为第二个董卓。现在要除掉他，力量还不够，可以向黄河以南发展势力，站稳脚跟，等待形势的变化。”曹操很赞同这个意见，于是率领以曹氏子侄为骨干的精兵，在黄河南岸展开了建立根据地的斗争。

争夺兖州

191年（初平二年），青州黄巾军和河北黑山军，又以燎原之势发展起来。这年秋天，10多万黑山军在于毒、白绕、眭固的率领下，进攻冀州的心脏邺城和东郡，并有渡过黄河南攻兖州的动向。而青州的百万黄巾军，因袁绍手下青州刺史臧洪的压力，正分两路向河北移动，准备与黑山军会合。

这时，袁绍刚领冀州牧不久，他担心两支起义军一旦会

师,更威胁他在冀州的统治,便想了一个堵击的计划。他以盟主的名义,派曹操引兵进入东郡,围剿黑山军。在镇压农民起义这一点上,袁绍和曹操的立场是一致的,但各自的打算不同。袁绍是想通过镇压起义军,把势力扩展到兖州。他并不了解曹操,以为曹操能附属于他。而曹操是想利用这一机会,取得一块地盘,然后别图发展。曹操在濮阳(今河南濮阳)镇压了黑山军的白绕部,袁绍就任命他为东郡太守。第二年,青州黄巾军入兖州,先攻下任城(今山东济宁),杀死任城相郑遂,接着向东平(今山东东平)进军。兖州刺史刘岱截击黄巾军,被黄巾军杀死。这时曹操正准备以东郡为基地,扩充势力。当刘岱死后兖州“州中无主”的消息传来,东郡人陈宫为使曹操占据兖州,去做说客。他对兖州的大小官员说,如果推举曹操出任兖州牧,曹操一定能担负起阻击农民军的任务。这时,曹操的朋友鲍信正在兖州任济北相,也竭力说服大家接受这个意见。于是鲍信和兖州治中万潜亲自赶到东郡,把曹操迎到兖州,做了兖州牧。

接着,曹操与鲍信进击黄巾军于寿张(今山东东平西南),被黄巾军打败,鲍信被杀死。后来曹操“明设赏罚,承间设奇,昼夜会战”,青州军遭受损失,不得不向济北(今山东长青西)方向撤退。曹操纵兵追击。青州军给曹操写信说:“你过去在济南,毁坏神坛,这个精神和我们黄巾军的道理相同。你似乎是个懂道理的人,但现在迷惑了。汉运已尽,黄家当立,新的天下就要出现,不是你的才力所能阻止得了的”,幻想取得曹操的合作。他采用武装镇压和诱降相结合的手段,迫使青州军30万向他投降。曹操从其中挑选一些精锐组成了一支战斗力

很强的队伍，号为“青州兵”。

这期间曹操的武装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曹操出任东郡太守以后，山阳钜野（今山东巨野）的豪强地主李乾纠合数千家宾客和曹操联军。李乾及其子李整死后，其侄李典就率领宗族、部曲 3000 余家共 1.3 万余人，归附曹操。勇将典韦也投到曹操所部夏侯惇的帐下。曹操领兖州牧后，任城（今山东济宁）地主吕虔也率领一批家兵归附。泰山巨平（今山东泰安南）人于禁，原为鲍信手下的普通兵士，前来投奔曹操。曹操根据他的才干，提拔他为军司马。阳平卫国（今河南清丰）人乐进原来是曹操的“帐下吏”，后来回本郡募兵，得 1000 多人，回来后就被提拔为军假司马和陷阵都尉，很快成为曹操的重要将领。

这样一来，曹操手下的战将多了，军队增加了，又有了精锐的“青州兵”，他的武装力量便进一步壮大了。这是曹操在兖州建立根据地的重要凭借。

曹操在兖州刚立住脚，就遭到袁术的进攻。兖州在袁术占据的南阳和袁绍占据的冀州的中间。袁术要向北发展势力，必须首先占领兖州。192 年冬，曹操刚击降青州黄巾军不久，袁术和公孙瓒就南北配合，同时向曹操和袁绍进攻。公孙瓒还派部将刘备为平原相，帮助青州刺史田楷、徐州牧陶谦，从东面威胁兖州。这时，曹操表面上继续保持对袁绍的依附关系。年底，袁绍在龙凑（今山东平原附近）击溃公孙瓒的主力，迫使他逃回幽州。第二年，曹操在陈留等地打败袁术，逼使他离开南阳，退居淮北。

曹操大败袁术，解除南面的威胁之后，便向东面的徐州发

展势力。

这时徐州牧是陶谦。陶谦是丹阳人，因参加镇压徐州黄巾军有功，被东汉政府任为徐州刺史。董卓专权时，他没参加关东联军讨伐董卓，被董卓提升为徐州牧。董卓被杀后，陶谦同袁术、公孙瓒结合，与曹操为敌。193年（初平四年）夏，曹操派人到琅邪接父亲曹嵩来兖州，在途中被陶谦部将张闳截击，曹嵩被杀，100多车财物被抢。这样，曹操同陶谦的仇恨就更深了。

同年秋，曹操亲率大军，东征陶谦，连下徐州10多个城池，进抵彭城（今江苏徐州）。陶谦领兵前来会战，被曹操打败，退保郯县（今山东郯城）。曹操攻郯不下，引兵向南攻陷虑（今江苏睢宁西南）、夏丘（今安徽泗县）等地。这时，曹操军队的纪律还很差，曹操的复仇心理也很强，“所过多所残戮”，前后“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陶谦急忙向青州刺史田楷求救。田楷派平原相刘备率数千人去支援。陶谦推刘备为豫州刺史，给他4000人，命他屯小沛（今江苏沛县东），抵抗曹军。这时曹操“军食亦尽”，便领兵退回兖州。

194年（兴平元年）4月，曹操第二次东征陶谦，大军进入徐州后，连下五城，一直扫荡到琅邪、东海两郡。曹操想拿下徐州治所郯县。陶谦和刘备合军在郯县东郊堵击，被曹军打败，陶谦准备逃向丹阳。正在这时，兖州境内发生了反对曹操的叛乱。曹操闻讯，急忙撤军，赶回兖州。

这次叛乱是陈留太守张邈发动的。张邈本来和曹操的关系很好，曾支持曹操在陈留起兵。关东联军讨伐董卓时，曹操实际上是张邈的部将。曹操代刘岱出任兖州牧以后，地位居于

张邈之上，张邈内心便有些不服。虽然曹操对张邈表示充分信任，在第一次东征陶谦时曾对自己家属说：“我如果战死了，你们就去投靠张邈”，但张邈害怕终有一天会为曹操所灭，“心不自安”。这时张邈手下的陈宫由于曹操将兖州名士边让杀了，也产生疑惧，便劝说张邈乘曹操领兵东征，内部空虚的时机，迎接在河内的吕布来一起统治兖州。张邈同意了陈宫的计划，派兵劝迎吕布到濮阳来，并推吕布为兖州牧。

张邈和陈宫在兖州统治已 10 多年，尤其是在陈留郡和东郡，有深厚的潜在势力，因此他们一起来反对曹操，立刻“郡县皆应”。只有兖州治所鄆城（今山东鄆城）以及东郡的两个属县范和东阿，还在曹操手中。同时，鄆城城内不少将吏也与张邈通谋，形势对曹操来说确是危险的。这时留守鄆城的荀彧，沉着冷静，坚定不移。他一方面派人将张邈叛变的消息通知曹操，一方面派人把驻扎在东郡的大将夏侯惇调回鄆城。在夏侯惇率领本部人马回到鄆城的当夜，他就把在城内通敌的将吏数十人杀掉，安定了军心。荀彧还派程昱到范和东阿，鼓励当地官兵“拒城坚守”，等待曹操回军。

吕布军队在鄆城、范、东阿等地的军事行动还未取得多少进展，曹操的军队便赶回来了。

同年 8 月，曹操围攻吕布占据的濮阳，在濮阳大姓田氏的帮助下，率军攻入东门，但巷战不利，险些被吕布的骑兵抓住。他冒着火焰从东门逃出，左手也被烧伤了。

濮阳一仗失利，曹操军队的士气受到很大影响。曹操不顾伤痛，亲自到各军抚慰将士，表彰有功之人，并鼓励他们做好攻城的准备，继续向吕布进攻。

从5月到8月,双方战争持续了100多天。吕布的粮食用尽,退兵山阳(今山东金乡西北)。曹操也因军队乏食,在9月回到鄆城。

曹操因兖州大部分地区丧失,战场上不顺利,加上灾荒严重,粮食难于筹集,兵士因饥饿有些逃离军队,处境是相当困难的。就在这时,袁绍派来说客,表示愿意同曹操继续保持联盟的关系,但要曹操把家属做为人质,送往冀州邺城。袁绍在曹操同吕布激战的时候,不来支援曹操,这时表示友好,实际上就是想乘人之危,借机吞并曹操。曹操认为这样做是“耻辱”,断然拒绝了。

经过一番艰苦的准备,195年春,曹操重振旗鼓,开始了收复兖州失地的战斗。他首先败吕布于定陶(今山东定陶),夏天又在钜野(今山东巨野南)大败吕布,并将吕布的将领薛兰杀死。正在这时,传来了徐州牧陶谦病死的消息,曹操想先去攻取徐州,然后回来打吕布。荀彧劝阻了曹操,并提出巩固根据地的意见,被曹操接受。

接着,曹操派兵抢收麦子,解决紧迫的军粮问题。吕布、陈宫领兵万余人来战,曹操用设伏的办法,将他们打败。吕布逃向定陶,曹操引兵追赶,经过激战,将定陶拿下。吕布率领残兵败将向徐州逃去。曹操分兵收复了兖州的一些反叛郡县。

张邈跟着吕布逃向徐州,派他弟弟张超保护家属逃往雍丘(今河南杞县)。8月曹操进围雍丘,到12月将城攻下,张超自杀。张邈在9月间听到雍丘被围的消息,想到袁术那里去请救兵,路上被部下杀死了。这时候,朝廷正式拜曹操为兖州牧。

这样,兖州便全部掌握在曹操手中了。他在河南的这块根

据地基本巩固了。这是曹操以后战胜其他对手、统一北方的基本条件。

挟天子以令诸侯

早在 192 年曹操代刘岱为兖州牧之后，兖州治中从事毛颺曾对曹操说：“现在天下分裂，皇帝西迁，老百姓不能从事生产，饥饿流亡，公家没有一年的储备，百姓得不到一点安定，这是难以维持长久的。现在袁绍、刘表虽然士民众多，看起来强大，但都无长远考虑，不是建树牢固基础的人。打仗要师出有义名，守卫要靠经济力量，我们应该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这样，霸王之业，可得成功。”

曹操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便着手去做。但由于兖州的统治没有稳定下来，实行起来有很多不便。曹操打败吕布在兖州的势力后，主客观条件有了变化，便努力贯彻这两项方针，取得了很大成功。

董卓当权时，献帝在长安受董卓控制。王允、吕布杀董卓之后，王允掌握了大权。接着凉州军阀李傕、郭汜等杀死王允，赶走吕布，献帝又落入他们手中。

为了接近朝廷，表示效忠皇帝，曹操在 192 年底，曾派使者前往长安。途中被河内太守张杨拦阻，不让过境。在张杨处的骑都尉董昭劝张杨说：“袁绍、曹操虽是同盟关系，但看形势，他们不会长久联合。曹操目前虽然弱小，却是天下英雄，将来定能发展，应当同他结交。现在是个好机会，最好帮助曹操同朝廷接上关系，并且上表推荐他，如果事情成功，曹操是不会忘记你的好处的。”张杨听后，立即设宴款待使者，并上表推

荐曹操，董昭还代曹操给李傕、郭汜等人写信，以“致殷勤”。曹操使者到达长安之后，李傕、郭汜怕曹操不是出于诚意，想把使者扣留下来。这时黄门侍郎钟繇劝阻说：“现在英雄并起，各自为政，唯独曹操心存王室，如果对他忠于朝廷的行为表示不予接受，恐怕有失众望。”李傕、郭汜只好改变态度，用礼物“厚加报答”，但不给曹操加官晋爵，对他的兖州牧地位，也不予正式承认。

195年（兴平二年）2月，凉州军将领之间火并，李傕先杀死右将军樊稠，接着又同郭汜互相残杀。他们在长安城内外，混战好几个月。李傕为了取得优势，放火烧掉宫殿，把献帝从宫中转移到自己兵营中来。郭汜则扣住公卿大臣作人质。双方闹得不可开交，力量都削弱了许多。6月间，李傕部将杨奉叛变，带走了不少军队，李傕的兵力更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凉州军的另一个将领镇东将军张济为李傕、郭汜调解，双方同意讲和，把挟持的献帝和公卿们也放出来了。

皇帝放出后，多数将领主张向东，回到洛阳去。李傕、郭汜不愿离开老巢，表示反对。结果双方妥协，暂时住在附近县城。8月，献帝来到新丰（今陕西临潼北），郭汜想胁迫献帝迁于郾，献帝不愿意，和公卿们躲到杨奉营中。杨奉击败郭汜，和董承等“护驾”东行。不久张济、李傕、郭汜又联合起来，追截献帝，在弘农（今河南灵宝北）把杨奉打败。杨奉表面上同李傕等讲和，暗中招来河东白波军首领韩暹等助战，又把李傕打败，继续“护驾”东行。李傕等又整兵追击，再次将杨奉等打败。杨奉等慌忙北渡黄河，用牛车把献帝迁到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由河内太守张杨、河东太守王邑供奉献帝粮食衣物，献帝

和百官们才算有个着落。196年7月，献帝在杨奉等人的护送下，终于回到了故都洛阳。

献帝虽然是个废物，但毕竟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谁把皇帝抢到手，谁就有政治上发号施令的主动权。所以不少人围绕着他争来抢去，大动干戈。在他身边的人，不愿抛弃他，离他较远的人，有些也想把他弄到手。早在献帝逃往河东的时候，袁绍手下的谋士沮授就向袁绍献计说：“应当趁我们在冀州开始站稳脚跟的时候，到西面去迎接献帝，把他迁到邺城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士马以讨叛逆，谁能抵挡得了呢！”但袁绍的另一个谋士郭图却反对说：“当今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聚集徒众，都想争夺天下。正是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如果我们把献帝迎到身边，动一动就得向他请示。听从他，则我们的权轻；违背他，又成为抗拒命令。这不是好办法。”沮授又说：“现在迎接朝廷，符合道义，又合时宜，如果不早定下来，必然有人抢先。”袁绍对沮授的主张根本听不进去，拒不接受。

正像沮授估计的那样，曹操抢先动手了。先前，曹操虽然没有力量打到长安去，但尽量做到通使长安，取得献帝对他做兖州牧的承认。现在献帝东移，正是迎接的好机会，他的重要谋士荀彧说：“现在皇帝东流西徙，人们担心帝室的命运，如能在这时迎奉献帝，正符合人们的愿望。用忠于帝室的行动来镇服各据一方的雄杰，是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应该当机立断，及早行动。”这正合曹操心意。他派曹洪领兵西迎献帝。这时，在朝廷当权的人物中，以杨奉的兵马较强，率军守梁县（今河南临汝）。董承、韩暹留在京师宿卫。他们之间虽然表面上联合

一体，实际上却勾心斗角，矛盾重重。曹操决定先利用杨奉，便通过早已和自己友好、这时在朝廷任议郎的董昭，给杨奉写信表示愿意与他合作辅佐王室，“有无相通，长短相济”。这时杨奉势孤力薄，见信大喜，对诸将说：“曹操在许县，离我们很近，有兵有粮，应该依靠他。”于是，他和诸将一同上表，请献帝拜曹操为建德将军，又迁为镇东将军，袭父爵为费亭侯。

这时，韩暹“矜功专恣”，董承不满，又无力对付他，也在暗中召曹操进京。曹操十分高兴，亲自率领军队赶到洛阳，朝见献帝。韩暹自料敌不过曹操，逃出京城。献帝任命曹操为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参预朝政。尽管如此，曹操要想巩固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真正能够“奉天子以令不臣”，还要付出很大气力。有一次曹操问董昭：“现在我到了洛阳，你看今后应该怎样做？”董昭回答说：“将军兴义兵以诛暴乱，现在又入朝天子，辅佐王室，这是五霸之功。但是这里的将领们，各怀异心，未必服从。留在洛阳匡弼朝政，必有许多不便，最好的办法是将天子迁到许县去。然而朝廷几次迁徙，现在刚还旧京，再移动恐怕会造成麻烦，愿将军权衡利弊，采取对策。”曹操认为迁都许县确实是个好办法，但最担心的是掌握“精兵”、屯驻于梁县的杨奉的阻挠。对此，董昭说：“杨奉势孤少援，愿意同将军合作。将军迁为镇东将军，袭费亭侯，是杨奉起的作用，应该及时选派使者厚厚答谢他，把他稳住。我们可以对他说：‘洛阳已残破不堪，没有粮食，想暂时把献帝接到鲁阳（今河南鲁山）去。鲁阳离许县很近，粮食供应没有困难。’杨奉为人勇而无谋，必定不会多疑。”曹操按董昭的意见办了，杨奉果然信以为真。曹操便把献帝转移到了许县，改年号为建安，以许为都城。献帝任曹

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于是，曹操总揽朝政。

这时杨奉才知道自己上了当，起兵想抢回献帝，结果被曹操打败，他的将领徐晃也投降了曹操。杨奉率余部投奔了袁术。

曹操得势，袁绍有些后悔，他要求曹操将帝都迁到鄆城，因鄆城离袁绍占据的冀州比较近，便于控制献帝。曹操拒绝袁绍这一要求，写信责备他说：“你地广兵多，而专门树立自己的势力，没看见你出师勤王，只看见你同别人互相攻伐。”袁绍无奈，只得上书表白一番。曹操以献帝的名义任袁绍为太尉，封邺侯。太尉虽是“三公”之一，但位在大将军之下。袁绍见曹操任大将军，自己的地位反而不如他，大怒道：“曹操几次失败，都是我救的他，现在竟然挟天子命令起我来了！”拒不接受任命。曹操的实力毕竟还不如袁绍，不得不把大将军的职位让给他，自己任司空（也是“三公”之一），以缓和同袁绍的矛盾。

曹操在政治上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越地位，对以后逐步消灭北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起了不小的作用。

屯田垦荒 充实军资

粮食问题是任何军队、任何政权都必须考虑解决的大问题。曹操的亲身经历，使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感受很深。

从陈留起兵之后，曹操就经常被粮食问题困扰着。他讨伐董卓失败，到扬州募兵过程中，募来的新兵，由于粮食不足，在中途叛逃过。他东征徐州陶谦时，曾由于粮食困难，不得不中途退兵。他同吕布争夺兖州统治权时，因粮食接济不上，只好罢兵自守。这时程昱为他设法筹集，也只能在自己所辖的东阿

解决三天的军粮，而且其中还杂有人肉干。他前往洛阳迎接献帝时，因粮食吃光，将士们险些饿死，幸而新郑县令杨沛把储存的桑椹干拿出来暂时充了饥。

粮食问题，不仅在曹操军队中如此，其他各地军阀的情况也一样，有些甚至更为严重。有不少武装势力，就不是被对手打败的，而是由于缺乏“粮谷”，“瓦解流离，无敌而自破”。

严酷的现实使曹操深深体会到，粮食对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不设法解决军粮问题，在群雄角逐中是站不住脚的，更谈不到吃掉对方，并兼天下。曹操还从历史中吸取经验，认识到强兵足食是立国的基础。因此他在196年，把献帝接到许县后，决定推行屯田制。在发布屯田令的同时，曹操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负责经营管理屯田事宜。

实行屯田要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国家要有直接控制的土地，二是要有相当的劳动力。就前者来说，连年战乱，地主和农民死亡流散，大量土地荒芜，无人经营，使曹操政权直接掌握了不少已开垦的土地。就后者来说，曹操先后镇压招抚了青州、颍川和汝南的黄巾军，他们有耕牛、农具，可以从事生产。枣祗、任峻等人便把原黄巾军的一些人，用军事组织形式加以编制，组织成屯田民。此外，曹操还在许下广泛招募各地流民，采用同样办法，把他们组织起来。屯田的基层组织为屯，每屯约有五六十人，由屯田司马管理。屯田组织不统属于郡县，而自成一个系统，官员有典农中郎将、典农都尉和直接隶属于朝廷的大司农。

屯田农民称屯田客，是直接受国家地租剥削的佃客。屯田

制开始实行时,不少人主张采用“计牛输谷”的办法,即按使用国家耕牛的多少,向国家缴纳定额租谷。这个不管收成好坏定额收租的办法,遭到了枣祗的反对。他认为按这个办法,收成好的年份,国家的收入不增加,收成坏的年份,农民的负担不减轻,是不妥当的。他提出了“分田之术”,就是根据每年的实际收成,按一定的比例缴纳租谷,丰收多纳,欠收少纳。曹操认为这个主张很有道理,便采纳了。

按照“分田之术”,屯田客用官牛耕种的,要将收成的60%交给国家,自得40%;如用自己的牛耕种,收成各得50%。这个剥削比例是相当高的,同汉代佃户的地租负担差不多。但是,屯田农民不承担兵役和徭役,比汉代佃户负担轻些。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屯田制能够实行下去。

随着曹操统治地区的扩大,屯田的地区也逐渐增多。除原来的民屯外,在一些军事驻地又建立了军屯,由士兵担任生产,建立了战时作战、平时务农的体制。

汉武帝实行屯田,只是在西北边疆地区,因为当时军事行动主要在西北地区。曹操在中原地区实行了这一制度,这是因为当时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在中原地区,实行屯田,有利于就地解决军粮供应问题。

屯田制的推行,使许多流民重归土地,解决了他们的一些生计问题,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并有力地支援了曹操对其他割据势力的战争。屯田事业对曹操势力的兴起和发展,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广纳贤才、经略徐淮

196年到199年，是曹操势力在河南地区大发展时期。

由于曹操控制着献帝，据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加上注意招纳贤者、广求人才，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便向他身边聚集。他曾三次发布“唯才是举”的命令，指出凡是治国、用兵之才，不论品行如何，都可以做官。

在吸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加曹操集团的过程中，较早投奔曹操的荀彧起了不小作用。

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南）人，祖父荀淑、父亲荀緄、叔父荀爽都是东汉名士。荀彧少年时，很得名士何颙的赏识，称他是“王佐之才”。189年，被举为孝廉，任县令，董卓之乱后，弃官归家。他认为颍川是“四战之地”，为了避开战祸，接受冀州牧韩馥的邀请，带领宗族移居冀州。他来到冀州时，韩馥已为袁绍所吞并。由于荀彧的弟弟荀谏和同郡人辛评、郭图等都依附在袁绍门下，在他们的劝说下，荀彧便依附了袁绍。袁绍不会用人，很少向荀彧询问政事，使他的才能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经过观察，他料定袁绍成不了大事，又听说曹操思贤若渴，便在191年前往东郡投奔曹操。曹操热情地接待了他，两人谈得非常投机。曹操高兴地说：“你真是我的子房啊！”曹操将荀彧比作张良，表明他对荀彧的重视。随后曹操任他为司马，参与军机大事。194年，陈宫叛迎吕布时，荀彧临危不惧，防御有方，保住了鄄城等地，帮助曹操打败吕布等，建立了兖州根据地。196年，曹操迎献帝建都许后，以荀彧为侍中，兼尚书令。尚书令是直接对君主负责，具体处理日常政务

的首脑。曹操外出征伐时，政事就全由荀彧调度处理。

荀彧在颍川知识分子中，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参加了曹操集团，也促使一些颍川人向曹操靠拢。经荀彧的推荐，荀攸（荀彧侄）、郭嘉两个有智谋的年轻人，于196年投归曹操。

荀攸字公达，何进当政时，任黄门侍郎。董卓之乱以后，谋刺董卓，事败下狱。董卓死后获释，弃官归家。后被任为蜀郡太守，因道路不通，暂驻荆州。经荀彧推荐，曹操任荀攸为汝南太守，后又调到朝廷任尚书。曹操同荀攸谈论国家大事，了解他确是一个智谋之士后，便以荀攸为军师。

郭嘉字奉孝，初在袁绍处，见袁绍不知用人，好谋无断，很难定“霸王之业”，便离开袁绍，投奔曹操。经荀彧推荐后，曹操召见郭嘉，同他谈论天下大事。曹操经过交谈发现他很有才能，于是任郭嘉为司空军祭酒，作为身边军事参谋。

还有钟繇，也是颍川人，原在东汉朝廷任官。曹操通使长安时，他曾为曹操说好话，后随献帝东迁许都。在荀彧的推荐下，曹操以钟繇为侍中、尚书仆射。

此外，避乱扬州的杜袭、赵俨也在197年投奔许都。陈群于198年也被曹操任用。

上面这些人，在曹操战胜对手、统一中原的事业中，做出了不少贡献。

196年以后，曹操的主要对手是北边的袁绍（冀州），南边的袁术（扬州淮南部分），东边的吕布（徐州），还有西边的张绣（荆州的南阳）。面对这种形势，曹操首先采取了北和袁绍的策略，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实力一时还不能与袁绍争锋。他把大将

军的职位让给他,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对于其他的割据势力,曹操采取了由近及远,先弱后强,拉拢分化,各个击破的方针。

曹操为了稳住割据关中的马腾、韩遂,以便集中在东方用兵,就让侍中钟繇兼司隶校尉,督关中诸军。钟繇到长安之后,写信给马腾、韩遂等人,对他们讲清利害关系,劝他们不要轻举妄动。马腾、韩遂表示服从。

197年(建安二年)春天,曹操亲率大军讨伐张绣,直趋宛县(今河南南阳)。张绣接战不利,举众投降,后又反悔,在一个晚间,对曹操营地发动突然袭击,曹军毫无准备,慌忙应战,死伤很多,曹操也几乎丧命。曹操的典军校尉典韦死守营门,身上受几十处创伤,力战而死。曹操长子曹昂及侄子曹安民也都战死。曹操退到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时,听到典韦战死的消息,流下了眼泪,派人从小道取回典韦尸体。曹操还对部将说:“我接受张绣投降,由于没有扣留他的人质,造成这次失败。从今以后,不会再遭到这样的失败了。”198年,曹操又率军进攻张绣,围穰城。围攻了二个月,还没有攻下。这时曹操听说袁绍想偷袭许都,以劫持汉献帝到邺的消息,便解穰城之围,退回许都。第二年,袁绍为了拉拢张绣对付曹操,派使者到穰城,约张绣出兵攻许。张绣的谋士贾诩劝他投降曹操。张绣以为袁强曹弱,自己又与曹操有仇,一开始不愿这样做,但最终张绣还是被贾诩说服了,率领士卒到许都向曹操投降。曹操见到贾诩时,高兴地说:“为我取信于天下的就是你!”接着,曹操拜张绣为扬武将军,并为儿子曹均娶了张绣的女儿。以后张绣在对袁绍的作战中,立下不少功劳。

在各地主集团的兼并战争中,曹操积极利用皇帝的招牌,

扩大自己的影响；袁绍则不愿意皇帝在身边，受其限制；袁术呢，则干脆自己当皇帝。

袁术是司空袁逢的儿子，官至折冲校尉、虎贲中郎将。董卓进京，他逃到南阳；他的部将长沙太守孙坚杀掉南阳太守张咨，他便占据了南阳。关东联军讨伐董卓散伙后，他同袁绍在立刘虞为帝的问题上出现了矛盾。他勾结幽州的公孙瓒反对袁绍；袁绍则联络荆州的刘表牵制他。191年，孙坚讨伐董卓时，带兵进入洛阳，得了一块“传国玺”，上面刻着“受命于天”等字样。据说这块玉玺是宦官张让等人作乱，挟持天子慌忙出奔时扔在井里的。袁术得知这个消息，立刻把孙坚的妻子扣留起来做人质，硬从孙坚手中把这块玉玺抢来，为的是日后好“名正言顺”地做皇帝。195年冬，献帝被挟持东出潼关，袁术以为时机已到，便召集手下人商议，表示要做皇帝。他对手下众人说：“现在刘氏天下很微弱，海内鼎沸。我家世代做高官，老百姓都归附我。我想应天顺民，称皇帝，不知诸君意下如何？”大家都不吱声，只有主簿阎象发了言，认为时机不成熟，袁术只好暂时作罢。袁术想取得老部属江东孙策的支持。孙策却给他写信说：“董卓贪残淫逸，骄奢横暴，擅自废立，天下的人都痛恨他，你怎么能步他的后尘呢？”还说：“你家五代都是朝廷名臣，辅佐汉室，荣誉恩宠，没有人能与之相比，理应效忠守节，报答王室，这是天下人所期望的。”袁术看罢，大失所望。

196年9月，曹操迎献帝都许后，袁术急不可待了。经过4个月的策划和准备，在197年1月，他终于抱着“传国玺”，在寿春（今安徽寿县）正式称帝了。

袁术称帝后，设法与吕布和好，想利用吕布的力量，“徐扬合势”，对抗曹操。曹操为了不使吕布向袁术靠拢，暂缓对吕布的攻击，并写信给他，表示愿意共同对敌；还以献帝的名义发了一道诏书，称赞他杀董卓之功，要他和曹操同心协力辅佐朝廷。

吕布是一个政治上反复无常的人。他本是丁原的部将，卖主求荣，杀丁原投靠董卓；后来又杀董卓，依附王允。他被李傕、郭汜打败逃奔关东之后，先依袁术，再投张杨，复奔袁绍。争夺兖州被曹操打败之后，他逃向徐州依靠刘备；不久又与袁术勾结，赶走刘备，占据徐州。当袁术向他表示友好，愿为儿子娶他女儿时，他很高兴地答应了这门亲事。后来得到曹操的来信和献帝的诏书，他又犹豫起来。

袁术称帝后，马上派韩胤为使者将称帝事告知吕布，并迎接其女儿为儿子完婚，吕布同意了。这时，吕布所属的沛相陈珪，早已倾心于曹操，前来劝说吕布，要他与曹操“协同策谋，共存大计”。他又改变态度，把已经就途的女儿追回，还把韩胤押送许都杀了。

袁术对吕布的出尔反尔，十分愤怒，立即派大将张勋、桥蕤等联合杨奉、韩暹等部，出动步骑数万人，攻打吕布，直趋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这时吕布的兵马不多，害怕敌不过袁术，埋怨起陈珪来。陈珪进计说：“袁术同杨奉、韩暹仓猝联兵，是乌合之众。他们不是一条心，好比连鸡，不能同栖一处，可以离间他们。”于是吕布写信给韩暹、杨奉说：“二位将军曾保护皇帝大驾，我也曾杀死权臣董卓，俱立功名。现在你们怎能同称帝的老贼在一起呢？我们应该协力攻打袁术，为国除害”，并

且答应破袁术之后，将所得军资，全部奉送给他俩。韩暹、杨奉本是鼠目寸光、唯利是图的军阀，得信后，便反戈一击，协同吕布把张勋打败。袁术军死伤惨重，最后他只领 5000 军卒逃走。

曹操在袁术力量削弱的情况下，于 197 年 9 月，乘势宣布袁术罪状，大举南讨。袁术自知不敌，仓惶向南逃去。曹操领兵追赶，将其大将桥蕤、李丰、梁纲等斩杀。袁术退到淮水以南，从此便一蹶不振了。

曹操攻打袁术的时候，吕布乘机在徐州扩大势力。他打败屯驻小沛的刘备，以及曹操派去增援刘备的夏侯惇，并与袁术互相声援。于是在打败袁术后，曹操决定东征吕布。

在曹操决定东征之前，曹军内部有过不同意见。不少将领认为，刘表、张绣在后，远征吕布，恐怕有危险。荀攸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刘表、张绣刚受打击，势必不敢再动。吕布骁猛，又仗恃袁术相助，如果让他纵横于淮水、泗水之间，一些豪杰必然响应他。现在乘他刚反叛，众心不一之时，前去攻打，一定能成功。”曹操认为荀攸的意见很好，便于 198 年亲率大军东讨。10 月，攻下彭城。吕布退保下邳。曹操所属广陵太守陈登起兵配合，曹军很快进逼下邳，打败吕布，将下邳包围起来。曹操写信给吕布，讲明利害，示意要他投降。吕布准备投降，被陈宫劝阻。他们派许汜、王楷到袁术处求救。袁术答应为吕布作声援。实际上，他已经没有多少兵力可以支援吕布了。

曹操围攻下邳，前后二个多月，迫使吕布手下将领侯成、宋宪、魏续等缚陈宫投降。吕布领一部分将士退守到下邳城的白门楼上，最后束手就擒。曹操在白门楼上召集文武官员处置吕布。吕布被押了上来，他请求把绳索放松些，曹操笑着说：

“縛虎不得不緊啊！”他又向曹操說：“明公所忧患的主要是呂布，現在我降服了，願為明公效犬馬之勞”，哀求饒他一命，還要劉備為他講情。劉備對曹操說：“明公你難道忘了呂布是怎樣跟隨丁原和董卓的嗎？”曹操想起呂布反復無常的一幕幕往事，感到十分可憎，下令把他絞死。曹操收降了呂布手下的年輕將領張遼，並提拔重用。張遼後來在曹操的軍事行動中，立下不少戰功，成了曹操手下的重要戰將。

呂布在徐州的勢力被消滅之後，袁術在淮南也無法再支持下去了。這時的袁術，由於追求皇帝驕奢淫逸的生活，把富庶的淮南地區糟蹋得殘破不堪。他自己也因“資實空盡，不能自立”。老百姓不支持他。士兵也不為他賣命，紛紛散走。袁術感到孤立了，想把皇帝的稱號取消。但那塊玉璽他還捨不得扔掉，想把它送給哥哥袁紹，仍讓袁家當皇帝。他想北上到青州依從袁譚（袁紹子），以便與袁紹合軍，但為曹操所阻。199年6月，走投無路的袁術，在壽春的江亭發病嘔血死去。

200年（建安五年），曹操又親征新占徐州的劉備，俘獲劉備的妻子和大將關羽。劉備敗走，投奔袁紹去了。

曹操消滅呂布、袁術，降服張綉，趕走劉備，控制了黃河以南的大塊地區，成為與黃河以北的袁紹相抗衡的重要力量。

二、袁曹爭霸和曹操統一北方

袁紹占據河北

曹操在河南地區忙於征張綉、平呂布、討袁術的時候，也

正是袁绍在河北地区镇压农民起义军，向四外扩张势力得手的时候。

袁绍字本初，汝南人，出身世代官僚地主家庭，人称“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是东汉末年官僚大地主的政治代表。

“三公”是指当时掌握最高军政大权的三个官：太尉、司徒、司空。袁安在章帝时曾任司空、司徒，袁敞在安帝时曾任司空，袁汤在桓帝时曾任司空、司徒、太尉，袁逢在灵帝时曾任司空。袁家四辈都有人做“三公”的官，所以人称“四世三公”。

“门生”这时不单指学生，也指那些投靠有名望的官僚地主门下的人。官越大，名望越高，门生也就越多。“故吏”是指旧时的属员。汉代“三公”和刺史、太守等都可以自己挑选设置属吏。属吏职位的取得以及后来的升迁，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私人关系，因此属吏对选用他的故主，怀有感恩图报的心理，彼此关系很密切。

像袁氏这样有势力的世家大族，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影响很深远。袁绍凭借这个家世，很快升至中军校尉。何进谋诛宦官要依靠他，任他为司隶校尉。袁绍反对董卓废立，董卓不敢杀他；他逃离洛阳后，还任命他为渤海太守，封邳乡侯，就是顾忌袁氏的势力大。关东诸军讨董卓，推袁绍为“盟主”，也是和他的资望分不开的。

虽然如此，他当时也只是一个渤海太守，连一个州的地盘都没有占据。191年，关东联军散伙后，他便向冀州发展势力。这时冀州牧韩馥和屯兵幽州的奋武将军公孙瓒之间有矛盾。袁绍便利用这一矛盾，从中取利。他先写信给公孙瓒，要他领

兵攻打韩馥。袁绍自己也引兵东向，摆出袭取冀州的态势。当韩馥迎战公孙瓒不利时，袁绍选派外甥高干及韩馥的老相识辛评、荀谏等人去冀州，向韩馥陈说利害，劝他将冀州让给自己。韩馥为人怯懦，占地虽广，粮谷虽足，但无谋略。在两边军事威胁和袁绍的劝诱之下，韩馥自思无力抵抗，并且考虑到自己是袁氏的“故吏”，袁绍不会亏待他，便不顾手下一些人的反对，将冀州让出，迎请袁绍为冀州牧。此后，袁绍以韩馥为奋威将军，但不给他一兵一卒，也不给他属官。就这样，袁绍轻易地占据了冀州。他以沮授、审配、田丰、许攸、逢纪、荀谏等人为谋士，以冀州为基地，向四周扩展势力。

冀州一带，农民起义军相当活跃，大的一支有二三万人，小的有六七千人。他们主要活动于河南、河北交界地区。在各支起义军中，以张牛角和褚飞燕最为有名。张牛角死后，部众推褚飞燕为首领。褚飞燕改姓张，称张燕。其他各支义军也纷纷归附张燕。张燕势盛，号称“黑山军”，在冀州攻打郡县，给袁绍造成严重威胁。

193年，黑山军的一支数万人，在于毒的率领下，乘袁绍攻打公孙瓒、内部空虚之机，一举攻下了冀州首府邺城，杀死郡守。袁绍率兵反扑。起义军退至朝歌（今河南淇县），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失败，于毒及义军1万多人被杀。接着袁绍又相继镇压了左髭、丈八、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氏根等部起义军，摧毁起义军营寨壁垒，屠杀数万人。袁绍曾和吕布一起进击黑山军首领张燕，在常山（今河北元氏西北）激战10多天，始终未能得逞。起义军死伤很多，袁绍军队也遭到重创。

在镇压追剿起义军的同时，袁绍又同公孙瓒争夺地盘。袁绍捷足先登，占据冀州，引起公孙瓒的极大不满。191年10月，公孙瓒宣布袁绍10大罪状，领兵3万进攻袁绍。冀州不少地方响应公孙瓒。袁绍害怕，将渤海太守让给公孙瓒从弟公孙范。公孙范到渤海后，反对渤海兵攻打袁绍。公孙瓒任命所属部将严纲为冀州刺史，田楷为青州刺史，单经为兖州刺史，一时势力相当强大。192年春，袁绍驻军广宗，同公孙瓒军队在界桥（今河北威县东清河上）以南展开激战，最后公孙瓒失败，逃奔渤海，严纲被杀。不久，公孙瓒又发兵攻打袁绍，在龙凑（今山东德州东北）被袁绍打败。两次受挫，使公孙瓒的力量大为削弱。他退回幽州，无力再发兵向袁绍进攻了。

公孙瓒退回幽州后，同幽州刺史刘虞的矛盾也激化了。193年，刘虞怕公孙瓒图己，先发兵攻打公孙瓒，结果失败，被擒杀。这样，公孙瓒便全部占据了幽州。

吞并刘虞之后，公孙瓒更加骄横，对老百姓加重榨取，对高贵而有才能的士人，不加优容，有的加以谋害，有的使之穷苦。他宠爱的多为商贩、流氓，同他们称兄道弟，或结为婚姻。“所在侵暴，百姓怨之”。

195年，刘虞旧部鲜于辅等集合州兵，为刘虞报仇，并招引乌桓人，攻打公孙瓒。袁绍乘机联合鲜于辅及乌桓、鲜卑等，集中10万兵力，共同进攻公孙瓒。公孙瓒接连被打败，最后退守易京（今河北雄县）。他在城外筑起10道沟墙，在沟墙里边四周建起五六丈高的土台，台上设了望楼。他自己则居于中间高达10丈的台楼上，以铁为门，与姬妾享乐其中。他以为自己的城池楼台固若金汤，没有人能够攻下。

198年(建安三年),袁绍亲率大军围攻易京。过了一段时间,公孙瓒手下的将领,有的投降,有的溃散。袁绍军直抵易京城下。199年春,公孙瓒感到形势不妙,派人突围出城向黑山军求救,又派人传信,想同援军约定以起火为号,夹攻袁绍。不料信被袁绍截获。袁绍将计就计,如期举火。公孙瓒以为是救兵来到,领兵开城出击,被袁绍设伏兵打败,只好又退守城中。接着,袁绍挖地道,穿到楼下,用火烧楼台支柱的办法将楼台烧倒。当地道穿到公孙瓒楼下时,公孙瓒自知大势已去,缢死其妻子,准备引火自焚。袁绍军队赶到,将他斩杀。

至此,袁绍占据了冀、青、幽、并四州,将河北地区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他以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

袁绍占据冀、青、幽、并四州之后,自以为了不起,野心更大。既然控制皇帝的想法未能实现,他就自己来当皇帝。

袁术在走投无路时,曾想把皇帝的称号送给袁绍。曾写信给袁绍说明这一切。袁绍见信后,便暗地要主簿耿苞为他制造当皇帝的舆论,宣扬“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他制造袁氏是黄帝后代的说法,表明自己是土德。赤德的汉朝衰败,土德的袁氏就应“顺天意”接替它。

但袁绍想称帝这件事,由于遭到手下将吏的反对,只得暂时搁置起来,等打败曹操以后再说,于是他开始作进攻许都的准备。

袁绍进窥许都

袁绍把矛头转向同他隔河相对的曹操后,打算用数量和

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攻下许都、消灭曹操。他手下的谋士沮授、田丰等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曹操在政治上处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而且法令统一、士兵精练。而自己方面因为连年用兵，百姓疲劳、府库空虚。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是不利的。他们主张，应当首先发展农业生产，奠定经济基础，充实军事力量，然后再去攻打曹操。但是，这个意见没有被野心勃勃、骄傲自大的袁绍所接受。他终于在郭图、审配等人的迎合、怂恿下，点选大军 10 万人向许都进攻。

在兴兵以前，袁绍原命沮授统率三军。郭图等人为了争功邀宠，对袁绍说，沮授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将来就不好控制了。袁绍对于沮授不赞成他这次用兵，本来已经不满，又听了郭图的谗言，就决定把沮授原来统率的军队分别命令沮授、郭图、淳于琼三个人各自带领一军。这样，就削弱了沮授总领三军的大权。

袁绍在进攻以前，曾经派人去劝说荆州牧刘表从南面进攻曹操。刘表只是在口头上答应了袁绍，实际上并没有出兵助战。袁绍的第一着棋落空了。他又派使者到穰城（今河南邓县）去见张绣，动员张绣从侧面袭击曹操。但是，张绣不仅没有帮他的忙，反而接受谋士贾诩的劝告，率领所部官兵归降了曹操。这样，就相对地减少了袁绍的优势。袁绍不得不推迟大举进攻的时间。

曹操听到袁绍要来进攻，就同他的高级谋士郭嘉、荀彧等人分析了当时的客观形势。特别是郭嘉，很有智谋，他把曹操和袁绍双方的情况作了对比，指出曹操必胜，袁绍必败。于是，

曹操决定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公元199年8月，曹操把部队推进到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并且先后作了以下的战略部署：

(一)派臧霸带领精兵进入青州，用来牵制袁军，同时巩固自己的右侧。

(二)派于禁带领步骑兵2000人屯守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同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北)太守刘延共同防止袁绍的正面进攻。

(三)在官渡布置防线，作为阻挡袁军的主要阵地。

公元200年春，正当曹操布置对袁绍作战的时候，另一个军阀刘备占据了徐州、下邳(今江苏宿县西北)等地。附近郡、县大多归附刘备。刘备的军队发展到几万人。他同袁绍有联系，打算合力对付曹操。面临这个意外的情况，为了避免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曹操决定亲自领兵去攻打刘备。结果，曹军很快地把刘备打垮，接着，又攻下下邳，擒获了刘备的大将关羽并收为己用。刘备兵败，被迫退到青州去投奔袁绍的儿子袁谭，后来又转到邺城(今河南安阳北)去投靠袁绍。这样，曹操就取得了局部优势。曹操打败刘备以后，就亲自领兵出屯官渡，准备迎击袁绍。

白马、延津之战

当曹操出兵进攻刘备的消息传到河北的时候，袁绍的谋士田丰认为这正是一个进攻许都的好机会，建议袁绍发兵去袭击曹操的背后。但是，见事迟慢的袁绍竟以儿子有病来推辞，没有接受田丰的建议，以致失去了有利的战机。田丰气得

连连说：“可惜呀可惜，大事完了！”直到曹操击破刘备回军官渡以后，袁绍才召集众将讨论怎样进攻许都。田丰认为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进攻是不利的，就一再劝阻袁绍说：“曹操既然已经打败了刘备，许都就不再是空虚的了；况且曹操善于用兵、机智灵活，他的军队虽然少，但是不可轻视。为今之计，不如作持久的打算。”袁绍不但拒绝田丰的忠告，而且认为他故意扰乱军心，下令把他关进监狱。接着，袁绍就向各州郡发表了讨伐曹操的文告，准备大举进攻。

同年2月，袁绍把大军10万人集结在河北前线的黎阳，准备渡河南进，直捣许都。他首先派大将颜良进攻白马。四月，曹操从官渡率兵北上，解救白马。他采纳了随军谋士荀攸的建议，引兵先到延津，装作要渡河去袭击袁绍后方的模样，准备等袁绍西来应战的时机，再以轻装部队回袭白马。袁绍不知是计，果然派出一部分军队往延津去迎战。曹操立刻率领骑兵，轻装急进，赶到白马。曹军来到离白马10多里的地方，颜良才发觉，慌忙应战。刘备的大将关羽也在曹操军中效力。他突入袁军阵中，在千军万马之中斩了颜良。袁军顿时溃败。战斗结束以后，曹操把白马城里的居民全部迁出，随着军队沿河向官渡撤退。

袁绍听说曹操从白马退去，亲自率领大军渡河南进，恨不得一口就把曹操吞掉。沮授劝阻说：“战争胜负的变化，不能不仔细考虑。现在最好还是驻军在延津，分出一部分兵力去进攻官渡。如果能攻下，再来迎接驻留延津的大军，也不算晚；如果大军贸然南进，万一失利，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骄傲自大的袁绍又一次拒绝了沮授的意见，决定命令主力部队

渡河向南追击。同时袁绍见沮授斗志不坚，就再把他的部队抽掉一部分划归郭图指挥。

当袁绍的军队赶到延津以南的时候，曹操命令军队在延津南面山坡下扎好营。瞭望哨发现袁军，立刻向曹操报告说：“袁绍追兵约有五六百骑。”过了一会，又报告说：“袁军骑兵比以前又增加了一些，步兵多得数不过来。”曹操一面命令不用再报告，一面让所有骑兵都卸下马鞍放马，把辎重车辆都杂乱地停在路上。曹操的部下都认为敌军众多，恐难抵挡，主张退守营垒。只有荀攸领会曹操的用意，对他们说：“这样正是为了引诱敌人上钩，怎么能够后退呢？”不一会，刘备和袁将文丑一同率领五六千人马先后来到了。曹军将领们感到情况紧急，催请曹操下令，上马应战。曹操还是非常沉着，对他们说：“还不到时候。”又过了片刻，袁军后继队伍大部分赶到，看见曹军的军用物资堆得满地都是，就争先恐后地去抢夺，乱成一片。于是，曹操立刻指挥全军，一齐上马冲杀。文丑在混乱中被杀。曹操的军队俘虏了文丑的全部人马，退回官渡。袁绍一连损失两员大将和许多人马，士气受到了重大的挫折。曹操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被动地位，奠定了全局胜利的初步基础。

官渡决战

经过白马、延津两仗以后，袁、曹双方进入了一个暂时相持阶段。袁绍虽然连败两仗，但是仍旧保持着优势力量：从军队数量说，袁绍的军队将近 10 万人，曹操最多不过三四万人。从后方的经济力量说，曹操占领的兖、豫 2 州，是汉末以来破坏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远不如袁绍占领的河北地区那样富

庶。曹操虽然在进入许都的那一年,就开始屯田积谷,但是毕竟只有四五年的光景,还不能根本改变占领区的残破面貌。军用粮饷,也远远不及袁绍充足。

曹操虽然在物质条件方面还比不上袁绍,但是他很懂得从政治上争取人心。他一方面严令各地方官加紧催收租税,以便供应前线;另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政治措施。他采纳了朗陵(今河南确山西南)令越俨的建议,把阳安郡界内所征收的绵绢,发还给百姓,减轻一些人民的负担。他还下令部队行军,不许马踏麦田,违者处死。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人民的支持,为自己在军事上战胜敌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袁绍没有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仍旧仗着他在军队数量、装备和物资储备上的优势,盲目冒进。公元200年7月,袁绍把大军集结到官渡北面的阳武,准备继续发动进攻。沮授再一次用持久战来消耗曹军的力量,以便最后战胜曹操。袁绍仍旧不听从沮授的意见。他命令主力部队进到官渡前线,安营下寨,军营东西长达几十里。曹操也针锋相对,摆好阵势,同袁军对峙。

公元200年9月,曹操向袁军发动了一次进攻,没有获胜。他就改变方针,深沟高垒,固守阵地,以等待有利时机。袁绍见曹军坚守不出,命令士兵在曹营外面堆起土山,砌起高高的壁楼,在那里用箭射击曹军。箭密得像下雨一般。曹营士兵来往行动都得用盾牌遮住身体。曹操命工匠连夜赶造了一种砲车,发射石块,把袁军的壁楼击破。砲车发射石块的时候,声响如雷,因此,当时人们都管这种车叫“霹雳车”。袁军这一

着没有成功，又暗凿地道，直通曹营，打算由地道里打过去。曹操针对这种地道战术，命人在营墙内挖掘长沟，进行防御。双方就这样在官渡相持了三个多月。

当时，曹操方面军队数量既少，军粮也不充足。在这种不利的处境下，曹操统治区内的很多军民都对战争前途抱有怀疑，有些郡县甚至叛变了。曹操也很忧虑。他曾经写信同留守许都的荀彧商量，打算退守许都。荀彧给曹操写回信，向他分析战争的前途。信里说明，当前是战败袁绍、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关头；曹军粮食虽然不足，但是还不至于毫无办法，只要坚持下去，战局一定会很快发生变化。他劝曹操要努力争取最后胜利，千万不要退兵，失去机会。曹操认为荀彧的见解很正确，就坚定了同袁绍周旋到底的决心。他一面命令部队继续固守官渡，一面密切注视敌人动态，以便寻找有利时机，进行最后的决战。

曹操看到袁军粮草虽然比较充足，但是因为军队多，消耗也大，如果军粮发生问题，同样会不战自败。曹操一方面严令后方催办粮草，接济军需；一方面，决定派人去烧毁袁军的粮草。恰巧袁绍派韩猛监押粮车几千辆，正在前来官渡途中。韩猛是袁绍手下的一员战将，但是他有勇无谋，而且轻敌少备。荀攸了解到这个情况，就向曹操建议派兵去劫夺袁绍的粮车。曹操派部将徐晃和史涣带兵前往，打跑了韩猛，烧掉了他押送的全部粮车和军用物资。到了10月，袁绍又派人从河北运来1万多车军粮，屯积在大营以北40里的故市、乌巢（都在今河南延津县境），还特派大将淳于琼带领1万人驻扎在那里保护。由于上次粮车被烧，一度造成袁军给养的困难，因此沮授

特别提醒袁绍,要他另派一员战将率领一部分部队驻防在淳于琼的外侧,以防曹军抄袭。袁绍没有采纳。

袁绍的另一个谋士许攸,认为曹操兵少,而且主力部队都集中在官渡,后方必定空虚。因此,他建议袁绍派出一支轻骑部队,去偷袭许都。但是,盲目自大而又顾虑多端的袁绍,并不重视许攸的意见。许攸感到袁绍这样骄傲轻敌,最后一定要失败。因此,他的思想发生动摇。正在这个当儿,许攸的家族有人犯了法,被留守邺城的审配拘捕起来。许攸在气愤之下,竟然背弃袁绍,去投奔曹操。

曹操听说许攸前来投靠,高兴得连鞋子都没有来得及穿,就光着脚跑出去迎接。许攸见了曹操,开口就问道:“袁绍军势很盛,您打算怎样对付他?目前还有多少存粮?”曹操说:“可以支持一年。”许攸知道这是假话,就说:“没有这么多吧!”曹操又回答说:“可以支持半年。”许攸直截了当地说:“您不想打败袁绍吗?为什么不说实话呢!”曹操这才对许攸说:“其实军粮只够维持一个月了。你看这该怎么办呢?”许攸这才把袁绍在鸟巢堆积军粮的情况完全告诉了他,并劝他率轻骑前往偷袭,把袁绍的粮食和辎重全部烧掉。

许攸的情报,使曹操喜出望外。当天夜里,曹操留下曹洪、荀攸防守官渡大营,亲自率领步骑兵 5000 人,打着袁军旗号,每人手里拿着一把干柴,从小路奔向鸟巢。曹操的部队骗过了袁军的耳目,顺利地通过了袁军的防线,把袁绍的粮屯团团围住,然后放起火来。袁军从梦中惊醒,慌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天亮以后,袁军守将淳于琼发现曹操兵马并不多,就把军队调出营门,攻击曹军。结果,被曹军打得大败,淳于琼只得退

守营屯。

袁绍听说曹操进攻乌巢粮屯，仍旧没有引起严重的注意，反而认为这是攻下官渡、歼灭曹军主力的最好机会。于是，他命令大将张郃、高览率兵加紧攻打曹操的官渡大营。张郃看到曹操亲领精兵围攻乌巢，恐怕淳于琼支持不住。他认为乌巢如果有失，大事也就完了。因此，他一再请求袁绍先派兵去救淳于琼。但是，袁绍在郭图的迎合下，仍旧坚持以主力进攻曹操的官渡大营，只派少数骑兵去救乌巢。由于曹操在官渡的营垒很是坚固，战士死守，袁军久攻不下，主力部队反而被吸引住了。这就给曹操拿下乌巢创造了有利条件。当袁绍的增援骑兵临近乌巢的时候，正是能否攻下乌巢，决定胜负大局的紧要关头。因此，曹操严令部下说：“等敌人到了我们背后，再来报告！”在曹操坚决果断的指挥下，不但击溃了袁军的增援部队，而且攻下了袁军营屯，杀死了淳于琼。袁军的 1 万多车粮谷也被烧得一干二净。

淳于琼战败被杀的消息传到官渡前线，张郃看到大势已去，失去了斗志。他同高览把全部攻城器械烧掉，一起到曹营去投降了。袁军粮屯被烧，军心已经动摇，这回又传来了主将投降的消息，更加慌乱，一下子全都溃散了。曹操乘势领兵出击，袁军大败。袁绍和袁谭只率领着 800 名亲兵逃回黄河以北。曹操缴获了袁军丢下的全部军用物资和珍宝财物，并坑杀了投降过来的许多袁军士兵。在这一次战争里，袁绍的主力差不多全部被歼灭了。

袁绍经不起这样的惨败。他又气又急，得了重病。公元 202 年 5 月，袁绍病死了。他的几个儿子争权夺位，最后竟互

相攻杀起来，结果都被曹操各个击破。公元 206 年，曹操彻底消灭了袁氏的残余力量，全部控制了过去为袁绍所占据的地盘。

平定三郡乌桓

乌桓是塞外的一个种族，也叫做乌丸，他们很早就居住在东北边境，过着游牧的生活。公元 2 世纪中叶以后，塞外的乌桓大体上分做上谷、辽西、辽东、右北平等四部。后来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部联合起来，称做“三郡乌桓”，由辽西部乌桓贵族蹋顿总管三郡乌桓的部众，称做单于。东汉末年，乌桓乘袁绍、公孙瓒等军阀混战的机会，不断侵扰东汉边疆，先后掳去汉族人民 10 多万户。后来袁绍和乌桓蹋顿单于勾结，联兵把公孙瓒打败。袁绍死后，他的两个儿子袁熙、袁尚被曹操追赶得走投无路，就率领军民投奔到蹋顿那里去了。于是蹋顿便和袁氏兄弟联合在一起，变本加厉地向汉朝边境侵犯，边境人民的和平生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曹操打败袁绍以后，为了统一北方，安定社会秩序，就必须对乌桓的侵扰进行有力的反击。曹操在用兵之前，先做了一些北征的准备工作。他动员民夫，在河北地区开凿“平虏”和“泉州”两条河渠，把从今天河北省南起饶阳东到乐亭的河流连接起来，以保证大军粮运的畅通无阻。曹操计划在大军到达滦河之后，再取道今天山海关这一条道路直指三郡乌桓的政治中心柳城（今辽宁朝阳县南）。公元 207 年的夏季，雨水过多，沿海一带道路泥泞不堪，5 月，曹操的大军只得在无终（今河北蓟县）驻扎下来。曹操得到无终人田畴的献计，决定放弃

原定的进军路线，改由田畴建议的道路进兵。为了迷惑乌桓人，曹操叫人在沿河路旁，竖起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现在暑夏多雨，道路阻绝，等到秋冬，再行进军。”乌桓的间谍看到曹操竖立的木牌，赶紧报告给蹋顿，蹋顿相信了间谍的话，真以为曹操一时不会来进攻了，对曹操的防御就渐渐松懈下来。

这一年的7月，曹操由田畴作向导，并得到徐无山（今河北玉田县北）中广大人民的协助，大兵出了卢龙塞（今喜峰口至冷口）。塞外的路非常难走，不是起伏的山峦，就是涨落无定的溪流，有的地方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还有好多地方根本就找不出路来。然而困难并没有吓倒曹操，他命令战士们一齐动手，逢山开路，沿途还不断鼓励战士克服困难。他们走了900多里路，中途经过白檀（今河北承德县西）、平冈（今河北平泉县），往东到达距离柳城仅仅200里路的地方，才被乌桓的侦察骑兵发觉，赶紧回去报告蹋顿单于。蹋顿单于在惊慌中和袁熙、袁尚率领好几万骑兵来迎战。两军在凡城（今河北平泉县境内）相遇了，曹操在远处看见乌桓兵的队伍散乱，命令部将张辽作先锋迎击，结果大破乌桓，在阵上斩杀了蹋顿，袁熙、袁尚也先后被消灭，曹操大军开进了柳城，三郡乌桓被彻底征服了。曹操凯旋南归的时候，把从前被乌桓掳去和逃亡塞外的汉族人民10多万户全部带了回来。曹操又把10多万乌桓人和汉朝乌桓校尉所统率的乌桓1万多人也都徙居到内地，让他们和汉族人民一起从事农业生产。从此，北方混乱的局面结束了，东北边境的威胁解除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又得到了正常的发展。

曹操为了纪念这次出征，曾经写了一首题目叫做《步出夏门行》的四言古诗，在最后一段中有这样几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充分表现了他广阔豪迈的胸怀和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积极奋斗的乐观精神。这一年，曹操已经 53 岁了。

公元 208 年 1 月，曹操回到邺城。就在这一年，他建议汉中央政府下令废止太尉、司徒、司空的三公官位，重新恢复西汉的丞相、御史大夫制度；并由他自己担任丞相的职位。

降服鲜卑轲比能

当曹操征服了三郡乌桓之后，乌桓族的势力大大地削弱了，但在乌桓西面的鲜卑族，又逐渐强大起来。原来的三郡乌桓地区，不久便为鲜卑所占有了。乌桓和鲜卑本来是近属，风俗和语言大体上都差不多，因此，留在塞外的乌桓部族也都合并到鲜卑部族中去了。公元 218 年，代（今山西阳高县西北）、上谷（今河北怀来县南）二郡塞外的乌桓无臣氏等三个单于，联合近塞的鲜卑部落酋长轲比能，骚扰河北边境。

轲比能是鲜卑族中一个部落的首领，作战很勇敢，在鲜卑族人民中间有很高的威望，因此被部众推为大人。汉朝末年，军阀长期混战，中原有很多人民逃到塞外去避乱，同时把制作兵器、铠甲、盾牌的技术也教会了鲜卑人，鲜卑人还向逃难的汉人学习文字，于是鲜卑社会有了发展。轲比能也开始用制度法令来统治部落和训练军队。曹操平定河北后，轲比能曾通过乌桓的官吏向曹操表示臣服。公元 212 年，轲比能的骑兵曾经

帮助曹操镇压过以田银、苏伯为首的河间农民起义军。不过这次轲比能却参加了代郡、上谷乌桓对河北边境的骚扰。

公元 218 年的 4 月，曹操派遣他的第三个儿子曹彰领兵前往征讨。当曹彰到达涿郡（今河北涿县）边界的时候，乌桓、鲜卑的联合骑兵好几千人突然来袭击他。这时曹彰手下只有步兵 1000 人，战马数百匹，情势相当紧急。曹彰采纳随军参谋田豫的建议，利用地势布成圆形的阵势，命令步兵在外，弓弩手暗藏在内，敌军来时，一齐放箭。结果乌桓、鲜卑的联军没法前进，便退散了。曹彰亲自率领士兵追杀，一直追了 200 多里，到达桑乾（今河北蔚县东北），距离代郡也只有 200 多里路了。曹彰部下的将官认为新到远地，人马劳乏，曹操又有不准越过代郡的命令，劝曹彰不要轻敌冒进。曹彰说：“领兵出征，只要对我们有利就要前进，怎么能事先规定一个限度呢？况且趁敌人去得不远，继续追击，一定可以获得大胜；如果放任敌人逃走，又算得上什么好将呢？”说完，立刻上马，还命令士兵说：“后出者斩！”结果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赶上了敌人，打死打伤和活捉乌桓与鲜卑联军共有好几千人。

这时，鲜卑轲比能知道无法战胜，便带兵退走塞外，不久，他又向曹操表示降服。从此，东汉王朝北方的边境上，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边塞人民又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和平地进行农业生产了。

第三节 孙、刘集团的崛起

一、孙策割据江东

孙策对江东各地势力的兼并作战，主要包括如下作战活动：孙策平定刘繇之战，发生于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十二月，刘繇占据了豫章郡，遣使通降于曹操；孙策击王朗之战，发生于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八月，孙策率军攻击王朗占据的会稽郡，孙策军一举将王朗击降；孙策进击刘勋之战，发生于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十月，孙策一举夺占刘勋的老巢皖城，俘获刘勋部众3万多人；孙策进击黄祖之战，发生于汉献帝建安四年十二月，以火攻大破黄祖军；孙策军逼降华歆之战。

平定刘繇

刘繇、薛礼、管融等割据曲阿一带地区，孙策为占领江东，遂决定首先进攻刘繇军。刘繇当时与其部将彭城相薛礼，屯兵于秣陵城（今江苏江宁南），以下邳相笮融屯兵于县城的南面。汉献帝兴平二年十二月，孙策军开始进攻刘繇秣陵南之牛渚营，击败刘繇部将樊能、于麋、张英等军，进占了牛渚营，将刘繇牛渚营内仓库里的粮食和作战物资全部掠获，随即转攻笮

融，笮融率军迎击，被孙策击败，龟缩于城内，闭门不战。孙策于是转攻秣陵城的薛礼，薛礼惊慌而逃。这时，樊能等又率兵突然袭击牛渚营，孙策立即率军回击，将樊能等击破，斩获共1万多人，取得渡江作战的首次重大胜利。孙策乘胜再攻笮融，战斗中孙策身中流矢，暂回牛渚营休养。但笮融却以为孙策身死，即乘机派军进击孙策军。孙策军以一部兵力引诱笮融军。另设伏兵将笮融军击败，斩首1万多人。孙策军再乘胜攻击笮融营垒，城坚难破，遂转兵向梅陵（今安徽南陵）进击，攻占了梅陵，接着又攻拔了丹阳（今安徽当涂东）、湖孰（今江苏江宁东南）、江乘（今江苏南京东）等地，大军逼近曲阿。后来笮融因于南昌（今江西南昌）袭击刘繇部将朱皓，而被刘繇率军将笮融击败，笮融逃入山中，被杀死。

刘繇的同乡太史慈，这时来看望他，便有人建议可命太史慈为大将，以与孙坚作战。但刘繇不肯，只让太史慈带一个侦察骑兵，刺探孙策军的军情。太史慈在神亭与孙策率领的韩当、黄盖等13人相遇，孙策与太史慈两人单独交手，难分胜负，后双方的步骑兵同时赶到，便各自撤军而归。

孙策随后即进至曲阿城下，刘繇与其交战，结果刘繇兵败，退走丹徒（今江苏镇江）。孙策随即进入曲阿，告谕各县邑，凡有刘繇的部下来投降者，一概不咎既往，一人从军，免除全家赋役，10多天之内，即招降了刘繇军2万多人，孙策集团由此势力大增，声威震撼江南。

刘繇兵败后，欲从丹徒逃往会稽，刘勋则建议说，会稽为富饶之地，孙策必然占据它，不如占领豫章（郡治在今江西南昌），与曹操通使，遣使奉献。这样，一旦孙策再来进攻，你已是

天子任命的官吏，曹操、刘表必然发兵相救。刘繇于是接受了刘勋的建议，奔往豫章郡。孙策遂率军东进，进攻吴郡和会稽郡，吴郡太守许贡率军抗击，孙策部将都尉朱治于由拳（今浙江嘉兴南）将许贡军击败，许贡南逃，投奔严白虎部。

进击王朗

汉献帝建安元年八月，孙策决定攻占王朗据守的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会稽郡方圆很大，包括今浙江和福建两省。孙策率领大军渡过浙江，直奔会稽。会稽功曹虞翻向太守王朗建议说，孙策善于用兵，不如躲避他。王朗不听，遂率兵于固陵抗击孙策军。孙策军数次从水路攻击王朗军，均未成功。孙策的叔父孙静便向孙策建议说：“王朗凭借险固的城池防守，我们难于很快攻下。查渎（今浙江萧山东北）在固陵的南面几十里，最好绕道那里去攻击固陵，以收攻其不备、出敌不意之效。同时，我亲率部队为前锋，定能攻破王朗。”孙策同意孙静的建议。孙策为了迷惑王朗军，便采取隐真示假的欺诈行动。孙策下令部队说：“最近淫雨连绵，河水污浊，士兵们喝多了，很多人肚子痛，赶快准备水缸数百口，以便将水澄清。”入夜之后，又点起一排一排的烟火，佯装部队仍在原地，以欺骗王朗。随即率领大军迂回查渎，突然袭击高迂屯（今浙江萧山西）。王朗大惊，急派原丹阳太守周昕等率军前往堵击，被孙策击败，周昕被擒斩首。王朗逃往东冶（今浙江临海东南），孙策军尾追而至，大败王朗，王朗率众投降。孙策旋即占领会稽郡，自任会稽太守。

汉献帝建安二年（197年）秋，曹操见孙策逐步平定了江

东的广大地区，便派议郎王浦以诏书拜孙策为骑都尉，后又假以明汉将军。王浦暗中欲袭击孙策，串通吴郡太守陈瑀、祖朗、严白虎为内应，被孙策发觉。孙策派部将吕范率军攻击，将陈瑀军击破于海西，俘获陈瑀部众 4000 人，接着又将严白虎击败。

击败刘勋

庐江(今安徽潜山)太守刘勋拥兵自重，占有今安徽省南部、河南省东南部、湖北省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是江、淮之间一个较强的割据势力。孙策对刘勋的强大甚为不安，为铲除其进军长江中游和江东的障碍，决定对刘勋用兵。但由于刘勋力量强大，难以硬攻，便采取了智取的策略。汉献帝建安四年(199年)十一月，孙策派遣使者携带大量珠宝布帛至庐江，见了刘勋低声下气地说：“上缭各地的人屡屡欺负我们，我们想发兵攻打他们，但道路难以通行，贵国乃赫赫大国，请出兵征伐他们。上缭很富庶，占领后可获取大量财富，你们出兵，我们也出兵做为外援。”刘勋听后信以为真，同时又见到大批财宝，更加高兴，遂一口答应出兵。大家都来向刘勋祝贺，只有将部刘晔不加庆贺。刘勋问他为何不贺，刘晔说：“上缭虽小，城坚池深，易守难攻，一个月之内也攻不下，那时我们大军在外，国内空虚，如果孙策趁我空虚之际，举兵袭击，那么我们的后方就难以保全，将处于欲进不能，后退又无处可归的绝境。可以肯定我大军一出，大祸就要临头。”刘勋不听刘晔的劝告，便率大军出征上缭。刘勋军至海昏(今江西永修东)，各地的首领早已得到消息，便留下空营，携带所有军实物资逃走。结果刘勋军一

点东西都没有抢到。

此时，孙权正在率军西进，军至石城（今安徽贵池西），得知了刘勋率军在海昏的消息后，即刻派其堂兄孙贲、孙辅率兵 8000 人急速南下，屯守彭泽（今江西湖口东彭泽乡）以截断刘勋军的归路。孙策亲率周瑜以 2 万人偷袭皖城（今安徽潜山），迅速攻拔了该城，俘虏袁术、刘勋等人的妻子儿女及其所部 3 万多人。刘勋攻击上缭一无所获，大本营被孙策袭击，遂回军北上，欲先至彭泽，途中突遭孙贲、孙辅军截击，刘勋兵败，退走流沂（湖北黄石东南）。

打败黄祖

黄祖拥兵占据长江中游一带地区，为刘表的部将。当初，孙坚奉袁术之命，进击刘表时，曾被黄祖的伏兵射死。汉献帝建安四年（199 年）十一月，孙策率军击败刘勋后，刘勋即向黄祖求救。于是，黄祖命其子黄射率水军 5000 人，支援刘勋，孙策又将刘勋击败，消灭黄祖军 2000 人，俘获战船 1000 余只。黄射战败后弃军逃走，刘勋则率数百部众，逃归曹操。孙策开始进攻黄祖军。当年十二月初八，孙策军到达沙羨（今湖北武汉西南）。刘表派他的侄子刘虎和部将韩晞，率领长矛军 5000 人援救黄祖。十二月十一日清晨，孙策率领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将周瑜、桂阳太守行征虏中郎将吕蒙、行荡冠中郎将程普、行奉业校尉孙权、行武锋校尉黄盖、行先登校尉韩当等，向沙羨的黄祖军进击。孙策亲击战鼓督战，众将校奋勇当先，迅疾若飞，千帆争渡，双方水军经过激烈交战，孙策军乘风以火攻黄祖水军，将黄祖军及长矛军击败，斩了韩晞，黄祖只身而逃，

刘表部将刘虎等共 3 万多人均被孙策军斩首或淹亡。

逼降华歆

华歆率军屯守豫章郡(在今江西南昌),孙策为夺占豫章,率领大军东下征伐华歆。孙策军至椒丘(在今江西南昌东北约 50 公里)后,便派功曹虞翻去说服华歆归降。虞翻见了华歆,详细向华歆陈述了降服与否的利害关系,华歆也自认为谋略不如孙策高明,士卒不如孙策精勇,粮食军资不如孙策充足,难以与孙策军相匹敌。最后虞翻告诫华歆说:“假如你要想防守孤城,你自己知道你的粮食已经很紧张,若不早点定下降服的决心,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孙策大军现已屯驻于椒丘,我回去之后,明天中午等待你的降服文书,如果到时你不送来,我们就要作最后的决战了。”华歆当即表示愿意降服,连夜写好文书,第二天一早便派人送至孙策军营。于是,孙策率军顺利进占豫章郡。孙策进占豫章郡后,势力更加强大,已经占据了今浙江、福建的全省,江西、湖北、江苏、湖南、安徽的大部或一部,在江东、江南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二、刘备集团的崛起

刘备在群雄逐鹿中的惨淡经营

曹操北征乌桓的时候,在荆州依附于刘表门下的刘备,为了扩充实力,也在注意访求人才。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祖先是西汉的宗室，以后支系疏远，家世没落，至刘备这一代便以织席贩鞋为生。刘备 15 岁时，曾同公孙瓒一起，向同郡的名士卢植学习儒家经典。但他“不甚乐读书”，而好结交“豪侠”，当地不少青年人同他要好。灵帝末年，他在中山（今河北定县）商人张士平、苏双的资助下，组织武装，并得到河东解县（今山西永济）人关羽（字云长）和同郡人张飞（字益德）的支持，开始发展势力。黄巾起义爆发后，刘备因参与镇压起义军有功，被任命为安喜（今河北安国西北）县尉。后来朝廷要裁减因军功任用的官员，刘备意料自己在被裁之列，因此，主动前往传舍看望朝廷派来的督邮，探听虚实。督邮刁难不见。刘备率领吏卒冲入传舍，将督邮捆起来，吊在树上狠狠鞭打，然后将县尉印绶系在督邮项下，弃官而去。后来刘备又做过高唐（今山东高唐东）县令。关东诸军讨伐董卓时，刘备也起兵参加了。后来他被农民起义军打败，投奔师兄幽州军阀公孙瓒。公孙瓒让他协助青州刺史田楷守青州，抵挡冀州袁绍的势力，不久任平原相。

193 年，占据兖州的曹操东征徐州。徐州牧陶谦大败之后，向田楷告急。田楷同刘备领兵往救陶谦。后来，曹操因部下张邈、陈宫叛变，不得不从徐州撤兵。陶谦表举刘备为豫州刺史。刘备领兵四五百人，屯小沛。

194 年冬，陶谦病死，他手下的将吏拥护刘备为徐州牧。下邳人陈登劝刘备说：“我们可以为你集合步骑兵十万人。你有了这支兵力，进可以辅佐天子、安济百姓，退可以据州自守。这是个好时机，你应该听从我们的主张。”北海相孔融也劝刘备不要失掉这个好时机。这对于多年来一直颠沛流离，没有固

定地盘的刘备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因此，在推让一番之后，便接受了印绶，领徐州牧。

占据淮南地区一直想称帝的袁术，对刘备据有徐州，自然是不满的。他多次兴兵讨伐刘备，但一直没有得逞。后来，他便勾结被曹操打败投归刘备的吕布，进攻刘备。刘备被打败，到兖州依附曹操。曹操表举刘备为豫州牧，并给他一些兵力，让他东还小沛，收拾散兵，进击自领徐州牧的吕布。198年，刘备又被吕布打败，曹操便亲自东征，杀死吕布。刘备随曹操还许都，曹操表举他为左将军，拜关羽为中郎将。

刘备是一个有政治抱负、不甘寄人篱下的人物，来到许都后，总是郁郁不乐，时刻想着脱离曹操，另图大业。

这时(199年)，朝廷内正酝酿着推翻曹操的政变。为首的是献帝的丈人、车骑将军董承，参加这一秘密活动的还有将军吴子兰、王子服和长水校尉种辑等，刘备也是其中的一员。

刘备参加董承的秘密活动之后，为了避免曹操对他怀疑，便闭门不接待宾客，整日在后院种菜，以伪装对政治不关心。有一次，曹操请他饮酒，谈论天下英雄。当刘备提到袁绍时，曹操说：“现在天下英雄，唯有你和我，袁本初一类的人是不上数的。”刘备一听曹操只把自己和他说成英雄，以为曹操已发觉了自己的秘密行迹，不禁大吃一惊，刚刚拿起的筷子也掉在桌上。这时正赶上滚过一阵惊雷，刘备乘机说：“古人说‘迅雷风烈必变’，确实是这样。一震的威力，竟如此厉害！”借以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慌。对于刘备，曹操是存有戒心的。他常派人到刘备住处察看动静。

不久，袁术想北上把传国玺和皇帝的称号送给袁绍。袁谭

从青州出兵,前往迎接。曹操得知这个消息,商议派兵阻拦袁术北上,不让袁家势力合在一起。刘备乘机请求承担这一任务,曹操便派将领朱灵等同他一道南下截击袁术。

当刘备离开许都之时,程昱、郭嘉忙对曹操说:“刘备是天下英豪,不可放纵;如果放了他,必然要生变乱。”这时曹操觉得已有令在先,更改不便,同时刘备已经远去,很难追回,只好作罢。

刘备到达下邳之后,袁术已病死于寿春,曹操下令要他率军回许都。刘备一方面让朱灵等人返回许都,一方面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将曹操所置徐州刺史车胄杀死,派关羽守下邳,自己引军屯于小沛,公开打出反对曹操的旗号。

200年春,董承等谋杀曹操的事情泄露。曹操处死董承等。在官渡决战之前,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曹操引兵东征徐州。这时刘备以为曹操正对付北面的袁绍,一时会不轻易东来,放松了戒备,同时由于在徐州立足未稳,所以当曹操亲自率军进击时,便无力抵抗,连妻子也被俘虏。他只好投奔青州袁谭,后又北上投靠袁绍。曹操攻取小沛之后,乘胜围攻下邳。关羽抵挡不住,向曹操投降。

曹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袁绍派刘备领兵袭击曹操后方。201年,刘备在曹操逼迫下,投奔荆州牧刘表。刘表给他一部分军队屯驻新野(今河南新野),看守荆州的北大门,以抵御曹操军队南下。

刘表字景升,东汉末年名士,是“八俊”之一。190年继王叡任荆州刺史。关东诸军讨伐董卓时,他也起兵参加了。此后,他时而勾结袁绍与袁术争夺,时而支持张绣与曹操为敌。官渡

之战时，袁绍向他求援，他口头答应，但不发兵，也不帮助曹操，采取了中立观望的态度，等待袁、曹两败俱伤的时候，好坐收渔人之利。刘表这种态度，引起属下一些人的不满。韩嵩、刘先曾要刘表“举州以附曹操”。刘表的大将蒯越也劝他这样做。但无所作为的刘表仍然狐疑不决。他虽然派韩嵩去许都，但实际上是观望虚实。

刘表这个人“虽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刘备投靠他之后，他厚待刘备，但并不重用。207年，曹操北征乌桓时，刘备劝他乘机袭击许都，结果正像曹操谋士郭嘉所预料的那样，他并未采取行动。

刘备到荆州后，在刘表坐观成败、不图进取的方针下，好几年都没有打大仗的机会。有一次，刘表请他赴宴，他去厕所时，发现自己大腿的肌肉都松软了，身体也胖了起来，席间不禁一阵心酸，流下泪来。刘表很惊奇，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过去我经常南征北战，身不离鞍，腿肉消瘦；现在长期闲居，腿肉增多了不少。时光过得真快，不觉已经快衰老了，而功业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悲伤。”

刘备为了摆脱力单势孤的困境，迅速扩充势力，干出一番事业来，必须首先取得荆州地主集团的支持，必须得到有智谋的人辅佐自己。于是，他注意访求有才干、有见识的人物。

当时，刘表对于荆州本地以及外来的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有才能的人，并不注意笼络。他们里边不少人，不满意刘表的做法，希望找到一个有作为的人物，作为他们的政治代表，维护他们的利益。襄阳地区的庞德公就是他们中间有影响的首领。他年纪大、威望高，品评人物也比较中

肯。一些有才识的人，聚集在他的周围，诸葛亮、庞统、徐庶、司马徽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刘备先向司马徽(字德操)请教，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司马徽说：“庸俗的儒生是不懂得时务的，真正了解天下大势的是有真才实学的俊杰。我们这里被人们称为卧龙、凤雏的，就是这样的俊杰。”刘备问：“卧龙、凤雏是谁？”回答说：“诸葛亮和庞统”。

不久，诸葛亮的好友徐庶来新野投奔刘备，成为刘备的重要谋士。徐庶也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刘备很想见到诸葛亮，便让徐庶把他请来。徐庶说：“这样的人不能采取召见的办法，将军应该亲自去拜访他。”于是，刘备便冒着严寒，亲自到隆中去敦请。头两次没有见到，第三次才受到诸葛亮的热诚接待。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三顾茅庐”。

隆中对策

刘备见到诸葛亮之后，他谦恭诚恳的态度，使诸葛亮很受感动。于是诸葛亮便将天下形势，向刘备作了一番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实现统一的战略策略。他分析曹操、孙权的情况说：“自从董卓之乱以来，四方豪杰并起，割据一方，争夺天下。曹操同袁绍相比，名望低微，兵力也少，但他最后竟能打败袁绍，由弱变强。这不仅是由于客观形势对他有利，而且由于主观努力。现在曹操已拥兵百万，又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确实不可以同他争锋。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了三代；地势险要，民众归附，有才能的也人为他效力。因此，可以与他联合，而不可去谋取他。”

接着，他又分析了荆州刘表和益州刘璋的情况：“荆州这个地区，北有汉水、沔水，南可直达南海郡，东南可连接吴郡、会稽郡，西则通往巴郡、蜀郡，是一个用武的要地，但刘表却没有能力守住它。这对将军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知将军是否有这个想法？益州地势险要，沃野千里，号称天府之国，汉高祖刘邦就是凭借它完成了帝业。但占据益州的刘璋，昏庸无能，北面又有张鲁威胁。他虽然拥有众多的百姓和富饶的资源，却不知如何治理它，使百姓安定。那里有智谋和才能的人，都希望得到一个贤明的君主。”

最后，他概括指出：“将军你是汉朝王室的后代，声誉传于四海，收揽英雄，思贤如渴，如果能跨有荆、益二州，据险防守；对西边和南边的戎、越人，保持和好关系，采取安抚政策；对外结好孙权，对内修明政治；局势一有变化，就可命令一名得力将领，带领荆州的军队向宛城（今河南南阳）和洛阳进攻，将军自己则率领益州的军队出秦川（今陕西南部）。到那时，老百姓谁能不带着好饭美酒来欢迎你呢？如果能够这样，将军统一的事业就可以成功，衰颓的汉朝也就可以兴盛了。”

诸葛亮的这个《隆中对策》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当时各割据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为刘备提出了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发展势力、实现统一的战略和策略。这一战略和策略，显示了年仅 27 岁的诸葛亮的远见卓识。他在以后辅佐刘备、刘禅的 20 多年中，一直为实现这一战略决策而奋斗，而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刘备极为赞同诸葛亮提出的谋略，从中看到了斗争的广阔前景。他诚恳而热情地邀请诸葛亮出来辅佐自己。诸葛亮

答应了他的要求。

诸葛亮一到刘备军中，便立即帮助他扩大军队。他建议刘备用清查“无籍”（没有在政府户籍上登记）游户的办法，在短期内，把军队由数千人扩大到数万人，成为以后转战各地的基本力量。

刘备在荆州八年（201—208年），在吸收人才，争取荆州地主集团的支持以及扩大军事力量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特别是得到诸葛亮的帮助，对以后势力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可以说，这是刘备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

第四节 赤壁之战 和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一、赤壁之战

官渡战后八年（208年），曹操统一了北方，掉转马头，挥师南下，意欲鲸吞荆州与江东，进而统一全国。

正当这时，刘表死去，他的小儿子刘琮承其父位，听说曹操军势强大，直取荆州，就吓坏了，赶快派人暗中去投降。

刘备的驻地新野一带，恰被夹在曹操和刘琮的两军之间。当刘备得知刘琮投降时，曹军已经逼近了。他来不及抵抗，急忙向江陵退却。江陵是军事重镇，又是兵力和物资的重要补给

地。曹操怕刘备捷足先登，亲率 5000 骑兵猛追，一昼夜行程 300 里，没几天就在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追上了。刘备寡不敌众，被打得大败，改从小路逃往夏口（今湖北武汉市的汉口）。刘表的长子刘琦正驻军夏口，两军会合，约有 2 万兵马。江陵重镇却被曹操夺去了。

江东的吴侯孙策早在官渡之战那年死去，死时才 26 岁。他的弟弟孙权仅 19 岁就承继父兄的事业，担负起巩固江东的重任。曹军大举南下这年孙权才 27 岁，正带兵驻在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观望形势的发展。他对曹军南下感到紧张，但取何对策尚举棋不定，就派出鲁肃去观察动静。鲁肃北上之时，正值刘备南退，他们在当阳相遇。鲁肃劝刘备退守长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鄂城），与孙权联兵，共同对付曹操。刘备便派出诸葛亮出使柴桑，与孙权共商大计。

诸葛亮见到孙权，知他尚在犹豫不决，就向他透彻地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曹军不可克服的弱点，以及孙刘联军必胜的基本条件，坚定了孙权联刘抗曹的决心和信心。

这时，曹操也派人给孙权送了一封信来。孙权把这封一半恐吓、一半劝诱的书信拿给文臣武将看，大家吓得张惶失措。长史张昭为首的一班人，竭力渲染曹军的强大，顿时，主张出降的议论占了上风。

孙吴的大将周瑜当时正在鄱阳湖训练水师，孙权接受鲁肃的建议把他召回柴桑，共议军机大事。周瑜坚决主战，并分析形势说：“曹军诈称八十万，其实不过二十几万，其中还有七八万是荆州降兵，这些人是慑于形势，并不心服。曹军长于陆战，我军习于水战，今天，他舍鞍马、仗舟楫，以其所短，对我所

长，哪有不败的道理。请拨给我几万精兵，开赴夏口，这正是活捉曹操的好时机。”孙权听周瑜这么一说，精神为之大振，遂拔出佩刀，“咔”的一声，砍下几案的一角，传令道：“今天，谁要再提出投降曹操，就和这几案一样！”

孙权决计后，任命周瑜为大都督，程普做副都督，鲁肃做参军校尉，带领 3 万人马，与刘备的水师会合，协同作战，共抗曹军。

这时，驻扎在赤壁江岸的曹军士兵，多是北方人，乍到南方，水土不服的很多，害起病来。没有病的，许多人也不习惯水上的风浪颠簸，晕船呕吐，失去作战能力。曹军针对这种情况，就把战船用铁索锁在一起，船上铺上木板，组成“连环船”，同陆地一样，果然平稳多了。

周瑜的部将黄盖，见曹军组成“连环船”，就建议采取火攻的办法破敌。几天以后，曹操接到黄盖派人送来的一封要求投降的信。曹操以为自己处在绝对优势，孙权的内部分化也是极其可能的，就信以为真，约定了受降的日期和暗号。

日期到了，对岸果然有一批船只扬帆驶来。船上满载浇上油的枯苇干荻，外边盖着帷幕。在离曹军水营只有二里左右的地方，黄盖就下令点起火来。当时东南风刮得正紧，风助火势、火借风威，这批火船如同离弦之箭，向曹军直冲而来。仓促间，曹军的战船无法分开，顿时烈焰腾空，江对岸的石壁都被照红了。大火延及岸上军营，江上陆上连成一片火海。曹军纷纷惊慌奔命，孙刘联军乘势掩杀。曹军淹死烧死的不计其数。曹操带着些残兵败将，取小道逃窜，才没丧命。

这场战争，在三国史上具有决定时局的重要意义。赤壁大

战后，曹操再无力南下；刘备却乘势夺取了荆、益二州，站稳了脚根；孙权保住江东，并向东南发展。这样就奠定了曹操、刘备、孙权三足鼎立的政治局面。

二、曹魏政权的建立

曹操袭取关中

曹操兵败赤壁，暂时收缩南下的势头，企图向关中、巴蜀地区发展。这时的关中地区，虽然主要仍为韩遂、马超集团所控制，但由于他们的势力有限，并未形成关中的主宰，因而除了韩遂、马超之外，尚有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孙横、梁兴、成宜、马玩等 10 多股较大的势力。这些势力，基本上互不统属、自相割据。

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 年）三月，曹操决定派遣司隶校尉钟繇讨伐在汉中地区的张鲁，命令征西护军夏侯渊等率兵出河东（指今黄河以东晋西南地区），与钟繇会合。

征讨汉中，必须经过关中地区，否则无法进兵。仓曹属高柔向曹操建议说：“大军向西进发，韩遂、马超等必定怀疑是袭击自己，他们定会互相煽动进行抗拒。应该先设法安抚三辅，三辅一旦平定，汉中就可传檄而定了。”但曹操不听，命令军队开始行动。关中诸将听说曹操大军西进的消息，果然疑虑曹操前来袭击自己。于是，马超、韩遂、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等皆率本部兵马反抗，共约 10 万大军，屯守潼关（今陕西潼关）。

曹操听说关西 10 万大军拒守潼关，遂命令安西将军曹仁率领诸将前往抵抗，并严令曹仁各将只准坚守，不许出兵交战。

建安十六年七月，曹操决定亲率大军征讨关中各部。八月，曹操率军进至潼关，与马超等军隔关扎营相峙。曹操深知潼关险要，难以攻取，于是明里摆出一副要立即进攻潼关的架势，暗中却秘密派遣徐晃、朱灵率步骑兵 4000 多人由蒲坂津（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偷渡黄河，占据河西，徐晃等经过一个月的时间，顺利到达河西。

闰八月，曹操率军由潼关北渡黄河。渡河时，曹操指挥部队先渡，他独自与勇士百余人在南岸担任掩护。

马超等见曹军渡河，遂率领步骑兵 1 万多人向曹军进攻，马超军的箭像雨点一样的密集，曹操镇静地趴在岸上一动不动。许褚扶着曹操上了船，船工中箭而死。这时，许褚一手举着马鞍掩护曹操，一手划船。校尉丁斐见情况危急，便放出牛马引诱敌人，马超的部队见了牛马顿时混乱，争着抢夺，曹操才安全脱险。从蒲坂津渡过黄河后，沿黄河西岸向南推进。

马超等见曹军西渡黄河，迂回南下，便率军退守渭口，以阻止曹军西进。曹操到处设置疑兵来欺骗敌人，暗中令部队入渭河架设浮桥。晚上，以部分兵力进驻渭河南岸宿营。马超乘夜偷袭，被曹操的伏兵击败。马超不得已，也驻军于渭河以南。马超自觉难以战胜曹操，便派人向曹操求和，并以割让河西为条件，曹操不答应。

九月，曹操的大军全部渡过渭河。马超等多次向曹军挑战，曹军均坚壁营垒，不与交战。马超等无奈，再次请求割地求

和,并以子弟送入曹营为质,表示归服。谋士贾诩认为可以假意答应,未离间敌军的关系。曹操遂赞同贾诩之计。

韩遂请求和曹操会面,他们以前有点旧交。两人见面后,骑着马交谈了很久。谈话不涉及军事与作战,只讲些过去在京都时的往事,讲完之后,曹操拍手大笑。

曹操这一离间之计非常灵验。当韩遂返回,马超便追问韩遂与曹操谈论了些什么,韩遂说没谈什么,马超遂对韩遂怀疑起来。以后,曹操又给韩遂写了一封信,把信中的许多地方故意加以涂改,好像是韩遂自己涂改的一样。马超看过此信,对韩遂更加怀疑。

曹操做了这些离间工作之后,便指定日期与马超会战。先以轻装士卒与马超军作战,待挫伤了马超的锐气之后,立即派出勇猛骑兵突然从左右两面夹击,大胜马超等军,斩了成宜、李堪等人。韩遂、马超逃到凉州,杨秋逃往安定,关中地区遂被曹操占领。

曹魏的建立

随着曹操统一战争的逐步胜利,曹操的政治地位也越来越高。建安十七年(212年),正月,汉献帝下诏,今后曹操参拜皇帝不称名字,入朝不趋,可佩剑上殿,一如汉初丞相萧何旧例。这年十月,大臣董昭对曹操说:“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您今日之功者;即使有您今日之功者,也未有久处人臣之位者。现在您虽愿保守名节,但是您在大臣之位,容易使人怀疑您,您不可不认真考虑。”曹操以为此话言之有理,乃与列侯诸将计议,以为丞相应当进爵为国公,配备九锡,以表彰殊勋。荀

彧却从维护汉室出发，反对这样做，使曹操极不高兴。后曹操借故将荀彧扣押在军中，荀彧知他与曹操的矛盾不会消除，于是服毒自杀。

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汉献帝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仍旧以丞相兼职冀州牧，加赐九锡等殊礼。不久，曹操开始建造魏社稷、宗庙。十一月，曹操又在自己的封国初置尚书、侍中和六卿等官职，以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仆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弈、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钟繇为大理，王修为大司农，袁涣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陈群为御史中丞，初步建立起魏氏政权。次年，汉献帝又下诏：曹操位在诸侯王之上，改授金玺等物。又过了二年，汉献帝再次下诏，把曹操爵位由魏公升封为魏王。曹操成为魏王后第二年，汉献帝又下诏，魏王曹操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蹕。又以曹操世子五官中郎将曹芳为太子。至此，虽然曹操名为魏王，表面上低于汉帝一级，实际上已是真皇帝，汉献帝徒有虚名，早成为傀儡和曹操的政治工具，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权力，全操纵在曹操父子手里。

从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控制了朝廷时起，一些忠于汉室的大臣，曾几次想谋杀曹操，从他手中夺回实权。建安五年（200年），车骑将军董承等人就想谋杀曹操，不料事情泄露，董承等人全被曹操诛杀。建安十九年（214年），伏皇后也写信给父亲伏完，陈述曹操残忍威逼汉献帝，令伏完密杀曹操，结果伏完不敢下手，反被曹操得知。曹操令御史大夫郗虑收回伏皇后的玺绶，将伏皇后和她生的二个皇子，以及室宗 100 多人杀戮。次年，曹操又逼汉献帝立他的女儿为皇后。建安二十三年（218

年),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反,火烧丞相长史王必的军营,欲抢走汉献帝投降刘备,最后也兵败被杀。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魏相国西曹掾魏讽,勾结长乐卫尉陈祗密谋袭击邺城,陈祗恐惧告发,曹丕下令捕捉魏讽,这次牵连被杀者达数千人,魏相国钟繇也由此而被免官。通过一次次斗争,拥护刘氏宗室的势力全部被清除,曹氏取代刘氏为帝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但曹操却不想由自己来取代刘氏。这年十二月,孙权袭杀关羽,曹操任命孙权为骠骑将军,封南昌侯。孙权遣使者来致谢,并上书向曹操称臣,劝曹操顺应天命,早即帝位。大臣陈群、大将夏侯惇等人也劝曹操不要犹豫,早正大位,曹操见部下都拥护他称帝,才吐露了真心话,说:“如果我真有一天命,那我当周文王吧。”表示他愿极力为儿子当皇帝创造条件,自己却不愿称帝。

魏黄初元年(220年)正月,曹操病死在洛阳,太子曹丕继魏王、丞相、冀州牧之位。这年七月,左中郎将李伏、太史丞许芝上表,奏称“魏当代汉,见于图纬,其事甚众。”群臣也纷纷上表,劝曹丕顺应天人之望,禅代刘氏。十月,汉献帝被迫遣御史大夫张者奉皇帝玺绶诏册,禅位于魏。曹丕假意推让一番,乃令在繁阳筑坛。坛建成后,曹丕登坛,由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使者数万人陪同,接受皇帝玺绶,正式即皇帝位,是为魏文帝,改元黄初。十一月,魏文帝曹丕下诏,改汉献帝为山阳公,追尊父亲武王曹操为魏武皇帝,正式建立了曹氏政权,中国历史也随之进入三国时期。

曹丕做了7年皇帝,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没有什么突出的建树。作为曹操的继承人,他没有把曹操的思想、政策和事业

真正继承下来。曹操“不信天命之事”，为了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他反对别人称王称帝，自己也表示决不废汉自立。而曹丕从曹操手里接来的仍然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他首先考虑的却是自己做皇帝。而且为了争取地主阶级各阶层的支持，维护其统治地位，采取了与先父背道而驰的做法，取悦于世族豪强，沿袭了东汉乡举里选的传统，创立和实行了“九品中正制”，承认士族有做官的特权。于是，在曹操执政期间曾受到一定压制的世族地主势力又重新抬头。曹丕一死，政权便迅速落入士族官僚司马氏之手。曹魏统治没有维持几十年便为西晋所代替，是与曹丕实行的政策分不开的。另外，他推崇汉文帝“有圣贤之风”，效法汉文帝的宽仁玄默，欲“以德化民”。对于孙权，他也主张像汉文帝一样“抚以恩德”，又颁行《太宗论》于天下，“明示不愿征伐”。在他执政的7年中，虽也曾两度伐吴，但都无功而返。

不过，曹丕的某些政治措施，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吸取东汉宦官外戚擅权造成政权长期不稳的教训，对宦官、外戚在政治上实行限制。他主张轻刑罚、薄赋税、禁复仇、禁淫祀、罢墓祭、营寿陵力求俭朴等。和曹操一样，他也比较重视农业生产，比较关心民生疾苦。对于战争未息，人民生活困苦，他常常表示不安。黄初五年（公元224年），河北发生饥荒他曾遣使者开仓廩赈济。次年二月，又派遣使者到许昌以东至沛郡一带去查访，问民生疾苦，给贫困者以救济。

三、蜀汉政权的建立

刘备攻占益州

通过赤壁之战，刘备集团巧取豪夺占据了荆州，实现了“隆中决策”的第一步目标。于是在诸葛亮的谋划下，刘备将夺取蜀地、进而占据整个益州，推上了实现下一步战略目标的快车道。在赤壁之战前，当曹操夺占荆州后，益州当时尚在州牧刘璋的占领之下，刘璋遂派别驾张松向曹操致贺。张松通达事理、见识渊博、精明干练。主簿杨修向曹操建议应任用张松，被曹操拒绝，张松由此引起对曹操的怨恨。张松返回以后，就劝刘璋与曹操断绝关系，与刘备结好，刘璋采纳了张松的建议。

刘璋的军校尉法正，也为贤能之士，刘璋不识贤能，未加重用。张松与法正十分友善，二人常常私议，认为刘璋难以成就大事，正巧张松劝刘璋结好刘备的意见被采纳，张松便乘机推荐法正出使刘备处。此时正值曹操命司隶校尉钟繇前往汉中，征伐张鲁，刘璋心中惊恐。张松进而劝刘璋说：“刘备是你的宗室，又是曹操的大敌，善长用兵，如派他讨伐张鲁，张鲁一定败亡。张鲁既败，那么益州就强大了。那时曹公虽然来了，也不会再有作为。”刘璋赞同张松的意见，于是决定派遣法正、孟达率 4000 人马，去迎接刘备入蜀。

刘璋的主簿黄权进谏说：“刘备以骁勇善战而出名，若请来，以部下对待他，定难满足他的欲望，要以上宾对待他，那么

一国不能容纳二主，如果宾客取得稳如泰山的地位，那么主人的地位就危如垒卵了。不如闭关自守，等待大局的变化。”刘璋不听。从事王累，将自己倒挂在州中城门下向刘璋进谏，刘璋也一概不加理会。

法正到了荆州，见了刘备，暗中向其献策说：“以将军的英武才能，趁刘璋的懦弱，有张松这样的州中股肱人才，做为内应；然后以益州的殷富，凭借天府之地的险阻，以此成就大业，易如反掌耳。”刘备犹豫不决，庞统进谏说：“荆州荒废残破，人物损失殆尽，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有很大发展。现益州有户百万，土地肥沃、殷实富足，如取得益州为基地，大业可顺利完成。”刘备还是犹豫不决，认为现在与其水火不容的是曹操，若马上进军蜀地，怕对天下人失去信义。庞统此时进一步劝告刘备说：“当今战乱之时，不能靠道义来安定天下。况且兼并弱小，以武力攻取愚昧之邦，是历来受古人尊重之举。待大功告成以后，再封赏大国，是不会失去信义的。如果今天不下决心攻取，恐怕就会成为别人的天下了。”刘备被庞统说服，决定进取蜀地，并向法正详细询问了蜀中的山川地理、兵马府库、关隘要塞等情况，法正还向刘备献了益州地图。于是刘备留下诸葛亮、关羽等人守备荆州，以赵云为留营司马，自率庞统、法正、黄忠、魏延等数万大军向蜀地进发。

建安十六年十二月，刘备进入蜀地，刘璋命益州各地的官吏迎接。刘备进入蜀地，到处受到迎送，前后赠送的礼物数以亿计。刘备从江州沿垫江前往涪县（今四川绵阳），刘璋亲率步骑3万多人，前往会见刘备，车辆帐幔、光彩耀目。张松要法正转报刘备，就在与刘璋会面时，将其捕获。刘备认为过于仓促。

庞统则认为，趁见面机会捕获刘璋，免得以后再动刀兵，即可轻而易举地安定一州了。但刘备觉得，刚刚进入别人的国家，对当地的民众没有任何恩德信义，不能这么做，而拒绝了上述建议。

刘璋推举刘备为代理大司马，兼领司隶校尉；刘备也推举刘璋代理镇西大将军，兼领益州牧。两方的官吏，更是互相往来，欢乐饮宴了 100 多天。刘璋增加刘备的兵力，多多拨给刘备军资，命其督领白水的军队，前去进击张鲁。刘备此时合并了 3 万多军队，车辆、盔甲、器械、财物激增。刘璋自回成都，刘备遂率军北进，至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南），便屯军休整，扩充势力、广布恩德，收买当地吏民之心。

从建安十六年十二月至十七年（212 年）十二月，刘备在葭萌屯兵 1 年，始终没有向张鲁进攻。军师庞统向刘备建议说：“暗中精选锐士，日夜兼程，直袭成都。刘璋不懂军事，一向疏于戒备，我大军突至，一举便可平定，此为上计。刘璋的名将杨怀、高沛，各自统率强兵，据守关头，已数次上书刘璋，建议刘璋命将军返回荆州。在我大军未出动之前，可放出荆州紧急，欲回荆州救急的空气，命全军整束行装，做出返归荆州之势。此二人向来钦佩将军的英名，又巴不得将军早日离去，预料他们必轻骑前来晋见将军，我们趁势捉住他们，收编他们的军队，然后进军成都（今四川成都），此为中计。退回白帝城（今四川奉节），连接荆州，慢慢再做进兵打算，此为下计。如若犹豫不决，将招至很大的困难，难以在此久留了。”刘备赞成庞统的中计。

刘备行动之前，正值曹操进攻孙权于濡须（今安徽巢湖），

孙权军被曹军击破，孙权急向刘备求救。刘备乘机写信给刘璋，诡称自己与孙权唇齿相依，要立即率兵前往相救。如若不救，荆州必被曹军占领，曹操既占荆州，定转兵侵占益州。据此要求刘璋给他增加 1 万兵马和军事物资，刘璋只给刘备 4000 人马，军事物资减半。刘备借机恼怒，并激起其部众的反刘璋情绪。张松的哥哥广汉太守张肃，怕将来牵连自己，揭发了张松与刘备谋划反刘璋之事。刘璋便捕杀了张松，并通告各地，断绝与刘备的往来。刘备更加愤怒，召见杨怀、高沛 2 人，将他们斩首，接着进兵关头，合并了他们的军队。刘备剪除了刘璋这两员名将之后，便决计向成都进军。刘备以黄忠、卓膺为前锋，亲率主力前往。为确保攻取成都的胜利，急调诸葛亮率军入蜀，会攻成都。

建安十八年(213 年)五月，益州从事郑度建议刘璋命各地坚壁清野、困死刘备，并趁刘备撤退之时，一举将其擒获，刘璋拒绝采纳。刘璋一方面命其部将扶禁、向存率兵 1 万，进袭刘备中郎将霍峻防守的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南)，一方面派出部将刘璿、冷苞、张任、邓贤、吴懿等人率军抵抗刘备，皆被刘备军击败。后又命李严、费观督率绵竹各军与刘备交战。结果李严、费观、吴懿等率军向刘备投降，刘备军更加强大，率兵包围了雒城(今四川广汉)。张任率军出城与刘备交战，被刘备军斩首。

建安十九年(214 年)五月，诸葛亮留下关羽守卫荆州，和张飞、赵云率军逆长江而上，首克巴东(今湖北巴东西北)，进至江州，攻取了巴都(今四川重庆)，活捉太守严颜。

诸葛亮攻占巴郡后，一方面命赵云率其部众直趋江阳(今

四川泸州)、犍为(在今四川彭山);一方面令张飞攻取巴西(今四川阆中)、德阳(今四川遂宁东南)以便与刘备大军会攻成都。

刘备军围攻雒城1年,仍未攻克。军师庞统为流矢所中而死。刘备在悲痛之余,命法正致书刘璋劝其尽早归降。法正在信中除了分析双方的形势强弱之外,还劝告刘璋说:“刘左将军自起兵以来,常常思念过去朋友的恩德,不会用刻薄的态度对待你,我觉得你应顺应大势,定可保留阁下全家安全。”刘璋对法正的劝降,不加理会。

不久,刘备攻破雒城后,立即挥军包围成都,此时诸葛亮、张飞、赵云诸路兵马,也齐集成都城下。同时,马超也率兵投奔刘备,兵至成都,屯于城北,成都城内吏民大为惊恐。刘备军包围成都几十天,派从事中郎简雍,入城劝刘璋投降。这时城中尚有精兵3万,粮食军资足以支持一年,吏民都欲拼死作战。但刘璋却对其部众说:“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饥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于建安十九年六月,与简雍共同出城向刘备投降。刘璋的部众无不流涕痛哭。刘备将刘璋迁居于公安,尽送还其财物,授以振威将军印绶。

当刘备在与刘璋作战时,防守葭萌的霍峻正遭扶禁、向存军的围攻。当时张鲁为招降霍峻,曾派大将杨昂引诱霍峻与其联兵,共守葭萌城,遭到霍峻拒绝,霍峻说:“小人的头颅可得,城池不可得。”霍峻被围攻1年多,仍然带领其仅有的几百人坚守作战。一天霍峻侦察发现扶禁、向存军懈怠,便选择精兵,出城猛击,大获全胜,杀了向存。待刘备平定蜀郡后,就将广汉

分出，划为梓潼部，派霍峻为梓潼太守。

至此，延续 3 年的刘备集团入蜀作战，便以刘备集团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

刘备攻取汉中和蜀汉的建立

蜀地在刘备集团的治理之下，经济恢复很快，社会财富日渐丰富。政治上由诸葛亮、法正、董和、刘巴等人的辅佐实行了一些符合当地地主阶级利益的政策，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很受百姓拥护。至此，刘备跨有荆益二州，以图天下的战略企图初步实现。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 年）十一月，曹操击降张鲁，全部占有了汉中地区，至此，曹操集团已基本统一了中国北部地区的绝大部分疆域。

曹操进攻张鲁，夺取汉中，只是向蜀地进军的第一步。曹操占据了汉中之后，因为无力继续向前推进，加之看到刘备集团已初步在益州站稳了脚跟才作罢。

建安二十二年（217 年）冬，法正向刘备建议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占据了汉中，不乘胜南下谋取巴、蜀，却留张郃、夏侯渊屯兵防守，自己急急回归，这不是其缺乏战略头脑，而是力量不足，或是因国内出了紧急事情。夏侯渊、张郃的才能、谋略，比不上我们的将帅，如果我们发兵征讨，定可战胜他们。夺取汉中以后，广兴农业、屯集粮食，侦察和等待向北进兵的机会。这样，上可以消灭曹操，复兴汉室；中可以逐渐占领雍、凉二州，开拓我们的疆土；下可以坚守要害地区，保证我们能长久地发展和存在，此乃上天赐予我们的良机，我们万万不可

丧失这个机会。”刘备赞同法正的建议，便决定亲率诸将向汉中进击。

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冬，刘备按即定的策划，首先派张飞、马超、吴兰、雷同等人率军进取下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春，刘备命诸葛亮留守益州，负责军政大事，供应前方军资和调集援兵，自率主力大军北上。

二月，张飞至固山与吴兰、雷同等进攻下辨。此时魏王曹操已派都护将军曹洪率军前来抵抗张飞。曹洪军即将攻击吴兰、雷同军，张飞扬言要切断曹洪军的后路。曹洪听到这一情况，犹豫不决。骑都尉曹休则认为，敌人如若真要切断我军后路，定会埋伏军队，秘密前往。现在先扬言在外，说明他们无力办到，目的在于吓唬我军，以阻止我进击，故而应趁敌主力尚未全部到达之前，攻击吴兰。吴兰败了，张飞自然无法立足。曹洪认为曹休分析正确，遂立即向吴兰军进攻，攻破了敌军，斩了吴兰。张飞、马超见形势不利，便撤离了下辨地区。

此时，夏侯渊与益州刺史赵颙已进驻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堵住刘备进军汉中的道路。平寇将军徐晃率军守卫马鸣阁（今四川广元北朝天驿附近），将军张郃守广石（今陕西勉县西）。

四月，刘备命陈式等 10 余营军攻马鸣阁，徐晃遣别将陈式军击败，刘备军自投山谷死者甚多。刘备再次派军才将马鸣阁攻破。

刘备军进至阳平关，夏侯渊、张郃、徐晃等军依据险要地势，合力抗击。刘备军无法攻破此关，被阻于关下，遂紧急派人命诸葛亮速发援兵。诸葛亮于是调集蜀地全部兵马，急驰北

上,增援刘备。

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夏侯渊军已与刘备军相持了一年多。刘备军攻不破阳平关,只好向南渡过沔水,在定军山(今陕西勉县南)扎营。夏侯渊率领军队尾随而至,围筑营垒与刘备相抗。刘备乘夜烧围鹿角。夏侯渊急令张郃护守东围,自率轻兵防护南围。

此时,法正向刘备建议可以进击曹军。刘备于是先击张郃营垒。张郃军危急,夏侯渊分兵一半,相助张郃。刘备命讨虏将军黄忠登上高地,率领兵马,向夏侯渊冲去,夏侯渊大败,黄忠斩了夏侯渊和益州刺史赵颙。

张郃率领败军回至阳平关,曹军失去了主将,军中惊乱,不知如何是好。张郃于是暂时做了军中的统帅,各将皆受张郃的节度,军心才安定下来。

第二天,刘备军欲渡汉水攻击张郃军,诸将以为刘备军众,难以与之匹敌,主张依水列阵,阻止刘备军渡河。司马郭淮认为,依水列阵是示弱的表现,不是上策。不如远离河岸列阵,引诱敌人渡河,待敌渡河一半,向其发动攻击,即可将敌人击败。张郃遂按郭淮的意见布阵。刘备见曹军远离河岸列阵,怕遭不测,遂决定暂不渡河进击。曹操得知张郃军的情况后,即命人持节,授给张郃以符节,任命张郃为统帅。

三月,曹操率军自长安出斜谷,向汉中进发,沿途选派部队控制了各个险要关隘道口,以防刘备军的截击。刘备得知曹操正率大军而来,仍满怀信心地认为,虽然曹操亲自率军而来,已经难以扭转其失败的局势,汉中地区已肯定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刘备遂乘曹操尚未到达之际,调集兵力,扼守险要,坚壁不战,曹操无法攻击刘备军。

曹军运送军粮至北山下，黄忠率领部队前去夺取，未按预定时间返回。将军赵云率领几十个骑兵出营寻找。此时，曹操大军正巧出动，赵云突然与曹大军相遇，便勇敢地突击曹军，且战且退。曹军初被冲散，见赵云兵少，又集中起来，向赵云军追击。赵云进入军营，便大开营门，偃旗息鼓，装扮成一座空城。曹军进至营前，见此情形心中疑虑，怕有埋伏，不敢入营，回军而走，赵云军见曹军退走，突然鼓声如雷，以强弓劲弩猛射曹军，曹军惊惧万分，争相逃命，践踏和掉入汉水中淹亡者不计其数。

曹操无法攻破刘备军，双方相持一个多月，曹操的军士逃亡者日益增多。曹操甚为忧虑，一筹莫展。一日，部将请示曹操当天的口令，曹脱口而出“鸡肋”二字。部下均不解其意，主簿杨修听后，当即开始整理自己的行装，准备启程。有人私下询问杨修何故？杨修说：“魏王出令鸡肋是说人食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表露了魏王此时对夺取汉中的心态，表明魏王已无意久留汉中。”不久，曹操便放弃汉中，率领军队退走长安。

至此，刘备攻取汉中之战，约经一年半的时间，终于以胜利宣告结束，刘备占据了整个汉中地区。

章武元年（221年），刘备在成都即皇帝位，蜀汉正式建立。

四、孙吴政权的建立

荆州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就为刘备提出了夺取荆州的战略构想；曹操想平定江南也是以

占据荆州为跳板；而孙吴集团军在孙坚、孙策在世时，就在着手图谋占领荆州，赤壁之战前孙吴的势力已经发展到荆州东部。但是赤壁战争的结果是孙、刘、曹三家瓜分荆州，谁也未能独占这一战略要地。战后，由于北方曹操的威胁还在，又不可能立即将刘备逐出荆州，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权衡利害，同意鲁肃的建议，将荆州要地借给了刘备，以维持联盟，再图发展。同时孙权以步骘为交州刺史，经营岭南。

但占据荆州毕竟是孙权的既定政策，刘备取得益州的第二年（215年）春，孙权即派诸葛瑾去向刘备索要荆州，刘备则以夺得凉州以后再归还为辞拒绝。孙权派出官吏去强行接管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又被关羽赶走。孙权大怒，派吕蒙领兵袭夺了三郡，刘备也立即领兵东下，派关羽争夺三郡。这时传来曹操进攻汉中的消息，刘备怕益州有失，便主动向孙权请和，孙权也感到暂无取胜的把握，于是双方商定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湘水以东的江夏、长沙、桂阳归孙权；湘水以西的南阳、零陵、武陵属刘备。刘备因自荆州出兵宛、洛的条件不足，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由镇守荆州的关羽发动襄樊战役，企图夺取军事重镇襄阳和樊城。开始关羽进攻顺利，又遇上樊城地区下了10多天大雨，水淹曹将于禁等七军。深知孙权态度的司马懿等建议曹操派人劝说孙权偷袭关羽后方。孙权果然决定乘机夺取荆州，得到事成之后将江南封给自己的许诺，即亲自率军沿江西上，直驱南郡，很快收降关羽部将糜芳和傅士仁，占领公安和江陵。关羽回救荆州不成，在从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突围后被孙权军队活捉杀死。这样，刘备占据的荆州各郡全部被孙权夺去，孙权集团的势力伸展到三峡以东，三国鼎立局面已经最后形成了。汉延康元年（220年）十月，曹丕

称帝，建立魏国。第二年四月，刘备也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七月，刘备为夺回荆州和替关羽报仇，亲统诸军大举攻吴。孙权为避免两面受敌，八月，遣使向魏称臣，曹丕封孙权为吴王。黄初三年（222年），吴军在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一带大败蜀军，刘备逃回白帝城。这时，孙权再次拒绝魏国要自己送子为质的要求。曹丕派曹休、张辽等率军攻吴，孙权分兵临江抵抗。十月，孙权自建年号黄武，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十一月派使臣至蜀汉，恢复盟好。公元223年春，魏国撤军。十月，蜀、魏均遣使至吴，孙权犹豫不决。蜀使邓芝力陈联蜀抗魏之利，孙权下决心绝魏，与蜀和好。吴黄龙元年（229年）四月，孙权改称皇帝，九月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孙吴政权正式建立。

第五节 三国 鼎立时期的政治形势

一、吴蜀夷陵之战

孙权集团夺取荆州、斩杀关羽之后，引起了刘备集团的震惊，刘备为替关羽报仇，夺回荆州，自率大军顺江东下，欲与东吴决战。刘备军为争取此次战役的胜利，首先进兵至秭归（今湖北秭归）。一方面制造声势，期待荆州各地吏民起而响应，叛离孙权；一方面派出使者，携带金银玉帛至武陵蛮夷部地区，诏命蛮夷部族起兵，从侧后袭击孙权军。

孙权得知刘备亲率大军来袭的消息，除了急速部署抵抗刘备之外，在战略全局上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方面是为防止曹丕乘机南下，使自己处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便于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八月，派出使者向曹丕请降。孙权在上书魏文帝时，把自己说得十分怯懦无能，极为恭维曹丕，并送回以前为关羽俘获的魏国将军于禁。这时魏国的大臣都向魏文帝祝贺，但只有刘晔却向曹丕建议说：“孙权无缘无故来向我们投降，必定国内发生了紧急大事。孙权以前偷袭荆州杀了关羽，刘备必然要大举兴师讨伐东吴。东吴外有强大之敌的进攻，故而来向我们投降。这样一来，一则可以借魏国支援的名义，来鼓舞他们的士气，迷惑敌人。我们应乘此机会，也大举出兵，直接渡过长江袭击东吴。这样，刘备从外面攻，我们从南面打，不出几天，吴国就可灭亡。”魏文帝不听刘晔的建议，接受了孙权的投降，这就使孙权顺利实现了其第一点策划。

另一方面孙权集团派出使者前往蜀地与刘备集团议和，议和的同时，积极沿长江两岸地区布置重兵，以加强诸要点的守备：以振威将军潘璋率军防守巫县（今四川巫山）至秭归（今湖北秭归）地区，为其前军；以大都督陆逊率军防卫枝江（今湖北枝江东北）至夷道（今湖北枝城）地区，为其中军；以虎威将军朱然、建武将军徐盛等防守江陵（今湖北公安西北）、孱陵（今湖北公安东南）一带地区。孙权自率左右将领驻于武昌（今湖北鄂州），指挥调度各路兵马。

孙权使者绥南将军诸葛瑾奉命与刘备议和，但刘备听不进东吴使者诸葛瑾的劝告，孙权求和的计划未能实现，只能按预定的计划，迎击刘备军的进攻。

刘备亲率大军于魏文帝黄初二年、蜀汉章武元年七月，开始向东吴进军。刘备的大都督吴班和将军冯习，首战即在巫山打败了孙权军守将李异和刘阿，把部队推进至秭归，刘备前线兵力已增至4万多人。

孙权大都督陆逊为避蜀军锋芒，实施战略退却，一直退了五六百里，退至夷道、猇亭（今湖北枝城西北）一线，屯兵防守。

刘备为了调动武陵地区的蛮夷武装，便派侍中马良，携带金银玉帛前往诸蛮夷部族活动，蛮夷纷纷响应，起兵反吴，支援刘备军。

魏文帝黄初三年、蜀汉章武二年（222年）二月，刘备军推进至秭归后，即将继续向前进击。他任命黄权为镇北将军，统领江北的军队，前出至临沮（今湖北远安西北）、当阳（今湖北当阳东）之间，以便防止曹军由北面的袭击，威胁孙权军的侧背。以将军吴班、陈式率水军自秭归顺江而下，为水军先锋，攻取夷陵。同时命令将军张南率军为陆路先锋，沿长江南岸，翻山越岭，进攻夷道（今湖北枝城）。孙权的安东将军孙桓率军迎击张南军，被张南于夷道以北将其击破，退入夷道城，张南挥军将夷道城包围。刘备旋即率其余将领进至猇亭。

此时，东吴诸将都主张立即迎战刘备军。但陆逊说：“刘备大军沿江东下，士气正盛，且已占据了险要之地，若向其进攻，难以很快攻破，纵然能攻取一些地方，也不能获取全胜。如果万一我们失利，就要影响全局，非同小可。当前，我们姑且奖励士卒，鼓舞士气，从多方面考虑攻击敌人的策略，观察敌人的变化，待机而动。刘备兵多势众，如果这里是平原旷野，恐怕我们早已为敌人所驱逐了。好在刘备主力是沿山进军，地形狭

窄，兵力无法展开，整日行进在高山密林之间，实已精疲力尽。因而，我们可以慢慢发现他的空隙，找到他的弱点再行攻击。”东吴诸将因不了解陆逊的作战意图，认为陆逊畏敌怯战，对他有些不满。

当年五月，刘备命令全军从巫峡建平起到夷陵 700 里间，接连设营，一路之上共设营几十座，并以将军冯习为大都督，以张南为前部都督，自一月起至五月，刘备军与东吴军，除了在夷道地区包围了东吴安东中郎将孙醒之外，未发生重大作战行动。刘备鉴于无法与东吴军决战，便施展了诱兵之计，他命令将军吴班率领数千人在平地立营以引诱吴军出战。吴军将领见吴班兵少，又于平地立营，都想出击。但陆逊认为蜀军以微弱之军，立营于平地，其中必定有诈，应按兵不动，观察它的行动。刘备见其计谋不成，不得不将其埋伏于山谷中的 8000 伏兵撤出。陆逊乘蜀军撤退之机，命将军宋谦率兵尾随蜀军之后，伺机攻克了蜀军五屯而归。接着陆逊上书孙权，陈述自己不立即向刘备军进击的原因。

闰六月，陆逊向蜀军发动进攻，他先派兵攻击蜀军一个营地，未能取胜，众将埋怨陆逊白白牺牲了一些兵力。但陆逊此时却对大家说，我已想好破敌之策了。接着，陆逊命令士卒每人各持一捆茅草，以火攻刘备军营，结果一举成功，迅即命令全军猛攻。虎威将军朱然，首先攻破刘备军的前锋部队，切断了蜀军后路，振威将军潘璋斩杀了蜀将冯习。朱然与偏将军韩当部又大破蜀军于涿乡（今湖北枝城西北），绥南将军诸葛瑾、中郎将骆统、都尉周胤等也率兵自孱陵（今湖北公安西南），向猯亭（今湖北枝城北古老背）进发，与陆逊军会合后，与蜀军大

战于猓亭，连破刘备 40 多座营垒，斩蜀将张南、蛮王沙摩柯。将军刘宁、杜路等兵败降吴，至此，刘备军的主力已全部战败。

刘备在猓亭战败，乃率部众退保马鞍山（今湖北长阳南）沿山环列，进行固守。陆逊挥军四面围攻，双方又大战一天一夜，蜀军死伤 1 万多人，数万人投降东吴军。刘备军遂彻底瓦解。刘备见大势已去，便于夜间突围而逃。

此时，原先被蜀军包围于夷道（今湖北枝城）的东吴中郎将孙桓，见蜀军大败，便奋力突围，也将蜀军击败，并乘胜追击刘备残部，刘备逃到石门山（今湖北巴东东北）时，见追兵将至，便命人将辎重、器械烧毁，以堵塞山路隘口，才阻止了陆逊军的追击。蜀军沿途的军资、船只、器械损失殆尽，士卒的尸体遮盖了大江江面，惨不忍睹。当刘备退至巫县（今四川巫山）时，不料孙桓已率轻骑百余人超越了刘备，赶至夔道（今四川奉节境）截断了刘备的退路，刘备只得弃马翻山而逃，后来，幸遇将军赵云率兵前来救援，才得以解脱，退入白帝城（今四川奉节），孙桓也退兵而走。

刘备的镇北将军黄权，因后路被吴军切断，无法回蜀，八月投降了曹魏，侍中马良统率的五溪蛮军，也被吴军将军步骘击破，马良战死。将军傅彤为刘备殿后，部众伤亡惨重，傅彤仍英勇奋战，力战而死。从事祭酒程畿也战死军中。

刘备退入白帝城后，东吴将军徐盛、潘璋等均主张继续追击蜀军，上表孙权说，刘备必定为我军俘获，并派出部将李异、刘阿等率兵追至白帝城之南山。但陆逊、朱然、骆统却清醒地估计到，曹丕名义上协助东吴进击刘备，实际上另有图谋，必须防止魏军的突然袭击，同时，赵云统率的蜀军后援部队也将

全部到达白帝城。东吴军也难以再击破赵云军，于是决定立即撤兵。

二、诸葛治蜀

厉行法治，任人唯贤

223年4月，刘备死后，17岁的太子刘禅即位，史称后主，改元建兴。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以丞相兼益州牧。刘禅年轻，要求政事由诸葛亮全面负责，同时刘备临终时也一再嘱托，于是诸葛亮就担负了治理蜀汉的重任。

当时诸葛亮面临的局面是困难的。猇亭惨败后，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同时，在蜀汉统治地区内，一些豪强地主也乘刘备死去的机会，起兵反叛。在三国之中，蜀汉的力量最小。这时，曹魏占据的中原地区，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军事力量较强，统治比较稳定，力量居于优势；孙吴占据江南，资源逐渐开发，又夺得荆州，内部也比较稳定；蜀汉只保有益州，在人力物力上都不如魏、吴。

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负起治理西蜀的责任，担子确实不轻。

诸葛亮治理西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厉行法治，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

早在刘备占据益州后，诸葛亮就协助刘备推行了这一政策。这一政策固然是针对老百姓的，但也引起了一部分豪强大

族的不满。

为了维护刘备集团在西蜀地区的统治，诸葛亮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法令、条例，《蜀科》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些法令、条例，就其本质来说，自然是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主要是针对老百姓的，是防止和镇压人民犯上作乱的。但对一些豪强官僚的骄横跋扈，不利于集权统治的行为，不利于地主阶级长远利益的行为，也给予一定限制。诸葛亮治蜀过程中，一直注意贯彻赏罚严明的原则。他的赏罚标准是：是否有利于蜀汉政权的巩固，是否有利于他的政策的贯彻执行。他认为“赏不可以虚施，罚不可以妄加”。主张“明法”，也反对“滥刑”。他指出，如果赏罚不明，就会造成“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的局面，给国家带来危害。

正因为赏罚关系重大，诸葛亮很注意选择忠直廉平的官吏主管治狱的工作。

诸葛亮对李严、廖立等人的处理，表明了他的赏罚是严肃的。

李严(后改名平)是蜀国高级官员。刘备临死时，他曾和诸葛亮一同受遗诏辅佐刘禅，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他负责供应军需物资，当军粮不继时，他不但不想办法克服困难，反而派人到前线，假传刘禅旨意，要诸葛亮退兵。诸葛亮退兵之后，他又故作吃惊，责问诸葛亮，诸葛亮回来后，经过查核，弄清了李严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不以国事为重的罪行真相，上书刘禅将他削职为民，流放川北梓潼郡。

长水校尉廖立，自命不凡，不可一世，认为自己是诸葛亮第二，应当掌管朝政。他看不起朝廷的文官武将，攻击诸葛亮

从下层选拔官吏的政策,说朝廷任用的官员都是“俗吏”,将领都是“不足以经大事”的小人,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群臣不和。诸葛亮得知情况后,也上表刘禅将廖立罢了官,并把他流放到汶山郡(今四川汶川西南)去。

为了做到“赏罚必信”,诸葛亮很重视官员的表率作用。

诸葛亮也注意身体力行。228年第一次北伐失败后,他认为自己身为统帅,用人不当,也有过失,便主动上书刘禅,请求降职三等,以示惩罚。

由于诸葛亮赏罚严明,使蜀汉政府的工作效率提高了,统治秩序逐渐稳定下来。

在治理蜀汉的过程中,诸葛亮很注意官吏的选拔。他“任人唯贤”,把一些有才能、忠于蜀汉政权的文臣武将安置到重要岗位上。如张疑出身低微,而且“放荡无礼”,缺少“德行”,但他忠于蜀汉政权,很有才能,诸葛亮就提拔他为越嶲太守。王平出身士卒,“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但他“遵履法度”,是个很有实战经验的将领。街亭之战时他立了功,诸葛亮便破格提拔他为将军。吕义“治身俭约”,为政“简而不烦”,当了地居要冲的汉中太守。邓芝“不治私产”,“明于赏罚”,又能贯彻诸葛亮的“联孙抗曹”方针,当了扬武将军。蒋琬本是荆州的一个缮写文书的小吏,随刘备到益州后,担任官吏“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诸葛亮外出打仗,他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确实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和能力的人。诸葛亮临死时向刘禅推荐,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

诸葛亮不仅自己注意发现人才,大胆提拔,而且还鼓励属下和各州郡长官向上推荐。曾任广汉太守的姚伉注意这样做

了。诸葛亮便向僚属们夸奖说：“当臣下的对国家最有益处的工作，就是多推荐人才。姚佑向朝廷推荐不少有文武才能的人，希望你们也都像他那样。”

为了切实做到“任人唯贤”，诸葛亮要求官吏们办事要讲求实效，“治实而不治名”，反对名不符实、表里不一的作风。他重视对官吏的考核，了解他们是否忠于职守，有无“损公肥私”、刑罚不公的情况，以便进用贤良，退去贪懦。

诸葛亮不拘出身、资历选用人才，遭到一些人反对。来敏是名门望族，父亲来艳，灵帝时做过司空，自己又是刘璋的亲戚。因他有一定知识，刘备、诸葛亮曾让他掌管教育，后主即位以后，先后为虎贲中郎将辅汉将军。他对诸葛亮的“任人唯贤”的政策不满，扬言说：“新提拔上来的那些人有什么功德，而夺我的荣资给他们，大家都憎恨我，这究竟是因为什么？”诸葛亮因“来敏乱群”，不利于政策的贯彻执行，把他罢了官。

诸葛亮的“任人唯贤”方针，受到了西蜀地区一些士人的欢迎，他们称赞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吸收了一些有才能的人参加蜀汉政权，使蜀汉在诸葛亮执政及以后一个时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广开言路

诸葛亮在治蜀过程中，为了提高统治效率，主张君主要实行“纳言之政”，注意采纳臣下的建议。他认为要把事情办好，就要多闻多见，如果能够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就好比有了更多的眼睛和耳朵；能够看得多，听得全，就能够免去缺欠，把事情办得更好。他常劝后主刘禅，不要堵塞忠谏的道路，要听取采

纳正确的主张。

诸葛亮自己身体力行，在处理军政事务的时候，就很注意听取手下人的意见，以便“集思广益”。

诸葛亮能够注意调动统治机构中各级官员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在封建社会中是少见的。诸葛亮忠于职守，严格要求自己，为蜀汉政权的利益，不计较个人的尊严，对一个掌握政治实权的封建统治者来说，确实是难得的。

诸葛亮对治蜀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终日操劳不得休息。丞相主簿杨颙很为诸葛亮的健康担心，用两个历史故事来劝诸葛亮，是要诸葛亮少管一些具体事情，多注意身体。对于杨颙的劝告和关心，诸葛亮很感激，但他重任在身，对事业的责任心使他对许多事情不能不亲自过问处理，结果劳累的情况丝毫没有改变。他效忠蜀汉，确实是“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诸葛亮在工作中，还很注意自己言论和行动的影响，特别注意处理好和后主刘禅之间以及和下级官员之间的关系。

有一次李严给他写信，劝他晋爵称王，接受“九锡”。按照当时诸葛亮的权力、地位、功勋和威望是可以这样做的，但他却认为这是“坐自贵大”，是一种没有益处的行为，回信谢绝了李严的这番“好意”。

还有一次，他的哥哥诸葛瑾，奉孙权之命出使蜀汉，诸葛亮只按接待别国使臣的礼节对待他，除公事会面交谈外，从未私下会面。

再如，诸葛亮北伐，领兵屯驻汉中时，安排他的儿子诸葛乔和其他将领的子弟一样，率领一部分兵卒在山谷中押解转

运军需物资。这个工作相当艰苦，要冒风雨，跋涉在崇山峻岭之中。为这件事，诸葛亮特意给诸葛瑾写了一封信说：“诸葛乔按理可以回到成都去，但是现在诸将子弟都在解运军中物资，大家应该同甘苦、共荣辱，所以我命令他领数百名兵士和诸将子弟一同在山谷中解运物资。”

正因为诸葛亮的言行注意从大局出发，所以有人评论他大权在握而不失礼，不跋扈欺上；代替皇帝行事，国人并不怀疑他有篡位自代的野心。诸葛亮能够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来振兴蜀汉，防止有人借机搬弄是非，挑拨君臣之间和臣僚之间的关系。

平定南中

夷陵战败后，刘备回至白帝城，便一病不起，因而，急召诸葛亮至白帝城嘱托后事。

江嘉（今四川名山北）太守黄元，因为诸葛亮不喜欢他，后又听到刘备兵败病重，怕诸葛亮一旦掌握了全权，对他不利，于是，便率其部众反叛，烧毁了临邛城（今四川邛崃）。此时，诸葛亮正在东行探望刘备的途中，成都无主，兵力空虚，黄元更加有恃无恐。益州治中从事杨洪向太子刘禅建议，命将军陈昺、郑綝率兵征讨。趁黄元顺长江东下之时，陈昺、郑綝率兵一举将黄元击败斩首，蜀地稍稍安定。

魏文帝黄初四年、蜀汉建兴元年（223年）六月前后，益州郡（今云南东部）汉族豪强雍闿乘蜀汉新败于夷陵，刘备病死，黄元等叛乱之机，策动少数民族首领孟获、牂牁（今贵州黄平西南）太守朱褒、越嶲郡（今四川西昌）夷王高定等起兵反叛。

反叛之初，势力并不强大，但经过雍闿几年威逼挑拨，叛乱渐渐遍及南中整个地区，仅有永昌郡（今云南保山东北）功曹吕凯、郡丞王伉仍忠于蜀汉政权，形势已相当严重。蜀汉委派的益州郡太守王昶被叛军杀死，太守张裔被绑送东吴，还有一些太守被阻于郡外，无法到任，只好下书劝降，但叛军一概不听。诸葛亮本着和抚南夷、稳定后方的既定政策，对南中这场叛乱，一直采取政治上的招抚策略，但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诸葛亮为了尽快平息南中叛乱，以便为进攻曹魏提供更多的人力物力支援，遂经过与吴结好，切断了雍闿与东吴的联系，时达二年多的准备后，决定率军平定南中。

诸葛亮深知用武力镇压少数民族，常常是压而不服，大军一撤，叛军复起，劳师无功。于是便想采取更为有效的策略，以收长治久安之利，越嶲太守马谡在送别诸葛亮时向他进献进兵南中的策略时说：“南中依仗其险要绝远的地势，反叛之心由来已久，今日平定，明日又会反叛，对其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用其心而已”。马谡之言，正中诸葛亮之意，诸葛亮遂在进军前发布了《南征教》，同时以右、中、左三路兵马南下，向雍闿进击，会师于益州郡。

黄初六年，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二月，诸葛亮开始向南中进军。出兵安上（今四川屏山），沿马湖江（今金沙江雷波至宜宾段），直逼越嶲郡。诸葛亮军进至卑水县（今四川美姑）一带，便暂停前进，准备向高定所部进击。

卑水地区是夷王高定的重要据点，听说诸葛亮引军而来，便增强了防守的兵力，雍闿、孟获等也率兵北上，援助高定。高定拉开阵势，准备与诸葛亮军决战。此时，高定部将因惧怕诸

葛亮的军威，便击杀了雍闿，孟获见此情景，也率军急忙退走泸水（今金沙江四川攀枝花至金阳一带）。诸葛亮见高定的援军退走，趁势向高定军进击，高定军大败，高定率残部向邛都（今四川西昌）撤退，诸葛亮军乘胜追击，一举攻克邛都，俘获了高定的妻室儿女和高定的部众，对他们进行了安抚，并欲招降高定。高定拒绝降服，率其残部 2000 多兵马，继续与诸葛亮作战，最后，被诸葛亮军击杀。

孟获率军渡过泸水，向其家乡味县（今云南曲靖）退走，诸葛亮军尾随追击，于当年五月，也渡过泸水，向孟获军进逼。

李恢所率的中路军，进至牂牁、益州两郡的接界地区，附近地区的叛乱分子势力很大，超过蜀军数倍，将李恢部重重包围。李恢沉着应战，乘叛军不备，突然率兵袭击，将叛军击溃，旋即南下盘江。与此同时，门下督马忠所率之左路军，也击败了盘踞在且兰的朱褒军，斩杀了朱褒。接着，三路大军进至味县附近，与孟获军首次交战于盘东（似在今云南曲靖附近）。

孟获在当地夷汉族中以勇猛善战而出名，颇得人心，诸葛亮因而命令部队要生俘孟获。双方经过交战，孟获果然被诸葛亮俘获。诸葛亮为使他心服口服，便让孟获观看蜀军的阵势，孟获看后很不服气，对诸葛亮说：“原先我不知你的虚实，故而上当战败，今承蒙恩赐观看了你的阵势，不过如此，假如能重新交战，一定可以打败你！”诸葛亮笑着放孟获回去，让他重整军队再来交战。结果连战七次，诸葛亮七纵七擒孟获，当最后一次还要放他回去时，孟获终于服气坚决不走了，诸葛亮于是率军进入滇池（今云南晋宁东）平定了南中地区。

诸葛亮欲选用当地夷人为官，以便治理益州、永昌、牂牁、

越嶲四郡。有人持异议而劝谏诸葛亮要慎重。诸葛亮说：“若是留下外地人为官，必须留下部队，留下部队就没有吃的，这是第一个难办到的；夷人刚刚战败，父叔、兄弟被打死，留外地人为官吏而无部队，必有祸患，这是第二个难办的事；夷人常有废杀官吏的行为，留外地官吏，终究不会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第三个难办的事。我决心不留兵在此，自然也就不必运粮至此，只概略地为他们制定个纲纪，夷汉各族共同遵守，大概就会安定下来。”于是，诸葛亮便全部任用孟获的官吏治理四郡，并以孟获为渠帅，南中地区从此安定，直至诸葛亮去世，再未发生过叛乱。

三、诸葛亮伐魏

诸葛亮第一次伐魏之战发生于魏明帝太和二年、蜀汉建兴六年(229年)春正月。诸葛亮亲率10万大军，兵出祁山，向曹魏之陇右进攻。

曹丕随着国势的增强，乘吴蜀双方争夺荆州战后实力大减的机会，对吴蜀不断进行了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黄初四年(223年)五月，刘备刚刚病死，曹丕便致书诸葛亮，劝其称臣降服，被诸葛亮拒绝。曹丕以孙权不送世子入侍为借口，三次举兵，进攻东吴，均被长江天险所阻，未能取得明显的战果。但是，尽管如此，曹丕欲一统天下，吞灭东吴、蜀汉的战争准备时刻都在加紧进行。

曹睿即位，接受了曹操、曹丕当政期间与东吴和蜀汉连年作战、每每失利的教训，采纳散骑常侍孙资等人的建议，停止

对吴、蜀用兵，发展生产、休养生息，待国富兵强之后，再进击吴、蜀两国。

蜀汉政权自平定了南中地区的反叛之后，诸葛亮便专心进行北上伐魏的战争准备。为实现其预定的战略目的，对外不断派遣使者，巩固了与东吴的联盟；对内则加紧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充实府库、修理内政，严格训练军队，改革阵图、武器、装备。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诸葛亮便于魏明帝太和元年、蜀汉建兴五年、吴黄武六年（227年）三月，决定率军北驻汉中，命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留守，总理政务。

诸葛亮进至汉中地区后，一方面加紧备战，一方面寻求进攻曹魏的对策。他为解除进兵曹魏的侧背威胁，首先策反曹魏新城（今湖北房县）太守孟达叛魏。

诸葛亮在决计进攻之前，与部将商议进兵之策。丞相司马魏延建议说：“听说夏侯楙是曹操之婿，胆小无谋，我请率5000精兵，并带粮5000斛，直出褒中，沿秦岭向东，由子午道北进，不到10天，即可到达长安。夏侯楙听到我魏延兵到，必定弃城而逃，那时长安城便只剩督军御史和京兆太守了。我将横门的仓库打开，足以周济逃散的饥民。等夏侯楙和东面的曹军相会，尚需20多天，那时丞相从斜谷而出，也即到达长安了。这样可将咸阳以西的地区全部占领。”诸葛亮认为此为危计，不如安全地从坦道攻取陇右，故不采用魏延之策。

诸葛亮为隐蔽自己的进军企图，迷惑曹军，出兵前，故意张扬将由斜谷进攻眉县（今陕西眉县东），同时以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进占箕谷（今陕西宝鸡东南），做为疑兵。诸葛亮则自率主力，兵出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以争夺陇右，

战胜之后，再直下关中。

魏明帝曹睿认为刘备死后，蜀地内乱，数年未曾得到蜀汉的动静，对诸葛亮军的突然来攻，没有准备，朝野上下均很震惊，曹睿于是急令大将军曹贞督率关右诸军，以抗击蜀汉军。

魏明帝太和二年、蜀汉建兴六年（228年）正月，诸葛亮军首先命赵云、邓芝率其所部，兵出斜谷，进占箕山。

二月，诸葛亮率兵进至西城（今甘肃礼县东北）。魏明帝得知诸葛亮果然率大军而至，遂命右将军张郃率步骑兵5万，自长安西进，阻止蜀军东向；命大将军曹贞驻守陈仓（今陕西宝鸡南），防御箕谷方向的赵云军，二月七日，曹睿也进至长安督战。

诸葛亮军，军威严整，声势很大，魏之天水、南安、安定等郡都反叛曹魏，投降了蜀汉。诸葛亮军以部分兵力进击广魏（今甘肃天水东北）、陇西（今甘肃陇西东南）以便夺占整个陇右地区。

魏右将军张郃部，沿六盘山间的谷道急进，直趋要地街亭。诸葛亮得知这一情况，急令参军马谡、裨将军王平率将军李盛、黄袭等为前锋，进占街亭，以保障主力侧翼的安全。另以将军高详进占柳城（今甘肃清水北）。

马谡到达街亭之后，违背诸葛亮的节度，“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裨将王平见马谡在高山之上扎营，缺乏水源，便力劝马谡依山傍水扎营，马谡不听，王平遂率1000部众，另设营寨。张郃大军一到街亭，便直逼马谡军山下，切断了马谡军的水源，与马谡军大战，一举将马谡击败。此时，王平军鸣鼓自守，虚张声势，张郃疑有伏兵，未敢再战，王平才收拾残部退

回。魏将郭淮也于柳城将蜀将高详部击败。

马谡军惨败，高详也被击溃。诸葛亮前军损失殆尽，本队受到极大威胁，夺取陇右的企图难以实现，不得不暂时退回汉中。

赵云、邓芝军在箕谷地区，也被曹贞军击败。赵云收拢部众固守，未遭受重大损失，旋即也撤军而回。

诸葛亮军战败，撤回汉中后，即上书蜀汉皇帝刘禅，请求自贬三等。诸葛亮为严明军法，决定将马谡和将军李盛斩首；赵云因兵败，被降为镇军将军；剥夺将军黄袭的兵权。裨将军王平表现优异，加封为参军，讨寇将军，封为亭侯，统率五部兼当营事。

街亭兵败，兵将溃至难以收拾的地步，而箕谷战败，却损失不大，诸葛亮对此不解，便询问邓芝是何原因。邓芝说：“赵云将军亲自断后，因而军资器械既没有丢失，兵将也没有离散”，诸葛亮深为感慨。

诸葛亮于第一次攻魏之后，至第五次攻魏之前，还进行了三次攻魏作战，其中第四次攻魏作战规模较大，这次战争发生于魏明帝太和五年、蜀汉建兴九年（公元231年）二月，止于当年六月。诸葛亮回军汉中之后，深感粮食是北攻曹魏的支柱。为此，诸葛亮认真吸取了五出祁山的教训，休养生息，积累经济和军事实力。为确保将来作战中的军粮供应，他在斜谷建立了邸阁，又发明了流马。这样，诸葛亮一方面在预定战场可以储备相当数量的粮食，又有了“木牛”、“流马”这些先进的运输工具，为其今后作战，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供应保障。蜀汉建兴十一年（233年），蜀汉庾降都督张翼，由于立法严苛，引起南

夷豪帅刘胄的反叛，诸葛亮便派参军马忠去接替张翼，马忠率军打败并斩杀了刘胄。蜀汉三年之内无战事，诸葛亮经过养士训卒三年备战，北伐曹魏的条件日渐成熟，遂遣使入吴，与东吴商定共同攻魏。

魏自诸葛亮退兵汉中后，为防止蜀汉的再次进军，便命司马懿认真进行作战准备。司马懿为充实关中和陇右地区人力物力，上表魏明帝，将冀州民众，迁往关中和陇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繁衍生息，以长期支持对蜀作战的需要。魏明帝太和六年、吴大帝嘉禾元年（232年）九月，魏明帝为惩罚辽东太守公孙渊与吴通好，派汝南太守田豫率青州诸军由海上、幽州刺史王雄由陆路进击公孙渊，无功而还。魏明帝青龙元年、蜀汉建兴十一年、东吴嘉禾二年吴魏之间发生了合肥、新城之战。接着，魏又派军与鲜卑轲比能在楼烦地区进行了交战，魏军先败；再次交战则将轲比能逐往漠北。至此，除蜀汉尚能与其匹敌之外，在中国北方已无任何力量能够动摇曹魏的统治。

诸葛亮鉴于陈仓、祁山的魏军已在该地筑成坚固城堡，如仍向上述地区进攻，必将屯兵坚城。于是，便以尚未筑城的斜谷做为进军通道，企图突然兵出斜谷，直入关中，以与魏军决战。

魏大将军司马懿率军屯于渭水之北，得知诸葛亮进军枹县（今陕西眉县渭水北岸）。急与诸将协商应敌之策。诸将多主张应屯军渭水以北，待机破敌。司马懿则认为，渭水之南，百姓聚居，应为必争之地。因而，引大军渡过渭水，凭险据守。司马懿对众将说，如果诸葛亮兵出武功（今陕西眉县东50里之渭水南岸），背靠险山，向东进击，形势将对我不利；若其西上

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我军则平安无事。为此,司马懿仍采取筑垒坚守,不与蜀军决战,待蜀军粮尽,自行退走的战略。不久,诸葛亮大军果然进占了五丈原,魏军将校均很高兴。但扬武将军郭淮却认为诸葛亮此举有更为远大的战略企图,其目的在于占领五丈原以西之陈仓、天水、祁山等地,推进其作战基地。为此,郭淮推断,诸葛亮军必争北原(今陕西眉县北、渭水北岸)。请求率兵进据北原。司马懿同意郭淮的意见,郭淮遂率兵预先进占了北原地区。

魏明帝青龙二年、蜀汉建兴十二年,吴嘉禾三年二月,诸葛亮亲率 10 万大军,从汉中出发,经过斜谷,向魏境枹县地区前进。与此同时,东吴孙权也答应出兵攻魏,以便逼迫曹魏于两面作战的不利态势之中。四月,蜀军顺利走出斜谷,进至五丈原。

司马懿按照预定的作战策划,已先期进至渭水南岸,背水设防,阻断了诸葛亮军东进的道路。诸葛亮军便渡渭水,攻击北原,但北原也为郭淮重兵占领,正在构筑营垒,蜀军与郭淮军交战,被郭淮军击败,未曾攻克。

诸葛亮东进不得,北攻又败于郭淮,一方面在五丈原筑垒防守,与司马懿大军相持;另一方面则派兵西取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等地。诸葛亮深知司马懿又将沿用坚壁不战,等待自己粮尽退走的老策略。于是,也下令军队屯田,计划以持久作战击败司马懿军。

诸葛亮与司马懿大军相持 100 多天,直至当年八月,诸葛亮多次挑战,司马懿就是坚壁不战。于是,诸葛亮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一些妇女的华丽服装,以求激怒司马懿出战。司马懿大

怒，派出使者向魏明帝请求出兵决战。魏明帝使命卫尉辛毗持节至司马懿处，制止司马懿出兵。护军姜维对诸葛亮说：“辛毗杖节到前方来，司马懿再不会出战了。”诸葛亮对姜维说：“司马懿本来就不打算出战。所以向曹睿上表请战，只是做个样子遮其部众的耳目而已。‘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如果他真能战胜我们，何必千里迢迢去请求曹睿批准出兵呢。”诸葛亮进一步对姜维分析司马懿军的作战意图说：“敌人以我千里远征，军粮补给艰难，利在速战速决。因而，持重不战，以待我师老自还，进而乘机突击我军的背后。因此，我军必须实行屯田积谷，与当时吏民相安而居，扎下根来，等待歼敌时机。同时利用“木牛”、“流马”加快运送军粮，这样我军不但不会疲惫，反而会愈战愈强，使司马懿的企图彻底败破。”

当诸葛亮的使者到司马懿军中送妇人服装时，司马懿不问蜀军的情况，只问诸葛亮吃饭睡觉和每天处理军务的繁忙程度。诸葛亮的使者回答说：“诸葛公起得很早，睡得很晚，受罚 20 板以上的案件，都要亲自阅览案卷，所吃的不过数升而已。”司马懿听后，对其左右说：“诸葛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当年八月，诸葛亮病重，刘禅派尚书仆射李福去探视，并请问国家大事如何安排。李福到达，和诸葛亮谈话之后，告辞而去，过了几站又返回来。诸葛亮说：“我知道先生回来的意思，前次虽然说了一整天，但话尚未说完，所以再回来让我作决定。先生要问的事，蒋琬比较合适。”李福接着又问，蒋琬以后，谁可担此重任。诸葛亮说：“费祎可以继之”李福再问费祎以后谁可继任，诸葛亮已无力作答了。

没过几天,这位 54 岁的蜀汉贤相便病故于军中。长史杨仪整军而出,准备撤退。当诸葛亮病危之时,曾与杨仪和费祎商议在他身没之后,汉军退兵的部署时,即已确定以将军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诸葛亮深知魏延不会受杨仪节度,于是又告诉杨仪说,若魏延不服从命令,你们便自率大军而归。诸葛亮死后,杨仪保密暂不发丧,让费祎前去试探魏延之意。魏延说:“丞相虽然死了,我魏延还在,丞相府的吏卒去埋葬他,我可以统率军队去和敌人作战,怎么可以因为一个人死,而废弃天下大事呢!况且像我魏延这样的人,怎么能受杨仪的指挥,作一个掩护撤退的将领呢!”魏延于是拉着费祎欲共同写信给各将领,部署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费祎假说向杨仪报告,杨仪是文人,决不敢违背先生的意见。魏延才放费祎回归。

费祎走后,魏延既后悔,又放心不下,派人去杨仪营中探听动静。杨仪正按诸葛亮原先的部署,组织各营撤军,魏延大怒,竟率军先行后撤,并将所过栈道全部烧毁。

司马懿得知诸葛亮病故、蜀军撤走的消息后,便率军追赶。姜维让杨仪下令部队反打着旗帜,擂起进攻的战鼓,装作欲反攻司马懿军的架势。司马懿怕诸葛亮未死、中其诱兵之计,不敢再追,收军回营。于是杨仪军掉头而退,走至山谷后面,才为诸葛亮发丧。百姓因此而编了一句谚语说:“死诸葛吓走生仲达”司马懿听到百姓的这一议论感慨地说:“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司马懿进入诸葛亮军留下的营垒中去视察,不由得惊叹道:“天下奇才也!”司马懿挥军再追,蜀军已远去,只得作罢。

杨仪军由于栈道被魏延烧毁,只好一面命士卒砍山木架

通道，一面昼夜兼程撤退。当行至南斜谷时，魏延军已先期占领，随即派兵迎击杨仪军。杨仪命将军何平率部抵抗魏延军，何平大声斥责魏延军说，丞相病故不久，尸骨未寒，你们何敢反叛！魏延部众均感到魏延理屈，纷纷逃散，只剩他和他的几个儿子，逃往汉中。

杨仪退兵途中立即派出将军马岱率部追赶魏延父子，将他们追上统统斩首，杨仪回军汉中又诛杀了魏延的三族。

四、魏吴东兴之战

魏吴东兴之战发生于魏王芳嘉平四年、东吴会稽王建兴元年（公元252年）十一月。

起初，孙权修筑东兴堤，想阻遏巢湖之水，后来因为进攻魏淮南地区时，反受其害，于是停止了修建。太傅诸葛恪当政后，遂在原基础上，于濡须山和七宝山之间，修筑了两座城池，以派将兵防守。

魏镇东将军诸葛诞就此事上书大将军司马师说，吴国正对魏国进行侵略，并建议在西部出兵牵制吴军西方的军队，而以精锐之军，攻拔吴军这座城池，定获大胜。

此时，魏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大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各自都上奏了征伐东吴的计划，三人的计划各不相同。魏王曹芳征询尚书傅嘏的意见。傅嘏在回报中详细分析了东吴的军事形势和魏军多年来对东吴作战的基本教训后，认为以上三人主张立即向东吴进军的计划均不可取，并向魏王建议说，只有在边疆驻军屯田，才是较为完善的策略。傅嘏据此

提出七条建议：“命王昶、胡遵等据守险要地区，审查各地的防御措施，各个方向均取守势，伺机夺取敌人良田沃土，将敌人逼向贫瘠地区，这是其一；向无人处发展，攻击敌人而不妨害民众，这是其二；注意安抚近处的百姓，降服的人必会越来越，这是其三；哨兵远设，使间谍无法进入，这是其四；逼敌退后防守，哨兵必然减少，耕种就有保障，这是其五；靠自己生产供自己食用，不必派兵运输，这是其六；发现有机可乘，应迅速进兵，这是其七。司马师不接受尚书傅嘏的建议，决心主动出兵攻吴。

魏齐王曹芳嘉平四年、东吴会稽王建兴元年十一月，魏主下令，命王昶等兵分三路向东吴进攻。

十二月，魏大军共约 15 万开始出动。征南大将军王昶率军向南郡（今湖北江陵）攻击；镇南将军毋丘俭率军向武昌（今湖北鄂州市）进发；征东大将军胡遵、镇东将军诸葛诞率军 7 万攻打东兴。

十二月十九日，东吴太傅诸葛恪率兵 4 万，日夜兼程往救东兴。此时魏将胡遵正指挥魏军架设浮桥渡河，并于东兴堤上列阵，向东、西两城进攻。因两城城墙高峻，魏军未能攻下。

诸葛恪率军急进，并以冠军将军丁奉和将军吕据、留赞、唐咨等率军为前部，沿山的西部而上。丁奉对诸将说，现在各军行动都比较慢，如敌占据了险要，我军就难以与其相争，我欲率兵疾进。于是，丁奉请各军让开通路，由他所率之军 3000 人先行，这时北风劲吹，丁奉命船队扬帆急进，两天即到达了东兴堤东南的东关（今安徽巢湖东南），屯兵于徐塘。

当时天降大雪，气候严寒，魏将胡遵等正聚会饮宴。丁奉

发现魏军前部兵少，便对部众鼓动说，取胜的时刻就在今天了！于是命令士卒解下铠甲，丢掉矛戟，只戴头盔，手执刀、盾，裸身沿堤而上。魏军见此情景，都大笑吴军愚笨，遂不加戒备。吴军登上堤岸，便高呼着冲向魏军，一举击破魏军前屯，此时吴将吕据等也率兵赶到，魏军惊慌散走。由于争渡浮桥，桥被压断，淹亡和互相践踏而死者众多。魏前部督韩琮，太守桓嘉等均战死，魏军被歼数万人，损失军资器具牛马不计其数，吴军大胜而归。

在西部担任进攻江陵和武昌任务的魏将王昶、毋丘俭听到东部战线作战失败，也立即烧营退军。

五、曹魏司马氏专权

曹操当政时，为争取世族豪强的支持，曾征聘一些地方名士出来做官。今河南武陟人司马懿出身名门士族，年轻时就有些名气，对天下大事颇为关心。曹操派人去请他，他却高卧在床，伪称身患风痹，起居不便，不肯出来。后来曹操告诉使者：“他再要拖拖拉拉，就将他收监问罪。”使者把话带给他，他这才心怀畏惧地跟随使者，来到京城。曹操请他出来，只让他做皇室子弟的教官。后来他先后担任过的主簿、太子中庶子和军司马等职，都不是什么显要的官职。主簿典领文书，是办事大臣；军司马位在大将军之下，只在将军府上参与拟订作战计划；太子中庶子也不过是太子的侍从大臣，并无多少实权。不过他在担任太子曹芳的侍从官时，成天与曹芳一起进出，关系十分亲密，这为他后来地位的上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曹操死，曹丕即位。司马懿便一跃而做了尚书官，不久改任督军、御史中丞，爵封安国乡侯。曹丕东征西讨，他一直独当一面。负责留守京师。曹丕病死，他与大将军曹真等同受诏命，辅佐魏明帝曹睿。

在担任明帝辅臣期间，司马懿曾统帅劲旅，北定辽东，西拒巴蜀，在长年征战过程中，逐渐控制了魏国军事大权。明帝病危，三天之内连发五道诏书将他召到床前，接着他的手，以后事相托。这样，他和已故大将军曹真的儿子曹爽，同受顾命，辅佐 8 岁的小皇帝曹芳。魏国朝廷内部至此便形成了曹氏和司马氏两派政治势力。

起初，曹爽年轻，对司马懿这位德高望重的朝廷老臣还是十分畏惧的，敬重他如同敬重自己的父亲，什么事都问问他的意见，不敢独断专行。自从起用了丁谧、何晏、邓飏、李胜、毕轨等一批被明帝抑制不用的名士，情况开始有了变化。

丁谧是曹操同乡丁斐的儿子。丁斐在曹操当政时官至典军校尉，是曹操亲信的高级参谋。丁谧年轻时交游不广，但读了不少书，为人沉毅，颇有才略。据说有一次与魏国诸王抢借空屋，傲慢无礼，曾被明帝关守监牢，不久因为他父亲的功劳而被赦免释放。明帝在世时，丁谧同曹爽关系就已非常要好；曹爽多次游说明帝要为丁谧请官，没有成功。明帝驾崩之后，曹爽即刻提拔他做了尚书官。

丁谧投桃报李，他怂恿曹爽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以曹氏重权不宜委之于人为理由。设谋剥夺了司马懿的军权，只给了个位望虽高却并无实权的太傅头衔，让他去做小皇帝的老师。接着委任心腹何晏负责选举。毕轨负责京师百官及其附近各

郡的纠察,李胜也做了河南尹,负责一地行政事宜。邓飏与丁谧一样,成了曹爽信任的尚书官。一时朝廷大小政事,全被曹爽及其心腹垄断,司马懿再没有插手余地。

老谋深算的司马懿,眼见曹爽集团的势力日甚一日,就假装把官位让了,称病在家,暗中却布置儿子司马师抓到了统领京师禁卫军的重要兵权。司马师偷偷训练了 3000 敢死士卒,分散京师各个部门,以备急用。

曹爽在独揽朝政、为所欲为的同时,也并没有放弃对司马懿的注意。公元 248 年冬天,河南尹李胜被派往荆州任刺史,曹爽等人便让他以辞别为由,去探听司马懿的动静。

司马懿听说李胜要来,便披头散发倒在床上,装作病重的样子。

李胜信以为真,回去就对曹爽说:“司马公病入膏肓,形神离散,怕是不久于人世了。”曹爽也就以为没有了心腹之患,更加放肆起来。

第二年正月,曹爽陪同小皇帝曹芳去京城南边的高平陵社祭祖,司马懿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政变。司马师把训练的 3000 敢死士卒一下子调集出来,控制了都城洛阳。司马懿亲自屯兵洛水浮桥,占领要道,并发布诏书,声讨曹爽的罪行。

曹爽的妻子刘氏,见司马懿起兵关闭了洛阳城门,赶紧招来曹爽的帐下守督商量对策。守督二话不说,爬上门楼引弓要射司马懿。这时,他感到手肘被人牵住了,回头一望,是同在曹爽帐下的将领孙谦。守督引弓三次,三次都被孙谦牵肘止住。司马懿领兵去了浮桥,走出守督的射程。

大司农桓范，是曹爽同乡。曹爽同他的关系虽说不上多么亲密，但平时特别尊重他。司马懿起兵时，召他做中领军，中领军可是朝廷亲信大臣才有资格担任的，司马懿委以此职，显然是想笼络他。他心有所动，准备应召前往。这时他的儿子出来劝阻了，说是皇帝车驾在外，还不如去投奔皇帝。桓范犹豫了一会，儿子又加催促，他这才直奔城门，打算出城南投曹爽。看门人司蕃恰巧是他以前举荐的，他伪称手有皇帝诏书，让司蕃赶快打开城门，司蕃原想问个究竟，不料桓范对他大加呵斥，说：“你不是我给举荐上来的吗，怎么敢这样待我！”司蕃无可奈何，只好开了城门。桓范拍马而去，不一会儿，便到了高平陵。

曹爽听到消息，心中十分惊慌。桓范劝他带上小皇帝南下许昌自保，他默然无语。这时司马懿又派了曹爽所信任的殿中校尉尹大目捎信说，他们不过是要免掉曹爽的官职。曹爽于是对同来祭陵的群臣说：“我看太傅的意思也不过这样，免了官我仍不失做富家翁。”接着又让小皇帝下了诏书免去他的官，大队人马准备开回洛阳。

曹爽一行，回到家里，司马懿立即派兵包围，曹府四周的门楼上，满布监视士兵。关在家里曹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上楼下楼，下楼上楼，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样围困了几天几夜，家里的米啊菜啊已吃个精光。曹爽为探听司马懿的真实意图，就写了封信派人送出，要求司马懿给他送米送菜。司马懿收到信后，佯装大惊，让来人带回一百斛大米和一些肉脯之类的菜肴。曹爽毕竟年轻，便以为司马懿再不会拿他怎么样啦。

不久司马懿召开公卿朝臣会议，以“大逆不道”之罪，捕杀

了曹爽弟兄及其党羽。桓范原不在其中,后来司蕃到衙门自首,将他供了出来,结果也被处以灭族。

从此以后,曹魏政权实际上已经控制在司马懿的手里。两年之后,司马懿病死,时年 73 岁。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俩相继执政。朝廷内外的重臣、将领曾接二连三进行反抗,但先后都被镇压下去。公元 254 年,22 岁的皇帝曹芳也被废掉,另立了 14 岁的曹髦当傀儡。

司马昭做丞相执政时,专横跋扈,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时时流露出篡权的野心。这时,民间到处流传着:这儿青龙困于井中,那儿黄龙在井中出现。

这时,小皇帝曹髦也年近 20,不甘任人摆布,对司马昭的独断朝政极为不满。他有感于黄龙的传闻,就提笔写了一首《潜龙诗》,借以抒发心中的忧愤。

司马昭很快就知道了曹髦的诗,非常恼怒。不久,他故意逼皇帝封他做晋公,按古制给以最尊崇的礼遇。显然,这是篡夺皇位的试探。

皇帝曹髦眼见司马昭气焰日甚一日,忧愤难平。他请来尚书王经,还有两位大臣王沈和王业,曹髦愤愤地说:“列卿,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可忍,孰不可忍?朕与其坐以待毙,何如早下手与他拚一场!”尚书王经苦劝皇帝三思而行。王沈、王业一声不吭。曹髦从怀中取出已用黄绢写好的诏书,说:“朕意已定,死亦不足畏!”

王沈、王业出来后就去向司马昭告密了。

曹髦亲自率宫中的几百名卫兵以及官奴、童仆,吵吵嚷嚷

要去进攻司马昭。曹髦还未见到司马昭，正碰上皇家禁军的首领中护军贾充带兵而来。贾充是司马昭的部下，战不多时，曹髦就被贾充指使的凶手成济杀死了。

司马昭作贼心虚，为了收买人心，事后出来假惺惺的责备自己尽职尽责。他不忍拿心腹贾充开刀，就把成济作为替罪羊，灭了三族。成济临刑前心怀不平，大骂不休。司马昭原本想借此平息舆论，结果是欲盖弥彰。这一来，他不敢贸然自称皇帝，就又立了曹操的孙子 15 岁的曹奂做皇帝。

这是公元 260 年的事，曹魏政权名存实亡了。

六、魏灭蜀

魏元帝景元四年、蜀汉后主炎兴元年、东吴景帝永安六年（263 年），魏征西将军邓艾和雍州刺史诸葛绪，在受领向蜀汉进击、牵制蜀汉大将军姜维军的诏命后，即积极备战，准备向蜀地进发，进攻沓中地区的蜀军主力姜维部。邓艾和诸葛绪虽同时执行同一作战任务，但互相之间并不相统属。

魏元帝景元四年、蜀汉后主炎兴元年九月一日，邓艾所率之西路军和诸葛绪所统的中路军，共同向沓中地区的姜维部进攻。

邓艾军 3 万余众，自狄道（今甘肃临洮）南进。邓艾军兵分三路，自率主力于中路，并以陇西太守牵弘率 5000 人为前部，从北面进攻沓中；以天水太守王颀率军 1 万直攻沓中姜维营垒；以金城太守杨欣率兵 5000，由洮阳以西，向甘松（今甘肃迭部东南）疾进。

姜维闻知邓艾率军攻沓中，又得知钟会大军已进入汉中，恐阳安关口有失，无心与邓艾军接战，立即率部东走，向汉中机动。途中与邓艾军大战于强川口（今甘肃宕昌西），姜维军战败，继续向汉中撤退。

此时魏雍州刺史诸葛绪军，已自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南进，攻取了武街（今甘肃成县西北），旋即率军至阴平桥头（今甘肃文县东南），以断绝姜维军之归路。姜维东退途中，得知了诸葛绪军已占领了阴平桥头，为将诸葛绪军从此处调开，便向北出孔函谷（今甘肃武都西南），迂回诸葛绪军的侧背。诸葛绪怕蜀军切断其后路，率军后撤 30 里回救后继部队。于是，姜维急速回军，顺利通过桥头隘路，当诸葛绪军发觉姜维又回军桥头时，再率军而返，姜维军已过桥头一日了。

姜维通过桥头之后，退向白水（今四川广元西北），途中与廖化、张翼、董厥军相遇，得知阳安关已经失守，遂率军退往剑阁，留廖化军一部防守桥头，以阻止邓艾、诸葛绪军南进。

魏镇西将军钟会所率 12 万大军，顺利攻占汉中后，又夺取了入蜀门户阳安关口，钟会遂挥军南下，直指剑阁（今四川剑阁东北）险关，大有灭蜀之势。

剑阁位于嘉陵江和龙斤山之间，有大小剑山相连，《读史方与纪要》称其为“凭高据险，界山为门”是“蜀境之巨防”，系由汉中入蜀的必经关隘。由于它处于丛山环绕、千仞壁立之中，有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魏将邓艾、诸葛绪率军进攻沓中，牵制蜀军主力的企图被姜维识破后，姜维即率主力东退，巧妙地骗过了诸葛绪，顺利地通过了东退的唯一通道阴平桥头。姜维正率军急走之际，得知阳安关口已为魏军占领，

深恐剑阁再失，遂率领途中相遇的蜀将廖化、张翼、董厥等军，一齐退向剑阁，占据了剑阁的险要地势，准备抗击钟会的主力大军。

钟会军至剑阁，随即率军向姜维守军进攻，姜维军凭险抵抗，钟会军屡攻不下，双方交战达一月之久。此时，魏军因粮道运输艰难，钟会在军事进攻受挫，粮食消耗将尽的困难局面下，转而通过威吓、劝诱欲迫使姜维投降，被姜维拒绝。钟会于是再督军向姜维军猛攻，仍然无法攻克，双方形成对峙。钟会见军粮日缺，再继续作战也难以奏效，遂欲撤军退走。

魏元帝景元四年、蜀汉炎兴元年、东吴景帝六年十月，邓艾向司马昭提出不要退兵、迂回剑阁、直趋成都的建议被采纳后，旋即率军到达阴平（今甘肃文县）。

阴平因地处摩天岭之北，故称阴平，阴平有一条南下蜀地的唯一羊肠小道，经过江油（今四川江油北 70 公里）、涪县（今四川绵阳）可达于成都。但自阴平至涪县必需翻越摩天岭，穿过岷山，山高谷深，极其艰险，通行十分困难。

邓艾军于十月中旬由阴平出发，亲率精兵万人在前面开路，以其余 2 万兵马运送粮食跟进。邓艾军沿白水河谷东进，然后开始翻越摩天岭，行无人之地 700 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运粮将匮，濒于危殆，邓艾军至马阁山（今四川平武东南），道路断绝，无法通行，邓艾使用毡子裹着身体从山上滚下，士卒都抓着树枝藤条，沿着悬崖陡壁，一个接一个地前进。这样，越过险山之后，进至江油，蜀守将蒋舒、马邈投降。魏军获得了部分军资粮食的补给，邓艾率军立即从江油经德阳亭向涪县进发。

此时，蜀汉后主刘禅才如梦初醒，已知局势危急，派使者急至东吴求救。东吴派其大将军丁奉，率领大军进袭魏之寿春（今安徽寿县），以将军丁封、孙异等率军进击沔中（在今湖北与陕西安康交界地区）以救蜀。但吴军可能出动规模不大，且为时已晚，并未对魏在蜀地的攻势有任何影响。

江油距成都只剩400里之遥，骑兵部队不过两日的行程。江油的失守，对蜀汉更加不利，刘禅于是派军师将军诸葛瞻，率军迎击邓艾军。诸葛瞻行至涪县后，即止军不前。部将尚书郎黄崇再三建议应急速前进，占据险要地势，坚决阻止敌人进入平原地区。诸葛瞻犹豫不决，黄崇甚至痛哭流涕的苦劝，诸葛瞻就是不从。邓艾遂得以长驱而进，击破诸葛瞻的前军，诸葛瞻被迫退守绵竹（今四川德阳）。邓艾致书诸葛瞻诱降说：“若降者，必表琅玕王。”诸葛瞻大怒，斩了邓艾来使，严阵以待邓艾军。

邓艾诱降诸葛瞻不成，便派其子惠唐亭侯邓忠攻击蜀军的右翼，以司马师纂率军攻击诸葛瞻军的左翼，二人均被诸葛瞻军击败，退兵回营，向邓艾报告说，敌军不可战胜！邓艾军翻山谷、千里远袭，此时已是兵少粮缺，利在速战速决。故邓艾大怒，斥责他们说：“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要将邓忠、师纂斩首。二人急忙率部返回战场，与蜀军力战，终于大破蜀军，斩杀了诸葛瞻。

此时诸葛瞻之子诸葛尚怒吼道：“我父子受朝廷大恩，朝中不早把黄皓杀死，以致使国家灭亡，百姓遭殃，我等生还有何用处！”遂快马急驰阵前，冲向敌人，与尚书张遵、羽林督李球、黄崇等各杀敌众多，英勇奋战而死。魏军战胜了诸葛瞻军

后,随即推进至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距成都已不足 200 里。

邓艾进占绵竹,已全部进入成都平原,进军之神速,完全出乎蜀国意料。举国呈现一片混乱,百姓纷纷逃入山泽,各地城池已无法防守,及邓艾兵至雒城(今四川新都东北),成都更乱为一团。此时后主刘禅召集群臣廷议,有的认为蜀与东吴互为盟邦,可以投奔东吴;有的主张南中地区有 7 郡之大,且形势险要,可以防守,应退向南中。光禄大夫谯周说:自古以来,没有寄生于其他国家的天子,如去吴国,也只能做吴国的臣民。”他认为,吴国迟早要被魏国所灭,同样都是称臣,向小国称臣,就不如向大国称臣,也免受二次羞辱。而要南逃,也应早做准备。现大敌已临近,失败在即,一些奸臣之心,令人莫测,恐怕南逃的第一天,就会有人发动叛乱,那里能到达南方呢!众人颇觉谯周分析有理。但刘禅仍想退向南方,谯周再次苦劝,刘禅遂决定派侍中张绍等,捧着自己的玺绶去向邓艾投降。

姜维军正于剑阁固守,与钟会的 10 多万大军对峙,得知绵竹失守,恐魏军迂回自己的侧背,同时也风闻蜀主欲退走南中,于是,便率军东退巴中(今四川巴中)。钟会遂乘机而进,大军平安入涪。同时派出将军胡烈、田续、庞会等率部追击姜维军,姜维军再急走郫县,向成都靠拢。正在此时,刘禅命令姜维等投降的诏令已到,姜维接到诏令,便率廖化、张翼、董厥诸将至涪县向钟会投降。汉军将士听到投降命令之后,气愤已极,拔刀砍石,但此时已无法挽回颓势,封建的忠君思想,使他们不敢再继续抵抗,只好屈辱地放下武器。至此,雄踞一方,立国

43 年的蜀汉政权，便亡于后主刘禅之手。

七、西晋的建立

264 年(咸熙元年)5 月，司马昭便公开称晋王。265 年 5 月，公开宣布以晋王之名行皇帝之实。司马氏以晋代魏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正如当时人所说：“司马懿父子自掌握曹魏政权以来，此时“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计立矣。”

但是，当司马昭戴上皇帝桂冠而没有登上皇帝宝座时，就病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他完成以晋代魏的帝业，建立了晋王朝。

司马炎，字安世，“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265 年 8 月，他继父为晋王，积极筹备称帝。11 月，他即仿效魏文帝逼汉献帝“禅让”的故事，叫魏元帝曹奂“告禅”。曹奂只得拱手把皇帝的宝座“禅让”给他。12 月的一个良辰吉日，司马炎率领文武百官及少数民族首领数万人，在洛阳南郊设坛祭天，举行隆重的“受禅”典礼和建立晋朝的“国家”。礼毕，在洛阳宫的太极前殿前即位，史称晋武帝。与此同时，追尊他的祖父司马懿为宣帝，伯父司马师为景帝，父亲司马昭为文帝，建年号为“泰始”，表示晋王朝的开始。

司马炎建立晋朝后，都城仍在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后来建都于建康(今南京市)的东晋人往往称旧都洛阳为“西台”或“西朝”，因此以洛阳为都的晋朝，史称西晋。

八、晋灭吴

占据长江上游，顺流而下，直捣建业，历来是晋国的战略主张。因而，晋对争夺长江上游十分重视，晋武帝派出他最优秀的战将羊祜假节都督荆州诸军事，以与吴名将陆抗相峙；以另一得力战将王浚为益州刺史，在蜀地训练水军数万，大造舟船，为顺江而下伐吴，积极创造条件。

羊祜在荆州地区的备战相当充分，他推行屯兵政策，屯田积谷，使“军无百日之粮”的襄阳，到伐吴之前积谷已足够 10 年之需。他积极训练士卒、制造兵器，不断增加部队的作战威力。他推行的分化瓦解吴人的政策，收到了巨大的心理效果。羊祜死后，晋武帝又派其名臣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军务，继续加紧准备攻吴。

东吴在蜀汉灭亡后，已处于唇亡齿寒之险境。吴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早已看到晋国下一步的作战企图在于吞并吴国，只是由于受长江天险的阻隔，加之力量暂时不够，正在休养待机。因而，这些人士深深预感到局势的危险性，不断向吴主提出休养生息、清明政治、加强经济实力的建议，请求孙皓增强长江上游的防御力量，以遏止晋军顺流而进的企图。

孙皓这个凶残昏聩之君，听不进忠臣良将的直谏，对晋迫在眉睫的大举进攻威胁，置若罔闻，既不增兵防守各地要冲，也不加强应有的戒备，为晋军的胜利进击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晋军灭吴之战，总的战略策划是出动 6 路大军，东西南三个方向同时进击。

西晋以夺占长江下游做为灭亡东吴的主要作战方向，故在下游地区出 10 多万大军直逼建业。以安东将军王浑率扬州诸军 10 多万之众，自寿春（今安徽寿县）向江西（今安徽和县）出横江渡口，占据长江之北岸地区；以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仙率领徐州诸军数万，自下邳（今江苏睢宁北）向涂中（今安徽滁州）进击。晋军这一兵临建业，占据长江北岸的作战策划，如能顺利实现，则其第一步便沿长江对建业构成了半环形包围，待上游诸军乘胜东下后，便一举会师秣陵，夺占建业。

在长江上中游出三路大军，从西面和北面水陆并进，首先占据西陵、江陵、夏口等地，然后乘胜顺流东下，直捣建业。

晋军以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率荆州诸军，由襄阳南下，直取江陵；以豫州刺史加建威将军王戎率豫州诸军自项城（今河南沈丘）穿越今大别山南进，攻取吴江夏、武昌两郡；以龙骧将军王浚、巴东监军唐彬率军 7 万，水陆并进，顺江东下沿江攻取西陵、江陵，并以陆路袭取武陵（今湖南常德），会师于巴陵（今湖南岳阳）。平南将军胡奋兵出夏口后，归属龙骧将军王浚指挥。

晋军这一作战策划显然是相当周密的，它既适应了晋军兵力不占绝对优势的具体情况，又便于对吴军各个击破。

晋武帝太康元年、东吴天纪四年正月，安东将军王浑所统率的 10 多万大军向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方向进军，派出参军陈慎等率部分兵力攻击寻阳（今湖北武穴东北）；派殄吴将军李纯率军向高望城（今江苏江浦西南）进攻吴军俞恭部。正月二十五日，李纯占领了高望城，击破俞恭军，推进至横江以东，夺占了渡江的有利战场。与此同时，参军陈慎军攻取了阳

濂乡，大败吴牙门将孔忠等。吴厉武将军陈代、平虏将军朱明等率部众降于晋军。

二月，吴主孙皓得知晋王浑率大军南下，即命丞相张悌统率丹阳（今江苏南京）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率兵3万，渡江迎战，以阻止晋军渡江。

三月初，张悌军渡江后，于杨荷（今安徽和县）正遇王浑部将城阳都尉张乔率7000兵马赶到，张悌军随即将张乔军包围，张乔兵微势弱，便闭寨请降。副军师诸葛靓认为，张乔是以假投降行缓兵之计，拖延时日，等待后援，我应急速进兵予以歼灭。但张悌却主张放过他们，因为强敌在前，不可因小敌而出战。于是接受张乔投降后，率兵继续前进，随即与王浑主力部队之司马孙畴和扬州刺史周浚军列阵相对。吴将孙莹首先率领5000精锐向晋军攻击，三次冲击均未奏效，被晋军斩首二将，不得不退兵。晋军则乘吴军退兵混乱之机，以将军薛胜、蒋班率军追杀，吴军大败。此时，伪降之张乔军又从背后杀来，吴军溃败而逃。诸葛靓见大势已去，收集败兵数百逃回江南。张悌不肯逃走，与沈莹、孙震力战而死，吴军3万多人，被斩近8000人，余皆逃散，晋军遂胜利推进至江边。此时，扬州别驾何惔向扬州刺史周浚建议说，张悌率东吴3万精兵，被我歼灭，吴国上下震惊，现龙骧将军王浑已攻下武昌，乘胜东下，所向皆克，吴已呈土崩瓦解之势，我应速挥军渡江，直捣建业，大军突然而至，定能不战而逼降东吴。但王浑听到这一建议后则认为晋帝只命他出兵江北，以抗吴军，如果渡过长江，就是违背君命，即使作战获胜，也难以获赏；但若失败，必获重罪。于是，王浑坚持按原诏令，就地等待王浚军的到达，然后再统一

节制王浚等军渡江作战。何恇再次向王浑建议说，将军身为上将，当见机而进，岂有事事等待诏命之理。王浑仍不听从。

琅邪王司马仙所率的一路大军，自正月出兵以来，迅速进至涂中后，令琅邪相刘弘率兵进抵长江，与建业隔江相峙，以牵制吴军；同时派长史王恒率诸军渡过长法，直攻建业。王恒军进展顺利，一一击破吴沿江守军，歼灭吴军五六万人，俘获吴督蔡机。

王浚军在长江上中游获胜之后，便挥军顺流而下，三月十四日到达牛渚。当进至距建业西南 50 里时，吴主孙皓才派遣游击将军张象率水军 1 万前往迎击，但吴军此时已成惊弓之鸟，张象的部队一望见晋军的旌旗便不战而降。王浚的兵甲布满长江，旌旗映亮天空，声势十分盛大，继续向前推进。

原先吴主派往交趾征讨郭马的将军陶浚，行至武昌时，听到晋军大举进攻的消息，便停止去交趾，返回了建业，此时，吴主孙皓便授其符节，命其率军 2 万，迎击晋军。结果，2 万军队出兵前夜便逃散一空。

此时，王浑、王浚和司马仙等各路大军已逼近吴国京师建业长江的北岸，吴国司徒何值、建威将军孙宴等交出印信符节，前往王浑军投降。吴主孙皓见自己内部已分崩离析，便采用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等人的计策，分别派遣使者送信给王浑、王浚、司马仙，请求降服，企图挑唆三人互相争功，引起晋军内部分裂。使者先把印玺送给司马仙。王浚此时正挥军直进，三月十五日行至三山（今江苏南京西南）时，王浑派使者命其暂停进军，王浚不理，借口风太大，无法停船为由，扯起风帆直冲建业。当日，王浚统率水陆 8 万之众，方舟百里，进入建

业。吴主孙皓反绑双手、拉着棺木，前往王浚军门投降。至此，晋军连克东吴 4 州、43 郡、降服吴军 23 万，东吴政权宣告灭亡，三国长期分裂的局面也随之结束，晋重新统一了中国。

第二章

西晋的短期统一

第一节 太康盛世

西晋的统一，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 90 多年的三国分立。消除了相互混战的“战国之苦”，出现了四海平一、天下康宁的局面。晋武帝司马炎在平吴战争胜利之后就把年号改为“太康”，表示晋王朝进入太康盛世。当时流行着一种名为《晋世宁》的歌舞，人们手捧杯盘载歌载舞，歌唱道：“晋世宁，舞杯盘。”歌唱所谓“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的国泰民安，歌唱“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的经济繁荣。

太康之世的所谓“牛马被野，余粮委亩”景象，是司马氏集团重视农业生产、特别是劳动人民安居乐业的结果。在司马懿辅助魏明帝时期，就相当注意农业生产。当时的大司农司马芝认为“国家之要，惟在谷帛”，主张“崇本抑末，务农重谷”，即实

行重农抑商政策，专以农桑为务。司马懿十分注意开河渠，尽地利，“广田积谷”。司马昭时期，针对曹魏皇帝的奢侈之弊，注意减除农民的徭役，“不夺农时，百姓大悦。”司马炎以晋代魏以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继续坚持和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设立“籍田”，实行古代帝王亲耕籍田制度，亲自在洛水之北举行耕籍田的仪式。与此同时，下令郡国计吏、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号令“四海之内，弃末反本，竞农务功”。禁止官吏贪污、烦扰百姓。对官吏实行黜赏办法，劝课农桑有显著政绩者予以奖赏。如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而熟田常课顷亩不减”，司马炎赐给他谷物千斛，并“布告天下”予以表扬。对于缺乏耕牛的灾民，西晋政府还贷给官牛。如 278 年（咸宁四年）7 月，司、豫等 7 州大水，司马炎同意把官牛 4.5 万头分给灾民耕田。

除了对郡县农民劝农务功外，西晋政府也曾利用军士垦田，利用官奴婢屯田。269 年（泰始五年），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时，曾利用士卒垦田 800 余顷，“大获其利”，军中“有十年之积”。275 年（咸宁元年），西晋政府用邺地的“奚官奴婢”代替田兵种稻，采用军屯方法，各 50 人为一屯。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西晋政府也注意开河渠通漕运，溉田地。如开凿陕南山，决河东注洛水，便于漕运。也曾修筑新渠、富寿渠、游陂渠，溉田 1500 顷。特别是平吴之后，镇南大将军杜预在荆州地区引滢水、涓水溉田 1 万多顷，并且开凿杨口，起自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陵、桂阳之漕。南方人民因此盛赞杜预的功绩，称他为“杜父”、“杜翁”，歌唱“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

由于西晋政府采取了重农的政策和措施,由于农民能够安居乐业,发展生产,所以当时的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有了新的发展。据说西晋统治初期,“民和俗静,家给人足”,太康年间还流传“天下无穷人”的谚语。这种所谓“天下无穷人”的说法,虽然不符合当时天下多数穷人的实际,但也反映了当时农业经济的一定发展和农民生活的一定改善。这种现象,在各地发现的晋墓随葬品中,也可以间接地看出。

在东起今甘肃永昌,经酒泉、嘉峪关、敦煌,直至新疆吐鲁番等地的魏晋之际墓葬中,都曾发现描绘当时农牧业生产和地主生活的壁画。这些壁画中,有放牧马、牛、羊和牛的育种等画面,有耕种、耕耨的画面,也有采桑的画面。特别是嘉峪关市郊魏晋墓的壁画中,有从播种到扬场等一整套农业生产活动的画面。其中有的画面是一人驾一牛或两牛耕田,有的是一人驾两牛耙地。也有的是一个人坐在耨上执鞭赶一条牛耨地,这种耕耨画面,反映了当时农民在耕作方面已经掌握了耕——耙——耨这套保墒防旱的先进耕作技术。这套技术,是黄河流域以及中国古代北方旱作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至于那些放牧画面,则是当时畜牧业发展的写照,表现出西北地区马、牛、羊成群的景象。新疆罗布淖尔等地曾出土过一些带有晋“泰始”、“太康”年号的木简。其中有一条晋代木简记载当时用“犁与牛”试行耕种。拜城克孜尔石窟的一幅晋代壁画。有二牛抬扛共拉一犁耕田的图象。也反映了当时新疆地区农业发展的景况。

在南方各地已经发现的西晋墓葬中,往往随葬陶、石制的猪、狗、鸡等以及饲养牛、羊、猪、狗、鸡等的圈栏。浙江常山县

何家发现一座有“太康八年八月造”砖铭的晋墓，随葬有青瓷猪舍、狗圈。猪舍面阔两间，进深两间，屋面是硬山顶。内塑猪一头，舍前左侧塑一妇女喂猪。狗圈为盘形，内塑一母狗侧卧，一小狗张嘴站在母狗旁。这反映了太康年间南方农村饲养家畜的情景。江苏吴县狮子山发现的带有“元康”（晋惠帝年号）纪年砖铭的晋墓，随葬有青瓷牛厩、猪栏、狗窝、鸡窝等，这反映了西晋中期以后南方农村饲养家畜家禽的情形。而最能说明西晋社会安定、农业和家畜家禽饲养业发展情况的，则是广西、广东境内发现的晋墓材料。

西晋中晚期，中原由于“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太康年间的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局面受到破坏。但在南方社会仍然安定，经济继续发展。如广州市郊晋墓的墓砖上，常见这样的砖铭：“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说明当时的南方社会平康，经济丰盛。广西苍梧的一座晋墓，随葬有驾牛犁田和牛车、牛圈、禽舍、谷仓等陶瓷模型。广东连县带有“永嘉”四年或六年砖铭的晋墓中，也随葬有黑色陶质犁田耙田模型一方，陶质屋、井、盂、牛、马、羊、鸡、鸭等陶器多件。这方犁田耙田模型呈长方形，长 19、宽 16.5 厘米，四角各有一漏斗状设施，中间纵贯一条田埂把田地分成两块，一块地上有一人使牛犁田，另一块地上有一人使牛耕田。四周又有田埂。这是当时农民耕种水田的形象。从整个模型看，当时的水田周围筑有拦水的田埂，四角修有排水的漏斗状设施，便于把水田中的水保持在一定的深度。耕作时，使用一牛挽犁犁田和一牛拉耙耙田。耙的模型是下有六根长齿，上有横耙。这种耙当是耖耙，近代简称为“耖”。这种犁

田耙田形象,说明当时的南方水田耕作已经形成了耕——耙——耖这一套土壤耕作技术,是当时熟化土壤的先进农业技术,标志着古代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而这一犁田耙田模型和陶制马、牛、羊、鸡、鸭等,就是晋代南方小农经济发展、六畜兴旺的一个缩影。

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西晋的金属冶铸业、陶瓷业等各种手工业也相继发展。首先是金属冶铸业的铁、铜、金、银等金属生产的工艺水平显著提高。在冶铁业方面,汉魏时期就已发明的一种炼钢方法——炒钢,西晋时普遍用来炼制百炼钢刀。《晋书》中记有这种“百炼钢刀”,说这种钢刀“名冠神都”,“威服九区”。西晋张华写的《七命》中,还说“楚之阳剑”的炼制过程是“乃锻乃铄,万辟千灌”。所谓“辟”即锻,“灌”当即灌注液体生铁。也就是把生铁和熟铁杂和起来炼钢,这种炼钢方法,古称“灌钢”或“团钢”。这种方法,是当时提高炼钢效率的一种新方法,南北朝以后进一步发展。

西晋的青铜冶铸业也相当发达,铜镜、带钩、镞斗等铜器的铸造工艺水平很高。当时的铸镜工匠,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汉魏以来的传统工艺,铸造出花纹精细、明亮美好的铜镜。北京市顺义县大营村发掘的带有西晋“泰始七年”砖铭的西晋墓中,江苏南京西岗、仪征县和江西新干县等地的西晋墓中,出土了当时的铜镜。各地出土的西晋铜镜,都相当精美。镜上的纹饰,有鸟、兽、鱼、规矩、柿蒂、仙人等等,图案繁缛,镂刻精细。南京出土的铜镜,有的镜背饰有青龙、白虎、东王公、西王母、鱼及其他禽兽等图案。江西出土的铜镜,既有朱雀、青龙、白虎等图案,又有柿蒂、缠枝花草、凤鸟和变体动物纹饰。北京

出土的铜镜,有的铸有“青同(铜)之竟(镜)明且好”的铭文。河南淇县出土的神兽镜,有“明知日月”等铭文。这反映了当时的铜镜质量“明且好”。南京出土的一件鎏金铜带钩,铸有兽头、神兽食鱼、飞鸟等图象,造型别致,构思新奇。江西大余县新城乡还出土了一件西晋时期龙首、凤尾、狮膝、虎足形制的青铜钺斗。这些精致的铜带钩、铜钺斗,代表了西晋时期青铜冶铸工艺的高水平。

西晋各地的金银器铸造工艺水平也很高。江苏南京西岗的西晋早期墓中,出土有金片、金戒指和金银发钗等金银饰。宜兴的周处墓中,出土了金镯、金花篮。河南洛阳西晋“元康”年间的徐美人墓中,出土了桃形金花。甘肃敦煌出土了金饰。广州西郊出土了金小狗和金银戒指、手镯等。北京顺义出土了西晋初年的金手镯、戒指和银手镯、发钗等。北京八宝山西晋晚期幽州刺史王浚妻华芳墓中,出土了极为精致的嵌蓝宝石银铃。铃体小巧玲珑,直径仅有 2.6 厘米的球体上部用掐丝工艺做成 8 个乐人形象,每个乐人的下面又悬挂一个小铃;下部装饰着连弧纹。乐人之间和悬挂的 8 个小铃上面,都点缀镶嵌红蓝宝石。8 个乐人中,两人捧箫,两人吹笛,两人持管或喇叭,两人捶击圆形小鼓,情态各异。铃的钮座是一个伏牛形,巨鼻、长角,尾下垂复又上卷,形象生动。它的工艺,代表了西晋金银器制造的高超水平。

西晋时北方鲜卑人的金银饰工艺的水平也很高。辽宁北票县的慕容鲜卑人的墓中,出土了数量很多的精美金饰,如有指环、镯、钗、铃、珠和金花冠饰、透雕或月牙状金饰等。其中一件较大的长方形透雕云纹金冠饰上,树着 16 枝金花枝,上面

悬缀着金环和金叶，稍加摇动，环、叶就摇摆起来。这可能是慕容鲜卑上层人物喜戴的“步摇冠”上插饰的金步摇。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的凉城县境，出土了拓跋鲜卑人的金饰。有兽纹的金饰牌、镶嵌宝石的兽形金饰、兽首金戒指、金耳坠等。一件四兽形金饰的背面，刻有“猗缶金”三字。“猗缶”即西晋中后期鲜卑首领拓跋猗缶。这批金饰，代表了西晋北方少数民族金银器的工艺水平和艺术特色。

在西晋的手工业中，陶瓷业特别是青瓷业最为发达。当时江南地区烧制青瓷的瓷窑数量和规模，远远超过东吴时期。以浙江上虞县为例。这里发现的西晋瓷窑窑址有 60 多处，比东吴时期的 30 多处增加了一倍。因此，青瓷器的产量、品种都比东吴时期大为增加，青瓷的质量也有提高。

青瓷，就是釉料含有铁的元素、烧成青绿釉色之类的瓷器。西晋浙江境内的青瓷釉色，由于各地瓷土成分的差别，形成了越窑、瓯窑、婺窑等各具特色的三大窑系。所谓越窑，即浙江北部上虞、余姚、绍兴等古代越国中心地带的窑场。唐代称这一带为越州，把这里的瓷窑称为越窑。唐代以前，这里烧制的青瓷，瓷胎一般呈灰色，釉呈青灰色，青中带灰，色调沉静。唐代的“千峰翠色”名瓷，就是在这种青灰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人有诗称誉说：“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所谓瓯窑，即浙江南部瓯江地区温州一带的瓷窑。这里所产的青瓷，一般胎色较白，釉作淡青色或青白色。西晋人称这种釉色的青瓷叫“缥瓷”。潘岳的《笙赋》中，有“倾缥瓷以酌酺（酒）”的赋辞，“缥瓷”即青白色或淡青色的瓷。所谓婺窑，即浙江中部金华地区的婺州窑。这里的青瓷产品，一般是在红色瓷

胎上用白瓷土作化妆土，釉层的外观显得饱满柔和。这三大窑系的青瓷釉色，代表了西晋青瓷的主要特色。除浙江外，江苏宜兴、福建福州等地也有生产青瓷的窑场，烧制带有地方特色的青瓷。

西晋青瓷的造型、装饰，继承和发展了东吴的青瓷工艺，取得了陶瓷装饰艺术的新成就。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这个时期的烧瓷工匠已经发明和熟练地掌握了烧制釉下彩青瓷的先进工艺，烧制出精美的釉下彩瓷品。江苏南京市南郊雨花台长岗村的一座东吴末期至西晋初期墓中，出土了一件青瓷釉下彩带盖盘口壶。这壶的瓷釉青黄，瓷胎灰白，釉下的瓷胎上通体有褐黑色彩绘，分组绘成仙人、仙草、神禽、神兽等富有神秘色彩的图案。器体造型端庄，装饰多彩，器盖上贴塑神鸟，器体的颈部、肩部、腹部也分组贴塑神鸟、铺首、佛像等装饰。在瓷器发展史上，这是一件划时代意义的青瓷珍品。

西晋青瓷的另一突出成就，是把东吴时期已经兴盛起来的烧制各种鸟兽形青瓷器和青瓷谷罐工艺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当时大量生产的鸟兽形瓷器，都造型优美，形象生动逼真，工艺水平提高。典型的青瓷器，有神兽尊、狮形水注、鸡首壶、鹰形壶以及虎、熊、羊、犀牛等形状的器皿。这些青瓷器，是当时人们主要是官僚、地主们的生活用品，也是他们用于随葬的随葬品。而堆塑人物、佛像、禽兽以及亭台楼阁等装饰的青瓷谷仓罐，则是官僚地主们用作随葬的明器。它是官僚地主们死后仍然过着豪富生活的象征器物，造型最为复杂，装饰最为富丽，工艺水平也最高。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兴

盛。西晋初期,为了务农积谷,曾经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禁止游食商贩。西晋政府贱视商人和商业,在城市中,规定市侩都戴头巾,巾上写明姓名及所卖物品,脚上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但是,由于商品交换、买卖是不可缺少的,必然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特别是西晋的官僚地主因为经商有利可图,往往兼营商业牟取暴利。如官僚石崇在任荆州刺史时,曾派人抢劫“远使商客”的钱财,并派人航海经商牟利,“致富不赀”。从西晋初期起,东西南北各地的商品买卖即兴盛起来。西方的“胡商”,常常成百人结队到晋地以至都城洛阳来经商。长江是当时“商旅”的水路。陆上的商旅来往频繁。北方的商贩,也常到洛阳来。如上党武乡(今山西榆林北)的羯人石勒等,少年时就曾经“随邑人行贩洛阳”。

商品买卖的兴旺,必然出现货币流通的活跃。史载曹魏明帝时期“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西晋时期一直沿用曹魏以来的五铢钱等钱币。北京顺义县西晋初期的墓中,曾出土铜质五铢、货泉钱 170 余枚。南京卫岗西晋初期墓中,也曾出土五铢钱两串 150 余枚。其他地方,也有出土。这些钱币在西晋社会中充分发挥了它的流通手段和积累手段的作用,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成为人们崇拜的“神宝”。西晋元康年间(291—299 年),南阳人鲁褒为此写了一篇名文《钱神论》,对五铢、货泉这类钱币的职能作了生动的描述:“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折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有了钱,就有了一切财物。钱在商品经济中

起着支配人们的巨大作用。“钱无耳，能使鬼”，成了西晋社会的流行谚语。

第二节 政治腐化和奢侈之风的泛滥

西晋王朝建立了，人民渴望着新的统一能带来新的社会繁荣与生活的和平安定。谁曾料到，这个王朝是依靠世家豪族的支持，通过宫廷政变建立起来的，所以，它一开始宣布的政令就是维护世家豪族的特权，给予人民的是灾难与重赋。它代表着一个正在腐朽糜烂着的统治阶级。

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就是这个阶级的总代表，他是个穷奢极欲的人。当时，全国总人口大约 1600 万，而他在后宫中养的后妃宫女就有近 1 万名。佳丽美人多得使他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他就每天乘着羊拉的辇车，任那畜牲信步走去，拉到哪里，就在哪里宴饮和寝宿。争宠的后妃就把新鲜的竹叶放在自己的门前，沿途洒上盐水，想方设法企望着拉车驯羊的光顾。即使这样，皇帝仍不满足，下令在全国选妃，官吏借机敲诈，直弄得到处鸡犬不宁。

皇帝尚淫奢，臣僚争相效尤，奢靡之风日甚，整个统治阶级沉浸在金迷纸醉的生活中。

丞相何曾“日食万钱”，他还抱怨在那满桌珍馐中“没有可以下筷子的地方”。他儿子何劭，“一日之供，以钱两万”，每餐

都要穷尽四方的奇珍异味。何氏父子的奢侈是有名的，可是晋武帝的女婿王济则更胜一筹。

一次，晋武帝幸驾王济府上，他家身穿绫罗锦绣的上百名婢女手托罕见的琉璃盘盏，穿梭般地送上一道又一道的山珍海味。盛宴间，有一蒸豕，即整个儿蒸的小猪。晋武帝一吃，格外鲜美，不同常味。他奇怪地问这豕怎么别有风味，才知道是用人乳喂养的。

王济的奢侈令人惊异，但还比不上石崇和王恺。

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堪称西晋世家豪门腐朽风貌的缩影。

王恺为显示豪富，以麦糖洗锅；石崇为与之匹敌，就用蜡烛当柴烧饭。王恺为压倒石崇，用紫色丝布做了40里长的步障；石崇自不示弱，就用比丝布更为贵重的织锦做了50里长的步障。石崇以香椒为泥，涂于室壁；王恺则用赤石脂泥墙。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石、王斗富，风闻京都，人多以为王不如石。皇帝知道了，为助舅舅王恺胜过石崇，特赐他一株2尺多高的珊瑚树，枝条多姿，世所罕见。王恺得意地拿出向石崇炫耀。石崇不屑一顾，随后拿起铁如意，一下把那奇宝打得粉碎。王恺十分惋惜，正欲发作，只听石崇从容地说：“不用可惜，我赔还就是了。”石崇让奴婢把自家中收藏的珊瑚全搬了来，三四尺高的就有六七株，光彩耀目，株株绝俗。石崇请王恺任意挑选。王恺目瞪口呆，怅然若失，自愧不如，只好服输。

这些豪门世家何以如此富有呢？因其世代都是大官僚和大地主，长期搜刮民脂民膏。世家豪族萌生于东汉，形成于魏

晋,是地主阶级中门望高贵、世代相承的特殊阶层。他们在政治上,累世做大官,门第高人一等;在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人手,并享有免纳赋役的特权;在军事上,他们豢养了大批部曲,在地方上称王称霸。而且,这些世家中都蓄养“苍头”、“家僮”,亦称“奴婢”,其地位相当于奴隶或半奴隶。石崇家就蓄养“苍头八百余人”。不难理解,这些豪族家的崇楼峻阁,是以农民的血汗作泥浆,以奴隶的白骨作砖石累砌起来的。石崇做荆州刺史时,公然劫掠远使客商以致暴富。

王恺一次宴客,命伎女吹笛助兴。乐伎演奏时丢忘了一节,被王恺听出,立即拉出去打死了。

石崇请客喝酒,让美女劝饮。客人如不尽饮,就杀劝酒的美女。一次,有个客人执拗不喝,美女竟接连被杀死 3 人。

早在西汉末年,权臣王莽的儿子打死一名奴婢,还抵偿了性命。东汉初年,朝廷就曾 6 次下令解放奴婢。并明令保护奴婢的人身权利,杀伤奴婢的要处以刑罚。可是,西晋王朝的世家豪门却视奴婢的性命如草芥,恣意杀害而不受制裁。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它反映着这个历史时期阶级关系的特点。

西晋豪族的腐朽,不但表现在王公大臣物质生活的挥霍奢侈上,也鲜明地表现在那群纨绔子弟的精神空虚上。西晋推行九品中正法,根据士人的品第来选官。而品第主要是依据门望来划分的,负责“计资产品”的大小中正官,又都由世家豪族把持。这样,朝中职闲位尊的高官,世代相袭,由豪门子弟垄断,他们不用读书努力,便可平流进取,坐至卿相。于是,王孙公子们,手执拂尘,游手好闲,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在这些腐朽的公子哥儿们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晋武帝的

儿子司马衷了。他在宫帟中长大,不懂世事。当他听说天下饥荒,百姓饿死之时,竟奇怪地问:“那他们为什么不去喝肉粥呢!”

从这一群脑满肠肥、精神空虚,形同行尸走肉的豪门子弟的身上,就可以清楚地预见到统治阶级的末日即将到来。

第三节 八王之乱

在西晋的第二个皇帝晋惠帝司马衷统治年间(290—306年),封建王朝中的后党与后党之间、后党和司马氏宗室之间、司马氏宗室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错综复杂,尖锐激烈,发生了许多次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和战争祸乱。先后参与或发动这些战乱的司马氏宗室有8个诸侯王,即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馥,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史称“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的爆发,根源于晋武帝司马炎立白痴儿子司马衷为太子,宠信杨氏、贾氏后党,让司马氏诸王和后党共同辅政。

晋武帝的次子司马衷,从小就是一个“昏愚”、“愚劣”的白痴,9岁时就被立为皇太子。当时不少朝臣认为将来这个痴太子当皇帝是不行的,婉言劝说晋武帝应废掉他。侍中和峤每与晋武帝谈及晋王朝的政权时,常以“储君为忧”,有一次婉言对晋武帝说:“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怕干不了陛下

家事。”晋武帝不予理睬，默然不答。太子少傅卫瓘也认为太子“不能亲政事”，想劝晋武帝废太子，但不敢直言。有一次晋武帝会宴群臣，卫瓘假装酒醉，跑到晋武帝床前，想说出建议废太子的话又不敢说出，只得用手抚摸床说：“此座可惜！”意思是说这个皇帝座位传给司马衷太可惜。晋武帝虽然领会他的意思，但又拒绝他的意见，对他说：“你真大醉了啊？”晋武帝自己也曾担心“太子闇弱，恐后乱国”，但由于他宠信杨氏后党，始终不愿废去痴太子。

全国统一以后，晋武帝以为天下平安无事，便“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他的皇后杨艳，出自弘农郡华阴（今陕西华县）的杨氏世族大家。司马衷是杨艳所生之子。杨艳死后，她的从妹杨芷又嫁给晋武帝为皇后，深受宠爱。杨芷的父亲杨骏，也就受到宠幸，超升为车骑将军，封为临晋侯，其弟杨珧、杨济当然也受到重用。当时杨氏兄弟三人“并在大位”，“势倾天下”，被称为“杨氏三公”，有“三杨”之号。杨皇后及杨骏等杨氏后党，当然不愿废去司马衷。有一次，晋武帝曾私下告诉皇后杨艳说：“皇太子不堪奉大统”，杨后以“立嫡以长不以贤”为理由反对改立太子。杨后坚持以司马衷这个白痴儿子为皇太子，将来当皇帝，晋武帝就让杨氏后党来辅佐他为帝。

晋武帝除了同意以司马衷为皇太子外，还同意为皇太子娶贾充的女儿贾南风为太子妃。贾充是平阳襄陵的世族大家，为司马昭杀死魏帝曹髦、篡夺魏帝位立过汗马功劳。司马炎被立为晋王太子、做了晋帝，也与贾充在司马昭面前称赞他“宽仁，且又居长，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有密切关系。西晋初年

有歌谣说：“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济天下。”就是说贾充与裴秀、王沈等三人是司马氏灭亡曹魏、建成西晋的功臣，而贾充尤其是西晋王朝的“元勋”。晋武帝对贾充更是“宠倖愈甚”，朝臣都“侧目”而视。贾充的妻子郭槐为了把女儿贾南风嫁给司马衷为妃，曾贿赂杨皇后，杨皇后盛称贾南风“有淑德”，又叫太子太傅荀顗称道贾充女南风“姿德淑茂，可以参选”。晋武帝也就同意了。贾南风以后成为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贾氏后党以后就成为与杨氏后党争权的主要敌手。

在晋武帝病危、临死前夕，杨氏后党的杨骏就想“尽斥群公”，独掌朝政。晋武帝知道他的儿子司马衷做皇帝“弗克负荷”，既对贾妃酷虐有所顾虑，又“恐杨氏之偪”，于是让官僚王佑为北军中侯，掌握中央禁军，让太子母弟秦王司马柬都督关中，楚王司马玮、淮南王司马允“镇守要害，以强帝室”，并下诏以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夹辅王室”，还想以朝士中有名望的青年官僚数人予以辅助。但是，杨骏怕失去权宠，和杨皇后伪造遗诏，由杨骏独自辅政。“中朝之乱，实始于斯（此）矣。”

290年（太熙元年）4月，晋武帝死，皇太子司马衷被杨氏后党扶上了皇帝宝座，杨皇后尊为皇太后，贾妃也成为皇后。杨骏以皇帝的舅舅、太傅“握大权，辅弱主”。这个“弱主”不仅是弱，而且是痴。他做了皇帝后，有一次到华林园中游乐，听到蛤蟆叫，竟然问左右的侍从：“蛤蟆鸣叫，是为官鸣，还是为私鸣？”侍从只好回答：“在官地为官鸣，在私地就为私鸣。”在他统治的后期，天下荒乱，百姓没有饭吃，饿死的很多。他却问老百姓“为什么不吃肉粥？”这样一个皇帝，只得听随后党、权臣的摆布。有句童谣说“宫中大马几作驴”，把司马衷这个“大

马”比作权臣驾驭的驴子。当时杨氏后党与贾氏后党，司马氏诸王与杨氏后党、贾氏后党以及诸王之间的“篡夺之祸”，便一次次地层出不穷，愈演愈烈。

291年（永平元年）3月，即在晋武帝死去、晋惠帝即位不到一年的时间，首先发生的是贾后策动楚王司马玮等发动宫廷武装政变。杀灭了杨氏后党。

贾后是一个妒忌、权诈的女人，在她做太子妃时就妒忌、酷虐，晋武帝因此大怒，曾要废掉她。杨皇后一方面劝说晋武帝，另一方面又严厉批评贾妃。贾妃不知皇后帮助了自己，反而怀恨杨皇后。杨骏辅政一开始，杨氏后党与贾氏后党的矛盾就开始尖锐化。贾后对杨骏执掌朝廷大权非常妒忌，一心要从杨氏手中夺取大权。杨骏也知道贾后情性难制，对她有所畏惧。为了保住自己的大权，杨骏多树亲党，让他的外甥等任近侍之职，让他的党羽统领中央禁兵。他想用“大开封赏”，取悦于众，但为政严碎，刚愎自用，反而“不允众心”。他排斥汝南王司马亮等辅政，造成“公室怨望，天下愤然。”贾后既“不肯以妇道事皇太后”，更反对杨骏，因此与宫中的侍从官阴谋策划，诬陷杨骏“为乱陷害”，杨太后与杨骏“同逆”，分别密召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带兵进京讨伐杨骏。司马亮没有出兵，司马玮却赶到京城与贾后联合以惠帝名义下诏废掉杨骏。当夜，全城戒严，司马玮亲自率领，东安公司马繇带了400名殿中兵攻打杨骏府第，杨骏在逃入马厩时被士兵用戟杀死。杨太后也被贾后废黜，饿死宫中。杨骏亲党都被夷三族，被杀死的有数千人。杨氏后党全被消灭。

一祸刚平，一祸又起。同年6月，贾后又阴谋制造了第二

次祸乱。

杨氏后党被诛灭以后，汝南王司马亮入朝为太宰，与太保卫瓘“对掌朝政”。当时，楚王司马玮以为自己诛灭杨骏有功，因而“多立威刑”，朝廷诸臣有所畏惧。司马亮、卫瓘认为司马玮“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议让他与诸王返回藩国。司马玮因而忿恨司马亮和卫瓘。贾后对司马亮、卫瓘共辅朝政非常不满，特别是对卫瓘怀有旧恨。卫瓘过去曾劝晋武帝应废掉太子司马衷，晋武帝虽然没有同意，但贾后父亲贾充曾经秘密告知贾后说：“卫瓘老奴，几破汝家。”贾后早已怀恨在心。卫瓘为人方直，与司马亮共同执政，当然不许贾后随意干预朝廷政事。贾后因而怨恨司马亮和卫瓘。但她也怕司马玮掌权，便利用和加深司马玮与司马亮、卫瓘之间的矛盾，“以计相次诛之”。

阴险狠毒的贾后诬陷司马亮、卫瓘二人有“废立之谋”，“欲危社稷”，假造诏书要司马玮带领“北军”夜间秘密围攻，讨伐司马亮、卫瓘。司马亮在哀叹“如何无道，枉杀不辜”之后而被害。卫瓘及其子孙 9 人也被杀。

司马玮年轻性险，对司马亮、卫瓘有“私怨”，对贾氏后党也不满。在杀死司马亮、卫瓘之后，他的部下曾劝他“因兵势”诛灭贾氏后党的贾模、郭彰，正在他犹豫不决之时，贾后立即宣布“楚王矫诏”，给他定上伪造诏书杀害“二公父子，又欲诛灭朝臣，谋图不轨”等罪名，把他处以死刑。他痛哭流涕，悲叹自己“受枉如此”，含冤而死。

贾后制造这次祸乱，杀掉司马亮、卫瓘、司马玮以后，便篡夺了朝廷全部大权，实行她“专制天下，威服内外”的“女主专政”。而她的残暴专政，又导致了 300 年（永康元年）4 月赵王

司马伦发动的第三次祸乱。

在贾后专政期间，西晋王朝的政治统治腐败不堪。真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为了保持自己的“女主专政”，贾后及其党羽贾谧等采取各种阴险毒辣手段诬陷、坑害愍怀太子司马遹。

司马遹是晋惠帝司马衷的谢妃所生，幼小时就聪明伶俐。晋武帝很爱他，曾对人说：“此儿当兴我家。”他不愿废掉司马衷，也就是想让司马遹将来继司马衷当皇帝。司马衷即帝位后，司马遹立为皇太子。贾后不能怀孕生子，假装怀孕，暗地把妹夫的儿子抱来作为自己的儿子，与贾谧密谋废太子遹，以自己的儿子代立。于是诬陷太子遹说过“皇后万岁后，吾当鱼肉之”的话。当时有的朝臣劝太子遹要预防受贾后之害，太子遹装聋不听，有人写了一首童谣警告他说：“东宫马子莫聋空，前至腊月缠汝鬢。”果然不出人们所料，299年（元康九年）12月，贾后把太子遹骗进她的宫中，把他灌醉后写了：“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了，吾当手了之。”随即把它送给晋惠帝看，要惠帝下诏说：“遹书如此，令赐死。”因为朝臣反对，贾后就废掉太子遹，把他送到许昌幽禁起来。

太子遹无辜被废，朝臣“众情愤怒”，想依靠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赵王司马伦“废贾后，复太子”。但是，司马伦平常与贾氏后党既有亲密关系又有矛盾，更怕朝臣认为他是贾后之党，太子复立以后对他不利，便采用他的亲信孙秀的诡计，挑动贾后害死太子，再以“为太子报仇”之名废掉贾后。他认为这样干，既可“免祸”，又足以“立功”、“得志”。贾后、贾谧听了司马伦的挑动，认为杀掉太子可绝众望，派人到许昌去想用毒药毒

死太子遹，太子遹拒不吃药，结果被用药杵椎死。

300年4月3日夜，司马伦与梁王司马彤、齐王司马冏等密谋打着“为太子报仇”的旗号，带兵入宫，先迎接惠帝，后宣布逮捕贾后。贾后一见到司马冏，大惊失色，问道：“你为何进宫？”司马冏声称：“有诏书逮捕你。”贾后说：“诏书当从我出，你有什么诏书？”知道自己将被废掉，遥呼惠帝说：“陛下有妇，使人废之，亦行自废。”贾后又问废她的“起事者是谁”？司马冏说：“梁王、赵王。”贾后听了后悔莫及，无可奈何地说：“系狗当系颈，今反系其尾，何得不然！”她没有先下手杀掉赵王司马伦，所以落得今天的下场。贾后最后被司马伦废掉、处死，贾氏后党贾谧等数十人都被诛灭。

司马伦，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以“性贪暴”著名。当他一箭双雕除掉贾氏后党和太子司马遹以后，便进一步篡夺皇权。他胡造司马懿要他当皇帝的“神语”，于301年1月耍起“禅让”的把戏，从惠帝手中夺来了皇帝御玺，自己当了皇帝。他眼睛有点瞎，人们说是“瞎儿作天子”。

赵王司马伦这个“瞎儿”篡夺了皇位，作了天子，激起了朝臣的愤恨和其他司马氏诸王的反对。301年（永宁元年）3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第四次祸乱。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三王起兵，讨伐司马伦“逆乱”。

在贾氏专权时期，司马伦谄事贾后，深交贾氏后党的贾谧、郭彰，大为贾后所亲信，是贾后的同党，又是谋害太子遹的同犯。在消灭贾氏后党以后，司马伦更是篡夺皇位、屠杀忠良的罪魁祸首。

司马伦当了皇帝，更滥封爵号，连他的奴卒厮役也都“加

以爵位”。按照官爵服饰规定，有些高官的冠饰是“貂蝉”，即在冠的前部加黄金瑯，附蝉为纹，貂尾为饰。头戴这种冠饰的官也称作“貂蝉”。由于司马伦滥封官爵，所以每次朝会，“貂蝉盈坐”。时人有谚语讽刺说：“貂不足，狗尾续。”讽刺司马伦滥封官爵，没有那么多的貂尾作冠饰，只有用狗尾代替。实际上也就是骂司马伦所封的官是狗官。

在朝臣“众心怨望”之际，曾经参与司马伦废贾后、又被司马伦排挤到许昌的齐王司马冏，与有关诸王密谋从南方起兵讨伐司马伦。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和镇守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也分别从北方、西方起兵响应。司马伦见“三王”带兵讨伐自己，也即派兵迎战。“三王”之兵与司马伦之兵在洛阳附近激战 60 多天，双方死亡 10 万人左右。当时洛阳的百官将士都想诛灭司马伦及其亲信孙秀“以谢天下”。司马伦的部将王舆在内外的压力下，率营兵 700 余人起义，杀死孙秀，废黜司马伦，拥戴惠帝复位。司马冏带领数 10 万兵士入洛，威震京都，以大司马之职入朝辅政。司马伦父子及其党羽多人，都被处死。

但在司马冏辅政一年多的时期内，司马氏诸王之间的争权斗争又更加激烈，结果导致了长沙王司马义反对司马冏的战乱，即第五次祸乱。

司马冏，晋武帝之侄、齐王司马攸之子，在讨伐司马伦时因“首建大谋”，有“复兴皇位之功”，所以执掌了朝政。执政期间，他也树立党羽、自擅威权，而且骄侈无礼、沉于酒色，不入朝见。这一方面引起了“朝廷侧目，海内失望”，另一方面又引起了长沙王司马义和河间王司马的极端不满。司马义是晋武

帝的第六子,想让他弟弟成都王司马颖继晋武帝为帝,曾经亲自对司马颖说:“天下者,先帝之业也,你成都王应该维持。”司马颺在司马冏谋讨司马伦的初期,是支持司马伦的,等到听到司马冏和司马颖二王兵盛时才派部将李含响应司马冏。司马冏执政后,李含与司马冏的部将发生了矛盾,又投奔司马颺,诡称“受密诏”要司马颺诛伐司马冏。司马颺便发兵讨司马冏,派人邀请司马颖也出兵,并传檄洛阳的司马冏为诛伐司马义的内应。302年(太安元年)12月,司马颺宣称司马冏“有无君之心”,出兵进攻洛阳,要求废掉司马冏。司马义立即在洛阳城内响应,宣称司马冏“谋反”,发兵进攻司马冏府第。司马冏也宣称司马义“矫诏”,派兵袭击司马义。双方军队展开了激战,洛阳城内飞矢如雨,火光冲天,混战了3天,司马冏兵败被斩,其党2000余人也被诛杀。司马义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握了中央大权。

长沙王司马义打败司马冏、掌握中央大权不久,又爆发了第六次祸乱,即河间王司马颺、成都王司马颖联兵讨伐司马义的战乱。

司马颺在出兵讨伐司马冏时,本来有自己的计谋,即他以为司马冏的兵力强、司马义的兵力弱,想使司马义在攻打司马冏时被司马冏擒获,他然后再以司马义被擒为借口宣告四方共讨司马冏,从而废掉晋惠帝、立司马颖为帝,“己为宰相,专制天下。”但是结果事出望外,司马义却战胜司马冏,执掌朝政。

为了害死司马义,司马颺曾派李含等秘密袭击司马义,但被司马义诛杀。司马颖也曾派遣刺客行刺司马义,也被司马义

杀掉。303年8月，司马颙派部将张方为都督，率领7万精兵打向洛阳，司马颖也派出军队助战。司马乂自为大都督，率军迎战。三方军队30余万，连战3个多月，死伤八九万。洛阳“战久粮乏，城中大饥”，公私穷困，米石万钱。张方打到洛阳，东海王司马越在此情况下，与部分禁军将领只好把司马乂拘禁起来，向司马颙、司马颖求和，结果司马乂被张方秘密烧死。

司马乂死后，司马颙在长安任王朝的太宰、大都督。司马颖在邺城立为皇太弟——皇帝接班人，都督中外诸军事，从此“僭侈日甚，有无君之心”，宠信、委任嬖人，“大失众望”。这就引起了第七次祸乱。304年（永兴元年）7月，洛阳的左卫将军陈眕等奉晋惠帝北征司马颖。东海王司马越为大都督，组织了10多万兵力进军安阳，司马颖派5万兵力迎战，打败了司马越，俘获了晋惠帝。8月，安北将军王浚、宁北将军东嬴公司马腾联兵南攻邺城，司马颖兵败挟晋惠帝南奔，司马颙派张方率领2万兵力援救司马颖。张方又从洛阳挟持晋惠帝西迁长安。这年12月，司马颙在长安废掉司马颖，另立豫章王司马炽（晋武帝的第25子）为皇太弟，自己都督中外诸军事，控制了皇权。

司马颙控制了皇权，又导致了第八次祸乱，即东海王司马越等西伐司马颙的战乱。

司马越在北征司马颖兵败以后，逃归自己的封国东海（今山东郯城县北）。司马颙的部将张方挟晋惠帝西迁长安，引起了“天下怨愤”。司马颙又挟晋惠帝发诏罢免司马越等王的朝廷官职。305年（永兴二年）7月，东方的一些司马氏诸王共推司马越为“倡议奉迎大驾，还复旧都”的盟主，司马越也即“东

山再起”，从徐州起兵西伐。司马颙先派司马颖、张方等迎战，兵败以后，又杀死张方，向司马越求和。司马越乘胜打进长安，司马颙逃亡山中。306年（光熙元年）6月，司马越奉惠帝回洛阳。就在这一年，司马颖、司马颙先后被杀，惠帝也被毒死。皇太弟司马炽被立为怀帝，司马越从此“专擅威权”。“八王之乱”结束。

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是“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的大混战，是西晋王朝的“国家之祸，至亲之乱”，使司马氏的西晋统治陷入“政乱朝危”的危机。它更使各族人民陷入苦难深渊，逼迫举行起义，反抗和推翻司马氏的腐朽统治。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的官僚贵族，也即利用这个时机建立割据政权。后赵的统治者石虎自立为“大赵天王”以后就公开承认说“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残灭，故使朕得至此。”

第四节 流民起义浪潮的掀起

一、李特、李流等领导的流民起义

西晋统治阶级的腐朽残暴，“八王之乱”的战争祸乱，给各族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数十万人的生命被战火夺走，生产遭到严重的摧残。灾荒连年，病疫流行，广大人民田荒家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被迫

背井离乡，出外逃荒，流亡异地。这些人被称为“流人”或“流民”。

各族人民不断流亡，形成了一股股流民的洪流，是西晋末年的普遍现象。298年（晋惠帝元康八年）以后的10年间，流亡人民达100万人以上。陕西、甘肃等地区的人民流入四川、湖北的有10多万人。山西人民流离四散，几乎十不存二，流入河南的有数万家。河北地区流入山东等地的有四五万人。四川流入湖南、湖北的也有四五万家。这些流民，有的“为人佣力”，有的流落荒野，既受本地地主欺压，又受当地官僚勒索，西晋政府更多次强令他们返回早已无家可归的家乡。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人人愁怨”，群起反抗西晋的统治，举行武装起义。其中最早、最大的流民起义，是301年（晋惠帝永宁元年）10月的“流人李特反于蜀”。

李特，字玄休，氏族，原籍巴西宕渠（今四川渠县东北）。东汉末年，李特的祖先率领氏族从巴西宕渠迁居汉中杨车坂，当时人称为“杨车巴”。曹操占领汉中时，李特的祖父率领500多家氏人归附，被任为将军，又迁到略阳（今甘肃秦安县东北），北方人称他们叫“巴氏”。西晋初年，李特之父李慕为东羌猎将，统领羌人。296年（惠帝元康六年）8月，甘肃、陕西境内的氏、羌人民反对西晋的残暴统治，推举氏族首领齐万年举兵反晋。齐万年称帝，聚众7万多人，经过三四年的战争，于299年（元康九年）1月失败。当时，关西大乱，连年饥荒，居住在水、略阳、扶风（今陕西泾阳）、始平（今陕西兴平）、阴平（今甘肃文县）、武都（今甘肃成县）等六郡的汉、氏、羌、賚、叟等族的豪强和人民数万家、10多万人被迫外出逃荒，经过汉中流徙

巴蜀(今四川)益州(今四川成都)和梁州(今陕西西南部)一带。李特、李庠、李流等兄弟率领氏族 7000 余人流入绵竹(今四川德阳)。

六郡流民入蜀时,晋之“八王之乱”正在发展。赵王司马伦与其他诸王正在酣战。中原正在大乱。益州刺史赵廞想乘中原之乱反叛晋廷,割据益州。晋廷任命成都内史耿滕代替赵廞,赵廞想利用李特、李庠等氐人作为爪牙,反对耿滕。300 年冬,赵廞战败了耿滕,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一方面他使李特弟李庠为威寇将军,驻守益州之北道绵竹,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阴谋杀害李庠。李庠认为现在“中国大乱”,晋室不可复兴,劝赵廞“宜应天时,顺人心,拯百姓于涂炭”,赵廞却以“大逆不道”之罪名杀死了李庠及其子侄宗族 30 余人。

李庠原是东羌良将,晓军法、兼文武,性好任侠,好济人之难,与六郡流人避难益、梁时,能振施穷乏,对饥病的流人时时予以营护隐恤,深得民心,用兵时更能布阵肃然。赵廞杀害李庠,激起了李特等氐人的无比仇恨。301 年正月,李特聚众 7000 余人,夜袭赵廞部将费远等驻在绵竹附近的 1 万多名驻军,放火焚烧费远的兵营,费远溃逃,士卒死者十之八九。李特等又攻克成都,赵廞败亡。

在李特战败赵廞的同时,晋廷又派梁州刺史罗尚为平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罗尚率领广汉太守辛冉等 7000 余人入蜀,强令六郡流民离开巴蜀,返回原郡。

罗尚、辛冉都是贪暴成性的家伙。他一入蜀就勒索李特等流民的“宝物”,大吃大喝李特等的“牛、酒”。辛冉更贪天之功

为己功。西晋朝廷曾因李特等六郡流民有消灭赵廞之功，命令加以封赏。辛冉却以消灭赵廞为己之功，私吞“朝命”。罗尚、辛冉狼狈为奸，残害流民。罗尚派人催赶流民，限令他们于301年7月启程还乡。辛冉则想杀掉流民首领，取其货物，并派人于各个重要关口搜索流民宝货。李特兄弟等人向罗尚、辛冉等反复请求延期，到秋收时启程。这时，分散在各地的“为人佣力”的流民，听到州郡强令遣返，加上水雨将降，年谷未登，回去也没有行资，于是，他们“人人愁怨，不知所为”。李特兄弟就把这些被强令遣返的流民安排于绵竹，请求辛冉从宽对待。但辛冉却因此大怒，派人分榜通道，用重赏购募李特兄弟。李特与其弟李骥把辛冉张贴的榜文取下，又改写成：“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赏百匹。”这就激起了六郡流民对罗尚、辛冉的仇恨。六郡流民纷纷归附李特。旬月之间，李特聚众2万多，李特弟李流也聚众数千。

李特兄弟聚集二三万流民，分成北营和东营。李特居北营，李流居东营。301年冬10月，李特派向罗尚要求延期遣返，罗尚坚决不肯。辛冉为了迅速消灭李特兄弟，便派遣步骑3万人袭击绵竹的李特流民营地，罗尚也派兵协助。李特兄弟早知他们要来袭击，便缮甲厉兵，严阵以待。罗尚、辛冉的晋军前来偷袭时，李特按兵不动。当晋军的一半进入后，李特的伏兵群起反击，歼灭了前来袭击的全部晋军。

绵竹首战告捷，李特等流民起义旗开得胜，六郡流民便推举李特为起义军首领。李特少年就“雄武善骑射，沈毅有大度”。他成了流民起义军首领时，便坚决消灭贪残之罗尚、辛冉。绵竹之战后，李特乘胜进攻广汉太守辛冉，攻占了广汉，又

继续进攻成都之益州刺史罗尚。

李特起义是“志济涂炭”，能够安抚百姓，与蜀地百姓约法三章，振济贫困，并注意礼待贤者，选拔贤才。因此起义军纪律严明，军政肃然，得到了蜀地百姓的称颂。

当时，罗尚节节败退，退守成都，请求援军。河间王司马颙派遣部将衙博和广汉太守张征率军讨伐李特，南夷校尉李毅、梁州刺史许雄也派兵援救罗尚。李特起义军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连败司马颙的部将衙博，攻占了巴西郡，巴西郡丞毛植等和衙博的部众都向起义军投降。罗尚派遣部将张龟从繁城（今四川繁县）三路进攻起义军，也都被起义军击败。302年（晋惠帝太安元年）5月，李特在起义军屡战屡胜的大好形势下，自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督，建年号为“建初”，意为初建起义政权。同年8月，李特兵分两路进攻晋军。一路北击广汉太守张征。张征依山据险，负隅顽抗。起义军英勇战斗，合力围攻，斩张征，并击破了梁州刺史许雄的援军。另一路则围攻成都之罗尚。成都有大小二城，蜀郡太守徐俭以成都小城投诚，李特进据小城，严守纪律，“惟取马以供军，余无侵掠”。成都以外的许多地主坞堡也向起义军投降。罗尚据守成都大城，派人向起义军求和。

303年（太安二年）2月，形势发生了不利于起义军的变化。这年一月，西晋朝廷派遣荆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孙阜率领3万水军入蜀救援罗尚。罗尚和蜀地的地主坞堡听说救兵将到，便阴谋反攻起义军。罗尚派间谍向李特假降，秘密串通成都外的地主坞堡，对起义军实行内外夹攻。当时因为成都缺粮，李特把起义部队都分散到成都附近的地主坞堡中“就食”，

军力也就分散。李流当时曾建议李特要“纳降如受敌，不可轻视”，要“收集猛锐，严为防卫”，但李特认为“大事已定，但当安民”，对假降之敌失去警惕。结果中了罗尚的奸计。罗尚在李特“骄怠无备”之时，突然出动大军袭击李特。李特在“众少不敌”的情况下，与罗尚大军连战 2 天、转战 30 余里，终因内外受敌、众寡悬殊而失利，李特及其兄李辅等英勇牺牲。

李特牺牲后，他的四弟李流和儿子李荡、李雄等起义军将士继续战斗。李流，字玄通，少好学，善骑射，人们称他“有贲育之勇”。他继李特为起义首领，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当时蜀地的地主据险结坞，坚壁清野，起义军缺粮，士众饥困，往往掘野芋充饥。晋军又不断向起义军进攻，李荡阵亡。在此困难的情况下，起义军坚持斗争，经过艰苦奋战，终于打退了宋岱、孙阜等荆州军的进攻，攻克了成都西北的郫城（今四川郫县北），又把罗尚围困在成都大城。不久，李流病故，李雄接替为起义军首领，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都于郫城。

李雄，字仲儒，李特的第三个儿子。少年时，他就以烈气闻名。李特起义后，他任起义军的前将军，又以“英武”著称。李流死后，他在扭转失利战局、转败为胜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李流临终前，希望起义军将士将来推举李雄为成都王。当时，军粮问题是战争胜负的关键问题。为了振兴起义军，李雄让投诚起义军的罗尚部徐舆去说服他的同乡范长生资助起义军粮食。范长生是涪陵一带拥有部曲的大地主、道教首领，率领 1000 多家在灌县青城山隐居，“求道养志”，积蓄大量粮食。他为了得到起义军的好处，也投靠了起义军，资助起义军军粮。罗尚派兵出击李雄，李雄一方面派兵予以痛击，另一方面又派

李骧进攻犍为(今四川彭山东),切断罗尚军的粮道。成都城中饥馑,李雄乘机急攻。罗尚不得不在夜间委城而逃。城中军民开门迎接起义军。李雄起义军进驻成都,占领了成都地区。

304年(晋惠帝永兴元年)11月,李雄在成都称成都王,改年号为“建兴”。废除西晋的法律,别行“约法七章”。306年春,李雄拜范长生为丞相,尊称“范贤”。范长生劝李雄称帝。6月,李雄即皇帝位,是为武帝,国号“大成”,年号“晏平”。意思当时流民起义成功。实现了天下平安。

由李特开始的流民起义,经过5年多的战争,到李雄建立“大成”国,宣告了起义任务的完成。这种完成,也就意味着新的蜕变的开始,流民起义领袖开始演变为新的封建帝王,由反抗封建地主的残酷压榨,逐渐与地主妥协,以至照顾地主的利益。如李雄拜范长生为丞相后,又尊他为“天地太师”,封他为西山侯,还免除他的徭赋,“复其部曲不豫军征,租税一入其家。”对于其他投降成国的地主官僚,李雄也加以优待,如越嶲(今四川会理)太守李钊到成都来投降,李雄也“待遇甚厚,朝廷仪式,丧纪之礼,皆决于钊。”

但是,经过流民起义建立起来的大成国,在各方面都比腐朽残暴的西晋统治好。首先,成国的政治制度简朴。李雄治国“简刑约法,甚有名称”。当时只有约法七章,所以“刑政宽简,狱无滞囚”。李雄更能“虚己好贤,随才授任”。军政官吏没有特殊“禄秩”,一般“取给予民”。官民的服饰也无特殊区别。也没有常备军,所以“行军无号令,用兵无部队”。其次,经济制度带有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色彩。太子李班(李雄的侄子)曾对李雄说:“古者垦田均平,贫富获所。今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

殖无地，富者以己所余而卖之，此岂王者大均之义乎？”平均主义是小生产者的思想。李班提出“垦田均平，贫富获所”的要求，反对富贵者广占田地、贫者耕种无地的现象，说明当时成国是考虑并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成国的赋税也比西晋王朝相对减轻。规定每户赋调的数额是“赋，男丁每岁纳谷三斛；女丁纳一半，即一斛半；疾病者又再减半。户调，每岁绢不过数丈，绵只数两。”对于新来归附的官民，还规定定期免除赋税。所以史载成国“事少役稀，百姓富实”，社会秩序安定，“闾门不闭，无相侵盗。”当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年谷屡熟，中原人民纷纷来到蜀地避乱。在甘肃陇西县一带的人民起义领袖陈安也归附李雄，一些少数民族也都来降服。成国因而“夷夏安之，威震西土”。

公元 334 年李雄死，李雄子李期杀李班，自称皇帝。338 年李寿又杀李期自立，改国号为汉。343 年李寿死，子李势立。李势是个暴君，人心离散。347 年桓温伐汉，李势军败散，晋军攻成都，李势到桓温君前投降，汉国亡。

二、张昌、石冰等领导的流民起义

张昌、石冰等人，继李特领导的流民起义之后，发动并领导了荆州地区的流民起义。

张昌，义阳郡（今河南南部及湖北北部）“蛮”族人。他武力过人，好论攻战，初为平氏县（今河南桐柏县西北）小吏。当时，西晋都督荆州诸军事的新野郡王司马歆“为政严刻，蛮夷并怨”，张昌深恨西晋政府的暴虐统治。那时，李特领导的蜀地流

民起义势力很盛，晋廷调荆州刺史宋岱率军前去镇压。李特战死后，李流继续坚持反抗晋朝政府的斗争。张昌便在这时逃出了平氏县府，准备发动流民起义。

半年之后，张昌聚众数千人，并准备好了起义的旗帜，想假借西晋政府派他募人讨伐李流的名义进行起义。正好西晋政府在这时发出诏书，强征荆州的“武勇”开赴益州去镇压李流起义军。荆州人民都反对这种戍役，不肯给统治者“远征”卖命。当时民间谣传“当有帝王兴于江左”，张昌的党人也乘机宣传鼓动，人民群众更加不肯去戍役。西晋政府为了及早扑灭蜀地的起义烈火，又“催遣严速”，郡县官长都亲自出马驱逐戍卒西征。戍卒因而屯聚起来，进行反抗。江夏郡（今湖北中部）当时是丰收之年，数千流民都流到这里“就食”。

起义的时机成熟了。303年（晋惠帝太安二年）5月，张昌便改名李辰，在离江夏郡治80里远的安陆县（今湖北安陆县北）石岩山聚众起义，流民和逃避戍役的人都到石岩山参加了起义军。

张昌起义后，江夏太守弓钦随即派兵前往镇压。起义军奋起反击，粉碎了弓钦的进犯，扩大了起义队伍，立即进攻郡城。弓钦出战，又被打败，带着家眷南逃武昌。晋镇南大将军、新野郡王司马歆又派遣部将靳满率兵进攻起义军，在随郡（今湖北大洪山以东随县一带）之西进行了一场大战，靳满又大败而走。起义军缴获了靳满军的武器，占据了江夏郡城。

当时广大人民急切期望能有解除他们苦难的“圣人”出来为他们作主。张昌适应人民的这种心理，宣传“当有圣人出为民主”，于是把在江夏的山都县（今湖北襄樊市以西）吏丘沈，

改名为刘尼。对外宣称刘尼是汉代皇帝后裔，是“圣人”，奉为天子。张昌自己为相国，兄张味为车骑将军，弟张放为广武将军。并请晋尚书令史郭贞为尚书郎，“欲访以朝议”。建国号曰“汉”，建年号为“神凤”。凤凰是祥瑞象征。张昌在石岩中设宫殿，在石岩上织竹为鸟形，施以五彩，在竹鸟旁放些肉，众鸟因而群集在竹鸟之旁。对外宣称是“凤凰降”，说明起义有凤凰之瑞。

张昌这样宣传、鼓动，起了鼓舞群众踊跃参加起义的作用。深受压迫、剥削的荆州人民，渴望代表他们利益、为他们作主的天子出来，渴望象征天下太平的凤凰下降。他们“竖牙旗，鸣鼓角”，大张旗鼓地响应张昌，“从之如归”。旬月之间，江沔地区的人民起义像烈火似地燃起，起义军发展到3万多人。史书记载，他们为了与官军相区别，“皆以绛科头，𦘔之以毛”或“皆著绛帽，以马尾为髻”。就是说，他们都用大红色布巾包头或头戴大红色帽子，用马尾之类作为假胡须，所以西晋统治者说他们是“绛头毛面”，骂他们是“妖逆”，甚至把他们污蔑为“犬羊”。但是，就是这些被西晋统治者视为“妖逆”、“犬羊”的革命群众，却英勇神武，在障山（安陆县东）将晋朝的监军华宏打得大败。晋新野王司马歆不得不向晋廷上书说：“妖贼张昌、刘尼妄称神圣，犬羊万计，绛头毛面，挑刀走戟，其锋不可当”，急求派遣大军“三道救助”。

西晋政府为了迅速扑灭这场起义烈火，立即调兵遣将，派遣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和威远将军、豫州刺史刘乔率领赵骧、羊伊等共同讨伐张昌起义军。当时，刘乔率领诸军屯兵汝南（今河南息县），刘弘、赵骧、羊伊等屯兵宛（今河南南阳市），

张昌针对晋军的部署，兵分三路主动出击。一路派将军黄林为大都督，率领 2 万义军打向豫州。这一路的前驱李宫等进攻汝水，受到刘乔军的阻击。黄林等进而东攻弋阳郡（郡治在西阳县，今河南光山县西），因为敌军婴城固守，没有攻下。另一路派将军马武南攻武昌郡（郡治在今湖北鄂城），攻破武昌，杀掉南阳太守刘彬。另一路是在马武攻破武昌以后，张昌集中全军力量向西围攻宛，打败了拥有 8000 精兵的赵骧，杀掉了羊伊。刘弘兵败，退屯梁县（今河南商丘）。破宛以后，张昌立即乘胜进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司马歆亲自带兵出城迎战，兵败被杀。

同年 6 月，刘弘率军进攻方城（今河南南阳东北）的起义军，又被义军打败。7 月，张昌派遣部将陈贞、陈兰、张甫等攻破江南的长沙（今湖南东北部）、湘东（今湖南东部）、零陵（今湖南西南部）、豫章（今江西南昌市）等郡；同时，又派部将石冰等东攻扬州、江州（今江西南昌市），打败扬州刺史陈徽以后，江、扬二州各郡县也就不攻自破。临淮人封云也响应石冰起义，自阜陵攻克徐州。

从 303 年 5 月到 7 月的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张昌起义军就控制了荆、豫、江、扬、徐等五州的广大地区，并建立了“汉”政权，各州郡也委派了牧守。这些牧守都是义军的将士。所以统治者写的史书诬蔑说张昌起义军“虽跨带五州，树立牧守，皆盗桀小人，而无禁制，但以劫掠为务”。

当张昌起义军的势力发展到跨带五州之时，西晋政府加强了对起义军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司马歆被杀后，晋廷以刘弘代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刘弘首先派兵消灭了和

他争夺荆州刺史权的长水校尉张奕，然后任用“有能名”的南蛮长史陶侃，和参军蒯桓、皮初等合力向竟陵郡（今湖北钟祥、天门间）方面的义军发起进攻。豫州刺史刘乔又派遣将军李扬、晋护尹奉等总兵向江夏方面进攻。八月，张昌亲自率领起义军进行反击，与陶侃等晋军苦战累日。起义军将士英勇战斗，牺牲惨重，最后，义军被陶侃战败，上万人被俘，张昌和丘沈逃往下雩山（今湖南岳阳东）。

张昌的荆州起义军虽然失败了，但五州人民的起义波涛，特别是荆州流人起义的风暴，并未完全平息。为了瓦解义军斗志，平息起义，刘弘不得不实行“劝课农桑，宽刑省赋”的措施，废除岷、方二山泽不许百姓捕鱼的旧制，让人民自由捕鱼，给予荆州流人“田以种粮食”，对流人还“擢其贤才，随资叙用”。

在刘弘实行瓦解荆州起义人民、平息荆州起义的同时，扬州地区的豪族地主则加强军力进剿和镇压张昌部将石冰等的起义军。303年（惠帝太安二年）12月，晋议郎周玘联合前南平内史王矩起兵江左，共推吴兴太守顾秘都督扬州九郡军事，发动江南地主共同起兵进攻石冰，杀害石冰所置吴兴太守区山及诸长吏。晋征东将军刘准和广陵度支、右将军陈敏也在江北发动对石冰的进攻。石冰派遣部将羌毒率领数万人在江南反击周玘，自领大军从临淮趋向寿春。羌毒在战斗中牺牲。石冰与陈敏自寿春战至扬州，又战至建业（今南京）。周玘又与陈敏在建业击败石冰，石冰的部将赵鸯也在芜湖阵亡。305年（永兴元年）3月，石冰从建康北撤到徐州，与封云共同抗击陈敏。石冰在反击陈敏的整个战斗过程中，经过了30余战，最后在徐州一战，因封云的部下张统叛变，与封云一起被张统杀害。

徐、扬二州的起义失败。同年秋天，张昌也被晋军擒获，英勇牺牲。

三、王如、杜弼等领导的流民起义

张昌起义失败之后，310年（晋怀帝永嘉四年）、311年在荆、湘地区又相继发生了王如、杜弼等流民起义。史称“王如乱北，杜弼跨南”。

王如，雍州新丰（今陕西临潼县东）人，曾在雍州当过州郡的武吏，关中地区荒乱时和广大群众逃荒流入南阳郡宛城（今河南南阳市），成为“雍州流人”。这些流民长期流落异乡，生活很苦，常常逼得走投无路，起来反抗。张昌起义时，晋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刘弘实行了一系列安抚流民的措施，才平息了流民起义。刘弘死后，高密王司马略代镇，人民暴动、起义又起，晋廷起用刘弘之子刘璠为顺阳内史。刘璠能继承父志，对人民采取一些安抚措施，所以“江汉之间翕然归心”。309年（永嘉三年）春，晋廷派山简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镇守襄阳。山简是晋司徒山涛之子，与山涛一样，一生以饮酒为乐，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认为刘璠能“得众心”，害怕百姓为乱，以刘璠“为主”。当时东海王司马越“专执权威”，西晋社会陷入“西方寇乱，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惧”之境，山简请求司马越把刘璠调入洛阳。而山简却不恤政事，“优游卒岁，唯酒是耽”，经常在荆州豪族习氏的美好园池“高阳池”上醉酒游乐。荆州一些人民群众对刘弘、刘璠父子表示怀念。刘璠离开荆州前往洛阳时，流人侯脱、路难等等还相率卫

送。但对每天花天酒地的山简之类的豪族却相当仇恨，起而反抗，“南夏遂乱”。309年冬，当反晋的王弥军队由洛阳南出轘辕时，流亡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的数万家流民，因为“素为居民所苦”，所以都放火焚烧晋之城邑，杀死晋之二千石长吏，响应王弥。310年，西晋政府又下令把在南阳的雍州流民遣还乡里。这些流民因为“关中荒残”，都不愿回去，而山简和南中郎将杜蕤却各自派兵押送他们还乡，并限令短期之内启程，逼得雍州流民起义。这年9月，王如联合流民中的“壮士”夜间袭击宛城山简、杜蕤二人押送流民的晋军，发动了流民起义，并攻破了襄城。关中流民庞实、严锺、侯脱等人也各率其众攻城镇，杀令长，响应王如。没有多久，王如的起义群众发展为四五万人。王如自号大将军，领司、雍2州牧。

这时，汉国的刘聪正派遣部将刘曜、王弥、石勒等围攻晋都洛阳，石勒引兵济河，将趋南阳。因为汉国是反晋的强国，王如等一方面“称藩于汉”，另一方面又反对石勒兼并他们。当石勒南趋南阳时，王如等打败了山简、杜蕤和荆州刺史王澄北上援救晋都的晋军，并派起义群众1万人屯据襄城，抗击石勒。但被石勒打败。王如因与侯脱不和，又怕石勒进攻自己，便厚贿石勒，与石勒“结为兄弟”。石勒对侯脱不附属自己，已准备进攻侯脱。王如为了保存自己，也叫石勒攻击侯脱。石勒进攻驻在宛城的侯脱，严锺率众援救侯脱，都被石勒兼并。王如与其弟王璃等因而独自活动在汉沔之间，进逼襄阳。山简此时已退屯夏口（今湖北汉口），派将军赵同率军进击王如，“经年不能克，智力并屈”。后来，石勒攻下襄阳，亲率精骑3万还攻王如，王如遣其弟王璃率骑2.5万人，“诈言犒军，实欲袭勒”，结

果被石勒击败。王如起义军的力量逐渐削弱。后来，起义军自己耕田种谷，但因为连年灾荒，军中大饥；加上起义军首领之间矛盾加深，互相争夺，力量更加衰弱。在晋军的进攻下，有些起义军首领降晋，王如逼得“计无所出”，也约在 312 年（永嘉六年）底降于晋荆州刺史王敦，后被王敦杀害。

王如虽然降晋，但王如的部将李运、王建等仍然坚持反抗西晋统治的斗争。313 年夏，李运、王建等率领流民 3000 余家自襄阳转战汉中，屯居成固（今陕西成固县），“徒属不事佃农，但营器仗”，坚持武装斗争。晋梁州刺史派部将晋邈等进攻李运、王建。李运、王建被杀。王建婿杨虎（或作杨武）继为流民首领，同年秋、冬，与氐人首领杨茂搜之子杨难敌联合夹攻，射死张光之子张孟苾、张援，气死张光，攻陷梁州，后来投奔李雄。

当王如等雍州流民在宛城起义之后不久，以杜弢为首的巴蜀流民在湘州（今湖南长沙）举行了四五万家 10 多万人的大规模起义。

西晋末年，流落在荆湘地区的巴蜀流民备尝西晋官僚和土著地主的“荼毒”，饱受他们的“侵苦”，对西晋的统治“并怀怨恨”，不断反抗。311 年 1 月，巴蜀流民李骧首先高举义旗，在乐乡（今湖北松滋）起义，攻烧南平（今湖北江陵以南公安一带）杀死县令，屯聚乐乡。以“酣讌纵诞，穷欢极娱”著称的荆州刺史王澄派成都内史王机率军镇压，李骧被迫请降。王澄一面虚伪答应，一面派军袭杀李骧于宠州，以李骧的妻妾为赏，并惨无人道地把 8000 多流民淹死江水中。这就激起了巴蜀流民的极大忿恨，杜畴、蹇抚等又率众在湘州再行起义，进攻南

平等郡县。这时湘州参军冯素又乘机向湘州刺史荀眺诬告说：“巴蜀流民皆欲反”。荀眺准备杀尽所有流民，又逼得所有巴蜀流民不得不举行大规模起义。汝班、蹇硕等四五万家 10 多万巴蜀流民全部起来进行反晋斗争，共同推举“素有清望”的蜀人杜弢为起义首领。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的秀才，以才学著称。李特在蜀起义时，他避居南平。李骧起义军进攻南平时，他又东下巴汉，曾任醴陵（今湖南醴陵）县令。因为湘州刺史荀眺想“杀尽”流民，他与巴蜀流民中的同乡经常相通，也在被“杀尽”之内，所以“惧死求生，遂相结聚”，加入流民起义。起义的巴蜀流民，因为他是蜀人，“推其素望，遂相凭结”。他代表巴蜀流民的利益，自称梁、益二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成为起义军的首领。

“平难将军”的“平难”，当然首先是平除湘州刺史荀眺等使巴蜀流民“备尝荼毒”之“难”，平除荆湘地区官僚地主加在流民身上的苦难，使巴蜀流民免除流离失所、备受欺凌的痛苦，能够耕种田地、安居乐业。这正如杜弢在起义中所说的：他加入流民起义是“欲守善自卫”，等“天下小定”，西晋政府安抚他们：“颯颯十余万口，亦劳瘁于警备，思放逸于南亩矣。”就是说温良恭顺的 10 余万口巴蜀流民，想的是能够“放逸于南亩”，过天下平安的农民生活。因此“平难将军”杜弢起义军的斗争锋芒首先是指向欲杀尽流民的刽子手荀眺等人。起义军一开始就进攻长沙，捉拿荀眺。荀眺弃城南逃广州（郡名，治所在今广州市），起义军四出追擒，打败了湘州、荆州、广州等方面晋军的进攻，南破零陵（今湖南零陵北），北败宜都（今湖北宜昌市）、巴陵（今湖南岳阳），东击武昌（今湖北鄂城），击毙或

处死了长沙、宜都、邵陵(今湖南邵阳一带)、衡阳等郡的太守。起义军反对官僚地主残暴统治的“平难”斗争遍及荆湘。

面临流民起义的风暴,西晋统治集团忧虑不安,千方百计地平息和镇压。原来镇守襄阳的晋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的山简,此时已为王如起义军所逼,迁于夏口,采用“招纳流亡”的软的手法,企图平息流民起义。杜弢也曾采用“伪降”的办法受山简“招纳”,被委任为广汉太守。但是,杜弢的“伪降”只是为了避免晋统治者的武力镇压,是为了保存起义军的实力,实际是“真反”。镇守在建业的琅邪王司马睿立即派征南将军王敦、武昌太守陶侃、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甘卓共同进攻杜弢起义军。陶侃等率领 10 万水陆大军前往荆湘进行围攻,王敦屯军豫章为诸军继援。陶侃表面上向杜弢起义军宣布“赦书”,实际上继之以强大的军事“进讨”。杜弢起义军既没有受陶侃的“赦书”迷惑,更没有被陶侃等的强大军事威力吓倒。勇敢地迎接陶侃等晋军的挑战。

312 年至 314 年之间,荆湘地区的反晋斗争不断扩展。天门郡(今湖北天门县)的“夷”人袁遂,公开树起反晋旗帜,自称“平晋将军”,意欲平除西晋统治。晋荆州刺史王澄及其爪牙成都内史王机被杜弢起义军打败而逃。原牙门将胡亢聚众反于竟陵(今湖北钟祥县),自号“楚公”。原新野王司马歆的参军王冲举兵反于豫州,自号“荆州刺史”。原新野王司马歆的南蛮司马杜曾则引用王冲的反晋军队击杀了胡亢,自号“南中郎将”,领竟陵太守,投入了杜弢起义军。琅邪王司马睿想夺取荆州的统治权,派周颙代王澄为荆州刺史。但周颙一到荆州,建平郡(今四川巫山县)的流民傅密等立即起义,迎接杜弢起义军。杜

弼又派王真进袭沌阳(今湖北汉阳西南),周颙狼狈失败,退屯浔水城(今湖北黄梅县南),被起义军围困。318年8月,陶侃派部将朱伺、吴寄等率兵救援周颙,杜弼立即挥军东进,杀向武昌,焚烧城邑。周颙败退建业,杜弼也撤退到长沙。陶侃自以为打了胜仗,向王敦告捷。王敦以为“若无陶侯,便失荆州”,表请司马睿任用陶侃为荆州刺史,统领西阳(今湖北黄冈县东)、江夏、武昌三郡,屯军沌口。陶侃又疯狂进讨荆州地区的起义军。

陶侃首先进攻杜曾,杜曾以“骁勇绝人”、“勇冠三军”著称,投入杜弼起义军后是起义军的著名勇将。陶侃认为“此人不死,州土未宁”,313年10月便率军围攻杜曾于石城(今湖北钟祥县城)。当时,杜曾军中骑兵较多,便派人密开城门,用骑兵突破陶侃的军阵,从背后痛击陶侃军。陶侃大败,杜弼部将王真和杜曾合力乘胜进攻陶侃军。这时,杜曾已兼并了王冲的部众,势力强盛,便和王真先败陶侃督护郑攀于沌阳(今湖北汉阳县),又败陶侃部将朱伺于沔口(今湖北汉口)。在战斗中,起义军作战每每“轻易先至,大众在后”,战士三五成队,“更息更战”,勇敢奋战。水战时,起义军用桔槔打沉晋军船舰,常使晋军“军中失色”。陶侃之侄陶舆是陶侃军的“武卫将军”,以“果烈善战”著名,也被起义军重创身亡,陶侃号咷大哭说:“丧吾家宝!”陶侃的部将张奕也投奔起义军。陶侃只落得只身败逃,一度被免除官职。次年2月,杜弼部将王真又曾击败陶侃军。

315年春,晋愍帝进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司马睿的诸臣建议司马睿亲自进驻江州,集中精兵劲卒

全力消灭杜弼起义军。为了保存起义军实力，杜弼曾向司马睿请降。司马睿使前南海太守王运受降，任杜弼为巴东监军。但是，晋之官僚却继续进攻杜弼起义军，以求“殉功”。这激起了杜弼的无比愤怒，又举起起义大旗，杀死王运，继续进行反晋斗争。杜弼决定兵分两路，出击晋军。一路派遣部将杜弘、张彦等进攻临川内史谢擒，战于海昏，杀死谢擒，攻克豫章。另一路派部将王真率领精卒 3000 为奇兵，出武陵江，杀向武陵（今湖南西北部），联合五谿夷，以舟师断晋军官运，径向武昌。但是，两路起义军都受到陶侃等晋军的袭击，结果败退。杜弼、张彦一路，被晋寻阳太守周访战败，张彦阵亡，杜弘南奔临贺（今广西贺县）。王真等一路，被陶侃军败于巴陵，退回长沙。陶侃进攻长沙，315 年 8 月，长沙被晋军攻陷，王真投降，杜弼逃亡，死于途中。湘州也就被晋军占领。319 年（东晋元帝大兴二年）5 月，周访又在武当（今湖北均县北）战败和杀死杜曾，杜弼起义完全失败。

第五节 刘渊称汉反晋

当南方的流民形成起义的洪流时，北方的各族人民也燃起了反晋的燎原烈火。匈奴贵族刘渊是当时利用各族人民起义斗争而称汉反晋的著名人物。

匈奴人是古代的少数民族之一。公元前 52 年（西汉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率领所部属各族 5000 余落归附

汉朝，成为西汉王朝的臣民。东汉时期，这些匈奴部落又逐渐发展到塞内。公元50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匈奴乌珠留若鞮单于的儿子右奥鞮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入居西河郡美稷县（西晋时改为左国城，在今山西离石县北东），为东汉王朝镇守边境。当时，他们与汉族军民杂处，享受免纳赋税等优待。东汉末年，匈奴羌渠单于曾派他的儿子于扶罗率领匈奴部众助汉镇压黄巾起义。羌渠死后，于扶罗留在汉境，自立为单于。于扶罗死后，其弟呼厨泉又立为单于。三国时期，魏王曹操因为匈奴户口繁殖，人数增多，把匈奴部众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当时这五部的匈奴贵族也改用汉姓。如于扶罗的儿子就改姓刘，叫刘豹。他们之所以改姓刘，是因为汉高祖刘邦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以宗室女为公主嫁给匈奴冒顿单于，以后的匈奴单于就是汉朝刘氏皇室的外甥，汉朝又与匈奴结为兄弟，关系平等，所以他们冒姓刘氏。曹操就用刘氏匈奴贵族为五部帅，刘豹由匈奴左贤王改任为左部帅。

西晋初期，刘姓匈奴五部约共两三万落、10多万人，分居在五地：左部所统约万余落，居于新兴（今山西忻县）；中部约4000余落，居于太原兹氏（今山西汾阳县）；右部约6000余落，居于祁县（今山西祁县）；南部约3000余落，居于蒲子（今山西隰县）；北部约4000余落，居于新兴（今山西忻县）；中部约4000余落，居于大陵（今山西文水县）。与刘姓匈奴五部相邻的，还有呼延、卜、兰、乔、郝等其他姓氏的匈奴人。在这些匈奴人中，刘姓匈奴的势力量强，刘姓匈奴贵族的汉化程度最深，在匈奴人中的声威和号召力最大。西晋末年，他们便成为反对西晋司马氏统治的一支强大力量，刘豹之子刘渊，字元

海，是他们推崇的首领。

魏晋之际，刘姓匈奴贵族与魏晋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魏咸熙年间(264—265年)，刘渊曾以“任子”身份留居京都洛阳，司马昭对他十分优待。西晋初年，刘豹死，晋武帝司马炎以刘渊代父为匈奴左部帅。后来改五部帅为五部都尉时，刘渊又改任北部都尉。当时西晋统治者与刘姓匈奴贵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贵族的关系，一方面是跟他们在文化上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另一方面是对他们又存有戒心、歧视甚至压抑。

当时，西晋的贵人富室竞相崇尚使用匈奴等少数民族的“胡床貊臠”，常“为羌煮貊炙”。而匈奴等少数民族的贵族更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影响，采用汉语、汉字，学习汉族典籍，成了汉化的匈奴人。刘渊一家就是典型。刘渊的从祖、故匈奴北部都尉刘宣，是汉族名儒孙炎的学生。刘渊本人少年时就师事上党(今山西襄垣东)儒生崔游，学习《诗》、《书》、《易》等经书，博览《史记》、《汉书》等史书，尤其好读《春秋左氏传》和《孙吴兵法》等书。他自己要求做到文武全能。既富有文化，又努力学习武艺，“妙绝于众”，特别是射箭方面，膂力过人。连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王济等人，也称赞他有文武才干。

刘姓匈奴贵族虽已汉化，他们的文化也不低于汉族官僚，但其政治地位却不如汉族官僚高，经济特权也受到限制。西晋王朝虽然利用他们“以夷制夷”，让他们做匈奴人民的统治者，但又认为他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给他们实权、大权。刘姓匈奴贵族对此非常不满，他们说：“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侯王，降同编户。”匈奴族的劳动人民则更受到汉族

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和奴役。曹魏以来,不少匈奴人被汉族官僚地主作为“田客”,甚至掠为奴隶,视同牲畜。从西晋初期开始,一些失意的匈奴贵族先后几次鼓动匈奴劳动人民起来反抗西晋的统治,都被西晋政府残酷镇压下去。如 271 年(泰始七年),刘姓匈奴贵族右贤王刘猛兴兵反晋,进攻西晋的北方重镇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结果兵败被杀。294 年(元康四年),其他姓氏的匈奴人郝散又起兵进攻上党,杀长吏,入守上郡(今陕西榆林县),兵败降晋后被杀。其弟郝度元又于 296 年(元康六年)联合马兰地方的羌人和卢水地方的“胡人”举兵攻破冯翊(今陕西东部、渭水下游)、北地(今陕西富平、耀县一带)二郡。

在这些匈奴人进行反晋斗争失败之后,刘渊统领的匈奴人也曾叛晋。晋惠帝司马衷统治初年,刘渊曾被任命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为“汉光”乡侯。元康末年,刘渊部下的一部分匈奴人曾叛晋出塞,刘渊本人因此“坐部人叛出塞免官”。这是刘渊属部的匈奴人反晋斗争的先声。刘姓匈奴贵族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反晋斗争。

刘渊被西晋王朝免官以后,司马氏诸王之间的内战日趋激烈,李特、张昌等流民起义不断兴起,西晋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当时,夺取了西晋中央权力的成都王司马颖,升为皇太弟、丞相,镇守邺城,都督中外诸军事。他为了利用刘渊的匈奴部众帮助他反对东海王司马越等,便起用刘渊为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和太弟屯骑校尉,在邺城将兵。就在这个时期,刘姓匈奴贵族刘宣等积极策划复兴匈奴邦业的反晋斗争。他们密谋说:“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

共推刘渊为匈奴大单于。他们密谋后，即派其党呼延攸到邺城告诉刘渊。当时刘渊本想和呼延攸一起回到匈奴五部所在地举兵反晋，因为司马颖不让他走，便叫呼延攸先回去转告刘宣等招集刘姓匈奴五部，并引会宣阳（今河南洛宁东北）一带匈奴人，以支持司马颖之名，行反对司马氏之实。

304年（永兴元年）7月，东海王司马越等从洛阳带着晋惠帝北征司马颖。这时司马颖又给刘渊加官封爵，任命他为辅国将军，督北城守事。司马颖打败了司马越等的“北征”军，置晋惠帝于邺城后，又进刘渊为冠军将军，封卢奴伯。这时，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和安北将军王浚支持司马越，调动乌丸、鲜卑及汉人兵力10万余南伐司马颖。刘渊这时便以回左国城调动匈奴五部兵力消灭司马腾和王浚为名，乘机反晋。司马颖信以为真，又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这年8月，刘渊回到匈奴五部后，刘宣等立即尊刘渊为大单于，公开举起了反晋的旗帜。二旬之间，聚众5万，建都离石（今山西离石）。

刘渊在离石起兵反晋时，王浚派将军祁弘率领乌丸骑兵进攻邺城，司马颖大败，挟持晋惠帝南奔洛阳，转到长安。司马腾又请鲜卑首领拓跋猗它及其弟猗卢进攻刘渊。这时刘渊因为自己曾经答应过援助司马颖，于是准备派刘景、刘延年等匈奴人率领2万步骑征讨鲜卑。刘宣等认为匈奴人的仇敌是晋，应该联合鲜卑、乌丸反晋，不能攻打鲜卑、乌丸而援救敌人。他们劝谏刘渊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举兵反晋。那时晋朝纲纪未坏，右贤王反晋的大事未成，结果被杀。这应是我们大单于的耻辱。当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这是上天厌恶晋的统治，把天下授给我们。您大单于

身有积德，素为晋人信服，正当振兴我们匈奴人邦族，复兴先人呼韩邪的事业。鲜卑、乌丸正好可以援助我们，为何拒援助而救仇敌？现在上天想借我们之手打败晋朝，我们不可以违背天意。违背天意不祥，违背众心难以济事。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愿单于不要迟疑。”

刘渊早已看到司马氏诸王内乱使西晋王朝衰败腐朽，想乘机摧毁“乱晋”，建立一个新政权。但他不是要复兴匈奴先人呼韩邪归汉的事业，而是要继承汉的帝业。他考虑必须采用刘汉的名义，名正言顺地以汉取晋。

在这年 11 月，刘渊便迁都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远人归附者数万”。在南郊设坛祭天，建汉国，称汉王，置百官，年号元熙。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祭祀汉高祖刘邦以下三宗五祖的神位，宣布要为刘汉灭亡雪耻，消灭司马氏晋朝，重修皇汉帝业。

刘渊建汉以后，晋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派将军聂玄带兵进袭汉国，激战于大陵。结果晋军大败，司马腾只得率领并州 2 万余户吏民向东溃逃。刘渊乘胜向晋军发动进攻，接二连三攻陷太原郡的郡城晋阳（今太原市西南）、中都（今山西榆次县东），上党郡的兹氏、屯留、长子等县（今山西西南部），西河郡的介休（今山西西部）。305 年（永兴二年），司马腾又派兵征讨刘渊，结果刘渊反击司马腾取得四战四捷的胜利，司马腾败逃。刘渊又乘胜追击，司马腾无力抗击，求救于鲜卑拓跋猗佗，才免于败亡。刘渊的汉国，成为北方反晋斗争的最强势力。

就在这个时期，北方又出现了“王弥起青、徐，汲桑乱河北”的反晋斗争。当时，西晋的成都王司马颖已被东海王司马

越打败，废去了其皇太弟称号，被禁锢在邺城。司马颖的故将公师藩同情司马颖，反对司马越、司马腾，于305年夏自称将军，在河北兴兵数万作乱。司马颖的故将、马牧帅汲桑，这时与石勒率领牧人乘马牧苑（牧马场，今山东茌平县）数百骑投奔公师藩。阳平（今山东莘县）人刘灵，在公师藩自称将军后，也自称将军，聚众起事。306年（光熙元年）3月，东莱愷（音坚）县（今山东黄县西南）的县令刘伯根，自称“愷公”，聚众万人反晋。豪族出身、做过散吏的王弥，也率领家僮响应。刘柏根任用王弥为长史，王弥的从弟王桑为东中郎将，举兵进攻青州（今山东东北部）郡城临淄。青州刺史王浚派兵镇压，刘柏根兵败被斩，王弥等逃入海岛反抗，又被晋兵打败，逃入长广山（今山东莱阳县境）为“群贼”。

307年（晋怀帝永嘉元年）以后，王弥和汲桑、石勒的反晋斗争规模愈来愈大。王弥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权略颇多，弓马迅速，射箭臂力过人，青州人给他的绰号叫“飞豹”。307年2月，王弥引兵寇掠青、徐二州（今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自称“征东将军”，攻杀晋之郡守等官吏。汲桑、石勒继之而起。当时，公师藩已被晋军镇压，司马颖及其二子也在邺城被杀。汲桑打着“为成都王报仇”的旗号，自称“大将军”，任用石勒为“讨虏将军”，用“为成都王诛东海王越、东嬴公腾为名”，于307年5月进攻邺城。当时镇守邺城的司马腾，认为“汲桑小贼，何足忧也”，但很快就被汲桑攻破，狼狈逃出邺城，在途中被杀。汲桑攻下邺城，烧邺宫，杀万余人，又打回兖州（今山东西南部、河南东北部）。

在王弥、汲桑“毒流天下”的情况下，当时执掌西晋王朝大

权的东海王司马越急派兖州刺史苟晞等率领晋军讨伐汲桑、石勒，在平原（今山东平原县西南）、阳平之间进行了大小 30 多次战斗。307 年 7 月，司马越又从洛阳亲自带兵进屯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声援苟晞。8 月，汲桑、石勒被苟晞击败，准备投奔刘渊，又被晋军打散。汲桑逃回马牧苑。这时，原来跟随司马腾从并州东撤的并州大姓田兰、田甄等举兵为司马腾报仇，汲桑在乐陵（今山东乐陵县南）被斩。

在汲桑逃回马牧苑被田兰等杀掉的同时，石勒却逃往乐平（今山西东部），投靠上党的胡部大张弼督、冯莫突。当时张弼督等拥众数千人，石勒劝他们及早率众归属刘渊，说：“刘单于举兵诛晋，部大拒而不从，能够独立吗？”张弼督等也认为自己不能独立，便和石勒一起归附刘渊。

石勒，字世龙，初名弼，上党武乡（今山西榆林北）羯人。青年时，并州饥乱，被并州刺史司马腾掠卖到冀州为奴。他健壮有胆力，雄武好骑射，与马牧帅汲桑相识，利用汲桑的苑马，结聚了壮士“十八骑”为“群盗”。汲桑给他改掉原来的名字，以石为姓，以勒为名。石勒姓名从此而定。他曾表白自己的身世说：“勒本小胡，出于戎裔，值晋纲弛御，海内饥乱，流离屯厄，窜命冀州，共相帅合，以救性命。”307 年 10 月，当石勒和张弼督、冯莫突一起投奔刘渊时，刘渊非常高兴，封张弼督为亲汉王，冯莫突为都督部大，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石勒又拜张弼督为兄，改张弼督姓名为石会。石勒还用计使乌丸张伏利度率领 2000 部众也来归属刘渊，刘渊又给石勒加官，督山东征讨诸军事。

在石勒归附刘渊之后，王弥、刘灵等因为在青、冀一带被

晋军击败也投奔了刘渊。当时，王弥对刘灵说：“晋兵现在仍然强大，我们归无安身之处。刘渊过去曾在京师做过质子，我与他交往过，交情很深。他现在称汉王，我准备归附他。”刘灵同意。307年12月，王弥、刘灵来归附，刘渊喜出望外，说：“我之有将军，如鱼之有水。”任用王弥为镇东大将军、青徐2州牧、都督缘海诸军事，封为东莱公，任用刘灵为平北将军。

石勒、王弥等归附刘渊以后，刘渊成为北方各族反对司马氏统治的最高头目，便准备称帝，以汉取晋。在王弥等归附刘渊以前，刘渊的匈奴族臣属就曾建议刘渊由汉王改称汉帝。王弥归附刘渊时，又当面劝刘渊称帝。308年7月，刘渊把都城从左国城迁到蒲子，10月，正式称为汉帝。次年7月，又认为“蒲子崎岖，难以久安”。把都城迁到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刘渊认为，平阳是唐尧的旧都，“气象方昌”，定都平阳，既表示他是唐尧后裔刘汉帝室的继承者，又象征他的国力昌盛。从此以后，刘渊便以刘氏皇帝号召北方各族官民消灭司马氏晋室，用他自己的话说：“吾所欲除者司马氏耳”！

第六节 永嘉之乱

当刘渊定都平阳、“欲除”司马氏之时，洛阳的司马氏晋室正处于天下荒乱的“永嘉”之世。306年，白痴皇帝晋惠帝司马衷死了。307年，司马炽继为晋怀帝，改年号为“永嘉”。从永嘉元年开始，西晋政权更加衰落。晋怀帝徒具虚名，执掌晋廷大

权的东海王司马越滥施淫威，诛杀异己，晋怀帝无能为力，只有“叹息流涕而已”。各地官僚对晋室离心离德，“四方诸侯，多怀无君之心”。晋都洛阳孤立无援。在此情况下，洛阳的晋左积弩将军朱诞降奔刘渊，向刘渊陈说“洛阳孤弱”，劝刘渊进攻洛阳。刘渊认为消灭晋室的时机已到，当即任用朱诞为“灭晋”前锋都督，组织兵力向洛阳进军。

309年8月，刘渊派他的儿子刘聪和王弥为前锋，族子刘曜和赵固为后继，进军洛阳。开始时，刘聪的汉军连败晋军，节节胜利。打到洛阳附近时，刘聪“自恃骤胜，怠不设备”，结果被晋军夜间偷袭击败，只得退回平阳。

刘渊第一次进攻洛阳失败之后，又于同年10月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进攻。这一次刘渊派刘聪、王弥、刘曜和刘景等率精骑5万奔袭洛阳，又派呼延翼等率步兵为后继。这时洛阳的晋军，已经有所准备。当刘聪等率领的汉军进驻洛阳西城时，城内晋军千余人夜间出城袭击，杀死刘渊的征虏将军呼延颢。刘聪因首战失利，率军南屯洛水，呼延翼被杀，再战又失利。刘渊在平阳听说汉军失利，召刘聪还师平阳。但刘聪认为“晋兵微弱”，请求刘渊让他们留攻洛阳。当时，洛阳的晋军婴城固守。刘聪亲赴嵩山祈祭，祈求神灵助战，留下他的部将刘厉、呼延郎等督摄留军。洛阳城内的东海王司马越趁机派出3000劲兵，乘虚出击，大战于洛阳南城宣阳门，杀死呼延朗，刘厉赴水而死，汉军大败。刘渊只好召刘聪还师平阳。

进攻洛阳失利的第二年6月，刘渊在平阳病死，太子刘和继位。刘和“内多猜忌，驭下无恩”，同刘聪等发生了争夺帝位的内战，结果刘聪杀死了刘和，自立为帝。

刘聪，字玄明，刘渊的第四个儿子。他文武双全。年幼时，聪明好学，能精通经史，诵读《孙吴兵法》，兼综百家之言，又工隶书，善属文，著有《述怀》诗百余篇，赋颂 50 余篇。他还精于击剑武术，猿臂善射，膂力骁捷，冠绝一时。青年时期，他曾游学洛阳，广交文武名士，担任过成都王司马颖的右积弩将军。刘渊起兵反晋后，他是刘汉反晋的勇将，担任过刘汉的车骑大将军、大司徒，先后被封为后贤王、鹿蠡王、楚王等。他杀死刘和、自立为帝时，便改年号为“光兴”。这年 10 月，刘聪便派他的儿子河内王刘粲、从弟始安王刘曜以及王弥等率领 4 万大军进攻洛阳，又派石勒以骑兵 2 万与刘粲等会合。

当刘聪进军洛阳时，洛阳的晋廷惊恐万状。东海王司马越火急派出使臣“征天下兵入援京师”，晋怀帝亲自嘱咐使臣说：“为我告诉镇守各地的将领，今日京师尚可救援，晚了就来不及了！”但是，使臣派出以后，并没有援兵前来，征南将军山简、荆州刺史王澄虽然派兵入援京师，但都被当时在南阳起义、一时“称藩于汉”的王如所阻。晋都洛阳形势孤危，晋廷的不少官僚，主张迁都避难。而身为太傅、“专执权威”的东海王司马越，既反对迁都，又“无卫国之心”，假借出讨刘聪、石勒和镇集兖州、豫州兵力的名义，出镇许昌，把晋怀帝丢在洛阳。晋怀帝对他说：“今日胡虏侵逼郊畿，人无固志。朝廷社稷依赖于公，岂可远出以孤根本？”而他却认为自己离开京都出征能“幸而破贼，则国威可振”，比在京都“坐待穷困”为好，拒不听从晋怀帝的劝止。310 年（永嘉四年）11 月，他擅自率领洛阳之众 20 余万外出。身居宰辅之重的太尉王衍，也“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跟随司马越外走。洛阳城防空虚，官府无复守卫。饥

荒严重，“殿内死人交横，盗贼公行”。

晋怀帝因为司马越专权，又多违诏命，十分恼火，311年（永嘉五年）3月，下诏列数司马越的罪状，以征东大将军、表州刺史荀晞为讨伐司马越的大将军。司马越与荀晞“竟为暴刻”，相互火并，造成了西晋政府“公私罄乏，所在寇乱，州郡携式，上下崩离，祸结衅深”。司马越行军到达项县（今河南项城）时，“忧惧成疾”而死。跟随司马越的王衍被推为元帅，襄阳王司马范为大将军，统领部众把司马越的棺柩送往他的封国埋葬。石勒骑兵趁机追击，追至苦县（今河南鹿邑县）甯平城，晋军王公士庶10余万人全被歼灭，王衍、司马范等王公贵族被俘。与此同时，原来留守洛阳的司马越部将何伦等听到司马越死的消息，带领司马越的儿子及宗室三十六王自洛阳东走，奔赴司马越之丧，也在途中被石勒战败处死。

司马越、王衍等晋廷重臣离开洛阳出征，不仅没有能“破”石勒等所谓胡虏之贼，“振”西晋之国威，反而全军覆没，“祸难之极，振古未闻”。洛阳穷困不堪，百官纷纷流亡。晋怀帝不得不准备迁都仓垣（今河南开封市西北），但临行时又无警卫车马之备，抚手哀叹：“如何曾无车舆！”这年6月，刘聪派刘曜、王弥、石勒等围攻洛阳，晋军节节溃败，洛阳陷落。晋怀帝被生俘，皇太子被杀死，百官士庶死者3万余人。

刘氏匈奴贵族攻陷洛阳时，王弥建议汉国都城从平阳迁到洛阳，对刘曜说：“洛阳天下之中，山河四险之固，城池宫室无假营造，可徙平阳都之。”但刘曜认为“天下未定，洛阳四面受敌，不可守”，不宜作为刘氏汉国都城；同时，也不让司马氏重在洛阳恢复统治，于是抢走宫人珍宝，烧毁全部宫庙官府，

使“晋之宗庙鞠(生)为茂草,亦犹洪川东逝,往而不还”。

刘聪在攻陷洛阳之后,又派刘粲、刘曜乘胜进袭长安。当时“关西饥馑,白骨蔽野”,百姓存者百无一二。长安城内“仓库虚竭,士卒离散”。同年8月,长安又被刘曜攻陷,4000多家长安官员逃往汉中,驻在长安的南阳王司马模投降以后被杀。刘聪以刘曜为雍州牧,改封为中山王,镇守长安。

晋都洛阳、长安被刘聪攻陷,晋怀帝作为阶下囚被押到平阳。刘聪以西晋“八王之乱”为例,奚落晋怀帝说:“你家骨肉之间为何这样相互残杀?”晋怀帝只得卑躬屈节,奉承刘聪,说:“大汉将应天受命,所以我家为陛下自相驱除。这是天意,不是人事。”也就是承认汉应替代晋,他从晋帝降为汉臣。刘聪先后封他为“平阿公”、“会稽公”。西晋王朝的“国祚”一度沦亡,“胡人”统治了中原。史称“永嘉之乱”。这是中国古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大的“胡人”之乱。它使中原人纷纷逃亡江南,西晋王朝走向衰亡,其影响之大比后来唐代发生的安史(安禄山、史思明)之乱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七节 北方的抗汉 斗争及西晋王朝的灭亡

“永嘉之乱”中,刘聪的汉国虽然取得了“东平洛邑,南定长安”以及俘获晋怀帝的巨大胜利,但在汉国统治下的人民“归汉之志未专,思晋之心犹盛”。北方忠于西晋王朝的官僚地

主和有志之士，也纷纷起来“抗滔天之巨寇”，努力组织武装力量反击刘聪的汉军，力图“克复神州”，“兴复晋室”，光复刚刚“倾弊”的“中华”。在反击刘汉、兴复司马氏晋室的晋臣中，真正“以匡复晋室为己任”、取得胜利的，首推前安定太守贾疋。

贾疋，字彦度，武威人，曹魏太尉贾诩的曾孙。他少有志略，器望甚伟，“见之者莫不悦附，特为武夫之所瞻仰”。西晋末年，他曾任安定（今甘肃泾川西北）太守，忠直公正，因反对“贪横失百姓心”的雍州刺史丁绰而受到南阳王司马模的武力征伐。他一度逃往卢水（今甘肃中部），联合当地的胡、氏少数民族首领，击败了丁绰等暴吏，重返安定。长安陷落以后，冯诩（今陕西大荔）太守综琳、安夷护军翽允等逃到安定，贾疋便与索琳、翽允等高举“匡复晋室”的旗帜，起兵反击据守长安的刘粲、刘曜。贾疋被推为平西将军，率领氐、羌和汉族晋兵 5 万多人，打向长安。雍州刺史翽特、扶风太守梁综等，也率领 10 万晋兵响应。从 311 年 10 月到年底的 3 个月间，贾疋率领的晋军，与刘粲、刘曜的汉军进行了大小 100 次战斗，打进了长安雍城。晋军“兵势大振，关西胡晋翕然响应。”

当贾疋等在关西举兵兴复晋室的时候，豫州刺史阎鼎与司空荀藩等正同谋奉秦王司马邺入关。准备入据长安，“以号令四方”。

司马邺，字彦旗，晋武帝司马炎之孙，袭封为秦王。洛阳陷落前，拜为散骑常侍、抚军将军。洛阳陷落时，避难于荥阳密县，南趋南阳。豫州刺史阎鼎与荀藩带着他自南阳趋武关，次于蓝田。阎鼎派人告知贾疋，贾疋派兵迎卫司马邺进入长安雍城。凉州（今甘肃武威）刺史张轨及其部属听说秦王司马邺到

了长安，也“驰檄关中，共尊辅秦王”，并声言派遣数万步骑径趋长安，“翼戴帝室”。312年（永嘉六年）4月，贾疋等晋军全部收复长安，刘曜从长安掠走男女8万余口，败回平阳。八九月间，司马邺被贾疋、索疋等奉为晋怀帝的皇太子，在长安重建西晋行台、宗庙、社稷，登坛昭告于天，摄皇帝位。贾疋、索琳相继为雍州刺史，被推为重建晋廷的“盟主”。313年（永嘉七年）2月，晋怀帝在平阳因图谋反汉，被刘聪杀死。4月，司马邺在长安举哀成礼，继晋怀帝正式即帝位，是为愍帝，改元“建兴”。

晋愍帝为了“克复中兴”，先后以镇守在建康（今南京市）的琅邪王司马睿为侍中、左丞相、大都督，督陕东和中外诸军事，要他率所领精兵20万径趋洛阳，收复东都；以镇守上邽（邽音圭，上邽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南）的南阳王司马保为右丞相、大都督，督陕西诸军事，要他率秦、凉、梁、雍4州劲旅30万径指长安，保卫西都；以幽州刺史王浚为大司马，以并州刺史刘琨为大将军，要他们率幽、并2州劲卒30万直捣刘聪的统治中心平阳。但司马睿以“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为由，拒绝出兵。

为了扫除“司马家儿辈”在北方的统治势力，刘聪利用石勒的兵力进袭幽州的王浚，用自己的兵力袭击并州的刘琨和长安的晋室。

石勒在永嘉之乱以后的一段时期，采取流寇的方式“席卷兖（州）豫（州），饮马江淮，折冲汉（水）沔（水）”，有“雄据江汉之志”。他的部将也曾建议他“当破丹杨，定江南，尽生缚取司马家儿辈”。后来，他采用张宾的意见，挥军北上，决定扫平河

朔，进据邺城、邯郸、襄国（今河北邢台）等山河四塞、形势险胜之地，建立以襄国为中心的统治区。他占领襄国以后，上表刘聪，陈述他“宜镇”襄国之意。刘聪给他加以散骑常侍，都督冀幽并营 4 州杂夷、征讨诸军事、冀州牧、幽州牧、东夷校尉等官衔，进封为襄国上党郡公。他也就集中力量进袭王浚。

王浚，字彭祖，王沈之子。永嘉之乱以前，曾历任幽州刺史、乌丸校尉、大都督、督幽冀诸军事等重职，是西晋末年镇守幽州的重要将领。他为了“自安之计”，曾“结好夷狄”，把女儿嫁给鲜卑首领务勿尘、苏恕延，务勿尘曾任晋辽西郡公，其别部首领也曾任“亲晋王”，支持西晋政权，反对刘氏匈奴贵族和石勒。但在永嘉之乱以后，王浚却产生了自己当皇帝的野心，自称受皇帝之诏承置，设坛告类，建立皇太子，使他的儿子居于王宫。他当时虽“名为晋臣，实欲废晋自立”，伺机称帝。反对他僭号称帝的晋臣，都被他排斥或杀害。他和并州刺史刘琨争夺冀州地盘，打击刘琨势力，弄得两人“虽同名晋臣，实为仇敌”。他“为政苛暴”，滥征徭赋，“调发殷烦，下不堪命”。当时曾发生水灾，人民没有饭吃，他“积粟五十万斛而不振给”。他“矜豪日甚，不亲为政”，当时童谣说：“幽州城门似藏户，中有伏尸王彭祖。”幽州人民骂他形同“伏尸”。他的将吏也都“贪残”，侵占土地，掠夺民财，其中以朱丘伯（名硕）和枣嵩（王浚的女婿）为最。

在王浚的苛暴统治下，幽州“士人愤怒”，“百姓内叛”，鲜卑、乌丸族也“离式于外”。而石勒却利用王浚想当皇帝的心理，采用诈降手段，给王浚献珍宝，表示请降。王浚这时“众叛亲离，甲旅寡弱”，见石勒表示降附，也就不加防备。石勒便进

一步给王浚上表劝进,说:“伏愿殿下应天顺时,践登皇祚”。并约定于314年(建兴二年)4月初亲赴幽州给王浚“奉上尊号”。王浚的皇帝之欲薰心,信以为真。当石勒率领轻骑从襄国到达易水(今河北西部)时,王浚驻守易水的部将派人到幽州治所蓟城(今北京市东)报告,请求派兵阻击。一旁的将佐都说:“胡人贪而无信,必有诡计,请求出击。”王浚却大怒,说:“石公来,正是要奉戴我的;敢说出击的人,斩首!”并布置人盛宴招待石勒。

王浚对石勒来降如此轻信,而石勒对王浚却非常警惕。4月3日凌晨,石勒到了蓟城,叫开城门,深怕城内有埋伏,便先赶进几千头牛羊,扬言说是向王浚献礼,实际上是要堵塞住街巷。石勒入城后,纵兵大掠,王浚这才惊惶失措,但左右的人请求自卫反击,王浚还是不准。当石勒入居王浚中庭,王浚走出堂屋时就被石勒部众捆绑起来。石勒叫王浚的妻子和自己并坐,押王浚站在面前。王浚大骂道:“胡奴侮辱我,为何如此大逆不道!”石勒指责王浚说:“你官位很高,手握强兵,坐视国家覆灭,不去救援,想自称皇帝,不是大逆不道吗!又任用奸党,残害百姓,陷害忠良,荼毒燕土,这是谁的罪过呢!”王浚瞠目结舌。

石勒把王浚押到襄国。王浚企图跳水自杀未遂,被斩。他在蓟城的宫殿被烧毁,巨万资产被没收。朱硕、枣嵩之流也以“纳贿乱政,为幽州患”之罪被处死。王浚的精兵万人,也被杀掉。石勒封了王浚的头颅向刘聪献捷,刘聪以石勒为大都督、督陕西诸军事。

王浚被石勒消灭以后,刘聪便和石勒夹攻并州的刘琨。

刘琨(271—318年),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县东北)人,出身士族。他少负志气,有诗名,是“二十四友”之一;更有纵横之才,是范阳人祖逖的好友,两人都有反虜报国之志。刘琨听说祖逖被西晋政府选用,曾给亲故写信说:“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虜,常恐祖生(祖逖)先吾著鞭。”表达了他要争先为国灭虜的志气。永嘉之乱以前,他出任并州刺史,领匈奴中郎将。当时并州一带寇贼纵横,道路断塞,他不怕艰难辛苦,募得千余人与“胡寇”战斗,以少击众,冒险而进,转战到达并州治所晋阳,在“荆棘成林,豺狼当道”的环境中开辟了扶晋反汉的战场,联合鲜卑反击刘氏匈奴贵族。永嘉之乱以后,他在并州一带坚持“北捍殊俗,西御强虜”,表请鲜卑首领拓跋猗叵之弟猗卢部将戍守晋阳,刘琨自己据守阳曲(今太原市北阳曲镇),经常为代郡公,曾和猗卢及其子六脩等抗击过刘曜对晋阳的进攻,刘曜曾在汾东被六脩击败,身中七创逃归平阳。猗卢游击刘聪的汉军。晋愍帝在长安重建晋室以后,刘聪把刘琨与长安晋室并列为首敌,对刘曜嘱咐说:“今长安假息,刘琨游魂,此国家所尤宜先除也。”刘琨也表示要坚决与刘氏匈奴贵族战斗到底,向晋愍帝上疏表示“致命寇场,尽其臣节”,“没身报国”。当刘聪和石勒对刘琨实行夹攻时,刘琨又向晋愍帝上表说:“臣与二虜(指刘聪、石勒),势不并立”,表示誓死抗击虜寇,“陨首谢国,没而无恨”。

315年(建兴三年)二月,晋愍帝进刘琨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进猗卢为代王。当时刘琨抗敌卫晋的决心虽然坚强,但他的兵力却十分单弱。在刘聪、石勒两大强敌的夹攻下,他只能依靠猗卢的鲜卑兵力据守晋阳、阳曲一带,并逐渐

陷入“进退维谷，首尾狼狈”的困境。就在这时，刘聪决定由石勒围困刘琨，派刘曜率领汉军向长安方面大举进攻。315年8月，当刘曜准备进攻刘琨的驻地阳曲时，刘聪派人通知刘曜说：“长安未平，宜以为先”，要他掉转兵力直向长安。

从315年9月，刘曜转攻长安以北的北地（今陕西耀县、富平县境）、冯虺、上郡（今陕西北部）等郡县。长安方面的晋愍帝也急忙调兵遣将，布置防御，派领军将军麴允为大都督，到北地抗击汉军；命征东将军索琳为尚书仆射，都督宫城诸军事；要求关西的南阳王司马保派兵东援长安。

但是，这时长安方面的晋军，战斗力削弱。刘曜连陷冯虺、上郡，虺允率领的步骑3万也在北地不战而溃。316年（建兴四年）8月，刘曜汉军就长驱直逼长安。晋愍帝数次向关西的司马保征兵，但司马保的一些将吏则迟迟不肯出兵，甚至说什么“虺虺（蛇）螫（毒）手，壮士断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断陇道（切断甘肃通往长安的道路），以观其变。”对刘曜攻打长安采取观望态度。当时主张出兵支援长安的从事中郎裴诜针对“虺虺螫手，壮士断腕”的说法，进行驳斥说：“今虺已螫头，头可断乎？”司马保犹豫一阵之后，才派镇军将军胡崧带兵东往长安。

这时，刘曜已经攻陷长安外城，麴允、索琳等只得退守长安小城。而前来支援长安的州郡晋兵，都怕汉兵强盛而不敢前进。如散骑常侍华辑率领的京兆等四郡兵只东屯霸上，胡崧率领的城西诸郡兵也只屯于长安之西的遮马桥。胡崧与麴允、索琳等又都各怀鬼胎，互相妒忌。胡崧深怕西晋“国威复振，则麴、索势盛”，所以按兵不动。麴允曾想奉晋愍帝离开长安、西去司马保的驻地，索琳则怕司马保得到晋愍帝时“必逞其私

志”，要晋愍帝困守长安。刘曜汉军则紧紧围困长安外城。长安小城中饥荒极其严重，许多人饿死，晋军士卒纷纷逃亡，只有凉州前来支援的“义众”千人守城。长安太仓中的粮食都已吃光，连晋愍帝也没有饭吃。面临这种粮尽兵微、兵穷势极的穷途末路，晋愍帝哀叹说：“误我事者，麴、索二公也。”哭泣着对麴允说：“今穷厄如此，外无救援，当忍耻出降，以活士民。”

11月，晋愍帝派人给刘曜送去降书。当时刘曜的兵营在长安城东豆田壁，晋愍帝亲自到豆田壁向刘曜投降，西晋王朝从此宣告灭亡。

第三章

东晋王朝的政治 偏安和江南经略

第一节 东晋的 建立与“王马共天下”

公元 316 年，西晋王朝覆灭。它的末代皇帝、18 岁的司马邺被俘虏到匈奴人建立的汉国都城，受尽奚落和侮辱；第二年惨遭杀害。消息传到今天的南京，当时镇守江南的晋王司马睿悲痛不已。第二年农历三月，司马睿称帝，东晋王朝建立。

开国大典上，北方南渡的山东士族王导，可谓出尽了风头。做了皇帝的司马睿，嫌他站在陪列的百官中不够显眼就硬是要拉他共坐御床，接受百官朝贺。王导推让再三，对皇上说：“天子好比太阳啊！要是太阳下同万物，它又怎么能普照万物呢？”司马睿这才作罢。

虽然王导没有去坐皇帝的御床，但这件事却反映出他在这个新兴王朝中的特殊地位。当时的民谣说：“王与马，共天

下。”“马”是司马睿的简称，“王”就指王导，意思是说，在东晋朝廷中，王导是坐了半个天下的。

那么，王导的这一地位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来司马睿在晋皇室中要算个远支，祖辈父辈又不曾建树过什么功业，所以地位并不显要。公元307年他受命移镇江南，负责扬州一带的军事防御工作。初来乍到，南方的土族豪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并骂随他一同南下的北方人是粗鄙的“伧夫”，以至于到任后1个多月，当地官民中的头面人物，谁也不肯前来拜见他。

和司马睿同年、关系也很要好的王导，这时是他的主要助手，看到这种局面，心里十分着急。他深深懂得，司马睿要在江南站稳脚跟，没有当地土族出面支持是不行的；而要取得这种支持，最为紧迫的便是必须想方设法，尽快提高司马睿的地位和威望。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一场好戏开演了。

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是江南人民的传统节日。这一天，不分男女老幼，都要到附近的河畔水滨去祭祀，祈求神灵降福免灾，保佑风调雨顺，有个好年成。江南人称之为“禊节”。

王导一看，机会来了。这年禊节，他让司马睿高坐大轿，由一支威武的仪仗队护送着，浩浩荡荡地开来看热闹了。自己则和一批同是从北方南下的土族，骑着马，恭恭敬敬地尾随而至。江南土族代表人物顾荣、纪瞻等，看到这种盛仪，心里十分吃惊。他们从王导这帮北方土族恭谨的态度上，觉得司马睿原来还是受人尊敬的，于是也刮目相看，相约在路边拜见，纷纷表示归顺。

局面一打开，王导便进一步献计说：“古代贤明君主，没有

一个不讲究礼待父老乡亲的，何况眼前还是大业草创，得人心实乃当务之急。如果能将顾荣这般南方士族笼络好，江南人民一定会争着为你效劳。”司马睿当即称是，于是就让王导出面，回访顾荣等人，延聘他们出来做官。这样一来，司马睿在南方逐渐就有了威望，而王导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也就逐步形成了。

随着北方士族的不断南下，他们要重新置立产业，但南方比较富庶的地方早就被当地土族占有了。王导采用了“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为薄弱的地方，设立侨州、侨郡、侨县。这些侨寄行政区的设立，就必然要设侨官，而侨官一设，北方士族便有了政治出路。同时，他们可以利用北方逃难来到江南的劳动力，重新创立产业。这些措施，缓和了南北士族间的矛盾，有利于双方的团结。司马睿要恢复晋政权，也因此而具备了政治基础。

公元 311 年冬天，北方士族桓彝到江南避乱，看到司马睿势力单薄，心里不踏实，对名士周顛发牢骚说：“中原战祸连年，我到这里来避乱，是想求得安全的，想不到这里的力量如此薄弱，前途在哪儿呢？”不久，王导接见了，同他一起讨论江南形势。桓彝觉得王导很有办法，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几年后，太原士族温峤受人派遣，来到江南。他找到王导，诉说着西晋覆灭的惨祸，不禁声泪俱下。王导也深表痛心，他对温峤谈了自己对晋室恢复的一些看法，温峤听了，立刻转忧为喜。可见王导在北方士族中是很有影响的，他们高兴地称他是春秋时代的齐相管仲。管仲能使齐桓公成就霸业，他们相信，王导也能帮助晋王司马睿复兴晋室。

东晋王朝的建立是与王导的努力分不开的；由此也不难明白，开国大典的那一天司马睿为什么要拉他共坐御床了。

王导没去坐御床，就做了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深受司马睿的信任。

6年之后，王导堂兄王敦起兵叛乱，王导辅佐明帝司马绍平息了这场叛乱。王导在明帝驾崩之后，仍受遗诏辅佐幼主成帝司马衍，直到公元339年病死。

第二节 东晋的门阀士族政治

一、门阀制度

我国古代达官贵人家的大门外有两根柱子，左边的叫“闾”，右边的叫“閭”，经常用来榜贴本户的功状。闾、閭成了做官人家的一种标志。因此，封建社会里世代为官的人家，又称闾閭、门阀士族或世家大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选用官吏专看家世出身，门阀士族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成为世袭官僚。他们又通过大族之间互相联姻，在统治阶级内部构成了一个门阀贵族阶层。这些人不但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而且还划定一整套维护门阀特权的等级制度，和庶族地主严加区分，叫作“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是世家豪族政治、经济势力高度发展的产物。

它胚胎于东汉，确立于魏晋，而到南北朝时臻于极盛。在这种制度下，家世声名是衡量身份的最高标准。只有那些祖辈有人做过大官，名望很高，而且代代相传都做大官的人，方被承认入于士族。士族中间也有差别。一般来说，族人能长期保持上品官级的，是为最高一层，称为“右姓”、“茂姓”。如，东吴地区的朱、张、顾、陆四族；原在北方，随晋室东渡的王、谢、袁、萧四族；山东的崔、卢、李、郑四族；太原王氏家族；关中的袁、裴、柳、薛、杨、杜六族，都是右姓大族。他们不但在本地区“郡望”最高，而且是“四海通望”，被天下所共认。其他大族虽然也在士流之内，但已是等而下之了。这些士族特别关心的是，如何才能永远保持自己优越的门第族望，保持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地位。为了保持他们高贵的血统，讲究门当户对的婚姻，只许在同等士族之间联姻，而绝对不许与庶族通婚。如果“婚宦失类”，就会受到士族群起非难。南齐时东海人王源，他的曾祖曾任尚书右仆射，父、祖和本人的官职也很高，当然属于士族范围之内。但是由于他把女儿嫁给“姓族士、庶莫辨（分不清）”的富阳满氏，便被其他士族地主认为玷辱了同类，引起舆论大哗。当时的御史中丞沈约，还为此上表弹劾，坚决要求皇帝，革除王源官职，剔出土流，“禁锢终身”。

还有一种保持特殊身份的办法，就是编撰“家谱”，把士族的世系源流明确记载下来，以备查考。政府命官取仕，“必稽（查）族谱而考其真伪”，以防庶族假冒。宋、齐之后，政府往往设立专门的“谱局”，找那些精通士族族谱的人专司其职。不熟悉谱学的人，就不能在吏部任职。于是，谱牒百氏之学竟然成了一种专门学问而兴盛起来。

士族为了标榜自己的特殊身份，还发展了一套繁琐的礼法。例如，当时在士流官宦中间，流行一种避家讳的风气。在这些人面前，绝对禁止说他祖辈任何一个人的名字，连声音相同的字眼也不能用，必须找其他义同音不同的字来代替。否则，就触犯了士族地主的忌讳，认为是有意侮慢。东晋时王忱去拜访太子洗马桓玄（桓温之子），桓玄设酒款待。王忱因为刚吃过寒食散，忌饮冷酒，连呼左右温酒来，不意触犯了桓玄父亲桓温的名讳。桓玄感到受到很大耻辱，又不敢得罪这位望族，竟在酒席上伤心的“呜咽流涕”。要在士流的大量社交活动中，不犯别人家讳，确实很难作到。居然也有人由于熟谙谱学，可以作到“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这也是门阀制度之下，才能出现的一种畸形现象。

在平时生活中，士族一般不与庶族人士来往，即使有时接触，也自矜门第，鄙薄寒流，故意造成“士、庶天隔”的局面。南朝宋武帝的皇舅路庆之出身寒微。有一次他的孙子路琼之去拜访名门望族王僧达。王僧达故意奚落他，先是“了不与语”，后又讥问：“昔日我家养马的仆役路庆之，是你什么亲戚”。后来还喝令左右，把路琼之坐过的胡床烧掉。路太后听说大怒，到皇帝面前哭诉。宋武帝也只能回答：“琼之少不更事，何必没事到王家去，自取受辱。人家王僧达是贵公子，哪能为这样事轻易问罪？”只好不了了之了。士族严格排斥庶人寒流，使两者的身份地位相差悬殊。以致连皇帝之尊，也难以出面干预，为出身卑微的皇亲贵戚撑腰。

陈腐僵化的门阀制度，是封建等级制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既反映了世族权势的恶性膨胀，又标志着门阀贵族已经完全

失去活力，正在走向最后的衰朽没落。

二、东晋的士族政治

在南北世族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东晋王朝，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代表着世族地主的利益。东晋的第一任宰相王导为政务求清静，他所确立的统治政策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作为这一政策的积极方面是清静无为，以宽民力。318年3月，司马睿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就下过一道诏书，要求各级官吏“同心戮力，深思所以宽众息役，惠益百姓”。就是说要减轻些对民众的赋税剥削和徭役负担。这主要表现在东晋前期（383年淝水之战前）实行的土断、度田和禁止霸占山泽等方面。这里，更多的是冠冕堂皇的言词。但是，这一政策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要让南北世家大族，在相互牵制下安稳地发展他们的势力，政府对他们不加干涉和抑制。

王导在司马睿称晋王时，拜右将军、扬州刺史。他曾派属官到扬州各郡去考察治绩。属官回来向王导汇报郡太守治绩的得失时，只有属官顾和不说话。王导问他听到什么没有？顾和回答说：你作为国家的首辅，宁可使吞舟大鱼漏网，又何必计较地方官的好坏，以察察为政。王导称赞他说得对。在王导辅政的晚年，对政事更是不予过问、干涉，下面送上来审批的簿籍、文书有时不打开就加以批准，并且自叹说：“人家说我糊涂，可将来总会有人称许我这种糊涂的。”

事实上，王导并不糊涂，他的“糊涂”，也就是宽纵豪强，是由东晋政权的阶级性质决定的。东晋政权是西晋政权的继续，

它继承了西晋政权的全部腐朽性，即使在东晋开国之初，也没有显出多大的新气象。司马睿还在做镇东将军的时候，有一个从河南豫州避难南下的低级士人陈頔，被人推荐作他的军事参谋。陈頔写信给王导说：西晋王朝之所以倾覆，正是因为用人不当，看门第不看真才，重虚名不重实用，因此政事日坏，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现在应该改弦更张，赏罚分明，拔擢贤才，共图中兴大业了。王导不听他的劝告。司马睿称帝后，陈頔看到新朝廷的一些官员，只顾贪图安逸，不管职事，又对晋元帝说：现在官员都继承西晋时的积弊，看来前车已经倾覆，后车仍不知戒鉴。晋元帝也不听他的劝告。陈頔出身孤寒，又屡发正论，东晋朝士多厌恶他，最后被贬逐到外地去作郡太守。

东晋政权不仅代表北方南下的世族地主，而且也代表南方土著的世族地主，南方土著的世族地主，如吴郡顾氏、陆氏、义兴周氏等，从东吴以来就是“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拥有众多土地和部曲的大地主。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不仅不能侵犯，而且必须加以尊重。东晋建国之初，王导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争取南方世族地主对东晋政权的支持。他不仅通过拉拢“南土之秀”的顾荣、贺循、纪瞻、周鸞等，使东晋政权在南方站稳了脚跟；而且他的从政务求清静，目的也在于力图弥合南北世族地主在掠夺土地和占有劳动人手方面必然产生的矛盾。

东晋继王导之后另一个有名的“风流宰相”是谢安。他在孝武帝时执政，效法王导，为政“去其烦细”、“不存小察”；他不许搜索被豪强窝藏的流民，甚至认为：“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

京都？”整个东晋王朝，在王、谢、庾、桓这些世家大族的相继统治之下，不仅南方土著的世族地主，继续在那里扩充他们的政治、经济势力；而且大批从北方南下的“亡官失守”之士，在东晋政府的宽纵、支持之下，也在南方恣意抢夺土地，占夺流民为部曲、佃客和奴婢，为自己创立新的产业。如渤海刁协，南渡后居于京口（江苏镇江市），晋元帝时，官至尚书左仆射（相当于副宰相），为元帝心腹股肱之臣。他的孙子刁逵及兄弟子侄均不拘名行，专以货殖为务，在京口有田地上万顷，奴婢数千人，霸占着京口的山山水水，被称为“京口之蠹”。从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南迁的谢氏，是掌握东晋朝政大权的四大士族之一，他们在寓居地浙东会稽占有的田地产业，更是相当可观的。如谢混的父、祖射琰、谢安，世居宰辅，有田业 10 余处，僮仆千余人。刘宋时期的谢灵运，是东晋北府兵名将谢玄之孙，他“因父、祖之资”，也拥有众多的田地和奴僮，仅“义故门生”（指那些投靠大士族地主门下的人和旧时的属官）就有数百名。王导的从子、大书法家王羲之，也是一个拥有很多产业的大士族地主。他在写给谢万（谢安之弟）的信中，声称要与谢万东游山海，经营田地。这说明从北方南下的王、谢等大士族地主在浙东一带是占有大片土地和拥有相当数量的奴僮的。当时江南地区的万顷江湖，都逐渐被南北豪族地主霸占，老百姓在江、河、湖泊里捕鱼捉蟹，钓竿和网罟被豪族地主劫夺，“不输十匹，则不得放。”

在政治上，南北士族地主在东晋享有种种特权。

士族中的高门士族子弟，年满 20 岁，不经选举，便可以作秘书郎、著作郎、员外散骑侍郎这一类既优闲又有发展前途的

官,作为政治上升迁的进身之阶。其中秘书郎一职,照例居职数十日或百日便得升迁。因此,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这样的谚语。就是说,即使是怀里抱着上车的婴儿,不管他将来才能和学识如何,就已经被赋予了著作郎和秘书郎一类的官衔,反映出士族地主在政治上所处的优越地位。

士族地主即使触犯刑律,构成犯罪,也可以免于追究,任其逍遥法外。东晋初年,首都建康曾经发生一起偷石头仓米 100 万斛的大盗窃案,主犯都是一些有名望的豪强大族,可是,在东晋政府的包庇、纵容下,处理这一案件时,却把石头粮仓的“督监”,拿来斩首示众,以推脱罪责。

整个东晋王朝,法禁宽弛,纲纪不立,豪强大族都挟藏户口,作为私人的荫户。东晋初年,山遐作浙江余姚县令,上任只有 80 天时间,就清查出来被豪强大族挟藏的荫户达 1 万余户,如果每户以 5 口计,即达 5 万多人。县里有个大族叫虞喜,因为挟藏大量荫户,应该判处死刑。山遐准备对虞喜绳之以法,但却引起了余姚县豪强对山遐的切齿痛恨。后来,这件事情报告到了执政的王导那里,得到的答复是:因为虞喜屡经推荐,不出来做官,有高风亮节,不应受法律的处分。不仅如此,豪强们反而捏造山遐的种种罪名,构陷其罪。山遐在写给会稽(今浙江绍兴)内史何充的书信中,要求何充为他向上面说情,再留任 100 天,狠狠地惩治一下违法的豪强大族,然后自己再去受法。何充为山遐作了申诉,但没有得到同意,山遐终于被罢官。

山遐在余姚县只用 80 天时间就清查出来豪族挟藏如此众

多的户口,这在东晋并不是个别现象。成帝时,宰辅王导死,成帝的舅舅庾冰辅政。他担任中书监、扬州刺史时,采取较王导辅政时严厉的措施,通过检查户口,查出扬州地区没有登记户籍而成为豪强大族荫户的也达1万多人,庾冰把他们全部编入政府的军队之中。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在东晋政府的宽纵、庇护之下,南北世族豪强拥有种种特权,他们可以所欲为,而不受法律的制裁。

第三节 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

一、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及斗争

东晋政权虽然是在南北世族地主的共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它主要依靠的是北方南渡的世族地主。北朝士大夫颜之推在《观我生赋》的自注中说:中原士族随晋元帝司马睿渡江的约有100家。因此,江东有所谓百家谱。这100家中原士族地主,是东晋王朝最主要的依靠力量。

在东晋朝廷中,南渡的世族地主充居显位,掌握大权。如支撑整个东晋政局的王、谢、庾、桓四大士族,都是从北方南渡的世家大族,他们在当时政治上的势力,大大超越于江东世族地主之上。江东世族地主,如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贺循任

太常(管礼仪的官)、丹阳秣陵(今南京市)人纪瞻、吴郡(今苏州)人陆晔为侍中,都只是具位虚名。他们在朝廷中,实际上是被北方南渡的士族地主所驾御的。对于这种状况,南方的士族地主十分反感。因为在他们看来,以司马睿为首的北来“亡官失守之士”,不过是一批高级难民。东晋建国之初,王导为了联络南方士族,常常说吴语,结果遭致北方士族的批评,说王导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求婚,陆玩辞谢说“小土丘上长不了松柏,香草、臭草不能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的先例。”又一次,陆玩曾去王导家吃酪(北方食品)得病,回家后写信给王导说:“我虽是吴人,却几乎做了‘伧鬼’(南人轻视北人的称呼)。”北方士族轻视吴语,实际上是轻视南方士族;南方士族不愿和北方士族通婚,称他们为“伧子”、“伧鬼”,也是瞧不起从北方逃来避难的中原士大夫。北方士族在东晋朝廷中驾御吴人,在政治上产生的结果是招致南方士族的怨恨。

在经济上,南渡的北方士族连同他们的宗族、乡里、宾客、部曲也以寓居于首都建康所在地的扬州地区为最多。这又造成南北士族在土地占有上产生很大的矛盾。东晋初年发生的义兴豪族周玘图谋举兵发动政变的事,正是南北士族地主集团矛盾的一个反映。

周玘字宣佩,义兴阳羨人(今江苏宜兴县),士族地主出身,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是江南数一数二的豪强大族。祖父周鲂,吴鄱阳太守。父周处,从小纵情肆欲,不修品行,被当地百姓视为“三害”(即猛虎、蛟龙和作恶的周处)之一,后来改恶从善,励志好学,仕吴为东观左丞。西晋时担任过新平太

守(今陕西彬县),由于“抚和戎狄”,与少数民族关系搞得比较好,因而受到老百姓的称赞。西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随梁王司马彤在镇压关中地区氐人齐万年起义的战争中,被起义军打死。周玘为人刚强坚毅,名重一方。他在西晋末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曾经为西晋王朝“三定江南”。

303年(晋惠帝太安二年),长江、沔水之间,爆发了义阳蛮张昌发动的流民起义。起义军的一支在封云、石冰的统率下,东向攻下徐州和扬州,晋扬州刺史陈徽出奔,石冰据有整个扬土,声势十分浩大。以周玘为首的江东士族共推“东吴四姓”之首的吴兴太守顾秘为都督扬州九郡军事,起兵斩杀石冰所置吴兴太守区山及诸长史,并与晋将陈敏合兵攻石冰于建康,石冰被迫北走,投奔徐州的封云。由于封云的司马(掌管军事的武官)张统的叛变,斩杀封云、石冰以降,于是徐、杨2州的起义,在江东世族地主的直接参与镇压下,被平息下去。这就是“一定江南”。

西晋的合肥度支陈敏字令通,庐江(今安徽霍丘西)郡人,他原是一个普通的郡吏,由于办事有能力,被西晋政府任命为尚书仓部令史。301年(晋惠帝永宁元年),赵王司马伦杀死贾后,篡夺了惠帝司马衷的皇位,齐王司马冏联合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起兵反对司马伦,双方在京城洛阳附近激战60多天,死亡甚众,造成京师仓廩空虚。陈敏建议说:“南方米谷已积数十年,快要霉烂了,何不把南方的米谷漕运京师以济困急呢?”朝廷接受了他的意见,于是以陈敏为合肥度支,又迁广陵度支,负责转运南方米谷至洛阳。他在配合周玘等镇压石

冰起义后，又以军功，升迁广陵相，转右将军。当时中原战乱，陈敏便图谋割据江东。305年（晋惠帝永兴二年），他收兵占据历阳（今安徽和县），并勾结从洛阳东归的吴王（晋武帝子司马晏，太康十年封）常侍、丹阳人甘卓，假传皇太弟司马炽之命，自封为扬州刺史。西晋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太守王广等都弃官奔走，陈敏又派兵南取江州，东略诸郡，据有整个吴越之地，更进而自封为都督江东军事、大司马、楚公。为了拉拢江东世族地主以建立割据政权，他任命江东首望顾荣等40余人为将军、郡守。顾荣、周玘等江东世族地主因陈敏出身寒微，“七第顽冗，六品下才”，不愿拥戴他为江东之主，与西晋征东大将军刘准取得联系。令刘准遣军临江，周玘、顾荣等在江南起兵呼应，又密使陈敏同党甘卓倒戈，终于斩杀陈敏于江乘（今江苏句容北）。这就是“再定江南”。

在讨平陈敏割据江东的过程中，吴兴人钱玠因起兵讨伐有功，被东海王司马越任命为建武将军，令其率军救援洛阳。钱玠进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听说匈奴贵族刘聪已经攻逼洛阳，恐惧不敢前进，便杀死西晋度支校尉陈丰（负责运送粮食的武官），焚烧粮仓，自称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立吴主孙皓子孙充为吴王。继而杀死孙充，率兵渡江而南，进攻义兴。周玘又率领乡里义众，讨斩钱玠，传首建康。这就是“三定江南”。

由于周玘“三定江南”，稳定了江东政局，才使东晋政权在江南得以建立，因此周玘是有大功于晋皇室的。但是司马睿疑忌周玘宗族强盛，人情所归，命他出任为吴兴太守，主要依靠南渡的中州士人来辅佐他的王业（当时司马睿的头衔还是镇东将军）。周玘内怀怨望，又为在司马睿身边掌权的北方大族

刁协所轻侮，因而便与镇东将军祭酒、东莱（今山东掖县）王恢（也为北方士族周玘所侮）密谋发动政变，诛杀执政的北方大族。当时他们与寓居淮泗地区的流民首领夏铁取得联系，令夏铁在淮泗起兵时，他们便在三吴响应。313年（愍帝建兴元年），夏铁聚众数百人准备起事，晋临淮太守蔡豹斩杀夏铁，计谋泄露。王恢惧奔周玘。周玘不得已杀死王恢，把他的尸体埋于猪牢。司马睿知道这一情况后，秘而不宣，召周玘为镇东司马，周玘还未到任，又改授建武将军、南郡（今湖北江陵）太守。周玘刚南行至芜湖，司马睿又调他为军谘祭酒。周玘忿于司马睿的反反复复，又知道自己的计谋已经泄露，终于忧愤恚怒而死。临死时，他对儿子周勰说：“我是被北方南渡的‘伧子’们气死的，能为我报仇的，才是我的儿子。”

周勰秉承父志，暗中联络吴兴郡功曹徐馥，图谋以叔父周札的名义，纠集江东士族地主势力，以讨王导、刁协为名，举兵反抗朝廷。当时徐馥先行发动，攻杀吴兴太守袁琇，众达数千人，准备奉周札之主；周勰族兄周续在宜兴起兵响应；孙皓族人孙弼也起兵应于广德，“豪侠乐乱者翕然附之”。然而周札因徐馥等冒昧起兵，估计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便把周勰的阴谋告知义兴太守孔侃，于是徐馥、孙弼、周续都被杀害，周勰酝酿发动的武装暴动便完全归于失败。但作为发动叛乱的首脑人物周勰，司马睿以“周氏奕世豪望，吴人所宗”，却没有加以追究，仍然抚之如旧。

322年，江、荆二州刺史王敦为了清除在司马睿身边掌握大权的刘隗、刁协、周颢等士族势力，在武昌起兵后直扑建康。当时周札负责建康石头城的水陆军事，王敦举兵攻石头城，周

札开城门接应，不战而降，王敦攻进建康，杀死戴渊、周顛、刁协，刘隗逃奔石勒。这一招，实际上是周札用支持王敦清君侧的手法做了周玘父子所要干的事。由于周札迎王敦入建康有功，王敦封周札为光禄勋，寻补尚书，不久又迁右将军、会稽内史，周札兄子周懋、周蒞、周赞、周缙、周勰等并居显位，一门五侯，“吴士贵盛，莫与为比”，因而又引起权臣王敦的忌惮。王敦通过其心腹钱凤的拉拢，与吴兴大族沈充深相勾结，谋灭周氏。

当时有个道士李脱，以妖术惑众，自称 800 岁，故号李八百，从中原来到建康，“以鬼道疗病，以署人官位”，当时很多人信奉他。他的弟子李弘也聚众养徒，制造“应讖当王”的舆论。王敦便指使庐江太守李恒告发周札叔侄与李脱图谋叛乱，借机在他军营中杀死担任谏议参军的周蒞及李脱、李弘，然后又派沈充率兵袭杀驻军会稽的周札，尽灭周氏。后来王敦失败，王敦死党沈充败归吴兴，为其故将吴儒所杀。江东之豪的周、沈二族在东晋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同归覆灭。

义兴周氏虽然被消灭了，但是周氏整整两代人的反抗，不能不震惊以司马氏为首的东晋统治集团。为了东晋王朝的长治久安，不能不对统治集团内部南北士族集团的关系作一番调整。停止对抗、嘉、湖流域土地的争夺，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于是以王、谢为首的北方世家大族，连同其宗族、宾客、乡里、部曲，纷纷到浙东会稽一带落籍定居。会稽的南方土著士族如虞氏、孔氏、贺氏，远不如太湖流域的顾、陆、朱、张以及吴兴的丘、沈诸族势力强盛。王、谢等北方世家大族在这里发展他们的经济势力所遇的阻力比较小，因此，王羲之、谢安等东

晋名士都“筑室东土”，在这里发展封建庄园。有的北方士族如林、黄、陈、郑四姓，还进而把势力发展到闽东地区。南北两大士族集团便从地域上各自划分了发展经济势力的范围。

但是，在政治权力的分配方面，无论整个东晋王朝，抑或后来的宋、齐、梁诸朝，南方士族比起北方士族来，总是稍逊一筹。南齐萧道成想任用吴郡张绪为尚书右仆射（相当于副宰相），征求王俭（王导五世孙）的意见，王俭回答说：“南方士族向来很少有人担任这个职务的”。当时褚彦回（晋太傅褚裒后代，北方士族）在座，提醒萧道成说：“江左用陆玩、顾和，都是南人”。王俭回答说：“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于是张绪终于没有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又齐武帝萧赜对沈文季（吴兴武康人）说：“南方士族没有人担任仆射的官，已经好多年了。”沈文季回答说：“南风不竞，非复一日”。可见南方士族在政治上的待遇还是不如北方士族，难怪南齐时吴兴乌程人丘灵鞠曾经愤恨地对人说：“我应该回去掘顾荣的坟墓。江南地方数千里，是人才辈出的地方。顾荣忽然把北方士大夫引来。妨碍我们的仕途，真是死有余辜”。

尽管这样，周玘父子对东晋王朝的反抗，还是使当时的实际掌权者心有余悸的。他们不能不自我克制，作出些轻微的让步，以缓和相互之间的矛盾。南北士族集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共同维护着东晋王朝偏安江南的局面。

二、王敦之乱

东晋初年，皇权微弱、皇室凋零。元帝司马睿依赖王导、王

敦兄弟的扶持，君臨江南，但中央和地方的大權主要控制在王氏家族的手中。王導居中為相，身兼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事、散騎常侍和揚州刺史。王敦則統領東晉當時實有的江、揚、荊、湘、交、廣 6 州，任都督 6 州諸軍事、江荊 2 州刺史。王氏群從兄弟如王廙、王舒、王彬等人，無不擔任中外要職。王敦起初還極力矯飾，雅好清談，不言財色，裝出一副君子面孔，等鎮壓荊州流民起義後，便原形畢露。他自恃身居強藩，手控強兵，又有大功，再不把元帝放在眼里，擅自委任將軍，甚而“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

元帝不甘充當傀儡，對王敦的專權跋扈，漸漸不能容忍，對王導也有意疏遠。他重用親信刁協為尚書令、劉隗為侍中掌握朝政，加強皇權，推行“以法御下”、排抑豪強大族的政策。王敦見此，十分不滿，憤恨之情形於聲色，乃上疏元帝，為王導鳴不平，指責元帝背棄“管鮑之交”。又每每酒後歌詠曹操樂府詩云：“老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一邊歌詠，一邊以手中的玉如意打擊唾壺為節拍，壺沿被打得盡是缺口。太興三年（320 年），湘州刺史甘卓調任梁州，王敦提出由他的部屬陳頌為湘州刺史，元帝不從；王敦又建議以宣城內史沈充出任，元帝知沈充是王敦一黨，仍然不從，而任命宗室譙王司馬承出鎮湘州，矛盾由是加深。王敦上表議論古今忠臣受到君主的猜嫌，都是因為有小人如蒼蠅從中播弄是非。元帝讀了王敦奏表，內心更加疑忌不安。太興四年（321 年）七月，元帝以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冀雍 6 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 4 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陽，征發揚州百姓的奴、客當兵和承擔轉輸之役。這一措

置对外声称北伐，实际上用以防备王敦。这时，王敦遣使邀甘卓一起举兵，令沈充还乡里纠集部众，正在加紧进行起兵的准备。

永昌元年（322年）一月，王敦以诛刘隗为名，从武昌起兵，直指建康。沈充立刻从吴兴起兵响应。王敦叛逆的消息传到建康，朝野的反应不一。元帝大怒，召还戴渊、刘隗护卫京师。刘隗、刁协主张尽诛王氏，元帝不许。王导诚惶诚恐，每天早上率领宗族 20 余人到台城待罪，但心里却默许王敦之举。大多数士族官僚因征发奴客以充兵吏等“刻碎之政”损害了自身的利益，故反对刘、刁，同情王导，对王敦进逼建康持观望态度。三月，元帝以王导为前锋大都督，派王廙去劝王敦罢兵，王敦不听，留下王廙不遣送回来。于是，元帝始令刁协督率中军，令刘隗守金城、征虏将军周札守石头城，又派太子右卫率周莛统兵讨伐沈充。王敦军至石头城，周札开门接纳。戴渊、刘隗、刁协、周颢等领兵反攻，都被王敦打得大败。元帝见败局已定，给刁、刘人马，让他们各自避难，刁协逃至江陵被杀，刘隗北奔石勒。

王敦控制建康后，杀死戴渊、周颢以立威，元帝授予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江牧，封武昌郡公。王敦有篡权之意，但是，即使是赞同王敦举兵的士族官僚如谢鲲、王峤、温峤及王敦的从弟王彬等，都反对王敦篡夺东晋政权。王敦只得暂时返回武昌，徐图再举，而设丞相留府于建康，以遥控朝政。是时，王敦暴虐恣睢，作威作福，四方上贡多入其府，将相方镇皆出其门，以沈充、钱凤为谋主，大兴土木，营造府第，夺人田宅，肆意掳掠。此年，元帝忧愤而死，太子司马绍继位，是

为明帝。

太宁元年(323年),王敦移镇姑熟(今安徽当涂),自领扬州牧。为加强王氏的军事实力,削弱帝室,他又任王含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王舒为荆州刺史,监荆州沔南诸军事;王彬为江州刺史。当明帝用郗鉴为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时,王敦另授以尚书令,郗鉴还京途经姑熟,王敦却久留不遣。次年,王敦以周氏宗族强盛,恐为后患,听从钱凤之计,杀周嵩、周莛,又进兵会稽袭杀周札,周氏宗族死亡殆尽。五月,王敦病重,矫诏拜其子王应为武卫将军、兄王含为骠骑大将军。钱凤问对策,王敦说:“我死之后,归身朝廷,保全门户,是上策;退还武昌,收兵自守,不废贡献,是中策;乘我还活着起兵,万一侥幸而胜是下策。”钱凤以为王敦所说的下策才是上策,积极准备叛乱。

明帝聪明有谋略,能断大事。各方面的消息证明王敦必然再次叛乱,他下决心要讨伐王敦。六月,明帝亲自到于湖(今当涂县南)侦察王敦营垒,然后进行周密的布置;以王导为大都督,领扬州刺史;温峤为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与右将军卞敦守石头城;应詹为护军将军、都督前锋及朱雀桥南诸军事;郗鉴行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庾亮领左卫将军,卞壶行中军将军,又征召兖州刺史刘遐、临淮太守苏峻、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约等入卫京师。这时,司徒王导听说王敦病危,率子弟发哀,大家以为王敦一定死了,斗志更加旺盛。尚书省转发诏书至王敦军府,历数王敦之罪。王敦见了诏书非常生气,但病重已不能亲自领兵,以王含为元帅,令钱凤、邓岳、周抚等率众进攻建康。七月,王含等领水陆兵众5万,进至秦淮河南岸。

温峤退屯北岸，烧朱雀桥阻断敌军前进道路。明帝亲募壮士千人，由将军段秀等带领，乘夜渡河，大破叛军。王敦听到战败的消息，又气又急而死。这时，沈充带领万余人与王含会合，而刘遐、苏峻带领的援军也到达建康。刘遐、苏峻的精兵万人从南塘出击，大破沈充、钱凤军，落水而死的有 3000 人。接着，刘遐又在青溪大败沈充。第二天，王含等烧营夜遁。明帝命诸军乘胜追击，沈充、钱凤皆被追斩，王含父子逃奔荆州，荆州刺史王舒使人沉之于江。王敦之乱终告平息。

三、苏峻之乱

咸和二年（327 年），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继王敦之乱后又发生苏峻之乱。

苏峻，西晋末被举为孝廉，北方大乱后纠集数千家，建立豪强武装，周围的豪强武装又推他为共主。当时，青州刺史曹嶷想收苏峻为部属，任之为掖县（今山东掖县）令，但遭到拒绝。曹嶷准备讨伐苏峻，苏峻率领所部数百家泛海南逃，投奔东晋。

苏峻历任淮陵内史、兰陵相。永昌元年（322 年），王敦首次进逼建康，元帝召苏峻进讨王敦，而他观望形势，迟回不前。太宁二年（324 年），王敦再次作乱，所遣王含、钱凤又顿兵建康城下，京城危急。明帝召苏峻、刘遐等流民帅入京勤王，苏、刘率精卒万人驰援。当沈充、钱凤夜渡秦淮河，从竹格渚上岸，护军将军应詹领兵拒战失利，叛军已到宣阳门外。这时，苏峻、刘遐统军自南塘横击，大破敌军，敌军落水淹死者 3000 人。接

着,苏峻又随从庾亮追击沈充至于吴兴。平叛后,苏峻因功进位为冠军将军、历阳内史、加散骑常侍,封邵陵公,食邑 1800 户。从此,苏峻威望逐渐提高,手中精兵已达万人,装备优良、实力雄厚,被朝廷委以捍卫江北的重任。但是,苏峻自恃兵强,日益骄横,藐视朝政,招纳亡命。朝廷运送给养去历阳的船只首尾相属,而稍不如意,他就破口大骂。

明帝死后,成帝继位。成帝年幼,外戚庾亮秉政。为加强中央集权,庾亮对内压抑宗室,对外削夺强藩。咸和元年(326 年),庾亮诛杀南顿王司马宗,司马宗亲信卞阐逃窜到历阳投奔苏峻,庾亮令苏峻交人,而苏峻藏匿不送。庾亮觉得苏峻在历阳终究是一个祸根,主张把他征调进京,剥夺他的兵权。此议一出,举朝皆以为不可,但大多不敢吭声,唯有王导、卞壶等数人表示反对。卞壶说:“苏峻拥有强兵,逼近京城,从历阳至建康,不足一日的路程,一旦发生变乱,后果十分严重,此事应慎重考虑。”庾亮不从。苏峻闻讯,遣司马何仍到京,对庾亮说:“只要是外任,无论远近,我唯命是从;至于内任,实非所能。”庾亮仍然不从。咸和二年(327 年)十月,庾亮以诏书命征苏峻为大司农、加散骑常侍。苏峻上表声称:“昔日明皇帝亲执臣手,委臣北讨胡寇。今日中原尚未平定,臣何敢自安!请补青州界一荒郡,使臣以展鹰犬之用。”但朝廷还是不许。苏峻无奈,整装待发,而心中又犹豫不决,参军任让对他说:“将军求补荒郡尚且不许,事到如此,恐无生路,不如拥兵自守。”于是,苏峻遂不奉诏,遣使与镇西将军、豫州刺史祖约联络,祖约因官位不符所望,颇为怨恨朝廷,所以一拍即合,约定以讨庾亮为名,一同起兵。

一场动乱爆发了。十二月，苏峻派部将韩晃、张健袭取了东晋屯积了大量食盐、大米的姑熟，直捣慈湖。苏峻起兵之前，江州刺史温峤请率军下援建康，三吴也请求发兵，庾亮都加以制止，特别写信给温峤说：“吾忧西陲（指陶侃），过于历阳，足下不可越过雷池一步。”苏峻起兵后，徐州刺史郗鉴又请求统兵御敌，同样被制止。然而，作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的庾亮并没有很好地部署兵力，抗击敌人。咸和三年（328年）正月，韩晃消灭慈湖守军。苏峻指挥苏、祖联军2万余人从横江渡口抢渡长江，进抵陵口。晋中军抵挡不住，连战败北。二月，苏峻占领蒋陵、覆舟山，建康已经近在咫尺，城内惶惶不安。有人建议在小丹杨打伏击战，庾亮不予采纳，而苏峻果真绕道小丹杨，因夜里行军竟迷了路。这样一个歼灭敌人、扭转危局的大好机会又被庾亮贻误了。没几天，苏峻击败建康城外守军，突破青溪栅。庾亮率领诸将在宣阳门内抵抗，但队伍尚未成形，士众皆弃甲而逃。庾亮与诸弟也匆匆乘船逃往寻阳，把成帝和皇太后都扔在建康。苏峻攻陷宫城后，遂“纵兵大掠，侵逼六宫，穷凶极暴，残酷无道”，又“裸剥士女，皆以坏席苫草自鄣，无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号之声震动内外”。他自任骠骑、领军将军，录尚书事，以祖约为太尉、尚书令，又改易百官，树置亲党，矫诏大赦，惟庾亮兄弟除外。同时，他分兵攻略义兴、晋陵各地。

庾亮既至寻阳，与温峤共推荆州刺史陶侃为盟主，兴兵讨伐苏峻。“戎卒四万、旌旗七百里，钲鼓之声，震于远近”，浩浩荡荡开往建康。不久，三吴也兴兵讨伐苏峻，会稽内史王舒以庾冰行奋武将军，使他领兵1万，西渡浙江，吴兴、吴国、义兴诸郡起而响应。五月，陶侃、温峤军于茄子浦，陶侃举王舒监浙

东军事、虞潭监浙西军事、郗鉴都督扬州八郡。郗鉴率众渡江，与陶侃会师。接着，诸军进据蔡洲，直逼石头城。苏峻率主力屯守石头城，并把成帝迁入石头城中。双方相持数月，陶侃因敌军兵势甚盛，难与争锋，在石头城西筑白石垒，又在京口一带筑大业等三垒，坚守不战。苏峻攻白石垒不克，乃分遣诸将东西抄掠，多所擒获，兵威更盛。从建康逃出来的官吏都说：“苏峻狡黠多智，其徒党极其骁勇，所向无敌。如果上天惩罚罪人，苏峻终当灭亡；如果依靠人力，则难以取胜。”温峤听了很生气，但累战不捷，也深怀恐惧。

苏峻遣将张健、韩晃急攻大业垒，垒中乏水，士卒渴极，饮粪汁解渴。守将郭默突围求援，陶侃准备派兵救援。长史殷羡说：“我军不习陆战，如救大业不能取胜，则全盘皆输。不如急攻石头城，大业之围自解。”陶侃听从。于是，陶侃督水军驶向石城，而庾亮、温峤、赵胤等率步兵万人从白石垒南上挑战。苏峻统领 8000 人迎战，其子苏硕与将领匡孝分兵冲击赵胤军，将赵胤打败。苏峻见赵胤军溃逃，大叫：“匡孝能破贼，我还不如他吗？”只带领数骑急急追赶，没有赶上。在回马白木陂时，他的马突然被踩倒，又被陶侃部牙门将彭世、李千投过的长矛击中。苏峻坠落下马，立刻被斩首、割肉、焚骨，三军齐呼万岁。苏峻余众退据石头城，任让等立苏峻弟苏逸为主，闭城自守。次年春天，诸军攻破石头城，斩杀苏逸等。祖约败后，率左右数百人北走后赵，被石勒杀死。

苏峻之乱平定后，东晋进入相对安定时期，是后 70 年无内战乱，社会经济逐渐得以恢复。

四、桓玄篡晋

自桓温出任荆州刺史以后，桓氏家族在荆州的统治持续了半个世纪。太元十四年（389年），桓温之侄、荆州刺史桓石民死，东晋朝廷以王忱继任，然而桓氏在荆州经营日久，根深叶茂，仍然拥有很大的势力。

桓温少子桓玄袭爵为南郡公，长大后相貌瑰奇、神情疏朗，且多才多艺，善于作文，但自以为才学、门第冠世，待人十分傲慢，引起众人的不满，朝廷也疑而不用。直到23岁，桓玄才被任为太子洗马，后迁义兴太守，甚郁郁不得志，愤懑叹道：“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遂拂袖弃官，返回荆州南郡（治江陵）的封地闲居。可是荆州刺史王忱与桓氏有隙，又常常压制桓玄。不久，王忱死，孝武帝任命殷仲堪为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宁3州诸军事，于是，桓氏的势力再度崛起。殷仲堪是一个玄学名士，原任黄门郎，资望不深，虽任荆州刺史，甚敬畏桓玄。有一次，桓玄去拜会殷仲堪，与仲堪在大厅前驰马舞稍（矛长丈八称稍），以稍尖对准仲堪。都督府参军事刘迈讥讽桓玄说：“马、稍之技有余，而精通义理则不足。”桓玄很恼火，殷仲堪不禁大惊失色。桓玄走后，殷仲堪斥责刘迈说：“你太过放肆，桓玄今夜派人来杀你，我岂能救你！”他让刘迈赶紧离开荆州回建康去。当夜，桓玄果然派人杀刘迈，追赶不及才作罢。征虏将军胡藩路过江陵时，对殷仲堪说：“桓玄志趣不同于常人，一副怏怏不得志之态，将军过份优崇他，恐怕于将来不利。”殷仲堪听了很不高兴。

隆安元年(387年),录尚书事司马道子专制朝政,尚书左仆射王国宝与其从弟王诸用事,图谋削弱两藩,夺取北府王恭和荆州殷仲堪的兵权。桓玄乘机挑唆殷仲堪说:“王国宝一向与府君对立,唯恐不能尽早置府君于死地。如今他手握大权,与王诸共相表里,想撤谁换谁,无不如意,王恭贵为皇上大舅,他们不敢轻动,而府君是先帝拔擢,破格居藩,大家以为府君思想意趣高超,但不是藩镇之才,如果他们发诏征府君为中书令,以殷凯代为荆州,府君将如何?”殷仲堪说:“我正因此而忧心如焚,你有何计策?”桓玄说:“王国宝当今奸凶,天下共知,王恭疾之如仇。君宜秘密与王恭约定,起兵以清君侧,然后率荆楚之众顺流而下,推举他为盟主,我等愿追随于后,此事乃是齐桓、晋文之举”。这时,恰好王恭遣使与殷仲堪商议讨伐王国宝,殷仲堪表示赞同,于是王恭上表朝廷,兴兵入讨。殷仲堪虽然与王恭结盟,但却犹豫不敢出兵,后听说朝廷已杀王国宝等,才派遣杨佺期进军巴陵(今湖南岳阳)。

隆安二年(398年),桓玄请求出任广州,司马道子甚忌桓玄,唯恐他在荆州闹事,遂顺其所请,任命他为广州刺史,督交、广2州,桓玄受命而不出发,仍滞留荆州。七月,北府王恭再次与殷仲堪结盟,以讨王愉、司马尚之兄弟为名,相约同时举兵。殷仲堪派南郡相杨佺期为先锋,桓玄次之,而亲自领兵2万相继而下。八月,杨、桓进抵湓口(今江西九江),江州刺史王愉仓惶逃往临川,被桓玄的偏军追获。接着,桓玄又大破中央军于白石,与杨佺期进军横江。这时,由于北府将领刘牢之倒戈,王恭兵败被杀。刘牢之率北府兵抵抗荆州军,桓玄、杨佺期只得回军蔡州,为了分化荆州军,司马道子采观念左卫

将军桓修的建议，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贬黜殷仲堪为广州刺史，而派桓修出任荆州刺史。诏命颁下，殷仲堪大怒，催促桓、杨向建康进军，桓、杨对朝廷的新任命很满意，不想出兵。殷仲堪一气之下遽然返回荆州，遣使告谕蔡州兵众说：“你们如不各自散归，我到江陵便杀尽你们的家人。”于是，部将刘系立刻带领 2000 人西上，桓玄等大惧，都赶快撤退，至寻阳（今江西南昌）才赶上了殷仲堪。三人利害关系相关，虽互相猜疑，但不得不重新在寻阳结盟。联名上书不受诏命。朝廷又只好让步，仍以殷仲堪任荆州刺史，并加抚慰，三人才受诏罢兵。这次起兵，桓玄取得江州，得到了很大的实惠。寻阳之盟，桓玄被推为盟主，更加骄矜，藐视杨佺期为寒士。杨佺期是南下较晚的流民帅，自以为出身北方高门的弘农杨氏，最恨别人瞧不起，在盟誓坛上就想发难袭击桓玄，殷仲堪担心杨佺期杀死桓玄之后再把矛头指向自己，故坚决制止。而桓玄也觉察杨佺期的阴谋，暗中有吞并他的打算。

三人的矛盾冲突终于逐渐白热化了。隆安三年（399 年），殷仲堪与杨佺期连姻，以对抗日益跋扈的桓玄，杨佺期屡次提议进攻桓玄，但殷仲堪不敢动，桓玄恐怕被殷、杨所灭，请求朝廷扩大他的部督区，朝廷企图激起他们的内讧，使命桓玄兼督荆州的长沙、衡阳、湘东、零陵四郡，又以桓玄兄桓伟代杨佺期兄杨广为南蛮校尉。杨佺期又气又急，借口后秦进攻洛阳，准备与殷仲堪举兵偷袭桓玄，但殷仲堪怀疑杨佺期别有用心，极力抑制。杨广则准备抗拒桓伟，殷仲堪也不从，调杨广出任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当时，荆州发生水灾，平地水深 3 尺。桓玄乘机发兵西上，声称救援洛阳，袭取巴陵，占据谷仓。

殷仲堪扣押桓伟为质，让他给桓玄写信，措辞哀哀可怜，桓玄却说：“殷仲堪为人无决断，我兄必无忧。”桓玄连打胜仗，进军到达零口，距江陵 20 里。江陵城中没有粮食，十分危急。殷仲堪急召襄阳杨佺期赴援，杨佺期说：“江陵没有粮食，如何御敌，可引军来共守襄阳。”而殷仲堪不愿放弃荆州，竟骗他说：“近来收集一些粮食，已经有了储备。”杨佺期乃领步骑 8000 到江陵，但殷仲堪无粮供应，杨佺期大怒，叹道：“今天只有失败了！”他也不见殷仲堪，与其兄弟杨广进攻桓玄，结果大败，单骑逃奔襄阳，终于与杨广被俘，桓玄杀之。殷仲堪听说杨佺期已死，带着数百人逃窜，也为桓玄部将追获，被迫自杀。隆安四年（400 年）三月，桓玄占领荆、雍 2 州，上表要求自领荆、江 2 州，朝廷授以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 7 州诸军事，兼荆州刺史，以桓修为江州刺史。桓玄不从，再上疏要求领江州，朝廷不得已使他督八州，并兼江州刺史。他还以兄桓伟为雍州刺史，以侄子桓振为淮南太守，朝廷都不敢不从。

控制了中、上游，桓玄以为已经握有东晋天下的 2/3，具备了问鼎轻重的实力。隆安五年（401 年）末，桓玄写信指斥执政说：“今日朝廷显贵心腹，谁是时流清望？岂能说没有人才，只是不能信任罢了。因为往昔朝廷失误，才酿成今日之祸。”司马元显见后大为恐慌，决定起兵讨伐桓玄。次年初，司马元显派北府都督刘牢之为前锋，但在桓玄策动下，刘牢之再次倒戈，桓玄势如破竹，顺利地攻进建康，捕杀司马元显等。从此，桓玄布置亲信心腹占据要津，一步步向最高权力逼近。他自命为总百揆、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假黄钺，领徐、荆、江 3 州刺史，继而以桓伟为荆州刺史，桓谦为尚书左

仆射，桓修为徐、兖 2 州刺史，桓石生为江州刺史，卞范之为丹杨尹。接着迁刘牢之为会稽内史，夺其北府兵权，刘牢之才觉得上当，大集僚佐商议占领江北与桓玄对抗。参军事刘袭说道：“事不可为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马郎君，今日复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众佐吏一哄而散。刘牢之甚惧，遣子刘敬宣到京口接引家人，而久久不见归来，以为已经出事，便带着部曲北逃，至新洲自缢而死。

桓玄执政之初，罢黜奸佞，拔擢贤俊。东晋“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釐改，竟不能行。”不久，奢豪之态复萌，政令无常，朋党互起。这时三吴发生大饥谨，饿殍遍地，户口减半，会稽郡人口只剩三四成，临海、永嘉郡死亡殆尽，殷实人家也竟身穿罗纨，怀抱金玉，闭门相守而饿死。在这种情况下，桓玄加紧篡权的步伐。元兴二年（403 年）二月，他为了提高威望，上表请率领诸军扫平河、洛，然后指使朝廷下诏制止，便称“奉诏故止”；九月，使朝廷拜己为相国，封为楚王。十月，又上表请求返回藩镇，逼帝出手诏挽留。至十一月，桓玄终于赶晋安帝出宫而登上皇帝宝座，建国号楚，改元永始。桓玄篡位后，更加骄奢淫逸，游猎无度，大兴土木，修缮宫室，朝野为之骚然，百姓不堪其苦。桓玄篡晋，是东晋门阀政治的尾声，元兴三年（404 年）五月，这个短命政权被刘裕推翻了，桓玄在逃跑途中被杀于江陵县南长江中的枚回洲。

第四节 孙恩、卢循起义

东晋会稽、吴郡等滨海地区流行道教，信奉者既有士族官僚，也有平民百姓。钱塘杜子恭是当时著名的五斗米道师，出身琅邪道教世家的孙泰以杜子恭为师，并继之为道师。孙泰有许多道徒，他被“敬之如神”，因“诳诱百姓”的罪名被东晋政府流放到广州，而广州刺史王怀之用他为代理郁林太守。晋孝武帝末年，孙泰回到建康（今江苏南京），执政司马道子以他为徐州主簿，司马元显跟从他学道教“秘术”。他利用传道的影响纠集兵众数千人，参与讨伐王恭，后更“煽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朝廷惟恐孙泰聚众为乱，杀了孙泰及其6个儿子。他的侄子孙恩逃亡于海岛上，有徒众百余人，决心报仇，陆上的信徒常常给孙恩等送去粮食衣物。

隆安三年（399年）十月，司马元显下令征发三吴地区免除了奴隶身份成为佃客者当兵，号称“乐属”，送往京都。于是，东土嚣然，民心骚动，不仅引起“乐属”及其家人的愤怒，也引起“乐属”主人的不满。孙恩乘机率领徒众从海岛登陆，进攻上虞（今浙江上虞），杀死县令，接着进攻会稽郡，杀内史王凝之，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人。旬日之中，会稽、吴郡、吴兴、义兴、临海、永嘉、东阳、新安等八郡都起来响应，纷纷杀死地方官吏，人数达到数十万。孙恩的队伍很复杂，既有狂热的道教信徒，也有一般民众；既有地主，也有农民，而就其大多数说，是三吴

地区深受压迫剥削的自耕农和佃客，这场斗争的本质是广大农民群众反抗东晋地主阶级残暴统治的阶级斗争，是东晋史上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东晋地方官吏如吴兴太守谢邕、永嘉太守谢逸、乌程令夏侯愔等相继被杀，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新蔡王司马崇、义兴太守魏隐等仓促弃郡逃窜，而居住在这儿的士族官僚顾胤、谢明慧、谢冲、张琨、孔道等虽然不少人信奉道教，但也都被杀死。孙恩占据会稽城，自称征东将军，其徒属号为“长生人”。孙恩任命许允之为义兴太守、丘尪为吴兴太守、陆瑰为吴郡太守等。

为了镇压起义，东晋朝廷任命徐州刺史谢琰兼督吴兴、义兴军事讨伐孙恩，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及扬州之晋陵军事的刘牢之也率领北府兵出发。起义初起、八郡响应时，孙恩被胜利冲昏头脑，对部属说：“天下无事了，我和诸君将要穿着朝服到建康。”义军既没有进攻的部署，也没有御敌的准备。十二月，谢琰击斩义兴许允之，又进击吴兴，大破丘尪。谢琰驻扎在乌程，派司马高素配合刘牢之，进临浙江（今富春江）。孙恩企图割据浙江以南，见刘牢之率北府精锐渡江，便带领男女 20 余万口东撤，丘尪、陆瑰、沈穆之等都被官军所杀。孙恩率众退回海岛。由于刘牢之等纵容官军暴掠，东土郡县城内百姓逃遁一空。

隆安四年（400 年）五月，孙恩从浹口（今浙江镇海东南）登陆，破余姚、上虞，进攻邢浦（今浙江绍兴北）时失利，不久再战邢浦，径直攻取会稽，会稽太守谢琰战败，与其二子都被部下杀死。朝廷大震，派高雅之等将领抵御孙恩，又被孙恩所败，死者十之七八。朝廷急忙以刘牢之都督会稽等五郡军事，进击

孙恩,孙恩再次退回海岛。次年二三月,孙恩又两次登陆进攻句章(今浙江宁波南)和海盐,都被北府将领刘裕击败。五月,孙恩改变进攻路线,由海道北上,攻扈渎(今上海青浦),杀吴国内史袁山松。接着,他又从海道突然进至丹徒,战士10余万,楼船千余艘,消息震动了建康。刘牢之急调刘裕所部北上,兵不满千人,倍道兼行,与孙恩义军战于京口西面蒜山。义军战败,从悬崖投水而死的人很多。孙恩整顿余部,直趋建康,因楼船高大,又逆风逆流,速度很慢,数日才到白石,这时建康已经准备,遂渡海至郁洲(今连云港,当时为海岛),以偏师攻陷广陵,杀敌3000人。后刘裕追至郁洲,多次击败起义军。义军损失万余人,加上饥馑疾疫,死者过半,力量日益衰弱,南退浹口入海。元兴元年(402年),孙恩进攻临海之举又一次失败,义军剩下1000余人,孙恩害怕为官军所俘,投海自杀。

孙恩死后,余众推孙恩妹夫卢循为主。当时,桓玄从荆州起兵攻入建康,控制了东晋朝廷,北府都督刘牢之被贬为会稽内史,自缢而死。桓玄为稳定三吴地区,授卢循为永嘉太守,卢循虽接受任命,仍继续进攻东阳郡,但屡战失利,于是泛海南下。元兴三年(404年),卢循攻打番禺(今广州)百余日,擒获广州刺史吴隐之。他自称平南将军、摄广州刺史事,又派姐夫徐道覆率众攻下始兴(今广东韶关)。这时,刘裕刚刚推翻桓玄的统治,正在清除桓玄残余势力,无暇南顾。义熙元年(405年)四月,朝廷正式任命卢循为广州刺史,徐道覆为始兴相。卢循据广州5年多,当刘裕北伐南燕时,徐道覆建议袭取建康,他说:“刘裕已出,顿兵坚城之下,不知何时回师,乘此进击易如反掌,如果攻克建康,刘裕即便回来,也已晚了。”卢循起初

不从,后来才勉强答应。义熙六年(401年)二月,卢循与徐道覆分兵北上。徐道覆从东路速克南康、庐陵,攻豫章(今江西南昌)时与东晋江州刺史何无忌战于赣水之上,大败官军,杀何无忌。卢循从西路攻湘中诸军,在长沙大败东晋荆州刺史刘道规派来的军队,推进至巴陵(今湖南岳阳),准备进军江陵。这时,刘裕闻讯后慌忙南归,只带数十人日夜兼程率先回到建康,布置京师的防卫。东晋豫州刺史刘毅准备出兵迎击卢循,刘裕写信劝止,刘毅不听,率领2万水军迳自姑熟出发。徐道覆得知刘毅军将至,便驰告卢循率军东下,合军共击刘毅。五月,义军与官军大战桑落洲(今江西九江东北长江中)。官军大败,悉数丢弃船舰、辎重,刘毅只带数百人逃走,余众全都当了俘虏。在义军处于优势时,卢循却又动摇起来,得到刘裕回到建康的消息,便十分害怕,企图撤兵西行,占领江陵,割据荆、江2州。在徐道覆的坚持下,义军才继续东进,“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楼船高十二丈,败还者争言其强盛。”

刘裕北伐始归,建康将士多有伤病,人数不过数千,人心惶惶不安。尚书左仆射孟昶等主张迁都江北,刘裕不许,认为“一旦迁动,便自土崩瓦解”,孟昶惧而自杀。但由于卢循的犹豫,刘裕赢得了喘息的时间,他招募士兵,修治石头城,亲自领兵屯守。义军进至淮口(秦淮河入长江处,今南京西北)时,徐道覆建议在新亭与白石间分几路上岸,同时发动进攻。卢循多疑少决,命令停泊蔡洲,寄希望于官军“自溃”,贻误了大好战机。直到刘裕树栅淮口,又修治越城,筑查浦、药园、廷尉三垒后,卢循才以10余舰攻击淮口栅,久攻不克,船舰反被风暴漂没。后转攻南岸,进击京口等地,并无所获。义军从五月至七

月屯兵建康城下，师老兵疲，粮食给养也发生困难，只得南撤寻阳。刘裕一面派部将王仲德、刘仲、蒯恩等追击卢循，一面大治水军，派部将孙处、沈田子率众 3000 人，从海道奔袭番禺。接着，刘裕又亲自率领兖州刺史刘藩及将军檀韶、刘敬宣等从建康出发，企图一举消灭义军。十月，徐道覆领兵 3 万突然至破家（今湖北江陵东南），准备攻打江陵，遭到荆州刺史刘道规拦腰阻击，死万余人，“赴水死者殆尽，道覆单舡走还湓口（今江西九江西）”。十一月，留守南陵（今安徽宣城西）的义军被王仲德率领官军打败。十二月，卢循、徐道覆重整队伍，“帅众数万塞江而下，而后莫见舳舻之际”，可见仍具有相当实力。而刘裕进军大雷（今安徽望江），派出轻舰，以强弩逼义军船舰泊西岸，由预先埋伏在西岸的步骑军纵火焚烧义军船舰，一时烟炎张天，义军大败。卢循指挥余部向豫章撤退，树栅左里，阻断官军。刘裕率军攻栅，义军虽作殊死战，但抵抗不住，死者万余人。卢循收集散卒数千人，向广州撤退，徐道覆也退回根据地始兴。义熙七年（411 年）二月，晋军攻破始兴，斩徐道覆。三月，卢循军至番禺城外，番禺早已被晋军占领。卢循围攻 20 余日不能下，晋军派出援军，卢循败走交州，最终在龙编（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遭到惨败，投水自杀。

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东晋的腐朽统治，特别是摧毁了门阀士族在三吴地区的统治基础。但由于孙恩、卢循、徐道覆等人旨在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经常表现出次等士族的动摇与妥协，使这次有数十万农民群众参加的起义，不能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第五节 北伐与偏安

一、祖逖北伐

祖逖的生活时代是西晋后期和东晋初年。他在当时，是一个识大体，有谋略，具有强烈民族感情的杰出人物。他年轻的时候就胸怀大志，同刘琨一起担任司州主簿，两人意气相投，结成莫逆之交。有一天，半夜听到鸡啼声，就把刘琨蹬醒说：“此非恶声也。”于是两人起来一同练习武艺。这种“闻鸡起舞”的奋发精神，一直被后来的有志之士传为美谈。

公元4世纪初，西晋灭亡，北方处于各少数民族贵族的统治下。晋宗室司马睿逃到建康建立了东晋王朝。祖逖也率领亲党数百家迁到南方。一路之上，祖逖把自己的车马让给老弱病人乘坐，自己却与大家一直徒步行走；药物、衣服、粮食也和大伙共用，深受大家的爱戴。东晋王朝建立以后，许多逃难到江南来的人都希望朝廷能收复失地，以便重返家园。北方的汉族人民在各族贵族的暴虐统治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也盼望东晋出兵北伐，推翻胡族的统治。可是，以司马睿为首的皇室和大官僚们却满足于偏安江左，把主要精力放在巩固自己的南方的统治上面。祖逖眼看国家危难，对司马睿等人的苟且偏安非常不满，就自告奋勇，请求朝廷准许他募兵北伐。司马睿

迫不得已，只好给了他一个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的空头名义，1000人的粮饷和3000匹布，其他军器物资什么也不给。即便是这样，祖逖还是毅然率领部曲100多家在公元313年旧历八月渡江北伐。在船划到中流时，他慷慨激昂地敲着船楫起誓说：“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跟随他的人都被他的豪情壮语所感动，斗志倍增。渡江以后，他在淮阴一面铸造兵器，一面募兵，到出发时已经成为一支拥有2000多人的军队了。

祖逖的军队由于得到北方人民的支持，迅速占领了安徽北部和河南南部地区。当时，长江以北还有不少汉族豪强地主盘踞的坞堡，这些人各自为政，互相间矛盾也很多。祖逖分别情况，有的加以调解使他们听从自己的号令参加北伐，有的投靠胡族就坚决打击。公元319年，陈留地方的豪强地主陈川叛降后赵石勒，祖逖决定发起对陈川的进攻。石勒派石虎领兵五万援救陈川，被祖逖打得大败。经过几年时间的艰苦斗争，在祖逖领导下基本上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全部领土。这一大好形势的出现，固然反映了当时的人心所向，但是，同祖逖的雄才大略和善于团结人也是分不开的。他在收复的地区内，亲眼目睹了经受战乱灾祸后人民生活的悲惨，就带头在生活上严格约束自己，过着俭朴的日子，不为自己占据田产。他亲自劝督军民种地植桑，要求自己的子弟都去参加耕作，挑担砍柴。他还能“爱人下土，虽疏交贱隶，皆恩礼遇之。”对所部军民立有功劳的，那怕功劳再小，也都立即给予奖赏。对于黄河两岸一些被迫接受胡族官职的人，祖逖也讲究策略，允许他们在表面上继续担任胡职，还不时派出巡逻兵到这些地方去假装抄袭，

制造他们并未归附东晋的假象。通过这种途径，祖逖常常能够得到后赵的各种情报，便于及时采取对策。祖逖的这些措施，深受各阶层军民的拥护。一次，祖逖置酒大会父老，人们感动得热泪盈眶，且歌且舞，赞扬祖逖和他所部将士的功绩。石勒看到祖逖军这样深得人心，不敢再渡河进犯。

正当祖逖准备继续进军河北，完成统一祖国大业的时候，司马睿却心怀疑惧，担心祖逖的力量过分强大，自己不容易控制。于是，派了一个叫戴渊的人来充当都督，节制北方 6 州诸军事。把祖逖已经收复和尚未收复的州县，都归这个戴渊管辖，用来牵制祖逖。这时，祖逖又得到消息说朝廷内部王敦、刘隗等大臣互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有爆发内乱的危险。他因此忧虑交加，终于病倒了。公元 321 年，祖逖抱恨去世，死时 56 岁。祖逖领导的北伐虽然没有胜利完成，但却打击了胡族南侵的气焰，使东晋王朝的统治得以稳定。他在渡江击楫时表达的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始终激励着后来的人们为反对民族压迫而斗争。

二、桓温北伐

桓温，字元子，今安徽怀远人。他承袭父爵，为琅邪太守，后又迁任荆州刺史，掌握了长江上游的兵权。

为了扩充实力，公元 346 年，桓温举兵伐蜀。据说他行军万里，仅用 3 个多月的时间就灭了賚族人李氏在那儿建立的成汉国，声势一下子壮大起来。

然而桓温真正的强大，还是在他这次西征之后。

西晋崩溃时，中原北方和西部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内迁，在长江上游和黄河流域先后建立了不少割据政权。桓温灭了成汉，长江上游收复了，但黄河流域的前燕、前秦等，仍很强大。许多逃难来到江南的人都希望朝廷能收复失地，以便他们重返家园；而处在各族贵族暴虐统治之下的北方汉族人民，也盼望东晋出兵北伐，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

桓温看准了这一形势，西征归来，便几次要求北伐，希望建立功名。当朝大臣害怕他的势力过分强大了不易控制，便相继派出外戚褚裒和名士殷浩率军北伐，抑制他的发展。褚裒、殷浩本是喜欢清谈、身负虚名的那类人，他们的北伐虽然也得到北方汉人的大力支持，来投奔的人日以千计，但他们并不努力向前，而是一触即退，致使归附的民众半道受围，苦不堪言，最后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不久褚裒病死，桓温又乘机上书晋穆帝司马聃，将殷浩废为庶人，消除了朝中最主要的敌手。

公元 345 年，桓温率军北伐，浩荡而至关中。他受到了关中人民牵牛担酒的欢迎。

但是桓温也不愿在北方战场上过多消耗实力，于是在今天陕西西安市东的灞桥这地方停军观望，就此丧失了彻底战胜敌人的时机。前秦军芟苗清野，深沟自固，而孤军深入的桓温却因为粮运不断，不得不全部退回。

公元 356 年，桓温第二次率军北进。这次进军，收复了亡都洛阳。桓温多次上表，请求还都，但因为东渡士族在南方产业已丰，无心北归，晋皇室也甘心偏安江左，所以他的请求始终没被重视。

公元 369 年，海西公司马奕当政时，桓温再次请命北伐。他从扬州出发，进军颇为顺利，直攻到前燕都城南边的枋头，今天河南浚县这地方。后来前燕得到前秦的援助，联军切断了桓温的粮道，桓温这才不得不弃甲烧船，大败而归，3 万多士兵牺牲在北方战场上。

桓温原是想通过北伐来提高自己在东晋朝廷中的名望的，谁知吃了败战，弄巧成拙，名望反而降了。

公元 371 年，桓温又奉皇太后令，带领百官开到会稽王司马昱的府第，将他迎回朝堂，变更衣饰，扶上了皇帝宝座，是为简文帝。

通过这一废一立，桓温声名大振。就是这素有威望的简文帝，对他也惧怕三分。简文帝上台不久，曾有一次召见了桓温的谋士、此时已官升中书郎的郗超，问他：“命之长短，本所不计，再不会发生什么大的变故了吧？”话中之意，是仍然担心扶他即位的桓温，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找个借口废掉他。郗超急忙应道：

“朝臣桓温正尽力于内固社稷，外恢经略，他不会做出什么非常之举的，我敢以百口担保。”

简文帝在这“百口担保”之下，似乎也稍稍振奋了一阵子。他和武陵王司马晞同是东晋开国君主司马睿的儿子，依长幼之分，晞是老四，他是最小。他即皇帝位，司马晞虽是兄长但只得了个辅佐天子的太宰官职，心中愤恨，便与新蔡王司马晃合谋起兵，欲图不轨，不意消息泄露，被收监听候发落。桓温上书建议说：“陛下应割一己之私情以存远计，如果斩除太宰父子，便可保解除后顾之忧。”简文帝回批说：“这样的话我连说出口

都觉于心不忍，何况要这样去做呢！”桓温再次上书，陈说杀了太宰父子的种种益处。简文帝下诏说：“如果晋室命运还长，桓公便宜奉行前诏；如果大势已去，那么就让我退位让贤！”桓温接到这样的诏令，不觉手脚发颤，额头沁出了粒粒珠。他再也没敢固执己见了，慌忙请命出镇，到今天的安徽当涂坐观事变。

公元 372 年农历七月，简文帝坐了 8 个月不到的皇位便一病不起了。一天一夜，他连下四道诏书，要召桓温回京师来商量后事。

觊觎皇位已久的桓温却并没有立刻回京，他写了封奏章派人送交皇上，说是自己外镇当涂虽没做什么事，但也不曾敢有片刻懈怠，唯恐愧对皇恩。眼下公务缠身，要等一阵子才能奉诏回朝。实际上，桓温是想故意拖延时日，好让简文帝做好准备给自己禅位。但这回他确实打错了算盘，他的奏章还没送到京城，简文帝就在皇宫东堂驾崩了。临死时册封的皇太子、简文帝的三儿子司马曜同一天即了皇帝位，称为孝武帝。桓温领文帝遗诏做了孝武皇帝的辅臣。

三、刘裕北伐

第一次北伐

东晋末年，靠镇压孙恩、卢循起义而起家的北府兵将领刘裕异军突起，他勇猛善战，屡立战功，成为东晋末年政坛上的一位显赫人物。当桓玄叛乱篡位时，刘裕兴兵讨伐，赶走桓玄，

恢复晋安帝皇位，以自己统率的强大的北府兵作为后盾，掌握了东晋的大权。但是刘裕毕竟出生寒门，在魏晋以来门阀士族观念盛行、崇尚清淡玄理的时代，大权在握的刘裕在上流社会仍然是不入流的。士族名流借清谈玄理控制舆论，排挤刘裕，使他常常处于不利地位。刘裕认识到，要压倒那些社会名流，必须建立盖世奇功。

当时整个北方失地主要被南燕、后燕、北魏、后秦、西秦、夏、南凉等少数民族政权瓜分，北伐收复失地，符合汉族人民的愿望。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离东晋最近的，一是齐鲁地区的南燕鲜卑族政权，一是关洛地区的后秦羌族政权。比较而言，南燕最近而且国力最单薄，北伐的成功把握最大。刘裕决定以南燕为北伐立功的目标。

义熙五年二月，南燕主慕容超派军队攻占东晋的宿预（在今安徽宿迁），掠走男女 2500 人。刘裕认为机会来了，三月，宣布北伐。刘毅当时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遥控朝廷舆论，齐声反对。刘毅自己上书，理由是：“当年前秦苻坚南侵，谢安为宰相，也不亲自北上拒战。宰相远出，根本动摇。”刘裕则游说百官，寻找支持者。首先支持刘裕的是车骑将军府司马谢裕。其次是刘裕的妻弟参军臧熹。左仆射孟昶见风使舵，也支持刘裕。刘裕大喜，特别委托孟昶代理中军将军府事务，以示信任。四月，刘裕率舟师由淮入泗北上。

五月，舟师至下邳，登陆，向南燕的琅邪（在今山东临沂）推进。一路上，步步为营，窥探对方的反应。当时，刘裕最担心对方屯兵于东莞（今山东莒县）南面山水交错的险地大岨，堵住晋军必经之路，然后坚壁清野，出奇兵断晋军粮道，使得晋

军不战自败。没想到南燕主慕容超刚愎自用，硬要屯兵于东莞，以逸待劳，与晋军决一雌雄。刘裕率军顺利出了大岷，不禁喜形于色，扬鞭北指，预言南燕必败。

六月，两军在东莞相遇。这里地势平夷，无险可依，利于战车奔驰。刘裕分战车 4000 辆为两翼，由兖州刺史刘藩和并州刺史刘道怜统领，谘议参军刘敬宣、陶延寿，参军刘怀玉、慎仲道、索邈等作为辅佐，大举进攻。南燕铁骑挡不住战车的威力，遭到惨败。晋军乘胜进围南燕国都广固（在今山东淄博东南）。几天后，晋军又攻占广固大城，慕容超仅在小城顽抗。齐鲁汉裔听说晋军合围广固，荷戈负粮前来归附者日以千计。慕容超见突围无望，只好派有人缘的尚书令韩范去后秦搬救兵。

这时，后秦主姚兴正在与夏主赫连勃勃进行争夺战，根本抽不出兵力支援南燕。姚兴与韩范私交甚好，经不住韩范的苦苦哀求，便想出一条计策，派专使恫吓刘裕。这个专使对刘裕扬言：“我们与慕容超关系睦洽，不能见危不救，今已遣铁骑 10 万屯驻洛阳，如果晋军不退，则当长驱相逐。”刘裕听完，哈哈大笑，对专使说：“转告你们姚兴，我消灭慕容超之后，息兵 3 年，便取关中、洛阳；今能自己送上门，就请快来！”刘穆之知道此事，有点不高兴，对刘裕说：“平时事无大小，都要请我参谋，今日这般草率，倘若姚兴大军真的前来，如何是好？”刘裕笑道：“兵贵神速。姚兴如果真的想救慕容超，必不事先让我知道；今有意通知我，一定是恫吓，并无出兵之意。这是军机，非你所能了解，故不告知。”显然，此时刘裕的军事头脑已经比其政治头脑要敏锐得多了。

广固小城久攻不下。这时，晋军俘获了扫兴而归的尚书令

韩范和南燕巧匠张纲。刘裕一面派人牵着韩范绕城示众，让城中人知道外援已绝；一面命令张纲赶造攻城战具，准备发动最后攻势。

义熙六年(410年)二月，广固小城被围已逾半年。这时，广州刺史卢循休养多年，兵强马壮，正准备趁刘裕远出，再次起义，北取建康。消息传来，刘裕大为焦急，命令全面攻城，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南燕守军已经丧失斗志，抵挡不住晋军的强大攻势，没几天，小城就破了。刘裕为了泄忿，斩南燕王公以下3000人，将其家口万余人没为奴婢，把广固城池毁为平地。南燕主慕容超被送到建康，斩首示众。

这次北伐的成功，使淮河以北久已沦陷的大片国土重又回到东晋的版图，振奋了民心。于是，刘裕成了东晋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其威望一下子压倒了刘毅。

第二次北伐

第一次北伐之后，刘裕优先考虑的是繁衍子孙，过舒坦日子。自义熙四年结发夫人臧氏病死，寻花问柳的勾当无人约束，他一连又纳了袁、孙、吕3个如意夫人。义熙九年(413年)袁氏生五子义恭，孙氏生六子义宣，义熙十一年(415年)，吕氏生七子义季。刘裕成了梦寐以求的“多仔公”，十分心满意足。

翦除异己之后，刘裕以长弟刘道怜为荆州刺史，控制上游，以19岁长子刘义符为兖州刺史，控制北府，自己以宰相控制扬州和朝政，刘氏家族的势力得到空前的巩固，刘裕觉得志愿都已达到，更无其他事情可做。

但是，自从朝廷加授刘裕太傅，特许刘裕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之后，刘裕知足的心井突然起了波澜。东晋最高荣誉官是所谓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傅排列第二。东晋臣子晋见皇帝，上殿不得佩剑著履，入朝必须疾走（称为“趋”），行礼必须呼名。从汉以来，臣子荣授太傅的本来不多，享受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等殊荣的更少。刘裕环首四顾，无人可与比肩，固然十分得意；但抬头一看，距白痴天子近在咫尺，自己犹在皇帝宝座之下，又觉若有所失。于是，刘裕做起了皇帝梦。

当皇帝自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时髦的做法不是直接弑君篡位，而是诱使当政的皇帝自觉才能浅薄，甘心情愿地让位，称为“禅让”。这就不仅要求受位者有权有势，而且要求受位者立有顺应民意的盖世奇功。当时只有北伐后秦，收复汉晋故都长安与洛阳，才是顺应民意的盖世奇功。刘裕焦虑地等待机会。

义熙十二年（416年）正月，鲁宗之之子鲁轨在后秦的支持下，率兵围攻雍州的襄阳，给了刘裕北伐后秦的借口。二月，刘裕自封中外大都督，宣布北伐。然而朝廷大臣纷纷进言阻止。这并不奇怪，他们的思想比老百姓要复杂，主要担心北伐万一失败，偏安之局难保，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只有刘裕死去长婿徐逵之的叔父徐羨之一言不发。有人探问其中缘故，徐羨之道：“我官位刚到五品，志愿便已满足。于今慕容超、谯纵均已平定，大晋疆域东西万余里，相公仍不满足，还要平定后秦。相公的思想与我们大相径庭，深不可测，还是不干预的好。”徐羨之已经看出刘裕要立功当皇帝的企图。北魏大臣崔

浩听说刘裕准备北伐，一语破的地指出：“刘裕是晋安帝的曹操”。

八月，刘裕以长子义符为中军将军，刘穆之为左仆射、中军将军府军司，徐羨之为太尉左司马，共同负责太尉留府事；令徐州刺史刘怀慎负责京师保卫工作。一切安排妥当，刘裕宣告发兵。

北伐前锋分水陆五路。彭城内史刘遵考、将军沈林子率水军由汴水经荥阳入黄河西征，将军王镇恶、檀道济率步兵顺淮、淝直取许昌、洛阳。这水路二路是主力。刘遵考是刘裕的族弟。王镇恶是前秦宰相王猛的嫡孙，前秦被后秦取代，遂奔东晋，发誓要灭后秦以雪恨。此二人甚得刘裕信任。新野太守朱超石、将军胡藩率步兵由新野（在今河南）北趋阳城（今河南登封），将军沈田子、傅弘之率步兵径赴武关（今陕西丹凤），冀州刺史王懿率水军由淮转泗、济、清诸水入黄河。这水陆三路作为前二路的侧应和后援。刘裕亲率主力沿王懿所行路线北上。

不到 2 个月，王镇恶、檀道济一路军行神速，连克项城、许昌、成皋（今河南荥阳上街镇），占领洛阳；刘遵考、沈林子一路劈波斩浪，进入黄河。同时，王懿一路攻占了北魏的滑台（今河南滑县）；朱超石、胡藩一路北渡黄河，牵制住北魏军队；沈田子、傅弘之一路西行穿插非常顺利。刘裕率领主力也到了彭城。

眼见大功指日可建，刘裕迫不及待，于十一月派左长史王弘还建康，向朝廷索取“九锡”。这“九锡”是古代帝王尊礼大臣所赐给的九种一般只有君主才能享用的器物，从汉以降，索取

“九锡”成为权臣篡位的一个阶梯。十二月，诏备“九锡”之礼，并加刘裕相国，令总百揆，封徐州的彭城、沛、兰陵、下邳、淮阳、山阳、广陵和兖州的鲁、高平、泰山等十郡为宋公，规定位在诸侯王之上。相国在当时虽然也是最高荣誉官之一，但不象“三公”那么闲散，往往作为宰相的加官，真正是“百揆”之长。东晋 5 等封爵：公、侯、伯、子、男，专封异姓。王在 5 等封爵之上，只封宗室。刘裕封宋公，却位在诸侯王之上，也是一种殊荣。然而，诏书下到彭城，刘裕推辞不受。刘裕决非改变了主意，这样做，实际是魏晋以来权臣在篡位前必须施展的一项故伎。权臣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劲地谦让，表示自己不愿做大官，不愿享殊荣，不愿做皇帝，暗中却逼着朝廷一个劲地给自己加官晋爵，增荣添誉，直到无以复加，当政的皇帝最后让出皇帝宝座为止，表示人心所向，推辞不掉。大敌当前，刘裕还能分心玩弄这套政治把戏，说明他对平定后秦有充分的信心。

义熙十三年（417 年）正月，刘裕留三子义隆镇守彭城，亲率大军向西挺进；三月，到达洛阳。这时，刘、王 2 路已进克潼关，并分兵直到长安；沈田子、傅弘之一路已出武关进据青泥（今陕西蓝田）。八月，王镇恶、沈田子等军分别大破后秦守卫部队，攻克长安，俘获其主姚泓，送建康斩首。九月，刘裕至长安。

关中汉民年年盼望王师，刘裕的到来，使他们欢欣鼓舞。十月，诏进刘裕为宋王，新增徐州的海陵、东安、北琅邪、北东莞、北东海、北谯、北梁和豫州的汝南、北颍川、北南顿 10 郡为王国封邑。北伐果然替刘裕赢得了巨大声誉。刘裕陶醉得忘乎所以了。这时，刘裕对不邀自来的宋王爵位并不怎么感兴

趣,推辞不受,却愿接受美女的艳情,演出一场英雄伴美女的风流喜剧。姚兴的侄女有倾城倾国之貌,被俘之后,刘裕一见钟情,宠爱无比,不仅乐不思归,更将国家大事全部扔在脑后。

十一月,刘裕的心腹刘穆之在建康病死。消息传到长安,新任从事中郎谢晦见刘裕仍在偎香搂玉,大为着急。他屡次进谏,阐明利害,刘裕才恍然若悟。原来,刘穆之留守建康,本是刘裕的“定心丸”,现在突然死去,局势难免发生变化,如有不测,刘裕的前功就算尽弃了。事业终究比女人重要。刘裕断然将姚氏遣出,遥令徐羨之代刘穆之主掌太尉留府事务,以12岁的次子刘义真为安西将军,王修为安西长史,王镇恶为安西司马,沈田子、毛德祖为安西中兵参军,率兵1万,共同辅佐义真镇守长安,自己则于十二月仓猝返回建康。

关中父老听说刘裕要离开,纷纷含泪挽留,说:“亡国奴不沾王化,迄今已有百年,始见相公,人人相贺。长安汉代皇陵,是相公祖宗坟墓,咸阳汉代宫殿,是相公祖宗宅舍,相公难道忍心抛弃吗?”刘裕全然不为所动。在这关键时候,谁也不能使刘裕回心转意了。

刘裕回到江南,受封为宋王,公元420年代晋称帝,国号宋。但他北伐所收复的广大地区被匈奴赫连勃勃攻占了。自后,刘裕也就只想做偏安江南的皇帝了。

东晋自祖逖一直到刘裕的北伐,虽然都因内部矛盾而没能取得成功,但每次北伐不仅给当时野蛮的胡族统治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偏安江南,保持华夏正统的汉族政权起到了有力的掩护和保护作用。淮南北成为南北战争的缓冲地带,使长江流域得到比较长期的安定,有利于江南的开发和文化的发展。

第四章

南朝政权的更迭

第一节 刘宋王朝的兴衰

一、寒人皇帝刘裕

东晋末年，出身于地主阶级下层的刘裕取得了封建统治的最高权力。

刘裕，小名寄奴，历史上称为宋武帝。420年，他登上皇帝宝座，建立宋朝，做了两年皇帝，死去了。

刘裕是以镇压孙恩起义起家的。在镇压孙恩起义中，他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从一个普通军官，掌握了东晋兵权。在他之前，不少出身高门大族的将领，觊觎过司马氏的皇位，远一点的像王敦，近一点的像桓温，都失败了。403年，桓温的儿子桓玄，取代司马氏做了皇帝，只不过100天，他和他的追随者，就被刘裕打倒了。

东晋偏安，祖逖、庾亮、殷浩、桓温都曾北伐。他们不是得不到士族的支持，便是坐失时机，都没有成功。这时，北方的南燕和东晋接壤，经常侵扰东晋的边境。南燕是鲜卑慕容氏建立的政权，占有现在山东南部 and 江苏北部一部分地方。羌族在关中建立的后秦，统治着现在陕西、山西西南部和河南黄河以南的地方，也和东晋为敌。409年，刘裕北伐南燕，长驱过了大岷（现在山东沂县北），攻下南燕都城广固（现在山东益都县西北），俘获南燕主慕容超，取得了青州。416年，他分兵五路，水陆并进，举行一次北伐。不到一年，汉魏（曹魏）以来的名都——洛阳和长安，都被他打下了。长安自316年被匈奴人刘曜攻陷，盼望着汉族的旌旗，已经101年了。后秦主姚泓，被俘后送到了建康（现在江苏南京市，东晋的都城，后来南朝也在这里建都）。北伐的成就，提高了刘裕的威望。

在消灭南方割据势力方面，刘裕也做得很出色。从411年起，5年当中，他先后打败了卢循、刘毅、谯纵和司马休之，南方出现了一百多年来没有过的统一。当鲜卑拓跋部征服了黄河流域，继续向南发展的时候，统一的、比较强盛的宋朝把它阻止在长江以北，使比较发达的江南经济和文化，免受破坏，得以继续发展。

东晋司马氏的政权，是依靠南北大族，在汉族灾难深重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刘裕帝业的经营，与此却不尽相同。

西晋灭亡，北方士民纷纷避难来到江南。刘裕的祖先也在这时候迁到长江边上的京口（现在江苏镇江市）。京口一带，原来地广人稀，自从北方流民来了，逐渐成为东晋的重镇，号称北府。居民强悍，勇于从军。东晋在这里招募军队，练成一支

劲旅，叫做北府兵。北府兵在淝水之战立过功勋。这一支军队，后来被派去镇压孙恩起义。当时，刘裕是刘牢之的部下。刘牢之部下的其他军官，抢掠财物，军纪败坏，只有刘裕约束部属，纪律比较严明。

刘裕年轻的时候，种过地，砍过柴，捕过鱼，做过小买卖。京口有一家姓刁的大族，为首的叫刁逵，残害地方，称为“京口之蠹”。刘裕也受过刁家的欺侮，吃过苦头。有一次，他和刁家人赌博，输了，还不起赌债，还被刁逵缚在马桩上。

从刘裕的经历看来，他是属于地主阶级中的下层，所谓寒门的。他“奋起寒微”，正表明他的出身和那些高门士族的子孙不同。

刘裕的追随者，大多数也和他一样，没有门户可以依傍。他最亲信的刘穆之，在得志之前，常常到岳父家里去混饭吃，受人奚落。立过许多战功的王镇恶，是前秦宰相王猛的儿子，前秦灭亡后，流寓荆州，当他被刘裕提拔起来的时候，不过是个靠近边境的小县县令。

桓家是东晋的世家大族，刘裕讨灭桓玄，把这个士族的头目拉下了台。名门出身的王愉、王绥、谢混、郗僧施，在桓玄垮台之后，也一个个被刘裕杀掉了。这些人被杀，罪名不完全一样。在他们心目中，刘裕是个成不了什么气候的小人物。他们对刘裕的态度，都非常傲慢，结果碰得头破血流。

刘裕取得了政治上的最高统治地位，士族的势力，日渐衰落，但这一过程持续了 200 年，直到唐初，经过了又一次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的涤荡，才告结束。

刘裕临终的时候，顾命大臣中有一个叫谢晦的人。刘裕对

儿子说，谢晦这个人，很有才干，假如将来有人反对你，那就必定是他。谢晦是谢安一家的人，东晋头一号的名门出身，和这个出身寒微的皇帝之间，猜疑似乎特别深。

士族的统治地位被削弱了，专制主义的皇权重新抬头。宋以后的齐、梁、陈，和宋相比，各有一些不同，但在这一点上，却基本一样。

二、宗室内乱及衰亡

刘宋初期，王室成员渐渐在统治集团掌握了巨大权力，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元嘉六年（429年），宋文帝以弟刘义康入朝秉政，为司徒、录尚书事，后又加领扬州刺史，宗室重臣取代高门权臣执掌枢机。刘义康专总朝权后，尽心尽力，逐渐树立了权威，生杀由己，势倾天下。义康却不识大体，私置归属6千人也不告诉皇帝。元嘉十三年（436年）文帝病危，安排后事，而刘义康亲信竟去查阅东晋成帝死立弟康帝的经过和仪注的档案，结果文帝却康复未死。刘义康的发展对文帝构成了严重威胁，文帝特别加强了太子刘劭统帅的卫兵，防备刘义康。元嘉十七年（440年），文帝采取了果断措施，诛杀刘义康党羽，令义康出镇江州，剥夺了他的巨大权力。几年后，范晔等人图谋拥立刘义康失败，义康被废为庶人。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北魏军临江，文帝担心义康被人利用，终于下令处死刘义康，这是王室内乱的萌芽。元嘉三十年（453年），文帝想废掉手握重兵的太子刘劭，谋事不密，被刘劭先发制人，杀其父文帝自立。文帝第三子刘骏时任江洲刺史，听说父亲被杀，传檄

州镇声讨刘劭。讨伐军很快逼进到建康附近，刘劭出兵，失利退守。江夏王刘义恭（刘裕第五子）弃家出逃，刘劭杀刘义恭 12 子及有嫌疑的宗室长沙嗣王刘瑾、临川嗣王刘晔、桂阳侯刘颢、新渝侯刘阶，还曾遣使杀义康 6 子于安成郡。建康被攻破后，刘骏又杀其兄刘劭及其 4 子，兄刘濬及其 3 子。从此，王室间骨肉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

等武帝刘骏即位后，不愿意让其叔父南郡王刘义宣（刘裕第六子）继续担任地广兵强的上游重镇荆州的刺史，下令内调刘义宣为丞相、扬州刺史。刘义宣据荆州 10 年，兵强财富，举兵反抗，联结江州刺史臧质、南豫州刺史鲁爽起兵，声势浩大，孝武帝用尽全力才勉强将叛乱镇压下去，杀刘义宣并其 18 子。孝武帝因其弟南平王刘铄（文帝第四子）平素对他不太礼貌且曾为刘劭所用，用毒药把弟刘铄毒死。武昌王刘浑（文帝第十子）从小行为不端，后任雍州刺史，和左右人开玩笑写文檄自号楚王，并署置百官。孝武知道后，逼令自杀。竟陵王刘诞，在平定刘劭和刘义宣叛乱中屡立大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干，因此而遭到孝武帝的猜忌，竟陵王也暗自防备。孝武帝派垣阆率兵偷袭，被刘诞所杀。又遣派沈庆之率大军进围广陵，刘诞杀宗室刘遵考子刘琨之，并坚守 3 个月，城破被杀。大明二年（458 年）海陵王刘休茂出任雍州刺史，司马庾深之掌管府州事。休茂性急，想政由己出。庾深之等人每每压制，刘休茂经常怨恨。张伯超常犯过失，受到训斥。张伯超担心受处罚，力劝刘休茂杀庾深之等人以举兵自卫，纵使事败还可逃入北魏为王。刘休茂就率张伯超等杀庾深之等人，征发民众，传檄各地。参军尹元庆杀刘休茂并其同党。

泰始元年(465年),宋武帝刘骏死,子刘子业(前废帝)继位,杀孝武宠臣戴法兴等,刘义恭(刘裕第5子)等人阴谋废帝,被刘子业先发制人,杀义恭并其4子。刘子业猜忌晋熙王刘昶、率兵讨伐,刘昶被迫聚众起兵,事败北逃,归降北魏。刘子业因嫉孝武宠妃殷淑仪,即位后赐死殷淑仪的儿子刘子鸾、刘子师并其女。刘子业杀南平王刘铄之子刘敬猷、刘敬渊、刘敬先。刘子业不仅残杀骨肉,还杀了许多大臣名将、近臣密戚,搞得人心惶惶,朝不保夕。刘子业还计划把剩下的6个叔叔全部杀掉。这时宿卫将士也被刘子业的屠杀搞得惊恐不安,杀了刘子业,拥立文帝第11子刘彧为帝,是为明帝。他第二天就杀废帝同母弟、豫章王子尚,妹山阴公主楚玉等人。刘子业在死前派人去杀弟弟、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因为他排行第三,又据江州,而其父刘骏就是文帝第三子。据江州起兵而得帝位。当时子勋仅仅10岁,江州实权掌握在长史邓琬手中,起兵反抗。明帝即位后,邓琬在寻阳(今江西九江)拥立刘子勋为帝。子勋弟,郢州刺史临海王子綏(孝武四子)、荆州刺史刘子頊(孝武第七子)和会稽太守刘子房(孝武第六子)均由长史作主,起兵响应,雍州刺史袁颢、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萧惠开、广州刺史袁昙远、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淝州行事何惠文、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晋陵太守、义兴太守等纷纷起兵,拥护子勋,爆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以明帝刘彧为首的文帝系诸王和以刘子勋为首的孝武帝系诸王的王室大内乱。明帝首先击败了会稽北上之军,生俘刘子房,结束了东线战役。之后,战争持胶着状态,由于明帝将领张兴世等偷袭刘子勋部军粮得手,使刘子勋军10余万人不战自

溃。明帝杀子勛、子頊，陆续平定了上游，西线战役结束。明帝随后又把孝武帝剩余儿子全部杀掉。这时徐州刺史薛安都等人见明帝大局已定，遣使归顺，而明帝却想向淮北人展示威风，派张永等人率大军进兵淮北迎接薛安都等，导致薛安都等人的疑虑，纷纷投降北魏，宋朝淮水以北的广大地区沦陷于北魏，这样淮南就成为前线，南方从此衰弱了。

明帝即位后，并未停止残杀骨肉。泰始五年（469年），柳欣慰谋反，欲立刘祗（文帝第八子）。刘祗与其来往联系，事后被降职，第二年被逼自杀。山阳王刘休范不善讨明帝欢心，明帝担心自己死后，幼主临朝，不好控制，就派人在射雉场杀了他，伪称坠马死亡。建安王休仁和明帝多年友爱，在前废帝时同经危难，后又平定诸王叛乱，屡建奇功，赢得朝野信赖。明帝却很不高兴，在病危时担心休仁危害其后嗣，就编造罪状，杀了刘休仁。刘休仁被杀时，巴陵王休若为荆州刺史，后被征为南徐州刺史，部下王敬先劝其举兵反抗，休若逮捕了王敬先，报告了朝廷，出镇京口。就是这样，明帝也担心休若能得人心恐将来倾危幼主，赐死。明帝就这样把所有可疑的王族一个一个剪除了。明帝死，子刘昱即位，是为后废帝。

刘景素系宋文帝诸孙子之中年岁最大者，以南徐州刺史、镇北将军之职，镇守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宋明帝死后，本可立为君主，但由于他贤能清正，深得朝野拥护，因而引起外戚陈氏和权臣杨运长、阮佃夫等人的忌恨，怕其继承帝位后，难以控制，便立了10岁的刘昱。刘景素的心腹将领多劝他起兵。其镇军参军江淹则劝止，刘景素不悦。此时，刘景素的防御将军王季符得罪于刘景素，单骑逃亡建康，告发了刘景素谋反之

事，杨运长等欲即刻发兵征讨，袁粲、萧道成以为不可。不久，刘景素亦派其世子刘延龄入京陈述事情原委，朝廷免除刘景素镇（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的职务。

元徽四年六月，刘景素与录事参军殷洌、中兵参军垣庆延、参军沈颺、左暄等相谋，派人往返于建康、京口结纳贤士，网罗起兵力量。冠军将军黄回、游击将军高道庆、辅国将军曹欣之、前军将军韩道清、长水校尉郭兰之、羽林监垣祗祖皆与刘景素通谋。此外，京城一些失意的将校也暗中归向刘景素。曹欣之暗中计划先占据石头城，待皇帝外出时即发动政变。游击将军高道庆、长水校尉郭兰之等急欲起兵。刘景素觉得时机不到，多次加以制止。不久，杨运长、阮佃夫获悉了刘景素等的动向，便派使者周天赐诈降刘景素，并劝他即刻出兵。刘景素知道有诈，斩其人头送回京师。

七月初一，羽林监垣祗祖率数百人由建康投奔京口，说京师已经溃乱，劝刘景素速率军进击。刘景素便于当日起兵，士民响应的数以千计。当杨运长、阮佃夫获悉垣祗祖反叛之后，即下令建康戒严，同时派骁骑将军任农夫、领军将军黄回、左军将军李安民等率步兵，右军将军张保率水军，前去讨伐。七月初四，再派南豫州刺史段佛荣为都统。萧道成知道黄回有二心，但并不惊动他，只派李安民、段佛荣与他同行，萧道成则屯兵于玄武湖，冠军将军萧颐镇守东府。刘景素得知宋军来攻，欲切断竹里（今江苏句容北），以阻击宋军。但垣庆延、垣祗祖、沈颺却认为现正值天气炎热，宋军远来疲惫，让敌人前来，我则不需出动，以逸待劳，可一战而胜。段洌等虽也力争出击，但仍按垣庆延等人的意见行动。

任农夫军在不受任何阻挡的情况下，顺利进至京口，放火焚烧市区，垣庆延等却不敢与宋军战斗，只在一旁观望。本来就缺乏谋略头脑的刘景素，现已惊慌不知所措。黄回因受到段佛荣的牵制，且见京口兵微势弱，也不敢行动。张保的水军停泊于西渚（今江苏镇江），刘景素左右勇士数十人，进击水军，张保战败而死。但刘景素的诸将不能互相支援，以致又被宋军击败，宋水军逼近京口城下，沈颺先率部逃走，垣祗祖等跟着也逃散。只有左暄与宋军力战，但由于兵力过少而战败。七月八日，宋军攻下京口，殿中将军张倪斩了刘景素和其 3 个儿子，同党垣祗祖等数十人均被杀。

第二节 南齐王朝的兴亡

一、南齐王朝的建立

宋宫廷政变 和萧道成独揽大权

京口刘景素叛乱被平定后，后废帝刘昱更加骄纵无度，整日出游，途中遇到稍不顺眼的人即任意屠杀残害。《宋书》记载刘昱出游时残害人民的情景说：“从者并执铍矛，行人男女，及犬马牛驴，值无免者。民间忧惧，昼日不敢开门，道上行人殆

绝。”阮佃夫与班直将军申伯宗等相谋，欲乘刘昱出游时，逮捕并废除他，改立安成王刘准。事机泄露，刘昱下令将阮佃夫等全部诛灭。

太后多次训戒刘昱，刘昱很不满意，借端午节太后送他的扇子不好为由，命太医煮毒药欲毒死太后，左右人提醒他说，你若把太后毒死，就要在宫中守孝，还能出游吗？刘昱才没有毒死她。刘昱在诛灭散骑常侍杜幼文、司徒长史沈勃、游击将军孙超之等全家后，又忌恨萧道成的威名，欲将其剪除。刘昱进入萧道成府第，要侍从把箭靶画在萧道成的肚子上，亲自拉弓欲射。侍从向刘昱建议说：“萧将军肚子大，是很好的箭靶，如一箭将他射死，以后就不能再射了，不如改用骨箭头来射。”刘昱便改用骨箭头，一箭射中，哈哈大笑。后又亲自磨矛，声称“明天就要刺死萧道成”。萧道成忧惧，暗中与袁粲、褚渊等商议废除刘昱改立他人，袁、褚二人皆不愿支持。萧道成的功曹纪僧真却向他建议说：“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岂得坐受夷灭！存亡之机，仰希熟虑。”萧道成遂下定了自己起兵的决心。

有人劝萧道成回至其南兖州治所广陵起兵，萧道成的族弟镇军长史萧顺之等均建议他利用刘昱喜欢出游的弱点，谋划成功之策，这样既容易成功，又可避免万一失败全族被灭的大祸。萧道成遂打消了去广陵起兵的计划，改取宫廷政变的手段。为此，萧道成秘密勾结越骑校尉王敬则，皇帝的左右侍卫杨玉夫、杨万年、陈奉伯等 25 人，时刻寻找可以动手的机会。七月初七，刘昱又出游酒醉后，宿于仁寿殿。王敬则、杨玉夫、杨万年等乘刘昱熟睡之机，以皇帝的防身刀割下他的人头。由

陈奉伯将人头送至萧道成府中，萧道成即刻进入皇宫，以太后的诏令，拥立安成王刘准即位，这便是史称的宋顺帝。

萧道成出镇东府，任司空、录当书事、骠骑大将军。不久，萧道成独揽军国大事，安插心腹，左右一切，刘宋的天下，实已掌握于萧道成之手。

击灭沈攸之 和萧道成代宋建齐

宋泰豫元年(472年)七月，沈攸之被任命为都督荆襄等8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沈攸之自认才略超人，早已心怀异志。担任荆州刺史的要职，权势益大，便将郢州(州治在今湖北武昌)地区的精锐士马、武器，带去荆州(今湖北江陵)，并以征讨蛮夷为名，招募勇士，制造盔甲器具，整训军队，扩充实力。他把供应京城的武器统统留下，养马2000多匹，制造战舰千艘，府库不断充盈，拥有雄兵10万，已成虎踞长江上游之势，朝廷对此十分惧怕。

沈攸之逐渐不听朝廷的诏命，自专州中一切事务，他虽施政严刻，但吏治精明，部下不敢欺瞒于他，“境内盗贼屏息，夜不闭户”。此时，沈攸之已为宋朝最强大的方镇势力，成为萧道成篡宋的巨大障碍。

萧道成见沈攸之势力日增，便派心腹部将张敬几为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雍州刺史，镇守于襄阳(今湖北襄樊)，以牵制沈攸之。张敬几到任后，沈攸之怕遭受张敬几的突袭，暗中严加戒备。但张敬几事奉沈攸之毕恭毕敬，贡奉不断。沈攸之为张敬几的表面忠诚所迷惑，甚至几次欲以打猎为名，约张敬

几在荆、雍两州州界相见。张敬几则回答说，咱们两人心中默契就行了，形式上不可显露的太明显。张敬几把这一切均密报了萧道成。张敬几为掌握沈攸之的动向，便与老友沈攸之的司马刘攘兵更加密切交往。张敬几怀疑沈攸之将要起兵，派人秘密询问刘攘兵，刘攘兵没有正面回答，只带给张敬几只马蹬，张敬几心领神会，从而做好了防备。

宋顺帝昇明元年（477年）十二月，沈攸之宣称太后派来使者，令其举兵。随之便调集军队，派出使者邀张敬几、豫州刺史刘怀珍、梁州刺史范柏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内史王文和同时起兵。张敬几、刘怀珍、王文和皆斩杀来使，并急报萧道成。范柏年、姚道和、庾佩玉均持观望态度。十二月十二日，沈攸之派辅国将军孙同率宁朔将军中兵参军武宝、龙骧将军骑兵参军朱君拔、宁朔将军等五将领兵3万为前锋，顺江东下，以司马刘攘兵军沈慧真、龙骧将军中兵参军王道起等五将率军2万继进；命中兵参军王灵秀等四将分别率军先兵出夏口，占据鲁山城（今湖北武汉市汉阳）。沈攸之自率录事参军兼司马武宗茂、参军沈韶、中兵参军皇甫贤、胡钦之，东门道顺等跟进。沈攸之在发兵的同时，致书萧道成，指责他妄杀君王，培植亲信，把持朝政，欲篡夺刘宋天下。朝廷获悉沈攸之起兵，尽皆惊惧。

萧道成入守朝堂。以侍中萧嶷镇守东府，抚军行参军镇守京口，以郢州刺史武陵王刘赞为荆州刺史，以右卫将军黄回为郢州刺史，督前锋诸军以迎击沈攸之军。

萧道成正在忧虑对付沈攸之起兵之际，内部又发生了大臣袁粲等策划除掉萧道成的事件。结果，由于袁粲集团组织失

调,被萧道成各个击灭。将军黄回本来也是参加袁粲起事的一员,但他见事机败露未敢发动。萧道成确知此事,仍继续对黄回安抚使用。十二月十四日,沈攸之进至夏口,部将宗俨之劝其进攻郢城(今湖北武昌),臧寅则认为:“郢城守军虽少,但地势险要,进攻需消耗较多军队,且非短时间能够攻下,这必然会损害军队的锐气。现应顺江直趋建康,指日可胜,如若我夺取了京城,郢城小邑何愁不克。”沈攸之采纳其计,正欲发兵之际,郢城守将柳世隆为牵制沈攸之,出兵挑战,并派人以恶言辱骂沈攸之。沈攸之被激怒,遂改变了东下的计划,下令全军登岸攻城,柳世隆督军防守,沈攸之久攻不下。

沈攸之用尽精锐部队,攻击郢城至昇明二年(478年)正月,几次为柳世隆军击退,萧贲派军主垣敬等八军占据西塞(今湖北黄石东长江南岸),以声援柳世隆。沈攸之命其部将皇甫仲贤向武昌(今湖北鄂州),以阻挡垣敬等军;以中兵参军公孙方平率马步3000进击西阳(今湖北黄冈东)。不久,平西将军黄回率军赴至西阳。

沈攸之本来就不得人心,兵发江陵(今湖北江陵)时,便有不少士卒逃亡。攻击郢城1月不克,士卒疲惫,逃亡者日益增多,沈攸之无法制止。沈攸之的司马刘攘兵用箭将降书射入郢城,请求向柳世隆投降,柳世隆已决定接纳其投降,刘攘兵于正月十九日晚,烧营逃走,士卒看到军营火起,争相逃散。沈攸之得悉,愤怒不已,斩刘攘兵的侄子、女婿,清晨率大军撤走。先渡江至鲁山,部众纷纷逃散。后来,复收集2万余众,退向江陵。当初,在沈攸之率军东下之后,雍州刺史张敬几便乘虚偷袭江陵,江陵守将沈攸之子沈元琰、长史江七等,夜间听到鹤

啼,以为敌军来攻,即弃城逃跑。张敬几顺利占领了江陵,将沈攸之的子孙全部斩杀。沈攸之行至距江陵约剩百里之遥,获知江陵已被张敬几占领,士众大惊而散,沈攸之无处可归,与儿子文和走到华容(今河北监利北)边界,在栎树林中自缢而死,当地人斩下其首级送至江陵。至此,沈攸之的势力全部为萧道成平定。

消灭了沈攸之后,萧道成认为南兖州刺史黄回终究会成为其夺取宋王朝政权的障碍,便于樛明二年四月,将黄回召至东府,命桓康率数十人将其杀死。

萧道成急欲夺取刘宋的天下,便请贤士谢朓来商,谢朓一言不发。太尉右长史王俭深谙萧道成的心意,便向萧道成进言说:“功高不赏,乃古今常见之事,以公今日的地位,不是应当即皇帝位吗!”萧道成听后,心中暗喜,但表面却装做严肃地拒绝。王俭因而又说:“刘宋失德,不是阁下将不能支持到今天,人们感激之情很快便会淡薄,阁下若稍作推辞,即会丧失人们的期望,非但不能成就大业,恐怕连个人的身家性命也难以保全。”萧道成深为满意。随即,亲自去找中书监、司空褚渊商量,褚渊因萧道成未明确地宣称欲当皇帝,佯装不知,未说任何劝进之词。

建元元年(479年)四月二十四日,宋顺帝被逼将帝位禅让给萧道成。

萧道成即位前后,杀尽刘宋皇族,以绝后患。萧道成为了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巩固政权,针对宋末情况,曾减免一些百姓逋租宿债,减轻市税。也曾下令禁断召募部曲,安抚流民还乡。检定黄籍,整顿户口。对于从军征战、未被录用和乡土

沦陷的士庶，下令量才任用。曾下令修建学校。这一切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从而给南方带来一段稳定的时期。

二、重蹈覆辙

公元 479 年，宋朝灭亡了，代之而起的是齐朝。齐朝是萧道成建立的，故亦称“萧齐”。历史书上又称“南齐”。

萧道成（427—482 年），即齐高帝，南兰陵（今江苏常州市西北）人。他原是个布衣，本没有远大的志向。初起，他在戍边的地方部队中充任个地位低下的参谋人员。他为人谨慎、能干，屡屡借助战功升迁。宋朝皇族在自相杀伐的时候，统领中央禁卫军的大权落入萧道成手中，他遂成为朝中的四位显贵人物之一。

一天夜间，小暴君又扬言要杀侍卫官。侍卫官乘他熟睡，先把他的头割了下来，送给王敬则。王敬则立即派人给萧道成送去。但是，萧道成死也不敢开门，怕是小暴君诳他的恶作剧。无奈，只好把人头隔墙扔了进去。萧道成亲自用水把人头洗净，仔细端详，认准确是小皇帝的人头时，才下令打开大门，披挂上全身戎装，火速率军进驻了皇宫。

天明，萧道成召集重要朝臣会议，商讨皇权应该属于谁。皇族的首脑刘秉和士族领袖袁粲略一迟疑，平时一贯和蔼可亲、谨慎从事的萧道成却一反常态，“须髯尽张，目光如电”，咄咄逼人。这时，萧道成的同谋王敬则忽地拔出白刃，在旁跃起嚷道：“天下事都应归于萧公，敢有开一言者，血染敬则刀！”并

要萧道成马上登上皇帝宝座，说：“要趁热打铁。”

萧道成自幼从儒学大师雷次宗读过儒家经典，熟悉封建王朝更迭的历史，同这个小吏出身的王敬则毕竟不同。他还要依先朝惯例，演出一场所谓“禅让”的历史剧。

这出戏差不多演了两年。当公元479年4月演出关键性的最后一幕时，操在萧道成股掌间的13岁的小皇帝刘准异常惊恐地逃到宫内佛殿中藏在佛盖下，终于被搜出，押上了板车。小皇帝惊恐地问：“是要杀我吗？”押送皇帝的王敬则说：“不会的，送你到另一座宫殿去住，你的祖先取代司马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小皇帝一路上涕泪涟涟，还喃喃地说：“但愿以后我辈辈都不再降生到帝王家！”

萧道成开国以后，就一心盘算着如何为子孙后代建立万世的基业。他临死前还谆谆告诫子孙们：“我本是个布衣，从来没想到会做皇帝。那是因刘宋骨肉相残，弄得国亡族灭，才为我大齐所取代。你们要以宋为鉴，兄弟和睦，骨肉恩爱，切不可……”

然而，历史好象故意在嘲弄这位布衣皇帝的主观臆想，在他儿子武帝死后，萧氏子孙也同刘氏子孙一样，演出了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历史悲剧。勾心斗角，叛乱迭起，宗室自相残杀，一年之内居然换了三个皇帝，南齐王朝元气大伤，政权的更迭势在难免。

三、萧衍的崛起

建武元年(494年)十一月，北魏趁齐朝内讧，大举南侵。

建武二年二月，由刘昶、王肃率领的一支北魏军队，到达司州，猛攻义阳郡（今河南信阳附近）。齐明帝萧鸾命江州刺史王广之率军增援，萧衍为冠军将军、军主，随援军北上，归王广之指挥。义阳之战中，萧衍先是夜率精兵，解救了陷在重围中的齐朝大将徐玄庆的人马；再是施离间之计，引起北魏将领刘昶、王肃的不和，趁机纵火夹击，大破敌军。北魏孝文帝听说，忙致书刘昶、王肃，告诫道：“萧衍善用兵，不要与他争锋，等我亲自对付他！”北魏皇帝对萧衍如此重视，齐朝皇帝对萧衍却起了疑心。萧鸾本来已经委任萧衍为司州刺史，这时，不得不把萧衍调回建康，严加看管。

萧衍在建康任太子中庶子，领四厢直，镇守石头城。他知道自己处在萧鸾的临视之下，便深自韬晦，遣散家兵，乘着折角小牛车四处游玩。萧鸾见萧衍似乎胸无大志，才渐渐放宽了心。

建武四年（497年）夏天，萧鸾得了重病。一天晚上，萧衍与张弘策醉醺醺地坐在凉席上，仰望星空，谈论国家大事。张弘策问萧衍：“你看星象如何？有什么大事要发生？”萧衍答：“汉北有失地之象，浙东有急兵之征。今冬北魏兵将南侵，届时汉北之地尽失；萧鸾久病多疑，人心不安，浙东王敬则必将兴兵，然而无功。由此引起天下大乱，西北边疆当有英雄出现。齐朝的天命，至此而尽。”弘策又问：“乱世英雄，究竟是谁？”萧衍得意地笑道：“东汉光武帝的名言说得好：‘安知非我！’”弘策大喜。

建武四年十月，北魏孝文帝果然亲率大军攻雍州（今湖北襄阳地区）。雍州刺史曹虎原是萧贲的心腹，不满萧鸾篡位弑

君的罪恶行为，几次扬言要率州投降北魏。雍州是齐朝的西北大门，山河形胜，兵马强壮，如果为北魏所得，齐朝的天下将会大大动摇。萧鸾忙派萧衍和右军司马张稷星夜赴雍州，许以解围之后，以萧衍为雍州刺史。张弘策兴奋地对萧衍说：“夏夜的预言开始应验了。”萧衍摆摆手，笑道：“天机不可泄露。”

萧衍、张稷至襄阳，曹虎的官位高于他们二人，互不统属。萧鸾担心引起矛盾，派左民尚书崔慧景总督诸军。第二年（498年）三月，崔慧景率联军北上，行至邓城（今河南邓县），与北魏孝文帝亲率的10万大军突然遭遇。崔慧景惊慌失措，指挥不当，全军大败。萧衍所部被北魏将军宇文福击败，萧衍单骑逃回襄阳。至此，汉北之地尽失。

同一时期，萧鸾由于病越来越重，看到萧道成、萧贲的子孙，尚未被杀的日渐长大，终究是个隐患，复以屠刀相向。河东王铉、临贺王子岳、西阳王子文、永阳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阳王子珉、湘工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阳王昭粲、巴陵王昭秀等先后都被杀死。王敬则在浙东心不自安，四月，举兵反，但五月即兵败被杀。

七月，萧鸾死，太子萧宝卷即位，是为东昏侯，改元永元。

萧鸾在死之前夕，想到与萧衍的一段患难之交，下诏正式委任萧衍为雍州刺史。萧鸾原指望萧衍能尽忠辅佐他的儿子，没想到萧衍早就有不臣之心了。

萧衍占据雍州之初，采取的是不慌不忙、坐以待变的态度。他把妻子郗徽及所生三女（萧玉姚、萧玉婉、萧玉嬛）接到襄阳，免得被东昏侯留作人质。郗徽怨自己没能给萧衍生个儿子，劝萧衍在这段平静时间内娶一房侧室。萧衍欣然同意，便

娶一姓丁名令光的女子为妾。丁氏原籍谯国，世居襄阳，萧衍娶她为妾，也就团结了襄阳的部分土著，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永元元年（499年）八月郗氏病死。此后，平静的生活结束了。

原来，东昏侯做皇帝后，吃喝玩乐，不务正业。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柘、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轮番值日，处理朝政，时称“六贵”。萧衍听说，心中高兴，对张弘策道：“一国三公，无所适从。今六贵临朝，必将引起权力之争。大乱一起，机会便来，必须早作安排。做不成皇帝，也得当个周文王。”于是，一面招贤纳士，征兵买马，一面通知在建康做官的诸弟速来雍州聚会，一面派人去益州与做刺史的长兄萧懿商量应变之计。

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投到萧衍的麾下。其中最有才干的是吕僧珍。他是萧衍父亲萧顺之官豫州刺史、领军将军时的老部下，初到襄阳，萧衍即委以中兵参军的重任。他很会钻营，协助萧衍招收武勇之士万余人，同时自己私招敢死之士数千人；协助萧衍广伐材竹，沉于襄阳之西的檀溪，储作造船之资，同时自己私造舟橹数百张，准备将来兵员工具不够用时，突然献出，博得萧衍的特别奖赏。

萧衍十兄弟，除长兄萧懿在益州，次兄萧敷、长弟萧畅几年前病死外，二弟萧融、三弟萧宏、四弟萧秀、五弟萧伟、六弟萧恢、七弟萧愔，均在建康做官。他们中间，萧伟和萧愔胆子最小，听到兄长的召唤，急忙弃官归雍；其余四人，则认为兄长实在多虑，都不愿放弃做京官的机会，仍留在建康。

这时，萧懿刚由益州迁官郢州。萧衍知道萧懿对齐朝十分

尽忠，特别委托张弘策亲去郢城（今湖北武昌）劝说萧懿。萧衍在信中写道：“主上昏虐，臣下奸邪，互相猜忌，必有大难。我们兄弟如能同心，雍、郢联合，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废昏立明，易于反掌。”张弘策也反复陈说厉害，直到口干舌燥。然而，萧懿一句也听不进去。

不久，六贵果然发生内讧。这时的东昏侯，行为非常乖僻，手段日渐狠毒。萧鸾临死前，曾对东昏侯说：“作事不可在人后。”意思是说，凡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东昏侯铭记于心。此时，他瞅准机会，抢先下手，不多时，便将六贵杀得一个不剩。继而大诛朝臣，弄得人心惶惶，不知死所。

永元二年（500年），豫州刺史裴叔业听说东昏侯诛戮大臣，内心甚惧，派亲信到襄阳见萧衍，请问自安之策。裴叔业在信中说：“我觉得，留在齐朝，早晚难免被杀，不如投降北魏，还可以封个河南公。”萧衍复信答道：“小人当政，谋不及远。如果真的相逼，只须率兵2万断建康退路，天下大事，一举可定。投降北魏，东昏必以新人代守豫州。这样，北土本来不可久留，而南归之望又永远断绝了。”萧衍自己不愿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但是，裴叔业的想法不同。没过多久，他终于投降北魏去了。东昏侯让萧懿代为豫州刺史。

这年三月，平西将军崔慧景发动叛乱，攻围建康，东昏侯飞书向萧懿求援。四月，萧懿挥师东下，击杀崔慧景，解了建康之危。东昏侯奖励萧懿，特别升他为尚书令。东晋南朝，尚书省是国家最高政务机构，尚书令是尚书省最高长官，相当宰相。萧懿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在建康的诸弟也都兴高采烈，同欢合庆。这时，萧衍却致书萧懿，告诫道：“平乱之后，本应有

大的封赏。但功高望重,即使逢明君贤主,也难自立。兄长所逢却是昏君暗主,再难免祸。如果愿意借平乱之威信,废昏立明,可建万世之功;不然,还望兄长速还历阳(豫州刺史治所),以防不虞。一旦放下兵权,逼留建康,后悔就来不及了!”萧懿认为纯属危言耸听,哪里听得进去。

东昏侯见崔慧景之乱这么容易就平息下去了,更加无忧无虑,追欢逐乐。宫殿的墙壁上绘满了春宫图画,与亲信反复观赏。把黄金凿成莲花,铺在殿内,让所宠潘妃在上面行走。最爱半夜出游,前呼后拥,鼓乐齐鸣,搅得建康官兵心神不安。为此,萧懿特任萧畅为卫尉,控制宫门管钥。东昏侯的行动受到限制,心里很恼火,手下宠臣茹法珍、王暄之等对萧懿兄弟也极为不满。有人劝萧懿不要坐以待毙,趁早废黜东昏侯及其党羽,萧懿不从。消息传到宫中,东昏侯与茹法珍、王暄之等马上制定了捕杀萧懿兄弟的方案。宫臣徐曜甫探明情况,急忙准备了一条小船,劝萧懿星夜逃亡襄阳,萧懿却正色道:“自古皆有死,岂有叛走的尚书令!”诸弟不愿与长兄同死,但又说长兄,都暗暗着急。永元二年十月,东昏侯终于赐萧懿自尽。萧懿临死前还想尽点愚忠,说:“家弟在雍,深为朝廷忧之。”萧融也被捕获处死。萧宏、萧秀、萧恢及叔父萧崇之子萧昺,如同丧家之犬,在小巷里东躲西藏。萧懿的好友,领军长史徐勉,最后实在看不下去,便冒风险把他们全部藏在自己家里。

噩耗传到襄阳,萧衍不得不提前采取行动了。

四、从雍州起兵到建康易帜

东昏侯杀了萧衍的兄弟，知道萧衍迟早会与自己为敌，决定抢先下手。永元二年（500年）十一月，他派禁卫军官郑植只身去襄阳，以探访其弟雍州宁蛮校尉府长史郑绍叔为名，见机行刺萧衍。郑植无心刺杀萧衍，由于家属在建康为人质，才不得不虚与周旋。他一到襄阳，就把这个阴谋告诉了郑绍叔。东晋南朝，雍州刺史例兼宁蛮校尉，郑绍叔为萧衍的僚佐，一向对萧衍忠心不二，马上向萧衍作了汇报。当晚，萧衍在郑绍叔家里宴请郑植，对郑植笑道：“朝廷派你刺我，现在是最好的机会。”宾主相视大笑，尽欢而散。次日，萧衍亲自领着郑植参观自己强壮的兵马，精新的武器和高大的战舰。郑植对郑绍叔说：“雍州实力雄厚，不可图也。”遂空手回建康复命。

东昏侯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同月，派新任益州巴西、梓潼二郡太守辅国将军刘山阳率精兵3千，以赴任为名，溯江西上，联络荆州兵，偷袭襄阳。当时，西中郎将、荆州刺史萧宝融是东昏侯的胞弟，西中郎将府长史萧颖胄是东昏侯的从叔，东昏侯认为此举必定成功。但他没有考虑到，萧宝融年仅13，大权全归萧颖胄掌管，萧颖胄是自己出了五服的从叔，已很疏远，而且对萧衍十分敬畏。萧衍得到消息，马上有了主意。他先派萧颖胄的故吏，参军王天虎，立即赶到荆州首府江陵，到处散布“山阳西上，并袭荆、雍”的谣言，以扰乱萧颖胄的思想和荆州官民的心绪。萧颖胄本来就不愿而且不敢偷袭雍州，因为：唇亡齿寒，于己不利；雍州兵强马壮，偷袭也难成功。现在，

萧颖胄听信谣言，怀疑刘山阳西行真想一箭双雕，更加犹豫。萧衍见此计成功，又派王天虎星夜送两封信去江陵，一封给萧颖胄，一封给颖胄之弟，现任南康王府僚佐的萧颖达，信内都只写“天虎口具”四字。王天虎走后，萧衍洋洋得意地对张弘策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上次派天虎去江陵，广为交结。这次紧急送信，仅给萧氏兄弟，便会引起官民的疑心。信内仅有‘天虎口具’四字，萧氏兄弟问天虎，天虎却什么也不知道。天虎是萧家故吏，萧氏兄弟又说不出信的内容，荆州官民必然认为他们有意隐瞒，产生自危之感。这样一来，刘山阳也不敢随意冒进。萧氏兄弟受疑于本州官民，又受疑于朝廷，最后必然与我联合，共同举兵。这叫做‘两封空函定荆州’。”

事情的发展正如萧衍所预料的一样。荆州官民对萧氏兄弟极为不满。刘山阳行至江安（今湖北公安），忽然逗留 10 余日不进。萧氏兄弟大惧。萧颖胄夜召僚佐会议，僚佐都说：“萧衍养精蓄锐已非一日，荆州兵又向惧雍州兵，偷袭必不能成功。即使成功，也难为朝廷所容。不如杀了刘山阳，荆、雍联合共抗朝廷。”萧颖胄乃杀王天虎，以示对朝廷忠心不二，诱刘山阳入城。刘山阳中计，刚入城就被杀死。荆州愿意与雍联合了。

得到消息的当夜，萧衍便召集张弘策、吕僧珍、长史王茂、别驾柳庆远、功曹吉士瞻等心腹，商定起兵的计划。次日清晨，大集僚佐，宣布奉南康王萧宝融为帝（是为和帝），发兵顺汉水东下，讨伐东昏侯。竟陵太守曹景宗劝萧衍先迎南康王来襄阳，正式即位建号，然后出师。王茂也认为把南康王放在别人手里，别人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对雍州不利。萧衍笑道：“大事不成，贵贱同死。我如成功，则威震天下，岂能受人节制！”

雍州大军始发，四方纷纷响应。汝南百姓胡文超纠集乡民，袭击东昏侯的部队。戍主张惠绍、戍副冯道根，均因母死，在家守孝，听到消息，认为机不可失，各自邀集同乡子弟，投奔雍州。上庸太守韦睿、华山太守康绚，也各率郡兵，投奔萧衍。同时，荆州大军沿江东下，湘州刺史杨公则也率军入江直取郢州。中兴元年（501年）二月，雍、荆、湘3州大军在江汉合流处会师，分别急攻郢、骑、汉口、鲁山、偃月、西阳、武昌诸城。

这时，东昏侯所派骁骑将军薛元嗣，已率军与郢州刺史张冲会合，共守郢城。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黄鹤楼下死尸堆积如山，郢城内外臭气冲天。三月，郢州刺史张冲突然病死，薛元嗣独守郢城，渐感难支。不久，联军大破建康新派的增援部队，郢城绝望。七月，薛元嗣投降。周围诸城也相继投降。新政权任命萧衍为征东将军。萧衍率联军东下，直指江州。

江州刺史陈伯之，土匪出身，年十三四即挟刀行劫，威震乡里。从军之后，敢于以性命赌博，屡建功勋，已任刺史一职。他对现在的地位十分珍惜，萧衍对付这种人办法更简单。他告诉诸将：“用兵须用声威。今郢城初下，建康援军受挫，浔阳人心惶惶，可传檄而定。”从俘虏中找到陈伯之的故吏苏隆之，厚加赏赐，令传话给伯之，只要伯之肯归顺，新政权不仅让他继续做江州刺史，还任命他兼安东将军。陈伯之考虑爱子在建康，不便公然归顺联军，请萧衍停军稍待，进一步商量条件。萧衍知道陈伯之想脚踏两只船，即日挥师东下，以实力要挟。八月，陈伯之投降。联军继续东下。

九月，萧衍率军到达建康西面的新林。徐勉携萧宏、萧秀、萧恢及萧昺潜至新林迎接联军，萧衍见诸弟无恙，心中大悦。

建康文武百官大多捎书给萧衍，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萧衍又是一阵高兴。好事往往接踵而来。没过几天，襄阳飞书报告，本月丁氏喜生贵子（即昭明太子萧统）。萧衍快到不惑之年，才得了一个儿子，喜悦的心情更是难以自己。为了早日结束战争，见到爱子，他宣布对建康展开全面进攻。

这一战，又比攻郢城激烈许多。建康兵员不足，东昏侯出囚徒配军。冠军将军王珍国勇猛异常，率部浴血顽抗，不几天，秦淮河积尸如山，西城成了一片废墟。十月，建康周围的京口、广陵、瓜步、破墩、琅邪、新亭、东府诸城相继被联军攻占，建康成了一座孤城，对联军已经构不成什么威胁了。

这时，萧衍最担心的是荆州的局势。联军初起时，益州刺史刘季连首鼠两端，并不表态。手下巴西太守鲁休烈、巴东太守萧惠训，却趁荆州空虚，派兵偷袭江陵。江陵西防重镇峡口不久即被攻破，萧颖胄大惧，向萧衍求援，希望能让湘州刺史杨公则回师解围。当时联军正在攻打郢城，无法抽师回防；如果江陵失守，联军将腹背受敌，情况十分不妙。萧衍只得先顾眼前，飞书安慰萧颖胄，说：“益州乌合之众，成不了气候。二弟（萧传、萧憺）留守襄阳，情况紧急时可以为援。”后来幸好益州兵中途受阻，没能继续东进，荆州转危为安。但是，事态的发展千变万化，现在荆州的情况怎样，萧衍丝毫不知，自然非常担心。十一月底，突然接到荆、雍快报，说萧颖胄死，荆州骚动，西中郎将府中兵参军席阐文已派人去襄阳迎萧憺主持荆州军政大事，局势逐渐平静。荆州落到萧憺的手中，萧衍没有后顾之忧了，心情顿时轻松下来。

这时建康的情况也越来越有利。东昏侯封传说中的神人

蒋子文为灵帝，迎神像于后堂，派巫师日夜祈福。自以为有神人保佑，万事不须担心，依旧昼寝夜游，通宵作乐。听到宫外战鼓敲响，便披着大红袍，搂着妃嫔，登景阳楼观战，指东道西，以为笑乐。将士想要封赏，后宫藏钱无数，他却一毛不拔。大臣纷纷投奔联军，将士个个牢骚满腹。宠臣茹法珍、梅虫儿却向东昏侯建议：“大臣将士不尽全力，使长围不解，都应该处死。”于是人心思乱。十二月，王珍国密遣亲信献明镜于萧衍，表示其心可照；萧衍还报以断金，用《易经》“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之意，表示愿意合作。王珍国遂与卫尉张稷商量政变计划。张稷曾与萧衍同救雍州，对萧衍早有好感，一口答应。几天后的一个深夜，王、张率兵潜入宫中，杀死东昏侯，取下首级，由文武百官署名送给萧衍。建康换上了和帝萧宝融的旗帜。

第三节 梁王朝的兴衰

一、梁武帝的佛教政治

齐朝末年，雍州刺史萧衍率军攻下建康，禅代称帝，是为武帝，国号梁。

萧衍(464—549年)，字叔达，南兰陵人。他做了47年皇帝，活到86岁。他自幼酷爱读书，至老手不释卷，对经史都有研究，曾撰《群经讲疏》200余卷，《通史》600卷。诗也作得很

好，“洛阳女儿名莫愁”的诗句至今仍在传诵着。他还是一个草隶兼长的书法家。

梁武帝统治时期，曾一度出现文化盛世之象，连北方的敌国也颇为佩服。称道他对政务的勤奋、冬季四更就起床，点起蜡烛，批阅奏章，处理公务，手都冻裂了，也不在乎。赞美他生活节俭，一日三餐都是蔬菜粗米，一床被子盖两年，一顶帽子戴三年都不肯换。

梁武帝晚年信佛甚为诚笃。每天只食一餐，也不饮酒，不听音乐（他自己是一个精通乐律的音乐家），穿的衣服质料全是棉花制的，不用丝绸。因制取丝绸要杀死众多蚕的生命，同佛家不忍杀生害命的经义是不合的。每当朝廷要判处一些罪犯的死刑，他就好多天现出不高兴的神情。后来他索性声言连皇帝也不做了，愿皈依佛法，出家为僧，4次舍身于建康城中最大的寺院同泰寺。因此得了个雅号，被称作“皇帝菩萨”。

皇帝菩萨的最大“政绩”之一，就是营寺塔、造佛像，使佛教的传播在南朝出现了空前的盛况。建康城东西南北各40里，京城内外寺院一座连着一座，崇楼峻阁，高台宝塔，耸入云天。唐诗人杜牧曾歌咏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以想见，其情其景多么壮观。梁朝有人口大约500万人，仅建康城内的僧尼就多达10万。每座寺庙中都役使着叫作“白徒”、“养女”的寺院奴婢。总计全国人口，寺庙几乎占去一半。寺庙不给政府输纳租税，还不时捞到大量的施舍。梁武帝4次舍身，每次都得以巨款赎回，总计花去4万万钱。

皇帝菩萨的“政绩”之二，就是不但养肥了手捻佛珠、身披袈裟的寺院地主，也养肥了皇族和世家这个统治阶级。他的六

弟临川王萧宏，贪婪成性，百般聚敛，仓库有百间，藏钱的每间有钱千万，贴有紫封，共有 30 余间，计钱 3 万万。其他则满装着丝、绸、漆、蜜、蜡、朱砂等，各种资财，不可数量。梁武帝一次到他家去，要查看他的库房，萧宏非常害怕，怕哥哥那么节俭而自己搜刮这么多，定会受到处罚。谁知梁武帝看了以后却连连称赞：“阿六，你很会处理生活啊！”

皇帝菩萨的“政绩”之三，就是弄得老百姓“肌肉略尽”，“骨髓俱罄”。所到之处“人人厌苦，家家思乱”。

皇帝菩萨的“政绩”之四，则是全国百姓不堪驱使，士兵毫无斗志。每次征发，均得木枷铁锁，否则就都跑光。

梁武帝末年（548 年），梁朝的统治已濒临山穷水尽的境地，这时又发生了侯景叛乱。

二、“侯景之乱”

在南朝梁武帝末年，发生了一段历史悲剧，叫“侯景之乱”。

侯景，羯族，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早年，他曾参加过六镇起义，不久即叛降北魏尔朱荣，充当先锋，反过手来镇压葛荣起义，并因功升迁定州刺史。高欢灭尔朱荣后，侯景又投靠高欢。过了不久，便成为东魏的一员大将，拥兵 10 万，镇守河南 13 州。公元 547 年高欢死后，侯景又以河南之地作为进见礼，投降了西魏。西魏深知侯景狡诈多变，便采取陆续接管的稳进策略，逐州逐镇的占领侯景献地 7 州 13 镇。同时，又召侯景入长安，企图解除其兵权，免留后患。这时，侯景东面有东魏高澄

派兵进逼，西面有西魏明助暗压，两面受敌，十分不利。因而，他又转而投降南梁，意图利用南军，牵制东魏。

老朽昏庸的梁武帝萧衍，竟想借侯景之力乘机进复中原，决定接纳侯景，封为大将军、河南王，就此引狼入室。梁武帝又派他的侄子萧渊明，率军北上，声援接应。但由于主将无能，士兵怯战，在寒山堰一战中，梁军几乎全军覆没，萧渊明也被东魏生俘。东魏又马上回师进击侯景。侯景大败，只好率八百步骑，南投梁朝辖境的寿阳城。通过这个曲折过程，侯景看清了南梁腐朽虚弱和可欺。

东魏取得军事胜利以后，又展开外交攻势，向南梁提出建议，只要除掉侯景，立即归还萧渊明和其他战俘。其实，这是有意挑起南梁与侯景之间的冲突，以收渔人之利。梁武帝不加深虑，回答东魏说：“贞阳（萧渊明为贞阳侯）旦至，侯景夕返（遣返）”，同意了东魏条件。侯景本来就认为南梁衰朽，很有染指野心，说过：“我取河北不成，取江南却有把握”。因此，当他知道梁武帝与东魏的议和情况后，就毫不犹豫地公开叛梁。

公元548年，侯景的军队袭取谯州（今安徽滁县），直逼长江北岸。梁武帝闻讯，急忙派他的侄子，平北将军萧正德布防长江，保卫建康。先前梁武帝无子，过继其弟萧宏之子萧正德为皇储，后来生了萧统，又将萧正德送还萧宏。萧正德失去继承皇位的机会，一直耿耿于怀。侯景借机煽诱萧正德，以推翻萧衍，拥戴他作皇帝为诱饵，约为内应。侯景兵马到了江边，便坐上梁朝平北将军派来的大船，大大方方地过了大江。接着萧正德权欲熏心，又无耻地引领叛军越过秦淮河，大开城门，迎侯景进入建康。侯景乃集中兵力，围攻梁武帝固守的宫城——

台城。这时梁朝诸王从各地奉命救援的军队，约有二三十万，逐渐汇合到建康周围，比起叛军尚占优势。可是，梁武帝的这些至亲骨肉，根本不是真心“勤王”，却巴望着梁武帝一死，自己捞个夺位的机会。所以，他们的军队，大多“淹留不进”，而且彼此之间也是“更相妒忌，不肯奋击。”侯景更放心大胆的攻城了。

梁武帝的儿子邵陵王萧纶就带着重兵驻扎在城外。朝廷大臣柳津的儿子柳仲礼为援军统帅。援军超过叛军几十倍，粮丰草足。可是，柳仲礼与萧纶却坐观侯景围攻台城，按兵不动。原来，他们巴不得侯景早破台城，替他们扫除夺取皇位的障碍。

85岁的梁武帝在城里心急如焚，问计于大臣柳津。柳津悲哀地说：“陛下有邵陵，我有仲礼，不忠不孝，贼还怎么能破呢！”

侯景围攻130日，台城终于陷落。号称“皇帝菩萨”的梁武帝也成了侯景的俘虏。城破后，梁武帝年老多病，想吃点蜂蜜也要不到，最后活活饿死了。死时86岁。

各地勤王师或降或走，如鸟兽散。侯景控制朝廷以后，马上翻脸，杀掉了萧正德，侯景又推出个萧纲，当了一段傀儡皇帝，没多久又废杀了。之后，又立萧栋，到公元551年，侯景终于公开行动，逼迫萧栋“禅位”，亲自粉墨登场，自立为汉帝。

公元551年，侯景的军队进攻江陵受挫。次年，梁将陈霸先、王僧辩等，乘胜顺江东下，再败侯景于建康。侯景乘船出逃，被部下杀死于舟中。扰害三年多的侯景之乱，至此告终。

侯景发动的叛乱，虽然只是几年光景，却给社会造成了严

重破坏,给人民带来极大痛苦。侯景叛军初围攻台城时,城内尚有男女 10 多万人,城破之日,只剩下二三千人,城里“横尸重沓(层层堆积),血汁漂流,无法行路”。侯景入城,聚尸焚烧,“烟气张天,臭闻数十里”。昔日拥有 28 万多户的繁华都城建康,经过洗劫而化成一片废墟。侯景攻取建康后,曾分兵攻略吴郡、会稽、广陵等地,一路烧杀破坏,把个号称“最为富庶”的三吴地区,破坏得残败不堪,长江下游地区,呈现出一片“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的凄凉景象。江南人民对侯景的暴行,恨之入骨,这正是侯景迅速失败的根本原因。当侯景的尸体运送到建康时,老百姓争着割他的肉吃,甚至焚骨扬灰后,吃尽他苦头的群众,还“以灰(他的骨灰)和酒饮之”,以解心头之恨。

侯景之乱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南梁末年,政治极为黑暗,统治阶级腐朽至极,梁武帝在位 48 年间,一贯纵容大族地主残酷剥削,百般聚敛。梁武帝的六弟萧宏一个人就有钱 3 亿余。老百姓被贵族、地主盘剥得“肌肉略尽”、“骨髓俱罄”。以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中、小起义时起时伏,严重削弱了南梁的统治力量。军队战斗力也被大大削弱。由于士卒身份低下,人心思逃,梁武帝“发召士兵,皆须锁械,不尔(不如此),便即逃散。”这样的军队怎能打仗呢?特别是到了梁武帝晚年,他本人迷信佛法,几次带头出家当和尚,还在境内大修佛寺,把政局搅得乌烟瘴气。统治阶级本身也腐化到了极点,那些士大夫,宽衣博带,穿高底靴,走路要人搀,出门要坐轿,连骑马都不敢,一个个高谈玄学,不务实际,根本没有应付危局的能力。但在同时,统治阶级内部却又矛盾重重,萧氏皇族内部的斗

争,就是一个缩影。这些皇室亲王,一个个眼盯着皇帝宝座,见利忘义,干出不少丑行。萧正德出卖江防,导引叛军入城。荆州萧绎、益州萧纪等人,“拥兵自守,坐看(萧)衍之悬危,竟不奔赴(援救)”。

侯景之乱,实际上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南梁王朝原来被遮掩住的所有黑暗图景。

梁武帝死前曾经半是自嘲半是自慰地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有何怨呢?”皇帝自己虽得失无怨,但因此而带给江南人民的却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富庶的江南,千里绝烟,尸骨堆积,如丘如陇。建康城到梁代已是历时 300 余年的五朝古都,有户 28 万,城破之日死者十之八九。480 寺院也荒破不堪,一片瓦砾。

三、江陵的陷落

承圣元年(552 年),梁武帝第七子萧绎在平定侯景之乱后在江陵即帝位,史称梁元帝。这时江北淮南州郡大都被东魏吞并,而上游梁益等州(今四川省,陕西南部)由萧绎八弟萧纪镇守,已先于萧绎称帝。南方军事重镇、江陵之屏障——雍州(今湖北北部、河南南部)已归附西魏,江州(今江西,福建)、广交(今两广和越南北部)等州已被割据。湘州(今湖南)正由萧绎派人讨伐叛将陆纳,梁元帝统治范围从巴陵(今湖南岳阳)以下至建康(今江苏南京),以长江为限,荆州界北到武宁(今湖北荆门北),西至峡口(今湖北宜昌),南朝当时的形势是很危险的。

九月，武陵王萧纪举兵东下。次年，萧绎听说以后，吓得赶快让巫术之士画萧纪像，亲自用钉子钉萧纪像的四肢来泄愤，又迅速乞求西魏出兵攻蜀。西魏派大军进攻蜀地，同年九月攻占全蜀。在这之前，萧纪军浩浩荡荡、船舰满江，顺流而下。萧绎部将陆法和在峡口（今湖北宜昌）两岸筑城，准备抵抗。萧绎又把侯景余党大将任约从监狱中放出，令其领兵，抵御萧纪，又遣王琳说降陆纳，平定湘州，使援峡口。萧纪频频向陆法和发起进攻，陆法和告急；萧纪屡战不克，后方西魏已围困成都，就向萧绎请和，萧绎不许，大败萧纪。

梁元帝这时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国都应定在什么地方。为此爆发了迁都之争，主要在东部士族和西部士族之间进行。东部士族历史上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都占相当优势，却因侯景之乱受到沉重打击，没有什么实力。西部士族原来只在军事上占一定地位，未衰败腐朽，支持萧绎再造梁政权，地位因而跃居东部士族之上，掌握着军队和大部分重要而关键的职务。而作为皇帝的萧绎，虽出身东部士族，但自然会超越出身而考虑各集团、阶层的力量及其平衡，他之被西部士族接受，是因为他是正统的象征与标志，而不是因为他是东部士族。

萧绎本来想还都建康，却遭到西部士族领军将军胡僧佑，太府卿黄罗汉、吏部尚书宗懌、御史中丞刘毅的反对，认为建康王气已尽而与虜只隔一江，一旦有变，很难对付，东部受损失很厉害，而江陵还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据古老传说荆州当出天子，应在元帝，因此应该定都江陵。而东部士族尚书在仆射王褒、黄门侍郎周弘正指出，从东晋以来，建康一直是国都，老百姓心理上已经习惯，一旦改变，老百姓会认为皇帝和列国诸

王一样。当然他们也看到距江陵仅 500 里的襄阳(今湖北襄樊),已在西魏手里,而萧警因萧绎杀了他的哥哥河东王萧誉,久有复仇之志,江陵的局势也已险恶。但他们知道萧绎为人猜忌多忌讳,因此没敢直说,仅隐约点了一下。萧绎知道自己的荆州军在收复建康时大焚掠已失去扬越一带人心,加之建康破坏惨重,一时不易收复。以前在侯景围困国都时不积极援救父兄,舆论对其不利;还攻讨六兄萧纶,心理上愧对父兄,自然也不愿东下,就请术士杜景豪占卜,不吉,就同意了西部人的意见。

萧绎征召东部士族为官,把他们集中到江陵,这些人一般都带着家属,这个举动对于以后的历史发展影响很大。

萧绎在侯景未平前,曾同时称臣于西魏和东魏北齐,即帝位后便不再称臣。萧绎在接待西魏使臣宇文弼不像接待北齐使臣那样热情,还向西魏宇文弼表示梁已统一,愚蠢地要求西魏按照过去的地图划定疆界,言辞不很恭顺。这时还猜忌悍将王琳,令其率部南下攻伐萧勃取广州,致使他后来无法及时回援。西魏权臣宇文泰决定不还侵地还要顺势拿下江汉地区。这时,萧警又入朝西魏,请求出兵,宇文泰就命于谨、宇文护等率步骑五万南侵,萧警领兵助战。马伯符密派使人将消息报告给梁元帝,他根本不信。新野庾季才又劝萧绎还都建康,不听。武宁太守宗均又报告魏军快来了,君臣商议,多不信此事,向魏派出使臣王琛。萧绎一直将信将疑,也不做准备抗敌,还不允许鄂州刺史陆法和增援。

承圣三年(554 年)底,西魏大军抵达江陵,先派精骑据江津,切断江路,以使江南援军无法渡江;萧绎派人征调援兵,同

时加强城防，抵抗西魏，西魏筑长围，切断江陵和外界联系，奋力攻城。梁领军将军胡僧佑亲自冒着箭雨飞石，昼夜督战，奖励将士，明行赏罚，部众效死，魏军进攻受阻。不久，僧佑中流矢死，内外惊恐。魏加紧攻城，城中有人开西门降魏，魏军入城，萧绎等退保子城，萧绎令人焚烧古今图书 14 万卷，随欲自杀，被人制止，拒绝了谢答仁、朱买臣等乘黑夜突围或固守子城的建议，投降西魏。萧绎在受尽百般凌辱之后，被处死。西魏军将府库珍宝及浑天仪、梁铜晷表，大玉径四尺及各种法物运往西魏长安，俘虏王公和大批士族并挑选男女百姓数万口为奴婢，分赏三军，驱归长安，小弱者全被杀掉。

魏立萧警为梁主，把江陵空城和附近延袤三百里的地方给了他，而将未遭破坏的雍州划归西魏。让萧警居江陵东城，魏设置防备，带兵住西城，名为助萧警防守，实际为监视。

江陵沦陷于北方，是南朝衰败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失去江北地区的缓冲屏障，北方军队可以轻易渡江进攻南方，使江南军事上的防守相当困难，更不用说对北方发动进攻了。江陵沦落使江南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南朝士族受到有史以来最沉重的打击。从此，侨人东部士族作为集团从历史上消失了，他们已没有什么重要作用了，只是在社会上还有点影响，仅仅是南方政权的点缀。刚刚兴起的西部士族受到了很大削弱，只是因王僧辩率重兵镇守下游得以保存一定实力。萧绎的焚书（其中很多珍贵的图书从此绝灭），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一大浩劫。大批士族的北迁，带去了南朝优秀的文化，推动了西魏北周文化上的发展，如王褒等人因文学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位宦通显，他们的文风对北朝文人有很大影响，对

南北文风的融合,起了较大的作用。北迁的部分士族和关陇统治集团逐渐融合,也构成其一个小的组成部分。

第四节 陈王朝的兴衰

一、陈王朝江南偏安

陈霸先(503—559年),是高要(今广东肇庆市)太守,率军自始兴(今广东韶关市)出大庾岭,沿赣水顺流而下,沿途人民纷纷从军献食,队伍迅速扩大起来,至湓城(今江西九江市)与王僧辩军会师。当时王僧辩的荆州军正发生饥荒,军心浮动。陈霸先就从自家军的50万石储粮中拨出30万石给荆州军,荆州军于是士气大振。两军齐心协力,攻陷建康,大败侯景叛军。

收复建康,歼灭侯景,王僧辩与陈霸先两军功劳最多。梁元帝萧绎(梁武帝的第七子)以王僧辩为太尉镇守石头城,以陈霸先为司空出镇京口。王、陈二人过往甚密,情投意洽,并相约作了儿女亲家。

梁元帝死了,王、陈又共同拥立元帝的儿子13岁的晋安王萧方智为皇帝,是为梁敬帝。

陈霸先是汉族人,王僧辩本是鲜卑人,姓乌丸氏。在陈霸先与王僧辩共同扶持梁王朝小皇帝的时候,北方鲜卑贵族建

立的北齐王朝发兵南犯，同时，派来使臣同王僧辩说：“梁朝正值多事之秋，皇帝年幼易生变故，推个长君为宜。萧渊明年长，担当大任比较适宜。梁朝如愿立萧渊明为皇帝，齐国愿立即回师，齐梁永远合好。”萧渊明是梁武帝的侄子，8年前梁齐在寒山大战，兵败被俘。北齐要送一个俘虏来做南朝皇帝，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王僧辩不顾陈霸先的坚决反对，竟将萧渊明迎回建康，立为皇帝。梁敬帝被改为皇太子。汉族的梁王朝听命于鲜卑人的齐王朝改立皇帝，这意味着屈节投降。王僧辩这样做是很不得江南民心的。于是，陈霸先当机立断，毅然从京口秘密起兵，袭杀了王僧辩，又废掉萧渊明，重新拥立萧方智为皇帝。

北齐闻讯大举南来，进至钟山（即南京市东的紫金山）。王僧辩的残余势力也乘机作乱。陈霸先率军抗敌。时值连日大雨，平地水深丈余。两军都遇到很大困难。陈霸先又军粮不济，无以为食。江南父老姐妹闻讯，家家在夜晚以荷叶裹饭，夹上鸭肉，去慰劳陈霸先军。在老百姓的支援下，这支军队为保卫乡土，奋勇杀敌，获得大捷，把北齐军打得七零八落，仓皇北窜。王僧辩的残余势力也被肃清了。

陈霸先军不负江南民众的企望，保卫南方免遭北齐的蹂躏，保持了南朝的政权。

公元557年，陈霸先受禅登上帝位，改国号为陈，是为陈武帝。他做皇帝不到三年就死去了，继任者陈文帝和陈宣帝完成了他的未竟事业。

陈朝的辖境在江南四朝中是最小的，西不过蜀，北失淮、淝，始终局促在长江中、下游以南。然而，广州、桂州都先后归

附，江南总算统一在陈氏的江东政权之下了。

陈宣帝的儿子陈叔宝，是南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也是个荒淫的君主。他在位时，南朝统治集团在豪侈的物质享受和精神放纵中，日益沉溺，腐败不堪。陈叔宝还自作靡靡之音《玉树后庭花》，在与妃嫔饮酒作乐时恣意演唱。这靡靡之音也就成了亡国之音，并为后世用作亡国的隐喻。故而，唐诗人杜牧曾写诗讽喻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二、金陵王气黯然销

当陈朝统治集沉浸在金陵春梦不思进取之时，与之隔江对峙的北周及继之而起的隋王朝却在朝一统天下的目标迈进。周武帝雄心勃勃，在公元 577 年灭掉北齐以后，即欲北平突厥，南定江左，统一天下。突厥是继匈奴、鲜卑之后游牧在蒙古草原的又一强大民族。第二年，他亲率 5 路大军，讨伐突厥，不幸病死途中，年仅 36 岁。周武帝虽未完成统一大业，但已为此奠定了基础。四年后，汉人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

杨坚(541—604 年)，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父杨忠，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封隋国公。杨忠死，杨坚袭父爵，女儿为周武帝儿子周宣帝的皇后。宣帝死，杨坚辅佐八岁的周静帝执政。杨氏是关中的世代名门，又是北周开国的柱石，同鲜卑贵族与汉族世家关系都很深。杨坚又以外戚地位执政。故而，杨坚代周，几乎是水到渠成，未遇到什么阻力。以汉人代鲜卑人执政而未遇阻力，这表明鲜卑人的汉化已达到彼此融为一体的程度。

杨坚建隋后，兢兢业业，励精图治。

与此同时，陈朝的后主陈叔宝，正宠幸嫔妃，大兴土木，建造崇楼峻阁，穷奢极欲，日夜宴饮，以艳诗靡音为乐。士人章华上书切谏：“陛下当了5年皇帝，殊不知祖上创业的艰难，惑于酒色，荒于朝政，祭祀祖庙的大典，一次也不亲躬，册封贵妃的常仪，又哪次没有驾临？老臣宿将，被甩得远远的；阿谀之徒，充斥朝廷。陛下如不改弦更张，唯恐江左复成草莽，任麋鹿驰骋了。”陈后主读过这奏疏之后，不仅无动于衷，反而下令砍了章华的头。

北方，隋朝的将士，在长江上游督造战船，木屑顺流而下，凭江可见。

南方，陈后主却正宠幸贵妃张丽华。他将其置于膝上，参决国政，并打算废掉皇后，立其主掌后宫呢！

陈朝廷文武官员无不人心惶惶。大臣韦鼎已尽卖田宅。人或问其故，说：“江东王气，尽于此矣！我和你都得死葬长安了！”

公元588年，隋文帝杨坚列举陈后主20条罪状，抄写30万份，在江南散发，并下令50万大军南伐。

陈朝沿江守军纷纷告警，朝廷重臣张惶失措。陈后主却无所谓地说：“王气在此。齐兵来过3次，周兵来过两次，哪次没失败呢？隋军来又能怎么样？”媚臣孔范附和说：“对呀！长江天堑，隋军哪能飞渡？我常恨官位低，隋军要渡江，正是我立功的好机会。”

陈后主君臣正演着这醉生梦死的滑稽剧的时候，隋军已经渡江，拉开了建康之战的序幕。

三、隋陈建康之战

隋攻占陈京师建康之战发生于隋开皇九年、陈祯明三年（589年）正月。隋晋王杨广统率大军，于夺占长江中上游的同时，攻占了陈都建康，生擒陈后主，将陈王朝灭亡。

隋王朝为夺取陈京师建康，进行了周密的作战策划。隋主杨坚于开皇八年（588年）十月，下诏于寿春（今安徽寿县）设置淮南行台中书省，以晋王杨广为行台尚书令。后以杨广为攻陈最高统帅，统率全部攻陈大军51万人，同时向长江中上游和建康周围进军。其战略企图为：以行军元帅杨素率水军，兵出永安（今四川奉节），顺江东下；以将军刘仁思兵出江陵（今湖北江陵），溯江西上，与杨素军配合夹击上游沿江各地之陈军，然后转兵攻取湘州（今湖南长沙）；以行军元帅杨俊率水路大军，兵出襄阳（今湖北襄樊），进占汉口（今湖北武汉市），以阻止上游陈军顺江而下支援建康；以蕲州刺史王世积兵出蕲春，南下豫章（今江西南昌），夺占长江中游；以将军韩擒虎兵出庐江（今安徽庐江），由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渡江，攻夺姑熟（今安徽当涂），尔后从右翼包围建康；将军贺若弼兵出广陵（今江苏扬州），自瓜洲渡江，攻取京口（今江苏镇江），尔后自左翼包围建康；杨广自率主力，兵出六合（今江苏六合），直取建康；为切断陈吴越等地与建康的联系，以将军燕荣率领水军，自东海（今江苏连云港）起渡，由水路攻取南沙（今江苏常熟西北）、吴州（今江苏吴县）。

隋将贺若弼屯兵于广陵，为麻痹陈军，顺利渡江，于建康

之战发起之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欺诈陈军。他买了好船，隐藏起来，将一些破旧船只故意摆在江水交汇之处，使陈人误认为隋军无可利用之舰船。贺若弼命其沿江驻防部队，于每次交接之时，均在广陵集合，并遍插旌旗，多设军营帐幕，制造隋大军齐集的假像。陈军每次见此情景，均信以为真，紧急调集军队，严加防备。后来，陈军发现此乃隋军正常的换防行动，遂习以为常，不再增兵戒备。与此同时，隋军还常出兵沿江岸狩猎，人马喧嚣，使陈军愈加失去对隋军行动的警惕。

隋开皇九年、陈祯明三年正月初一，隋军乘陈后主召集满朝文武庆贺元会之机，开始渡江。贺若弼军由于以前欺诈手段的成功，故从广陵渡江时，陈守军一无所知，韩擒虎率军 500 人，利用夜暗也于当夜自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渡过长江，攻打采石（今安徽和县东南）陈守军因全部喝醉，采石被隋军一举攻克。

采石守将徐子建派人急入京城奏报。陈后主召集公卿商议后，于初四下诏：命骠骑将军萧摩诃、护军将军樊毅、中领军鲁广达等为都督；司空司马消难、湘州刺史施文庆等为大监军，并以南豫州刺史樊猛率水军从白下（今江苏南京北金川门外）出发，迎击隋军。

初六，贺若弼攻占京口（今南京镇江），生俘陈南徐州刺史莹恪。贺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士卒去民间买酒，贺若弼均予以斩杀。对所俘的 6000 多陈军，全部释放，让其返回劝降，故贺军所到之处，陈军纷纷归降。

隋将韩擒虎率兵进攻姑孰（今安徽当涂），陈军战败，姑孰守将樊猛之子樊巡被俘，散骑常侍皋文奏也兵败逃回京城。江

南百姓纷纷投向韩擒虎军，其中鲁广达的两个儿子鲁世真、鲁世雄降于韩擒虎后，又去招降其父。

樊猛和左卫将军蒋元逊，率 80 艘青龙战船于白下一带地区巡逻。此时，贺若弼军从北路，韩擒虎军从南路，一起进兵，陈军沿江各戍守将领均望风而逃。贺若弼顺利突进，陈后主令司徒豫章王陈叔英屯守于朝堂，萧摩诃屯守于耆闍寺，鲁广达屯守于白土岗，忠武将军孔范屯守宝田寺。隋、陈双方最后决战的态势已经形成。

初七，贺若弼进占钟山（今南京紫金山），屯驻于白土岗东侧，总管杜彦、韩擒虎共率步骑兵 2 万，进抵新林。此时，陈京师建康留有 10 多万军队。陈后主胆怯懦弱，不懂军事，只知日夜哭泣，军国大事全部交由湘州刺史施文庆处理。施文庆深知众将均嫉恨自己，故很怕众将立功，于己不利。因而，便将众人上奏的各种报告，均扣押不呈。

当贺若弼攻打京口和进占钟山之初，将军萧摩诃曾两次建议乘其立足未固之际，率兵迎击，均为陈后主所拒绝。使陈军失去了宝贵战机。至十五日，镇东大将军任忠向陈后主提出阻断水上通路，切断其前后联系，阻断敌之归途，使敌各路人攻自退的建议。陈后主也拒绝采纳。但第 2 天，陈后主忽又决定令萧摩诃等从陆上出战：以鲁广达于白土岗布阵，防守于各军的最南面；任忠在其次；樊毅、孔范又在其次；萧摩诃部在最北面。各军南北绵延 20 余里，前后进退互不知悉。

隋将贺若弼率精锐骑兵登上山顶，望见陈军正在布阵，驰至山下，率杨牙、员明等 7 总管，共 8000 士卒，也布阵准备与陈军交战。由于陈后主与萧摩诃的妻子私通，故萧摩诃早已无

心作战，只有鲁广达与隋军拼杀，隋军抵挡不住，纷纷退走，270多人被斩杀。贺若弼纵火，以烟幕掩护部众，重整队伍，又转向孔范军阵冲击。孔范部队一与隋军交战即败逃，其余各部陈军见此，也相继溃逃，共死5000多人，萧摩诃被隋军生俘。

陈将任忠投降了隋军，防守朱雀航的陈将蔡徵军惊慌而溃。任忠领着韩擒虎军直接进入朱雀门，有些陈军想要抗拒，均被任忠制止。

陈王朝的文武百官纷纷逃遁，陈后主带领他的爱妃等10余人，跳入宫内的井中，隋军冲入宫中，用绳子将他及两名贵妃吊出。陈后主见了贺若弼不停地下拜，至此，陈亡。

陈后主随后被带往长安。公元589年，南朝的最后一个王朝陈朝灭亡了。

建康，古亦称金陵，自孙吴在此建都，历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有六朝古都之称。它作为三国以来四百年间分裂割据时期南方政权的京都，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至此，长期以来南北对峙的局面遂为隋朝所统一。

正月二十二日，隋晋王杨广进入建康，将陈奸臣施文庆、沈客卿、阳慧朗、徐析等统统斩首。杨广因贺若弼提前作战，违抗军令，交刑吏治罪，后来，隋主杨坚得知，急忙下诏赦免，并对贺若弼为平定陈王朝立下的功劳，大加封赏。

陈吴州刺史萧瑛，占据吴州（今江苏苏州），拒不降隋。二月，杨广命右卫大将军宇文述率行军总管元契、张默言等，前往征讨。此时，隋落丛公燕荣也从东海率水军前来会攻。萧瑛于晋陵（今江苏常州）城东设置栏栅，以阻挡宇文述军；以部将王褒防守吴州，自率兵由义兴（今江苏宜兴）进入太湖，欲从后

面偷袭宇文述军。宇文述军进展顺利，一举攻破萧军的栏栅，随之，转兵攻击萧玘，萧军大败。接着，宇文述派兵从另一条路线偷袭吴州，守将王褒化装为道士逃跑。萧玘率残部退守包山（今太湖中洞庭西山），被隋将燕荣击败擒获。陈东扬州刺史萧岩，献出会稽（今浙江绍兴）降隋，杨广遂将萧玘、萧岩一并送往京师斩首。

第五节 南朝的政治经济

一、“寒人掌机要”的南朝政治

魏（曹魏）晋以来，统治集团定了九个等第来评选人才，列在上等的叫上品，下等的叫下品。评选的标准，主要是门第。上品为高门所独占；寒门出身的人，只能列入下品。等第不同，担任的官职也不同。上品由清官出身，一直当清官；下品由浊官出身，一直当浊官。由浊官出身的寒门，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有转做清官的可能。评定人才等第的官，叫做“中正”；州有大中正，郡有小中正。中正这个官，不是门第显赫的人是当不上的。

这就是所谓的“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门阀统治的产物，也是门阀统治的护身符。

统治阶级中的寒门，在这个制度下，处于被高门排挤的地

位。这种情况，到南朝发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是从宋朝开始的。江南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寒门的地位。寒门中，有些人成了地方豪强，有些人成了富户。宋朝皇室的“崛起寒微”，又为这个变化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宋明帝和阮佃夫，齐武帝和纪僧真、刘系宗、茹法亮、吕文度，梁武帝和朱异，陈后主和沈客卿、施文庆之间的关系，与宋孝武帝和戴法兴的关系，差不多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阮佃夫这些人，籍贯、出身和戴法兴差不多，经历也差不多，都做过中书舍人，权力呢，又一个个都“势倾天下”。

中书舍人这个官，本来是中书省的僚属，地位并不高。宋孝武帝开始把国家的机密要务转到了中书舍人的手里。齐武帝时，四个中书舍人，还各设一个办事机关，称为“四户”。皇帝的诏令，从这四个机关发出来，宰相无权过问。原来由尚书省管理的许多事务，也转到“四户”中来了。

皇帝对于这些中书舍人，是另眼相看的。那个为江敫所瞧不起的纪僧真，在齐武帝看来，仪表、谈吐都比得上士大夫。齐武帝有一次送纪僧真出门，端详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笑着说：“人生何必计较门户，像纪僧真这样的风采，士大夫哪里比得上！”

对于刘系宗、吕文度，齐武帝也把他们和士大夫相比，说：“担当国家大事，一个刘系宗便够了。沈约、王融这等人，几百个也抵不上刘系宗一个。”又说：“公卿中有像吕文度这样操劳国事的，就不愁天下不太平了。”

寒门和皇权的结合，是南朝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一个特

色。齐武帝和寒门的关系，又是其中的典型。

南朝皇帝，不但用寒门控制中央的政权机关，还用寒门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从宋朝开始，南朝皇帝都用宗室诸王镇守地方。宋、齐两朝，皇帝又通过一个叫做“典签”的官，来监视镇守地方诸王的行动。

典签本来是地方上管理文书的小官，仿佛后来的文书管理员。宋朝后半期，这个文书管理员，突然重要起来。戴法兴在刘骏当江州刺史的时候，做的便是这个官。但戴法兴还不是由皇帝直接派到江州去的，也不和皇帝发生直接的关系。这时候，典签还不过是刺史的亲信。宋孝武帝以后，皇帝就用亲信的人做典签，直接派往各个地方，作为皇帝的耳目。通常的情况是：一州派上几个，轮流往返建康，向皇帝报告情况。从此，州刺史以下的地方官吏，便在典签的掌握当中。皇帝对地方的控制，也就进一步加强了。

齐武帝的弟弟武陵王萧晔做江州刺史，和典签赵渥之合不来。赵渥之说：“我离开江州，你的刺史也做不成了。”赵渥之到了建康，在齐武帝面前说了萧晔许多坏话。果然，萧晔的刺史被撤掉了。齐武帝的儿子邵陵王萧子贞做吴郡太守，想吃熊白（熊背上的肥肉，一种美味的食物），问厨子要。厨子说：“典签不在，我不能给。”

齐武帝和寒门的结合，在利用典签加强对诸王的控制这方面，是很突出的。

这个原来地位低下的典签，齐以后被称为典签帅、签帅或主帅。当齐明帝萧鸾翦除高帝、武帝子孙的时候，典签的力量，有时胜过甲兵。齐武帝的儿子巴陵王萧子伦，镇守琅琊，齐明

帝打算派兵去收捕，典签华伯茂认为派兵去还不如把事情交给他办。后来华伯茂只用一杯毒酒，便逼得萧子伦自杀了。

门阀统治，到南朝至少有了 200 年的历史。出身寒门的皇帝，和高门之间，政治上的利害不尽相同，经常和寒门结合，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南朝统治阶级内部的一种普遍现象。

二、南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从全国范围看，社会经济发展呈现迂回迟缓，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南方却有突出的发展。这一时期南方经济之所以有较大开发，一个重要因素是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这个大迁徙以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开端，西晋永嘉以后进入高潮。自永嘉之际至北魏拓跋焘攻宋，前后出现六次人口移动高潮，总数不下百万人口。南迁人口主要集中于荆扬二州，而以三吴地区为最，其次是交广二州。南方政府对于流民的政策，开始是设侨郡进行安置，经过历次土断，便都先后注籍而土著化了。大量人口的增加，不仅使南方增添了劳动力，而且也传进了北方的先进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南方的社会生产力，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时南方经济开发的另一重要因素，是部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其中以山越和蛮族的变化最大。山越分布于长江下游以南地区，早在三国时便已逐渐与汉族融合。蛮族分布于江、荆、湘（今湖北、湖南）地区，他们原来多住在山险地带，三国以来汉人不断逃入蛮部，刘宋时由于“赋役严苦，贫者不复

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汉杂居促进了蛮人经济的发展，到南朝初年，他们已成了封建政权榨取租谷的对象。镇压蛮人起义的沈庆之说过：“去岁蛮田稔，积谷重岩，未有饥弊，卒难禽翦”，可见他们的农业生产已自给而有余了。汉族地主不断对蛮族进行征服与掠夺，强迫蛮人充当其佃客、部曲和营户，但客观上却有利于他们与汉族的融合。汉族地主在征服少数民族大族后，便于当地设置新的郡县进行统治，南齐时在豫、郢、司、雍宁蛮府管领下，以蛮民设立的郡有 44 个，县 139 个，这些新设郡县，一般是经济达到或接近汉族水平的地区。所以南方民族融合的出现既增加了开发南方的劳动力，又扩大了开发的地区，说明南方开发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创造。

南方的相对和平环境，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南北人民保卫江南经济、文化的斗争以及反门阀斗争，则对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200 多年间，南方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显著发展。

农 业

农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土地的大量垦辟上。劳动力的增加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土地的利用率大为提高，经过劳动人民数百年的辛勤垦辟，南方的许多荒原变成肥田沃壤，荆扬的洞庭、鄱阳、太湖流域，成了谷仓地带。宋沈约形容说：“江南之为国盛矣。……考之汉域，惟丹阳、会稽而已。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宴如也。自此……以至大明（宋孝武帝时）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户，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

海傍湖，良畴亦数 10 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复衣天下。”他指出当时荆扬之盛，已远超北方的关中。其中的三吴地区农业最为发达，会稽被称为“晋之关中”。会稽山阴一次大火，就烧掉仓米数百万斛。以南方首都建康为中心的丹阳地区，“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鄱阳湖流域的豫章地区，也是“沃野垦辟，家给人足，畜藏无缺，故穰岁则供商旅之求，饥年不告臧孙之余。”新开的南方交广地区，稻米一年二熟，“米不外散，恒为丰国”。土地的大量垦辟，使南方农业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有所改变，以至有人认为超过北方，说：“自淮以北，方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以货”。

北方农民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东晋时期传入南方，与南北劳动人民生产经验的结合，提高了水稻栽培技术，出现了所谓“三熟之稻”。稻的单位产量也大大提高，三国时南方水稻最高产量大抵亩产 5 石，南朝时最高记录已达亩产 20 斛。北方的麦这时也在南方大力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其它各种农作物的品种，这时也有新的增加，齐永明年间的市焦余中所记农作物品种，除了稻、麦，还有菽、胡麻、大豆、小豆、大胡麻、粳、粟等许多品种，南方不再是仅以柑桔、荔枝、龙眼而驰名了。

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水利事业，这一时期在南方得到很大发展。东晋到梁各朝都有修建，几乎遍及南方各地。东晋时有吴兴乌程新筑狄塘，溉田千顷；丹阳曲阿新丰塘，灌田二千顷；乌程还有谢安所开谢塘。宋时有荆州的获湖，堰湖开渎，通引

水江；乌程吴兴塘，灌田二千余顷；豫章有蔡兴宗所筑塘。齐时有句容的赤山塘；还有遏涟水以溉田；广陵有裘塘。梁时有豫章的苍陵堰，溉田千余顷；临海乐安县堰谷为六陂以溉田，水利技术也有创造性的提高，人们根据防旱、排涝以及灌溉的不同要求，对江、湖、池、泽等自然水系加以利用，对水的蓄、灌、泄都能由人控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湖田，也就是围湖造田。除了地主阶级国家修建的较大水利工程以外，随着大地主田庄的发展，出现了不少私家小陂，即所谓“富室承陂之家，处处而是”。土地所有者，实际也是水利的所有者和控制者，所以对大地主的财富也多是田池并提。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主要目的在于防害的水利工程的兴建，如长江上的江陵大堤，钱塘江的捍海塘，沪渎的防沙垒等。

手工业

南方原来就有较好的手工业基础，又吸取了北方手工业技术，于是有了新的提高。金属冶炼业无论官冶私冶都很发达，政府中专设东冶令、南冶令以管理冶铁，官冶以梅根治和冶塘最为著名。各官冶所铸器物以甲兵为主，也铸民需用品，“大则釜鬲，小则铍锄”。梁时筑浮山堰，一次就沉二冶所存铁器数千万斤，可见冶铁规模之大与产量之高。这时冶铁技术的最高成就是“灌钢”技术的出现，即所谓“杂炼生钢”，生指生铁，钢指熟铁，即是利用生铁液灌入熟铁，提高钢的含炭量，以加强钢的强度，这是冶炼技术上的创造性成就。在纺织业方面，南方原来就有基础的麻葛织业，这时技术更为精湛，花色品种增加，有所谓越布、香葛、细葛、南布、花练等，宋刘裕曾因

为厌恶其“精丽劳人”而下令禁织。这时南方的丝织业发展也很快,三国时吴的锦还是资于蜀国,东晋刘裕灭后秦,将关中锦工迁往江南,成立锦署,此后南方高级丝织业有所发展,高级丝品中的罗縠极为轻薄,视之如同烟气。蚕桑技术也有提高,豫章、永嘉、闽中等地出现四熟、五熟以至八熟之蚕。制瓷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更快,尤其是青瓷,无论是胎制、釉色、纹饰与烧制技术等各方面,都有显著的提高。现在已发现的这一时期重要窑址,都在长江以南,而这一时期的南方的出土墓葬,也都有大量青瓷葬品,尤其以三吴地区出土最多。宜兴西晋大将周处墓出土青瓷器达 42 件之多,不仅制作精巧,而且有仿生活用品的青瓷件臼、米筛、畚箕、扫帚、水桶、鸡鸭舍、猪圈等物出土,说明青瓷应用的普遍。经济发展和军事需要,也促进了南方造船业的发展。东晋时卢循起义军曾作 8 槽舰 9 枚,起 4 层,高 10 余丈。梁时江东有军舰千余艘,其中“舩舩大船两边悉 80 棹,棹手皆越人,去来趣袭,捷过风电”。南朝最大船已有载 2 万斛者,比吴时装载量增加一倍。梁祖冲之曾有“千里船”的发明,虽未推广,也可视为把简单机械原理用于船舶的尝试。东汉时期就已经传入南方的造纸术,也有新的发展,尤其是在利用南方丰富造纸资源上,取得很大成就,除了麻、楮外,又扩展到桑皮、藤皮。“藤角纸”是纸中最上乘品,剡县和余杭由拳,都是这种纸的产地。除了白纸,还能制造青、赤、缥、绿、桃花等各种色纸。技术的改进和原料来源的扩大,提高了纸的产量,因此东晋时正式下令废除竹简,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商业及交通事业

这一时期由于自然经济比重上升,商业不甚发达,但南方的商业比之当时北方还是要繁荣些。当时南方的许多政治中心也都同时是商业中心,建康借全国政治中心地位而繁荣,“贡使商旅,方舟万计”,秦淮河北岸,有大市百余小市 10 余,梁时城中达 28 万户,城东西各长 40 里,繁华程度可比汉之长安、洛阳两京。寿春“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是南宋贸易中心。江陵是“雍嶠交梁之会”,为长江上下南北的交通枢纽。番禺是南方经济中心与国际贸易口岸,以至“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 3000 万”,是当时的肥缺。海外贸易也较前发达,直接通商国家远至天竺(印度)、波斯(伊朗)、师子国(斯里兰卡),与南洋诸国的贡旅尤为频繁。远洋大船载 200 多人,船上长途旅行设备齐全,载有各国商人及货物,经营进出口贸易,主要集散地是广州,因为商业发达,商税成为政府重要财政收入,主要商税有所谓散估(交易税)、津税(关税)、市税、牛埭税(过境税)。与商业发展相适应,货币的使用也较过去普遍,当时通行的货币,东晋有比轮、四文及沈郎钱,宋有四铢、当两及耒子钱,梁有五铢、女钱、铁钱及四柱钱,陈有五铢及六铢钱。但布帛等实物也一直起着货币作用。商业的孳生物高利贷这时也有发展,高利贷主有贵族、官僚、大地主,也有寺院僧侣,梁临川王萧宏设邸店放债,以田地房舍契券为抵押,至期不还便没收抵押物。典当也在这时萌芽,小自一束绢,大至黄金贵重,都可到寺院库房质钱。

城市商业的发达也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展。江南有稠密

的自然河道，水运原来就很畅通，这时很多河道用运河加以连接。当时形成了 3 条便利的交通线，从江陵至京口的长江水道是一条干线，连结荆扬两个最繁荣地区；从江陵、豫章至番禺的湘赣水道，是 1 条辅线，把荆、扬、交、广连接起来；北起句章，中经建安，南至番禺的海道，是另 1 条辅线，沟通了三吴与交广。三吴的运河网最为发达，建康和吴郡之间有破岗渚，丹徒、无锡、吴郡之间有运河，由吴郡经钱塘至浙东也有水运。以京口、广陵为枢纽，北通寿春的水运也很畅通。一条北起彭城，中经广陵、京口，南至三吴间交通网的初步形成，成为后来隋大运河南段的雏形。水道的设施也很完备，码头称作桁，最大的桁是建康朱雀大桁；河岸上引船前进的堤称为埭，官府在埭上设有税卡，仅浙东四埭的通过税，一年便达四百万钱，可见水运交通的繁荣。

南朝时期，南方经济的重大发展，是劳动人民在极其艰苦的历史条件下的巨大创造，这一经济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六朝文化，成为高度发展的盛唐经济、文化的重要来源。

第六节 南朝的社会危机

一、“土断”和“检籍”

南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复杂。士族享有许多特权，不交

租,不纳税,不服役,还可以合法地占有佃客,半合法地招集部曲。庶族要交租服役,作为一个阶层来说,即使在齐朝,政治上所受到的待遇,和高门也不能比,例如:寒门免官,还免不了要挨 100 大板。就整个南朝来说,失掉了往日显赫声势的高门,害怕这一颓势急转直下,顽固地想维持长期形成的优越地位;寒门呢,却千方百计,不断地挤到士族的行列中去。皇帝和这两个阶层的愿望,都有些矛盾。南朝统治阶级内部一起一伏的斗争,便是这样引来的,“土断”和“检籍”是这种斗争的表现。

东晋时,北方流亡者大量南下,朝廷在扬州和荆州设了许多侨郡、侨县安置他们,不向他们征租赋和徭役。流亡者中的士族,成了侨郡、侨县的主人,当守令的是他们,奴役流亡人民的是他们。一个个的侨郡、侨县,仿佛一个个的小独立王国。日子久了,这种现象严重地影响了朝廷的收入,也助长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东晋统治阶级内部,便发生了侨寓和“土断”两派意见严重的斗争。侨寓派主张维持现状;“土断”派主张撤销侨郡、侨县,流民住在哪里,便在哪里落籍,和当地居民一样,向朝廷纳租服役。公元 364 年,以桓温为首的“土断”派获得胜利,实行“土断”。桓温死后,“土断”半途而废,但斗争并没有停止。

南朝第一个皇帝刘裕,继桓温之后实行“土断”,撤销了许多侨郡、侨县,侨寓的人被编入当地户籍,和土著居民同等看待。原来被士族当作私产的侨寓户口,成了负担国家赋役的编民。这不但增强了朝廷的力量,也大大裁抑了士族的势力。

刘裕对士族的隐藏户口,曾经严厉地加以禁止。士族隐藏户口的现象,东晋时已十分严重,山遐做余姚县(现在余姚县)

令,到任不过 80 天,便查出“私附”(土族隐藏的户口)1 万多。那时,余姚全县人口不过三四万,“私附”竟占到 1/3。在这次清查当中,有个叫虞喜的人隐藏了户口,本来应该办罪,可是,山遐办不了他;检查隐藏户口本来是地方官的职责,山遐做了这件事,却被朝廷免了官。当刘裕清查隐藏户口时,余姚县还有一个虞亮不遵守法令,隐藏户口。虞亮和虞喜的命运却不相同,被判处了死刑;余姚县的顶头上司会稽内史司马休之,也因督察不严,免去了官职。从山遐免官,到司马休之免官,不到 100 年。100 年中,统治阶级内部土族的地位有了很明显的变化。

大约过了 30 年,刘裕的孙子宋孝武帝刘骏,又在雍州实行“土断”。这一次,以柳元景为首的侨寓雍州的土族,还是激烈地反对“土断”。他们造谣说,雍州刺史王玄谟要造反;并且积极准备起兵,讨平“叛乱”。宋孝武帝派了亲信吴喜去见王玄谟,向王玄谟表示支持雍州的“土断”,不相信谣言,并且带去了一封亲笔信,信上说:“你已经是个 70 岁的老头子了,还能有什么不满足,要造反啊!我们君臣的关系,是谁也破坏不了的。我这样说,只不过是逗你一笑罢了!”这一次雍州“土断”,把雍州管辖的 3 个郡、16 个县合并成了一个郡。

宋以后,南朝北面的统治区域不断地变动,北方的流民不断地南来,侨郡、侨县不断地设立,“土断”也不断地进行。

南朝统治阶级内部,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便是庶族中的富人采取各种手段挤到土族的行列中去。因此,南朝历史中,就有了所谓的“检籍”。

“检籍”是检查户籍的简称。南朝的户口籍,用黄纸书写,

叫做“黄籍”。一家一户，人口多少，祖上做过什么官，任过什么职，有过什么军功，和哪些人家结过亲，是僧还是道，如此等等，都被详细记载在“黄籍”上。“黄籍”是政府区别士族和庶族的根据，也是剥削民众的根据。

士族和有军功的人，不承担国家的赋役，和尚、道士也被免除了赋役的负担。庶族中的富人，要逃避赋役，便冒充士族、假报军功、托名僧道，或者不报户口，或者人活着而在户口簿上注称死亡……，办法很多，但必须花钱买动管户口簿的官吏，在“黄籍”上篡改自己户名下的记录。

宋、齐以来，庶族中的富人，用 1 万钱左右贿赂篡改户籍，便可以从“卑微”变成“士流”。齐朝初年，虞玩之说，扬州九郡需要重新审查的户籍竟有 7.1 万多，占扬州户口的一半（宋时扬州领户有 14.3296 万）。这是威胁到朝廷收入的一个严重现象。

宋朝皇帝已经开始和这种现象作斗争。斗争方式之一便是“检籍”，把假冒的得以免除赋役的人清查出来。宋孝武帝索性来一个士庶不分，士族一律被强迫负担徭役。但这个办法，当时似乎行不通，反对服役的士族，便“相聚为盗”；后来沈攸之在荆州起兵和萧道成作对，据说也因把徭役加在士族身上失掉了“民心”，沈攸之失败，后任刺史到了荆州，一天当中，便遣散了服役的士人 3000 多。

齐高帝萧道成对“检籍”工作，十分重视，即位的第二年（480 年），便指派虞玩之主持这个工作，对“黄籍”进行清查。武帝时，设立“检籍”的专门机构，建立专门的“检籍”工作制度；清查出来的冒牌士族，被罚到边远地方去作戍卒。485 年，

三吴地区(现在江苏南部、浙江东部,当时最富庶的地方)的富人,一时结集了3万多,在唐寓之领导下,发动了一场反对“检籍”的武装叛乱。乱事很快地被压平了,但“检籍”工作也随着缓和下来。过了5年(490年),齐武帝又下了一道命令,宣布恢复宋朝末年的户籍,被罚到边疆去戍守的人,也得到赦免,回了本乡。显然,皇帝不愿意在“检籍”的风波中淹没自己。但是,这并不是说,朝廷和庶族富人的斗争已经停止。梁、陈两朝皇帝的留心“谱学”,梁武帝整理百家士族和东南士族的“谱系”,依然是防止庶族富人冒名士族的斗争的继续。

二、“耕当问奴,织当访婢”

南朝土地集中在少数贵族和大地主手里。宋朝的孔灵符在永兴(现在浙江萧山县)的庄园,周围33里,水陆田地265顷,还有9处果园。沈庆之在娄湖(现在江苏昆山县)也有大庄园,他年老时,把建康的宅第还给了官家,带了家眷和亲戚搬到娄湖去享“清福”,指着一望无际的田园,踌躇满志地说:“我还有什么需要呢,钱都在这里了!”诗人谢灵运写过一篇《山居赋》,描写自己的山居,山环水绕:有纵横的阡陌,有簇族的果园,有疏疏落落的药圃,稻粱、花果、药物,依山傍水,从春到秋,从冬到夏,给水色山光,添了妩媚。但是,诗人笔下的画卷,不知隐藏了多少奴僮的辛苦。

南朝贵族、大地主霸占土地,利用奴僮在土地上劳动。像沈庆之家里的奴僮以“千计”;谢灵运,史书说他“奴僮既众”,当然也是不少。苛政之下,老百姓“卖儿贴(卖)妇”,是奴婢的一

个重要来源。

奴婢在南朝是可以买卖的。齐朝的萧景先临死时，嘱咐儿子经营田业，说劳动力不足，可以买奴婢补充。一个奴婢，当时值钱 5000 到 7000，用大米来折算，大约抵得上 6 斗。私人占有的奴婢，多数是买来的。宋明帝造湘宫寺，极其壮丽。有人说，这座寺沾满了老百姓“卖儿贴妇”的眼泪。南朝有很多像宋明帝这样的皇帝，也有数不清的湘宫寺。

私人占有的奴婢之外，还有官奴婢。和秦、汉一样，官奴婢是没入的罪犯和战争当中的俘虏。

南朝境内居住的少数民族，也往往被掠为奴婢。南海郡有公开的奴婢市场，买卖“高凉生口”（高凉也是当时的一个郡）。这个地方的官员，从奴婢买卖中猎取厚利。

有的奴隶主为保证对奴隶的占有，要在奴隶脸上烙印记。那时，犯了罪的被烙印记，叫做“黥”刑。有的奴隶，便不问犯罪不犯罪，被“黥”得像个刑徒。梁朝贵族萧正德，“奴僮数百，皆黥其面”，就是一个例子。

被烙了印记的奴隶，派到远方去经商，无法逃走。齐朝的刘寅叫奴隶当伯到广州去做买卖，过了七八年，还是不得回来。用奴隶去做买卖，在南朝很普遍。

奴婢在南朝是最受压迫的一个阶层，和牛马田宅一样，是主人的财产。法律规定，奴婢逃跑要受到各种酷刑；如果进行反抗，还可以任意被主人处死。但是在整个社会生产当中，他们不居于主要的地位。

三、“亡命”和“山贼”的暴动

南朝 170 年，陈朝以前的 140 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约有 40 次。起义的人数，有的几千，有的几万，最多的一次达 20 万。

益州和扬州，是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农民起义，在这两个地方，比较频繁，益州有 9 次，扬州有 7 次。

益州农民起义，宋朝有：432 年赵广的攻打成都；466 年成都的两次被围攻；472 年李承明在巴西（现在四川阆中西北）的暴动。齐朝有：499 年到 500 年赵续伯的起义。梁朝时，益州农民，从 505 年开始，45 年当中，规模较大的起义就有 5 次。焦僧护占领成都附近的郫县、繁县（现在四川新繁县），起义人数有几万。吕苟儿攻打成都，也有 10 万人。张文萼领导的一次暴动，人数有 1 万，还打死了镇压他们的巴西豪强首领侯弘远。沙门（和尚）孙天英领导僧徒暴动，虽然不过几千人，却也勇敢地攻打了成都。

益州农民起义的矛头大都指向州的统治中心——成都，9 次当中，成都被攻打了 6 次。南朝的时候，被派往益州做刺史的，不是皇帝的兄弟子侄，便是赫赫的显贵。赵广起义时，益州刺史刘道济，是宋武帝的心腹刘粹的弟弟。孙天英攻打成都时，益州刺史是梁武帝的儿子萧纪。这些人来到益州，和地方封建势力之间有利害冲突。刘道济在益州，历史书上说他“伤政害民”，既为益州人民所痛恨，也招致了地方势力的不满。萧纪在益州，把搜括得来的钱，铸成金饼银饼，不但益州农民被

他剥削得膏血都尽，益州的地方豪强的利益，也受到损害。这种情况，使得益州的统治中心——成都，成为益州农民起义进攻的目标，他们感到，一切大祸害都是从盘踞在那里的统治者加在他们身上的。

扬州起义的农民，被旧历史书称做“亡命”或“山贼”。451年，司马顺则起义；司马顺则被称为“亡命”。510年，吴承伯起义；吴承伯被称为“山贼”。“亡命”和“山贼”，都是被赋役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铤而走险的农民。

农民不断地逃亡，是南朝一个普遍现象。

齐朝的时候，永嘉郡有一个横阳县（现在浙江平阳县），山深谷峻，农民逃亡到那里，垦殖山荒，日子久了，渐渐结成村落。范述曾做永嘉太守，把这些逃到深山里的人骗了出来，强迫他们成为向政府交租股役的编户，据说有200家之多。过去的太守，对这些住在深山里的流亡农民，只知道派兵去抓，用武力去剿；但毕竟抓不完，剿不尽。范述曾换了个花样，使了另一手，有一些农民便落了圈套，受了欺骗。

梁朝有个臧厥，也采用范述曾的一手。当他做晋安郡太守时，也把逃亡到山里的农民，收作了国家的编户。晋安郡人民，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臧虎”。

被称为“亡命”或“山贼”的暴动，人数往往只有几千，但坚持斗争的时间，有的却很长久。宋朝末年，“亡命”王无初在六合山（现在江苏六合县境内）领导农民斗争，屡次打退官军的进攻，坚持了10年多。这是南朝农民反对地主斗争坚持得最长的一次。

扬州农民起义规模最大的一次，要算宣城吴承伯的起义，

吴承伯领导的农民斗争,从现在安徽南部进入浙江,攻破了几座县城。沿途有许多被压迫的群众参加,从历史记载看来,还有所谓“叛吏”在内。吏在南朝,被国家驱使,和农奴差不多。这一次起义,发展到了2万人,地方官被打得纷纷逃散;最后,在“台军”(朝廷的军队)镇压下失败了。比吴承伯起义早40年,临海田流在滨海山谷中起义,自号东海王,杀鄞县(今浙江宁波)县令,第二年才被镇压下去。这一次起义,使得宋朝东部的州郡惊慌失措。

扬州地方统治势力,和朝廷的关系较深。镇压农民暴动,朝廷和地方总是协同一致。所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扬州比较困难。各地分散的暴动,也往往很快地被镇压下去。但农民的阶级斗争,却保持着这个阶级固有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本色。

其他地方的情况,就比较复杂。有时候,地方势力利用当地农民对朝廷赋役负担的不满,掀起反对朝廷的斗争。542年,梁朝安成郡的刘敬躬反对安成内史(相对于郡太守的官)萧悦,在现在江西西南部揭竿而起,攻破了江西南部和中部的许多县城,一直打到江西偏北的豫章郡。跟随着刘敬躬的群众有好几万人。刘敬躬本人,出身于安成望族,属于统治阶级的中上层。但拿起武器参加斗争的群众,无疑地是被压迫的农民,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刘敬躬的部曲和其他望族的部曲。

466年,益州爆发了最大的一次农民暴动,但被地方豪强和宋朝贵族利用了。这一年,宋朝皇帝内部争夺帝位的斗争很激烈。晋安王刘子勋在寻阳(现在江西九江市)起兵,反对已经夺得帝位的宋明帝。益州刺史萧惠开,以支持刘子勋为名,从

益州出兵，打算扩充自己的势力。他派出两支兵，一支在巴东（现在四川奉节县）遭到地方武装任叔儿的袭击；一支在梁州（现在陕西南郑县）为杨僧嗣所截断。

萧惠开和益州地方力量之间，本来有着不同的利害。益州人民，也因为萧惠开的残酷统治，对他十分痛恨。当萧惠开派出去的军队被益州地方武装打得七零八落的时候，成都附近各郡的豪强和被压迫的农民，由晋原郡首先发难，纷纷向成都集中。第一次攻打成都的有 10 万人，第二次增加到 20 万人。这是南朝一次少见的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行动。没有广大农民反对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情绪，这样规模巨大的武装斗争，是不能想象的。

但是，这两次攻打成都的领导权都操在地方豪强和后来为宋明帝派到益州宣慰的大员萧宝首手里。萧宝首在第一次攻打成都失败之后来到益州。这个贵族野心家，也打算利用地方对萧惠开的不满，掀起更大的反对萧惠开的斗争，在皇帝的记功簿记上他“平蜀”的功劳，博取更高的官位和赏赐。

因此，成都始终没有被打下来；围攻成都的农民队伍，也就在失败之后，纷纷解散了。

432 年，成都附近广汉（现在四川遂宁县）、巴西，爆发了农民起义。赵广领导的一支农民武装，攻破了涪城（现在四川绵阳县）。益州各地农民纷纷响应，郡太守都弃官逃命。这一年的深秋，赵广攻打成都，四面围城，有 10 万多人，围攻了 3 个月，没有攻下，最后被迫退回广汉。

这次起义队伍中，也有不得志的地主阶级分子，不满于苛捐杂税的商人。这些人里面，像帛氏奴、梁显，还窃取了起义军

的领导地位。但主要领导权,和 466 年那一次不同,掌握在和农民有密切联系的人手里。

当起义军队从成都撤退,最后回到广汉的时候,一些领袖在战斗中牺牲了,大部分人退到了山里,逐渐结集力量,坚持斗争。直到 437 年,重要领袖程道养战死,地主阶级分子帛氏奴、梁显投降,起义才最后被镇压下去。这次起义,从 432 年到 437 年,一直坚持了 5 年,是南朝益州农民武装斗争时间最长的一次。

四、唐寓之起义

唐寓之起义是发生在公元 486 年南齐时的一次农民起义。这次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反对南齐政府的“检定户籍”。

在检籍过程中,被清理出来的作假的户籍,称为“却籍”。“却籍”的民户要全家补兵,罚充远役。一些官吏借检定户籍贪污作弊,趁机向人民敲诈勒索,发财致富。有钱的就“应却而不却”,没有钱的却“不须却而却”。结果,大受其害的仍然是广大人民。1 人被检,10 家都受牵连。被却籍的民户终于在唐寓之的领导下起义了。

公元 486 年,唐寓之利用会稽太守王敬则去“朝正”(正月朝拜皇帝)的机会,举兵起义。起义军首先攻下了富阳,“三吴却籍者奔之,众至三万”。接着,起义军攻破桐庐,进占钱塘、盐官、诸暨、余杭。唐寓之又派遣一支起义队伍攻陷东阳郡,杀了太守;另一支起义队伍由孙弘率领,攻取山阴,一直打到浦阳江(曹娥江)。唐寓之攻下钱塘后,便称帝,设置百官,建立了吴

政权。

齐武帝急派中央亲兵前往镇压。经过激战，唐寓之被俘牺牲。起义军也被残酷的镇压下去了。

萧齐统治者对起义区的人民大肆烧掠，跟随唐寓之起义的“却籍”人民被罚去修筑白下城，一部分人还被发配到淮河一带作戍卒 10 年。但是，人民反检籍的斗争却没有终止。公元 490 年，萧齐政权被迫停止检籍，宣布“却籍无效”，恢复刘宋末年户籍所注原状。唐寓之起义的成果是应当肯定的。

第五章 民族战乱 和民族融合

第一节 五胡内迁

西晋王朝的自我毁灭给北方几个内迁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创造了绝好机会，这几个内迁少数民族史称“五胡”，他们曾长期遭受魏晋统治者的压迫，当他们获得翻身和报复机会时，最初的冲劲对文明的毁坏却也不可低估。然而，在汉魏晋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内迁大都是和平地进行的。

五胡即匈奴、羯、氐、羌、鲜卑五族，他们分布在西北边境，东汉以来，已向内地迁徙。魏晋时期，汉族统治者为了补充内地劳动人手的不足和加强对各少数民族的控制，经常招引和强制他们入居内地。各少数民族人民内迁后，在汉文明的长期影响下，逐步地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业生活过渡。他们一方面仍保持着部落组织，一方面和汉人一样，要受所在郡县官吏的管辖。

迁移到塞内和汉人杂处的胡人，以匈奴人为最早，汉化程度也较高。他们是东汉时归附汉朝的南匈奴后裔，曹操时，曾把并州匈奴三万余落分为五部，置五部帅，派汉人为司马加以监督。魏末晋初又析为五部、三卒、四率，匈奴部帅改为都尉，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西晋时期，塞外匈奴、杂“胡”仍然源源不断地入塞，前后达二十余万人，分布在今晋、陕、甘三省境内。卢水胡是“杂胡”中的一支，被安置在凉州。

羯是西晋时随匈奴入塞的“匈奴别部”，入塞后聚居于上党武乡（山西长治北），后来散布于太行山一带。羯人大部习于农耕，经济生活上同汉人的差别已基本消失。

鲜卑在东汉时已游牧于匈奴故地。二世纪五十年代，鲜卑各部推檀石槐为最高军事首领，檀石槐仿照匈奴遗制，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三国时，首领轲比能吸收逃亡塞外的汉人，拟则中国制度，勒御部众，一度强大。其后，部落分散，分成不相统属的几支，慕容部、段部、宇文部活动在辽东、辽西和河北塞外；拓跋部活动于代郡、定襄、云中及其以北一线。魏晋时期，秃发一支数万人迁到雍、凉二州间，乞伏一支迁到陇西一带。并且，各部都继续向塞内迁徙。

氏族和羌族是两个古老的民族，除一部还留居今青海、甘肃以外，魏晋时已有不少入居关中和益州。氏族原聚居在武都一带，魏蜀争汉中时，曹操令张既、杨阜等先后徙武都氏人于天水、扶风和京兆，曹操攻汉中时，又把賸人（又称巴氏）迁到洛阳。氏人中的仇池杨氏部族强大，晋元康六年（296）建立仇池国（甘肃成县境），至北魏正始三年（506）始灭。羌人数量很多，分成不同部落，东汉以来大部分已迁到陕西。西晋时，“关

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户口，戎狄居半。”（《晋书·江统传》）五胡加上賚人，当时又称为“六夷”。

魏晋以来北方各族的内迁，加速了各族社会的文明开化，各族部落越是远离自己原来的住地就越是容易脱离部落羁绊；越是深入汉人地区就越容易成为耕种小块土地的封建农民。各族人民由游牧转向定居农耕，是走向封建化和民族进步的重要表现。在内徙各族逐步封建化的过程中，各“胡”族不但大量吸收汉族的农业文明，而且也以自己的草原文明影响汉人，如晋时洛阳贵族尚用胡床貂襜褕。北方汉人还吸收了胡人的习俗，以酪浆为饮料。大量胡族人的内迁，给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民族差异的存在也是社会动乱的因素，处理不当就会引起民族纠纷和仇杀。各族的内迁引起了一些汉族统治者的忧虑，特别是一些民族的住地靠近洛阳，使晋统治者感到了威胁。因此有许多人主张把这些民族强迫迁走。魏嘉平年间（249—254）邓艾曾建议分割匈奴部落，将与汉人杂处的氐羌徙于汉人地区之外。西晋时期，郭钦主张向匈奴住地移徙汉人，加强军事控制，并把最接近洛阳的“杂胡”迁到匈奴之外，“峻四夷出入之防”。江统更专门写了《徙戎论》，主张把内迁的匈奴、氐、羌一并遣回故土，以使“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但是，内迁各族人民早已习惯于农业生活，当然不愿回到落后生产方式的地方去；一些汉族地主也认为内迁各族是他们榨取兵力、劳力和财富的重要来源，也不愿把这些少数民族赶走。各族内迁和杂居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不可能强制改变。

汉族统治者一方面想驱赶内迁的少数民族，一方面又残

酷地役使他们，所以胡族的内徙，既充满了严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也充满了激烈的反抗和斗争。对于胡族来说，汉人是统治族，是征服者。汉末以来，地方的割据势力就多以外族人为兵，内迁各族还常常被迫服贱役，甚至连贵族也不能免。羯人石勒父、祖都是部落小帅，他自己作过行贩，还曾为人“力耕”，后来被并州刺史司马腾捕缚，卖给荏平人师瓘为耕奴。各地军阀、豪强掠卖少数民族人民的事屡见不鲜。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剥削，使各少数民族人民对西晋统治者“怨恨之气，毒于骨髓”。

第二节 十六国春秋

一、汉和前赵

东汉以来，我国北方和西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陆续迁到长城以内和黄河流域一带居住。到西晋时，由于内迁各族长期与汉族交往，逐渐走向定居的农业生活，但大多保留部落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自己民族的语言和习惯。

西晋统治阶级对入迁的少数民族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他们强迫少数民族交纳重税，服兵役、徭役，甚至把少数民族人民掠卖为奴。西晋士族就多买鲜卑慕容部妇女为

婢妾。各少数民族人民不断进行斗争，以反抗西晋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

西晋统治阶级在自相残杀的内乱中，受到极大削弱。各少数民族贵族趁机利用各族人民对西晋政府的仇恨，纷纷起兵反晋。西晋灭亡后，在我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和汉族贵族先后建立了十几个割据政权，进行了长达 100 多年的混战，直到公元 439 年，北魏统一北方，这种局面才告结束。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为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指汉及前赵(匈奴)、后赵(羯)，前燕(鲜卑)、成汉(巴氏)、前凉(汉)、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南凉(鲜卑)、西凉(汉)、北凉(卢水胡)、南燕(鲜卑)、北燕(汉)、夏(匈奴)等十六国。巴中成汉在巴蜀地区，而十六国之外，还有汉人冉闵建立的魏，丁灵翟氏建立的魏、武都氏帅杨氏建立的仇池国，鲜卑慕容氏建立的西燕，鲜卑拓跋氏建立的代五个政权，总计先后建立了 21 个政权。上述政权中后赵、前燕、前秦都曾占据过北方大部分疆域。尤其是前秦基本统一了北方，但时间都很短，百来年时间(304—439 年北魏统一北方前)，北方战役基本没有平息过。

最先起兵反晋的是匈奴族的刘渊。魏晋以来，内迁的匈奴族被分为五部。他们自认是汉朝的宗亲(汉时匈奴与汉朝皇帝联姻)，故而改为刘姓。刘渊是匈奴族中屠各族一支的贵族。他曾向儒生崔游学习经书，博览《史记》、《汉书》、诸子书，尤好《孙子兵法》，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晋惠帝时，刘渊被封为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公元 304 年，他利用晋室内乱机会，回到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召集部众 5 万人，起兵反晋，

建立汉国。不久，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自称皇帝。他为了笼络汉族地主支持自己，宣告匈奴刘氏是两汉刘氏的外甥，祭三祖(汉高帝、汉光武帝、汉昭烈帝)五宗(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汉明帝、汉章帝)，不祭匈奴单于。汉国建立后，刘渊连年派儿子刘聪、部将石勒、晋士族出身的王弥等，进攻西晋都城洛阳。公元310年，刘渊病死，刘聪做了汉国皇帝。次年，他派族人刘曜和石勒攻陷洛阳，俘虏晋怀帝，杀晋王公、士民3万余人，并纵兵在洛阳大肆焚掠，致使一度繁荣的洛阳城化为灰烬。晋怀帝被杀以后，晋愍帝即位长安。公元316年，刘曜又攻破长安，晋愍帝投降，西晋灭亡。

由于汉国具有部落军事组织的特点，随着其征服地区的扩大，掌握军权的上层分子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割据势力。刘渊之侄刘曜坐镇长安，盘据关中地区。羯帅石勒驻扎襄国(河北邢台)，割据河北一带。刘聪的统治实际限于山西一隅。刘聪及其太子刘粲既昏庸又残暴，刘粲迫使氐、羌首领自诬与其叔父刘乂谋反，迫使氐、羌10余万落反叛逃亡，所属汉人20余万不堪掠夺也逃到河北投奔石勒。匈奴贵族为争夺财富和权力互相倾轧；使汉国统治很不稳定。公元318年刘聪死，外戚靳准杀新继位的刘粲及刘氏家族，坐镇长安的刘曜起兵族灭靳氏。次年，刘曜自称皇帝，建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前赵)。由于刘曜在关中地区时各民族采取高压政策，加上治国无方，一味征战，国势日颓，石勒则乘机控制了河北广大地区。公元320年石勒称赵王，定都襄国，史称后赵。接着，刘曜和石勒互相攻杀起来。公元328年，石勒俘虏刘曜，灭掉前赵。

二、后赵的兴亡

后赵国的创建者是石勒。石勒字世龙，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羯人。羯族是“匈奴别部羌渠之胄”，为匈奴十几个部落中的一支。

晋惠帝末年，山西发生大饥荒，大量汉族居民流徙河北、豫中，自谋生路，一些少数民族居民则被官吏掠卖。石勒当时20岁，也在被掠卖的行列中。石勒被卖往茌平（今山东茌平县）人师瓘家作奴隶，师瓘见石勒气度不凡，很是器重，不久就将他放免为佃客。在此期间，石勒结识了汲桑等一些豪杰。后来石勒召集王阳等八人骑马四处抢劫，号为“骑盗”，后又得郭敖等10人加入，号称“十八骑”。这时，中原八王混战正烈，成都王司马颖逼惠帝居邺城，王浚联合鲜卑进攻司马颖，关东也以讨伐司马颖为名而起兵。后来司马颖被杀，司马颖故将公师藩自称将军，起兵赵魏，声称为司马颖复仇，众至10万，石勒与汲桑一同依附于公师藩。公师藩失败后，汲桑自号大将军，以石勒为前驱，石勒率军长驱入邺，杀司马腾。不久汲桑为西晋苟晞打败被杀，石勒遂辗转投奔刘渊，刘渊以石勒都督山东征讨诸军事。晋永嘉二年（308年），刘渊称帝。次年，刘渊以石勒为安东大将军。石勒出兵攻破冀州诸郡县坞堡，部众发展到10余万人，石勒在冀州集衣冠之士为君子营，用张宾为谋主，继续发展自己的势力。永嘉四年（310年），刘渊死，刘聪以石勒为并州刺史，封汲郡公。

永嘉五年，石勒与司马越所统西晋主力部队战于苦县（今

河南鹿邑县)的宁平城(今河南郸城县东北),全歼晋兵,同年与刘曜、王弥攻破洛阳。不久石勒又杀王弥,并其部众,以后又于建兴二年(314年)杀王浚,割据河北、山东大部分地区。公元316年(建兴四年),石勒击败西晋并州刺史刘琨,刘琨被石勒打败后,被段匹磾杀害。大兴元年(318年)刘聪病死,刘粲继位,靳准杀刘氏发动政变,石勒出兵攻陷平阳。次年,汉主刘曜授石勒为太宰、领大将军,进爵赵王,加殊礼,如曹操辅汉故事。这年六月,刘曜建前赵于长安,署石勒为大将军,以河内24郡封石勒为赵王,是为后赵。

太宁三年(325年),后赵石生进攻前赵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今河南新安),斩尹平,掠五千户而还。从此,二赵构隙,互相攻击,开始了前、后赵对峙的局面。太宁四年(326年),前赵刘曜联合东晋司州刺史李矩、颍川太守郭默,合力进攻石生,刘曜派中山王刘岳率兵1.5万人,以镇东将军呼延谟率荆州、司州之兵直趋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后赵石虎率步骑4万自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与刘岳战于洛西,刘岳大败石虎。六月,石虎重新集结军队与前赵刘岳战于石梁(今河南洛阳市东),刘岳战败被擒,俘其将佐80余人,氏羌3000余人,皆送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活埋其士卒9000人。不久又攻陷并州,刘曜引兵回长安,因愤成疾,东晋李矩、郭默逃奔建康,李矩部下帅余众2000降于后赵。自此,司、豫、徐、兖、并等州皆为后赵所有。

石虎取得并州后,便与前赵争夺河东。咸和三年(328年),后赵石虎率兵4万,自轵关(今河南济源西北,太行八陁第一陁)西上,围攻蒲阪(今山西永济县),刘曜听说后赵西上,

亲自率领水陆精锐援救蒲阪，两军战于高候（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石虎军队大败，陈尸 200 余里，南奔朝歌（今河南淇县），刘曜自大阳（今山西平陆西南），乘胜进攻石生于金墉（今河南洛阳以东），决千金谒（今河南洛阳以北）以灌城，后赵荥阳（今河南荥阳）太守尹矩、野王（今河南泌阳县）太守张进投降刘曜，形势发展对后赵大为不利。

同年十一月，石勒准备亲自将兵驰救洛阳，部下程遐认为，刘曜悬军千里，难以久持，大王亲动，难保万全，不同意石勒亲自出征。石勒大怒，召来徐光问道：“刘曜乘一战之胜，围困洛阳；庸人们都说其锋不可当，刘曜虽带兵甲十万，但攻一城却百日不克，今刘曜悬军深入，军疲卒怠，我若以锐军进击，可一战而擒。如果洛阳失守，刘曜必拼命争夺冀州，自黄河北上，后赵便无救了，程遐劝我不出兵，你以为如何呢？”徐光回答说：“刘曜虽有高候之胜，不能趁势进军襄国，足见其用兵无能。以大王的谋略勇武，刘曜必定望旗奔败，现在出兵是平定天下的最好机会，不可错失良机”。石勒听了很高兴，于是内外戒严，部署军队，并下令有谏阻出兵者斩首，接着分军三路，以石堪、石聪、豫州刺史桃豹各率所部会集荥阳（今河南荥阳），石虎据石门（今河南郑州市西北），石勒自统步骑 4 万驰援金墉。十二月，后赵诸军集结于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有步兵 6 万，骑兵 2.7 万多人。石勒见前赵在成皋未设守军，举手指天，又自指额头说：“天助我也”，于是卷甲衔枚，诡道兼行，进军洛河。刘曜见后赵大军突然到达，神色大变，忙调兵 10 万守洛西，军陈南北 10 余里。石勒见此，大喜，对左右说：“可以贺我矣。”遂命石虎领步卒 3 万自洛阳城北而西，攻击前赵中

军，又命石堪、石聪各率精骑 8000 自城西而北进，击其前锋，石勒率步骑 4 万直入洛阳。石堪、石聪与前赵军前锋战于洛阳城西南头的西阳门，石勒出洛阳城西北头门，南北夹击，前赵军队大溃，刘曜马陷石渠，坠于冰上，被石堪擒获，石勒大破前赵军队，斩首 5 万余级，下令说：“所欲擒者一人，今已获之，其敕将士抑锋止锐，纵其归命之路”。

石勒命征东将军石邃将兵护送刘曜于襄国，石勒让刘曜写信与其太子刘熙，令其投降，刘曜在信中却令熙与诸大臣“匡维社稷，勿以吾易意也”，石勒遂杀刘曜。

咸和四年（329 年）正月，刘熙得知刘曜被擒，大为恐惧，率百官逃奔上邽（今甘肃天水市），关中大乱。前赵将军蒋英、辛恕率众数十万投降后赵。八月，前赵刘熙由上邽进攻长安。九月，石虎帅骑 2 万驰救，击败前赵军队，生擒赵太子刘熙、南阳王刘胤及其将帅、王公卿校以下 3000 余人，全部杀死，又徙其台省文武、关东流民、秦雍大族 9000 人于襄国，又活埋五郡各 5000 余人于洛阳。

咸和五年（330 年）七月，石勒即帝位，改元建平，定都襄国。石赵政权对其统治区内的汉族和少数人民采取分治的政策。石勒在位期间，非常注重汉化教育，初取河北，即在襄国“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称帝后又“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 2 人，弟子 150 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石勒自己不识字，却很喜欢学习，常常要人读史书给他听。他对历史事件的许多看法，常使听者叹服。

咸和八年（333 年）七月，石勒病卒，由太子石弘继位，十

月，石虎废石弘，居摄赵天王，杀石弘、石宏、石恢及程太后，咸康二年（336年），石虎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次年，石虎自号大赵天王。咸康五年（339年），石虎即帝位，改元太宁。石虎执政期间，大兴土木，先在旧都襄国修太武殿，在邺都修东、西宫，在邺南修飞桥，耗资数千万亿，桥竟不成。以后又在邺都作台观 40 余所，又调集工匠、民工 40 余万人修长安、洛阳二宫。命河南四州，备南讨之师，并、朔、秦各州率领征集西讨军资，青、冀、幽 3 州三五发卒，各州造甲者 50 万人，加之公侯牧守竞营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船夫 17 万人为水淹没，深山采木为猛兽所害者 1/3。又发近郡男女 16 万，车 10 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墙于邺北，遇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为了满足其荒淫侈靡的生活，石虎还大征百姓家女 13 岁以上、20 岁以下的 3 万余人充实后宫，地方郡县为讨好献媚，求取美色女子，强夺已婚女子 9000 人入宫，故有“夺人妻女，十万盈宫”之说。

石虎的暴政，终于引起了人民的反抗。咸康八年（342年），爆发了以李弘为首的山东农民起义，起义很快被镇压。永和五年（349年），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梁犊起义，这次起义虽被镇压，但石赵统治从此便摇摇欲坠了。这年，石虎病死，其子石世继立，石世被其兄石遵所杀，石遵即位不久又为其弟石鉴杀害。正在诸子争夺皇位，互相残杀之时，汉人冉闵趁势起兵，夺取政权后，大杀胡人，胡人死者 20 余万，后赵至此灭亡。

三、冉魏的兴亡

永和五年(349年)四月,后赵皇帝石虎死,其子石世嗣位。太保张豺掌权,策划杀死司空李农,李农逃奔上白(在今河北省),帅乞活军数万家自保。当时,石世之兄、彭城王石遵来奔丧,征虏将军冉闵及羌酋姚弋仲、氐酋蒲洪等劝说石遵声讨张豺。五月,石遵率军直趋后赵都城邺城(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冉闵为前锋。冉闵字永曾,小字棘奴,魏郡内黄(今属河南省)人。其父石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最初加入乞活军,为石勒所虏,被石虎收为养子,改姓名为石瞻。冉闵为石虎养孙,善谋略,勇力绝人,后赵胡汉诸将莫不畏惧,封武兴公。

石遵军队到达邺城,杀死张豺、石世,自立为帝,以冉闵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沛王石冲起兵攻石遵,冉闵、李农率军10万迎战,斩杀石冲。十一月,石遵因冉闵擅权,密谋诛杀他。冉闵与李农先发制人,杀死石遵,立其弟石鉴为帝。冉闵任大将军,封武德王;李农为大司马、录尚书事。石鉴虽为冉闵所立,却对冉闵疑惧参半,暗中派兵袭击冉闵、李农,不胜。石虎的儿子新兴王石祗与姚弋仲、蒲洪联合,发布檄文,自襄国(今河北邢台县)起兵,共讨冉闵、李农。邺城之内,龙骧将军孙伏都等人率羯人3000挟持石鉴,进攻冉闵、李农,不胜,屯驻在邺城凤阳门。石鉴惧怕冉闵杀死自己,驰招冉闵、李农,命其攻讨孙伏都,以表白自己未与孙伏都等同谋。冉闵、李农率军攻杀孙伏都等,邺城中凤阳门至琨华门一线,死尸横地,血流成河。冉闵害怕胡人谋反,下令内外六夷敢持兵器者一律杀

死。胡人听说后大为害怕，斩关踰城，纷纷外逃者不计其数。冉闵拘禁石鉴，又下令邺城大开城门，与其同心者留下，不同心者可以随意离开。结果，邺城百里之内的汉族人全都自愿入城，而城中胡人、羯人争相出城，城门拥挤得水泄不通。冉闵由此知道胡人不拥护依附自己，于是下令大杀胡、羯族人，凡汉人杀死一名胡人，送首级到凤阳门来，文官进位三等，武官都封拜为牙门将。命令颁布的一天之内，胡人被杀死达数万人。冉闵还亲自带领汉人斩杀胡、羯，无论贵贱、男女、老少，一律不放过，死者达 20 余万人。尸体都抛到城外，任由野狗豺狼叼食。邺城以外地区，也根据冉闵的命令斩杀胡人。当时，鼻高须多、相貌类似胡人的被滥杀掉一半。

永和六年（350 年）正月，冉闵诛杀诸胡，又借口讖言有“继赵李”的说法，将后赵国号改为卫，石姓改为李，改元青龙。邺城中公卿将校外逃的人很多，四方州郡也各拥兵数万，占据一方，不听冉闵号令。闰正月，石鉴密谋暗杀冉闵、李农，宦官告密，冉闵杀死石鉴，同时杀死石虎的 38 个孙子，尽灭石氏。其后，冉闵即皇帝位，复姓冉氏，年号永兴，国号大魏。后赵亡。二月，前燕慕容儁乘中原地区局势大乱，乘机分兵数路进攻冉魏，一路节节胜利。三月，前燕军队攻克蓟城（今北京市），中原士兵纷纷投降。后赵新兴王石祗称帝于襄国，六夷拥兵据城者都起而响应，也派军队进攻冉魏。当时，冉魏所能控制的地区限于邺城及其附近，其余原后赵将帅，或随石祗等攻魏，或据守城池观望。冉闵杀死李农及尚书令王谟、侍中王衍等人。派使者临江告东晋说：“逆胡乱中华，今已诛之，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东晋却不作响应。

同年六月，冉闵率军队攻石祗于邯郸（在今河北省），大破之，又与后赵大将张贺度等会战，取得胜利，斩首近3万级，尽俘其众而归。当时，冉闵军队有部卒30余万人，旌旗钟鼓，连绵100多里，声势极壮，后赵极盛之时也无此气象。冉闵又恢复九品中正制，“清定九流”，视才委任，儒学世家的子弟，多被重用。当时人大多认为可以同魏晋初期的兴盛气象相比。

同年十一月，冉闵以其子冉胤为大单于、骠骑大将军，配备1000名投降的胡人为其部下，冉魏光禄大夫韦謏进谏，请诛杀驱逐投降的胡人，取消单于的称号。但冉闵此时的民族政策已有所改变，正想抚慰胡羯等少数民族为己所用，因而杀死韦謏及其儿子。次年二月，冉闵率军队围攻石祗于襄国，已达100多天，羌族姚襄及前燕救兵到达，合攻魏军，冉闵大败，仅带10余骑返回邺城，大臣石谏、石璞等及将士死于是役者有10多万人。当时，后赵衰亡，胡、汉流民数百万人流徙还乡，途中互相攻掠，侥幸不死而归家者仅有十分之二三。中原地区大饥，疾疫流行，活人相食。

冉闵在襄国城下失利后，石祗派大将刘显率7万军队乘胜进攻邺城。冉闵出战，大败刘显，斩首3万余级。刘显秘密投降，回军杀死石祗及其大臣10多人。冉闵以刘显为上大将军、大单于、冀州牧。不久，刘显又背叛冉闵，率军攻邺城。

永和八年（352年）正月，冉闵击败刘显，追击至襄国，攻克城池，擒杀刘显及后赵公卿大臣百余人，迁其民于邺城。后赵残余势力至此基本被消灭。但前燕军队攻势日急。同年四月，前燕与冉魏会战于魏昌（在今河北省无极县西），冉闵恃勇冲锋，十战皆胜。前燕军队设伏诱冉闵深入，魏军大败，冉闵

单骑奔逃，马死被俘，送往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县）杀死。前燕乘胜进攻邺城，魏太子冉智等固守。七月，城陷，冉魏亡。原后赵将领在中原地区据城自守者大多投降了前燕。冉魏立国仅 2 年。

冉闵诛胡是十六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族仇杀行为，反映了当时后赵统治下胡汉矛盾的尖锐深刻。

四、前凉

公元 301 年凉州大姓张轨受西晋朝廷任命为凉州刺史，从“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张轨及其子寔守土保境，中原人民纷纷前来避乱，张氏子孙世守凉州，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凉州成为中国北部唯一的安全地区。张轨以晋室忠臣自任，深得汉人拥护，内部较为巩固。张轨孙张骏始自称假凉王，建立政权，史称前凉，但仍对东晋朝廷表示忠诚，借以维系人心。因此在较长时期汉族士人在那里传授儒学，保存了中原失传的一些经籍和学说。州治姑臧（今甘肃武威）成为西北地区的文化中心。张氏虽接受东晋封号，但与建康相距万里，实际上也是一个割据政权。前凉先后打退了刘曜、石虎的进攻，又西越流沙，攻龟兹，西域诸国先后归附。然后击败伊吾戍己校尉赵贞，在其地设立高昌郡，控制了从陇西到西域的广大地区。张骏死后，前凉开始衰败。张祚自称凉王，群臣切谏，说不奉戴晋朝，大失人心，一定要亡国。张祚杀谏者丁琪。第二年张祚被臣下杀死。张天锡做凉王，正是苻坚强盛的时候，376 年，苻坚发兵来攻，张天锡战败投降，前凉宣告灭亡，立国凡 76 年。

五、前燕兴亡

前燕灭亡冉魏

建立前燕的鲜卑族的慕容部(又称白部),居住在辽河流域。西晋时,酋长慕容廆率部移居辽西,开始经营农业,并仿照魏晋建立各种制度。晋末中原大乱,一批汉族官僚地主带着宗族部曲,以及大批流民避乱迁居辽西。慕容廆设立侨郡县予以安置,用汉人士族为官,令鲜卑贵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遣使渡海,要求接受东晋封号,要求东晋出兵夹击石勒。慕容廆以裴嶷等人为辅佐,建立起完全汉化的鲜卑国。333年慕容廆死,子慕容皝继位。337年慕容皝自称燕王,但名义上仍尊奉东晋王朝。慕容皝自立为燕王后,便欲积极向周围扩展势力,为此,他首先把矛头指向了段辽部。段辽居于今河北省东北和西北部地区,是阻止前燕南进、后赵北上的中间障碍。加之段氏又曾帮助慕容仁兄弟对抗慕容皝,为清除这一障碍,打通南下的道路,前燕遂决定联合后赵,夹击段辽,而后赵也因段辽多次侵掠其北部边疆,早有消灭段辽之意,因而,双方决心合力进击段氏。

东晋成帝咸康四年(338年)三月,燕王慕容皝率军南进,袭占辽都城令支(今河北迁安西)以北诸县邑,获胜而归。在此之前,后赵派横海将军桃豹、渡辽将军王华统率水军10万,由漂渝津(今天津北)渡海进发,另以龙骧将军支雄、冠军将军姚弋仲率步骑7万从陆路向段辽进攻。

段兰见慕容皝退走，便欲率军急追，此时，慕容翰劝阻段兰说，现在赵军在南，应合力击退赵军，再与燕战；同时，燕王亲自率兵前来，士卒精锐，万一失利，将无力对付南面的赵军。段兰不听，决心率全军追击慕容皝。慕容皝早已布置了伏兵，一举将段兰军击败，斩杀数千人，使段辽势力受到严重损失。

后赵的支雄军，直取蓟县（今北京）。段辽之渔阳、上谷、代郡太守相继降赵，40多座城池被后赵占领。赵将郭太、麻秋率轻骑2万，追至密云山中，斩3000多人，段辽向后赵投降。

段辽降赵后，燕赵疆域相接，遂展开了燕赵之间的争夺战。

燕王慕容皝有些惊恐。赵军随之又招降了燕国36个城邑，更引起了慕容皝的震惊。五月初九，赵军围攻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南）。慕容皝欲率众逃走，其部将慕舆根极力劝阻。他认为赵如乘燕逃走，可一举攻占燕城邑，掠走燕国的民众和财富，赵将更加强大，燕则趋于覆亡。不如固守坚城，全力抗敌，依据形势的变化，实在不利，再走不迟。慕容皝采纳了慕舆根的建议，但仍然惶惶不可终日。后来，玄菟郡太守刘佩，请求出兵袭击敌人，率敢死骑兵数百突然向赵军冲击，所到之处，敌军皆败，斩杀了一些赵军，胜利退回，使燕军士气为之大振。部将封奕随之向慕容皝建议说，石虎凶狠暴虐已极，民众和上天都恨他，败亡之日已为期不远。他远道而来，兵马虽然众多，但我们依坚城固守，他也无计可施，只要我们严令军队防守，等待时机，是会有机会战胜他的。

赵军四面攻城，慕舆根等率军昼夜苦战，赵军无法攻克棘城，于十三日撤军而走。慕容皝抓住时机，派其子慕容恪率骑

兵 2000 追击赵军，赵军大败，被斩杀 3 万多人，余众丢弃盔甲军资而逃，只有游击将军冉闵的部众秩序井然。燕随之收复了丢失的城池，诛杀了叛变者，实力稍有增强。

咸康四年十二月，原向后赵投降的段辽，又遣使向前燕请降。赵石虎接到段辽的降书之后，便派征东大将军麻秋率军 3 万去迎接段辽。石虎告诫麻秋说，受降如同攻击敌人一样，不可疏忽。此时，燕王慕容皝也率军迎降段辽。段辽遂暗中与燕商议，借机挫败赵军。于是，慕容皝命慕容恪在密云山中埋伏了 7000 精兵。待麻秋军至，慕容恪军突然袭击赵军，将 3 万赵军消灭大半。麻秋步行逃走。

燕突袭赵腹心地区。咸康六年（340 年）九月，石虎准备了 50 万大军，战船 1 万艘，并在乐安城（今河北乐亭）屯粮 100 万斛，搜括民马 4 万余匹，阅兵于宛阳（今河北临漳境），准备发兵攻燕。慕容皝对其部将说：“石虎自以为乐安城防守严密，蓟城南北必不设备，今若秘密从小路进击，出其不意，定可破敌。”十月，慕容皝率军入螭鹘塞（今河北居庸关），秘密击赵，长驱直进，兵至蓟城之下，赵幽州刺史石光拥兵数万，紧闭城门，不敢出战。燕军遂进占武遂津（今河北定兴境），袭取了高阳（今河北高阳东），所到之地，烧毁赵积谷财物，对赵境腹地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后，率军而归。公元 348 年，慕容皝死，其子慕容俊继位为燕王。

燕进击后赵之前，后赵的内乱愈演愈烈。后赵石鉴向赵主石遵建议诛杀冉闵，被郑太后阻止，石鉴因怕冉闵知晓后，对自己不利，又暗中通报冉闵。冉闵怒，遂率兵将赵主石遵、郑太后、太子石衍等杀掉，拥立石鉴为帝。石虎之子新兴王石祗，屯

兵襄国，遂与姚弋仲、蒲洪连兵，进讨冉闵、李农，反被冉闵、李农击败。接着冉闵、李农杀石鉴、石虎的子孙 28 人，尽灭石氏后代。冉闵于晋穆帝永和六年（350 年）闰正月，称帝，改国号为大魏，史称冉魏。冉闵称帝时，已打败了各个对手，拥兵 30 多万，胜过石勒的极盛时期。

此时，前燕见后赵将亡，便于永和六年二月，开始发兵进攻赵之残余势力。燕王慕容俊命慕容霸率兵 2 万为东路军，兵出徒河（今辽宁锦州）；慕舆根从西道率军出鬲螭塞（居庸关）；慕容俊率军为中路，出卢龙塞（今河北迁安西北）。

慕容霸军至三径，后赵征东将军邓恒惊恐惧怕，焚毁仓库后，放弃安乐（今河北乐亭），退走蓟城，与幽州刺史王午合兵守蓟（今北京）。三月，燕军进至无终（今天津蓟县），赵刺史王午留其将王佗守卫蓟城，自与邓恒率军屯守鲁口。三月五日，慕容俊攻占蓟城，斩了王佗。慕容俊遂迁都于蓟。燕军进击范阳（今河北涿州），赵太守李产投降于燕。三月二十四日，慕容俊亲自率军至鲁口，进攻邓恒至清梁（今河北蠡县西），邓恒部将鹿勃早率军数千夜袭燕军，慕容霸、慕舆根、李洪等将率军力战，将赵军击退，追杀 40 里，鹿勃早只身逃走，燕军回师蓟城。

前燕未进攻冉魏之前，后赵新兴王石祗又于晋穆帝永和六年三月底，于襄国即皇帝位，以石琨为相国，姚弋仲为丞相。凡六夷占据的州郡都响应石祗，后赵由此力量稍有恢复，接着便和冉魏互相攻伐。四月，石祗命相国石琨率 10 万大军进攻冉魏。刘国、石琨进占邯郸，镇南将军刘国率军从繁阳（今河南内黄西北）与石琨会合。魏派卫将王泰进击石琨军，将其击败，

斩赵军 1 万多人，刘国退回繁阳。八月，赵将张贺度、段勤、刘国、靳豚等，在昌城（今山东淄博东南）会师，准备向冉魏都城邺（今河北临漳西）进击。冉闵率军 30 万迎击赵军，于苍亭（今山东莘县南）将张贺度等军击败，斩敌 2.8 万人，靳豚也被斩首。冉魏与后赵石祗相争，极大地消耗了双方的实力，为前燕击灭冉魏创造了有利的战机。

晋永和七年（351 年），前燕首次击败冉魏。二月，魏主冉闵率军 10 万，围攻襄国，十分危急，后赵石祗遣使向前燕和姚弋仲求救。慕容俊命将军悦绾率兵 3 万与诸军会合，以救后赵。冉闵亲自率军与悦绾、姚弋仲、石琨交战。悦绾在距魏军数里远时，命少数骑兵，拖着树枝，扬起灰尘，以示人多势众，魏军远远望见，十分惊恐。这时，悦绾与姚弋仲、石琨军立即从三面攻击冉闵军。石祗也从后面冲杀而来，冉魏军大败，冉闵 10 万大军损失殆尽，仅率十几个骑兵逃回邺都。两个月后，冉魏军力复振，于邺城击败石祗 7 万大军，石祗的大将刘显遂斩杀了石祗，投降于冉魏。

晋永和八年（352 年）四月，燕派慕容恪率军攻魏，恰值冉闵攻取襄国后率部众至常山（郡治在河北石家庄西北）、中山（郡治在今河北定州）等郡游食。冉闵见燕军来攻，便欲亲率大军迎击。大将军董闰、车骑将军张温劝谏说：“鲜卑军乘胜，兵锋正锐，而且敌众我寡，应暂避其锋锐，待其懈怠之时，再举兵集中向其攻击，定能获胜。”冉闵不听，决心与燕军一战，消灭慕容俊。两军会战于魏昌（今河北无极县西），冉闵先胜后败，被俘往龙城杀害。

四月二十五日，燕慕容评和中尉侯龛率精锐骑兵 1 万进

攻邺都，冉魏将军蒋干和太子冉智闭城坚守。战斗打得相当艰苦，邺城内兵疲粮尽，吃人充饥，原后赵王的宫人差不多被吃光，蒋干派人向东晋求救，东晋无力相助。五月二日，燕又以慕容军、慕舆根、右司马皇甫真等统率步骑兵 2 万，协助慕容评攻打邺城。

蒋干见无援兵，便于六月三日，率精锐士卒 5000 人出城与燕军作战，被燕军击败，斩首 4000 多人，蒋干败退回城。八月十三日，冉魏的长水校尉马顾开邺都城门，向燕军投降。蒋干逃走，冉魏皇后及太子冉智被俘，冉魏至此而亡。

公元 353 年，慕容隼自称皇帝，公元 357 年迁都邺城，攻取河南州郡，并准备进攻东晋，下令检查户口，每户留一丁，其余都当士兵，想凑成 150 万人的大军。360 年慕容俊死去，其野心未能实现，其子慕容暐继位燕晋，矛盾进一步恶化起来。

枋头之战

东晋桓温北征前燕枋头之战发生于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前燕建熙十年(369 年)三月，东晋大司马桓温率步骑兵 5 万，北征前燕。燕主慕容暐调动兵马反攻晋军，晋军兵败，桓温烧毁舟船，率部退兵。

前燕自与东晋接壤以来，至永和十年(345 年)止，晋燕双方未发生过重大作战行动。永和十年二月，燕王慕容俊以慕容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秦、雍、益、梁、江、扬、荆、徐、豫、兖十州诸军事，镇守洛水一带地区。

永和十一年(355 年)四月，兰陵太守孙黑、济北(今山东东阿)太守高柱、建兴太守高瓮、秦河内(今河南沁阳)太守王

会、黎阳(今河南浚县)太守韩高等,都投降于燕。

从永和十二年(356年)起,前燕开始进一步大举向周边扩张。当年正月,燕大司马慕容恪率军渡河,首先向齐地进攻。晋将段龛率兵3万迎击燕军。燕军击败段龛于淄水,俘晋军数千人。龛退守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燕军以高墙深堑长期围困,至十月,城中粮薪断绝,杀人而食。段龛遂率全军出战,被燕军全歼,段龛终于率余众降燕,齐地为燕全部占领。

接着,燕又向西北进击。晋穆帝升平元年(357年)五月,燕派抚军将军慕容垂、中军将军慕容虔、护军将军平熙统率步骑兵8万,向塞北大败敕勒部族,俘斩10多万人。匈奴单于贺赖头见前燕兵锋盛大,也率部众3.5万多人降于燕军,燕的势力进一步增强。当年十一月,燕将其国都南迁于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升平二年(358年)二月,又攻占了上党(今山西黎城西南),九月击败了占据平阳(今山西临汾)的张平。

燕征服西北,解除了后顾之忧后,便开始向大河以南进击。升平二年九月,燕司空阳骛率军渡过黄河,进攻原后赵将领高昌于东燕,乐安王慕容臧进占濮县(今河南濮阳南)之原后赵另一将领李历,李历弃城逃往荥阳。十月,慕容恪又击败晋泰山太守诸葛攸。十二月,晋徐州刺史荀羨先率兵击败燕太守贾坚,燕青州刺史慕容尘派兵随即将荀羨击败。燕王慕容俊为进一步展开争夺河南地区的作战,决定大力扩充军队,并力南向,以与东晋决战。

晋穆帝升平三年、前燕光寿三年(359年)秋,晋泰山太守诸葛攸率水陆军2万多人欲向燕军攻击,经石门(今山东平阴东北),渡济水,驻于大河岸边。燕上庸王慕容评和长乐太守傅

颜，统率步骑兵 5 万，在东阿（今东阳谷东北）将晋军击败。

东晋王朝为加强前线的兵力，于当年十月，以吴兴太守谢万屯兵于下蔡（今安徽凤台）；以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郗昙，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诸军事，接替苟羨，进占高平（今山东金乡东北）。不久，谢万率军从涡水和颍水之间援救洛阳，恰巧，正值郗昙因病而退守彭城（今江苏徐州），谢万以为郗昙是兵败而退，便惊慌率军而归。这样，许昌、颍川、譙、沛诸郡遂全部落入燕军之手。

升平四年（360 年）正月，燕王慕容俊病死，由太子慕容暉即帝位。慕容俊新丧，加之慕容皝叛乱，燕境内局势动荡，故暂时停止了向河南地区的扩张。

升平五年（361 年）二月，燕河内太守吕护降于晋，晋以吕护为冀州刺史。吕护欲联合晋军向燕都邺城进击。燕得知此讯，太宰慕容恪率兵 5 万，冠军将军皇甫真率兵 1 万，征讨吕护。燕军至野王（今河南沁阳），吕护据城坚守。护军将军傅颜建议急攻。慕容恪认为吕护军守备坚固，很难短期攻克，对傅说：“护内无积蓄，外无救援。我深沟高垒，坐而守之，休兵养士，离间其党，于我不劳而贼势日蹙，不过十旬，取之必矣。”于是，构筑长围，围困吕护军。燕国围野王数月，吕护命部将兴出战，被傅颜斩杀，吕护城中更加危急。燕将军皇甫真告诫其部众说，吕护势穷，必然选择弱处突围而走，我必须严加戒备。吕护果然于夜间率精锐士众向皇甫真部突围，燕军有备，未能突破。慕容恪随即挥军急攻野王城，吕护军死伤殆尽，只身逃奔荥阳后，于十月，叛晋降燕。

在燕军围困吕护之际，晋桓温乘机命其弟桓豁率兵攻取

了许昌，击败燕守将慕容尘。晋哀帝隆和元年（362年）二月，燕吕护率军攻击洛阳，河南太守戴施逃奔于宛城（今河南南阳）。晋洛阳守将陈祐告急。五月，桓温命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庾希及竟陵太守邓遐率水军 3000 人，前往增援洛阳。七月，吕护见晋援军将至，收兵退返小平津，吕护身中流矢而亡。十二月庾希、邓遐退回河南。兴宁元年（363年）四月，燕宁东将军慕容忠进攻荥阳太守刘远，刘远兵败，逃奔鲁阳（今河南鲁山）。五月，燕军攻拔密城（今河南密县），刘远逃往江陵。十月，燕镇南将军慕容尘，自许昌出兵攻击陈留太守袁披于长平（今河南西华东北）。此时，晋汝南太守朱斌乘虚攻取了许昌。兴宁二年（364年）二月，燕太傅慕容评、龙骧将军李洪率大军南下，略地河南。四月，李洪攻击许昌、汝南（郡治在今河南汝南），击败晋军，颍川太安李福战死。汝南太守朱斌逃奔寿春（今安徽寿县），陈郡太守朱辅退保彭城。燕军节节取胜，逐一攻取了许昌、汝南、陈郡，随即迁移 1 万户百姓至幽冀二州。晋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桓温，为与前燕争夺河南地区，率水军屯于合肥（今安徽合肥），并派西中郎将袁真率军前往河南，抵抗前燕军的进袭。

兴宁二年八月，燕太宰慕容恪率军欲攻取洛阳，先遣人招降附近吏民，接着命司马悦希进至盟津（今河南孟县南）。豫州刺史孙兴进至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从东、北两面向洛阳进击。此时，晋洛阳守将冠军将军陈祐，兵不过 2000，形势危急，沈充之子沈劭，欲立功洗雪其父逆乱之耻，自行招募壮士千人，被任命为冠军长史，率众前往洛阳增援。沈劭屡次以少数兵力，击破燕军。不久，洛阳粮食将尽，陈祐自度难以长期坚

守，便以援救许昌为名，率军东走，而留下沈劲率 500 人守卫洛阳。沈劲豪爽高兴地认为：“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结果，河南地区诸城，尽为前燕所占，但洛阳孤城仍在沈劲的坚守之下。兴宁三年、前燕建熙六年（365 年）二月，燕太宰慕容恪、吴王慕容垂共攻洛阳，至三月才攻克。扬武将军沈劲被俘，沈劲神态自若。慕容恪有意宽释任用。部将慕容虔劝告说：“劲虽为奇士，观其气度，终不为人用。今赦之，必为后患。”遂杀之。

晋海西公太和元年、前燕建熙七年（366 年）十月，前燕乘晋司马勋叛乱和前秦进击荆州，晋兵力分散之际，命抚军将军下邳王慕容厉进攻兖州。攻战了鲁（郡治在今山东曲阜东北）、高平（郡治在今山东金乡西北）数郡。十二月，晋南阳督护赵亿，举宛城投降前燕，太守桓澹退保新野。太和二年、前燕建熙八年（367 年）四月，前燕慕容尘奔袭竟陵（似在今湖北潜江西北），晋竟陵太守罗崇将燕军击败。五月，晋荆州刺史桓豁、太守罗崇攻克宛城，燕南中郎将赵盘退走鲁阳（今河南鲁山），桓豁率军追击，于雒志将赵盘擒获。

晋与前燕争夺河南地区的结果，前燕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占领了黄淮之间的广大地区，东晋逐渐呈现退保江南的趋势，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前秦、前燕与东晋三足鼎立的局面。

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前燕建熙十年（369 年）三月，大司马桓温等，欲乘前燕太宰慕容恪死去之机，率军北征前燕。当年四月，率其弟南中郎将桓冲、西中郎将袁真共步骑兵 5 万，由姑孰（今安徽当涂）出发，并命袁真先率军攻占谯（今安徽亳州）、梁（今河南商丘西南），然后开通石门（今河南荥阳北）以疏通水路，转运军粮。桓温军于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击败燕

将慕容忠后，于六月进至金乡（今山东金乡北）。这时，天旱水浅，水路不通。桓温便命冠军将军毛虎生，在巨野（今山东巨野东北）开通水路 300 多里，引汶水入清水，再入黄河。桓温军的船只前后相接数百里，参军郗超见此情景，向桓温建议说：“从清水进入大河（黄河），都是逆流，路程曲折遥远，运输艰难。假如敌拒不应战，我运输粮道断绝，取之于敌，又不可能，那样将十分危险。不如率军直趋邺城（今河北临漳西），敌人畏惧将军的威名，必望风而逃，若敌人迎战，则我可立即将敌击败。即使敌人坚守邺城，在此盛夏之际，也难守住。同时，易水以南的百姓，见官军已至，必将悉数来归。”郗超深知桓温持重，不会采纳上述建议。故而又建议说，若不采纳上策，也可屯兵于阿济地区，暂不进兵。先将军资粮食储运充足，待来年夏季进兵也不失为可取之策。桓温均拒绝采纳。

燕主慕容暐知悉晋军前来，便以下邳王慕容厉为征讨大都督，率步骑 2 万，于黄墟（今河南杞县东北）阻击桓温军。厉兵大败，全军被歼，慕容厉单骑逃归，燕高平（郡治在今山东金乡西北）太守徐翻举郡降晋。接着，前锋邓遐、朱序击败燕将傅颜于林渚（今河南新郑北）。燕主又派安乐王慕容臧率军迎击桓温军，又被晋军击败。慕容暐见形势日急，于是派其散骑常侍李凤向前秦求救。

七月，桓温军至武阳（今河南范县东北），前燕原兖州刺史孙元率其族众起兵响应桓温军。晋军进至枋头（今河南淇县东南），慕容暐及太傅慕容评大惧，欲逃奔和龙（今辽宁朝阳）。吴王慕容垂进谏说：“臣请击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燕主慕容暐遂以慕容垂为使持节、南讨大都督，率征南将军范阳王

慕容德等 5 万之众，迎击桓温军。

燕主慕容暐深恐难以抗击晋军，又派其散骑常侍乐嵩出使前秦，以割让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为条件，向秦请求援兵。前秦王苻坚召集群臣相商，众臣皆认为：“昔桓温伐我，至灞上，燕不救我；今温伐燕，我何救焉！”谋臣王猛暗中劝苻坚应出兵相救，苻坚同意王猛的建议，八月，命将军苟池、洛州刺史邓羌率步骑兵 2 万，前往救燕。秦军兵出洛阳，进入颍川（今河南许昌地区），准备与晋军作战。

燕太傅封孚向申胤问道：“晋军兵众强盛，军威严整，本应乘势，直接向我进攻。为何只驻于高岸，不与我交战。从现在的情况看不出有消灭我们的势头，是何道理？”申胤说：“以晋军今日的声势看来，按说可以战胜我军。但是，我认为，桓温必不能成功，原因是晋室衰弱，桓温专治其国，晋朝大臣难与其同心，均不愿让桓温得志，必将设法败坏他的北征行动。同时，桓温秉性骄傲，而又多依赖于人，不善于应付突然事变。其大军深入异国，非但不乘胜直进，反而徘徊观望，妄图坐等我方的变化，不战而胜。如若晋军粮运中断，其势必然衰竭，将不攻而自败。”

桓温军以燕降人段思为向导，前燕尚书郎悉罗腾与晋军交战，活捉了段思。桓温又派前赵原将领李述徇略赵、魏一带地区，悉罗腾又率虎贲中郎将染干津击败了晋军，斩杀了李述，大大挫伤了晋军的锐气。

九月，前燕范阳王慕容德率领骑兵 1 万，兰台侍御史刘当率 5000 骑兵，屯于石门，断桓温军之归路；燕豫州刺史李邽率 5000 骑兵，切断了桓温军的运粮道路。接着，慕容德命将军

慕容宙率 1000 骑兵为前锋，向晋军攻击。慕容宙深知晋军的优长，长于冲锋陷阵，追击时十分勇猛。于是他在率兵与晋军相遇后，便以 200 骑兵向晋军挑战，将其余人马设置 3 处伏兵，佯装败退，引诱晋军追击，晋军果然猛追而中伏，死伤甚重。

桓温军数战不利，粮道断绝，粮食将尽，又听说秦援兵即至，于是，烧毁舟船，丢弃军实辎重，率军自陆路退还，而留毛虎生领东燕（郡治在今河南延津东北）太守，督东燕等四郡诸军事。

桓温率军自东燕南下仓垣（今开封东北），沿途为防止燕军自上流于河水中投毒，均“凿井而饮”，急退 700 余里。燕军将领开始欲争相追击，吴王慕容垂阻止大家说：“不可，温初退惶恐，必严设警备，以精锐为后拒，击之未必得志，不如缓之。”慕容垂遂率 8000 骑兵，随晋军之后慢慢跟进。数天之后，慕容垂判断晋军已疲，于是对诸将说：“温可击矣。”便急率众追之。桓温退至襄邑（今河南睢县），燕将慕容德已先率劲骑 4000，埋伏于襄邑东涧中，待桓温军至，与慕容垂前后夹击晋军，桓温大败，被斩首 3 万级。接着，前秦将领苟池又于谯（今安徽亳州）郡截击桓温败退之众，斩晋军 1 万。晋将孙元占据武阳，阻止燕军，又被燕左卫将军孟高战败生擒。十月，桓温才率残兵败将，退屯山阳（今江苏淮安）。

桓温兵败，迁罪于部将袁真，上表免除袁真官职，贬为平民，接着又免除冠军将军邓遐的官职，袁真心中不服，便上书奏明桓温的罪状。朝廷畏惧桓温的权势，不作裁决。袁真遂占据寿春（今安徽寿县），投降了前燕，随即遣使至燕、秦请求救

兵。燕主任命袁真为使持节、都督淮南诸军事、征南大将军、扬州刺史，封宣城公。

燕吴王慕容垂从襄邑回师邺城，威名大振，燕太傅慕容评更加对他忌恨。慕容垂上表奏请应重赏作战有功将吏，但燕太后也由于对慕容垂的忌恨，不但不奖赏有功之士，反而与慕容评密谋除掉慕容垂，消息走漏，慕容垂被迫投向了前秦。

慕容垂投降后，前燕国势日颓。统治集团日益腐化，太后可足浑氏专横乱政；太傅慕容评贪得无厌；王公贵族普遍藏匿人户，荫户总数比国家户口还多。由于政治黑暗腐败，统治集团内部倾轧日益剧烈，国防疲软、松弛。公元370年前秦乘机灭掉前燕。慕容暐及王公以下并鲜卑4万余户被迁往长安。

六、前秦始末

前秦的兴起

前秦(351—394年)是氐人苻氏建立的政权，故亦称“苻秦”。

氐人在揭开历史序幕的时候，已聚居在今川陕甘三省接壤的地域。氐人自称是槃瓠的后裔。槃瓠是南方一些民族起源神话中的犬名。氐人可能也是以犬为图腾，同南方某些少数民族有着近亲血缘关系，本非胡人。但在民族间长期的文化交流中，氐人已同当地的羌人、巴人等无多大区别，故而晋时已被目为五胡之一。

秦王苻坚(338—385年)，是氐人，他却没有石虎、冉闵等

人那种狭隘的民族观念。他有经国大志，欲建立一个爱护百姓、团结各民族、天下一家的国家。他重用鲜卑、羌、羯以及匈奴各民族的领袖人物，也器重汉族的将领与政治家。他特别重视汉族政治家王猛，曾这样说：“我得到王猛，如同刘备得到了诸葛亮。”

王猛(325—375年)，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昌乐西)人，家境贫寒，曾以贩卖土筐为业。他贫而好学，通今博古，尤嗜兵书，具有政治家与军事家的才能。东晋军队北伐到关中时，王猛曾拜访过晋军统帅，他一边摸着虱子，一边同晋军统帅谈论天下大事，旁若无人，侃侃而谈。晋军统帅请他到东晋做官，他没有去。不久，他就成为苻坚的谋主。

王猛辅政，一开始就针对时弊，采取了抑制氏族豪强，缓和民族关系的政策。氐人的贵族国戚，横行不法，从来没有人敢去过问。王猛当政后，在几十天内，就杀了20多个，并陈尸于市。这一下，“朝廷震栗，奸猾屏气”。秦王苻坚也赞许说：“我今天才知道，国家有了法制，天子才有尊严！”王猛接着又整顿朝政，改革军队，提倡教化，兴修水利，劝课农桑……。经过治理，前秦国富兵强，百姓丰乐，社会安定。那时，自长安到各州的大路两旁，都种着一行行的杨树、柳树和槐树，枝叶繁茂，每20里有一茶店，每40里设一驿站，旅行者沿路可以取得供给，贸易车辆安然往来。

秦王苻坚的天下一家的政治思想与王猛的才干，共同赢得了前秦的强大和北中国的统一。前秦的版图，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包襄阳，北尽大漠。当其时，东北的肃慎与新罗，西方的于阗、大宛和康居、天竺等62国，都派遣使臣贡献万物，

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这时，只有东晋王朝同它南北对峙。

东晋襄阳抗战

当前秦已经成为长江以北唯一强大军事力量的时候，东晋的北方就越来越吃紧了。从长江中游到淮水一带的襄阳、寿阳和淮阴等城，都成了东晋的边防要地。可是东晋统治阶级过着苟安腐朽的剥削寄生生活，丝毫不把这种紧张局势放在心上。到了后来，战争爆发的可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当时执掌东晋大权的谢氏家族，看到苻坚快下手了，就在军事上做了一些准备。谢安在公元 377 年（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年）任命将军朱序做梁州刺史，守卫襄阳，还派了自己的侄儿谢玄坐镇广陵（今江苏扬州），负责江北的军事。谢玄为预防苻坚向南侵犯，就在当地招募南逃的北方农民及其子弟，充实队伍。有个名叫刘牢之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祖辈都是有名的勇将，也去应募。谢玄看到他很勇猛，又会打仗，就叫他担任参军的职务，率领一支最精壮的士兵做整个军队的前锋。后来，谢玄兼任了徐州刺史，坐镇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因为京口在京都建康的北面，所以当时把京口称为北府，把谢玄这支军队称作“北府兵”。

公元 378 年的春天，苻坚派遣他的儿子苻丕做统帅，领了 7 万军队，从正面向东晋的重镇襄阳发动了进攻，另外还派遣 10 万兵马，分做三路从侧面配合苻丕进攻。前秦对东晋的大规模的战争序幕就揭开了。

这年 4 月，前秦的兵马到了汉水的北面。镇守襄阳的朱

序,从城楼上望见秦军的旗号,知道是秦将石越率领的骑兵。朱序心里想:汉水民船已经全都靠到南岸来了,他们找不到渡江的船只,又怎么能渡过汉水呢?所以他毫不在乎,没有积极设防。

当秦兵到达汉水北岸的消息刚刚传到襄阳的时候,朱序的母亲韩氏就非常警惕。韩氏早年曾经跟随朱序的父亲朱熹打过仗,也懂得一些军事上的知识,她担心秦兵早晚会渡过汉水来攻城的,于是亲自去巡视襄阳城的防守工作。韩氏看到面临汉水的中城的西北角城墙很不坚固,容易倒塌,就带领家里的许多女仆和城里的壮年妇女准备在这里修筑一道新的城墙。襄阳城里的妇女们看到刺史的母亲年龄很大,还这样不辞劳苦地关心城里的安全,都很感动,于是她们也都参加了筑城墙的工作。因为大家齐心努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修筑起了城西北角的一条 20 多丈长的新城墙。

当时,汉水北面的秦将石越,接到统帅苻丕的命令,要他强渡汉水。石越不敢怠慢,赶紧预备了轻便的竹筏,命令部下的 5000 个骑兵,一齐乘筏渡江。襄阳城上的守军看到秦兵行动了,慌忙去报告朱序。朱序接到报告,方才大惊失色,要在城外布防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把守城的将士全部撤到中城里去,把城门紧紧地关闭起来。

强渡汉水的石越带了 5000 骑兵,很快地渡到了南岸。石越到了襄阳城外,下了攻城的命令,5000 个骑兵便汹汹地开始冲杀,很快就占领了襄阳城的外郭。这时晋军停在汉水南岸的 100 多只渡船,也全被石越的骑兵缴获了。他们强迫船夫驶往北岸,又把其他的秦兵全部渡过江来。秦兵的主帅苻丕来到

了襄阳城下，亲自指挥士兵打仗。秦兵昼夜不停地攻打襄阳的中城，困守在襄阳中城的朱序和全城的将士，依靠城内老百姓的支援，展开了激烈的守城战。因为受到秦兵的猛烈冲击，中城的西北角果然倒塌了，幸亏城里面还有那道新筑的城墙，这才挡住了秦兵的攻势。襄阳城的老百姓对于韩氏的预见非常佩服，于是大家就把这道新城墙起名叫做“夫人城”。

襄阳的攻守战是很激烈的。当时东晋的大将桓冲，率领了7万军队驻守在襄阳以南的上明（今湖北松滋县西），但他非常害怕秦兵的声势，不敢去援救襄阳。这就使得苻丕有了更多的时间调兵遣将，把襄阳城一重又一重地围困起来，并堵住了晋军的粮道，以孤立襄阳。

襄阳城的广大军民坚决抵抗前秦，连城里的妇女也上城防守，英勇地参加了战斗。从这年春天一直到年底，苻丕始终没有办法攻下这座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孤城。于是苻坚发了火，他派人送给儿子苻丕一把宝剑，限令苻丕在来年春天攻下襄阳，要是攻不下，就用这把剑自杀。苻丕害怕了，命令部下的10余万军队加紧猛攻襄阳城，可是每次都遭到襄阳军民的英勇反击，被迫退到离襄阳城较远的地方扎下营寨，策划下一步的进攻。

秦兵退了，可是朱序却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积极加强城里的守卫工作，反而放松了戒备。到了第二年的二月，朱序手下的督护李伯护暗地派自己的儿子偷出城去，跑到秦营去告密，向苻丕说：襄阳的城防已经松懈了，如果秦兵前来攻城，愿意做苻丕的内应。苻丕和李伯护这个奸细还约好攻城的日期。因为李伯护的出卖。固守了一年的襄阳城终于失

陷了。朱序在城陷以后，被苻丕捉住，解送到长安，他的意志不坚定，受不了敌人的威胁利诱，终于投降了前秦，做了前秦的“度支尚书”（管理财政的最高长官）。那个出卖襄阳城的坏蛋李伯护，自以为可以得到苻坚的重用，结果反而被苻坚杀了。

襄阳失陷以后，东晋的防线便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形势十分紧张，秦兵凶焰格外高涨了。他们加紧攻打襄阳西面的魏兴（今陕西安康县北），晋朝的守将吉挹也奋勇苦战。公元379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4月，魏兴失守，吉挹想自杀，却被部下劝住了。同时，秦兵又对东晋的东方防线发动进攻，相继攻下彭城、淮阴、盱眙，还围攻三阿（今江苏高邮县西北）。秦兵的先锋部队距离广陵只有百把里的路程，从广陵到东晋王朝的京城建康也不远了，东晋朝廷惊慌不安，急忙在长江一带布防。东晋的大将谢玄从广陵赶到三阿，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才把秦兵的攻势打退，解除了三阿的围困。接着，谢玄向北推进，收复了盱眙、淮阴，迫使秦兵不得不狼狈地败退到淮水以北。

前秦的进犯，暂时被打退了。

苻坚大举进攻东晋

苻坚听到了失败的消息，就用惩罚部下的办法来泄愤。有的大将很怕苻坚，就自杀了；有的虽然保全了性命，可是也被苻坚剥夺了官爵和职位。苻坚为了满足他个人掠夺财富的私欲，一心想吞并东晋。可是东晋王朝却以为危机已经过去了。根本不想积极设防，也不想乘机反攻，收复失地。

公元382年的4月，苻坚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积极

地进行战争的准备，他任命弟弟苻融做“征南大将军”。八月里，他又任命裴元略做巴西（今四川绵阳县一带）、梓潼二郡的太守，秘密命令他在长江上游训练水军，准备从四川沿着长江顺流东下，向东晋发动更大的进攻。

10月，苻坚在大举进兵的前夕，在长安的太极殿召开了包括文武官员参加的御前会议，会议内容是商量进攻东晋的大计。苻坚首先向官员们提出问题说：“我继承王位已经20多年了，四面八方大体上也已经平定，只有东南的晋朝还不投降。现在我有九十七万军队，很想亲自去攻打晋朝，你们的意见怎样？”文武官员听苻坚说要起兵攻打晋朝，都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觉得攻打晋朝没有什么把握。“左仆射”权翼首先说：“晋朝虽然偏安在江南，可是内部还没有涣散，何况还有谢安、桓冲这些杰出的人才，最好还是以后再说。”石越也说：“东晋据有长江天险，看来是不可以进攻的。”苻坚见权翼和石越都反对自己用兵，心里很不高兴，同时还认为自己军队强大，于是骄傲地说：“我带领的军队这么多，只要把马鞭丢在长江里，就可以把长江的江流堵断。长江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会开了很久，也没有能够作出决定。苻坚很生气，叫官员们先回去，却把苻融一个人留了下来，对他说：“自古以来国家的大计都是由一两个人来决定的，现在你给我出出主意吧。”苻融主张不要攻晋，认为晋朝内部还算稳定，没有可乘的机会，又认为秦兵连年打仗，士兵过于疲乏，都在埋怨，还是不出兵好。苻坚听了更气，说：“连你也这样说，叫我还和谁商量？”苻融急得哭起来，再三劝苻坚不要用兵，苻坚却一句也听不进去，终于轻率地决定进攻东晋。

公元 383 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7 月,苻坚颁布了进攻东晋的动员令,规定:老百姓每 10 个人当中要抽出一个人去当兵;凡是贵族地主家里的子弟,年龄在 20 岁以下,有武艺的都给他们羽林郎(禁卫军的军官)的官号,编进禁卫部队随军作战;各州的公私马匹一律征调做军马。前秦各个地方官吏接到这个命令,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到处拉伕抽丁,乘机向老百姓勒索财物,弄得老百姓叫苦连天。苻坚在征兵的同时,还大模大样地下了一道诏书,说什么灭晋以后,要委派东晋皇帝做“尚书左仆射”,晋朝的宰相谢安做“吏部尚书”,晋朝的车骑将军桓冲做“侍中”。他还说这次出兵一定是马到成功,现在先在长安给他们准备下住宅,以便他们来了时居住。苻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软化东晋的统治集团,瓦解东晋的军心。同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苻坚是多么骄傲。

这年 8 月,苻坚征集的各州兵马,共计有步兵 60 多万,骑兵 27 万,羽林郎 3 万。苻坚派苻融和鲜卑贵族慕容垂带领步骑 25 万做先锋,浩浩荡荡地从长安向东进发。同时,他委任一个羌族的将军姚萇当“龙骧将军”,督理益州和梁州的军务,并对姚萇说:“我登位时的身份就是龙骧将军,这些年来不肯随随便便把这个职位授给什么人,现在你可要格外出力才对。”苻坚的大军,一路人喊马嘶,声势相当浩大。9 月,苻坚到了项城(今河南项城)。这时苻融的先锋部队也已经到了颍口(今安徽颍上县东南的正阳镇),并且向东晋在淝水(淮水的支流,在今安徽寿县境内)西岸的重镇寿阳(今安徽寿县)展开了进攻。

洛涧战役

苻坚大举进攻的消息传到建康，东晋的孝武帝和满朝的文武官员都慌作一团，紧急的边报也接连不断，弄得人心惶惶。在这存亡的紧急关头，和战已经成为东晋王朝面临的首要问题。人民坚决要求抗战，保卫乡土，阶级矛盾暂时缓和下来，广大军民投入了抗秦的斗争；东晋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己偏安在江南的地主政权和利益，也感到非起来抗战不可。在宰相谢安的决定下，东晋政府选择了抗战的道路。

孝武帝任命谢安做“征讨大都督”，统筹全局，布置防务，谢安认为淮河一线是苻坚进攻的主要方面，其他各线只具有配合和牵制的作用，首先必须派大军抵挡淮河一线敌人的进攻。于是他推派自己的弟弟“尚书仆射”谢石代理征讨大都督的职务，指挥全部军队，同时选派优秀的将领谢玄做“前锋都督”，谢安的儿子谢琰和桓伊等统率 8 万精兵去迎击苻坚。另外谢安又派了将军胡彬，率领了 5000 水军去增援寿阳。

当时被苻坚入侵的消息吓得惶惶不安的东晋大小官员，看到宰相谢安的态度仍旧和平常一样沉着冷静，才又定下心来。

苻坚依仗自己的兵力占着很大的优势，在战略上，采取了全线进攻。10 月，胡彬的水军还没有到达寿阳，苻融就把防御力量比较薄弱的寿阳攻破了。胡彬在途中听到这个消息，便不敢前进，只得把水军结集在硖石（今安徽凤台县西南），控制了这个险要的地方，专等谢石的大军到来。苻融占领了寿阳以后，一面派兵渡过淝水，围攻硖石，一面派了“卫军将军”梁成

领了 5 万军队，控制了洛涧（即洛水注入淮水的地方，在今安徽安远县西）。梁成封锁了淮水，阻止从东面来援救的谢石、谢玄的军队。谢石只得在距离洛涧 25 里的地方，把 8 万军队驻扎下来。

谢石的大军不能前进，被围困在硖石的胡彬的水军就孤立了，眼看军粮就要吃光，情形十分危急。胡彬为了迷惑敌人，便命令士兵们天天在河岸上扬簸沙土，好像在扬米一样，故意给秦兵看见，表示自己的军粮还很充足；同时他又给谢石写了一封要求援助解围的告急信，说现在敌军势力太大，我这里的军粮已经吃完，情况十分紧急，恐怕再不能和大军见面了。他把密信交给一个亲兵，叫他乘夜突出重围去送给谢石。不幸这个亲兵在途中被苻融的士兵捉住，告急的密信也给搜去了。苻融得到胡彬缺粮的情报，连夜派人到项城去报告苻坚，说：“现在晋军人少粮尽，很容易杀败他们，应该马上向他们发动进攻，不能让他们跑掉。”

骄傲自大的苻坚得到苻融的密报，非常高兴，决定让大部队留在项城，只带领 8000 个轻骑兵不分昼夜地赶往寿阳，想出其不意地捉住谢石，认为这样就可以一下子灭亡东晋了。他临离开项城以前，还恐吓项城的将士们说：“谁敢泄漏了消息，我就要把他的舌头割掉！”

苻坚赶到了寿阳，和苻融商量，准备先派一个使者到谢石那里去诱降，尽快地瓦解晋军。于是他们要朱序到谢石那里去宣扬秦兵的强大，劝告谢石快些投降。朱序从前在襄阳失守以后，虽然投降了苻坚，总算还没有忘掉晋朝，他这次跟随苻坚出征，回想起以前被俘投降的事，非常羞恨，想找个立功补过

的机会。朱序心里做了打算，就接受了劝降的任务。他到了晋营，密告谢石说：“苻坚发动全国兵力，一共有 90 多万，如果这些军队一齐到来，的确很难对付。但是在秦兵的前锋部队正在途中，凉州的兵也刚赶到咸阳，而且苻坚把大部兵力屯在项城，只带了 8000 个轻骑兵秘密来到寿阳，因此，秦兵在前线的兵力并不怎么雄厚。你只要派一支精兵打败秦兵的前锋，挫折他的锐气，秦兵就会全线崩溃了。”朱序没有在晋营停留多久，就回寿阳去了。

谢石、谢玄、谢琰共同研究了朱序的密报。谢石因为听说苻坚在寿阳，有些害怕，还想采取守势，不想速战。可是谢琰却主张马上出兵，他说：“朱序说的很对，我们应该乘苻坚的兵力还没有全部集中的时候，用少数兵力打败他们。只要先消灭挡住我们进路的梁成的秦兵，我们的军队就可以前进，胡彬的围就可以解了，这才是个好办法。”谢玄也很赞成这个主张，决定派部下的勇将刘牢之率领 5000 北府兵去袭击驻扎在洛涧的秦将梁成的军队，扫除晋军前进的障碍。

刘牢之领着 5000 个摩拳擦掌的北府兵，向洛涧出发。为了保卫自己的乡土，北府兵情绪高涨。他们来到了离洛水还有 10 里的地方，就看到洛水的对岸扎满了梁成的水营。刘牢之就决定向梁成进行夜袭，当天晚上，他下了进攻的命令，北府兵很快就渡过了不宽的洛水。5000 个北府兵像猛虎下山一样，勇猛地冲破了秦兵的沿岸阵地，杀进了敌营。梁成从睡梦中惊醒，吓得呆了，在黑夜里仓皇披挂上马，吩咐部下迎战。可是秦兵被这次突然的袭击弄得措手不及，被北府兵杀得人仰马翻。刘牢之和他的参军刘袭、诸葛求奋力冲杀，梁成和前秦

的弋阳(今河南潢川县一带)太守王咏都在混战中被晋军斩杀。秦兵失去了主将,更加乱成一团,纷纷向四面八方溃逃。刘牢之为了围歼敌军,马上分兵截断秦兵的退路。秦兵在黑夜里被追得走投无路,抢着跳进淮水里逃命,许多人都淹死了。刘牢之的北府兵收复了洛涧,解除了淮河的封锁线,还缴获了许多军械。

谢石、谢玄听到刘牢之打了胜仗的消息,立刻指挥各路军队,一口气冲到淝水的东岸,和对岸苻坚的秦兵对峙起来。晋军在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士气也更加高涨了。

淝水之战

公元383年,前秦在洛涧战役中惨败。谢石、谢玄乘胜进军,同秦军夹淝水而阵。苻坚和苻融登上寿阳城头观察阵势,望见东晋的军队部伍严整,又远远望见八公山下的草木摇动,也以为是晋兵。苻坚对苻融说:“此亦劲敌,何谓弱也!”说时不觉脸上流露出了畏惧的神色。

谢玄为了迅速与秦军决战,派使者去对苻融说,双方隔着淝水不便作战,请秦军稍往后撤,以便晋兵渡河同秦军决一胜负。苻坚、苻融企图乘晋军渡过一半的时候,用铁骑猛冲的战术,歼灭晋军。于是,就下令秦军后撤。可是,秦军士卒不明白往后撤退的意图,以为秦军败了。朱序又乘机在军中大呼:“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全军顿时大乱,一退就再也停止不住。晋兵趁势渡水进攻。秦军主将苻融亲自出马想阻止后退的秦兵,结果,马被挤倒,苻融为晋兵所杀。

于是秦兵大败,拚命逃窜,连听见风声鹤唳都以为是晋兵

追来了，昼夜不敢停息，因为饥饿寒冷和互相践踏而死的十之七八。苻坚也被流矢射中，只得带领 10 余万残兵败将逃回长安。

淝水之战时，东晋的主帅谢安为安定人心，故意对外表示镇定，与客人在山墅对棋。当战胜秦军的捷报送来时，他看了看，随即放在桌上，继续下棋。客人沉不住气，问他战况如何？他故意轻描淡写地说：“小孩子们已经把敌兵破了。”可是，当谢安走入内室时，鞋子下面的木齿都被门槛折断，激动、兴奋的心情再也按捺不住了。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秦晋淝水之战。战争的结果，取得胜利的并非貌似强大的前秦，而是力量比较弱小的东晋。晋军的获胜并不偶然。由于它得到人民的支持，上下齐心，加上指挥上的正确，抓住了秦军的弱点和有利战机，终于转危为安，保住了东晋的半壁天下。

公元 385 年，羌族将领姚萇杀死苻坚，占据长安，自称秦帝，建立后秦。同时，其他少数民族贵族也纷纷独立，建立割据政权。北方又重新陷入分裂混战的局面。

七、后燕的兴亡

后燕参合陂之战

晋太元九年、前秦建元二十年（384 年）正月。前秦冠军将军慕容垂，在淝水之战后叛离前秦，经过近 2 年的作战，击败了前秦在燕地的势力，建立了燕国，史称后燕。

慕容垂恢复了前燕的疆域之后,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年)正月,登上帝位,又不断向北和西方扩展,有时还与魏联合作战,使后燕除了魏国之外,成为黄河以北及当时中国东北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刘显占据今山西一带地区,势力强大,称雄于北方,但其内部不和,魏王拓跋珪想趁机联合燕军击灭他。晋太元十二年、后燕建兴二年(387年)七月,匈奴刘卫辰献马给后燕,中途被刘显劫走。慕容垂怒,派太原王慕容楷率兵,与赵王慕容麟共攻刘显。刘显惨败。慕容垂封刘显之弟可泥为乌桓王,安抚其部众,并迁移8000个部落到中山。

晋太元十四年、后燕建兴四年(389年)五月,燕命范阳王慕容德、赵王慕容麟率军攻击贺讷。贺讷败逃勿根山,燕军追至,投降于燕。

晋太元十八年、后燕建兴八年(393年)十一月,后燕开始了灭亡西燕的战争,至建兴九年(394年)八月,灭亡了西燕。十月,后燕主慕容垂向东巡守阳平、平原,命辽西王慕容农渡河,与安南将军尹国向青、兖二州扩展势力。慕容农攻占了廩丘(今山东郓城西北),尹国攻占了阳城(今山东茌平南),晋东平太守韦荀战死。于是高平、秦山、琅邪各郡守将均弃城而逃。后燕军进占了青州、兖州大片地区,兵临东海。至此,后燕已恢复了前燕的绝大部分疆域,进入它的极盛阶段。

后燕自建国以来,势力逐渐强大,连续击降了周围一些割据势力。当时北魏势力虽然也日益强盛,但相比之下,尚较燕为弱。东晋太元十三年(388年)八月,魏王拓跋珪派九原公拓跋仪出使后燕。慕容垂见拓跋珪未亲自前来,便责问使者为何

魏王不亲自来。拓跋珪回答说，我们先王和燕一起尊奉晋朝，世代犹如兄弟，我奉命前来，并无失礼之处。慕容垂傲慢地说：“吾今威加四海，岂得以昔日为比？”拓跋珪毫不示弱地说：“燕如果失去理智，欲诉诸武力，这是军事将帅的事，不是我出使的使命。”魏本来也有图谋燕国之心，拓跋珪出使燕国，名为朝拜，实则也是刺探和察看燕国的虚实。因而拓跋珪返回后便对拓跋珪说：“燕主慕容垂已衰老，太子暗弱，范阳王慕容德自负勇略超人，将来必不安于做太子的臣下。一旦慕容垂死去，内乱必起，到那时才可以吞灭燕国，现在则不可与燕较量。”此后，魏多次与燕联合作战，燕也因此而把魏看做是依附于自己的力量。

晋太元十六年、后燕建兴六年（391年）六月，燕国赵王慕容麟击败贺讷、贺染干后，慕容麟燕王慕容垂建议说：“臣观察拓跋珪的情况，终究会成为国家的大患，不如及早将其召入朝中为官，让拓跋珪之弟掌理魏国。”慕容垂未采纳这一建议。七月，魏主又命其弟觚贡献于燕王。此时，燕主便留下觚为人质，让魏贡献良马，拓跋珪拒绝，燕魏于是绝交，魏随即遣长史张充通好于西燕。至晋太元十八年后燕击灭西燕之战时，西燕兵败，遣使向魏求援，拓跋珪命部将拓跋虔、庾岳率骑兵5万相救。但魏军尚未赶至战场，西燕便已被后燕灭亡。

晋太元二十年、后燕建兴十年（395年）四月，魏叛离后燕，派兵夺占归附于燕的塞外诸部族。燕主震怒，决心出兵击魏。此时散骑常侍高湖劝阻燕王说：“燕魏世代联姻，结好多年，最近，我们向魏索求良马，扣留拓跋珪之弟，是我们失礼，不应先出兵进攻他们。而且，拓跋珪沉着勇敢，谋略超人，兵强

马壮，很难轻易将其击败。再说，我皇太子正当年少气盛之际，现在让他领兵出征，一定会轻视魏军。若万一战败，损伤我国威，败坏我大业，后果将不可设想，望陛下深思。”高湖言词激烈，慕容垂甚为生气，将高湖免官。

晋太元二十年、后燕建兴十年、北魏登国十年（395）六月二十六日，燕主慕容垂命太子慕容宝、辽西王慕容农、赵王慕容麟率军 8 万，从五原出发攻魏；以范阳王慕容德、陈留王慕容绍率步骑 1.8 万人为后援。

七月，魏长史张兗得知后燕军将至，便向拓跋珪建议说：“燕王满足于滑台和长子击灭西燕的胜利，倾全国的军力物力向我进攻，必然有轻视我们的心理，应示弱于敌，使其进一步骄傲，才易于将其击败。”拓跋珪按照张兗之谋，将其部落和畜户全部迁至黄河以西 1000 多里，以避燕军之锋锐。后燕军至五原，收降魏别部 3 万余家，进至黄河岸边，造船具准备渡河。拓跋珪见后燕军至，立即派右司马许谦向后秦请求援军。九月，北魏主拓跋珪也率军推进至黄河南岸。后燕将要渡河之前，暴风突起，将渡船数十只漂向南岸，北魏军俘获燕甲士 300 多人，随即释放他们回归。燕军见无法渡河，便与北魏军隔河相持。

当初，燕军自中山发兵之前，燕主慕容垂便已患病，燕军进至五原后，燕派出的使者，途中均为拓跋珪布置的游骑所截获，使慕容宝等数月不知燕王的病势情况。拓跋珪此时将其俘获的燕使者带至河边，隔河告诉慕容宝说：“若父已死，何不早归！”慕容玉等听说，心中忧恐，军心骇动。与此同时，拓跋珪命拓跋虔率 5 万骑兵屯于河东，拓跋仪率 10 万骑兵屯于河

北，拓跋遵率 7 万骑兵布置于后燕军之南，后秦王姚兴也命将军杨佛嵩率兵救魏。

后燕与北魏军相持数十日后，赵王慕容麟部将慕舆嵩等均相信燕主慕容垂已死，遂阴谋作乱，准备立赵王为燕主，事机泄露，慕舆嵩等被处死。于是，赵王慕容麟与太子慕容宝之间互相怀疑，军心更加动乱。慕容宝见此，便于十月二十五日烧毁船只，乘夜退走。当时，河水尚结冻，慕容宝以为魏军必难渡河，便未设后防，十一月初三，暴风严寒，河水封冻，北魏王拓跋珪随即引军过河，留下辎重，率精锐骑兵 2 万，昼夜兼行，急追燕军。

燕军行至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东北之岱海），突起大风，“黑气如堤，自军后来”，覆盖了燕军的上空。随军的和尚支昙猛向慕容宝建议说：“风气暴迅，魏兵将至之候，宜遣兵御之。”慕容宝不以为然，支昙猛坚持劝谏，慕容麟怒斥支昙猛说：“以太子的神武，大军之盛众，足以横行沙漠，胡虏怎敢来送死！你妄言惊扰军心，就当斩首示众！”支昙猛则以苻坚以百万之师，败于淮南的往事，继续劝谏，慕容宝遂以慕容麟率骑兵 3 万，行于全军之后，以防不测。当月初九的黄昏，北魏军至参合陂西，后燕军于陂东，扎营于蟠山南水边。北魏军士皆衔枚，束住马口，乘夜暗向燕军接近。次日黎明，北魏军突然从山上向下冲击燕军营垒，燕军当时正欲东走，突遭北魏军的进攻，部众大乱。拓跋珪纵兵猛击，燕军溺死和互相践踏而死者数以万计。四五万燕兵放下武器，投降了北魏军。太子慕容宝等单骑逃走。北魏军杀燕右仆射陈留王慕容绍，俘慕容倭奴，慕容道成、尹国等文武将吏数千人，兵甲粮食以巨万计。拓跋珪下令

将降卒全部坑杀。参合陂燕军的惨败，大伤了后燕军元气。

十二月，燕太子慕容宝不甘于参合陂的失败，向燕主慕容垂请求再次出兵攻魏。司徒慕容德也向慕容垂建议说：“胡虏因参合陂的胜利，必产生轻视太子的心理，应以陛下的神勇谋略，征服魏国，不然后患无穷。”慕容垂采纳这一建议，准备向魏反攻。

晋太元二十一年、后燕慕容垂末年（396年）正月，燕主慕容垂命征东将军平规率军2万从冀州出发，但平规却借机起兵叛燕，慕容垂亲自率军击败平规，便于当年三月暗中率军出征。燕军经青岭（今河北易县西）、天门（今河北涞源南），凿山开道，以出魏国不意，直指云中郡。此时，魏国陈留公拓跋虔率3万多户镇守平城（今山西大同东）。慕容垂军至猎岭（今山西南句注山的北麓），命慕容农、慕容隆为前锋，率军突击平城。这时的后燕军，因参合陂的惨败，皆畏惧魏军，只有龙城兵勇猛善战。拓跋虔由于平时向来不加戒备，于三月十二日，燕军兵临平城之下，拓跋虔才发觉，率后出战，被燕军击败斩杀，燕军尽俘其部众。北魏主拓跋珪以拓跋虔兵败，十分震怒，欲率部退走。各部落得知拓跋虔死，也皆存二心，拓跋珪不知所措。

此时，慕容垂率军过参合陂，见尸骨如山，便为之祭奠。“军士皆恸哭，声震山谷。”慕容垂惭愧不已，发病而呕血，暂停前进。太子慕容宝等听说慕容垂病重，皆率军由云中郡引军折回。慕容垂在平城休养10日，病情转好，修筑燕昌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后，率军向中山退走。魏主珪本欲追击燕军，但听说平城已全部为燕军占领，遂率军退走阴山。夏四月，慕容垂

死于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

中山决战

后燕主病亡后,太子慕容宝继位,非但没有慕容垂的智勇谋略,且又荒怠而不孚众望,燕朝野上下离心倾向日益高涨。北魏王拓跋珪乘此时机,决计发全国之军,进击后燕国都中山,欲一举灭亡后燕。

晋太元二十一年、北魏登国十一年、后燕永康元年(396年)六月,北魏主为向后燕都中山(今河北定州)进击,首先命将军王建等率军进攻后燕广宁(今河北涿鹿)太守刘亢泥。首战告捷,斩刘亢泥,将其部众迁往平城(今山西大同)。燕上谷(今北京西北)太守开封公慕容详弃郡城逃走。

此时,拓跋珪登上皇帝位,改元皇始。接着接受参军事张恂的建议,亲率大军出征。八月二十八日,北魏40万大军,南出马邑(今山西朔县),越过句注山(今山西代县西北),旌旗2000里,军容异常盛大。拓跋珪命左将军李栗率骑兵5万为前锋,另派将军封真率军从东道出军都(今北京昌平西北),进击后燕之幽州(今河北涿州)。九月十八日,南下的魏军进至阳曲(今山西阳曲西南),迅速逼近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城下。拓跋珪命令骑兵部队绕城鼓噪而去,以示威于后燕军。燕辽西王慕容农率兵出战,大败而归。慕容农的司马慕容舆嵩关闭城门,拒绝慕容农入城,慕容农无奈只得率数千骑东走。此时,北魏中领军将军公孙肥率军追击,追至潞川(今浊漳河),俘慕容农妻子,全歼其数千骑兵。慕容农带伤率3个骑兵逃归中山。北魏军于是占领晋阳。九月十九日,拓跋珪乘胜派辅国将军

奚牧向汾川一带地区进击，俘后燕丹阳王慕容买德及离石护军高秀和，遂以张恂为诸郡太守，招抚并州地区。随后，拓跋珪即率军东向，直趋北燕都城中山。

燕主慕容宝闻北魏大军将至，召集众臣商议破敌之策，后燕主采纳慕容麟之策，修固中山城防，屯积粮食，准备持久作战。同时，派辽西王慕容农率军屯于安喜（今河北定州西），以为京都中山之警戒。十月，拓跋珪命冠军将军于栗磾、宁朔将军公孙兰率骑兵 2 万，暗中从晋阳开辟当年韩信破赵的通路（即晋阳至井陘）。随之，拓跋珪沿通路出井陘，直趋中山。拓跋珪出井陘后，首先率兵攻克了中山南面的屏障常山（今河北石家庄北），俘燕太守苟延。常山以东的守宰或走或降，大部分郡县均降附于魏军，只剩下中山、邺城（今河北临漳西）、信都（今河北冀县）3 城为燕所有。十一月，魏军兵分 3 路进攻上述 3 城：以东平公拓跋仪率骑兵 5 万进攻邺城；以冠军将军王建、左将军李栗进攻信都；拓跋珪自率主力进击中山。十一月二十日，拓跋珪进至中山城下，开始围攻。燕高阳王慕容隆防守中山城南面，率部力战，自黎明战至午后，斩敌数千人，魏军被迫撤退。魏主拓跋珪见此，对其诸将说：“中山城固，宝必不肯出战，急攻则伤士，外围则费粮，不如先取邺、信都，然后图之。”

与此同时，后燕章武王慕容宙与镇北将军阳城王慕容兰镇守于蓟城（今北京南）。魏别将石河头率军进攻，未曾攻克，魏军退屯渔阳（今北京东北）。

晋太元二十一年（396 年）十一月，北魏东平公的拓跋仪率军进抵邺城。范阳王慕容德即命南安王慕容青等率军夜袭

魏军营，将魏军击破，魏军退屯新城（在邺城附近）。十二月，魏主命辽西公贺赖卢率骑兵 2 万，支援拓跋珪进攻邺城。晋安帝隆发元年、北魏皇始二年、后燕永康二年（397 年）正月，后燕邺城守将范阳王慕容德求救于后秦，后秦不救，邺城更加惊慌。此时，贺赖卢自以为是拓跋珪的舅父，不受拓跋珪的节制，引起二人和，拓跋珪的司马丁建乘机与慕容军暗通消息，以箭射书入城。恰巧贺赖卢营中起火，丁建便对拓跋珪说：“贺赖卢烧营叛变。”拓跋珪信以为真，遂引兵退走，贺赖卢听说拓跋珪军退，也率军撤离。丁建则率其部众投降燕军。丁建降燕后即对慕容德说，拓跋珪军已疲惫，可以击破。于是，慕容德命桂阳王慕容镇、南安王慕容青率骑兵 7000 追击魏军，魏军大败。

魏别部大人没根常常因骁勇引起拓跋珪的忌恶，没根怕诛杀，故当拓跋珪派贺赖卢率援兵赴邺后，没根便乘机率数十个骑兵降燕。燕王命其为镇东大将军，封雁门公。没根请求率兵袭击魏军，慕容宝只给百余骑兵，没根仿效魏军的旗号，乘夜进入魏营，进至中军营帐，拓跋珪才发觉，狼狈而逃。没根人少，难以击溃魏大军，斩杀魏军多人而还。

奉命进击信都（今河北冀县）的魏冠军将军王建部，苦战两月，至隆安元年正月尚未攻克，士卒伤亡惨重。正月二十二日，拓跋珪自率大军攻信都，燕宜都王慕容凤弃城逃回中山，信都为魏军所占。

晋隆安元年（397 年）二月初，拓跋珪还至相城。没根侄子丑提为并州监军，得知其叔父降燕，怕被牵连诛斩，也率其部叛魏。拓跋珪怕国内乱起，欲引军退走，遂派其相国涉延向燕

求和，并愿意以其弟为人质。但燕主慕容宝得知魏内乱将起，拒绝与魏媾和，并派冗从仆射兰真责备拓跋珪忘恩负义。随即调步兵 12 万、骑兵 3.7 万人屯于曲阳柏肆（今河北藁城北）滹沱河北岸，以与魏军决战。二月初九，魏王拓跋珪率军至滹沱河南岸扎营。慕容宝乘夜，以敢死之士 1 万多人暗中渡河，突击魏营。慕容宝自率大军列阵于魏营之北，以便接应支援。燕军乘风纵火，急袭魏军。魏军大乱，拓跋珪弃营赤足而逃。燕将军乞特真率百余人冲入拓跋珪帐中，得拓跋珪衣靴。不料，燕军无故自惊，互相攻杀。拓跋珪于营外见此情况，立即收拢部众，多布火炬于营外，纵骑突击。燕敢死部队大败，退回慕容宝阵内，慕容宝率军退回水北。第 2 天拓跋珪率军列阵，与燕军相持。燕军士气不振，慕容宝引军向中山退走。魏兵尾随而击，燕兵屡败。慕容宝惊恐，丢弃大军，率骑兵 2 万急速逃回中山。当时风雪弥漫，“冻死者相枕”。燕军为逃命下令丢弃袍仗急退。燕朝臣将吏为魏俘获和投降者甚众。

隆安元年（397 年）二月，拓跋珪再率军进击中山。此时，燕内部发生了内乱，尚书慕舆皓欲杀死慕容宝，立慕容麟为主。消息泄露，慕舆皓降魏，慕容麟心中很不自安，孕育着其统治集团的严重分裂。后燕外地的援兵慕容会部，进展也十分缓慢。他率领部队在卢龙附近停留 3 个多月，不向中山进发。后经慕容宝再三责备，才慢慢吞吞进至蓟城（今北京南）。

魏军久围中山，无法战胜燕军。燕军想出城作战，征北大将军慕容隆向慕容宝建议说：“拓跋珪虽屡小胜，但其军队在外已经一年，其锋锐已被顿挫，人马死伤大半，人心思归，各部（指贺兰、纥邻、纥奚部）纷纷叛离，正可乘机向其进击。同时，

全城吏民思战，若利用我之民心士气，乘敌之衰，向敌进击，定可取胜。如果犹豫不决，军众锐气丧失，城中也日益穷困，事久生变，再想出击，则为时已晚。”慕容宝欲采纳这一建议，但慕容麟却多次劝阻了他。

燕主慕容宝派人向魏王拓跋珪求和，并以送还拓跋珪的弟弟拓跋觚、割让常山以西给魏国为条件。拓跋珪应允而撤走。后来慕容宝又追悔，拓跋珪本已行至卢怒，遂回军，再围中山。不久，燕内乱又起，慕容麟以武力劫持左卫将军慕容精，想逼其率禁军杀死慕容宝，遭慕容精严词拒绝。慕容麟杀慕容精后，逃出中山，奔于丁零部，中山城中震动。慕容宝不知慕容麟逃向何处，怕他将慕容会的军队夺走，占领龙城（今辽宁朝阳）。为此，慕容宝便于三月十四日夜，率太子慕容策、辽西王慕容农、高阳王慕容隆、长乐王慕容盛等 1 万多骑兵逃出中山，前往蓟城，其余燕将有的降魏，有的则逃往邺城。

中山城中由于慕容宝等人的逃走，吏民更加惊慌，于是，军民便拥立慕容详为君主，继续防守中山。拓跋珪尽全力攻城，数日没有攻破，便通过喊话劝降，城中燕军坚决拒绝。

慕容宝进入蓟城之后，立即装载宫中玉物，率领全部人马向其起家的京都龙城进发。魏将石河头率军追击，于华谦泽追及燕军，双方展开激战，魏军大败，燕军追杀 100 多里，杀魏军数千人。慕容隆又单独追杀数十里才回军北走。慕容隆面对这一胜利，感慨地流下了眼泪，他激动地说：中山城中屯兵数万，没有出兵杀敌的机会，今日的大捷，令人遗恨不已。

不久，燕内乱又起。慕容会因未当上太子，同时又忌恨慕容农、慕容隆的职位都高于自己，于是，派仇尼归等壮士 20 多

人，潜入慕容隆等人帐中，杀死慕容隆。后来慕容宝又欲杀死慕容会，慕容会率 10 余骑逃入中山，被慕容详斩首。

四月，魏军粮将尽，中山、邺城均未攻克。拓跋珪遂命东平公拓跋仪率军离开邺城，屯守巨鹿（今河北鸡泽东北），聚集粮食。慕容详乘机派出 6000 兵马，袭击魏军，被魏军斩杀 5000 多人。五月，原奉慕容宝之命，率 3000 人进入中山的燕将库辱官骥，在城中与慕容详交战，被慕容详全部歼灭。中山城中已无固定的君主，男女结盟，各自为战，混乱已至极点。

五月，魏王拓跋珪自动解除对中山的包围，率军至河间地区就食。慕容详则认为自己的功劳。乘此登上燕国皇帝位，改元为建始。接着，便杀王公以下 500 多人，众人离心。城中的民众饥饿难忍，均请求出城就食，慕容详不答应，饿死者遍布街巷。七月，赵王慕容麟率军偷袭中山，将慕容详斩首，慕容麟自称燕王。八月，拓跋珪率军至常山郡的九门（今河北藁城西北），军中发生大瘟疫，人马死亡大半，士卒都想回归。但拓跋珪灭燕决心已定，继续滞留燕境，招抚各郡县吏民归降。九月，中山城中大饥，慕容麟率 2 万人出走，屯于新市，拓跋珪率军进击。十月，慕容麟退过派水，拓跋珪与慕容麟军大战于义台（今河北新乐西南），慕容麟军惨败，被斩 9000 多人，慕容麟返回中山，带领妻儿逃向邺城。十月二十日，魏军攻克中山，燕公卿吏卒 2 万多人皆降于魏。二十三日，拓跋珪派 3 万骑兵支援拓跋仪攻取邺城。

此时，邺城守将慕容德向慕容宝上书，请求慕容宝回归邺城。慕容宝便调拨军队，准备南下。但赵王慕容麟进入邺城后，即向慕容德建议放弃邺城，退守滑台（今河南滑县）。慕容德遂

于隆安二年(398年)正月,率4万户民众向滑台退走,拓跋仪于是顺利进入邺城。至此,燕魏两国中山战略决战,前后历经1年零3个月便告结束。

中山战略决战之后,后燕已基本解体,蓟城以南、滑台以北的后燕疆域,已全部被北魏攻占。自此,后燕遂被北魏分割为南、北两个部分。

燕主慕容宝于隆安二年正月,第二次见到慕容德奏请南下的使者,决计不听众臣的劝告,率文武百官南下,留下慕容盛镇守龙城。二月十七日燕军出动,以抚军将军慕容舆腾为前军、司空慕容农为中军、慕容宝自率后军,各军相距一顿之地,大军绵延100多里。二十日,慕容宝进至乙连(似为今辽宁建昌附近),燕慕容隆旧将段速骨、宋赤眉等由于惧怕南下征战,发动兵变,杀乐浪威王慕容宙、中牟熙公段谊以及宗室各王,拥立慕容隆之子慕容崇为君王。慕容宝带领10余骑兵逃入慕容农军营后,返回龙城。燕南下大军纷纷溃散,后来慕容农投降叛军,又被乱军杀死。慕容宝、慕容盛、慕容舆腾等率少数轻骑南逃。尚书兰汗杀死全部叛乱头目后,拥立太子慕容策为君。慕容宝回至南方,又为慕容德拒绝,无处容身,只得再折返龙城。兰汗派其弟加难率军于龙城外廓杀死慕容宝,兰汗再杀太子慕容策,遂自立为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昌黎王,改年号为青龙。慕容盛的妃子是兰汗的女儿,故盛未被兰汗所杀。七月,慕容盛运用离间策略,使兰汗兄弟相互攻杀,最后,慕容盛的亲信部将将兰汗斩首,自己便以长乐王称制,改元为建平。十月,登上皇帝位。慕容盛以后,又使后燕延续了七八年。

晋隆安四年、后燕长乐二年(400年)二月,燕主慕容盛率

军 3 万进攻高句丽。以骠骑大将军慕容熙为前锋,攻拔了新城、南苏二城,开拓疆域 700 多里,迁移 5000 户而归。慕容盛对慕容熙的骁勇深为称赞。至隆安五年(401 年)八月,慕容盛在兵变中被杀,由慕容熙即位。慕容熙当政后,骄奢暴虐,杀人成性,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他与皇后出猎,5000 士卒被冻死和被虎狼咬死。皇后苻氏死去,他命人制作的丧车,高出城门,无法通过,便下令毁掉城门。他披头散发,赤脚步行 20 里送葬。不久,便被冯跋等人击灭,拥立高云为帝,后燕灭亡。由于高云昏暗无能,大权被掌握在汉人冯跋手里,公元 409 年,冯跋杀掉高云,雄据龙城,自称燕天王,史称“北燕”,北燕在辽西割据了 20 余年,冯跋死后,其弟冯弘立,公元 436 年,北魏灭掉了北燕,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八、西燕始末

太元八年(383 年),前秦苻坚率领百万大军进攻东晋,结果大败,原在前秦统治下的各少数民族贵族遂乘机纷纷起兵,建立政权。次年正月,原前燕鲜卑贵族慕容垂首先在关东称王,建立后燕。三月,原前燕皇帝慕容暐之弟慕容泓听说慕容垂起兵,也脱离前秦,逃亡到关东地区,召集当地牧马的鲜卑族人,众至数千。慕容泓遂带领这数千人马,返回关西地区,攻占华阴(在今陕西省华阴县东南)。前秦苻坚派将军张永帅 5000 军队来攻,被慕容泓击败。慕容泓声威愈壮,部众日增,于是自称使持节、都督陕东诸军事、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并任命慕容垂为丞相、都督陕东诸军事、领大司马、冀州牧、吴

王，正式建立西燕。当时，慕容泓之弟慕容冲担任前秦平阳太守，也于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起兵，部众 2 万，进攻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县），与慕容泓遥相呼应。

前秦苻坚分遣军队进攻慕容泓、慕容冲。同年四月，慕容泓败秦军于华泽，慕容冲却被前秦军队击败，率 8000 骑兵来投奔慕容泓。慕容泓取得对前秦军队的胜利，又得到慕容冲前来会合的部众，声势大振，人马很快增加到 10 余万。于是，派使者至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告诉苻坚，说：慕容垂已经平定关东，前秦可迅速以礼送回慕容暉，则慕容泓将率领部众护卫慕容暉返回原前燕都城邺城（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从此，燕与前秦划定虎牢（在今河南省荥阳县汜水镇）为界，互不侵犯，永为友邻。苻坚闻言大怒，痛斥留居长安的慕容暉，又命他写信招抚慕容泓等。慕容暉却秘密派人告诉慕容泓，要他全力恢复大业，一旦听到慕容暉的死讯，即称帝复燕。慕容泓于是带领军队向长安进发，并建年号为燕兴。

同年六月，慕容泓因为声望德行都比慕容冲要逊色一些，又执法严苛，引起部下不满。于是高盖等人杀死慕容泓，推举慕容冲为皇太弟，承制行事，设置百官，以高盖为尚书令。七月，西燕大军逼进长安，先后在郑西、灞上（均在陕西省西安市附近）大胜前秦军队，占领阿房城（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距长安咫尺之遥。九月，慕容冲率众进攻长安，苻坚登城御敌，大呼慕容冲而斥责说：你们这群奴隶，只适合去放牧牲畜，何苦前来送死！慕容冲回答说：奴隶厌倦劳苦，想以你们来代替。十二月，慕容暉等人设计想暗杀苻坚，事情不成，苻坚杀死慕容暉，留居长安城内的 1000 多名鲜卑人，无论男女老少统统被

杀。

太元十年(385年),慕容冲听到慕容暐的死讯,在阿房城即皇帝位,改元更始。其后,西燕与前秦在长安附近多次攻战,互有胜负。但总的局势是前秦同时遭到西燕、后燕、后秦的进攻,大势已去。同年五月,苻坚见长安难守,留下太子苻宏守城,自己率数百骑逃到五将山(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不久,苻宏也弃城出逃,西燕军队进入长安,纵兵大掠,城内外死者不可胜计。

太元十一年(386年)正月,后燕慕容垂称帝,建都中山(今河北省定县)。西燕将士多为徒河鲜卑,强烈希望东归故乡,而慕容冲因为后燕占据关东,兵强将勇,阻断道路,不敢东下,而他自己又乐不思蜀,留恋长安。于是在长安附近发展农业,筑造宫室,作长期据守的打算,由此招致其部下强烈不满。二月,西燕左将军韩延利用鲜卑军民的不满情绪,杀死慕容冲,推举鲜卑段随为燕王,改元昌平。三月,西燕左仆射慕容恒、尚书慕容永又袭杀段随,立慕容颢为燕王,改元建明,并带领鲜卑部众共40余万人放弃长安向东进发。半路上行至临晋(今陕西省大荔县),慕容恒之弟慕容韬又杀慕容颢,慕容恒遂立慕容冲之子慕容瑶为帝,改元建平。不料部众不附,都去投奔慕容永。慕容永于是杀死慕容瑶,立慕容泓之子慕容忠为帝,改元建武。慕容永任太尉、河东公。慕容永,字叔明,为慕容廆之弟慕容运的孙子。前燕灭亡,随众迁到长安,家境贫困,夫妇依靠制卖皮靴为生。慕容冲称帝后,慕容永为其部下小将,屡立大功,升迁为黄门郎,至此成为西燕握有实权的大臣。

东归的西燕鲜卑在途中频频发生内乱，逡巡而至闻喜（在今山西省），惧怕后燕之强，逗留不进，筑燕熙城（在今山西省闻喜县北）自守。同年六月，刁云等人又杀死慕容忠，共同推举慕容永为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雍秦梁凉四州牧、河东王，称藩于后燕。十月，慕容永向前秦苻丕借道东归，苻丕不许，西燕、前秦两军会战于襄陵（今山西省襄汾县）前秦军大败，王公百官都被西燕俘获。慕容永乘胜进据长子（在今山西省），即皇帝位，改元中兴，西燕数十万部众的东归至此而止。以后，西燕割据一隅，主要经营境内，未与其他政权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其鼎盛之时的疆域，南到轵关（在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北至新兴（今山西省忻州市），东、西则以太行山、黄河为界占有今山西省大部分地区。

太元十八年（393年）十一月，后燕慕容垂因为西燕也是鲜卑慕容氏立国，一直与后燕争夺正统地位，客观上对民心向背有一定影响，所以决定进攻西燕。首先派5万军队由井陘（在今河北省获鹿县西南）进攻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次年二月，慕容垂又亲率大军分三路进攻，一路出滏口（在今河北省磁县西北），一路出壶关（在今山西省长治市东南），慕容垂自率一路出沙亭（在邺城西南）。慕容永也分遣军队拒守，并在台壁（在今山西黎城县西南）聚集粮草，由小逸豆归率万余人戍守。后燕军队1个多月按兵不动，慕容永怀疑后燕主力将从南路进攻，于是将军队都调集到轵关，只留下戍守台壁的一支部队。五月，慕容垂率主力突然由滏口进攻台壁，击溃西燕守军，包围台壁。慕容永急忙召回守卫轵关的军队，自率5万精兵与后燕战于台壁南，中伏大败。慕容永逃回长

子，后燕军乘胜攻克晋阳。六月，后燕军队包围长子。八月，慕容永向东晋、北魏求救，救兵未至，其部下开城门投降，慕容永及其公卿、大将 30 余人被后燕杀死，西燕管辖的 8 郡 7 万余家百姓都归后燕所有，西燕亡。

九、东晋灭南燕

中山决战后，南据滑台（河南滑县）的慕容德于公元 400 年自称燕帝，建立燕政权，史称南燕。

义熙元年（405 年）八月，南燕主慕容德死去。慕容超继承王位后，猜忌暴虐，迷于游猎作乐，大失人心。大臣封孚、韩悼屡屡劝谏，均不听。一天，慕容超问封孚说：“朕可以与前代哪个皇帝相比？”封孚回答：“桀和纣。”南燕以这样的君主当政，自然预示着其没落时期的到来。

义熙五年（409 年）二月，南燕主慕容超以抢掠东晋的乐妓为名，派将军慕容兴宗、斛谷提、公孙归率领骑兵袭占了东晋的宿豫（今江苏宿迁）、偃阳平太守刘千载、济阴太守徐阮，大肆掳掠而去。同月，公孙归再攻占济南（今山东济南），俘太守赵元，掠走千余人。彭城以南的晋军民，纷起而自卫。晋燕双方已处箭拔弩张之势。

东晋刘裕入朝当权之后，为收揽人心，巩固其实力地位，在经济上采取了减轻徭役租税的政策，修复芍城（今安徽寿县南）水利设施，使社会阶级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政治上注意限制刘毅、诸葛长民、司马氏家族的势力；军事上，他重用刘穆之、王镇恶等谋略将帅，积极准备恢复中原。这样，东晋王

朝便为北灭南燕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东晋刘裕鉴于南燕于二月两次入袭东晋北部边境,为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权威,便于义熙五年(409年)三月,上表晋安帝请求兴师击灭南燕。朝中大臣廷议均认为不可,唯有左仆射孟昶、车骑司马谢裕、参军藏熹极力赞成北伐。刘裕决心坚定,并谋划以水军、车兵、步兵、骑兵联合作战,一举击败燕军。

南燕在得知东晋大军来攻之前,桂林王太尉慕容镇等极力主张先击北魏,以雪国耻;但南燕主慕容超和征虏将军公孙五楼则主张南下袭晋。当得知东晋大军北攻的消息后,南燕主慕容超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公孙五楼建议说:“吴兵轻敏果敢,利在速战,不应与其正面交锋,应据守大岷,阻敌深入境内,以拖延时日,沮丧敌之锐气,然后选拔精锐骑兵 2000,沿海岸南下,切断敌军粮道,另以段晖率兖州军沿着山路东走,腹背夹击,此为上策;命各地郡守依险固守,坚壁清野,毁掉庄稼,使敌人无粮可取,其大军在外,求战不能,食尽兵疲,旬月之间即可获胜,此为中策。放纵敌人越过大岷,出城迎战,此为下策。”慕容超拒绝采纳公孙五楼上策和中策的建议。他主张放纵敌人越过大岷山,再行歼灭。太尉桂林王慕容镇也劝谏,不宜纵敌入岷,自贻窘逼。阻守大岷,才是上策。慕容超仍不听从。慕容镇退朝后对将军韩悼叹息说,陛下既不同意出大岷迎敌,又不准坚壁清野,放敌深入腹心地区,坐以待围,我们必将国灭身亡。慕容超听说到后,大怒,竟将慕容镇下狱。慕容超决心采取收莒城、梁父之军,固守京都广固(今山东淄博东)、纵敌入岷来攻的战略。

东晋义熙五年四月十一日,刘裕率军 10 多万,自建康出

发，从水路过长江，自淮水入泗水北进。五月进至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留下船舰、辎重，由陆路进至琅邪（今山东临沂北）。所过之地构筑城堡，分兵留守，以防备南燕骑兵的突袭和被切断后路。

琅邪已为燕境，在晋军到达之前，南燕主已将莒城和梁父的守军调走。由琅邪至燕都广固有三条通道：一是沿沂水北上，经东莞（今山东沂水），越过大岷山（今山东沂水北），直捣临朐（今山东临朐）、广固，此为捷径，但大岷山险峻，山高 70 余丈，周围 20 多里，山上有穆陵关，通道仅能容纳一轨（一辆车的宽度），称“齐南天险”；二是由东北经过莒城、东武（今山东诸城）入潍水北进，再折向西走，进击广固，此路迂远，耗费时日；三是由西北越泗水经梁父，转向东北逼近广固，此路山路太长，行军运输均很困难。但刘裕却欲从此路进军。此时，部将向刘裕建议说“燕人若塞大岷山之险，或坚壁清野，大军深入，不唯无功，将不能自归。”刘裕则胸有成竹地说：“吾虑之熟矣。鲜卑贪婪，没有深谋远虑。谓我孤军远入，不能持久；不过进据临朐，退守广固，必不能守险清野，敢为诸君保之。”

刘裕率军经过大岷，不见燕军出战，异常高兴，部将询问原因，刘裕说：“我大军已过大岷险关，士有必死的信念，田里到处是庄稼，我已无断粮之忧，敌人已在我掌握之中。”

六月十二日，刘裕军至东莞。此时，慕容超派公孙五楼、辅国将军贺赖卢、左将军段晖率步骑 5 万，屯于临朐，当听到晋军已越过大岷山，又亲率步骑兵 5 万增援临朐。临朐在大岷山的西北，为广固南面的屏障，距城西 40 里有巨蔑水。慕容超遂令公孙五楼进据巨蔑水，但晋军前锋龙骧将军孟龙符也已到

达巨蔑水边。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南燕军被晋军击败退走。晋军占据了巨蔑水后，刘裕以兵车 4000 乘分为左右两翼，双车并行，继续前进。当晋军进至临朐城南，距城只剩数里，慕容超突然以万余骑兵前后夹击晋军。刘裕急令兖州刺史刘藩、并州刺史刘道怜、咨议参军刘敬宣、陶延寿，参军刘怀玉、慎仲道、索邈等部，奋力迎击，双方战至半日，仍未分胜负。此时，刘裕参军胡藩向刘裕建议说：“燕军全部出动，临朐城中留守兵力必然薄弱，愿以奇兵从间道攻取该城，此韩信所以破赵也。”刘裕欣然应允，立即派胡藩、咨议参军檀韶、建威将军向弥率部暗中出燕军之后，直攻临朐；同时扬言晋后续大军已由海上而来。向弥部首先登城，攻克临朐。慕容超大惊，自城中单骑逃出，奔于城南段晖军。刘裕乘胜猛击燕军，燕军大败，刘裕军斩南燕大将军段晖等 10 多人。慕容超败回广固，晋军奋力追击，进抵广固城下。六月十九日，晋军攻占了广固外城，收集部众退守保内城。刘裕军筑长围，高 3 丈，并挖堑 3 重，以做久困之计。同时，广泛招抚投降的燕军吏，选贤任能，华夷均甚喜悦，并利用齐地的粮食补给军队，停止了从南方的运送，使晋军更加主动。

慕容超被困，形势危急，便赦免了其桂林王慕容镇，并决定派尚书郎张纲向后秦求救。此时，慕容镇向慕容超建议说：“今陛下亲率六师，战败而还，群臣离心，士民丧气。现秦正与大夏交战，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还者尚有数万，朝廷拿出全部金银财宝赏赐全军，更决一战。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敌；如其不然，死亦为美。”司徒乐浪王慕容惠则认为，晋军乘胜，气势百倍，我以败军之卒出击，将难以取胜。秦虽与大夏交战，但不

足为虑。且秦“与我分据中原，势如唇齿，安得不来相救！但不遣大臣，则不能得重兵，尚书令韩范为燕、秦所重，宜遣乞师。”慕容超便派韩范前往。

七月，南燕尚书垣尊、京兆太守垣苗越城而出，投降于晋军。随即向刘裕建议说，张纲善制攻城器械，如若擒获张纲，广固必能攻拔。不久，张纲被晋太山太守申宣俘获，送至刘裕军营。刘裕让张纲登上楼车，命张纲向城中喊话，声言“后秦军队已被夏军击败，没有援军到来。”广固城内军民得此消息，深为惊恐，加之，每当江南派使者和援军的到达，刘裕便于夜间秘密派兵迎接，第2天，则大张旗鼓而进，以虚张声势，恫吓燕军，对南燕军起了不小的威慑作用。北方地区的民众每天背负粮食前来归附刘裕军的不下1000多人，燕右仆射张华、中丞封恺均为刘裕所俘。慕容超见大势危急，便向晋请求以割让大岷以南为条件，称臣于晋，遭刘裕拒绝。

九月，南燕尚书张俊、韩范不但未从后秦搬来救兵反而先后降于刘裕军。南燕人素来敬重韩范，刘裕便让他绕城宣示燕人，他已降晋，燕军更加沮丧。

十月，张纲为刘裕军所造攻城器具完毕，“设备奇巧，飞楼木幔之属，莫不毕备。城上火石弓矢，无所用之。”晋军由于拥有了良好的攻城器械，杀伤燕军日众，加之燕军被困已久，城中粮食将尽，燕军吏纷纷越城降晋。尚书悦寿认为燕“独守穷城，绝望外援。”虽然将军公孙五楼、贺赖卢曾挖掘地道，率众出城袭击晋兵，但无法破敌，故劝告慕容超降服。但慕容超说：“吾宁奋剑而死，不能衔璧而生！”

义熙六年(410年)二月初五，刘裕命率军攻城，悦寿开启

城门放入晋军，慕容超率数十骑突围而逃，被晋军生俘，送至建康斩首。至此，刘裕围攻广固 8 个月之久，才将南燕灭亡。刘裕进入广固城中，欲将城中的男子全部坑杀，将他们的妻女赏给将士，后经韩范劝止，只将燕王公以下 3000 人处死。

十、后秦的兴亡

后秦的创立

太宁元年（323 年）六月，前赵皇帝刘曜击灭陈安，陇上氐、羌军少数民族都送任子请降。刘曜以羌酋姚弋仲为平西将军，封平襄公，使他居于陇上。姚弋仲为南安赤亭（今甘肃省陇西县西）羌族人，其祖先自东汉末叶内迁至赤亭。西晋末年大乱，姚弋仲又率部从内迁至榆眉（在今陕西省千阳县东）。咸和四年（329 年），后赵攻灭前赵，姚弋仲投降后赵，被任命为行安西将军，六夷左都督。其后，后赵石虎迁徙关西氐羌及秦陇居民 10 多万户于关东地区，以姚弋仲为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命其率部众数万人徙居清河湫头（今河北省枣强县东北）。姚弋仲为人刚直不阿，对后赵石氏忠诚不二，多参与朝政大计，后升任持节、十郡六夷大都督、冠军大将军。

永和五年（349 年），后赵梁犊起义，将士勇悍，兵锋甚锐，接连打败后赵前去镇压的军队。姚弋仲参与对梁犊义军的进攻，取得胜利，以功进封为西平郡公。石虎死后，冉闵诛胡，后赵大乱，姚弋仲本想乘后赵扰乱之际，攻占关西地区，因而与氏族蒲洪发生冲突，大败。石虎之子石祗称帝于襄国（今河北

省邢台市),以姚弋仲为右丞相、亲赵王,礼遇甚厚。永和七年(351年)八月,姚弋仲以后赵已亡,认为自古以来没有以戎狄身份可以做成皇帝的,于是派使者至东晋请降。东晋即封姚弋仲为使持节、六夷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同时拜其子姚襄为持节、平北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牧。

永和八年(352年)三月,姚弋仲病死,其子姚襄统领部众。姚襄字景国,为姚弋仲第五子,为人好学博通,雅善谈论,又雄武冠世。姚襄即位后,任用汉族士人王亮、尹赤等为辅佐,与前秦争战不胜,率部众南下归东晋,驻扎在谯城(今河南省夏邑县),广兴屯田,训练士卒。后因与东晋扬州刺史殷浩不和,移屯梁国蠡台(在今河南省商丘市)。次年十月,殷浩率众北伐,以姚襄为先锋。姚襄设伏于途中,突袭殷浩,取得大胜,率军渡过淮河,屯驻在盱眙(在今江苏省),招兵买马,劝课农桑,部众很快发展到7万多人。但因其部下大多为北方人,不愿在南方居住。永和十一年(355年)五月,姚襄率众北还,进据许昌(在今河南省)。次年,又带领军队进攻洛阳,踰月不克。东晋征西大将军桓温率军队前来讨伐,两军会战于伊水,姚襄大败,逃到襄陵(今山西省襄汾县),逐渐向关中发展。永和十三年(357年),前秦军队与姚襄战于三原(在今陕西省),姚襄兵败被杀,其弟姚萇率众投降前秦,被封为扬武将军。

太元八年(383年),前秦苻坚进攻东晋,封姚萇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结果,前秦大败,鲜卑慕容垂、慕容泓等乘机起兵叛秦。次年三月,苻坚命姚萇随苻叡讨伐慕容泓,前秦兵败,苻叡被杀。姚萇派人向苻坚谢罪,苻坚怒诛使者,姚萇畏罪逃走,关陇豪强尹纬、庞德等纠集羌人5万余家,投奔

姚萇，推举其为盟主。姚萇于是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年号白雀，设置百官，正式创立后秦政权。当时，关中地区有鲜卑慕容冲与前秦苻坚相攻战，姚萇进据北地（在今陕西省耀县境内），厉兵秣马，静以待变，附近地区的羌胡络绎前来归附，众达 10 多万，势力渐大，陆续攻战新平（今陕西省彬县）、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县北）诸城。前秦苻坚因受鲜卑慕容冲围攻，弃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逃到五将山（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被姚萇杀死，长安被西燕慕容冲占据。

太元十一年（386 年）三月，西燕鲜卑数十万人放弃长安东归，卢水胡郝奴乘虚进入长安。四月，姚萇率军至长安。唾手而得，于是在长安称帝，改元建初，国号大秦，史称后秦。以后，后秦对外主要与前秦残余势力相攻战，对内则注意革除时弊，修举德政，建立太学，拔擢贤能，又在各镇设置学官，选拔人才。

太元十八年（393 年）十二月，姚萇病死，其子姚兴继立。次年，前秦苻登乘姚萇新死之机，前来进攻，被姚兴击败，并追杀苻登，解散其部众，全部归家耕田。前秦亡。以后，姚兴在关陇地区扫平小股地方势力，统治日益巩固。太元二十一年（396 年），西燕被后燕消灭，原西燕河东太守柳恭等人拥兵自守，不附后燕。姚兴派军队攻克蒲坂（在今山西省永济县），占有了河东地区。隆安三年（399 年）十月，后秦军队攻克洛阳，军威甚壮，东晋所辖淮河、汉水以北诸城纷纷投降。元兴二年（403 年）八月，后秦灭亡后凉，迁后凉吕隆及其宗族、僚属与百姓 1 万户于长安。在此前后，西秦乞伏乾归、南凉秃发利鹿孤、北凉沮渠蒙逊等割据势力都曾一度投降后秦，接受官爵，陇右河西

的广大地区,都归入后秦的势力范围。后秦遂成为十六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其疆域北边直抵阴山,南边达到梁州(今陕西省汉中市),东面到徐州(今河南省商丘市南),西边包括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县),在北方地区与关东的后燕并立。

姚兴在位,比较留心整顿内政,曾下令解放自卖为奴婢的百姓,注意选拔任用人才,命令各郡国每年都要推荐清行孝廉一人。并建立律学,革除刑法之弊,在复兴儒学,重视教育方面也推行过积极的措施。所以,在姚兴统治的时期,后秦势力达到极盛。

东晋灭后秦

后秦于隆安四年(400年)首次击降西秦之后,又于隆安五年(401年)击灭了后凉,势力大增,成为当时中国西北地区最强大的国家。

义熙五年,后秦弘始十一年、夏龙升三年(409年),秦、夏两国连续发生了征战。当年四月,夏主率骑兵2万攻秦,掠夺平凉的杂胡7000多户,进兵屯于依力川(今甘肃平凉附近)。九月,秦主姚兴率军回击夏军,秦军大败,秦将姚榆生为夏军生擒,左将军姚文崇等拼死力战,夏军才退走,姚兴也返还长安。接着夏军又攻占后秦的敕奇堡、黄石固、我罗城等地。义熙六年、后秦弘始十二年、夏龙升四年(410年),夏主又派左将军赫连罗提攻占后秦之定阳城(今陕西富县境),坑杀秦军4000人。接着,夏军又进击陇右地区,攻占白崖堡,兵逼清水(今甘肃清水)。义熙七年、夏龙升五年、后秦弘始十三年(411年)正月,秦姚详屯守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被夏军逼迫弃

城南逃。夏军追及将姚弋弼杀死，俘其全军。夏主赫连勃勃再南攻安定（今甘肃镇原南），于青石北原击败后秦尚书相佛嵩，俘其吏民 4.5 万人。义熙十二年、夏凤翔四年（416 年）六月，夏军攻占了上邽，杀秦州刺史姚弋仲及将士 5000 多，毁上邽城，接着进攻阴密（今甘肃灵台西 50 里），又杀秦将姚良子以下 1 万多人。秦征北将军姚恢弃安定（今甘肃泾川北），奔回长安。安定人胡俨等率 5 万户举城降于大夏。后秦与大夏之间的连年征伐，进一步消耗和削弱了秦军的实力，为东晋灭亡后秦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东晋在击灭南燕后，刘裕原想乘胜向后秦进攻，但因卢循、徐道覆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逼近建康（今江苏南京）朝廷急调刘裕回归，以镇压农民起义军。因而，东晋只得顺延了击灭后秦的时间表。至晋义熙十一年（415 年），刘裕相继镇压了卢循、徐道覆起义军，剪除了荆州刺史刘毅、兖州刺史刘藩及豫州刺史诸葛长民等，平定了益州，打击了晋宗室司马休之等势力，政局稳定，经济和军事实力逐步增强。义熙十二年（416 年）初，后秦主姚兴病亡前后，姚弼、姚悛、姚宣、姚耕儿等明争暗斗，争夺帝位，政治动乱，人心浮动，叛离者日增；连年与大夏、南凉、西秦等征战，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丧失了强国地位。加之北魏势力下降，无力他顾。这些，都为东晋击灭后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刘裕遂据此定下了出兵灭秦的战略决策。

刘裕为夺取击秦的胜利，进行了详尽的作战策划：

首先以主力大军由淮水、泗水，沿黄河西进，夺占战略重镇洛阳；以一部兵力由武关进击，以牵制关中秦军，然后夺取潼关，直攻长安。

以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率步兵为前锋，自寿阳（今安徽寿县）沿淮水淝水进攻许昌（今河南许昌东）、洛阳（今河南洛阳）。王镇恶自淝水出商丘攻向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檀道济自颍水出项城（今河南商丘），攻向许昌，会师洛阳，待刘裕所率主力到达，再继续西进。

以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率水军由彭城（今江苏徐州）溯汴水出石门（今河南荥阳东北）。入黄河，进占洛阳以北，阻止魏军南下侧击晋军。

以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率军兵出襄阳（今湖北襄樊），赴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以牵制关中的后秦军向洛阳机动。

令冀州刺史王仲德总督前锋诸军，并率领水军由彭城溯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防止魏军渡越黄河南进。

刘裕亲领主力由彭城自泗水、巨野泽再入黄河，西趋洛阳。

当后秦获知晋军已抵许昌时，仍在与大夏、西秦作战。秦东平公姚绍深感忧虑，认为应集中全力对付东晋。遂向后秦主姚泓献策说，应将远在安定的吏民迁至京师，这样可得精兵10万，即令夏、晋两国同时向我进攻，也不至有亡国之祸。但这一策划却被左仆射梁喜否定。梁喜认为：“安定守将齐公姚恢素有威名，且吏民与大夏赫连勃勃已结深仇，必然死守安定。如若放弃安定，夏人必然进逼郿县（今陕西眉县东北），况关中兵足以抗击晋军，何必自己削弱自己呢”。

后秦主姚泓根据以上建议，决定采取两面作战的对策，既保卫西北的安定，防止大夏的进击；也重点据守长安、洛阳、潼

关、武关等重要城邑关隘，阻止晋军的西进。姚泓的这一作战决策，使后秦从战争的开始便处于战略上顾此失彼的被动境地。

东晋义熙十二年、后秦永和元年（416年）八月十二日，刘裕率军自建康出发，各路大军也相继按预定策划出动。

九月，刘裕率军进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前锋王镇恶、檀道济军也进展顺利，自进入秦境以来所向皆捷。秦将王苟生以漆丘（今河南商丘以北）降于王镇恶军；徐州刺史姚掌以项城（今河南沈丘）降于檀道济军；后秦新蔡（今河南新蔡）太守董遵坚守城邑不降，檀道济攻克该城，将董遵斩杀，旋即攻克了重镇许昌（今河南许昌东），俘获颍川太守姚垣及大将杨业。与此同时，建武将军沈林子军，自汴水进入黄河，襄邑（今河南睢县）董神虎率领 1000 多人响应晋军。沈林子随即与他共攻仓垣（今河南开封北），攻克了该城，后秦兖州刺史韦华降服。

十月，晋军进占了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王镇恶、檀道济两军旋即会师于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后秦镇守于洛阳的征南将军姚洸，见晋军逼近，派人至长安求救。后秦主姚泓命越骑校尉阎生率骑兵 3000、武卫将军姚益南率步兵 1 万增援洛阳，并令并州牧姚懿自蒲阪（今山西永济西）进屯陕津（今山西平陆东南，即古茅津渡），以为声援。此时，宁朔将军赵玄向姚洸建议说：“今晋寇益深，人情骇动；众寡不敌，若出战不捷，则大事去矣。宜摄诸戍之兵，固守金墉不下，晋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战而坐收其利也。”姚洸的司马姚禹及主簿阎恢、杨虔皆妨恨赵玄，便暗中与檀道济相通，极力反对赵玄的建议，并怂恿姚洸分兵

防守各地。姚洸中计，派赵玄分兵 1000 前往防守柏谷坞（今河南偃师东南），以广武将军石无讳东至巩城（今河南巩县西南）防守。继之，成皋、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皆降于晋军，王镇晋、檀道济、沈林子等军由成皋顺利西进。石无讳进至石关（今河南偃师西），得悉晋军已至，便退兵洛阳；赵玄与晋军战于柏谷坞，兵败战死。十月二十日檀道济军逼近洛阳，二十二日姚洸出城降晋。檀道济俘秦军 4000 多人。此时后秦越骑校尉阎生和武卫将军姚益南正率部赶赴洛阳途中，得知洛阳失守，不敢再向前进。

刘裕原先命令前锋军攻取洛阳，且待后续主力到达之后再继续西进。但王镇恶等见后秦内乱纷起，潼关守军薄弱，便当机立断，不待刘裕大军到达，分兵两路西进。一路王镇恶军至澠池（今河南澠池县西），派部将毛德祖进攻秦弘农太守尹雅，于蠡吾城（今河南洛宁西），生擒尹雅，王镇恶军迅速进抵潼关（今陕西潼关北）城下。另一路檀道济、沈林子部，自陕（今河南陕县）北渡黄河，向蒲阪（今山西永济西）进攻。后秦河北太守薛帛沈往河东，檀道济等军进攻蒲阪，被守将后秦并州刺史尹昭击退，檀命别将再攻匈奴堡，又被秦将辅国将军姚城都击败。此时，后秦以东平公姚绍为太宰、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改封鲁公，率武卫将军姚鸾等步骑兵 5 万防守潼关，又命姚驹率部增援蒲阪。沈林子认为，蒲阪城池十分坚固，兵力众多，难以很快攻取；王镇恶孤军于潼关，不如南下与王镇恶合军攻打潼关，潼关既破，尹昭不攻自溃。檀道济同意沈林子的意见，遂引军自蒲阪南下。三月檀道济、沈林子军到达潼关。姚绍率兵出战，檀道济、沈林子将秦军击败，斩俘秦军 1000 多

人。姚绍退兵定城(陕西潼关西 30 里),凭险据守,告诉众将说:“檀道济等兵少势弱,孤军深入。敌只能坚守城池,以待后援。我分兵断其粮道,当可将敌坐擒。”于是,便派将军姚鸾截断大路,以阻止晋军的粮运。

姚鸾先派将军尹雅与晋军战于潼关之南,被晋军战败生擒。三月初四日,沈林子乘夜率勇锐士卒偷袭鸾军营,杀姚鸾及秦军数千人。姚绍又派姚讚屯兵于河上,欲断晋军水运。沈林子再率军进击,姚讚兵败,逃回定城。此时,秦将薛帛举河曲降晋,不久,晋军给养不继,军心浮动,全军顿兵坚城,不得前进,军中纷纷提议撤军东归。此时,将军沈林子按剑怒斥说:“今许、洛已定,关右将平,事之成败,系于前锋。且大军尚在远方,敌军兵众气盛,想要撤军,也难以安全退走,我决心单独率部继续完成受领的使命。”王镇恶等人遂镇定下来,派出使者驰告刘裕,请求速派援军,运送军粮。使者晋见刘裕,刘裕以魏紧跟于黄河北岸并进,威胁重大,而拒绝派兵增援。王镇恶等于是亲至弘农(今河南灵宝北)动员民众,捐献军粮,才解了缺粮之危,军心趋于安定。四月,姚绍再次命长史姚治、宁朔将军安鸾、护军姚墨蠡、河东太守唐小方率 2000 人屯守河北的九原,企图再断晋军粮道,又被沈林子击败。姚治、姚墨蠡、唐小方均被斩首,其全军几乎丧尽。姚绍听说姚治等人兵败身亡,悲愤已极,发病呕血,将兵权交予东平公姚讚之后死去。旋即,姚讚率兵偷袭沈林子军,又被沈林子击败,双方形成相持局面。

刘裕亲率大军于义熙十三年(417 年)正月离开彭城(今江苏徐州),自淮水、泗水进入清河。三月初八,刘裕以左将军

向弥率部分兵力屯于黄河重要渡口碛碛(今山东东阿西北),自率大军进入黄河;魏军为防止晋军于黄河北岸上陆向魏进击,也以数千骑兵沿黄河北岸跟随刘裕军西行,凡漂流至北岸的晋军人员,均被魏军擒杀。刘裕数次派兵上岸攻击魏,刚一登岸,魏军便逃离岸边。为击败魏军的袭扰,刘裕命数千勇士,车百乘,由丁旼和宁朔将军朱超石率领,携带强弓利箭,登上黄河北岸,列阵而进。魏军立即前来进攻,魏将长孙嵩率骑兵3万四面围攻晋军。晋军拼力死战,魏军被利箭射杀者甚众,死尸堆积遍地,魏将阿薄干被斩,魏兵败退走。朱超石率宁朔将军胡藩、宁远将军刘荣祖追杀,又斩俘1000多人。四月中旬,刘裕进至洛阳,为防止魏军的袭击,在洛阳停军两个月,部署后方的防卫。七月,刘裕进至陕地(今河南三门峡),将军沈田子、傅弘之进入武关(今陕西商县南),后秦守将逃走。沈田子等军进占青泥,后秦命给事黄门侍郎姚和都屯兵于峽柳(今陕西商县西北),阻击沈田子军。

八月,刘裕大军进至阆乡(今陕西潼关东)。刘裕顾虑沈田子等军力薄弱,为使其更好地牵制和吸引秦军兵力,便派将军沈林子率军前往支援。此时,沈田子等正准备攻击峽柳。后秦主姚泓本欲率军迎击刘裕军于潼关定城,但顾虑沈田子等军突袭其侧背,于是决定先率军消灭沈田子军,然后再倾全国之军迎击刘裕的主力大军。八月,姚泓所率数万骑兵,突然进至青泥(在峽柳附近)。沈田子得知姚泓率大军而来,欲乘秦军刚刚到达,向其攻击。傅弘之认为敌众我寡,不应出击。沈田子说:“兵贵用奇,不必在众。且今众寡相悬,势不两立,若彼结围既固,则我无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营陈未立,先薄之,可

以有功。”于是，决定先率自己本部兵马向敌攻击，傅弘之跟随于后。沈田子军被秦军重重包围，沈田子激励士卒奋力拼杀，大败秦军，斩秦军1万多人。姚泓率败军退返长安。当沈林子到达岷柳时，姚泓军即已退走，于是，沈田子与沈林子合军共追秦军。关中许多郡县见姚泓兵败，暗中纷纷降于晋军。

八月初二，刘裕到达潼关，即以朱超石为河东太守，命其与振武将军徐猗之于河北会合薛帛，共攻重要战略渡口蒲阪（今山西永济西）。后秦平原公姚璞与姚和都击败晋军，斩了徐猗之，朱超石逃回潼关。此时，王镇恶请求率领水军从黄河入渭水，逼向长安。刘裕采纳了他的建议。王镇恶军出发后，正值后秦恢武将军姚难由香城（今陕西大荔东）率军西撤，王镇恶跟踪追击。姚泓率兵由灊上到达石桥（长安城洛门东北），接应姚难；以镇北将军姚疆和姚难合兵守卫泾上（今陕西高陵境），迎击王镇恶军。王镇恶命将军毛德祖率部攻击，将秦军击败。姚疆战死，姚难逃回长安。东平公姚讚得知晋军迫近长安，便率军由定城退往郑城（今陕西华县）。刘裕大军随之逼近。后秦主姚泓见长安危急，自己尚有数万军队，可以抗击晋军。遂令姚丕军防守渭桥（长安城北），胡翼度军防守石积（长安城东北），姚讚军防守灊东（灊水东岸），姚泓自己率军守卫逍遥园（长安城西）。

八月二十三日，王镇恶乘蒙冲小舰进至渭桥，弃船登岸。当时，由于渭水湍急，大部舰船皆被冲走。王镇恶乘势激励部众说：“吾属并家在江南，此为长安北门，去家万里，舟楫、衣粮皆已随流。今进战而胜，则功名俱显；不胜，则骸骨不返，无他歧矣，卿等勉之！”于是，身先士卒，率军进击姚丕军。姚丕战

败，姚泓率兵来救，与姚丕败兵互相践踏，也不战而溃。姚丕等皆战死，姚泓单骑逃回宫内。王镇恶军由平朔门（长安北门）攻入长安城，姚泓与姚裕率数百骑逃奔石桥。东平公姚讚得知姚泓兵败，率众往救，士众皆溃逃。八月二十四日，姚泓率群臣至王镇恶军营投降，至此，后秦便宣告灭亡。

十一、后凉的兴亡

后凉的建国之战

东晋太元七年、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九月，正当前秦极盛之时，前秦王苻坚命其骁骑将军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率凌江将军姜飞、轻车将军彭晃、将军杜进、康盛等统兵10万，开始准备统一西域的战争。太元八年、建元十年（383年）正月，吕光率军从长安出发，在淝水之战进行期间，吕光的10万大军也正鏖战于西域地区，经过近1年的征战，前秦胜利地统一了西域全境。至太元十年、前秦苻丕太安元年（385年）九月，吕光回军至宜禾（今甘肃安西西）。

当初，秦凉州刺史梁熙听说吕光欲回军，便想关闭边境，拒绝吕光军入境。高昌太守杨翰向梁熙建议说：“吕光刚刚击破西域，兵力强大，锐气正盛，他听说中原大乱，定会别有所图。河西之地方圆万里，带甲士卒10万之众，足够以此自保。若吕光越过流沙地带，其势力便很难阻挡。高梧谷口为险要关隘，应以兵戍守，控制水源，则可置其于饥渴之绝境，为我所制。如若认为高梧谷太远，守住伊吾关（今新疆哈密西）也可。

一旦敌人越过这道关口，即是有张良的妙策，也无济于事了。”梁熙拒不采纳。县令张统也认为，吕光聪明才智过人，拥有思归之士，乘着战胜的军威，其锋锐势必难以抵挡。因而，建议梁熙应拥立行唐公苻洛，以借助帝室的威望，制服吕光，但也遭梁熙拒绝。

当初，吕光听到杨翰向梁熙的建议，心中恐惧，不敢前进。将军杜进分析说，梁熙的为人，文弱有余，机敏决断力差，定不会采纳杨翰的计划，不值得忧虑。因而建议应乘“其上下未同，宜在速进，进而不捷，请受过言之诛。”吕光采纳了杜进的建议，挥军直进，进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杨翰举郡城高昌投降。吕光进至玉门（今甘肃敦煌西北），梁熙下书责备吕光不该擅自回军，并令其子梁胤为鹰扬将军，与振威将军姚皓、别驾卫翰率军5万，于酒泉（今甘肃酒泉）抗击吕光。敦煌太守姚静、晋昌太守李纯均以郡城向吕光降服。吕光接着回书梁熙，反责他不赴国难，而以重兵阻止胜利之师回归，同时命其部将彭晃、杜进、姜飞为前锋，率军与梁胤交战于安弥（今甘肃酒泉地区），大败梁胤军，将其生擒。附近的胡夷部族纷纷向吕光投降，武威太守彭济将梁熙抓获，也向吕光降服。吕光杀了梁熙，率军进入姑臧（今甘肃武威），自任梁州刺史。接着吕光又率军攻克了酒泉、西郡（今甘肃永昌西北），杀太守宋泮、宋皓。四月，吕光率军先后击败了逼进姑臧城西的张大豫军、城南的王穆与奚于军，斩奚于等以下2万多人，后又将张大豫军逼退东走。至此，吕光已基本据有了凉州全部。九月，吕光得知苻坚已死去，便于十月，改年号为太（大）安，这便是后凉政权建立的开始。

后凉扩张

后凉主吕光，为全部占领凉州、秦州地区，于建立政权之后，便接连向凉州未占地区和秦州一些地区进兵。晋太元十二年、后凉太安二年（387年）七月，吕光派部将彭晃、徐灵于临洮（今甘肃岷县）进击张大豫、王穆，一举将其击败。八月，广武人擒张大豫，送交吕光，吕光将其斩首。

十二月，吕光的西平太守康宁自称匈奴王，叛离后凉，杀湟河太守强禧；张掖太守彭晃也与康宁相结，起兵反叛，对吕光的后凉政权构成巨大威胁。于是吕光决心亲自率兵征讨，遂乘三股叛军尚未紧密协同之前，以骑兵3万，进攻彭晃。吕光军倍道兼行，迅速进至张掖（今甘肃张掖西北）。经20天的激战，攻克该城，斩彭晃。接着吕光又乘王穆正率兵攻击敦煌之际，亲率骑兵2万，进击酒泉，兵至而克。吕光军进至凉兴（今甘肃安西境），王穆闻讯，引军东走，途中部众溃散，王穆单骑逃走，被人斩杀。凉州的全部、河西地区大部均为吕光所据有。

吕光为向东方和南方扩展，于太元十七年、后凉麟嘉四年（392年）八月，派其弟右将军吕宝，率军进占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的乞伏乾归。吕宝军兵败，吕宝与部众1万多人被斩。吕光随即又派其子虎贲中郎将吕纂攻击南羌彭奚念，吕纂也兵败而归。吕光见两战皆败，便亲自率军至枹罕（今甘肃临夏东北），再攻彭奚念，将彭奚念军击败。彭奚念率部众南逃甘松，吕光军占据了枹罕。这样，后凉的疆域除全部据有西域、凉州之外，东西便推进至洮水林（今甘肃洮河）岸边和金城以西地区。晋太元二十年、后凉麟嘉七年（395年）七月，吕光率

10 万大军,进攻西秦王乞伏乾归。西秦恐惧,西秦左辅密贵周、左卫将军莫者羗羗等劝西秦王乾归臣服于吕光,并以其子敕勃为质。乾归应允,吕光便引军退走。至晋太元二十一年(396 年)六月,吕光登上天王位,国号大凉,后凉至此已达到它的全盛时期。

后凉的灭亡

吕光施政严苛,其诸子和外甥等人贪婪荒淫,残暴无比,很不得人心。接着又在战争中迭次失败,后凉政权逐渐走向没落。

东晋安帝隆安元年、后凉龙飞二年、西秦乞伏乾归太初十年(397 年)正月,吕光因乞伏乾归数度叛离,决定派兵消灭他。乞伏乾归的部将都劝其逃走,但乞伏乾归却认为:“军之胜败,在于巧拙,不在众寡。光兵虽众而无法,其弟延勇而无谋,不足惮也。且其精兵尽在延所,延败,光自走矣。”吕光率军进至长最(今甘肃永登南)。太原公吕纂等率步骑兵 3 万进攻金城(今甘肃兰州西),乾归率军 2 万前往救援,尚未赶到,金城已被凉军占领。吕光又派其部将梁恭等率甲士 100 多人,出阳武下峡(今甘肃靖远境),与秦州刺史没弈干向西秦的东部地区进攻;同时命天水公中延率炮罕之众攻取了临洮(今甘肃岷县)、武始(今甘肃临洮)、河关等地。乞伏乾归作战不利,便命人反间吕延,伪称“乾归众溃,奔成纪(今甘肃通渭东北)”。吕延信以为真,欲率轻骑直追。司马耿稚劝阻说:“乾归勇略过人,不会望风而溃,以前,他战败王广、杨定都是诡称自己兵败。这次传达消息的人,脸色不定,难免有诈。应率全军一齐

推进，步骑相接，待全军到达，再行攻击，必然成功。”吕延不听劝阻，率轻骑而进，乾归迎击吕延，将其斩首。凉军战败，司马耿稚和将军姜显率军退回枹罕。吕光见精锐吕延军败，也退军姑臧。

四月，张掖庐水胡人沮渠蒙逊以替其叔父报仇为名，起兵反凉，攻占了凉临松郡（今甘肃民乐西北），屯兵于金山。吕光令吕纂进剿，双方战于忽谷，蒙逊兵败，逃入山中。蒙逊的堂兄男成，为后凉将军，听到蒙逊起兵的消息也起兵响应，聚众数千人，屯于乐馆（在今甘肃酒泉东南）。酒泉太守垒澄讨伐男成，垒澄兵败身亡。男成与蒙逊共推建康郡（今甘肃酒泉东南）太守段业为大都督、凉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玺。段业遂以男成为辅国将军，以蒙逊为镇西将军。吕光为讨伐段业，令吕纂率军前往，未能战胜。八月，后凉散骑常侍、太常郭默见吕光年老多病，太子昏庸懦弱，太原公吕纂又十分凶暴，一旦吕光死去，朝中必定大乱，自己身居机要大臣多年，难免被害。于是，便联合仆射王详，推举田胡王乞基为君主，占据姑臧城东苑，起兵叛凉。凉王吕光急令太原公吕纂率兵讨伐。吕纂将行动之前，众将劝他说，公若东走，段业必然率兵跟在我们之后，伺机向我进击，不如偷偷离开这里。吕纂认为，段业没有雄才大略，只能依靠坚城防守。如果我们暗中离去，正好助长他的气焰，不如公开威吓他之后，堂堂正正而走。于是派使者告诉段业说：“郭默叛变。我现回姑臧，你如敢决一胜负，希早些出城作战。”段业果然未敢出兵。

吕纂返回，与西安太守石元良共同进击，将郭默军打败，进入姑臧。郭默在东苑俘获了吕光的8个孙子，为解其战败的

仇恨，将此 8 人杀死解尸，喝其血盟誓。此时，凉人张捷、宋生等聚众 3000，于休屠城（今甘肃武威北）起兵反凉，郭默遂与他们推后凉将军杨轨为盟主，共同叛凉。杨轨自称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不久，吕纂击败郭默将军王斐于城西，郭军兵势渐衰，便遣使向南凉王秃发乌孤求救。九月，乌孤令其弟骠骑将军利鹿孤率 5000 骑兵往救。至东晋隆安二年、后凉龙飞三年、南凉太初二年（398 年）二月，杨轨命其西平相郭纬率步骑兵 2 万，支援郭默军，秃发乌孤也命其弟车骑将军傉檀，率领骑兵 1 万协助杨轨。杨轨军进至姑臧城北，扎营以待，准备进攻姑臧。四月，吕纂率军攻击杨轨，郭默前来援助，吕纂兵败退回。此时，段业军则攻击了后凉的西郡（郡治在今甘肃永昌西北），于是，凉之晋昌（郡治在今甘肃安西东南）太安王德、敦煌太守孟敏，均举郡投降于段业。杨轨依恃自己人多势众，欲与吕光决战，六月，杨轨兵败，投奔了乞基，郭默听说杨轨败逃，也投奔了西秦。后凉将军吕弘，放弃张掖，率军东走，段业率部进入张掖，欲率军追击吕弘。沮渠蒙逊劝阻他说：“归师勿遏，穷寇勿追，此兵家之忌也！”段业不听，率军急追，结果大败而回。

后凉王吕光于东晋隆安三年（399 年）十二月死去，由其子吕绍即位，旋即为吕纂发动宫廷兵变所篡位，改年号为咸宁。不久，大司马吕弘又起兵反叛吕纂，被吕纂击败，处死。后凉内部的纷乱，进一步削弱了它的实力，引起了人民的怨恨。晋隆安四年（400 年）六月，吕纂率兵进攻张掖，姜纪劝阻无效，结果，被秃发傉檀率 1 万骑兵，乘机偷袭姑臧，幸亏陇西公吕纬率军死战，才保住了京师姑臧。隆安五年（401 年）二

月，吕超将吕纂刺杀，拥立吕隆为王。吕隆即位后，想以杀豪族树立自己的威望，朝廷内外人人不能自保。此时，魏安人焦朗派遣使者向后秦陇西公姚硕德建议说：“吕氏自吕光死后，兄弟互杀，朝纲混乱，暴虐无度，百姓饥困，死亡大半，应乘其互相篡权攻杀之时，向其进攻，必定成功。”姚硕德向后秦王姚兴奏请后，率领步骑兵 6 万，向后凉进击，乞伏乾归也率 7000 骑兵跟随出征。当年七月，姚硕德军从金城渡过黄河，直趋广武（今甘肃永登东南）。河西王利鹿孤将广武守军收缩于城内，以避秦军，秦军顺利进至姑臧。后凉王吕隆派辅国大将军吕超、龙骧将军吕邈等率军迎战。后凉军战败，吕邈被俘，1 万多人被后秦军斩杀，吕隆据城固守。凉巴西公吕佗率领东苑兵众 2.5 万人向后秦投降。九月，吕隆派使者向姚硕德投降，后秦主命其为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建康公。不久，吕隆又重整军备，与南凉秃发傉檀和北凉的沮渠蒙逊互相攻杀。吕隆心中恐惧，怕被他们消灭，于是，便于东晋安帝元兴二年、后秦弘始五年（403 年）八月，向后秦左仆射齐难等投降，齐难将吕隆及百官送往长安，后凉宣告灭亡。姚兴灭后凉，得鸠摩罗什，于是后秦境内佛教大兴。

十二、南凉、北凉、西凉

南凉——397 年，河西鲜卑酋长秃发乌孤占金城（甘肃皋兰县西北），自称西平王，黄河南鲜卑十二部大人都来归附。传至秃发傉檀，414 年，被乞伏炽磐攻灭。

北凉——沮渠蒙逊，匈奴族酋长。401 年，沮渠蒙逊杀吕

光叛将段业，占领张掖，自称张掖公。412年，占姑臧，自称河西王。414年，听说刘裕将北伐，沮渠蒙逊害怕，派人到东晋称臣。刘裕灭姚泓，沮渠蒙逊更害怕，一个属官刘祥有事进见，沮渠蒙逊说，你听到刘裕入关，态度就和从前不一样了，立即把刘祥杀死。他深怕汉族人李氏建立的西凉国，因此专力对付西凉，420年，灭西凉。沮渠蒙逊占有西凉七郡，交通西域诸国，财物丰富，战争较少，在境内大兴佛教。沮渠蒙逊在姑臧南百里山崖中（今武威天梯山），大造佛像，千变万化，使人惊异。西域来了一个僧人昙无讖，在姑臧译出《大般涅槃经》等十几部大乘经典，对佛学有重要贡献。他自称有役使鬼神医治百病及多生儿子的秘术，沮渠蒙逊使女儿、媳妇到昙无讖处学男女交接术，淫风盛行，号昙无讖为圣人。魏太武帝拓跋焘，听说沮渠蒙逊得到这个圣人，派使人来强索，说是要和他讲道，如果不送出昙无讖，就动兵来讨伐。沮渠蒙逊坚决拒绝拓跋焘的要求，并且杀死昙无讖。432年，沮渠蒙逊死，子沮渠茂虔继位。439年，魏灭北凉。

西凉——凉州大姓李暠，400年，据敦煌，自称凉公。405年，迁都酒泉，想号召汉族人推倒沮渠蒙逊的统治。417年，李暠死，子李暠继位。420年，沮渠蒙逊灭西凉。

自304年匈奴刘渊起兵，至439年魏灭北凉，前后凡136年。在这个长时期里，黄河流域遭受割据者的破坏是极其惨重的。大抵汉族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黄河下游地区，战争尤为剧烈。关中在苻坚姚兴统治时期，居民多少得到喘息的机会，比下游地区总算好了一些。凉州自前凉以来是战争最少的地区，汉族的经济文化都还能保持旧状；吕光通西域后，西方的佛教

和文化东流，先在比较安定的凉州停留，再由凉州流向内地，因之凉州在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北部的重要文化区，对北魏的文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十三、西秦、夏

西秦——385年，陇西鲜卑酋长乞伏国仁聚集鲜卑部落10余万人，据陇西，自称大单于。388年，乞伏国仁死，弟乞伏乾归继位。400年，乞伏乾归战败，投降后秦作附属国。409年，乞伏乾归自称秦王，都苑川（甘肃靖远县西南）。乞伏乾归死，子乞伏炽磐继位。414年，灭南凉。428年，乞伏炽磐死，子乞伏暮末继位。西秦几个国王都是十分好战的人，连年与羌人、匈奴人、吐谷浑（青海游牧人，酋长是鲜卑慕窗口部贵族）人混战，西北地区化为炽烈的战场。431年，乞伏暮末战败，为夏所灭。

夏——赫连勃勃是匈奴族酋长，初为姚兴部属，407年，自称大夏天王。赫连勃勃是一个极端残暴的人，他把人民看作草芥，任意虐杀，对他的臣下，也随手惨杀。他搜罗一些汉族士人来助虐，因之战斗常获胜利，成为强国。413年，赫连勃勃发民众10余万户筑统万城（陕西横山县西）作为国都。城基厚30步，高6丈余。筑城的土都经过蒸熟，筑成后用铁锥刺土，刺进一寸，便杀筑者，残忍刻暴民不堪命。城中宫墙厚3丈余，也用蒸熟土筑成，坚硬可以磨刀斧。宫中楼台高大，殿阁宏伟，装饰土木，极其侈丽。赫连勃勃杀民工和匠人至少有数千人。

文士胡义周作《统万城铭》，歌颂赫连勃勃的功德，说是“庶民子来，不日而成”。胡义周一类士人的心，和赫连勃勃同样是一颗兽心，人民遭受无限的灾祸，在他们看来，却是应该歌颂的功德。

刘裕灭后秦，算是立了大功，留 12 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自己赶忙回建康去夺东晋的帝位，关中的得失对刘裕是无足重轻的。赫连勃勃和他的军师王买德看中了这一点，418 年，率大军进攻长安。刘裕留下的将帅互相残杀，沈田子杀王镇恶，王修杀沈田子，刘义真杀王修。这些将帅杀完以后，刘义真纵将士大抢掠，载着夺得的财物妇女，逃向潼关。车子太多了，一天只走 10 里路。赫连勃勃率军追击，刘义真军全部覆没，刘义真逃归江南。赫连勃勃杀死刘义真军无数，积人头成大堆，称为髑髅台。长安居民以及刘裕军兵卒的损害和死亡是严重的，但是，刘裕只要自己做成了皇帝，别人的损害和死亡，根本都是些度外之事，不负丝毫的责任。

赫连勃勃取得长安，自称皇帝。425 年，赫连勃勃死，子赫连昌继位。426 年，魏攻夏，入统万，取长安。427 年，魏取统万。赫连昌逃到上邽城（甘肃天水县西南）。428 年，魏俘获赫连昌。赫连定据平凉，击败魏军。赫连定与魏连年战争。431 年，赫连定灭西秦，掳秦民十余万口，想逃到河西去，渡河时被魏属国吐谷浑击灭。

第三节 北魏的汉化改革

一、北魏的建立

沙漠汗之死

当南方东晋被南朝的刘宋取代时，北方五胡十六国的长期纷争也渐趋尾声。这纷争历史的最后胜利者是刚刚从原始社会走出来的鲜卑拓跋部。他们以其悍勇成为北方统一山河的新主人，建立起魏王朝，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史称北魏，亦称后魏、拓跋魏、元魏。

北魏（386—534）历时一个半世纪。它统一北方在公元439年，即北朝的开始。

鲜卑人的先民被称作东胡人。秦末汉初之际，曾被冒顿单于率领的匈奴骑兵打得大败。东胡人的一部逃入乌桓山，被称为乌桓人；一部逃入鲜卑山，遂被称为鲜卑人。

300年过去了，蒙古大漠南北的匈奴人先后南移西迁，鲜卑人遂历经“九难八阻”，走出高山深谷，游牧于蒙古大草原。鲜卑人主要分为宇文部、慕容部、拓跋部、秃发部、乞伏部。在长城以外从东到西分布着。

三国时，拓跋部一个叫力微的人做了大酋长，与曹魏往来

问聘，并送儿子沙漠汗作质子长住洛阳。西晋初，沙漠汗告别洛阳回国，力微派各部酋长入塞到阴馆（今山西代县西北）去迎接。沙漠汗在洛阳居住日久，言谈风采，服饰打扮，已同汉人差不多，这就引起酋长们的猜忌。酒宴间，沙漠汗抬头忽见头上有飞鸟，遂引弓发丸，鸟应弹而落。鲜卑域内本无此猎器，酋长们见了弹丸，以为沙漠汗得了晋人的奇术，大为震惊，遂相谋：“沙漠汗穿的是晋人的衣服，又学了晋人的奇术，他要继任做了大酋长，势必要改变祖宗的旧俗，那我们的日子可就不过了！”

原始氏族社会的旧俗同封建制度的新风在拓跋部第一次发生了冲突。这次冲突中，新风的力量是微弱的，传统的旧势力却是强大而可怕的。酋长们联名去同力微商议，力微也担心儿子的到来会破坏古老的风尚。这样，沙漠汗未曾回到久别的故乡，就被杀害在途中了。

沙漠汗是拓跋部新旧势力角斗中的第一个牺牲者。

道武帝拓跋珪

383年，淝水之战后，前秦土崩瓦解。

386年，拓跋部乘机复国，拓跋珪被各部酋长拥戴，称代王。同年，改称魏，历史上称为北魏。拓跋珪，字涉圭，是什翼犍的嫡孙，历史上叫做魏道武帝。

拓跋部复国之后，拓跋珪团结内部，打败铁弗部的刘卫辰部（后来刘卫辰的儿子赫连勃勃在现在陕西建立了夏），成为塞上强大的政权。

这个充满活力的政权，当后燕向它索取名马、拘留它派往

中山的使臣的时候，就和后燕断绝了和好。

395年，后燕皇帝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宝统兵8万，进攻北魏。这一年七月，后燕军队到达五原。拓跋珪带着部众、畜产，退到黄河以南现在河套一带。后燕出兵3个多月，找不到北魏的主力。凉秋九月，慕容宝还徘徊在黄河的北岸。

十月下旬，慕容宝烧掉渡河的船只，准备退兵。河上还只有薄冰，慕容宝满以为退兵之后，北魏军一时过不了黄河，沿河没有设一个斥候。十一月初，天气陡然寒冷，接连几夜北风，千里冰封了。拓跋珪带了2万轻骑渡过了黄河，日夜追赶，到达参合陂（现在山西大同市东）西，后燕军正在东面不远的地方过夜。一点也没有觉察追兵已在近边的后燕军，正准备继续东行。北魏的兵马闪烁在朝阳灿烂的群山中。一夜之间，拓跋珪所率领的轻骑和原来被派去截断后燕归路的人马，已经把后燕军队紧紧包围了。慕容宝抛弃大军，轻骑逃走。后燕军四五万人，放下武器之后全部被活埋了。

参合陂之战是一次具有决定性的战争，后燕的有生力量被消灭，北方的统一，南北朝对立的形势，在这一战之后，基本形成了。

北魏乘战胜之威，在396年的秋天，攻占后燕的并州（现在山西太原市西南）同年，从井陘（现在河北井陘县）进入河北，围攻后燕的都城中山。一年后，中山被占领，后燕的残余力量，分别退向龙城（现在辽宁朝阳县）和广固。

398年，北魏定都平城（现在山西大同市），在这之前，还没有固定的都城。

从拓跋部迁到匈奴旧地，到拓跋珪时，已经快300年了。

原来只知道逐水草、过游牧生活的鲜卑人，在什翼犍时，开始有了农业。394年，拓跋珪派他的堂兄弟东平公拓跋仪带了一部分鲜卑人在现在河套地方“屯田”，农业收成一开始就很好，种地的人分得的粮食，比过去畜牧的利益丰厚，大家都很高兴。灭了后燕，又从汉族居住地区迁来几十万汉族和其他各族人，在平城附近“计口授田”，分给他们土地和耕牛，强迫他们从事农业劳动。平城附近，被划为“王畿”。王畿之外，又有所谓“方”、“维”，由皇帝直接派遣官员管理。四个“方”，四个“维”，合起来称“八国”。管理这些地方的官员叫做“八部大夫”或“八部帅”。原来的游牧为业的鲜卑人，在“方”、“维”定居下来；原来的“部大人”，为皇帝任命的官员所代替了。这些官员不同于原来的部大人，主要任务是监督和劝课农耕。朝廷按照各地收入的多少，来考核官员的政绩。对拓跋部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这个进步，从力微时开始，到拓跋珪手里，便以行政命令固定下来了。

东起濡源（现在河北丰宁县），西到五原，东西1千多里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广阔的牧场，居民长期停滞在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这时，封建的生产关系，在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持下，有了发展。北魏这个年轻的政权，转过来，又从这里得到了物质力量的支持。

拓跋珪一登上历史舞台，就和他的前辈一样，为了统治汉族民众，从汉族士大夫那里寻找支持。汉族士大夫需要依靠拓跋氏政权，维护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也给予一定的支持。386年，张袞和许谦是两个被安置在显赫地位上的汉族士大夫。后燕进攻北魏时，向拓跋珪建议撤退到河南（现在河套

一带)去的是张袞;战胜了后燕,向拓跋珪建议攻打并州的是张恂。崔宏归附北魏之后,还把拓跋部的历史和汉族的历史联系起来,说黄帝最小的儿子昌意“受封北土”,是拓跋部的祖先,拓跋珪对此也表示赞同。有一次,拓跋珪问博士李先:“世界上什么东西可以增长见识和智慧?”李先说:“书籍。”拓跋珪便命令各地搜罗书籍,送到平城去。另一个博士公孙表,把韩非的著作介绍给他,告诉他怎样做一个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国家的皇帝。

但是,北魏在广大的汉族居住地区的民族压迫,不能不引起汉族人民的反抗。北魏初年,汉族士大夫出来做官,和北魏统治者虽然有阶级利益一致的一面,但他们多半是由于逼迫,连最有名的崔宏也不能例外。后燕灭亡,汉族居住地区河北一带,士大夫反对拓跋部的武装斗争,399年一年中便有三起。汉族人民反对压迫的斗争,前一年也已经在博陵(现在河北安平)、勃海(现在河北南皮)、章武(现在河北大城县)这些地方发生了。

随着封建化的发展,统治阶层中鲜卑贵族和皇帝之间,也不断发生冲突。一件新事物的出现,总要遇到许多阻碍,受到旧势力顽固的抵抗。拓跋部的守旧势力,过去不能容忍一个新的国王,现在也不能容忍一个封建主义的皇帝。因此,贵族中一些人,遇有机会,便觊觎皇帝这个宝座。396年,拓跋珪围攻中山,国内传言他在柏肆坞(现在河北蒿县北30里)打了败仗,他的堂兄弟拓跋顺便在云中阴谋起兵,夺取政权;贺兰部留在阴馆的贵族也乘机反叛。拓跋珪在400年下了两道诏书,一道说:“人们认为汉高祖以平民而有天下,是不对的。汉高祖

做皇帝,是由于天命;没有天命,谁妄图非分,谁就要遭殃。”另一道诏书反复说明:名爵是末,道义是本,不可本末倒置;诚谕群臣讲道义,不要贪名争位。从这一年起,贵族因反对他被处死的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堂兄弟拓跋遵和拓跋仪。这两个人过去都有战功,拓跋仪确实想造反,阴谋暴露之后,因为功大没有办罪,后来私自出走才赐死。皇帝和贵族的冲突无法解决,使这个为北魏奠定基业的第一个皇帝精神失常。到409年,他就被儿子拓跋绍杀死了,活了39岁。

拓跋绍走了他的前辈杀父的老路,拓跋珪也和他的前辈——拓跋部著名的大酋长猗卢、第一个国王什翼犍一样,死在新旧斗争的血泊里。但这时候,公开支持拓跋绍的人很少了,当拓跋珪的太子拓跋嗣一回到平城,北魏宫廷内的风波便平息了。

北魏统一北方

409年,拓跋嗣杀死拓跋绍,做了北魏的皇帝,历史上称魏明元帝。423年,拓跋嗣死去,年32岁。这一年,他的16岁的儿子拓跋焘继承了帝位。

拓跋焘,字佛狸,是北魏杰出的君主,历史上称魏太武帝。从拓跋嗣做皇帝到拓跋焘统一北方,恰好30年。

409年,北方还分裂为许多割据政权。和北魏接壤的有北燕、北凉、后秦、南燕和夏等,北魏的北面还有一个正在强大起来的柔然。夏和柔然,是北魏的两个劲敌。

415年,平城附近连年霜旱,不少人饿死。有人主张迁都邺城(现在河南安阳市北)。当时,谋士崔浩对魏明元帝讲了很

多不能迁都的道理，重要的一个理由，便是迁都之后，平城的防守力量弱了，夏和柔然必然乘机进犯。417年，刘裕攻打后秦，后秦向北魏求救。北魏讨论了这件事，崔浩又以为要防备柔然进犯，不可出兵。刘裕打进了长安，拓跋嗣打算派一支精锐骑兵，直捣彭城（现在江苏徐州市）和寿春（现在安徽寿县），又向崔浩问计。崔浩对他分析了当时形势，以为“西有屈丐（即夏，屈丐的意思是卑下，北魏称赫连氏为屈丐以示侮辱），北有柔然”，出师对北魏不利。崔浩当时谋略无双，担心的就是夏和柔然，可见他们对北魏的威胁是很大的。

柔然是鲜卑的一支，又叫蠕蠕或叫芮芮，长期游牧在拓跋部的北边，冬天从漠北迁向漠南，夏天又回到漠北，每年向拓跋部贡献“马畜貂豹皮”。拓跋珪攻打过柔然，把这个部落迁到了云中。394年，柔然首领社仑逃走。402年，社仑征服高车诸部，雄踞漠北，自称豆伐可汗，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游牧政权，东到朝鲜故地之西，西到焉耆（现在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北到贝加尔湖，南面和北魏隔着一片广大的牧地，时常攻掠北魏的边境。但这时，柔然还很落后，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军事行政的联合体。

拓跋嗣即位不久，柔然侵犯北魏边境。410年，北魏大将长孙嵩被柔然围在牛川（现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拓跋嗣亲自出征，社仑才率众退走。423年，南朝的刘宋和北魏交战，正在争夺河南，柔然又进犯北魏边境。拓跋嗣从赤城（现在河北赤城县）到五原筑了一道长城，设了一些镇戍，防止柔然南下，拱卫平城。这时，北魏对柔然还是处于防御的地位。

魏太武帝拓跋焘主动出击柔然，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

429年。这一年，柔然被打败，原来臣服于它的一些高车部落乘机摆脱了羁绊，被北魏降服的柔然有30多万家，掳获的马牛羊达到几百万头，敕勒（高车部）也有几十万人向北魏投降。这些降附的部落被魏太武帝迁到漠南几千里的边境上，在军事镇压下，从事农耕和畜牧。另一部分柔然人，往漠北退走，遇有机会，便象一阵风暴，袭击北魏的北方边境。

夏是匈奴族铁弗部建立的政权。夏的皇帝赫连勃勃的父亲刘卫辰，是拓跋珪打败了铁弗部，刘卫辰死后，勃勃就逃到后秦依靠姚兴。勃勃弃去原来的姓——铁弗，改姓赫连。407年，勃勃脱离后秦独立，称大夏天王；418年，赶走刘裕留驻在长安的军队，占有关中（现在陕甘地区），自称皇帝。魏太武帝即位的第二年（425年），赫连勃勃死去，夏发生内乱。426年，魏太武帝分两路攻夏，一路攻长安，一路攻统万（夏的都城，现在陕西榆林县西南）。这一年，攻下长安，第二年，攻下统万。

统万城高6丈多，城上宽10步，城基宽30步，城里宫城3丈多高。城是特制过的土筑的，坚硬得和石头一般。宫城内建筑壮丽，有高大的殿阁和楼台，雕镂得穷极工巧。筑这座城，征发了10多万民工。魏军进入统万，魏太武帝对左右说：“小小国家，滥用民力到这种地步，怎能不灭亡啊！”

攻下统万以后4年多，夏的残余势力才最后被消灭。

灭夏不久，割据辽东、辽西（现在辽宁）的北燕和割据河西（现在甘肃）的北凉也先后被北魏打败，灭亡了。

西晋之末，中原不少学者到凉州避难，从此以后，凉州成为汉族文化在西北的一个中心。北魏灭北凉，居住在凉州的汉

族士人，不少到北魏都城平城去做官，或者当教授。索敞、常爽是当时最有名的两位教授。常爽有学生 700 人。索敞的学生，有几十人担任了北魏的重要官职。凉州士人，对于北魏的“文治”，作出了贡献。

魏太武帝是结束中国北方长期分裂局面的重要人物。这个人的特点是果断、镇定，善于用兵。424 年，和柔然交战，他在云中包围，围骑多至 50 重，还神色自若。进攻统万，值大风雨，飞沙扑面，有人劝他暂时退兵，他却乘风雨飞沙，转到敌军侧面，奋勇进击，取得胜利。他又很得军心，作战时，亲犯矢石，将士为他出死力。

二、北魏的汉化改革

北魏的“班禄”

北魏在孝文帝时，在政治经济方面，实行了几项重要的改革，“班禄”（给百官俸禄）是其中的一项。这是拓跋部封建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

北魏建立以来，对文武百官，不给俸禄，484 年，开始“班禄”。俸禄中，有米，有田，有布帛，有力役。“班禄”之后，这些东西，按照官品大小，定出差等，分给了百官。北魏的力役，有的叫“吏”，有的叫“干”。“吏”和“干”，身分与农奴相似，替官员当差，或在“公田”上劳动，把收获物的大部分交给官员。

这个制度的实行，在北魏，是经过一番曲折的。

鲜卑拓跋部本来是个野蛮的好战集团，一走上历史舞台，

便以战争掳掠为业。鲜卑将士，在战争中大肆掳掠，牛羊、珍宝、人口都成了掳掠的对象。北魏皇帝也常把战争中的俘虏赏赐给群臣。

对于进入文明不久的鲜卑人来说，掳掠是完全正当的，也是合法的。

征服战争结束了，鲜卑拓跋部统治了广大的经济文化较先进地区。北魏皇帝用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姓（即坞壁主、帅）做州刺史和郡太守。一州 3 个刺史，2 个鲜卑贵族，1 个汉族地主。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狼狈为奸，战时的掳掠方式，便以平时贪污的形式继续下去。汉族封建的俸禄制，当时对于鲜卑人来说，还是格格不入的。

有一个叫崔宽的人，在陕城（现在河南陕县）当镇将，和地方豪强打得火热，从他们手里接受“礼物”（即贿赂），又利用这个地方和南边贸易往来的便利，大做买卖，几年中，发了大财。当他任满回平城时，豪强上书皇帝，对他表示依恋。皇帝也称赞他善于“抚纳”。和崔宽打得火热的人们，就是这个地方的坞壁主、帅，或者说是汉族大姓。

这是孝文帝改革以前不久的事。在北魏统治者看来，崔宽是不能算作贪污的。第一，他所接受的“礼物”，是由于送礼者的自愿；第二，崔宽在陕城并没短欠政府的收入。用当时的话来说，至多只能说是“义赃”，义的意思就是自愿。文武百官，“盗没军资，所在掳掠”，损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或者串通富商大贾，乘老百姓交纳租赋，放高得贷，买贱卖贵，损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或者自己发了财，政府的赋税却收不足，损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才算是“赃”，算是枉法，算是贪污。

战时的掳掠，遭到了各族人民的反抗；平时的贪污，加深了北魏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北魏的政治危机和财政困难。

远在魏太武帝时，便开始了对贪污的惩罚。426年，太武帝去东方视察，这个地区的守宰，因贪污免去官职的有10多名。447年，鲜卑贵族拓跋处真等8人在镇压盖吴起义时，“盗没军资，所在掳掠，赃各千万计”。也判了死刑。

但是，贪污的地方官免不尽，掳掠的将领杀不完，人民反抗的浪潮，却一个连着一个。454年，郑县（现在河北任丘县北）人民起义，文成帝亲自去镇压，15岁以上的男子全被惨杀，15岁以下的男子被罚作“生口”。过了6年，邻近郑县的深泽（现在河北深泽县东南）、束州（现在河北河间县东北）两县的人民，又愤怒地把县令杀死。

461年，文成帝被迫下令禁止贪污，规定犯赃绢10匹以上的处死刑。文成帝的儿子献文帝拓跋弘在位，更进一步规定：受羊1头，酒1斛的处死。有一个叫张白泽的人对献文帝说：“你这样不行啊！接受一头羊，一斛酒，便办死罪，谁还能和你共治天下呢？最好的办法是模仿过去的制度，实行‘班禄’，给了俸禄，还贪污，再办罪不迟。”献文帝认为张白泽的话有道理，停止了羊酒之罚，但“班禄”的事还不能实行。

478年献文帝的儿子孝文帝在诏书中说：“各州刺史，只图私利，不顾国家，为非作歹，闹得‘盗贼并兴’。”对这些刺史责骂了一番之后，又用转趋和缓的语气向他们呼吁，要他们出主意，使他既对得起祖宗，又使百姓“感恩”，平息人民群众反抗贪污政治的浪潮，保持鲜卑贵族的统治。

6年之后,484年,“班禄”便成为北魏改革的前奏。

鲜卑贵族内部,像对待其他各项改革一样,因为“班禄”,形成了一个反对派。这是一个保守派。

这一派的领袖,是鲜卑大贵族淮南王拓跋它。他请求皇帝依旧“断禄”(停止给百官俸禄)。这一派人,坚持鲜卑贵族的利益,要求保持拓跋部野蛮掠夺的遗风。北魏皇帝让大臣们公开辩论。高间说:“不给俸禄,贪财好利之徒,可以为非作歹;清白自守的人,连生活也不能维持!”高间是“班禄”派的代表。

北魏皇帝在剧烈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对贪污不得不实行禁止、惩罚;又是因为这样,才被迫“班禄”,实行汉化。

俸禄制实行后,规定犯赃绢1匹以上的处死刑,“枉法”的不论多少,一律处死。

484年六月,正式“班禄”后,这一年九月,刺史以下官吏,因犯赃被发觉,有40多个人办了死罪。其中,有一个叫李洪之的,因贪污从任上押到平城,孝文帝亲自审问了以后赐死。这个人的来头不小,人们都知道他是献文帝的舅舅,孝文帝的舅公,是显宦,又是贵戚;虽然在他死了以后,孝文帝向一些大臣泄露,说这个舅公是冒牌的。

“三长制”

“三长制”是北魏一项重要的改革,正式实行,可能是在485年,比“均田制”早一些。

“三长制”实行之前,北魏地方基层政权,掌握在宗主手里。宗主的前身,就是坞壁主。北魏和坞壁主合作,已经很多年了。坞壁主的代表,有的担任朝廷官职,有的当了地方的守、

令。一般坞壁主，得到“宗主督护”这一官职做护身符，用“过主”的名义，“督护”地方，替朝廷征收租赋，和朝廷分享剥削人民的权利。

在“宗主督护”的情况下，1户往往包括三五十家，户主（即宗主）向朝廷交纳租调，计租粟20石，调帛2匹、絮2斤，丝1斤，调外帛1匹零2丈，这叫做“常赋”。常赋之外，还有“杂调”。杂调大概包括了各种劳役。北魏在“班禄”之后，每户又增加粟2石，帛3匹多。如果三五十家平均负担这些租调，并不算重。但实际上这些负担却沉重地落在劳动人民的身上。有钱有势的人家“兼并有余”，一般老百姓“糊口不足”。一些依附于豪强的荫户，境遇更为悲惨。

“宗主督护”使汉族豪强和鲜卑贵族得到了政治上的相安，但是朝廷收入却因此受到影响，阶级矛盾也不断激化。“人困于下，官损于上”，正是这一情况的写照。

当北魏在经济上越来越依靠对汉族居住地区的剥削时，一场和豪强争夺民户的斗争，便不可避免了。

十六国时期，鲜卑慕容部统治者内部争夺民户，十分剧烈。前燕快要灭亡，把贵族占有的户口20多万收为朝廷的编户，闹得满城风雨。后来，后燕和南燕也这样做了。南燕清查荫户，还调兵遣将，如临大敌。

北魏皇帝和贵族豪强争夺民户，没有走他的前辈采取武力的老路。他是以古为法来改编户口的，用汉族传统的什伍组织，代替了“过主督护”这一鲜卑旧俗。

“三长制”规定：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大户分成了小家，“三长”也直属于州

郡。过去半属于朝廷和不属于朝廷的户，现在都成了朝廷的编户。宗主的权力被削弱了。三长的职责是检查户口，征发徭役和兵役。对整个地主阶级来说，三长制是一种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更有效的机器。

但是宗主仍然保持特殊的地位。他们被选任当了“三长”，免去了征戍的负担，家属中也有 1 至 3 人受到了同样的优待。

过去以户为单位的赋役制，改成了以“家”为单位。一夫一妇算作一家，每年向国家交粟 2 石，布或帛 1 匹。没有成亲的男子，四个人相当于一夫一妇的负担。占有奴婢和耕牛的人家，奴婢 8 人或耕牛 20 头，交一夫一妇的粟和布。在这里，豪强也受到了照顾与优待。

在实行“三长制”的时候，北魏朝廷有过不同的意见。坚持宗主利益的郑羲，认为这个办法看来很好，却不一定行得通。他对皇帝说：“你不相信，试行一下，失败了，才知道我的看法不错。”郑羲是中原有数的豪门，做西兖州刺史时，天天有人送贿赂上门，“礼物”从西门进来，便在东门卖去。送“礼”来的人，连一口酒肉也捞不到。朝臣中，大部分人都赞同郑羲的意见。这是反对派。

鲜卑大贵族拓跋丕，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实行起来对公私都有利。不少人认为这个办法好是好，但农忙时节，派人下去清查户口，恐怕老百姓要骚动，影响农事，不如等到冬天，农闲了再说。向皇帝建议颁行“三长制”的李冲，认为要改，趁农忙时最好，老百姓知道改革对他们有利，改起来容易得多。李冲家在陇西（现在甘肃），陇西自西晋以来，是中原土族避难的地方，保持了汉族的文化传统。李冲一家，世代相传的是汉魏（曹

魏)以来的旧学,汉族封建的旧制,在他脑子里生了根。这样,“三长制”便成为他主张以古为法,革去“宗主督护”的蓝图。

孝文帝的祖母文明太后主持这场辩论。她作结论说:“实行这个办法,有两大好处:一是征收租赋有根据、有准则;二是隐匿的户口可以查出来,企图侥幸的人侥幸不了!有什么不可以实行的呢!”

北魏朝廷从财政收入着眼,从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着眼,坚决地实行了这一项改革。实行之后,政府的收入果然增加了。

在北魏广阔的土地上,出现了一批新的独立的农户。比起过去的荫户来,这些人有了多一些的自由,多一些的独立经济。社会生产也因而有了一些恢复和发展。但北魏的坞壁势力依然存在,“三长”在政治上也依然是宗主的代理人。这一切污秽,还要等农民战争来扫荡。

“均田制”

北魏实行“三长制”,清查了荫户,改编了户籍,规定了新的赋役制。接着,便行“均田”。“均田令”的公布,是在485年的冬天,“三长制”实行之后。

“均田”实行之前,北魏土地占有的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是朝廷所有的土地。这种土地,集中在畿内和近畿之地。这些地方,是拓跋部游牧的故乡,后来扩大了,成为北魏的根本。这些土地上,有牧场,有农田;从事畜牧和耕种的,是被征服的各族人民,称作“新民”的牧奴和农奴。在中原,由于战乱,留下了大量的无主荒地。这些荒地,在名义上,也是为朝

廷所有的。

第二，是贵族、僧侣和地主占有的土地。汉魏（曹魏）以来的大土地占有制，经过十六国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贵族、大地主的土地上耕种的，有佃客、部曲和奴婢。在寺院土地上劳动的，有类似农奴的“僧祇户”，相当于奴隶的“佛图户”，还有比这两种人的身分高一些的“沙弥”。

第三，是自耕农的私有土地。自耕农一般是独立的劳动者，但由于赋役的沉重负担，经常失去土地，成为“望绝一廛”（得不到一块耕地）的流浪者，或者依附于坞壁和寺院，沦为依附农民。

十六国时期，中原的生产，受到极大的破坏。北魏统一之后，生产有了恢复。但鲜卑贵族和汉族坞壁主残酷的掠夺和压迫，生产继续受到阻碍和破坏，“良畴（田）委（被抛弃）而不开（耕种），柔桑枯而不采”，正是这一情况的写照。

北魏结束了征服战争，经济上依赖中原地区谷、帛的支持。中原地区自耕农的破产、流散，日益紧张的阶级斗争，加深了北魏的政治危机。坞壁主继续扩大对荫户的占有，使朝廷收入受到影响。由争夺民户而带来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紧张状态，也使得北魏的统治者不能不去寻求医国的药方。

强大的政权和中原大量存在的荒地，为北魏皇帝提供了改革的主观力量与客观条件。政府和豪强争夺民户，构成了改革的中心内容。

“三长制”的实行，不少荫户从豪强控制下转入了政府之手；政府便分给他们荒地，让他们在土地上固定下来，以保证赋役的收入。

“均田制”规定：15 岁以上的男子和妇女开始向政府“受田”（领种土地），到了不能劳动或者身死时，把土地还给政府。奴婢和一般老百姓同样“受田”，耕牛也“受田”。一户之内，奴婢“受田”不限人数，有多少奴婢，按规定受多少田，耕牛却不能超过四头。

田有两种：一种叫露田，一种叫桑田。

露田本来是无主的荒地，规定不能种桑、榆、枣等果木，按规定领种，按规定还给政府，不能买卖。男子一人领种 40 亩，妇女 20 亩，奴婢同样。耕牛一头则为 30 亩，占有奴婢和耕牛的人家，因为出卖或者死亡失去了对奴婢和耕牛占有的权力，领种的田地要交还。

桑田是已经种了或者允许种桑、榆、枣等果木的土地。对于桑田，令文中规定得很细致。一则说，桑田“不在还受之限”，只领种，不必还给政府。再则说，所有桑田都是“世业”，可以世代传下去。一户之内，按规定应有一定数目的桑田，自有的土地达到了这个数目，政府便不再给；不足的，由政府补足。一户之内，桑田有余，可以出卖；不足，可以买进。

男子一人，领种桑田 20 亩，奴隶同样。桑田不论是人们原有的，或是新从政府领种的，都是私产，在一定限度内，可以买卖。奴隶领种的桑田，当然也就成为奴隶占有的私产了。

此外，还有一些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倍田”的规定。所谓倍田，即加倍或 3 倍给予土地，领种露田 40 亩，人 80 亩或 120 亩，理由是因为土地要休耕，两年轮种或三年轮种一次。而这，恰恰方便了地主保持原有土地。所有桑田，按照规定都算到倍田中去，不足倍田之数，才用露田来补足。适宜于

种麻的地方，男子还可领种麻田 10 亩，妇女 5 亩。奴婢也可以照样领种。麻田是要交还的，不能成为“世业。”

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被保存下来了，占有奴婢的人，不但合法地占有了原有的土地，还可以合法地以桑田的名义占有政府的荒地，以露田的名义使用荒地。但豪强兼并有了限制。对于那些荫户和流浪者，“均田制”的实行，为他们提供了自立门户的条件。

在中世纪，封建剥削主要是通过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虽然保存自己的土地，但他是作为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必须为土地占有者劳动或缴纳产品。“均田制”实行之后，“望绝一廛”的农民，便以和过去不同的一种形式被束缚在土地上，向政府缴纳产品了。

在这一点上，北魏皇帝做到了在他以前将近 300 年来所有统治者所没有做到的事。

520 年，北魏户口，比西晋全盛时期的太康（晋武帝年号。太康元年，西晋统一全国）年间，增加了一倍。超过 500 万户。这时，北魏南边的边境，还不过淮南。这不仅说明了百余年来北方经济因统一而逐渐有了恢复和发展，人口增加了；也标志着—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重新获得了力量，皇帝对地方割据的势力，采取了有效的裁抑措施。“均田制”是这些措施重要的组成部分。

北魏末年长期战乱，地方豪强又乘机鱼肉人民，称王称霸。“均田制”名义上仍为北魏继承者——东魏和北齐、西魏和北周——所遵行。但是在东部，“富者连畛亘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均田制”已名存实亡；西部的情况不同，北周在这个基础

上,重新恢复了中断的北方统一。

“均田制”直到唐朝由全盛走向没落才失去它的作用,成为历史的陈物。

孝文帝迁都与“文治”

魏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杰出的君主。他5岁做了皇帝,国家大事,决定于他的祖母文明太后。文明太后是一个有才略的政治家,在献文帝时,便掌握大权,前后当政25年。5世纪80年代,她排除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地主的阻挠,进行了巨大的改革。孝文帝在她影响下,深受汉族封建文化的熏陶,从经史百家中学习了汉族封建统治的经验。

490年,太后死了,孝文帝按照儒家经典的规定,守孝服丧,开始不进饮食,后来勉强吃一点,但也吃得很少。鲜卑贵族劝他照祖宗老规矩办丧事,不要过哀。孝文帝却以为祖宗朝,南征北战,“重武略,不重文教”;言下之意,不愿墨守祖宗成规,要在“文治”上下功夫。他对祖母的“哀慕缠绵”,也许并不是由于悼念,而是激励生者继续进行汉化,为进一步搞好“文治”做个样子。

在政治上,孝文帝是文明太后的肖孙。这两个人的事业,都是在用汉化巩固北魏的统治,而孝文帝更把它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495年,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标志着这一新阶段的开始。

中原的富庶,一开始便吸引着这个新兴的塞上政权。北魏道武帝、明元帝都曾经有过把都城南迁的打算。但那时条件还不成熟,平城和所谓近畿之地是北魏政权的根本所在,夏和柔然时时威胁着它的西境和北境,而中原地区也还因鲜卑贵族

和汉族大地主之间的隔阂尚深，迁往中原，不能不使鲜卑统治者有所顾虑。

北方统一之后，实行“文治”的要求提上了议事日程。鲜卑统治者和汉族大地主的合作，随着岁月流逝而增强。北魏政权，也愈来愈依赖中原地区谷、帛的支持。原来出战士，输战马，征伐四方的中心——平城，担当不了“文治”的任务。迁都洛阳，便成为当日形势的要求了。

100年来，北方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北魏的对外关系，转而以和它敌对的南朝为中心。从政治上和南朝争取汉族士大夫，成了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429年，北魏讨论“行次”（五行的次序。照汉代学者的意见，其顺序为木火土金水），这是一次具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讨论。孝文帝采纳了李彪的建议，认为北魏继承西晋，西晋是金，魏当为水，魏是正统所在。要和南朝争正统，理所当然的不能再僻处平城，就要把都城迁到汉魏（曹魏）的故都洛阳去。

493年，王肃从江南逃奔北方，孝文帝在邺城接见他。王肃出身江南豪门，是南方士族的领袖，孝文帝对他十分器重，恨相见之晚。历史记载上说那时孝文帝“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凡威仪文物，多肃所定”。孝文帝继文明太后之后，力图改变鲜卑旧俗，不仅对象王肃那样的人物，恨相得之晚，和南方交战，也屡次释放俘虏，说“在君为君，其民何罪！”还禁止掠夺，宣布犯禁的处极刑。这是在和南朝打政治仗。这样，也就要把都城迁到洛阳去。

迁都洛阳，是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要求。但鲜卑贵族，大多数还没有这种认识，不赞成迁都。

493年，孝文帝不得以南伐为名，来达到迁都的目的。

这一年秋天，他率领步骑 30 万，到了洛阳。在洛阳，他参观西晋宫殿的遗址，象古代东周贵族经过镐京（西周故都，现在陕西西安市西南）宫阙那样伤心。但是，孝文帝并不是为西晋的灭亡而伤悼。

洛阳秋雨连绵。文武百官，对着惨淡的秋天，心情十分沉重。皇帝真的要南伐吗？他们当中，有知情的，也有不知情的。雨越下越大了。九月丙子这一天，孝文帝全副戎装，骑在马上，下令三军，往南进发。大臣都跪在马前，叩头谏止进军。孝文帝满面怒容，对着这些人说：“我要统一天下，你们这帮人却屡次阻挠大计。谁再说，就要办谁的罪！”说完，整一整马缰，仿佛就要出发了。一个叫拓跋休的鲜卑贵族，仍然跪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嗫嗫嚅嚅地仍在请求皇帝不要南进。孝文帝富于表情的脸，忽然换了另一种颜色，用另一种口气对群臣道：“这回出兵，费了不少事，用了许多钱，不可劳而无功。不南进，便迁都。你们赞成吗？赞成的立在左边，不赞成的立在右边。”

这一出戏演得很出色，大军在洛阳停下来了，迁都成了定局。在南伐和迁都这两件大事上，这些文武百官，暂时选择了迁都。因为南北双方，多次在战场上较量过，南伐的危险性很大，谁也不愿担风险。

任城王拓跋澄被派回平城去做说服工作。他原来也弄不清南伐的目的，和孝文帝有过激烈的争论，后来孝文帝私下告诉他：“平城只能用武，不适宜于文治。”他这才转过来支持迁都。拓跋澄动身回平城时，孝文帝着重地嘱咐他：“要好好干啊，革去旧俗的日子，已经到了！”

另一位大贵族于烈，被派回平城担任留守的重任。孝文帝

曾经问他：“你赞成迁都吗？”于烈说：“你的深谋远虑，我现在还不明白。我的内心，是一半乐迁（赞成），一半恋旧（不赞成）。”孝文帝认为这个人忠直，说：“你不唱反调就行啦！”

平城贵族知道要迁都，一时很是震动。拓跋澄回去后，百般晓喻，不安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494年，孝文帝又亲自回到平城去，召集文武百官，晓以迁都的利害。

北魏汉化，经过的时间很长久，道路很曲折，在鲜卑贵族中，始终存在一个反对派；落后保守的势力，始终阻碍汉化的进程。

孝文帝对反对派的工作，做得很细致，很认真；但反对派顽固到底，496年，终于掀起一场叛乱。鲜卑大贵族穆泰、陆叟，阴谋在平城建立一个和洛阳对抗的政权；孝文帝的太子拓跋恂，在反对派的怂恿下，密图从洛阳逃回平城去。武装叛乱被压平了，拓跋恂被废后终于赐死。

西晋灭亡以来，荒废了170多年的魏（曹魏）晋故都洛阳，成了北魏的新都。493年，孝文帝开始重建新都，到他的儿子宣武帝元恪手上才建设完成。

迁都之后，从平城迁到洛阳的人，叫做“代迁户”，总数约有100万人；其中，勇士15万被编成禁卫军（羽林、虎贲）。洛阳附近的河阳（现在河南孟县西），设了一个新牧场，养马10万匹。每年从河西选马到并州牧场，让马习惯内地水土，再迁到河阳来。一部分拓跋部人民以及北边其他各族人民，便在中原地区定居下来。迁都后，摆脱贵族传统保守势力的影响，北魏汉化的改革更广泛，更迅速了。495年，孝文帝下令禁止鲜卑服装，要求鲜卑人改穿汉服；禁止鲜卑话，改说河南洛阳话；“代迁户”都在洛阳落了籍，死后葬在北邙山（在洛阳的北面）。

有一次，孝文帝在洛阳街上，看见一个鲜卑妇女，坐在车中，作鲜卑打扮。后来，在朝见群臣时，便责备任城王拓跋澄，说他督察不严，奉行命令不力。拓跋澄为自己辩解，说只有少数人这样打扮；孝文帝尖锐地问道：“难道要全部这样打扮才算督察不严吗？你这样说，简直是‘一言丧邦’！”又转向史官说：“应该把这件事记载下来。”

496年，又命令改去鲜卑姓，他自己改姓元，其他改姓长孙、穆、奚、陆、贺、刘……；把鲜卑族的穆、陆等八姓定为国姓，和汉族大姓崔、卢、郑、王同等待遇，享受同样的政治特权。汉族大姓，叫做郡姓；郡姓之中，又分四等，最高的叫做甲姓。从此完全承袭了魏（曹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以贵袭贵，贱袭贱”，按门第高低来分配官职。但门第高低，皇帝可以左右，和南朝不同。这正如“三长制”和“均田制”的实行，代表中央集权力量的皇帝，在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中占了上风。

孝文帝又通过婚姻方式，来加强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姓的联系。他自己取四姓（崔、卢、郑、王）的女子入宫，又为他的5个弟弟娶汉族大姓的女子做正妻。范阳卢氏，一家娶了3位公主。政治利益进一步把鲜卑统治者和汉族豪门结在一起了。

“文治”构成了汉化的核心。北魏的国家机器，随着封建化的逐渐完成，也更为完备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为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历史规律。孝文帝和他的前辈什翼犍、道武帝、太武帝、文明太后一样，在鲜卑族汉化过程中，顺应了这一规律，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西晋以来，我国北方各族经历了一场社会经济文化的大变动，他们通过和平交往，也通过战争，逐渐接受了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以及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文化，形成了这一

时期我国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那些“代迁户”渐渐失去了旧有的联系，在新的地方取得了新的联系，学得了新的风俗和新的嗜好。残存至今的六世纪中叶的敦煌户籍，说明已成为均田户的匈奴、高车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状况，已经同当地汉人完全没有差别。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提倡鲜卑人学习汉族的文化知识。鲜卑贵族自认天资笨，学不来；他却强调重要的是学习与否。他自己学习很努力，亲自动手写诏令，作诗赋，和汉族文人学士相比，并无逊色。

499年，孝文帝在南伐的归途中病死，才33岁。

第四节 北魏同南朝的战争

一、北魏与刘宋之间的战争

北魏与刘宋争夺河南地区之战

拓跋珪建国后，经过与东胡、高东、匈奴、柔然等部族的多次作战，特别是在击败东方强国后燕之后，国势日趋强大。但是，国内仍时有叛乱发生，且西有强盛的后秦，北有柔然的不断进袭，尚不敢与东晋展开大规模的征战。晋安帝义熙元年、北魏天赐二年（405年）五月，东晋北青州刺史刘该反叛，以魏

国为后援，晋清河、阳平两郡太孙全聚众响应刘该。六月，魏乘机派豫州刺史索度真、大将斛斯兰进击徐州，围攻彭城（今江苏徐州）。晋刘裕命其弟南彭城内史刘道怜、东海太守孟龙符率兵相救，将刘该、孙全击败斩首，魏军也战败而逃。自此，北魏多年再不敢对晋用兵。义熙五年、北魏天赐六年（409年）十月，魏国发生内讧。拓跋珪贺夫人所生之子拓跋绍，因其母受天囚禁不满，联络宫女、宦者将其父拓跋珪杀死。旋即，拓跋珪另一儿子拓跋嗣，又将拓跋绍杀死而即皇帝位。拓跋嗣即位之后，面对后秦、夏、柔然、东晋诸国的纷争，只能与北方诸国争夺，仍无力南下。晋义熙九年（413年）九月，魏国内的吐京胡与离石胡人，不满魏的统治压榨，在首领出以眷的率领下，起兵反魏。魏主拓跋嗣命元城侯拓跋屈率会稽公刘洁、永安侯魏勤率军围剿。出以眷联合夏军迎击魏军，击败并生俘刘洁，魏勤也战败身亡。至刘裕代晋前后，魏一方面通过稳定内部，发展生产，积累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对北方诸国作战，屡屡获胜，不断俘获对方的人口和牲畜财物，实力大大增强。便从公元422年开始，在积极推进统一北方的同时，也间或向晋河南地区用兵，魏宋之间的战争遂拉开序幕。

魏首次进攻宋河南

刘宋永初三年七月，魏主拓跋嗣得知刘裕病故，便欲发兵攻宋。谋臣崔浩则认为，刘裕刚死，其内部尚未出现争权分裂的现象，应暂缓用兵，须等待其权臣相争，自顾不暇之时，再举兵进攻，定能轻易取胜。魏主不听，遂于九月，由司空奚斤假节、加晋兵大将军、行扬州刺史，率宋兵将军、交州刺史周几，

吴兵将军、广州刺史公孙表入袭刘宋。魏军将出动之前，魏主召集众大臣商议攻宋的战略：是先攻城池还是先行略地。统帅奚斤认为应先攻城池。崔浩则认为：“南人擅长守城，从前苻坚进攻襄阳，攻击1年，尚未攻克。现大军如顿兵小城，损伤军力，敌人援军再至，我军懈怠，敌势盛锐，将十分危险。不如先分兵略地，以占领淮水以北为限。设置地方官吏，收敛租税，则洛阳（今河南洛阳）、滑台（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县城）、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便被彻底孤立于我包围之中。敌军不沿黄河东走，就将成为我笼中之物，这样，定可获胜。”但奚斤坚持先攻城池，魏主应允。

十月，奚斤率步骑兵2万，渡过黄河，扎营于滑台之东。此时，宋司州刺史毛德祖屯守于虎牢，东郡太守王景度屯守于滑台，河南太守王涓之屯守金墉（今河南洛阳东），陈留太守严稜屯守仓垣（今河南开封西北），颍川太守李元德屯守许昌。

东郡太守王景度见魏军渡河而来，急向毛德祖告急，毛德祖派司马翟广等率步骑3000往救。毛德祖为防止魏军南下，又派长社令王法政率军500戍守邵陵（今河南鄢陵），以将军刘怜率骑兵200屯于雍丘（今河南杞县）。司马楚之引军进攻刘怜，不克，魏尚书滑稽率军攻击仓垣，宋军弃城逃去。奚斤率军进攻滑台，不克，向魏主请求增兵。魏主拓跋嗣怒，斥责了奚斤，随即于十月二十三日自率5万大军出天关越恒岭，以声援奚斤军。

奚斤怕魏主降罪，命全军急攻滑台，战至十一月十一日攻克该城。太守王景度败走，其司马阳瓚被俘，不屈而死。魏主以成皋王苟儿为兖州刺史，镇守于滑台。奚斤随即率军进攻司

马翟广于虎牢关以东之土楼，将翟广击败，逼近险关虎牢。毛德祖迎击魏军，魏军屡次战败。魏主派将军于粟磾率军 3000，进屯河阳，谋攻金墉。毛德祖命将军奚晃率军沿河阻止于粟磾部。十二月十八日，魏主拓跋嗣率军进至冀州（今山东济南北），即命楚兵将军、徐州刺史叔孙建率兵从平原（今山东济南东北）渡河；同时以中领军将军娥清、期思侯闾大肥率军 7000 渡河，策应叔孙建、周几等军。娥清军施即前出至碣磳要津，徇略青州和兖州。此时，宋豫州刺史刘粹不思派兵北上迎击魏军，反命治中高道瑾率步骑 500 进据项城（今河南沈丘），宋徐州刺史王仲德率兵屯于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也未前出迎击魏军。由于刘宋兖州刺史徐琰早已于十二月十五日即弃尹卯南逃，故于平原、碣磳渡河之魏军，魏快便占据了泰山、高平、金乡等郡，叔孙建的 6 万骑兵顺利进入青州（州治在今山东益都）。宋青州刺史竺夔派使至建康告急。当年十二月一日，宋廷任命南兖州刺史檀道济为监征讨诸军事，与王仲德共同率军救援青州。魏将于粟磾渡河后，与奚斤等军并力进攻奚晃军，将宋军击败，进逼虎牢。宋景平元年、北魏泰常八年（423 年）正月，魏于粟磾军进攻金墉。正月初五，宋河南太守王涓之弃洛阳城逃走，魏军进占了战略重镇洛阳，魏主遂以于粟磾为豫州刺史，镇守洛阳。

正月十八日，魏主拓跋嗣进至邺城。二十二日，魏将叔孙建攻入临淄，所攻城邑皆破。此时，宋青州刺史竺夔仍率吏民固守于东阳城（今山东益都），他下令附近地区的民众坚壁清野，依山守险，与魏军对抗，使魏军的攻势顿挫。拓跋嗣遂派建义将军刁雍招募 5000 军队，前往支援叔孙建等军。三月，叔孙

建率骑兵 3 万逼近东阳城。城中只有文武官吏和士卒 1500 多人。竺夔和济南太守垣苗全力坚守，并时常出奇兵袭击魏军，屡次将魏军打败。魏军以步骑兵包围东阳十数层，赶造攻城器械，准备攻城。宋军挖四道堑壕，加强守备设施。魏军则填平三道，并以橦车攻城。宋军派人从地道中潜出，以粗麻绳绑在橦车上，将橦车拉断。魏军攻势越来越猛，城垣渐被毁坏。此时，宋将檀道济的援军已进至彭城，见东阳势危，便与王仲德率军急驰东阳。四月，叔孙建军将东阳城打开一个 30 多步长的缺口，刁雍请求快速入城，叔孙建不许。待檀道济援军将到，刁雍又建议率 5000 人占据大岷山（今山东临朐东南大岷山）险要之处，将宋军引入，进而歼灭。但叔孙建认为，天已渐热，魏军不少人患病，怕双方再僵持不下，士兵死伤殆尽，故决定立即烧营退走。檀道济军至东阳后，因军粮已尽，无法追击。宋军见东阳城已被毁坏，无法坚守，便移守不其城（今山东崂山西北）。魏将刁雍退走尹卯，叔孙建退向滑台，再向西走，与奚斤会合。

魏将奚斤、公孙表从三月开始共攻虎牢。宋将毛德祖在虎牢据城坚守。毛德祖命部众在城内挖掘七丈多深的地道，伸向城外围城魏军营寨的背后，以 400 多敢死之士，命参军范道基等率领，沿地道出至魏军之后，突袭敌人，斩魏军数百，并烧毁魏军攻城器械而退回。奚斤攻虎牢不克，便自率 3000 兵骑，进攻在许昌的颍川太守李元德。李元德战败逃走，奚斤以庾龙为颍川太守。此时，毛德祖正率军与魏将公孙表大战，从清晨战至午后，魏军被杀数百，适逢奚斤率军由许昌回军。与公孙表合击宋军，斩宋军甲士 1000 多人，毛德祖率众退回虎牢。

毛德祖无法击退魏军，便施展了借刀杀人的谋略，欲假魏军之手剪除勇略兼备的魏将公孙表。毛德祖过去与公孙表系老友，便不断与公孙表书信往来，同时把往来的情况密告奚斤，伪称公孙表已与自己合谋叛魏。毛德祖为使奚斤确信不疑，故意将每次写给公孙表的信做多处涂改。奚斤与公孙表均不知是诈，每当公孙表将毛德祖涂改的信给奚斤看时，奚斤的疑心便加剧一步。奚斤遂向魏主报告公孙表的情况，魏主怨恨，派人夜入公孙表营帐，将其勒死。与此同时，宋将刘粹派颍川太守李元德反攻许昌，击败魏军，斩魏太守庾龙，收复该城。

拓跋嗣由盟津（今河南孟县南）转至河内（今河南沁阳），随即又派并州刺史伊楼拔率兵协助奚斤围攻虎牢。四月初一，魏主亲至成皋，指挥围攻成皋的作战，魏军硬攻不克，便切断成皋引黄河水的渠道。成皋水源断绝 3 日，魏全军猛攻，仍未能攻下。虎牢前后被围 200 多天，天天作战，宋军的精锐士卒多已死伤殆尽，而魏军逐渐增多。闰四月，魏军将虎牢外城攻破。毛德祖又筑起三道城垣，复被魏军摧毁两道。宋军依托最后一道城垣拼死力战，将吏一心，顽强无比。此时，位于湖陆的檀道济军、项城的刘粹军、高桥的沈叔狸军，均因害怕魏军的强大而不敢救援虎牢。四月二十一日魏军挖地道和深井，井深 40 丈，将虎牢城中的饮水放走。城中人马饥渴疲劳，受伤的人，已无血流出。魏军急攻，遂于二十三日将虎牢攻破。宋将士欲扶毛德祖出走，毛德祖对部将说：“我誓与此城俱毙，义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将豆代田旋即将毛德祖生俘。城中的宋军，除参军范道基率 200 人突围退走外，也均为魏军俘获。至此，司、兖、豫诸州大部郡县均被魏占领。

十一月，魏将周几进攻许昌。许昌守军溃败，宋颍川太守李元德逃至项城，魏军随即包围汝阳（今河南周口西南），汝阳太守王公度也逃至项城。为防止魏军攻打项城，宋将刘粹军命其部将姚耸夫率兵增强项城的防卫。魏军攻拔并夷平许昌城，建立疆界标志而撤军。

魏宋第二次争夺河南

宋元嘉六年、北魏神䴥二年（429年）春，文帝为收复河南地区，便趁北魏大规模出兵柔然之机，命魏使者回归时向魏主传话威吓魏交还河南地区，否则，宋将发大军北攻。魏主拓跋焘不顾宋的威吓，毅然向柔然进军。元嘉七年、北魏神䴥三年（430年）三月，宋文帝决心北征河南。由右将军到彦之统率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共5万军队沿黄河进攻；以骁骑将军段宏率精锐骑兵8000直取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率军1万，为段宏军的后继；以后将军高义欣率军3万，监督征讨诸军务。宋在发兵之前，先派殿中将军田奇出使魏国，欲向魏要回河南。田奇对魏王说：“河南本为宋领土，后被你们侵占，现应恢复双方原来的边界。”遭魏坚决拒绝。此时，魏驻守河南的一些部将上表魏主，说宋军即将向魏进攻，并请示魏主发3万军队，先行击宋，以挫败敌人攻魏的企图，但未被魏主采纳。后来，魏主按照众大臣的建议，下令冀、定、相三州造舰船3000艘，调发幽州以南的军队屯守黄河沿岸，以阻宋军的进攻。六月，魏主拓跋焘派平南大将军、丹阳王大毗驻屯于黄河上；派司马楚之为安南大将军、荆州刺史、琅邪王，屯驻于颍川（今河南长葛东北），以阻止宋军北进。

宋到彦之军从淮水入泗水，由于当时洪水泛滥，每日行军不过 10 里，故从四月直至七月，才到达须昌（今山东东平附近），随即逆黄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镇兵少，命诸军全部撤至黄河北岸。魏主任命大鸿胪阳平公杜超为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镇守邺城（今河北临漳西），为诸军节度。于是，宋军兵不血刃，占领了四镇。宋军统帅到彦之留将军朱修之防守滑台，尹冲防守虎牢，建武将军杜冀守卫金墉。诸军推进至灵昌津（在今河南汲县东古黄河道上，又名延津），宋军遂分兵驻守黄河南岸，西端达于潼关，东西绵延 2000 多里。司、兖等州的迅速回归，使宋军大喜，唯有王仲德心中忧虑。他认为：宋军诸将不了解魏军的多谋狡诈，必中敌计。魏军现主动北撤，一待河水结冰，定将大举南下，实在令人不安。

八月，魏主拓跋焘命冠军将军安颉督护诸军，进击到彦之军。到彦之派裨将姚耸夫渡过黄河，进攻冶坂（今河南孟县西黄河北岸）。姚耸夫兵败，死者甚众，魏主即派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与大毗屯兵河上，以进击到彦之军。十月二十二日，魏冠军将军安颉率军从委粟津（今河南范县东古黄河上）渡过黄河，攻金墉。金墉已失修多年，且无粮食储备，宋将杜冀欲弃城退走，又怕宋主问罪。但宋主此时已赋予姚耸夫率军 1500 人，去洛水捞取秦大钟的任务。杜冀欲增强自己的实力，遂欺骗姚耸夫说，金墉城已修好，粮食充足，只是防守兵力不足，请姚与他合兵防守，待破敌立功后，再去捞取大钟，也为时不晚。姚耸夫应允。待姚率兵进至金墉，发现城破难守，便率部众退走，此时，杜冀也随之南逃。安颉军至洛阳，即攻占了金墉，杀宋军 5000 多人。不久，杜冀逃回建康后，却向宋文帝报告说：“臣本

欲以死坚守，但姚弋仲到达后立即率军退走，沮丧军心，故使洛阳失守。”宋文帝听后大怒，遂命人于寿阳（今安徽寿县）将姚弋仲斩首。姚弋仲是所有宋军偏将中最为英勇善战的一员。

魏尚未渡河的军队，集结于七女津（失考），到彦之怕魏军再大举南渡，令裨将王蟠龙逆水夺取魏军渡船，被魏将杜超击杀。安颉与龙骧将军陆俟攻打虎牢，十月二十八日，攻占了这座险关，宋守将尹冲与荥阳太守崔模向魏军投降。宋将统帅到彦之得知洛阳、虎牢失守，各军相继战败逃走，也欲率军退回。部将殿中将军垣护之劝其不可轻易撤兵，应一面派兵加强滑台的守备，一面自率大军渡河北进。到彦之不听，决心烧毁船只，从陆路南退。此时，王促德又劝告他说：“洛阳、虎牢的失守已势在难免，现敌距我尚在千里之外，滑台又有强兵，若弃船南退，军队必定散逃。应乘船先入济水，至马耳谷，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但到彦之引军进入济水后，行至历城（今山东济南），便“焚舟弃甲，步趋彭城。”此时，宋将竺灵秀也放弃须昌（今山东东平附近），南奔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于是，青、兖二州惊恐。魏军逼近济南（今山东济南），济南太守萧承之率数百人防守济南。魏军越来越多，萧承之命部众大开城门，以待魏军。部众均不解地说：“贼众我寡，奈何轻敌之甚！”萧承之对大家说：“今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唯当见强以待之耳。”魏军进至城下，见城门大开，以为必有伏兵，怕中埋伏，遂引军退走。十一月十六日，魏将叔孙建进军进攻湖陆，竺灵秀大败，宋军被杀 5000 多人。叔孙建还屯范城（今河南范县东，古黄河北岸）。十二月。宋文帝见右将军到彦之、安北将军王仲德战败，弃甲兵而归，府库为之空虚，皆免官下狱治罪；

兖州刺史竺灵秀擅自弃军退逃，被诛杀。

至宋元嘉八年、北魏神䴥四年(432年)正月，宋军稍稍扭转了溃败混乱的战局。此时，宋文帝命檀道济率宁朔将军王促德、骁骑将军段宏等军援救滑台。魏以叔孙建、长孙道生迎击檀道济军。正月十六日，檀道济军至寿张(今山东东平西南)，与魏安平公乙旃眷军相遇。道济等奋击，大破魏军，转战至高梁亭(似在今山东东平或东阿境)，斩魏济州刺史悉烦库结。二月，檀道济等军乘胜进至济上，前后与魏军30多战，檀道济军多获胜。宋军至历城，魏叔孙建军以轻骑袭击檀道济军前后，烧毁军粮草。宋军缺乏食粮，难以继续前进。于是，魏将安颉、司马楚之等督军全力进攻滑台，魏主并派楚兵将军王慧龙率部助攻。宋将朱修之坚守滑台数月，粮食吃尽，便熏挖老鼠而食。二月十日，魏军终于攻克滑台，俘宋将朱修之和东郡太守申谟，获宋军1万多人。

滑台的陷落和宋军粮尽，使檀道济等军处于极端困难之境，檀道济遂自历城撤退。魏军从俘虏口中得知宋军粮尽的困难情况，便挥众追击。宋军惊恐，即将溃败。此时，檀道济于阵中夜间“喝筹量沙”，并以所剩之少量食米覆盖于沙子上面，以欺骗魏军。清晨魏军发现宋军粮食堆积丰足，便杀死招供之俘虏。

檀道济军少，魏军众多，大军从四面威逼而来。檀道济命士卒身穿甲衣，自己则穿白衣乘车，慢慢出自阵前。魏军见此情景，以为必有伏兵，不敢逼近，稍向后退，因而，檀道济得以率全军退回。至此，魏宋第2次争夺河南地区的作战，遂告结束。

北魏与刘宋河南淮南战役

刘宋王朝为摆脱长期遭受北魏侵袭的被动局面，开始定下大规模北进之策。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六月，也即北魏撤军2个多月后，宋文帝决心北征。但宋王朝的一些大臣却有的赞成；有的则极力加以劝阻。丹杨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谟等均赞成出兵；左将军刘康祖认为：“岁月已晚，请待明年。”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劝谏宋文帝说：“我为步兵，魏为骑兵，难以与其匹敌。当年檀道济北征无功而还，将军到彦之也兵败回归。今王玄谟等将，并不比檀道济、到彦之高明；而且六军的实力，也未超过往昔，如若北进，势必使王师重遭战败之耻。”宋太子刘劭及护军将军萧思话亦劝阻出兵，均遭宋文帝拒绝。宋文帝北进伐魏决心已坚。

宋策划兵出三路：东路大军由青冀二州刺史萧斌率宁朔将军王玄谟、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咨议参军申垣等部6万水军北进入河；中路大军由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率太子左卫率臧质、骁骑将军王方回向许洛一带进击；徐充二州刺史武陵王刘骏率军向须昌、滑台进攻；西路大军由雍州刺史刘诞统率，指向长安。为配合长安以东的宋军作战，宋还命梁州、南、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率军进攻北魏。宋军企图先夺占碣磳（今山东茌平县西南古黄河南）、滑台（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县）等沿河重镇，进而将虎牢，洛阳、长安连为一片，收复黄河以南地区。

北魏得知宋军将北进的消息，拓跋焘为迎击宋军，计划先让宋军北上，宋若进兵不止，则魏军暂退阴山以避宋军的锋芒。待秋后天凉马壮之时，再回军反击，歼灭宋军。

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七月中旬，东路宋军在萧斌指挥下，宋军建武司马申元吉引军趋碣磳，十七日，北魏济州刺史王卖德弃城而逃，宋军顺利进占了碣磳。与此同时，宋青冀二州刺史萧斌命将军崔猛进攻乐安郡（郡治在今山东广饶县北），魏青州刺史张淮之也弃城而走。萧斌与沈庆之留驻碣磳，宁朔将军王玄谟部进攻滑台，钟离太守垣护之为前锋，率战船百艘进围石济（在滑台西南 120 里）。九月，魏主拓跋焘率军南下救援滑台，同时命太子晃屯兵漠南，以防柔然的乘虚进攻，以吴王拓跋余防守平城（今山西大同），调发州郡兵 5 万，分给各军。王玄谟军士气甚盛，器械精良。初围滑台之时，众将见滑台城内多为茅屋，建议以火箭射入城内，将滑台烧毁。由于王玄谟贪图城中的财产，不同意众将的主张。宋军攻滑台数月不克。当听到魏援军将至滑台，众将建议以车结营，防止魏兵的突击，王玄谟又未采纳，致使战机一误再误。

十月，魏主拓跋焘率军进至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淇门渡）即派殿中尚书长孙真率骑兵 5000，由石济先行渡越黄河，以截断宋军之退路，同时派关内侯陆真带领数人于夜间穿过宋军包围，进入滑台城，安抚城中的魏军，登城察看宋军动静，返回向魏主报告。旋即，魏主决定率军渡过黄河。魏大军“众号百万，鞭鼓之声，震动天地”。王玄谟惊惧，率部退走碣磳，魏军追击，击杀宋军万余人，王玄谟部溃散殆尽，丢弃军资器械堆积如山。

宋中路军在东路大军北进的同时，在雍州刺史刘诞的统率下，也开始出动。刘诞派其中兵参军柳元景、振威将军尹显祖、奋武将军曾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庞法起等率

兵自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北上,首先攻魏之弘农。

西路军在宋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的指挥下,以中兵参军胡盛之率部出汝南,梁垣兵出上蔡(今河南汝南),直趋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魏长社守将荆州刺史鲁爽弃城北走。幢主王阳兜乘胜进击魏豫州刺史仆兰,仆兰退向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刘铄立即派安蛮司马刘康祖率兵协助梁垣,进逼虎牢。闰十月,庞法起等部进入卢氏,斩魏卢氏令李封,继续西进弘农(今河南灵玉东北函谷关城),十月十五日,庞法起等部攻克了弘农,擒魏弘农太守李初古拔。宋将薛安都留守弘农,庞法起继续率军向潼关进攻。十一月,宋文帝命柳元景为弘农太守。柳元景随即命薛安都、尹显祖率军协同庞法起进击陕城(今河南三门峡西旧陕县)。陕城坚固,宋军攻之不克。此时,魏洛州刺史张是连提率军两万,兵出崤谷救援陕城。薛安都等与魏军战于城南,魏军以骑兵纵击,宋军难以抵挡。薛安都大怒,脱去铠甲、解除马装具,瞋目横矛,单骑突阵,所向无敌,魏人夹射不能中。如是数四,杀伤不可计数。战至黄昏,宋军别将鲁元保引兵自函谷关突至,魏军乃退。柳元景派军副柳元怙率步骑兵 2000 援助薛安都。第 2 天宋军陈于城西南,准备与魏军决一死战。宋备武将军曾方平对薛安都说:“今劲敌在前,坚城在后,是吾敢死之日,卿若不进,我当斩卿,我若不进,卿当斩我也!”薛安都慨然应允,遂合力与魏军战。此时,宋将柳元怙率兵突然杀至,军威严整,魏军惊惧。双方自清晨战至黄昏。魏军大败,宋军斩魏洛州刺史张是连提以下 3000 多人,生俘 2000,余众溺水而死者不可胜数。

魏主拓跋焘在东路挫败了宋军的进攻后,便于当年闰十

月，挥军继续南下。魏主拓跋焘自率一路大军自东平直指邹山（今山东邹县东南）。十一月初二，魏主兵临邹山，宋鲁郡太守崔邪利被魏生俘，三日后进占了邹山。楚王拓跋建自清水西进，兵至萧城（今安徽萧县西北），步尼公部自清水东前进，屯于留城（今江苏沛县东南）。宋武陵王刘骏立即派兵迎击，以参军马文恭率军趋萧城，太尉江夏王刘义恭命军主嵇玄敬率部向留城。旋即，马文恭军战败。魏步尼公部与嵇玄敬相遇，引兵趋巷桥，欲渡向清水西岸。此时，沛县（今江苏沛县）民众烧毁巷桥破坏了魏军的渡河行动。同时还于夜间进入林中击鼓，惊吓魏军。魏军以为宋大军至，争渡巷水，（在江苏省沛县西），溺死者近半数。

魏永昌王拓跋仁连克悬瓠，项城（今河南沈丘）。宋文帝深怕魏军进一步夺取战略重镇寿阳，遂令于虎牢附近的刘康祖部回归。十一月十七日，拓跋仁率骑兵 8 万追及刘康祖于尉武。此时，刘康祖军只有 8000 人。刘康祖的副将胡盛之，欲从山间的小路暗暗回军寿阳。刘康祖生气地说：“到黄河边寻找敌人决战，找不到敌人，现魏军自送上门，为何要躲避呢！”于是决定以兵车结营而进，同时下令军中说，有逃跑者斩，后退者断足！魏军四面围攻宋军，宋将士殊死作战，自早晨战至午后，宋军杀死魏军 1 万多人，人血没及脚跟。刘康祖负伤 10 处，斗志愈加坚强。魏军众分做 3 军，轮流作战作休息。至黄昏大风起，魏军以柴草烧宋军军营，刘康祖不幸被流矢射穿脖子而死，宋军失去指挥，终于被魏军全部歼灭。

魏军至萧城，距彭城（今江苏徐州）10 余里。彭城宋军兵多食少，太尉江夏王刘义恭欲弃城南退。后遭安北长史张畅、

武陵王刘骏的劝阻，才打消了撤退的念头。魏主拓跋焘十一月二十六日进至彭城，指挥部众围攻该城，数日不下。至十二月初一，又继续令全军南进。以中书郎鲁秀兵出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高凉王拓跋那兵出山阳（今江苏淮安），拓跋仁军出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长江北岸）。魏军轻装疾驰，所过城邑宋军皆望风而逃。

当魏军围攻彭城时，宋文帝即令辅国将军臧质率军 1 万援救彭城，军至盱眙（今江苏盱眙北）时，魏主已以苇筏数万，渡过淮水。臧质军遂停止北上，令其冗从仆射胡崇之、积弩将军臧澄之占据盱眙东南之东山，建威将军毛熙祚占据前浦，臧质结营于城南。十二月初十，魏燕王拓跋谭向胡崇之、臧澄之、毛熙祚 3 部进攻，3 营全军被歼，臧质按兵不敢相救。魏军随即又将臧质军击溃，臧质弃军械辎重，逃入盱眙城。十二月十五日魏主进至瓜步山，即令部众砍伐芦苇，编扎渡筏，声言准备渡越长江。与此同时，拓跋仁部、拓跋那部也出至长江岸边，均扬言欲渡江南下。宋王朝京城内外尽皆惊恐，十二月二十七日，宣布“内外戒严”。丹杨统辖地区之内，所有男子一律从军，征王公以下的贵族子弟入伍。以领军将军刘遵考等分别率军防守重要渡口，加强水上警戒，上自于湖（今安徽当涂）、下至蔡州（今南京市西南，原为长江中的沙洲），“陈舰列营，周亘江滨，自采石至于暨阳，六七百里”，以太子齐邵镇守建康的门户石头城，统领全部水军。丹杨尹徐湛之镇守石头仓城，吏部尚书江湛兼领军，全权处理军机大事。宋文帝面对北魏大军临江之势，十分忧虑，对轻率决定北伐之举悔恨不已，同时叹息道：“檀道济若在，岂使胡马至此！”

魏军自进军南下以来，由于到处烧杀抢掠，激起江北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百姓坚壁清野。魏军掠无所获，人马饥乏。前有浩瀚长江、后有坚城未克。魏主拓跋焘见无法渡江，向宋求和请婚未成，便决定撤军北还。魏太平真君十二年、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年）正月初一，拓跋焘于瓜步山上大会群臣、论功行赏之后，便于第2天率军驱掠5万家退走。魏军转攻盱眙。盱眙城坚、兵足粮丰，魏军凶猛攻城，难以攻破。魏军采用钩车欲钩倒城楼，宋军便以铁环栓在魏军的铁钩绳上，并以数百人拉住铁环，保住了城楼。魏军又以士卒登城肉搏，宋军英勇拼杀，杀伤魏军数以万计，堆尸与城齐高，战斗异常激烈，魏军攻击1月，未能奏效，便于二月初二烧毁攻城器械继续北走。

二、北魏与南齐的战争

萧道成建立了南齐政权之后不久，北魏便与南齐进行了争夺战。

北魏南齐第1阶段的争夺战发生于齐建元元年、北魏太和三年（公元479年）十一月，止于齐建元三年、魏太和五年（公元481年）二月。魏齐经3次主要征战，互有胜负，各自收兵保境。

北魏南齐第2阶段淮、汉水地区争夺战发生于齐建武元年、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十二月，止于齐建武二年、魏太和十九年。北魏孝文帝元宏率30多万大军，同时在淮水和汉水上游地区与齐军展开激战，南齐以20万兵力分路抗击，双方经激烈交锋，魏军主动撤走。

魏齐第 3 阶段争夺战发生于南齐建武四年、北魏太和二十一年(公元 497 年)六月,止于齐永泰元年、魏太和二十二年(公元 498 年)三月。魏主亲率近 40 万大军南进,齐帝萧鸾倾全国之力迎击魏军,魏军胜多负少,未达成夺占淮南的预定作战企图,主动撤回。

魏齐第 4 阶段争夺战发生于齐东昏侯永元元年、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 499 年)正月,止于齐永元二年、魏宣帝景明元年(500 年)八月。南齐以太尉陈显达率军 4 万北攻魏境。后来魏主元宏带病南征,死于回军途中。其后,魏以 10 万大军进据寿阳,终于占领了整个淮南地区。

北魏经过太武帝拓跋焘的开拓,国势已极为强大,再经文成帝拓跋濬、献文帝拓跋弘时期的休养生息,国力进一步增强。

魏主拓跋弘聪敏早熟,刚毅果敢,信奉黄、老和佛教,常有隐退之心。在其击败柔然返回京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即与大臣商议禅让帝位于京兆王拓跋子推之事,众大臣皆不同意,遂不得不让位给太子拓跋宏(元宏),此时,拓跋宏年仅 5 岁。拓跋宏即位后,由于年幼,拓跋弘又被尊为太上皇帝,仍暂理朝政。拓跋弘“勤于为治,赏罚严明,慎择牧守,进廉退贪”,且无论处理大小问题皆以法律为据,对改善魏国的政治颇有贡献。北魏冯太后,因情夫李奕曾被拓跋弘判处死刑而对拓跋弘怨恨,便于宋苍梧王元徽四年(公元 476 年)六月,将年仅 23 岁的太上皇拓跋弘鸩杀。自此,冯太后,便以孝文帝祖母的身分,亲理朝政。总之,魏自公元 470 年至 478 年期间,国内政治形势基本稳定,除与柔然、仇池有数次征战之外,无更大规模

的作战行动，与南朝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

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 479 年）四月二十日，刘宋王朝的末代皇帝宋顺帝被迫将帝位禅让于齐王萧道成。这样，萧道成便建立了南齐政权，成了南齐的开国之君。南齐为巩固自己的政权，消灭刘宋王朝的残余势力，废除刘宋时期的封国。五月，萧道成杀了宋顺帝，并将宋宗室老少尽皆诛灭。萧道成成为改变刘宋王朝的政治弊端，让大臣广泛议论改革朝政的措施。当时提出的主要建议有：一、废除刘宋大明以来的一些苛政细节，讲求简易行事；二、开办文、武两种学府。根据学习情况，淘汰劣者，大胆使用优秀之士；三、奖励节俭。“宜褒进朝士之约素清修者，贬退其骄奢荒淫者”；四、减轻赋税。萧道成对上述建议给予了应有的奖赏，并下令有关部门研究可行措施，颁布执行。为防止将吏拥兵过重，萧道成接受中领军李安民的建议，取消将吏的部曲私兵，严格限制其随身护卫，并不得擅自征兵。

齐建元元年、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年十一月，魏主决定派军击齐。当月 15 日，以代理梁郡王拓跋嘉率二将，兵出淮阴（今江苏淮阴县西南甘罗城）；陇西公琛督率 3 将，兵出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蜀岗上）；河东公薛虎子率 3 将，兵出寿阳（今安徽寿县），奉丹杨王刘昶入袭齐境。答应帮助刘昶恢复刘宋江山，取胜后让刘昶登基，称臣于魏。大阳蛮首领桓诞请求做全军之先锋，魏主遂任其为南征西道大都督。此时，义阳人谢天盖，举兵响应魏军，自称司州刺史，魏乐陵（今河南汝阳）镇将韦珍率兵渡过淮水，前往接应。南齐见魏军攻入，豫章王萧嶷派中兵参军萧惠朗率军 2000，协助司州刺史萧景先征讨谢天盖，韦

珍掠 7000 多户而归。南齐建元二年(公元 480 年)正月,魏将陇西公琛等军,攻占齐马头戍(今安徽蚌埠西),击杀齐太守刘从。南齐震惊,齐高帝下诏内外戒严,调兵遣将,准备抗击魏军。

二月,拓跋嘉与刘昶军合攻寿阳。魏军步骑兵号称 20 万之众,来势汹涌。齐豫州刺史垣崇祖决定以水淹敌军。他于寿阳西北筑一水坝,拦住肥水,并于坝北筑一小城,四周以深沟环绕,派军数千防守。他判断,敌人到后,看见小城,必然企图一举攻占,待其全力攻城之时,突然将水坝破坏,定能将敌军淹亡。魏军到后,果然蜂拥攻击小城,此时,齐军按原定计划破坝放水,魏军溺死者不可胜数,不得不引军退走。接着,徐州刺史崔文仲派军主陈靖攻克了魏之竹邑,斩戍主白仲都。齐将崔叔延又击破魏之睢陵(今江苏睢宁),斩魏淮阳太守梁恶。魏刘昶等鉴于雨水正盛,请求魏主班师回归,魏主应允。

齐建元二年、北魏太和四年(公元 480 年)七月,南齐角城(今江苏清江西南古淮河与泗水交汇处)戍主献角城降魏。八月,魏即派徐州刺史梁郡王拓跋嘉,率兵前往迎接角城戍主,与此同时,魏再遣五路大军南进:以平南将军郎大檀等 3 将由朐城(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镇)地区进发;将军白吐头等两将兵出海西(今江苏灌南东南);元泰等 2 将兵发连口;封延等 3 将兵出角城;镇南将军贺罗兵发下蔡(今安徽凤台)。闰九月,魏梁郡王拓跋嘉统率的 10 万大军围攻朐山,朐山戍主玄元度加强守卫,抗击魏军。齐青、冀二州刺史卢绍之命其子率军前来援救,大破魏军。与此同时,齐王朝派出的军主崔灵建等所率之 1 万兵马,也赶至朐山。入夜,齐军每人手举两支火

把,以示人多势众,魏军望见以为齐大军到达,惊慌退走。齐建元三年、魏太和五年(公元481年)正月,魏主派兵进袭淮阳(今江苏清江西古泗水西岸)。南齐以领军将军李安民为都督,与军主周盘龙等率兵往救,魏军缘淮水大掠,江北民众皆惊慌渡江而逃。周盘龙之子周奉叔以200人冲入魏军阵内,魏军以万余骑兵将其包围,周盘龙随之也突入敌阵,所向披靡。魏数万之众无人敢挡,死伤万余,引军而退,李安民等率军追击,又将魏军击败。

北魏见南齐统治集团互相残杀,国政混乱,便藉口萧鸾废海陵王自立为大逆不道,乘机发兵南进。此时,又有齐雍州刺史曹虎遣使降魏,魏孝文帝遂坚定了伐齐的决心。

魏主定下南征决心之后,遂做了相应的作战策划,决定兵出四路而进:一路大军以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率领四将攻取襄阳(今湖北襄樊);一路大军以大将军刘昶、平南将军王肃攻取义阳(今河南信阳);一路大军由徐州刺史拓跋衍进击钟高(今安徽凤阳东北临淮关);一路大军以平南将军刘藻攻取南郑(今陕西汉中);以尚书仆射卢渊为安南将军,督都襄阳前锋诸军。自率主力跟随中路部队之后续进。魏主企图以齐雍州刺史曹虎为内应,各路大军齐进,直逼淮水、汉水之滨,力争夺取淮水、汉水沿岸的广大地区;如无法达成上述目的,亦可“巡抚淮甸,访民疾苦,使彼知君德之所在,有北向之心”。

南齐得知魏大军来犯,决定分兵抗击北魏军。齐主命镇南将军王广之督司州诸军事,抗击刘昶军,以右卫将军萧坦之督徐州诸军事,抗击拓跋衍军,命尚书右仆射沈文季督豫州诸军事,抗击魏主军。

齐建武元年、魏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北魏主自洛阳南下，二十八日进至悬瓠（今河南汝南），二十九日诏令魏军将先前于寿阳（今安徽寿县）、钟离、马头（今安徽寿县西北）等地掠获的民众均放回南方。同时严令魏军不得侵掠，违者以砍头论处。

建武二年、太和十九年（公元 495 年）正月，拓跋珪军围攻钟离城，齐徐州刺史萧惠休率众坚守，同时利用机会出城袭击魏军，将拓跋珪军击破。刘昶、王肃军进攻义阳，齐冠军将军、司州刺史萧诞抗击魏军，王肃数次击破齐军，招降齐军 1 万多人。齐主面对魏大军来攻，下令京城内外戒严，任命太尉陈显达为使持节，都督西北征讨诸军事。正月二十九日，魏主渡过淮河，到达寿阳地区，魏军号众 30 万，铁骑逶迤数十里。魏军路遇大雨，孝文帝命令左右不要为自己再打伞盖，看到生病的士卒，亲自慰抚他们。魏主沿淮水东进，十七日，进至钟离。齐主急派左卫将军崔慧景、将军裴叔业率军援救钟离，魏齐两军遂在各个方向展开激战。

魏主见攻钟离不克，欲越过钟离城，直趋大江之滨。不巧，此时魏司徒冯诞病故，未能成行。魏军攻钟离至三月初，士卒死伤众多。魏主遂下令于邵阳州（在当时淮水中）筑城，以木栅截断水路，又于两岸再筑两城，切断齐之援兵来路。齐左卫将军崔慧景部将张欣泰根据魏人于邵阳州筑城的情况分析，认为魏军有退走之意，便向崔慧景建议和魏主对话，请魏撤军。张欣泰与魏主对话后，魏主同意撤军北归。魏主北渡淮水，留五将断后。齐军立即派兵截断魏军退路，魏主命军主奚康生捆绑木筏，于木筏之上堆放柴草，顺风放火焚烧齐舰船，魏军凭

借浓烟烈火，投掷刀刃，将齐军击败，仍然固守于邵阳州上。

魏主命前将军杨播率步骑兵 5000 最后撤离两岸。杨播列阵以待，齐兵水陆四面包围杨播军。杨播与魏军以圆阵力战，杀伤齐军众多。经两昼夜激战，魏军粮食已尽，围攻的齐军攻势益猛，杨播率 300 精锐骑兵冲出包围，北渡而归。

待魏军全部撤离南岸，固守于邵阳州上的魏军 1 万多人，与齐军商谈，以给齐军 500 匹战马为代价，借道北渡。崔慧景欲乘机截断魏军的退路，将魏军击灭。此时，张欣泰又建议说：“归师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轻也，胜之既不足为武，败则徒丧前功，不如许之”。崔慧景接受张欣泰的建议，放魏军渡河北去。进击寿阳的魏军，见齐尚书左仆射沈文秀率援军进至寿阳，不久即撤走。

魏大将军刘昶、王肃以号称 20 万大军，与齐司州刺史萧诞激战于义阳（今河南信阳北），诞兵屡败，投降于魏者 1 万多人。二月中旬，魏军攻势更猛，城中齐军背着盾牌才敢活动。齐主命镇南将军王广之率军急救义阳，王广之距义阳城尚有百里之遥，便因畏惧魏军强大，不敢前进。此时，黄门侍郎萧衍请求率兵前行，王广之授以精锐之兵，萧衍夜间由小路进发，与太子右卫率萧诛等，突然进至距魏军几里之地，魏军出乎意料，不知宋军虚实，不敢逼近。天将黎明，义阳城中的齐军望见自己的援军到来，萧诞立即派长史王伯瑜率军出城，向魏军攻击，火烧魏军筑起的围城栏栅，魏军无法支持，解围而走。萧诞等挥军追击，将魏军击败，义阳之围遂解。

齐建武元年、魏太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魏主诏令尚书仆射、安南将军卢渊率军进攻南阳（今河南邓县），卢渊因军

粮不足,要求先攻赭阳(今河南方城东),以便夺占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的粮仓。于是,卢渊与征南大将军拓跋英、安南将军李佐、荆州刺史韦珍共攻赭阳,齐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闭城坚守。魏军围攻赭阳至建武二年、魏太和十九年四月底,由于诸将不相统属,难以协同作战,故赭阳仍牢牢控制于齐军之手。魏安南将军李佐英勇作战,日夜加紧围攻,其部队伤亡甚众。此时,齐主命太子右卫率垣历生率军增援赭阳。魏军诸将见齐军援兵到达,恐寡不敌众,均欲撤走,唯独李佐坚持作战,自率骑兵 2000 迎战齐援军,被齐军击破,卢渊等人引兵退走,垣历生挥军追击,大破魏军。

北魏太和二十一年、南齐建武四年(公元 497 年)六月,也即北魏南齐于第 2 阶段争夺战后 2 年,魏孝文帝决定发冀、定、瀛、杨、济五州之军 20 万,南下击齐,于是魏齐双方开始了第 3 阶段的争夺战,争夺战的地区,仍然为南阳和淮南地区。

魏太和二十一年八月十九日,魏大军开始出动。齐主得知魏主南下,便于建武四年八月,派遣军主班直将军胡松率部协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戍守赭阳(今河南方城东)。九月,魏荆州刺史薛真度率军直攻南阳。齐南阳太守房伯玉将薛真度军击破。魏孝文帝得知愤怒,认为南阳乃一小郡,不将其攻夺誓不罢休。于是,率大军转向襄阳,彭城王元勰等率 36 军为后继,号称百万大军,汹涌南下。九月十七日,魏主留下部分军队攻赭阳,十九日,进至宛城(今河南南阳),当夜即攻占宛城外城,房伯玉退守内城。魏军无法攻破内城,派使者威吓利诱,房伯玉仍不理睬,继续顽强抗击。魏主在通过宛城东南一座小桥

时,险些被房伯玉埋伏的勇士所杀。二十三日,魏主留下太尉元禧继续攻击宛城,率军南下,二十五日进至新野(今河南新野),围攻新野不下,魏主又派使者威吓新野太守刘思忌。刘思忌置之不理。此时,位于赭阳的魏右军将军府长史韩显宗,击败齐将胡松、斩了齐偏将高法援后,率军进至新野。魏主问他,杀了敌将,击败敌军,为何不为露布张扬成绩?韩显宗回答说自己兵少力微,俘斩不多,如果张扬自己的成果,就是犯罪了。魏主十分尊敬他的作风。至十月初三,魏军攻新野仍未奏效,魏主下令筑长围困新野城,自率大军,往攻襄樊(今湖北襄樊)。齐主见雍州形势危急,诏令徐州刺史裴叔叶率军援救雍州。裴叔叶则向齐主建议以攻掠魏境,来牵制魏军的行动。于是,裴叔叶率军攻击魏之虹城,掠男女4000多人。齐主另派太子中庶子萧衍、右军司马张稷率军援救雍州。十一月,齐前军将军韩秀芳等15将投降魏军,魏军在沔北地区节节战败齐军,齐将军王伏保等人被魏军生俘。十二月初七,魏军攻克了新野城。齐雍州刺史曹虎因与房伯玉不和,屯兵于樊城(今湖北襄樊),迟迟不去援救房伯玉。二十四日,齐主诏令度支尚书崔慧景往救雍州,雍州所有军队均受其节度。崔慧景率步兵2万,骑兵4000,急驰襄阳。

齐将裴叔叶派部鲁康祚,赵公政率军1万,进袭魏之太仓口(今河南息县附近)。魏豫州刺史王肃派长史傅永率甲士3000迎击。鲁康祚军屯于淮水之南,傅永屯军于淮水之北,两军相隔10余里。傅永深知齐军长于夜袭,其在偷渡淮水时,必于浅水处设置火光做为标记。于是,傅永便布置了埋伏,同时还令人以葫芦盛油,放于深水中,待齐军退却过河点火标示浅

水位置时，也同时点火，引诱齐军在深水区过河。果然，当夜齐军即来袭营，被傅永大败，在逃归南岸过河时，又溺死数千人，鲁康祚被杀，赵公政为魏军生俘。裴叔叶率兵万余，进攻魏楚王戍（今安徽临泉西南），王肃命傅永前去支援。傅永驰至，急令人将城外堑耗填平，并于夜间在城外埋伏战士千余人。当裴叔叶的前锋刚刚到达城下正欲设置围攻工事时，傅永的伏兵突然杀出，将裴叔叶的先头部队击败。裴叔叶得知，留下部分兵力防守营地，自率数千人前去援救。裴叔叶至楚王戍前，见傅永已紧闭城门，随之也收兵回撤。傅永看到裴叔叶军已远至数里，便打开城门，奋力追杀，大破裴军，缴获了裴叔叶的伞、扇、鼓、帐幕及铠甲兵器 1 万多件。傅永的部下要求再继续追击敌军，傅永则认为自己兵不满 3000，裴叔叶兵精势众，并非不能作战，而是不摸自己的虚实中计而败，不可再追。于是，便收兵回城。魏孝文帝派使臣至前线封赏傅永，拜他为安远将军、汝南太守。后来，孝文帝常感叹说：“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版，唯傅修期耳！”

齐永泰元年、魏太和二十二年（498 年）正月，魏统军李佐攻占了新野，俘太守刘思忌，魏军欲逼降他，刘思忌激昂地说：“宁为南鬼，不为北臣！”李佐于是杀了刘思忌。新野的丢失，震动了沔水以北，湖阳（今河南唐河西南湖阳镇）戍主蔡道福、赭阳戍主成公期、舞阴戍主黄瑶起、南乡（今河南淅川西南旧县东南）太守席谦，相继弃城南逃。黄瑶起被魏军俘获斩杀，王肃将其切成肉块烹食，以报父仇。一月二十三日，齐王派太尉陈显达援救雍州。二月十二日，魏军攻克宛城的北城，太守房伯玉自缚出降，魏主将其赦免。三月初一，齐将崔慧景、萧衍等人

于邓城惨败。当时崔慧景、萧衍、军主刘山阳、傅法宪等人率军 5000 至邓城增援，魏数万骑兵突然袭来，萧衍想出城作战，崔慧景则认为敌军不会夜间围城，黄昏后自会退走。但魏军非但不走，后续部队又相继到达。崔慧景见形势不妙，竟不向各军通报便从南门引军退走。其余部队看到崔慧景退走，也相继而逃。魏军追歼齐军，斩齐将傅法宪，齐军沿途被魏军射死和渡河淹亡者甚众。三月初九，魏孝文帝率 10 万大军，围困樊城，齐将曹虎闭城坚守，魏军围攻 10 余天不克。魏孝文帝见襄阳、樊城坚固难攻，便于三十日撤军北归。

魏镇南将军王肃正率军攻打义阳之际，齐将裴叔叶率军 5 万包围了魏之涡阳（今安徽蒙城），欲以此调动魏军北上，解除义阳的包围。魏南兖州刺史孟表固守涡阳，粮食吃尽，便吃树皮草根，战斗相当艰苦。裴叔叶将所杀的魏军人头堆积 5 丈多高，让城中的人观看，藉以瓦解魏军斗志。裴叔叶为扩大战果，又派出军主萧躋等人攻击龙元（今安徽怀远西北龙元集），魏广陵王元羽率军前往援救，裴叔叶率部大破元羽军。孝文帝派安远将军傅永、征虏将军刘藻、辅国将军高聪率军增援涡阳，并令王肃节度诸军。裴叔叶进击魏援军，魏军大败。高聪逃往悬瓠（今河南汝南），傅永收集残余部队退走。裴叔叶再击魏军，先后共斩魏军 1 万多人，俘获 3000 余人，缴获军资、器物等不可胜数。孝文帝得知王肃等惨败，下令将诸将带上枷锁，送至悬瓠。刘藻、高聪免死，流放平州，傅永削去官爵，王肃贬为平南将军。王肃要求再度率军援救涡阳，孝文帝说：“朕若少分兵予你，则难以制胜敌人；若多分兵，则我现在兵力不足，你应审重临之。至于义阳的包围，当解则解，当攻则坚决攻下，

如若丢失涡阳，那就是你的大罪了。”王肃于是解除了对义阳的包围，率统军杨大眼、奚康生等带领步骑 10 多万人援救涡阳。

裴叔叶见魏军众盛，夜间率军退走。第 2 天士卒溃散，魏军追杀，死伤人数无法计算，裴叔叶退至涡口防守，涡阳之围遂解。

齐东昏侯永元元年、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 年）正月，南齐为恢复雍州诸郡，太尉陈显达督率崔慧景军 4 万余众，进击北魏。魏派前将军元英率军迎击，陈显达与魏军交战，屡挫魏军，经 40 天苦战，攻入马圈城（今河南镇平南），城中食尽，守军以人肉及树皮充饥，后来，魏军突围而走，被齐军斩获 1000 多人。陈显达率军入城，随即又派军主庄丘黑进攻南乡（今河南浙川西南旧县东南），将该城攻克。孝文帝得知兵败，遂对任城王元澄说：“显达侵扰，朕不亲行，无以制之。”遂于三月初四，带病南征。初七，孝文帝军至梁城（今河南临汝西南）。崔慧景进攻魏之顺阳（今河南浙川东），魏顺阳太守张烈率部坚守。孝文帝命振威将军慕容平城率骑兵 5000 援救。魏主进至马圈城，命荆州刺史广阳王元嘉切断沟均口（丹江入汉水之口，今湖北均县），阻止齐军的归路。陈显达率军进至匀水西岸，占据鹰子山筑城防守。齐军见退路已断，军心沮丧，与魏军作战，屡屡战败。魏武卫将军元嵩，脱下头盔，率军猛冲，齐军大败。齐军主崔恭祖、胡松用黑布幔包着陈显达，抬着从小路逃走。魏军急追，齐军被杀 3 万多人，数亿军资皆被魏缴获，魏军一直追至汉水之滨才收兵而还。旋即，崔慧景也放弃顺阳而退走。

三月二十四日，魏主病已垂危，率军北撤，到了穀塘原，已无法行进，便对元勰交待后事；命元勰派人赐皇后冯氏饮药自尽，以掩盖她失德的丑事；委政于元勰，让他辅佐太子，元勰坚决推辞。四月初一，做为一代明君的孝文帝元宏病逝于穀塘原。魏主病故后，元勰与元澄商定，由于陈显达刚回军不久，怕他一旦获知魏主死讯，又回军北上，故秘不发丧，将魏主的尸体载于车中，元勰等照常奉献饮食，等魏太子元恪赶至鲁阳，才宣布魏主的死讯，故魏军得以平安撤军。

魏齐双方经均口争夺战后，南齐政权由于统治集团的内讧仇杀，武帝景明元年（500年）正月，齐豫州刺史裴叔叶，见大臣一一被诛，心中惶恐，便向魏请降。北魏主派彭城王元勰、车骑将军王肃率步骑兵10万，前往寿阳（今安徽寿县）接应裴叔叶。二月二十八日，魏大将军李醜、将军杨大眼率骑兵2000进入寿阳，并派将军奚康生率羽林军1000人，协助李醜军防守寿阳。齐主闻魏军将至，于三月十五日命平西将军崔慧景率领水军，直逼寿阳，以豫州刺史萧懿率步兵3万屯于小岷（今安徽含山北）；交州刺史李叔献屯兵于合肥（今安徽合肥西北）；萧懿部将胡松、李居士率众万余，屯于死虎；以骠骑司马陈伯之率水军逆淮水而上，屯于硖石（今安徽凤台、寿县之间淮河两岸），以逼寿阳。魏军奚康生等军固守寿阳月余，魏大军即至。元勰、王肃军进攻胡松、陈伯之军，齐军大败。魏军随之进击合肥，生擒刺史李叔献。

魏统军李文福向元勰建议攻取淮南要镇建安，夺取该地，可北图义阳，南保寿阳。元勰应允，即派宇文福前往进攻，宇文福军至建安，齐戍主胡景略自缚出城投降。当年六月，齐冠军

将军、骠骑司马陈伯之再度率军攻击寿阳，魏彭城王、大司马元颯率军坚守待援。不久，魏汝阴太守傅永率军 3000 赶到，利用夜暗，进入寿阳城与元颯密议后，率部分兵力屯于城外。八月十八日，傅永率军突袭陈伯之，齐军惨败，被斩 9000 人，被俘 1 万人，陈伯之狼狈逃回。淮南地区全部被魏攻占。

三、北魏与梁朝的战争

魏梁梁州争夺战

起初，梁辅国将军夏侯道迁为南谯太守，跟随裴叔叶镇守寿阳。后因与裴叔叶不和，单骑投奔了魏，魏主命其守卫合肥（今安徽合肥西北）。后来，夏侯道迁又投奔梁朝，梁主命其跟随梁、秦二州刺史庄丘黑镇守南郑（今陕西南郑），为庄丘黑的长史，领汉中太守。庄丘黑病死后，梁帝任命都官尚书王珍国为刺史，王珍国尚未到任，夏侯道迁便暗与考城戍主江忱之等合谋降魏。最初，魏仇池镇将杨灵珍叛魏降齐，齐帝曾任命其为征虏将军、假武都王、助戍汉中，有部曲 600 人。夏侯道迁深为忧惧。梁天监四年（公元 505 年）正月，梁帝遣吴公之去南郑。夏侯道迁便乘机杀死吴公之，发兵进袭杨灵珍父子，将杨灵珍父子斩杀。梁白马戍主尹天宝闻知，率兵攻击夏侯道迁，击败其部将庞树，进围南郑。夏侯道迁向氏王杨绍先、杨集起、杨集义等求救。杨集义之弟杨集朗率兵往救。击杀了尹天宝，解了南郑之围。魏主任命夏侯道迁为平南将军、豫州刺史。同时，派尚书邢峦为镇西将军、都督征梁、汉诸军事，率部前征赴

任。这样，魏梁争夺梁州之战便拉开了序幕。

梁天监四年、北魏正始二年二月，魏镇西将军邢峦进至汉中，率军一一攻占了各个城戍，魏遂以邢峦为梁、秦二州刺史。此时，巴西太守庞景民占据郡城（今四川阆中县）抗拒魏军，郡民严玄思聚众起兵，自称巴州刺史，投降于魏，进击庞景民，将庞景民斩首。氏王杨集起、杨集义等得知魏军攻占汉中，心中惊恐，率兵叛魏，截断汉中粮道，魏邢峦屡次派兵将其击破。梁晋寿太守王景胤据守石亭（今四川广元北），见魏军南下，急求救于益州刺史邓元起。此时，梁武帝也下诏假邓元起都督征讨诸军事，援救汉中。四月，梁冠军将军孔陵率军 2 万防守深杭（今四川广元市境），辅国将军鲁方达戍南安（四川剑阁），任僧褒等戍守石同（今四川剑阁剑门关北），企图阻止魏军南下，邢峦遣统军王足率军一一击破，进入险关剑阁。孔陵等退保梓潼（今四川梓潼），王足再进击，又将梁军击破。至此，梁州 14 郡，东西 700 里，南北千里，皆为魏占。七月，王足军逼近涪城（今四川绵阳东），八月十二日，鲁方达等被王足部将纪洪雅、卢祖迁等击败，鲁方达等 15 将和王景胤等 24 将也全部战死。十一月，王足军包围涪城，蜀人震惊，益州诸城降魏者十之二三。百姓自相报名降魏者 5 万多户。邢峦上表魏主建议乘胜攻取蜀地。他认为：“建康距成都万里，陆路已经切断，只能靠水路相通，若水军由东向西而上，非 1 年时间不能到达。益州已外无援军，这是可以攻夺的理由之一；益州不久前经历了刘季连的反叛和邓元起的围剿，所储军资已经耗尽，吏民皆无坚守的意志，此可夺取的理由之二；萧渊藻年不满 20，无从政治军的经验，昔日的战将多已被杀，其所用之人多为少年，此可夺取的

理由之三；蜀地可依恃的天险剑阁，已在我军掌握之下，且益州 1/3 已为我占，从南安至涪城通达无阻，故前方屡战屡败，后方民心动摇，此可夺取的理由之四；萧渊藻是萧衍骨肉至亲，一定不会死战，若攻克涪城，萧渊藻定会望风而逃，蜀地士众胆怯且弓箭弱少，此可夺取的理由之五。现我已连克重重险关，民心皆有归顺之意，涪城成都旦夕可取。如若现在不取，以后再攻将甚为困难。益州为殷实之地，户口 10 万，比起寿春、义阳利多 3 倍，望朝廷把握战机，发兵攻取。”魏主婉言拒绝，邢峦再次上表劝谏魏主说：“过去邓艾、钟会率领 18 万大军，耗尽中国的储备，才得以平定蜀地；臣下才不如古人，所以敢以 2 万之军进取蜀地，实是由于地利、民心所致。臣正是知征伐的危险，故自入剑阁以来，鬓发半白，负担重重。但是，我若乘胜进军，夺得了涪城，便将益州占去一半，切断了敌之水陆交通。敌军外无援兵，孤军困守成都，定然难以持久！”魏主仍然不从。

魏主原先已任命王足为益州刺史，后来，又改派羊祉为益州刺史，王足得知，甚为不满，便率军而回。过了一段时期，王足投奔了梁朝。天监五年，北魏正始三年（公元 506 年）正月，杨集义围攻魏关城（今陕西宁强西北阳平关）。邢峦派建武将军傅竖眼率军讨伐，将其击败，乘胜攻克了武兴，于该地设置了武兴镇（今陕西略阳），后改为东益州。同时，以晋寿为益州，由羊祉镇守，梁州之争夺战遂告结束。

魏梁徐州、钟离争夺战

梁帝萧衍早有北上伐魏的企图，在其基本巩固了国内政

权之后,便于天监四年二月,召集群臣商议北伐事宜。当月十一日,即命卫尉卿杨公则率军堵塞洛口(今安徽淮南市东北青洛河与高塘湖北入淮河之口);六月,再命豫州刺史王超宗率军围攻魏之小岷(今安徽寿县东南),魏扬州刺史薛真度派军将王超宗击败。九月初一,杨公则率部与魏扬州刺史元嵩交战,杨公则军大败。十月初五,梁帝决心派大军击魏,这样,魏梁钟离地区的争夺战随即拉开战幕。

梁天监五年、魏正始三年(公元506年)正月,梁冀州刺史桓和率军首先攻北魏南青州未克。二月,梁徐州刺史昌义之率军与魏平南将军陈伯之交战于梁城(今安徽淮南),昌义之被击败。梁将萧昞率军向魏徐州进攻,兵围淮阳(今江苏淮阴西古泗水西岸)。三月十四日,魏荆州刺史赵怡、平南将军奚康生率部援救淮阳。与此同时,梁辅国将军刘思效击败魏青州刺史元系于胶水,取得了北征以来的首次胜利。此时,梁临川王萧宏致书陈伯之,劝其降归梁朝,陈伯之应允,率部众8000自梁城降。四月十六日,魏主见淮南地区梁军攻势日剧,遂决计大举发兵应战。任命中山王元英为征南将军、都督徐、扬二州诸军事,率军10余万迎击梁军。旋即,梁江州刺史王茂率军数万进击魏荆州,诱使魏边境百姓及诸蛮族另设立宛州,令其任命的宛州刺史雷豹狼等袭占了魏河南城(今河南新野北)。魏命平南将军勇将杨大眼都督诸军进攻王茂军,王茂兵败,被歼2000多人。杨大眼挥军攻拔河南城,王茂逃归,杨大眼军直追至汉水岸边,连拔梁五城。此时,魏征虏将军宇文福也率军进攻梁司州,俘千余人而去。太子右卫率张惠绍等率军进攻魏徐州,攻占了宿预(今江苏宿迁东南旧黄河东北岸古城),俘魏城

主马成龙，十一日，梁北徐州刺史昌义之攻克了梁城。梁豫州刺史韦叡派长史王超宗、梁郡太守冯道根等率军进攻小岷（今安徽寿县东南），未能攻克。韦叡亲自巡视魏军围栅，见魏军以数人于营外列阵。韦叡欲下令向敌攻击。众将以为军队刚到，未做好作战准备，应缓攻。韦叡认为城中守军 2000 多人，足以固垒自守，故今“无故出人于外，必其骁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众将仍犹豫不前。韦叡指其符节对众人说：“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叡之法，不可犯也。”随即下令进击。士众皆殊死而战，魏军不支，败退入营。韦叡挥军急攻小城，时过午夜，便攻拔了该城。接着，进兵合肥（今安徽合肥西北）。梁右军司马胡景略，久攻合肥不下。韦叡到达后，观察山川水势，率众于肥水筑堰，堵截水流，使梁之水军直接进抵合肥。此时，魏将军杨灵胤率 5 万大军突然杀至，众人惊恐，皆请求上表梁主增兵援救。韦叡沉着地答道：“敌已兵临城下，才请求增兵，为时已晚。况且我要求增兵，敌人也会相应增兵，用兵之道，贵在出奇制胜，不在人多势众。”于是，决然向杨灵胤军进击，将魏军击败。

梁军为确保水上通道，韦叡命军主于怀静于岸边筑城垒保护堰堤，魏军派兵向城垒进攻，将城内守军 1000 多人全部歼灭。魏军进攻堤下，兵势盛大，梁军惊惧，众将皆建议韦叡退保巢湖或三叉。韦叡大怒道：“宁有此邪！将军死绥，有前无却。”令部将取其缴扇麾幢，树立于堤下，以示决战到底的斗志。韦叡身体羸弱，每战均不骑马，以板车自载，亲临战阵督战，勇敢坚毅无人可比，常常夜半起床，谋划制敌之策，士众均愿为其效力死战。韦叡筑垒，阻止了魏军的进攻。随即出动与

合肥城等高的战舰，将合肥四面包围，魏合肥守军惊恐万状，相对啼哭，无应对之策。韦叡造攻城器具，此时堰水暴满，魏援军无用武之地。韦叡指挥水军全力攻城，魏守将杜元伦中弩而死，合肥城破，梁军俘斩魏军万余人。

五月十八日，魏军副统帅元遥率军自寿阳南进，进逼梁军。二十三日，梁庐江太守裴邃攻占了魏羊石城（今安徽霍丘东南），二十六日再占霍丘（今安徽霍丘）。梁王朝为减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临淮关）方向的压力，分散魏军的兵力，又于徐州及其附近地区发动攻势：以青冀二州刺史桓和进围朐山城（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海州镇），六月初七，攻克该城；六月十二日，梁太子右卫率张惠绍与假徐州刺史宋黑率军水陆俱进，包围了高塚戍（今江苏徐州西），直逼彭城（今江苏徐州），魏主命武卫将军奚康生率军相救，击败张惠绍军，斩宋黑。魏王朝为加强徐州方向的作战，于六月二十四日任命度支尚书邢峦为都督东讨诸军事。七月初三，梁将桓和攻占了魏兖州的固城（今山东滕县东北）。在徐州方向战事稍平静之际，钟离方向又趋激烈。七月二十五日，梁徐州刺史王伯敖与元英交战于阴陵（今安徽定远西北），王伯敖兵败，被歼 5000 多人。魏为加强南进的攻势，于当月二十六日，又征发定、冀、瀛、扬、并、肆六州军 10 万人南下。

此时，梁帝萧衍仍继续采取加强徐州方向的兵力，以求进一步分散魏军力量的策略。为此，派其将军角念率兵 1 万，进驻蒙山（今山东蒙阴西南），招纳兖州百姓，归附者甚多。此时，梁将萧及屯兵于固城，桓和屯兵于孤山（今山东滕县东南）。魏尚书邢峦命统军樊鲁进攻桓和，以别将元恒进攻萧及，统军毕

祖朽进攻角念。樊鲁于孤山大败桓和，元恒攻克了固城，毕祖朽击败了角念，角念退走。魏主下诏平南将军、安乐王元詮监督后续诸军前往淮南。同时，邢峦与梁将兰怀恭交战于睢口（今睢水入泗水之口），击败了兰怀恭军，兵围宿预。兰怀恭又于清水南筑城固守，邢峦与平南将军杨大眼合力攻城。至九月十一日，将该城攻占，杀守将兰怀恭，歼灭梁军数以万计。旋即，梁将张惠绍、萧昞分别弃宿预、淮阳南退。梁临川王萧宏统率诸军进至洛口（今安徽淮南东北青洛河与高塘湖北入淮河之口）。萧宏因是萧衍之弟，故其所统之军“器械精新，军容甚威，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顷刻，萧宏军前锋攻克梁城。此时，魏宣武帝元恪已下诏邢峦督各军渡淮，以与梁军决战，邢峦立即令部将奚康生、杨大眼率军前出。与此同时，梁将韦叡之军已屯于羊石（今安徽霍县东南），双方的决战态势已经形成。

梁军诸将皆主张乘攻克梁城之势，向魏军发起深远进攻，但萧宏生性怯懦，不敢顺势推进。此时，魏军合势，将攻击梁城，萧宏闻之惊惧，召诸将商议退兵之策。部将吕僧珍说：“知难而退，此为善策！”萧宏说：“我深觉僧珍之言有理。”尚书右仆杨愔则反对说：“自我大军来到，诸城皆降，何难之有！”太守裴邃说：“我军此次出征，就是与敌决斗，为什么要逃避敌人呢！”将军马仙琕、昌义之、朱僧勇、胡辛生等皆坚决表示要“前死一尺，无却生一寸！”萧宏心中虽然仍想退走，但不敢违背众将的意愿，只好停军不前。魏军得知萧宏不敢决战，便派人送女人衣服给萧宏，并且让士卒高唱：“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虎。”众将建议派裴邃率军攻击寿阳（今安徽寿

县),萧宏不允,同时号令全军说:“人马有前行者斩!”魏将奚康生见梁军不战的状态,急派杨大眼向中山王元英建议说:“梁军自攻占梁城,便久驻不进,可见敌军畏惧于我。我若进占洛水,敌军必自行溃败。”元英则认为:“萧宏虽愚笨无能,但其下有良将韦叡、裴邃,不可轻视,宜暂观望形势,不可与其交锋。”九月二十七日晚,洛口时逢暴风雨,梁军惊,萧宏仅率数骑逃走,将士们寻找萧宏不见踪影,皆四散逃归,丢弃的兵戈军资堵塞了河床,梁军死者近5万之众。此时,昌义之仍驻守于梁城,得知洛口兵溃,与张惠绍也率部撤退。元英挥军追击梁军,直至马头(今安徽怀远东南),攻拔该城,此时梁将韦叡仍驻守东陵(今安徽寿县南)。

十月,魏将元英率军欲进攻钟离。魏主为增强前线的力量,诏令邢峦率军前往会合。邢峦为此上书魏主说:“梁军野战虽非我军敌手,但守城却是他们之长,现若集中我全部精锐攻击钟离,取胜也无多少利益;战败则我耗损将难以估量。且钟离在淮水以南,即使其不战而降顺我军,我无充足的军粮也很难守住,何况兴师动众前往攻击。况且,我军出动已过半年,士卒疲惫死伤情况,已可想而知。虽目前尚有部分资粮,恐怕可用之军已相当微弱。为此,我认为应修复旧戍,安抚各州,等待时日再作行动,方为上策。”但元恪不从,令其急速进军。邢峦再次上表进言说:“中山王进军钟离,实难解其意,如欲冒险,直接偷袭广陵,出其不备,也许会侥幸成功,如果只凭80天的军资便想夺取坚城钟离,往昔还未出现过这种奇迹。敌人据城不战,而钟离又城坚水深,我将难以堵塞城堑。这样,我军顿兵钟离,徒然等到明春,士卒自然疲惫不堪。如若再令我率众前

去,既无从得到军粮补给,士卒又无冬季的寒装,若遇冰雪天寒,将难以应付。臣下宁可受不敢进兵的责备,不愿落个损兵折将空耗军力的罪名。钟离向为天险,朝中诸臣皆知,假使城内已有我军的内应,那么成败尚未可知,如无内应,必难攻占。陛下如不听臣下的劝告,请下令将我所率之军全部交由中山王统率。臣下愿以个人身分跟随中山王行动。”魏主仍不从邢峦的建议,将其召回,改命镇东将军萧宝寅协同元英共攻钟离。十一月初四,梁帝诏命右卫将军曹景宗都督 20 万军队援救钟离。先令其率军至道人洲(今安徽凤阳东北淮水中),待诸路大军齐集后,再一起进兵。曹景宗多次请求先行占领邵阳洲尾(今安徽凤阳东北淮水中),梁帝坚决不许。

梁天监六年、魏正始四年(公元 507 年)正月,魏中山王元英与平东将军杨大眼率数十万大军开始围攻钟离。钟离在淮水之南,魏军为渡过淮水,于邵阳洲两岸筑桥,并植树栅数百步,保护桥梁的安全,元英在南岸率军攻城,杨于北岸筑城防守渡桥,储备和运送军粮。钟离城仅有守军 3000,守将昌义之指挥部众随机应战,魏军以车和人背泥土填塞护城河,若士卒体力不支,来不及回转,便以土将其埋于河内。护城河填满后,魏军即以冲车攻城。魏军“昼夜苦攻,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万计,魏人死者与城平”。钟离仍岿然不动。二月,魏主诏令元英退军,元英请求魏主宽限至三月,待阴雨天气过后,保证攻克钟离城。魏主不许,再次下诏命其还军,元英复上表保证攻克该城。魏主无奈,便派步兵校尉范绍至元英军中,商议进退之策。范绍见钟离城池坚固,也劝说元英退军,元英仍不听从。

梁帝命豫州刺史韦叡率军援救钟离，并受曹景宗节度。韦叡接到命令，自合肥（今安徽合肥西北）直插钟离，凡遇山谷，便架飞桥通过。部将有人畏惧魏军强盛，多劝韦叡缓进。韦叡则说：“钟离守军现只能挖掘地洞而居，背负着门板才能出来打水，处境十分险恶，我们车驰卒奔尚嫌缓慢，何况还故意缓行呢！”遂率部加速行进，10天便赶至邵阳洲。韦叡令南梁太守冯道根连夜筑城树栅。冯道根非常善于筑城立栅，一夜之间便指挥部众于邵阳洲上筑起一座城垒，距魏军营垒仅百余步。天亮之后，元英发现了梁军所筑之城，以杖击地惊叹道：“是何神也！”曹景宗和韦叡等军“器甲精新，军容甚威，魏人望之夺气。”

梁将曹景宗担心城中守军惊慌，派人潜入城内通报援兵将至的消息，守军得知士气大振。魏将杨大眼勇冠三军，亲率骑兵1万前来交战，所到之处，尽皆望风披靡。韦叡将兵车聚集一起，排成阵势，抵挡杨大眼骑兵的突击，并以强弩2000枚同时射向魏军，利箭贯穿了魏军的盾牌，射伤很多魏兵，一支箭将杨大眼右臂射穿，杨大眼才引军退回。第2天黎明，元英自率大军交战，数次交锋，魏军不胜而退。入夜，魏军又来攻垒，仍未取胜。曹景宗招募敢死之士千人，于杨大眼城南数里筑垒，以切断魏淮水南北间的联系。

起初，梁帝命曹景宗修造高大的舰船，使舰的高度与魏军的城垒及渡桥等齐，准备以火攻破敌。此时，曹景宗与韦叡各进攻一座桥。三月，淮水突然暴涨，韦叡派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率军乘大舰向洲中的魏军进击，将洲中的魏军部队歼灭，另以小船装载干草，灌以油脂，焚烧魏军的桥

梁，火借风势，烟雾迷漫，梁军敢死之士，乘势砍断河桥与魏军城栅。梁大军乘着舰船，猛击敌人，魏军大溃。元英见河桥被毁，弃城而逃，杨大眼也烧营而退。魏军士众“趋水死者 10 余万，斩首也如之，所获军实牛马，不可胜计。”

魏梁义阳三关争夺战

梁天监七年、魏永平元年（公元 508 年）九月二十日，魏郢州（州治在今河南信阳）司马彭珍等人皆背叛，暗中引梁军前往义阳（今河南信阳），魏三关（平靖关、黄岘关均在河南信阳西南；武阳关在今河南罗山南）戍主侯登等人也举三关城降梁，梁将胡武城、陶平虏率军进围义阳。郢州刺史娄悦据义阳城固守。魏主复以中山王元英都督南征诸军事，率步骑 3 万，兵出汝南（今河南汝南），前往义阳解救。

十月，魏悬瓠（今河南汝南）军主白早生杀豫州刺史司马悦叛魏，自称平北将军，向梁司州（州治在今湖北孝感）刺史马仙琕求援。马仙琕随即率军进至楚王城（今河南信阳市北长台关西），命其副将齐苟儿率军 2000 助守悬瓠，同时梁主下诏以白早生为司州刺史。

魏主下诏以尚书邢峦行豫州事，率兵讨伐白早生。出兵之前，魏主元恪问邢峦说：“以卿之见，白早生是逃走还是死守？何时可将其平定？”邢峦答称：“白早生非有深谋大智，只是因司马悦暴虐无道，利用众人的愤怒情绪而起兵，百姓被胁迫，不得已而跟随他，即使梁军入城，由于水路不通，粮运无法持续，只能为我军所擒。白早生新得梁军援助和封锡，利欲熏心，一定会防守而不逃，我军一到，吏民必翻然而归顺，不出半年，

定可将白早生击灭。”魏主十分欣喜，即命邢峦出兵，同时命中山王元英所率之军为其援兵，北上合击白早生。邢峦率骑兵 800，倍道兼行，5 天即进至鲍口（今河南西平）。十月十四日，白早生命其大将胡孝至率军 7000，出城 200 里，迎击邢峦军，邢峦军奋力抗击，大破胡孝智，乘胜长驱直进悬瓠。白早生率军出城迎战，又被邢峦击败。邢峦挥众渡过汝水，包围悬瓠城。魏主特下诏加邢峦为都督南讨诸军事。此时，魏郢、豫二州，自悬瓠南至安陆（今湖北安陆）诸城邑全部为梁所占，唯信阳一座孤城为魏所有。十月二十七日，魏镇东参军成景雋杀宿预（今江苏宿迁东南旧黄河东北岸古城）戍主严仲贤，举宿预降梁。魏主为保障义阳方向的作战，遂于十一月十一日，派安东将军杨椿率军 4 万进攻宿预。魏主得知邢峦每战皆捷，下诏中山王元英率兵直趋义阳，元英以兵力单薄，多次上表请求增兵，魏主不允。元英只得率现有兵力进至悬瓠，随之便与邢峦合力攻城。至十二月初十，齐苟儿等开城门出降，白早生及其余党数十人被斩，元英旋即引军攻取义阳。梁宁朔将军张道凝屯兵楚王城（河南信阳市北长台关西），于十四日弃城而逃，元英军追击，将其斩首，马仙琕退往平靖关。魏义阳太守辛祥与娄悦共同守卫义阳，抗击梁军胡武城、陶平虏部。辛祥利用夜暗，出城偷袭梁军，生俘陶平虏，斩胡武城，梁军溃败，义阳之围随之而解。梁天监八年、魏永元二年（公元 509 年）正月，魏元英军至义阳将欲取三关，策划说：“三关相互依存，犹如人之左右手，如攻克一关，其余两关不攻自破，故攻难，不如攻易。东关易攻，应先取为宜，此即黄石公所说‘战如风发，攻如河决。’”元英怕敌人集中兵力于东关，便命其长史李华率 5 个统

军的部队攻击西关，以吸引梁军的兵力，自率主力直趋东关。

梁马仙琕部将云骑将军马广先屯守于长薄，军主胡文超屯于松岷。正月十八日，元英军至长薄，长薄军溃，马广率众退入武阳关，元英随之包围武阳关。梁帝下诏冠军将军彭甕生、骠骑将军徐元季率军援救武阳。元英见武阳关易于攻取便故意放梁之援军入城，然后全力攻城，交战6天，将武阳关攻克。生俘梁军3将以下7000多人，接着元英又转攻广岷，梁太子左卫率李元履弃关而逃，随即又攻向西关。守将马仙琕也弃关走。此时，前往支援马仙琕的梁韦叡已进至安陆（今湖北安陆），知马仙琕兵退，便止军不前，屯兵安陆，随即将安陆城墙加高两丈，挖掘围城大堑，于城墙之上建筑高楼，以备魏军来攻。众人颇笑韦叡胆怯。韦叡向众人说：“不然，为将当用时，不可专勇。”魏将元英急追马仙琕军，欲报钟离战败之仇，当得知韦叡已来，便引军而退。

魏梁胸山争夺战

魏梁第3阶段争夺战起于梁天监十年、北魏永平四年（公元511年）三月，止于天监十五年、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六月。魏梁双方经过争夺胸山、寿阳、益州诸战役，魏胜多负少，梁败多胜少，但战争的结局均以保有其原先所占领土而告终。

魏梁于第2阶段争夺战结束后2个月，也即天监八年，北魏永平元年（公元509年）三月，派荆州刺史元志，率军7万入袭潺沟诸蛮族，诸蛮族渡过汉水向梁投降。梁雍州刺史萧昌开樊城接纳诸蛮，随即命司马朱思远等率军攻击魏军，于潺沟将

魏军击败，斩首 1 万余级。四月，魏楚王城主李国兴以城降梁。当年十一月，魏宗正卿元树也投降于梁，被梁帝封为邺王。魏永平四年正月，汾州（州治在今山西隰县）胡人刘龙驹聚众起兵反魏，魏主下诏谏议大夫薛和调发东秦、汾、夏等州军前往征讨，将刘龙驹击败。

梁欲与魏通好，在释放被梁俘虏的魏中书舍人董绍时，梁帝萧衍亲自接见，赐其衣物，希望他回归之后，向魏主传达梁朝欲与魏通好之意。但是，董绍回归向魏主报告后，遭到魏主拒绝。天监九年（510 年）六月，梁发生了宣城（今安徽宣城）人起兵反叛事件。当时宣城郡吏吴承伯率众 2 万多人反梁，进攻郡府，杀死太守朱僧勇后，转攻周围诸县邑。闰六月，攻至吴兴（今浙江湖州），吴兴太守蔡搏招募士卒，将吴承伯军击败，斩吴承伯。吴承伯余众进至新安（今安徽休宁），攻占了歙（今安徽歙县）、黟（今安徽黟县）等县。新安太守谢览率军镇压，被义军击败，逃往会稽。后来，建康派兵围剿，起事被平定。

天监十年、魏永平四年（511 年）三月，梁琅邪人王万寿率众起事反梁，攻杀东莞、琅邪太守刘晰，占据了朐山（今江苏连云港海州镇），向魏军求救，于是，魏梁第 3 阶段争夺之战随之而起。

梁天监十年、魏永平三年三月底，魏徐州刺史庐昶相继派郯城（今山东郯城）戍守副将张天惠、琅邪（今山东省诸城东南）戍主傅文骥率军前往朐山，接应王万寿，梁青、冀二州刺史张稷派兵迎击魏军，未能取胜。四月，魏军占据了朐山，梁令振远将军马仙琕率军进击，魏旋即命假安南将军萧宝寅、假平东将军赵遐率军至朐山，均受庐昶节度。五月，马仙琕军包围

了朐山，梁多次发兵援助张稷，双方胶着于朐山城。秋，魏将庐昶向魏主请求增兵 6000 人，米 10 万石，魏主给其增兵 4000，十一月初七，魏主下诏扬州刺史李崇等兵出寿阳（今安徽寿县），以分散梁军围攻朐山的兵力。不久，朐山城粮尽，魏将傅文骧举朐山城投降于梁。十二月十九日，刘昶率军逃走，各军相继溃散，天降大雪，魏 2/3 士卒冻死或冻掉手足。马仙琕率军猛追，大破魏军，僵尸逶迤 200 里，仅萧宝寅率其部众安全而归，庐昶单骑逃至郟城，魏主将庐昶、赵遐免官。

魏梁寿阳争夺战

梁天监十二年、魏延昌二年（513 年）五月，寿阳久雨成灾，大水灌入城内，房屋几近淹没。魏扬州刺史李崇率守军驻扎于城墙上，诸将劝告李崇放弃寿阳，防守城北的八公山。李崇则认为，淮南万里的安危系于自己，一旦率部离开，百姓便会四散而逃，则扬州重地即会失去，决不为个人安全，而放弃寿阳。于是，决定先让百姓乘木筏，往高地避难，自率士卒与城共存亡。但是，扬州治中裴绚，以为李崇已北走，便自称豫州刺史，与别驾郑祖起等人向梁投降，梁主派将军马仙琕率军前来迎接。李崇先派人召请裴绚，遭裴绚拒绝，李崇随即命宁朔将军李神等率水军征讨，裴绚战败被俘，在押解途中投水自杀。

魏梁益州争夺战

梁天监十三年、魏延昌三年（514 年）十月，梁宁州刺史李略之侄李苗与益州主簿淳于诞，自汉中入魏而降，并向魏主陈

述攻取蜀地的策略，魏主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随即以司徒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率步骑兵 15 万入袭益州；并命益州刺史傅竖眼兵进巴北（今四川阆中），梁州刺史羊祉兵进庾城（似为今四川绵阳东），安西将军奚康生进击绵竹（今四川德阳北），抚军将军甄琛指向剑阁（今四川剑阁东北剑门关），以淳于诞为骁骑将军，假李苗为龙骧将军。准备发兵之前，又诏令中护军元遥为征南将军都督镇遏梁、楚诸地（今河南许昌以东地区），以防止梁军乘虚北进。天监十四年，魏延昌四年（515 年）二月，魏大军进至晋寿（今四川广元南），蜀人震恐。魏将傅竖眼率步骑 3 万进击巴北，梁帝派宁州刺史任太洪自阴平（今四川江油东北）间道进击魏军侧后，招抚巴氏部族，断绝魏军运粮之路。

此时，魏国内突然形势大变。天监十四年正月十三日，魏主宣武帝元恪病死，随即由年仅 7 岁的太子元诩即位。魏主随即于二月初七下诏，令高肇回师。

在魏军北归时，梁将任太洪率军偷袭东洛（今四川省昭化西北），除口两戍，同时虚张声势宣称梁援军陆续到来，一时之间氏人和蜀人纷起响应梁军。任太洪乘势进围关城（今陕西北阳平关），魏益州刺史傅竖眼命统军姜喜等率军进击任太洪军，任太洪军大败，弃关城而归。

魏梁寿阳再争夺战

早在天监十三年、魏延昌三年（514 年）时，梁帝萧衍接受魏降将王足的建议，于淮水上筑坝，企图拦蓄洪水，借以淹灌寿阳（今安徽寿县），但因河水迅猛，屡遭失败，空耗了大量人

力物力。梁既蓄淮水淹灌寿阳不成，便欲以兵力直接夺取，遂于天监十四年、魏延昌四年（515年）九月，命左游击将军赵祖悦率军袭占了魏西硤石，以威逼战略重镇寿阳，并修筑外城，将淮水沿岸民众迁于城内，随即由将军田道龙等率兵分攻魏军诸戍守城邑，魏扬州刺史李崇分别命部将率军迎击。九月，魏朝派假镇南将军崔亮进攻西硤石，又以镇东将军萧宝寅清除淮水上的堤堰，以解除淮水对寿阳安全的威胁。闰十二月，魏将崔亮进击硤石，梁将赵祖悦迎战失利，闭城固守，崔亮军随即包围该城。至天监十五年（516年）正月，魏军尚未攻克硤石，于是崔亮与李崇相约，从陆路和水路同时攻击，但李崇由于与崔亮不和，多次违约，不率军前往。为此，代行魏朝政的胡太后，下令吏部尚书李平为使持节、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加行台，节度各军，率骑兵 2000 前往寿阳督战。胡太后严令有违军令者，依照军法论处。

魏将萧宝寅派轻车将军刘智文等率军渡过淮水，攻占了 3 座城垒。二月初八，又击败梁将坦孟孙等于淮水北岸，再击梁筑之浮山堤堰。李平进至寿阳，即督令崔亮、李崇等军从水陆两路一起向梁军进攻，屡次获胜，再无人敢违背军令。

崔亮为阻止梁军增援，派将军崔延伯率部防守下蔡（今安徽凤台）。崔延伯进至下蔡，即与部将伊甕生夹淮水两岸构筑营垒，并将众多车轮的外框取掉，把车辐削尖，两轮相合，并以竹子做成大索，连接车轮，10 余道并排横于水上作为浮桥，两端装以大的滑轮，可随意收放，无法火烧和刀砍。这样，既切断了梁将赵祖悦的退路，又使梁战舰无法通行，故昌义之、王神念军至梁城（今安徽淮南田家庵附近）便无法前进，硤石援军

断绝，在魏将军李平等的水陆两军夹攻之下，外城失陷，赵祖悦出城投降，全军被俘，赵祖悦被魏军斩首。此时，胡太后下诏崔亮乘胜继续进军，但崔亮假称有病，请求回归。胡太后无奈，只好下令回师。

魏梁东益州争夺战

梁天监十四年、魏延昌四年闰十二月，魏龙骧将军元法僧接替傅竖眼为益州刺史，他既庸碌无能，又贪婪残暴，葭萌人任令宗聚众起兵反魏，杀魏晋寿太守，举城降梁，当地民众纷起响应。梁益州刺史鄱阳王肖恢即派巴西、梓潼两郡太守张齐率军 3 万前往迎接。

梁天监十五年、魏熙平元年（516 年）四月，魏刺史元法僧派其子元景隆率军迎击张齐军，被张齐大败于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南），屠城 10 余多，兵围东益州州治武兴（今陕西略阳西）。元法僧据城自守，州内其它城邑都降梁叛魏，魏为争夺东益州特召镇南将军傅竖眼为益州刺史、西征都督，率步骑 3000 驰援益州。傅竖眼进入益州，转战 3 日，行军 200 多里，9 战 9 胜。傅竖眼击杀梁刺史任太洪，张齐率兵退保白水（今四川剑阁东南）。傅竖眼原先任益州刺史时，出于其“不营产业，衣食之外，俸禄粟帛皆以饗赐夷首，赈恤士卒，捡勒部下，守宰肃然”，因而，深得当地各族百姓的敬服。在傅竖眼解职回朝时，益州民众相泣而送数百里，故益州百姓得知傅竖眼重来，皆欢欣鼓舞，沿途相迎，顺利进占了武兴城。

魏梓潼太守苟金龙兼领阳平关戍主，当初梁军来攻时，金龙病重，便由其妻刘氏率众登城拒战，与梁军相持争夺 100 余

日，士卒死伤过半，副将高景图谋降梁，她当即将高景及其余党数千人除掉。她与士卒分衣减食，生死与共，士众既畏惧又敬服。关城之内无水，城外水井皆被梁军所占，处境极度困苦。此时，正巧天降大雨，刘氏下令将全部衣物布帛悬挂室外，然后拧干取水。不久，傅竖眼兵至，关城围解，魏朝为表彰刘氏英勇善战，封其儿子为平昌县子。

六月，梁将张齐屡次从白水出发，进击魏之葭萌，傅竖眼派虎威将军强虬率兵攻击梁信义将军杨兴起，将其击败斩首，攻克白水。旋即，梁宁朔将军王光昭又于阴平被魏军击败，张齐亲率精勇 2 万与傅竖眼交战，七月，张齐军大败逃走。梁占据小剑（今四川剑阁剑门关北）、大剑（剑门关附近），二戍的守军皆弃城而逃，东益州遂全部又为魏攻占。

魏梁淮水南北地区争夺战

魏梁第 4 阶段争夺战发生于梁普通五年、北魏正光五年（524 年）六月，止于梁中大通元年、北魏永安二年（529 年）六月。在此期间，梁王朝乘魏北方各族人民起义与魏内乱之机，不断发兵北进，一度攻占魏都洛阳。后来，梁军为北魏大丞相尔朱荣所败，北征之师全军覆没。

北魏主宣武帝元恪当朝的后期，其统治的腐败黑暗已急骤地导致了其国势的衰落。权臣的专断、外戚的争权、民族的残酷压榨已使北魏的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趋走向水火不容的尖锐对立状态。

北魏的民族矛盾一直十分尖锐激烈，各族的起义反抗事件，此起彼伏。魏北方六镇、关陇地区及河北地区的人民大规

模起义便接踵而起。北魏王朝就是在一面镇压人民起义的同时，一面与梁王朝的北攻大军作战，战略形势已处于多面受敌、楚歌四起的危机之中。

梁王朝随着萧梁政权的逐渐稳固，腐败奢侈也日趋严重。临川王萧宏搜括的财物装满了 100 间仓库，在京都建康拥有几十处府邸，他私放高利贷，统统以人家的房产抵押，凡期满还不起债务者，一律被他赶出家门，京都众多百姓因此而流离失所。至于萧梁地方政权的贪残苛暴，更是普遍，普通二年（521 年）六月，梁义州（今河南固始东）刺史文僧明与边城（似在今河南固始南）太守田守德率部投降于魏，梁帝派大匠卿裴邃为信武将军、假节，督诸军前往征讨，于檀公岷（今安徽金寨西南大别山）击败魏义州刺史封寿，进围其城，封寿请求降服，义州又为梁所有。此后，北魏内政混乱，民众大起义，梁王朝认为有机可乘，遂开始策划北攻魏境。

梁普通五年、北魏正光五年六月，梁王朝决定乘魏人民起义之机，出兵北伐，以豫州刺史裴僧督征讨诸军，督率诸军分别出动。九月初一，梁将成景儁攻占魏睢陵（今江苏睢宁），北兖州刺史赵景悦包围了荆山（今安徽怀远西南），裴邃派别将攻击淮阳，自率骑兵 3000 进击寿阳（今安徽寿县）。九月十五日夜，攻占了外城，遭到魏扬州刺史长孙稚的顽强抵抗，1 日大战 9 个回合，不分胜负。后来，梁军的援军蔡秀成部迷失道路，未能及时赶到，不得不撤兵而归。

北魏为援救寿阳，以行台郢道元、都督河间王元深率军趋寿阳，以安乐王元鉴率军增援淮阳（今江苏淮阴西古泗水西岸）。元琛军至西硖石（今安徽寿县、凤台间），击走包围涡阳的

梁军，收复荆山戍。梁青、冀二州刺史王念神与元琛交战，也被元琛击败。十月，裴邃又率军攻占魏建陵城（今山东新沂南沐河西岸）、曲木（今江苏新沂县东南），接着，梁扫虏将军彭宝孙又攻拔魏之琅邪（今山东临沂西），彭宝孙再克檀丘（今山东泗水东南），裴邃攻占了狄城（今安徽寿县南），占髀城，进屯黎浆（今安徽寿县东南）。魏东海太守辜敬欣举司吾城（今山东新沂南峒嵒镇）降。定远将军曹世宗攻占了曲阳（今安徽凤台东北），又占秦墟（今安徽淮南东上窑镇），至此，魏许多城邑的守将，纷纷弃城而走。十一月初十，彭宝孙攻占魏东莞（今山东莒县东北），裴邃兵围寿阳之安城（今安徽霍丘东）、马头戍（今安徽寿县南）皆降于梁。十二月，魏荆山戍守军也投降于梁，与此同时，梁军又在义阳（今河南信阳市）方向节节获胜，武勇将军李国兴和信威长史杨乾率军接连攻占了魏义阳三关（河南信阳市以南），随之兵围义阳。魏郢州刺史裴询和西郢刺史田朴特合力抗击梁军，梁军围城 100 天未克，魏援军到来，李国兴引军退回。

梁普通六年（526 年）正月，梁雍州刺史晋安王萧纲，派安北长史柳浑击破魏南乡郡（郡治为今河南淅川西南旧县东南原丹江南岸）；司马董当门攻破魏晋城（今河南新野、邓县间）、马圈（今河南镇平南）、彫城（今河南邓县或镇平境）。此时，魏徐州刺史元法僧起兵叛魏自立为帝。魏发兵进击，元法僧乃派其子元景仲去梁请降，这对魏在徐州方向的作战是一个重大打击。

裴邃攻占了魏新蔡郡（今河南固始东北），梁帝随即命领军将军西昌侯萧渊藻、南兖州刺史豫章王萧豫综等率军跟进，

正月二十八日，裴邃攻占了魏之郑城（今安徽颖上县），汝水与颖水之间广大地区的百姓纷纷响应梁军。魏河间王元琛等一向畏惧裴邃的威名，率军进至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城父集），停军 8 个月不敢前进，魏主焦急，派廷尉少卿崔孝芬持节送上齐库刀催促其进兵南下，元琛才率兵前进。元琛军至寿阳，率兵 5 万出城与裴邃军决战，裴邃以逸待劳，布设四甄阵，并派直閤将军李祖怜与元琛军接战后佯退，元琛挥全军猛追，进入了梁军的伏兵阵内。裴邃指挥众军四面齐攻，魏军大败，被斩 1 万多人，余众退回寿阳城固守，不敢再战。

与此同时，魏军在徐州方向也被梁军击败。先是魏安乐王元鉴率军进击梁元略军于彭城（今江苏徐州南），元略大败，与数十骑逃入彭城，后来元鉴疏于戒备，元法僧率军突然出城袭击，大败元鉴军，元鉴弃众单骑逃走。接着梁将王希聃攻占了魏之南阳平郡（今安徽萧县以南地区），魏主见彭城局势危急，急派安丰王元延明为东道行台，临淮王元彧为都督，进兵彭城。

梁帝派往徐州方向作战的豫章王萧豫综，为齐东昏侯的遗腹子，对梁帝萧衍杀其父东昏侯霸占其母吴淑妃早已积恨在心，乘进兵彭城之机，于七月向魏军投降，魏军乘势进入彭城，纵军追歼梁兵，梁军被歼十之八九，魏顺利夺回了徐州诸郡县，兵至宿预（今江苏宿迁东南旧黄河东北岸）而还。十月，魏西荆（州治为今湖北隃西西北）、北荆（州治为今河南襄城）、西郢（州治在今河南泌阳）等州的诸蛮夷乘魏梁交兵之机，纷起叛魏，杀都督，占城邑，截断交通要道。十二月，诸蛮夷部众投降于梁，引梁将曹义宗等兵围魏荆州（州治为今河南邓县）。

魏都督崔暹率兵数万往救，行至鲁阳（今河南鲁山），便不敢再进。魏主又以临淮王元彧为征南大将军，率军征鲁阳蛮，以司空长史辛雄为行台左丞，东向叶城（今河南叶县旧县城），另派征虏将军裴衍、恒农太守王黑率军 1 万，兵出武关，以救荆州。不久，梁曹义宗等攻取了顺阳、马圈，与魏将裴衍等交战于淅阳（今河南西峡北），梁军战败，裴衍等收复顺阳，进围马圈，旋即，魏军缺粮，又为梁军所败，顺阳复为梁占。梁普通七年、北魏孝昌二年（公元 526 年），魏梁又于淮水交战。当时，淮水上涨，寿阳城几乎被淹没，梁乘机命郢州刺史元树等从北路进攻黎浆（今安徽寿县南），以豫州刺史夏侯亶等从南路攻击寿阳。十一月，梁将夏侯亶军所到之处，连连获胜，魏扬州刺史李宪举寿阳城投降梁朝，梁宣猛将军率兵进入了寿阳，至此，这座魏梁反复争夺多年的淮上战略重镇，入于梁手。

魏梁彭城、涡阳地区争夺战

梁大通元年、北魏孝昌三年（527 年）二月末，梁将成景偁率军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魏主派前荆州刺史崔孝芬为行台，率军迎击，梁军欲在泗水上筑坝拦水，淹灌彭城，崔孝芬与都督李叔仁等率部众将梁军击退。五月，成景偁攻克魏之临潼（今安徽灵璧东北潼郡村）、竹邑（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梁东宫直阁将军兰钦攻拔了魏之萧城（今安徽萧县西北），朔固（今安徽萧县南）。九月，梁谯州刺史湛僧智围攻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于广陵城（今河南息县），魏将军元显伯率兵往救。与此同时，梁主也派司州刺史夏侯夔军至广陵城下，元庆和举城降，元显伯军乘夜逃走，梁军追击元显伯，斩获魏军 1 万多人。接

着，梁军别将又屠楚城（今河南信阳长台关西）。梁帝命领军将军曹义宗、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率军与寻阳太守辜放会攻魏涡阳（今安徽蒙城），此时，魏散骑常侍费穆突然率军而至，辜放营垒尚未建立，附近只有士卒 200。辜放沉着坚毅，脱去头盔，下马坐于椅上，镇定应战，士卒皆殊死作战，以一当百，才将魏军击退。魏主随即派将军元昭等率 5 万大军援救涡阳，前锋进至驼涧，距涡阳尚有 40 里，陈庆之欲前去迎战，辜放认为，敌军前锋一定必是其精锐之师，不如等待他们自己前来，再行攻击，但陈庆之则认为，“魏军远来疲惫，距我又远，必定不会料到我军去攻击，在其大军未到之前，击其先锋挫敌锐气”。于是，单独率骑兵 200，奔袭魏军，一举挫败魏军前锋后，率军退回，与诸将联营前进，依涡阳与魏军相峙。双方自春至冬，交战百次，战士已极度疲惫，众人皆欲撤军而回。陈庆之则阻止众人说：“吾闻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须虏大合，然后与战。”陈庆之还以梁主有密令不许撤兵为由，阻止众人撤退，诸将遂不再议论退兵之事。

魏军于梁军背后筑 13 城，以扼梁军，陈庆之利用夜暗，全军衔枚而出，突然袭击魏军四城。此时，魏涡阳城主王纬乞降，魏所余 9 城，兵甲犹盛。梁军挑选 30 名俘虏分回魏营报告，同时将所俘魏军割去的左耳列于阵前，梁军紧随其后，冲击魏军营垒，诸城皆溃，魏军全部被梁斩获，尸体将涡水塞流，涡阳民众 3 万余口皆为梁有。

魏梁中原争夺战

梁中大通二年、北魏永安二年四月，魏郢州（州治在今河

南信阳市)刺史元显达向梁投降,梁帝命其郢州刺史元树,将军夏侯夔率军迎降。梁随即将魏郢州改称北司州,以夏侯夔为刺史,至此,魏梁争夺多年的战略重镇义阳及其周围地区尽入梁地。夏侯夔继之率军进攻魏毛城,威逼新蔡(今河南新蔡)。与此同时,梁豫州刺史夏侯亶也兵围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南),再攻陈项,魏行台源子恭率兵迎击。不久,魏汝南王元悦、东道行台临淮王元弼、北海王元颢、北青州刺史元世儁、南荆州刺史李志等皆向梁投降。五月,梁将曹义宗兵围魏荆州(州治在今河南邓县),不克,梁军以堰蓄水灌城,只差数板未全部淹没。此时,魏内乱日益加剧,无力相救,城中粮食将尽,刺史王罴与士卒煮粥分食,每次出战,不披甲胄,对天高呼:“天若不祐国家,令箭中王罴额。”如此历经3年,大小战斗无数次,王罴仍安全无恙、率众坚持战斗。不久,魏以中军将军费穆都督南征诸军事,率兵解救荆州。十月,魏行台尚书左仆射于晖等率军数十万,进击叛将羊侃于瑕丘(今山东兖州东北),魏军收复泰山。

元颢投梁之后,被梁封为魏王,不久,袭占了魏之铨城(今安徽宿县西南),并屯兵于此。梁中大通元年、北魏永安二年四月,元颢与梁将陈庆之乘虚自铨城攻拔魏之荣城,遂进至梁国(今河南商丘南)。魏将丘大千拥众7万、分筑九城以拒之,陈庆之经过激战,攻拔丘大千3垒,丘大千向梁军投降。魏见元颢有西进之势,于当年五月,以东南道大都督杨昱、西阿王元庆、抚军将军元显恭、镇守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尚书仆射尔朱世隆镇于虎牢(今荥阳西北汜水镇),侍中尔朱世承防守崤函关(今河南登封东南崤岭上),以屏障京师洛阳东方

的安全。五月十七日，元颢攻占梁国。随即以陈庆之为卫将军、徐州刺史，率兵西进，兵至荥阳，为杨昱的 7 万守军所阻，荥阳兵精城坚，元颢军无法攻克。元颢派人游说杨昱投降，遭杨昱拒绝，旋即，魏将元天穆与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几率大军先后进至荥阳，梁军士卒惊恐。陈庆之则鼓动众人说：“我们到此攻城略地众多，大家杀人父兄、劫人子女无数，元天穆的部众，都是我们的仇敌，我军只有 7000，敌众 30 余万，今日必须以必死的决心才能图存。而敌骑兵众多，长于野战，我应于敌大军尚未及集之前，即攻占荥阳，以据城而守，如若畏缩不前，将自取灭亡。”于是，士众拼死力战，经 5 天搏斗，终于攻占了荥阳，生俘杨昱，将魏军将领 37 人统统斩首，挖心而食，唯以杨昱是忠臣而免死。不久，元天穆等率军围攻荥阳，陈庆之率精骑 3000，将其击败，元天穆等逃走，陈庆之随即进攻险关虎牢。虎牢守将魏右仆射尔朱世隆、西荆州刺史王罴率骑兵 1 万，不敢与陈庆之数千之众交战，弃城而逃，陈庆之顺利攻占虎牢关。元颢军节节取胜，威逼洛阳，魏帝元子攸此时欲迁都长安，但长安已经残破，于是中书舍人高道穆向元子攸进谏说：“元颢部队数量有限，乘虚而入中原，主要是由于我将帅无能，陛下如能率宿卫部队，以重赏招募精勇，背城一战，臣等竭尽死力，定能击败元颢。如若顾虑难以取胜，不如渡过黄河北上，征召大将军元天穆、大丞相尔朱荣，令其会兵合击，少则 10 日，多则一月，定可成功。”魏主决定北走，五月二十三日放弃洛阳，渡河至河内郡（郡治在今河南沁阳）。元颢顺利进入洛阳。元颢虽占据了洛阳，但北魏的州郡仍很强大，此时元颢的后军都督侯暄屯兵于睢阳，魏行台崔孝芬、大都督刁宣率军急攻睢

阳，将侯暄击败斩杀；魏上党王元天穆率兵 4 万攻拔了大梁（今河南开封北）；将军费穆率兵 2 万进击虎牢。但不久，元天穆惧怕陈庆之，率兵渡河北走，费穆降于陈庆之，陈庆之复夺回大梁、梁国。至此，陈庆之以 7000 之众，争夺中原，击破魏几十万大军，交战 47 次，夺城 32 座，可见陈庆之军气势之锐。

六月初二，魏主命大丞相尔朱荣率军南下，兵至黄河岸边，与元颢军隔河相对。六月十九日夜，尔朱荣命车骑将军尔朱兆和大都督贺拔胜利利用木筏从硖石（今河南孟津西）偷渡黄河成功，随即奇袭元颢之子领军将军元冠受，将元冠受擒获。元延明的部众得知此讯，纷纷溃散，元颢不知所措，率其左右数百骑向南逃窜，后来逃至临颖（今河南临颖西北），为士卒所杀。陈庆之收集步骑兵数千人，结阵东退。元颢、陈庆之所占诸城邑，又皆归降于魏，尔朱荣急追陈庆之军，陈庆之军死伤殆尽，陈庆之剔去鬓发伪装成和尚，抄小路潜回建康，梁争夺中原最终失败。

第五节 北魏的社会危机

一、北魏“新民”

398 年，北魏在平城建都。平城周围，叫做“畿内”；环绕着畿内 1000 多里的地方，叫做“近畿”。这些地方，过去是拓跋部

游牧的故乡；北魏建立，成了它的根据地，也是它统治的中心。

北魏前期，这个地区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被征服的各族人民，陆续被迁往这里。有从东面来的，有从西面来的，有的来自朔漠，有的来自中原。其中，有沮渠氏和赫连氏的余部（北凉和夏的余众），有人数众多的汉族和高车族，有历史悠久的蛮，有开始出现在我国历史舞台上的奚（库莫奚，东胡种）。

十六国时期，各族统治者都纷纷迁徙民户，集中在都城的附近，但没有一个有北魏这样的规模。

398年，魏道武帝打败后燕，从后燕境内（现在河北和山东的一部分）迁来汉族、徒河（即鲜卑慕容部）、高丽和杂夷36万人，加上“百工伎巧”（手工业工匠）、共达46万人。429年，魏太武帝降服高车，把几十万高车人，迁到近畿的北边和西边。451年，南朝“降民”被迁到这个地区来的有5万家，一家以5口计算，总数当在25万。

这是几次规模较大的迁徙。在魏孝文帝迁都之前，100年中，北魏把被征服和降服于它的各族人迁到畿内和近畿，大约在20次以上。

被迁徙到这个地区来的各族人民，叫做“新民”。有的“计口授田”，在国有土地上，用官府的牛力耕种土地；有的被保留原有的部落组织，在指定的牧场上，放牛牧马；有的沦为“营户”，被规定世代在军队里服劳役；在皇帝的“恩命”下，有的被作为赏赐给了百官，叫做“隶户”；有的拨给了佛寺，成了“僧祇户”和“佛图户”。沦为奴隶的人，大多是战争中的俘虏。第一次征服战争结束，皇帝把俘虏当作“生口”，和马、牛、羊、

缯、帛一样，赐给文武百官。鲜卑贵族可以合法地占有 200 名奴隶，实际上，大贵族占有的奴隶，有的多到几千。贵族家里，还有一个专门管理奴隶的“典师”。北魏前期，宫廷里用奴婢从事各种生产劳动，有织绫、织锦的，有造酒的，有养猪、养羊的，有种菜的。

北魏在河西有一个广大的牧场。这个牧场时常爆发牧奴反抗北魏统治者的斗争。北魏的军事重镇薄骨律镇（现在宁夏灵武县）、高平镇（现在宁夏固原县）、统万镇（现在陕西榆林县西南）、怀朔镇（现在内蒙古包头市东北）、沃野镇（现在内蒙古五原县西北）在牧场四周形成一个包围圈，北魏统治者把重兵驻在这些地方，对于在这里放牧的牧奴来说，简直是个大牢狱。430 年，高车 3 万多家被迁到这里来。

鲜卑拓跋部的成员，自从“分土定居”以后，有的耕种土地，有的从事畜牧。他们是自由农民和牧民，但主要的职业还是从军。在征服战争中，有些人发了财，有些人战死，有些人从战场上回到家乡，在凄凉的茅屋下等待着新的出征。小农的贫富分化，本来是不可避免的，征服战争加速了这一过程。444 年，北魏皇帝命令有牛力的人家借牛给无牛力的人家耕种，借牛耕地 7 亩，以耘锄 2 亩地来报偿。473 年，又重申前令，而且规定，不服从命令的有牛力的人家，一辈子不许当官。统治者企图以行政命令来延缓这种贫富的分化，但分化并不因此而停止，不少鲜卑人终于失掉了生计，在外游荡，2/3 成了“游手”。

征服战争的胜利，富了北魏统治者，肥了鲜卑贵族。贵族的奢侈和平民的饥寒，形成了尖锐的对照。魏太武帝为了缓和

这种矛盾，便提倡节俭。他夸奖一个叫长孙道生的贵族，说这个贵族的熊皮障泥（马具上的一种饰物，是用来遮挡泥泞的）用了几十年，还舍不得调换。但贵族的奢侈如故，和所有封建统治者一样，魏太武帝的这种提倡，只能是停留在嘴上的教条。

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在这个地区，沦为农奴和牧奴。他们无时不在努力摆脱鲜卑统治者的羁绊，企图打碎身上的枷锁。这些人和鲜卑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地激化着。这是 398 年以来，这个地区的一个新的、基本的矛盾。鲜卑平民和贵族的斗争，久已存在，随着征服战争的胜利、结束，更不断地尖锐起来。魏孝文帝迁都之后，不到 30 年，被压迫的农奴、牧奴和鲜卑平民便形成一个伟大的力量，在这个地区，掀起一场大风暴，震撼着整个北魏的统治。

二、盖吴起义

451 年，宋魏交战，魏太武帝围攻盱眙（现在江苏盱眙县北），写信给守将臧质说：“攻城的兵士，都不是我们鲜卑人，东北面是丁零人和胡人，南面是氏人和羌人。你打死丁零人，可以减少我常山（现在河北正定县南）、赵郡（现在河北元氏县东）的叛贼；打死胡人，可以减少我并州的叛贼；打死氏人、羌人，可以减少我关中的叛贼。你打死这些人，对我没有坏处。”

常山、赵郡是丁零族聚居的地方。十六国时期，丁零族活跃在我国历史舞台上。后燕的建立，丁零族起过重要的作用。关中是氏族、羌族聚居的地方。这两个族先后在北方建立过前

秦、后秦和后凉。

胡人在并州最为集中，相当于现在的陕西，甘肃也有。他们有种种不同的名称：山胡、稽胡、羯胡、屠各、吐京胡、卢水胡……，照当时惯例，一律叫做杂胡。这些胡人，曾被匈奴征服，他们随匈奴从西域迁来已经三四百年了。

北魏统一北方，实行严峻的军事统治，对待这些少数民族人，更加残暴。各族人民，被迁徙到平城附近，强迫从事农耕和畜牧，或者被迫为营户，在军队里服劳役，被当作牛马一般看待。

北魏前期，从魏道武帝攻占中山到魏孝文帝拓跋（元）宏改制，90年来，各族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被旧历史书记载下来的，超过70次。其中，少数民族人的反抗斗争，丁零有5次，胡有18次；氐、羌在关中的起义，魏太武帝时就有2次。

在这些反抗斗争中，445年关中盖吴的起义，是北魏前期各族人民起义中影响最大的一次。

西晋以来，关中是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的地方。西晋政治家江统说，关中人口100多万，“戎”“狄”要占一半。少数族中，有氐、有羌，有山胡、卢水胡，还有屠各等。北魏征服关中，在氐族聚居的地方，设仇池镇（现在甘肃成县西）；在羌族聚居的地方，设李润镇（现在陕西大荔县东）；在卢水胡聚居的地方，设杏城镇（现在陕西黄陵县西南），实行军事镇压。关中历代的名都——长安，这时也成了军事镇慑的中心，叫做长安镇。各镇镇将全由鲜卑贵族担任，掌握军事大权。杏城镇将曾由卢水胡酋帅郝温充当过，但这不过是“以夷制夷”的个别情况。

所以，关中地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表现得最复杂，最尖

锐。人民对北魏的残酷统治不满，北魏境内，流传着“灭魏者吴”的谶语。

445年，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起义，起义群众10余万人。它严重威胁着北魏的统治，使得北魏皇帝竟然害怕听到盖吴这个名字。

盖吴以杏城为根据地，这年十月，打败了北魏长安镇副将拓跋纥的进攻，自称天台王。接着，他派了一支部队由白广平率领，向西进军，泾河两岸的少数民族居民纷纷响应。白广平渡过泾河，在汧城（现在陕西陇县南）打了一个大胜仗，杀死了北魏的守将。盖吴亲自率领主力军东进，攻打李润；后来又回师西攻长安。

盖吴起兵之后，“关内大震”，北魏调兵遣将，从各地调集的骑兵，总数达8万人，连高车部骑兵也从遥远的北方调来了。魏太武帝本人，也不得不在这一年的年底，亲自出马，来挽回颓势。

关中各族人民起义，在445年冬末，达到一个高潮。东起潼关，西到汧陇（现在陕西、甘肃交界的地方），到处燃烧着起义的火炬。盖吴还派了一个使者赵绾到江南去，呼吁宋朝皇帝出兵。

盖吴起兵之前，数百年来居住在河东（现在山西西南部）地区的蜀族领袖薛永宗已经举起了反魏的旗帜，薛安都也已经占领了黄河南岸的弘农（现在河南灵宝县南）。蜀族是从四川迁到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多数居住在河东，有一部分在现在陕西居住。蜀族的起义，和盖吴一东一西，遥相呼应。

446年初，魏太武帝带了大兵围攻薛永宗。由于北魏兵力

占优势和薛永宗事前准备不够，薛永宗被打败，带领全家老小，投入汾水，壮烈地牺牲了。薛安都被迫放弃弘农，到南方投奔宋朝。

蜀族起义被镇压后，魏太武帝渡过黄河。北魏军距离盖吴主力军不过 60 里，但是魏太武帝不敢决战，沿着渭水南岸直奔长安。魏太武帝企图用屠杀来稳定渭河以南的秩序，在周至（现在陕西周至县）血洗了以耿青、孙温为首的两个武装居民点。长安有一座佛寺，里面存放了一批武器，魏太武帝认为和尚不该有武器，一定是和盖吴通谋，把全寺的和尚都杀光了。

后来，盖吴的主力在杏城被北魏将军乙弗拔打败，魏太武帝从长安回到平城，又特地派兵去李润，屠杀羌族的居民。

但是，屠杀熄灭不了反抗的火焰。在盖吴主力军被打败之后，由边冏、梁会领导的氐、羌、屠各等族人民起义的火光，又在金城（现在甘肃榆中县西北）、天水（现在甘肃天水市西南）照亮着被压迫者的希望。盖吴也重新结集了力量，回到杏城。关中人民起义，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北魏从河北增调 2 万兵力，在长安以南布防。

顽强的战斗，从五月到八月，差不多继续了 100 天。起义军的领袖白广平在战斗中牺牲了。有些领袖被俘，盖吴也牺牲了。

盖吴死后的第二年（447 年），吐京胡和山胡起义。山胡领袖曹仆浑被杀害，起义群众，誓死不降，“赴险死者以万数。”

20 年后，杏城这个地方，盖平定，成赤李和曹平原又先后举起盖吴的旗帜。再过 20 年，杏城镇改置了北华州，李润镇改置了华州，仇池镇改置了渠州。关中这个地区，严峻的军事统

治机构便被官僚行政机构代替了。

三、“争富”和“佞佛”

493年，魏孝文帝开始营建新都。新的洛阳城，在汉魏（曹魏）故城的基础上重建，前后经过了10年。城东西长约6里，南北9里，大小和故城一样。城外东西南3面，有市场和街坊，伊、洛2水，为这些市场提供了交通运输的便利。如果把这些包括在内，新都的规模，东西20里，南北15里，比汉魏（曹魏）故都大得多。

城南4里的洛水上，有一座浮桥叫永桥。桥南有整齐优美的建筑群；大街小巷，槐柳成荫，掩映着高门绣户。靠东是北魏招待各方来人的地方，靠西是这些人的居留地。从南方来的人住在“金陵馆”，3年以后赐宅“归正里”；从东方来的人住在“扶馆”，3年以后赐宅“慕化里”；从北方来的人住在“燕然馆”，3年以后赐宅“归德里”；从西方的来的人住在“崦嵫馆”，3年以后赐宅“慕义里”。

居留在这里的所谓“附化之民”，最多的时候有1万多家。其中，从南朝来的3千多家，老百姓管他们居住的“归正里”叫“吴人坊”；人们在那里贩卖水产，因此又叫“鱼鳖市”。

城西4里有个大市，周围8里。大市东面，有许多商人的住宅。

大市西面的延酤、治觞2里，居民以酿酒为业。

荒废了170多年的洛阳，成了北魏的新都，也成了北魏统治者享乐纵欲的中心。像高阳王元雍的住宅、园囿，和皇宫、禁

苑一样豪华,吃一顿饭,花费数万钱。河间王元琛,和元雍比富,家里养骏马 10 余匹,有远从波斯国来的,名为“追风赤骥”,日行千里;马曹是银制的,环锁是黄金制的。他邀集王公饮宴,金银用器几百种,来自西域各国的水晶、玛瑙、赤玉雕琢成的酒杯、饭碗、菜盘,都十分精巧。府库中,藏满了钱绢和各种织物,有毛织的锦罽,(音计,地毯),麻织的越葛,丝织的绸绫,罗的颜色洁白如雪,縠(音胡,罗的一种)轻得象雾。他对章武王元融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石崇是西晋有名的富人,曾和大贵族王恺斗富,晋武帝帮着王恺,也斗不过他)元融见了这般奢侈,又叹羨,又懊恼,躺在床上 3 天起不来。江阳王元继来看他,说:“何必这样呢,你的财产,不见得比他少呀!”元融说:“我过去总以为只有高阳王的财产比我多,现在才知道河间王又胜过高阳王!”

贪婪充满了这些王公贵族的心。

统治阶级在精神上同样堕落。516 年,胡太后(宣武帝元恪的妻子)在洛阳城内造了一座佛寺,叫伏永宁寺,僧房楼观,大小 1000 余间。寺内有九级浮图(塔)一座,高 1000 尺,上面有闪闪发光的金顶。塔上有金铎 120 枚,金铃 5400 枚,“高风永(长)夜”,铃铎声韵铿锵,远远传到 10 多里外。浮图北面有座佛殿,供奉一尊丈八的金像,10 尊普通高度的金像,3 尊绣珠像,5 尊金织像,两尊玉像,制作十分奇巧。自从佛教传入中国,这样的佛寺、宝塔,还是第一次出现。

518 年,洛阳佛寺已有 500 所;534 年,激增到 1367 所。州郡佛寺,这时,有 3 万多所,僧尼多到 200 万。

洛阳南面的伊阙,山崖峭拔,北魏皇帝在这里为他们的父

母凿石造像，营建石窟。3个巨大的石窟，从500年开凿，到523年，用了80多万人工，继续了24年，统治者造像立寺，一时成风，贵戚冯熙一人，在各州郡造的佛寺，多到72所。

斗富和佞佛，说明了北魏统治者的生活腐化和精神空虚。

兴建佛寺，耗费了无数的人力和物力。在北魏政府残酷剥削之下，忍受不了“调役”（租税和力役）的人们，以出家为名，逃往寺院。一小撮僧侣地主，便广占田园和劳动人手。政府直接剥削的对象，因之减少，其财政收入也减少了。

在魏孝文帝死后不到20年，北魏便面临着崩溃的命运。孝文帝的儿子宣武帝在位时，吏部这个衙门，已经成了卖官的市场，被当时人叫做“市曹”。506年，吏部尚书元晖定价卖官，大郡2000匹绢，次郡1000匹绢，下郡500匹绢，其他官职，也按不同等级，定出不同售价。孝明帝（宣武帝的儿子）初年，元修义做吏部尚书，上党郡太守出缺，有个中散大夫高居，皇帝已经允许他优先补官，他便求补上党郡守。但是元修义接受了别人的贿赂，不肯给高居这个位子；高居便在公堂上，大呼有贼。有人问他：“光天化日，哪来的贼？”高居指着元修义说：“坐在这里的人，因为别人出了重价，违背皇上命令，不让我去当官，岂不是白日行劫吗？”

519年，崔亮做吏部尚书，实行“停年格”，当官的人，一律按年资顺序补官。当时，有人认为这个办法不好，不论人才高下，也不管人品好坏，不合任官唯才唯贤的标准。崔亮承认这些意见有理，但认为不合“权宜”。“停年格”的实行，正反映了当时官位竞逐的剧烈，也说明了北魏统治者处理这个问题时的束手无策。

贪污之风一时泛滥成灾。河间王元琛做定州刺史，任满回洛阳。胡太后（孝明帝的母亲，孝明帝在位，由她当政）说：“这个人在定州，什么都要，只差没有把中山宫搬来！”（中山是后燕的都城，北魏皇帝在这里有行宫）

有一次，胡太后带了一班王公大臣去看库藏，让他们自己从绢库里背绢帛，说能背多少，便给多少。大贵族章武王元融，大官僚李崇，都给绢压得跌倒了，一个跌伤了脚，一个跌损了腰。

统治者贪财逐利。

北方经济，在北魏统一之后，经过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有了较大幅度的恢复和发展。劳动人民辛勤创造的财富，在孝文帝死后三四十年中，被消耗得精光。改革时，规定户调绢 1 匹长 4 丈，不准滥收。这时，官吏征收绢帛，每匹却长到七八丈。田租粟米，也因采用大斗、重秤，增加不少。“均田制”下农民的负担，骤然增长了 1 倍到 2 倍以上。高利贷者趁火打劫，利息高到 250%。

“委斗筲（小人）以共治之重，托硕鼠（贪官）以百里之命”，统治阶级中有一些人，对这一现状，也不禁感到悲愤，发出了这样的责难。

四、胡太后乱政

太和二十三年（499 年），孝文帝死，皇太子元恪继位，是为世宗宣武帝。宣武帝在对南朝的军事斗争中，有一定武功，但在国内政治上却无所建树。他崇尚儒学，沉迷佛教，“宽以摄

下”，优柔寡断，致使北魏政治开始逆转。腐败现象日见滋蔓。他的近侍右卫将军元晖、侍中卢昶 2 人，时人号称为“饿虎将军”、“饥鹰侍中”。执政大臣莫不贪财受贿。咸阳王元禧任侍中、太尉，受孝文帝遣诏辅政，位居宰辅之首，而受贿为人请官，蓄养姬妾数十，仍然是意犹未尽。另一顾命大臣北海王元详，任司徒、侍中、录尚书事，也是位望兼极，而“贪冒无厌，多所取纳，公私营贩，侵剥远近”。又纵情声色，大建园池，逼占民宅，朝野闻知。高肇以帝舅任尚书令、冀州大中正，最为宣武帝亲信，但胸无学识，控制不住政局，使在朝官吏，莫不丧气。

延昌四年(515 年)，宣武帝死，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领军将军于忠、詹事王显、中庶子侯刚等人迎太子元诩即皇帝位，是为孝明帝。尊高皇后为皇太后，尊其母胡充华为皇太妃。高太后谋议诛杀胡充华，宦刘腾密报侯刚等人，反逼高太后削发为尼，出居瑶光寺。胡充华成为皇太后。这时元诩年仅 6 岁，胡太后遂临朝听政。胡太后死后谥号为“灵”，故又称其为灵太后。北魏从道武帝拓跋珪始，为防止母后、外戚擅权，立下 1 条制度，凡皇子被立为皇太子者，其母必须自裁。因此后宫嫔妃，均盼生女不生男，即使生男，也唯恐立为太子。唯独胡充华认为，不可因 1 人畏死而使皇家无嗣，祈祝自己能生太子，及其怀孕，有人劝她坠胎，被她谢绝。她生下 1 子，名诩，是宣武帝的长子。元诩 2 岁，被立为太子，宣武帝也革除旧制，从此立太子不再杀其母。

胡太后临朝听政后，北魏政治更为败坏，她无政治远略，生活上荒淫奢侈，崇信佛教，初听政，便滥用民力，在京师修建永宁、太上公等佛寺。永宁寺中建 9 层浮图(塔)1 座，高 100

丈，离京城百里便可遥见。角角悬有金铎，共 120 个。浮图北有佛殿 1 所，中塑丈八高的金像 1 尊，还有 1 人高的金像 10 尊，绣珠像 3 尊，金织像 5 尊，玉像 2 尊。寺内共有僧房楼观 1000 余间，皆是“雕梁粉壁”。门墙也是用功奇巧，“世所未闻”，确实是“殫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胡太后又令外州各造 5 级浮图，又常常大办佛事斋会，施舍物品全以万计。胡太后如此佞佛残民，使“百姓疲于土木之功，金银之价为踊上”。在胡太后的默许纵容下，王公贵族的腐败也更为严重。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大兴土木，追逐着争侈斗富。大小官吏都只想着比富，贪官污吏也就愈来愈多，促成了北魏王朝“土崩鱼烂”之势。胡太后在用人方面也是“委用非人”，她重用奸佞宦官刘腾和妹夫元叉，任由其胡作非为。刘腾为侍中、光禄大夫，常常干预朝政，受人贿赂，为人求官，皆被胡太后批准。河间王元琛，为定州刺史，以贪纵著名，任满还朝，被废于家。他请求为刘腾的养子，贿赂刘腾金宝以巨万计，刘腾便向胡太后推荐他为都官尚书，出为秦州刺史，到任后又变本加厉地大肆聚敛，百姓视他如虎狼。元叉也是恃宠骄盈，野心勃勃，皆不把朝官放在眼里，太傅清河王元怿，也是胡太后亲信，以亲王辅政，看不惯元叉的为人，想方设法贬退他。正光元年（520 年），元叉勾结刘腾抢先一步，诬陷元怿欲谋害宣武帝，矫诏召集公卿，杀害元怿。二人恐胡太后怪罪，又幽禁胡太后于北宫。从此刘腾与元叉共执朝政，表里擅权，一个在宫内，一个在朝廷，“共裁刑赏，政无巨细，决于二人，威振内外”。朝廷八坐、九卿等大官，每日要先去刘腾府上请示问安。观颜察色，然后才敢归各官府办公。大臣有事请求，不论公事

私事，只看送上钱物多少。又利用手中大权经营商业，刻剥六镇，“岁入利息以巨万计”。元叉在朝廷也是执掌机要，任情罢免官吏。他的父亲京兆王元继见儿子在朝廷得志，在家与妻子公开受贿授官，大小官吏，不送礼便不任命，甚至连郡县的小吏也得送礼才能任命。在这种腐败政治下，牧守令长无不是极力贪污，“由是百姓困穷，人人思乱”。

刘腾病死后，元叉独掌内外大权，意骄志满，纵情酒色，放松了对胡太后的防卫。孝昌元年（525年），胡太后乘机与高阳王元雍定计，解除了元叉的军权，后又赐死于家，元叉党羽，均被罢免，胡太后二次临朝听政，大赦改元。

这时在地方官吏、镇将的残酷剥削压迫下，六镇等地的各族人民起义业已爆发，如火如荼。胡太后不思选拔人才，整顿吏治，征治贪官，清除腐败，抚慰民心，与民休养生息，缓和阶级矛盾，依旧是“颇事妆饰，数出游幸”。又从自己的私欲出发，重用毫无威望的郑俨、徐纥等人，这些人手执朝纲，势动内外，与她一样“宣淫于朝”，大失众望。因连年镇压农民起义军，府库空虚，国用不足，北魏王朝向均田农民预征6年租调，仍是入不敷出。胡太后又下令加重各种税收，改京师地区田租1亩为5升，借贷公田的农民每亩出1斗；又制定市场税，规定凡出入于市场者，均须交纳1钱；对旅店也分为5等，按等收税。各地官吏也是聚敛无厌，不顾百姓死活，正光年间（520—524年）之后，四方多遇旱涝等灾，百姓困厄，本已不能自存，在贪官污吏无穷尽的剥削下，更多的均田农民被迫投入起义队伍，起义队伍的声势越来越大。针对官逼民反的这种情况，吏部郎中辛雄上书胡太后，说：“华夷之民相聚为乱，岂有余憾哉！正

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时早加慰抚。”胡太后不听。不久，胡太后为能长久掌权，满足她的权力欲，不顾民心和局势之严重，竟毒杀亲生儿子孝明帝元诩，立年仅 3 岁的元钊为帝。消息传出，举国惊愤，人人知天下之安再也无望。

孝文帝以后，北魏的统治阶级已失去往日奋发开拓，积极进取的精神，诸王公大臣，围绕着“权”与“利”角逐不已，互相残害，离心离德，鱼肉人民，这种种因素组成的合力，促成北魏速亡。

五、尔朱荣入洛

尔朱荣，北秀容（今山西朔县北）人，其先世为部落酋帅，因居尔朱川，故以此地名为姓，其高祖尔朱羽健，在北魏登国年间（386—395 年），是领民酋长，率契胡武士 1700 人，助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进攻后燕，在平定晋阳、中山之役中立下大功，拓跋珪下令把尔朱川周围 300 里地封给他，永为世业。到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时，家资已是相当雄厚，牛、羊、驼、马，各以颜色为群，不计其数，朝廷每有战事，则献马资助。尔朱荣继承家业，养有部曲 8000。北魏正光年间（520 年—525 年），各族人民起义蜂起，尔朱荣知天下将乱，便散其畜牧资财，暗地招募勇士，结纳豪杰，侯景、司马子如、贾显度、段荣、奚泰等人皆闻名去投奔他。后来贺拔岳、高欢、尉景等人陆续依附了他。

六镇起义时，起义浪潮波及到秀容郡，内附民乞伏莫干先率众起义，攻破秀容郡，杀秀容太守。南秀容牧子万于乞真也

率领牧奴起义，杀太仆卿陆延。并州牧奴素和婆岭也聚众造反。这些起义都先后被尔朱荣派兵镇压。其后乞步落又举起义旗，刘阿如也率领一支义军活动于瓜州、肆州之间，敕勒人北到步若也反于沃阳，斛律洛阳反于桑干，又都被尔朱荣的队伍屠杀。孝昌二年（526年）八月，尔朱荣率军到达肆州，肆州刺史尉庆宾知其有野心，恐有意外，紧闭城门，不允许尔朱荣军入城，尔朱荣大怒，攻破该城，改任其从叔尔朱羽生为肆州刺史，尔朱荣兵精马壮，势力越来越大，北魏朝廷想借他之力扑灭起义军，对他乱杀地方朝廷命官不仅不怪罪，而且再次晋升他为镇北将军。鲜于修礼领导的河北起义兴起后，尔朱荣上表请求东讨，被进号为征东将军、右卫将军、假车骑将军、都督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诸军事，进为大都督，加金紫光禄大夫。后葛荣火并杜洛周军，义军声势盛，尔朱荣又上书朝廷，请求允许他带 3000 骑兵东援相州，卫护邺城，胡太后不许。唯恐他势力过大后，朝廷无法牵制，反养虎遗患。胡太后的亲信大臣徐纥也建议胡太后离间尔朱荣部将，以削弱他的力量。尔朱荣无奈，只得分兵北捍马邑，东塞井陘，再等待机会，对徐纥也更加愤恨。

这时在朝廷内部，胡太后与孝明帝元诩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烈。胡太后不愿让孝明帝执政，凡与孝明帝亲近的大臣，均被胡太后一一除去，孝明帝也厌恶郑俨、徐纥帮助胡太后，极想除去。因手中无实权，朝中无得力大臣，无法办到，于是想借助外援达到夺权的目的。他给尔朱荣下了一道密诏，命他率军赶赴洛阳。尔朱荣接诏，立刻以高欢为先锋，急向洛阳进军，大军行至上党，孝明帝觉此举不妥，又忙下令停止进军。此事

被郑俨、徐纥得知，恐大祸降临，忙与胡太后密谋，孝昌三年（527年）春，鸩杀了孝明帝元诩。又以一个才生下的皇女充做皇子，立为皇帝。不久，见人心已安，复下诏说前所立皇帝实际上是女婴，应当重新选择一个王子为帝，于是改立临洮王元宝暉的世子元钊为帝。元钊年仅3岁，胡太后想长久执掌朝政。因此故意挑选了年幼的元钊为帝，朝廷大权仍操在胡太后手里。

胡太后的所作所为，为尔朱荣进军洛阳制造了机会。尔朱荣听到朝廷大变动的消息后，立即与并州刺史、北魏宗室元天穆商议，欲率铁骑入洛阳，翦诛奸佞，更立年长者为君。深为元天穆赞同。乃上书直言：“孝明皇帝崩驾，海内咸称为鸩毒致祸，现在群盗沸腾，邻敌窥视，而想以年幼儿童镇天下，不是怪事吗？希望允许我赴京，参预大议，寻察帝暴崩之由，法办徐纥、郑俨之徒。然后重择宗亲以继帝位。”胡太后内心畏惧，赶快派尔朱荣的从弟尔朱世隆至晋阳抚慰尔朱荣。三月，尔朱荣与元天穆商量，以为长乐王元子攸素有威望，可立为皇帝。2人议定，乃遣侄儿尔朱天光及亲信奚毅等人潜入洛阳，征询尔朱世隆的意见，并面见元子攸，向他转述了尔朱荣之意，元子攸表示同意。尔朱天光归晋阳报告后，尔朱荣对立元子攸为帝之事仍然有所犹疑便令工匠以铜为孝文帝及咸阳王元禧等6王的子孙各铸一个铜像，能铸成者当立为帝，结果唯有元子攸的铜像铸成了。尔朱荣坚定了主意，乃自晋阳发兵。胡太后闻讯，召集诸王公计议，宗室大臣都痛恨胡太后所为，无人言语，徐纥独认为，尔朱荣是小胡，破之不难。胡太后也以为是这样，任命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率众拒抗尔朱荣，另派别将郑

季明、郑先护率兵守御黄河大桥，派武卫将军费穆屯兵小平津，阻拦尔朱荣入洛。

尔朱荣率军至河内郡后，遣心腹王相秘密进入洛阳，迎接元子攸。四月丙申这一天，元子攸与兄彭城王元劭、弟霸城公元子正暗暗由高渚北渡黄河，与尔朱荣在河阳相会。3日后，大军南渡过黄河，元子攸正式即皇帝，是为敬宗孝庄皇帝。以兄元劭为元上王，以弟元子正为始平王，以尔朱荣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封太原王。元子攸称帝后，胡太后派遣的守将郑先护、郑季明、费穆当天倒戈投降尔朱荣，李神轨见势不好，急忙率军逃归。徐纥得讯，知大势已去，矫诏在夜里开了宫中门，骗取骅骝厩御马10匹奔兖州，郑俨也逃隐乡里。胡太后无处可走，把孝明帝后宫嫔妃尽数召来，命令全部出家为尼，胡太后自己也落发出家。尔朱荣派人召百官前来迎接孝庄皇帝。第二天，百官奉玺绶，备法驾，前往河桥迎孝庄帝。次日，尔朱荣派骑兵抓来胡太后与幼主元钊，送至河阴（今河南洛阳市北），胡太后对尔朱荣极力解释，尔朱荣不听，拂衣而起，下令把胡太后与幼主沉入黄河。又骗百官到行宫西北集合，声称要祭天，待百官到齐后，命骑兵层层包围，纵兵大杀，自丞相高阳王元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义王元略以下，百官死者达2000余人。又令军士高呼：“元氏既灭，尔朱氏兴”。军士皆称万岁。又另遣军士数十人闯入行宫，杀元子攸兄元劭与弟元子正，迁元子攸于河桥，严加看守。此次事变，史称“河阴之变”。

高欢等人都劝尔朱荣称帝，贺拔岳认为不妥，尔朱荣犹疑不决，自铸金像占卜，连铸四次未铸成。功曹参军刘灵善卜筮，

尔朱荣特别迷信他，就问他可否称帝，回答说不可。尔朱荣又欲让元天穆称帝，也回答说不可，刘灵助说：“唯长乐王有天命耳。”于是尔朱荣取消了自己称帝的念头，又于当天夜里迎接孝庄帝还营。尔朱荣所带骑兵杀的大臣太多，不敢入洛阳城，有心向北迁都，武卫将军 讷礼坚决反对，尔朱荣才奉送孝庄帝入洛阳皇宫。这时洛阳城几乎成为一座空城，士民闻尔朱荣进洛阳，无论贫富，纷纷外逃，百官残存者也逃窜躲匿不出。孝庄帝登太极殿，下诏大赦，改元建义，只有散骑常侍山伟一人跪在下面，后见尔朱荣不再杀戮，士民才陆陆续续回到洛阳。

尔朱荣仍然想迁都，后见宫阙壮丽，列树成行，才罢迁都之议。五月，孝庄帝加拜尔朱荣为北道大行台，尔朱荣至明光殿，再次向孝庄帝谢河桥之事，发誓决不再有二心，孝庄帝也保证没有疑心。为稳住尔朱荣，孝庄帝又纳尔朱荣女为皇后。尔朱荣回到晋阳，令元天穆入洛阳，任侍中、录尚书事、京畿大都督兼领军将军，又以行台郎中朱瑞为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朝中要官也全以心腹充任。七月，孝庄帝又加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这时葛荣领导的起义军正向洛阳进发，尔朱荣自率骑兵围攻，葛荣轻敌被俘，被尔朱荣囚车送给孝庄帝。孝庄帝又加尔朱荣食邑十万户，为太原国邑，进位太师。

前北魏北海王元颢，当“河阴之变”时南奔萧衍，这年十月，萧衍又立元颢为北魏皇帝，年号孝基，派大将陈庆之送元颢还洛阳。孝庄帝以为元颢兵弱，不以为虑，命元天穆等将先镇压山东的邢杲起义，然后再回师征元颢。谁知陈庆之用兵神速，乘虚径进，连克梁国、荥阳、虎牢等城，进逼洛阳。事出意

外，孝庄帝只带少数随从逃离洛阳，北渡黄河到达上党长子。尔朱荣由晋阳赶到长子，与孝庄帝相见，率兵反攻过黄河，大败陈庆之军，元颢、陈庆之复南奔萧衍。孝庄帝归洛阳复位，加拜尔朱荣天柱大将军。其后，尔朱荣又命人镇压了葛荣余部韩楼率领的起义军，又命雍州刺史朱天光镇压了关陇起义军，俘斩万俟丑奴等人，扑灭了北魏农民起义的烈火。

尔朱荣虽然远居晋阳，但遥制朝政，朝廷要臣多是其党羽，朝中大小事情，都须向他汇报。选拔大小官吏，皆由他定夺。再加上尔朱皇后性妒忌，孝庄帝是外逼于尔朱荣，内迫于皇后，极为不满。便与城阳王元微、侍中李彧、杨侃、尚书右仆射元罗等人密谋，决意杀尔朱荣。永安三年（530年）九月，尔朱荣至洛阳朝见孝庄帝，孝庄帝伏兵于明光殿东廊，当尔朱荣与其长子尔朱菩提、元天穆等人坐定后，伏兵冲出，杀元天穆与尔朱菩提，孝庄帝亲手刃了尔朱荣。尔朱荣在朝党羽纷纷外逃。

尔朱荣死后，北魏政局更为动乱。同年，尔朱荣的侄儿尔朱兆轻骑袭击洛阳，驱散卫士，生擒孝庄帝，送至晋阳杀死。尔朱世隆等人先立长广王元晔为帝，后又改立为广陵王元羽之子元恭为帝。尔朱氏家族虽然暂时还控制着朝政。但由于内部不团结，互相猜忌，其力量大为削弱，后来，尔朱氏家族尽被高欢诛灭，北魏政权又操纵在高欢手里。

六、北魏末年各族人民起义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给北魏带来了一些兴旺景象。但是，

好景不长，从宣武帝开始，剥削加重，徭役频繁，统治阶级生活腐化，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起来。

在这样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各族人民大起义。起义首先爆发于六镇。接着有关陇人民起义，河北、青州起义。

北魏初年，为了拱卫都城平城，防御柔然南下，拓跋焘曾在北面沿边建立了一些军事据点，称作镇。其中最重要的是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均在今内蒙境内）和怀荒镇（今河北张家口北）等六镇。原先，镇将都是宗室贵族，镇兵也多是“高门子弟”、“强宗子弟”，被视为“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他们不但可以做大官，而且免除一切赋税徭役，成为人们羡慕、追求的美职。随着孝文帝迁都和时日旷久，镇兵的身份逐渐降低，许多犯罪的人被发配到北边为兵，“役同厮养（仆役）”。边镇军民还受着镇将的剥削、压迫，“腴美”的好田都被“主将参僚”占有，“瘠土荒畴”才给他们耕种。反抗情绪在六镇中日益高涨。公元523年，柔然主阿那瓌率众30万入塞，烧杀抢掠而去。柔玄、怀荒等镇遭受极大的破坏。群众要求镇将救济，遭到拒绝。不久，沃野镇的破六韩拔陵杀死镇将，率众起义，占领了沃野镇。于是各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纷纷起义响应，一时“六镇尽叛”。公元524年，破六韩拔陵攻下武川、怀朔两镇，又先后大败魏兵于五原、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北），起义军完全控制了六镇。

公元525年，破六韩拔陵起义军在北魏和柔然夹击下失败了。北魏政府把起义军“降户”20万人强迫迁往内地冀、定、瀛3州（今河北省）“就食”。这个地区阶级矛盾本来已很尖锐，

加上连年灾荒,已是“饥馑积年,户口逃散”。六镇人民依然受苦,到河北后也无食可就,终于在河北又爆发了起义。

公元 525 年,柔玄镇兵杜洛周率领“六镇降户”,在上谷起义。后来攻下幽州、定州和瀛州,击败柔然主阿那瓌的军队。公元 526 年,以怀朔镇兵鲜于修礼为首的“六镇降户”也在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起义。击败北魏派来镇压的军队,起义军发展到 10 多万人。鲜于修礼被叛徒杀死后,部将葛荣继续领导起义军进行战斗。他们击杀了北魏大将元融,后来更俘斩了北魏军队的最高统帅广阳王元琛。河北各地农民纷纷起而响应,参加起义队伍。起义军占领了河北广大地区,发展到几十万人。葛荣杀了杜洛周,吞并了杜洛周的群众,两部合计将近百万。起义军的矛头直指北魏京师洛阳。

葛荣出身镇将,杀害了杜洛周,拉拢汉族豪强地主,却又轻侮汉族人民。他的军队纪律很坏,攻破沧州城,居民被杀的有十之八九。这就不能不造成起义军内部的分裂,也使他自己脱离了广大群众。同时,葛荣在胜利形势下,冲昏了头脑,对于北魏尔朱荣带领前来镇压起义的“契胡”劲旅,毫不戒备,声言:“此易与耳”,又列阵数十里,分散了兵力。结果,在滏口(今河北邯郸市西)一战,起义军大败,葛荣也被尔朱荣军俘虏杀害。

葛荣失败后,余部在韩楼等人领导下继续战斗,一度占领了幽州,发展到数万人。六镇兵民在并州、肆州也先后发动了 20 多次反抗起义。关陇的莫折念生起义军后来在万俟丑奴等的率领下,也一直坚持到公元 531 年。

这些起义虽然最后被北魏政府镇压下去了。但是,经过这

次沉重的打击，北魏政府却大大地削弱，不久就土崩瓦解了。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是汉族、鲜卑族、羌族、氐族等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北魏政府的联合行动。羌族起义军曾一度占领潼关，威胁洛阳。在战斗中，各族人民进一步消除了隔阂，增进了相互了解，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各族的融合。这次起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大融合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七、北魏灭亡

公元 534 年，孝武帝在长安宫中喝下一杯毒酒，北魏王朝历时 149 年的历史也就随之告终了。

高欢失去的虽是个傀儡皇帝，但在政治上就失去了号召力。他为挽回劣势，就在洛阳又立了位皇帝，即孝静帝元善见。国号仍称魏，史称东魏（534—550 年）。

北魏的孝武帝在长安被鸩杀以后，关陇地带的军人首领宇文泰也另立了一位皇帝，继续称魏。史称西魏（535—556 年）。

统一的北魏，被分裂成东魏与西魏，两个皇帝，东西对峙。其实，两个皇帝，一对傀儡，地位都如同囚徒一样。东魏的孝静帝一次想出去骑马散闷，刚刚骑到马上，监视的官员就来呵斥他：“天子不要骑马，大将军要生气了！”又一次，他同高欢的儿子高澄饮酒，说话时自称为“朕”，高澄就怒骂道：“朕，朕，狗脚朕！”并令人狠狠地揍皇帝 3 拳。过后，皇帝反向那个揍他的人致意，并赏绢 100 束。

第六节 东魏、西魏、北周

一、东魏西魏邙山决战

魏自东西分裂，战争连年不断，尤其是河南地区，更是战火不熄，田园荒芜，财穷民竭，“民多饿死”。东魏丞相高欢为准备战争，下令各州凡是靠近河边、渡口、桥头的地方，均要修建粮仓，储存粮谷以备荒年和供军队调运。高欢并下令在幽、瀛、沧、青等四州靠近海滨的地方煮盐，以充实国库的费用。这样，由于东魏农业连年丰收，国力稍见恢复。

西魏也积极整顿吏治，选择人才，恢复经济，休养生息，增强国力。为在东面稳住阵脚，其东道行台王思政于平定崤山和澠池一带地区后，上书请求增修玉壁城（今山西稷山西南）的防务，并自请由恒农调往该城屯守。西魏主下诏令其为都督汾、并 2 州诸军事。

自大统六年五月以后，西魏国内连续发生了几起反叛事件。行台宫延和、陕州刺史官延庆投降于东魏。原已臣服的吐谷浑，非但早已断绝了与西魏的往来，而且还于这年的十一月，借道柔然，去往东魏修好，这无疑从西面构成了对西魏的战略威胁。大统七年（541 年）三月，西魏夏州刺史刘平伏占据上郡，起兵反叛，大都督于谨前往讨伐，将其生俘。宇文泰又与

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苏绰改革时政，推行富国强民之法，并设置屯田，增加军资。大统八年（542年），正式设置了六军。这些，都对西魏国力的增强具有一定的作用。

东魏高欢自上次河南失利后，已深感争夺河南已非易事，而夺得河南再入潼关，险阻重重，更属不易。故东魏一方面以其大行台侯景屯重兵于河南；另一方面则自率大军，夺取薄阪、进逼关中，以与宇文泰决战，彻底灭亡西魏。

西魏宇文泰深知由晋阳趋蒲阪，渡越黄河，进占华州（州治在今陕西大荔），迂回长安侧背，乃是治其于死地的要害。故其始终屯重兵于华州，亲自坐镇，以防不测。当得知高欢率大军而来，也便发倾国之军，直趋蒲阪，迎击高欢，欲将东魏军阻于河东。

梁武帝大同八年、东魏兴和四年、西魏大统八年八月，东魏按照预定策划，命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侯景为兼尚书仆射、河南道大行台，并赋予其于河南地区随机征讨独断专行的大权。丞相高欢开始率大军自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西古城）出动，向西南趋汾绛。高欢军连营 10 里，声势十分浩大，拉开欲自河东进关之势。西魏丞相宇文泰急令并州刺史王思政坚实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以切断高欢军的进军之路，同时以太子钦率军镇守蒲阪，高欢写信欲招降王思政，许诺让其掌管并州，遭王思政拒绝。二月，高欢兵围玉壁，围攻 9 日不克，时值大风雪，“士卒饥冻，多死者”，遂退兵。此时，宇文泰已率军进入蒲阪，并前出至皂荚（似在今山西永济境）。当宇文泰得知高欢率军退走，急率部追击，但高欢军已渡汾水远去，宇文泰遂回师。

东魏武定元年、西魏大统九年(543年)二月,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叛离东魏,举战略重镇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降于西魏。西魏前几次与东魏的争夺,始终未彻底战胜东魏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未曾占据虎牢险关。因之,当宇文泰得知虎牢守将高仲密来降,便亲率各路大军接应。宇文泰以太子少傅李远为先锋,迅速进至洛阳,随即命仪同三司于谨率军进攻柏谷(今河南宜阳县南),得手后,转兵进围河桥南城(今河南孟津西南)。

三月,东魏丞相高欢亲率 10 万大军进至黄河北岸。宇文泰得知高欢军至,率部退至瀍水边。为阻止高欢军渡河,烧毁河桥,便从上流放下许多燃烧的火船。高欢部将斛律金令行台郎中张亮以百余只小船,曳带长长的链条,驶入河中,将每只火船钩住,岸边收拉链条,统统把火船拉至岸边,保住了河桥,使 10 万大军顺利渡河。

高欢渡河后,于洛阳西北邙山一带布阵,数日不进。宇文泰为轻装前进,沿邙山偷袭高欢军,将辎重留于瀍曲,夜间悄然而进,当行至距高欢军 40 里处时,被高欢军的侦察骑兵发现,高欢军立即戒备,严阵以待。十八日黎明,两军相遇,展开交战。此时,高欢的右军彭乐率数千骑冲向宇文泰军的北翼,所向皆溃,彭乐乘胜直冲宇文泰的大营,宇文泰慌忙败退。彭乐军俘获了西魏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临洮王元柬、蜀郡王元荣宗、江夏王元昇、钜鹿王元阐、谯郡王元亮、詹事赵善和督将僚佐共 48 人。高欢乘势挥军追杀斩敌 3 万多人,取得了邙山决战的首战胜利。

高欢令彭乐急追宇文泰,追及后,宇文泰对彭乐挑拨说:

“今天如果没有我，明天你也会被诛灭，快去营内拿取你需要的财宝！”彭乐听从了宇文泰的话，将宇文泰的金带和财宝拿回，向高欢报告说：“宇文泰弃刀而逃，已吓破肝胆！”高欢对彭乐取胜虽然高兴，但却对他放走宇文泰十分恼火。令其趴在地上，抓住他的发髻，连续往地上撞击数次，并举起刀在他的颈上前后三次欲往下砍，气愤已极，彭乐再三请求愿领 5000 精兵，前去捉拿宇文泰。高欢还是念他大胜宇文泰军之功，赏赐彭乐 3000 匹绢，宽恕了他。

第二天，双方再战。宇文泰领中军，中山公赵贵领左军，领军若于惠等领右军。中右两军合力向东魏中军猛攻，东魏中军大败，连高欢的乘马也被冲走。部将赫连阳顺将自己的乘马让给高欢，高欢仅率步骑兵 7 人而逃。当高欢即将被西魏兵追及时，其亲信都督尉兴庆以身佩的百枝利箭，不断射杀西魏追兵，才掩护高欢逃脱。

东魏降卒向宇文泰报告了高欢的去向，宇文泰立即招募勇士 3000 人，配合大都督贺拔胜再击高欢。贺拔胜追上高欢，率 13 名骑兵，冲入高欢阵中，眼看要刺倒高欢，不料东魏河州刺史刘洪徽以利箭将贺拔胜身旁的两个从骑射中，射死了贺拔胜的乘马，高欢乘机远逃。贺拔胜对天叹道：“今日不执弓矢，天也！”西魏虽中军和右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其他各军却连连失利。西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贵所部被东魏军击破，他单骑冲入敌阵，挥刀左右砍杀，决心拼死一战，一人杀伤大量敌军。西魏左军赵贵等五员大将均战败，东魏军士气又振，宇文泰率军来战，又不胜。此时，天已黄昏，宇文泰引军退走，高欢军急追。在这危急时刻，大将独孤信、于谨突然从背后攻击东魏的

追兵，东魏遭此突袭，才暂停追击，宇文泰率部逃脱，退入关中。高欢率军尾追宇文泰军，进至陕州（州治在今河南三门峡西旧陕县），西魏开府仪同三司达奚武占据州城，阻止东魏军的西进。高欢是进是退，犹豫不定。行台郎中封子绘向高欢建议说：“统一东西魏，正在今日，天与不取，反受其害。天赐良机不可失去，昔日曹孟德进军汉中，未能乘胜收取巴、蜀，失于犹豫不决，后悔莫及，愿大王速进。”高欢深为赞许，再召众将相议，大家认为野外没有青草，马匹疲惫消瘦，不宜远追。部将陈元康力主继续西进，高欢怕宇文泰中途设置伏兵，而不愿西进。陈元康说：“当年沙苑之役我军失利，敌人尚没有设伏，今天敌人慌忙败逃到如此程度而不追击，西魏必为后患。”高欢不从，只命部将刘丰生率数千骑继续追击，自率大军而归。

宇文泰命将军王思政镇守恒农。王思政得知东魏追兵将至，令士卒大开城门，脱衣而息，并慰劳激励将士，表现得毫无畏惧之情。数日后，刘丰生率军进至城下，见此情景，心中疑惧，不敢进攻，领兵退回。

至此，北豫州、洛州等地均入于东魏之手，但战略重镇虎牢仍在西魏控制之下。

二、北齐建立

547年高欢死后，其子高澄，高洋相继执政。550年，高洋废孝静帝，自立为帝，即文宣帝，国号齐，年号开宝，史称北齐。开始北齐也曾进行过一些改革，但却不能坚持实行下去。北齐的前后几个皇帝，都很荒淫残暴。到齐后主高纬时尤其突出，

可说昏庸腐败到了极点。这位齐后主不理政事，整天抱着琵琶弹唱“无愁曲”，自号“无愁天子”。他役使大量民工建造起“穷极壮丽”的宫殿，但又“所好不常”，几次拆毁重建，浪费掉大量人力物力。平日赏赐自己的亲信，往往“一戏之赏、动逾（超过）百万”。甚至供他玩耍的狗、马和鹰，也要封给“赤彪仪同”、“逍遥郡君”、“凌霄郡君”之类的官号。他喜爱的公鸡也被封为“开府”（官名），按数享受俸禄。国库空竭，不足供费，他就拿出二三个郡或六七个县，让手下拿去鬻爵卖钱。结果许多州县官职都被富商大户纳钱买去。这些人到任以后，必然竭尽全力压榨人民，以便捞回更多的油水。在北齐的腐朽统治下，贵族豪强“恃势侵夺”，疯狂地兼并土地，以致“富有连畛巨陌，贫无立锥之地”，阶级矛盾下分尖锐。自东魏到北齐，农民起义一直没有停息，这便从根本上动摇了北齐政权。北齐崇尚佛教，各地大修佛寺，“劳役金巨万计”。当时北齐境内僧尼人数竟达 200 多万，寺庙四万余所，致使全国“户口租调，十亡六七”，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北齐政权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也甚不得法。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并引起鲜卑贵族内部亲汉、排汉之争。齐文宣帝曾杀掉汉化的鲜卑族元氏家系的人 700 多人。齐后主在位时，又大肆滥杀汉人汉官。北齐政权既失去了汉族地主的支持，又失去鲜卑贵的支持，逐渐分崩离析，陷入极端孤立的地位。

三、北周的建立

公元 557 年，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废掉西魏皇帝，在长安

登基,改国号周,史称北周(557—581)。

北周占据关中地区,僻处西北一隅,经济凋敝,民穷兵弱,力量远不及控制着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广大地区的北齐强盛。但是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北周却能逐渐强大,并终于灭掉北齐,统一北方,这不是偶然的。

早在宇文觉代魏之前,其父宇文泰已经实际上控制着西魏政权,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宇文泰出身于鲜卑宇文部族。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一直努力争取汉族地主的支持,积极学习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他重用汉人苏绰,制定了计帐(以乡为单位计算户口、土地和赋役的办法)、户籍等制度,并对北魏以来实行的均田制和租调制,也作了一些必要的改进。如规定:有家室的男子受田 140 亩,未娶妻的男丁受田 100 亩。前者每年交纳绢 1 匹、绵 8 两、粟 5 斛,后者减半,受灾歉收则规定可以适当减免。力役也按年成好坏,分别定为每年负担三旬、二旬或一旬。这些改革,使宇文泰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得到加强和巩固。宇文泰在军事上创行府兵制。全军由 6 柱国分领,下设 12 大将军、24 开府。每个柱国督两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督两个开府,每个开府领 1 军,共 24 军。军士都由固定的将领统率,而且另立户籍,不再负担其它赋役。实行这种制度,提高了士兵身份,改善了兵将之间的关系,战斗力大大加强。宇文泰控制下的西魏当时虽然国力较弱,但在军事上已经能够和实力雄厚的东魏抗衡,还常能“以寡克众”。经过宇文泰的长期经营,为后来北周武帝的进一步改革和最终灭齐,准备了很好的条件。

北周正式取代西魏的第三年,即公元 560 年周武帝宇文

邕即位后,进一步摆脱鲜卑旧俗的束缚,继续推行多方面的改革。他几次下诏把从江陵俘虏来的奴婢全部释放为民,把他们投入生产。他还注重增辟农田,兴修水利,于“蒲州开河渠,同州开龙首渠,以广灌溉”,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周武帝注意促进民族融合,大量招募汉人充当府兵,扩大了士兵的来源,加强了北周的军力。周武帝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是禁断佛、道二教。早在北魏末年,不少人“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纷纷投身佛寺,使得僧民数量恶性膨胀。北周境内即有僧侣 100 多万,相当于政府户籍的 1/10,侵占去国家手中的大量劳动力,严重影响政府财政收入。公元 574 年周武帝“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断然下诏禁止佛、道二教,销毁佛经佛像,勒令僧道还俗。寺观的土地财产全部没收,分赏臣下,充为国用。成百万的僧侣以及僧祇户(依附于寺院的佃客)、佛图户(寺院奴隶)被编入户籍。这一措施大大增加了北周的财政收入和兵役来源,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周武帝的一系列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向,调整了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发展。通过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北周国力显著增强。这就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为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周武帝在励精图治实行改革的同时,北与突厥和亲,南和陈朝通好。在争取到突厥和南陈,同时南北出兵配合的约定,完成了外交上的部署之后,武帝亲自率军东进,开始的消灭北齐的战争。

四、北周伐北齐

周欲出兵击灭北齐，便于周建德四年、北齐武平六年二月，下令首先在边境地区增加兵力、储备军资。北齐得知，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以防不测。陈宣帝太建七年、周建德四年（575年）、齐武平六年七月周主宇文邕下诏伐齐，任命柱国、陈王宇文纯、荥阳郡公司马消难、郑国公达奚震为前 3 军总管；以越王宇文盛、周昌郡侯莫陈崇（琼）赵王宇文招为后 3 军总管；以齐王宇文宪率兵 2 万，直趋黎阳（今河南滑县旧城）；以随国公杨坚、广宁郡公薛迥率水师 3 万，自渭水入黄河，顺流东下；以柱国、梁国公侯莫陈芮率军 2 万，扼守太行道（在河阳北，为通向并、冀等州的要道）；以申国公李穆率兵 3 万，防守河阳道；常山公于翼率部 2 万，自安陆（今湖北安陆），向陈（今河南陈留）、汝（今河南汝南）进发。七月三十日周主宇文邕自率大军 6 万，并以大将杨素为先锋，直捣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

八月下旬，周师进入齐境。周主为争取北齐民心，下令禁止砍伐树木，践踏庄稼，违令者斩首。八月二十五日，宇文邕攻占了河阴大城，宇文宪部攻拔了武济城（今河南孟津），随之攻占了洛口（今河南巩县西北，洛水入黄河之口）东、西二城，并放火焚烧了浮桥。此时，北齐永桥大都督傅伏乘夜潜入河阳之中泅城防守。周师攻克了南城后，即包围中泅城 20 天不克。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率部固守金墉城（今河南洛阳东北），周主宇文邕亲自率军围攻，也久攻不下。

九月，齐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晋阳率兵南下，迅速进抵河

阳。此时周主宇文邕病，遂于九月初九日夜撤军西归。但恰逢黄河水涨流激，舟师若溯流西上，恐为齐军追及，于是只得焚毁舰船，改由陆路退走。至此，周军首次大规模击齐，即告草草收兵。

陈太建八年、北周建德五年、北齐隆化元年(576年)十月初四，周主宇文邕再次下令进击齐国，首先指向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金殿)。以越王宇文盛、杞国公宇文亮、随国公杨坚分别率部为右3军；谯王宇文俭、大将军窦泰、广化郡公丘崇分别率部众为左3军；齐王宇文宪、陈王宇文纯统率前军。月中，宇文邕率军进至晋州(州治今山西临汾)，驻扎于汾曲(临汾西南汾水弯曲处)。随即命宇文宪率精骑2万，屯守雀鼠谷(今山西介休西南，霍县北汾河谷)，宇文纯率步骑2万，屯守千里径(今山西霍县东)，达奚震率步骑1万，防守统军川(亦名统军水，今山西洪洞县南汾水东岸支流)，大将军韩明率步骑5000，防守齐子岭(亦称秦岭，在今河南济源西北)，以焉氏郡公尹升率步骑5000，屯守鼓钟镇(今山西坦曲境)，以凉城郡公辛韶率步骑5000，驻守蒲津关(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东黄河上)。命赵王宇文招率步骑1万，自华谷(今山西稷山西北化峪村)进攻齐汾州诸城。柱国宇文盛率步骑1万，防守汾水关(今山西灵石南汾河东岸，亦称阴地关)，同时以内史大夫王谊监督六军攻打平阳城。

齐晋州道行台仆射、海昌王尉相贵据守平阳四周城戍，抵御周军的进攻。

齐主高纬于晋阳晋王祠集结重兵，兵分3路，一路1万兵马攻向千里径(今山西霍县东)，另1万兵马向汾水关进击。高

纬自率主力大军趋鸡栖原。十一月初四，齐主高纬率大军进至平阳城下。周主宇文邕见齐国声势极盛，便决定西返长安，以避齐军锋锐。周师已退，齐师包围了平阳城，日夜围攻，城中情况异常危急。周守将梁士彦率士卒拼死力战，并激励部众说：“死在今日，吾为尔先。”周军人人奋勇拼杀，“无不一当百”。周主得知，遂命宇文宪率军 6 万，驻于涑川（今山西西南部之黄河支流涑水河），遥为声援。此时，平阳城已被齐军从地下挖塌一段缺口，齐士众欲乘势攻入城内，但齐主高纬却要部队停止攻击，等待其宠姬冯淑妃前来观看，然而，当冯淑妃梳妆打扮来至城下时，周军已用圆木将缺口牢牢封住，使齐军失去了夺回平阳的战机。

十一月十九日，周主下令再次攻齐。二十二日大军从长安出发，赶往平阳。二十七日周大军渡过黄河，十二月初三，进抵高显（今山西曲沃西北），第 2 天，周 8 万大军进至平阳城下，东西列阵绵延 20 多里。齐军为阻周军的推进，便于城南挖掘一道深沟，从平阳城西的乔山一直延伸到汾水之边。周齐两军隔壕相持，难决胜负。此时，齐主高纬问其右丞相高阿那肱，是决战还是不战。高阿那肱认为，原 10 万大军，除病伤勒杂人员外，能够参战的士卒不过 1/3，故面对强敌，应以走为上策。但一些将领和宦官则主张与周军决战，高纬于是令部填塞壕沟，向周军进击。周主宇文邕见此情景，十分高兴，立即下令迎击齐军。

高纬与冯妃并马观战。此时，周军将齐军东西的阵势稍稍向后逼退，冯妃便惊呼：“军败矣！”齐录尚书事、城阳王穆提婆便催促齐主说：“大家快走！大家快走！”当齐稳定了阵势，诸将

劝齐主切不可后退，以免引起军心动摇。但齐主却在穆提婆等的唆使下，与冯妃弃军策马而逃。齐军士众见主帅逃走，于是“齐师大溃，死者万余人，军资器械，数百里间，委弃山积”。

五、北齐灭亡

齐主高纬逃回晋阳，听说周追兵将至，便下令以安德王高延宗、广宁王高孝珩留守晋阳，欲自己逃奔突厥。诸将虽多方劝阻，但高纬不听，遂于夜间砍掉城门锁，仓皇而逃，途中经领军将军梅胜郎力劝，才打消了去突厥的念头，转而退向邺城（今河北临漳西）。穆提婆等人见齐大势将去，便投靠周军，被周主任命为柱国、宜州刺史。陆令萱畏罪自杀，满门被诛。周主同时下令，招降齐国官吏，齐国官吏将相纷纷降周。

高纬逃出晋阳后，齐晋阳守军便拥立安德王高延宗为主。北周建德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周主大军逼攻晋阳，军势盛众，齐高延宗命将军莫多娄敬显和韩骨相踞守城的南面，以和阿干子和段畅防守城的东面。自率军防守城的北面。高延宗出城交战，勇猛异常，手挥长矛，如入无人之地。但不久和阿干子和段畅率千余骑兵投降周军，故周军很快攻入了东城。此时，正在城外与周军作战的高延宗及莫多娄敬显也率军从东门入城，这样，齐军前后夹击周师，周军一时大乱而溃，被斩杀2000多人，周主左右的卫士几乎全部被杀，宇文邕也险被砍杀。周主乘黑夜逃出晋阳城，本欲急速退走。其部将也多劝他退兵。唯将军宇文忻却厉声劝止说：“昨日破城，将士轻敌，微有不利，何足为怀！丈夫当死中求生，败中取胜。今破竹之势

已成，奈何弃之而去！”宇文宪、柱国王谊也劝止退兵，降将段畅又反复陈述晋阳城内虚弱，极易攻取。周主宇文邕终于被说服，重整军阵，于十七日清晨，再度围攻晋阳东城。高延宗力战不胜被擒，降于周。十二月二十九日，周主统率大军，以宇文宪为先锋，继续向邺城进发。

齐广宁王高孝珩见形势危急，向齐主进献以声威并举之策，吓退周军，他建议，“以任城王高潜率军，兵出并径（今河北并径西北并径山上），声言夺取晋阳；以独孤永业率洛州道军，进击潼关，声言夺取长安；臣率京师军，兵出滏口（今河北磁县西北鼓山），迎击周师。敌得知南北两道均有大军出动，必闻风而退。”高孝珩同时建议拿出宫中财宝和宫女，赏给将士。高纬对此甚为不满，拒绝了高孝珩的建议。大臣斛律教卿建议齐主亲自慰劳将士，并替他拟好讲稿，叮嘱他说，你要慷慨激昂、涕泪横流，以感动人心。但高纬登台之后，竟忘记讲稿的内容，只知发出阵阵傻笑，他左右的侍卫也跟着笑。三军将士见此，皆气愤异常，认为国家至此危亡之际，国君还轻松地开怀大笑，众人何必着急！于是军无斗志，民心涣散。齐主面对危局，无可奈何，将帝位让给年仅8岁的太子高恒，自己当了太上皇。高纬派长乐王尉世辩率骑兵千余去侦察周向邺城进军的情况，行至滏口时，突然望见远方群鸟飞起，疑是周军的战旗，便回马急驰而还，一直逃回邺城，都不敢再回头一望。此时，黄门侍郎颜之推、中书侍郎薛道衡、侍中陈德信等劝谏高纬逃奔黄河以南，招募士卒，抗击周师。若抗之不胜，可南投陈国。高纬采纳这一建议，遂于正月初三，率宫人从邺城转移至济州（今山东茌平西南），初九，齐幼主高恒也离邺东走。正月十八，周

大军抵至邺城之下，十九日攻破邺城，齐军大败，周师进占邺城。周主随即派将军尉迟勤追击齐主。

齐主高纬在济州停留数日后，留胡太后于济州，以高阿那肱守卫济州关（在平城北碣碣故意关），自率后、妃、高恒等继续东走，奔向青州，并派田鹏鸾侦察周师动静。周军俘田鹏鸾后，拷问齐主下落，田鹏鸾至死不招。高纬欲由青州南下降陈，此时，济州关守将高阿那肱一面暗中通于周师，相约生擒高纬；一面不断向高纬假报称，周师距离尚远，他已将通往青州的桥梁烧毁，以稳住高纬。待周师进至济州关，高阿那肱即引导周师尉迟勤急趋青州。高纬见周师已至，急带后、妃等 10 余骑仓皇南逃，二十五日，逃至南邓村（今山东临朐境），被尉迟勤俘获，连同在济州俘获的胡太后等，一并押往邺城，北齐至此已告灭亡。

第七节 北方的 民族融合与经济的发展

经过大约 4 个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从东汉末以来内迁的匈奴、羯、鲜卑、氐、羌、乌桓等族，终于在北朝末年实现了与汉族的大融合。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长期生活在一个国家内的各族人民，有着不可分割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这是实现民族融合的强大纽带。而这一历史时期之所以出现这样广泛的民族大融合，还有其特定历史条件，这就是

民族大迁徙所造成的民族大杂居,杂居便利了经济、文化较低的族接受较高族的经济文化,经过错综复杂的民族斗争,付出了重大的历史代价,内迁各族的经济、文化终于达到汉族水平。均田制在各族中的普遍实行,是内迁胡族实现封建化的标志;三长制的实行,则意味着胡族部落组织的最终瓦解。经济、文化的一致必然引起语言、习俗的一致,再经过互相通婚的混血,民族特点和差异也逐渐消失,于是出现了民族间的融合。

民族融合的表现,从胡族来看,除了在经济、文化上他们纳入先进体系外,在语言、姓氏、服饰、风俗习惯上,都实现了汉化。胡族贵族也从跃马弯弓的武士而士大夫化,元宏本人就“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虽有夸大,亦足见其汉文学修养程度。北方的这一历史变化,致使南方人士都感到惊异,陈庆之就曾对朱异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族融合情况。从汉族来看,吸收了新的血液,汉族共同体进一步扩大,而且在经济、文化中吸收了不少胡族的优秀成分,如经济中的畜牧业生产经验;物质生活中的胡服、胡食(胡饼、胡饭等)、胡床等;精神生活中的胡乐、胡歌、胡舞等。正是由于汉歌与胡歌的结合,才出现了像《木兰辞》和《敕勒歌》那样优美动人的民间诗歌。民族融合是这4个世纪中北方历史发展中最积极的历史现象,在民族融合基础上丰富了河朔文化与南方六朝文化,构成了唐代高度封建文化的两个重要来源。

孝文改制以后,北方的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恢复与发展。

自十六国以来,北方的社会经济处于严重破坏局面,北魏统一北方后,虽然减少了战争的破坏,但由于奴隶占有的上升,对经济的破坏性还很大。经过均田、三长的实行,户口得到整理,农民负担减轻,奴隶占有成分下降,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六世纪初,仅占半个中国的北魏统治下的人口,比西晋太康年间南北人口之和还多出一倍。反映当时农业技术发展最高水平的著作《齐民要术》,全面记录了当时农业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当时北方各族农民,不仅广泛应用古老的代田法与区田法,而且在精耕细作、防旱保墒、良种繁殖、作物轮作、施用绿肥、浸种催青等耕作技术上,都有新的改进与发展。整地、播种、中耕、灌溉工具也种类繁多,远远超过两汉时期,技术也有很大提高。当时的园艺技术如蔬菜、果树的栽培,家庭副业如养蚕、酿造技术,内容也很丰富。至于畜牧生产以及畜产品加工技术的提高,则包括了胡族人民的重大贡献。

手工业者奴隶身分的解除,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均田制的实行也有利于耕织结合的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主要是促进纺织业的发展。由于纺织品产量的提高,绢布价格大幅度下降,魏初绢布每匹价千钱,孝文以后始终不过匹二三百钱。高级织品的技术也有提高,邺及汉中都以生产精制织品而著名。采盐业的发达使盐税成为政府一大收入,长孙稚就说过:“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犹不应减 30 万匹也”。制盐技术也有提高,盐的种类繁多,当时有所谓水晶戎盐 9 种盐等。金属冶炼业远不如南方发达,冶铁以相州牵口冶技术最优良,经常生产锋利的刀送交武库。北齐时,綦母怀文,造宿铁刀,“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

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 30 札”。直到唐时襄国冶家尚传其法。

十六国以来，北方长期处于政治上割据，生产衰落，坞壁自成独立经济单位，交换极不发达，绢帛代替货币周流。孝文以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活跃，史载“魏初至于太和（孝文年号），钱货无所流通，高祖（孝文）始诏天下用钱焉”。495 年（太和 19 年），始铸太和五铢钱。当时洛阳是最繁华的城市，城中设有专门工商业区，大市周围近 8 里，有工巧、乐器、酿酒、造车等不同行业。城市中居住着不少巨商富贾，刘宝“最为富室。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 10 匹。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南北贸易虽受政治上分裂影响，但仍有流通。国际贸易也迄未终止，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罗马），百国千城皆有交往，洛阳城市居住很多“西域商胡”。直到魏末还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

第六章 三国两晋 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

第一节 汉末魏晋 南北朝时期思想潮流

一、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

名法思想的兴起

东汉后期,讖纬神学思想逐渐衰落,以讖纬迷信为中心的儒家神学也宣告破产。儒家名教(即儒家的伦理纲常)之治已丧失维系人心的效能。在这种形势下,需要在儒家以外找寻一种理论,更好地作为重新稳定王朝统治秩序的思想工具。根据名教标准选拔人才的察举制度,到东汉后期被世家大族所以垄断。他们彼此标榜、钓名窃誉而名不副实,民谣讥讽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随着汉王朝统治的瘫痪,就连名不副实的察举制度也

难以实行。迫切的问题,是用怎样一个标准来选拔代表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人才,用以巩固统治秩序。

曹操为了巩固他在北方建立的统治,比较注意抑制豪强和大力选拔寒门庶族人才,提出了“用人唯才”的口号,目的在于打击世代享有政治特权的世家大族,改变他们根据儒家名教观点的用人标准。为适应“用人唯才”的政治需要,就要确立新的选拔人才的标准与此相应的理论。

于是,在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后被罢黜的先秦诸子学说中,首先被一部分士大夫所看中的是名家和法家的思想学说。因为名家之学,在当时的现实政治意义上,并不在于其纯理论的辩论和推理,而在于它能考核名实、知人善任。当时,法家也讲求“循名责实”,这不局限于如何发现人才,更重要的是如何使用人才。这就必然从形名之学联系到封建法治。所以,汉末魏初,在曹魏政权的支持下,兴起了名法思想。据史书记载:“魏武初霸,术兼名法”(《文心雕龙·论说》),“今之学者,师商(鞅)韩(非)而尚法术,竟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晋书·傅玄传》)。有关“名”“法”之学的著作纷纷问世,如王符《潜夫论》中的《考绩篇》、仲长统《昌言》中的《损益篇》、徐干的《中论》、桓范的《世要论》、刘劭的《人物志》等。其中尤以刘劭的《人物志》最能系统地反映当时考核名实、品鉴人物思想的名法之学。这些著作,大都以探讨考核人才的名实问题,以及人才的德行与才能的关系等问题为主要内容,大都是适应当时选拔和品鉴人才的需要而作的,和曹操的“唯才是举”的政策有关。这些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进一步提高到抽象理论形式上,即由考核人才到探讨人才的普遍特性,由人物性

情的根本追溯到天地万物的根本,就成为后来兴起的玄学的课题。因此,以刘劭《人物志》为代表的名法思想,对开启魏晋士大夫玄谈风气有很大影响。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成为后来魏晋玄学思想的萌芽。

曹操、诸葛亮的名法思想

汉末魏晋之时,除了名法思想呈现活跃外,儒、墨、道、纵横等家以及兵家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如鲁胜为《墨经》作注,刘陶善论纵横,曹操、诸葛亮等都有兵法的论著等。这是定于一尊的儒家当时已丧失其思想统治地位的结果。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诸葛亮,为了抑制豪强、巩固新建的政权,也接受了名法思想的影响。

曹操在统一北方、与豪门世族的分裂割据势力进行斗争中,以及在建立曹魏政权的过程中,推行了一些进步的政治措施。他主张法治,抑制和打击地方豪强和世族官僚。并根据法家“信赏必罚”、“选贤任能”的原则整顿吏治,以“用人唯才”作为选拔和考核官吏的标准,打破了过去世族官僚凭借门第和以儒家名教观念垄断选举的局面。他三次下令“求贤”,凡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不问其出身和门第,一律委以重任。这体现出法家韩非“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拔于卒伍”(《韩非子·显学》)的思想。曹操还继承了法家商鞅的耕战思想,认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三国志·武帝纪》)。为了解决粮饷,他奖励耕战,设置屯田。这些措施收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效果,对缓和社会矛盾和促使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

曹操的军事思想,较多地继承了先秦法家和兵家的传统。他在《孙子兵法序》中,阐明了先秦法家“以战去战”的思想,认为古代的统治者常用战争来解决问题,故而他很注意研究军事,亲自注释《孙子兵法》。他坚持以法治军,自订赏罚制度,强调“法令既明,赏罚必行”。他在天人关系上,坚持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公开申明自己“性不信天命”把“天”只看作是“阴阳四时”有规律可寻的自然现象。因此,他“禁妖祥之事”(《孙子兵法·九地篇》注),在作战指挥上排除迷信干扰,重视调查,强调人的作用。在曹操的《孙子兵法中》中,还显示出他具有某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他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又说:“势盛必衰,形露必败”,说明他已初步看到矛盾双方(如盛衰、胜败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此,他很重视客观条件和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提出了“天地间,人为贵”(《度关山》诗)以及“战在我,非在敌也”(《三国志·武帝纪》)的观点。官渡之战,曹操以三万兵马,打败袁绍的十万之众,就因他能够从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出发,对整个战役作了周密部署,采用了先秦兵家“强而避之”、“卑而骄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战略战术,实行有计划战略退却,避免过早地与敌决战,而以自己的局部优势和主动,打击敌人的局部劣势和被动,进而取得全局的优势和主动,然后抓住战机,“击其懈怠,出其空虚”(《孙子兵法注》),终于创造了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给袁军以歼灭性打击,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西晋傅玄在给晋武帝的奏疏中曾提到:“近者魏武好法

术,而天下贵刑名”(《晋书·傅玄传》)。但曹操毕竟和先秦法家不同,他的思想是折衷的。他在建安八年(203年)发布的《修学令》中,就以“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的理由,提出要“修文学”(即经学),“使先王之道不废”(《三国志·高秦传》)。建安十八年(213年)颁发的《以高柔为理曹掾令》中,又提出:“治安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更明确表明他当时之所以崇尚法治,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是由当时形势所决定的。他思想的重点在于“以刑为先”而不废“礼”;“以礼为首”而不废“刑”。“礼”和“刑”向来是封建统治者对付人民的两手,交相使用;至于何者为先,要由当时斗争的需要来决定。

诸葛亮在他 20 多年的政治生活中,显示出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诸葛亮在治理内政上与曹操相似,采取的政治措施也体现了他的法治思想。他认为实行法治,赏罚分明,是“为治之要”。入蜀之初,就针对夔地“豪强专横恣虐”的情况,主张“修明法制”,要求做到“赏赐不避怨仇”,“诛罚不避亲戚”(《诸葛亮集·赏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诸葛亮集·十六条》),才能避免“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的弊病,政治才能走上清明。他还认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应“进用贤良,退去贪懦”(《诸葛亮集·举措》),只有“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同上),才能推举出真正有才能的人。留府长史张裔赞他说:“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诸葛亮集·附录卷一》)这体现了诸葛亮赏罚分明的法治思想,同时也说明了诸葛亮在蜀实行法治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诸葛亮也继承了先秦法家和兵家重视家法作用的传统。他说：“若赏罚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之师，无益于用”（《诸葛亮集·将苑》），因此，“明赏罚之理”是“用兵之道”的重要条件。他本人就严守军法。由于马谡违背军令，失了街亭，影响战争的全局，他忍痛挥泪斩了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马谡，且上表奏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处”，而且还说：“孙（武）吴（起）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诸葛亮·论斩马谡》）。在作战中，他遵循孙武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原则，注意调查研究，指出“古之善斗者，必先探敌情而后图之”（《诸葛亮集·将苑》）。在战略战术上，他要求“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实待虚，以生待死，以众待寡，以旺待衰，以伏待来”（《诸葛亮集·治军》），反映出一定的朴素辩证法的思想。

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为此后魏晋玄学思想提供了某些思想条件。

二、魏晋玄学思潮

玄学是在魏正始年间（240—249年）形成而盛行于魏晋时期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是随着门阀世族势力的发展而兴起的社会意识形态，为门阀世族建立新的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根据。所谓玄学，是由于当时研究《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本号称“三玄”的书而得名。玄学家们以“三玄”为经典，综合道、儒、名、法诸家学说，采取思辨哲学的方法与形式，提出有无、本末、体用、言意、动静以及自然与名教等范畴，并对天人

关系等问题赋予了新的涵义和论证,开辟了一代哲学新风,从而取代了趋于衰微的汉代经学。

玄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阶段

曹魏政权到曹丕时期,开始对世家大族妥协,世家大族势力逐渐发展起来,到全国统一的门阀世族专政的西晋王朝时,统治者们鉴于东汉王朝被摧垮的现实,不能不从中总结和吸取教训,为重整统治秩序和纲常名教寻求新的理论根据,这对玄学的产生是有影响的。加之,魏晋之际,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曹魏宗室与司马氏集团自相杀夺,造成了“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的恐怖局面。门阀世族的“名士”们,面对这一政治现实,并置身于互相杀夺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他们深感“处天地之将闭、平路之将陂,时将大变,世将大革”(《晋书·王弼传》)的极不稳定的时代,前途不可乐观。他们苟且偷安、奢淫享乐,又心怀忧恐、精神空虚。于是,他们急切要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和顺时应变的处世之道。以思辨哲学形式出现的玄学唯心主义,很符合世族统治集团的需要,因而得以风靡一时。

玄学的产生,除了上述的社会原因之外,还有它思想渊源。在中国的学术思想发展史上,从两汉的经学形态发展到魏晋的玄学形态,决不是偶然的、一蹴而就的事,有它发展的过程。它也是在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和“清议”之风盛行,以后由于党锢之祸,很多名士被当权者杀害。在这种政治高压

下,名士们大多缄默下来,于是,“上议朝政、下讥卿士”的风气不得有所变化。当时,就连“一代人伦”的郭泰,“虽善人伦,而不危言核论”(《后汉书·郭泰传》)。郭泰这种避实就虚的谈论,首开从“清议”转向“清谈”之风。魏晋之际,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纷争激烈,名士们为了逃避杀身之祸,往往终日酣饮、不言时政。“清议”发展到魏晋之际,已完全被“言及玄远”的玄学“清谈”所代替。但品藻人物的“清议”形式,却被玄学“清谈”所继承;所不同的,只是更加简约玄澹。如当时人评云:“世目李元礼(膺),谡谡如颈松下风”,“王公(敦)目太尉(王衍)、壁立千仞”(《世说新语·赏誉篇》)等等。

东汉今文经学的迷信荒诞和烦琐的严重弊病,注定它必然走向衰落的道路。但就在它盛行之期的东汉初年,已潜伏下一股反今文经学的暗流。扬雄摒弃今文经学所特别推崇的儒家经典——《公羊春秋》,而别寻其他经典作为立论的根据,首开其先端。他的《太玄》,即摹《易》之作,虽然其中夹杂象数,但他却以玄论天道、王政、人事,法度为主。其后,张衡、崔瑗、宋忠、王肃等著名儒者皆为《太玄》作注,可见其思想影响之大。

东汉末年,随着汉王朝的衰亡,经学内部也在发生变化。素称经学大师的马融、郑玄,已打破了原来师法、家法的束缚,走上了综合今古文经学的道路。而马融更是值得注意的人物,他注解群经,独不注《春秋》而著《三传异同说》,与汉儒以《公羊春秋》言阴阳灾异之传统学术大为不同,《后汉书·卢植传》称他“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他注《易》,也与京房的今文《易》以阴阳术数灾异说《易》不同,他采纳了费直的今文《易》说,着重以义理解经,故荀悦在他的《汉纪》中说马融“颇

生异说。”在马融以义理解《易》之后，有宋忠、王肃、荀爽、钟繇等《易》说新解的兴起。到了曹魏正始年间，王弼注《易》，则继承了马融以来自由解经之风，不拘守章句，以传证经，一扫汉儒训诂和阴阳象数之学的传统，专以义理玄言发挥，并集其大成，建立了本体论的新体系。《老子》之有注，也始于马融，《后汉书》本传说他曾注过《老子》，但隋代诸志均未著录，想必隋时已亡佚。从马融始，到王弼之前，注《老子》者有虞翻、董遇、钟会、何晏等人；尔后，东晋南北朝的名士，莫不奉《易》、《老子》、《庄子》“三玄”为经典，故注家辈出，而每家之注，即为表达其自己的玄学思想之著作，而其源也导自于马融。因此，在经学通向玄学的途径中，马融则是开启综合儒道的魏晋玄学先河的人物。

此外，汉末刘表在荆州“开立学宫，博求儒士，使纂毋闾、宋忠等撰定五经章句”，“删除浮辞，芟除烦重”（《全三国文·刘镇南碑》），说明刘表所领导的荆州之学，是注意到克服经学中只重章名训诂而忽略根本大义的偏向，而尤其重视《易》和《太玄》的。例如，荆州之学的中坚人物宋忠就有《易》注十卷、《太玄经注》九卷，《隋书经籍志》中均有著录。而著名玄学家王弼之父、祖二代均与荆州之学的关系极为密切，其家学之渊源不能不对王弼的玄学思想的形成有所影响。

汉末魏初的不少著作，以探讨考核人才的名实问题、才能与德行的关系等问题为主要内容，反映了名法思想的抬头，且与当时“用人唯才”政策有关。这些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到了魏晋之际，由于曹操宗室和司马氏的纷争仇杀，名士们为了避祸，则由具体问题而转向抽象的思辨，从而成为后来

兴起的玄学的重要课题。例如刘劭在《人物志》和《九徵篇》中就完全从抽象人性出发，提出“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其微而玄”，促进了魏晋名士们的玄谈之风的盛行。刘劭的《人物志》最能系统地反映当时考核名实、品鉴人物思想的名理之学。后人就此时思想评述说：“魏武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玄论。”（《文心雕龙·论说》）。

魏晋玄学思潮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年），以何晏、王弼为代表，首创“贵无”论，提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主导思想，为玄学唯心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开创了所谓的“正始玄风”。他们还提出“名教本于自然”的理论，重新确立了名教的权威。这就表明：玄学一开始就走着兼综儒道的学术途径。

第二阶段为竹林时期，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他二人出生约与王弼为同时，而迟卒十余年。嵇康、阮籍与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人，史称“竹林七贤”。他们正处于司马氏集团夺取曹魏政权的时期。由于司马氏集团的险毒和荒淫、为篡夺曹魏政权屡兴杀伐、企图诛灭曹党，而且还以崇尚“名教”自饰，因为嵇康、阮籍等出于对司马氏集团的不满和激愤，起而揭露其虚伪的“名教”外衣，而以“崇尚自然无为”为特征，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对“名教”礼法多有抨击。但是“任自然”观点的极端发展，却导致纵欲之风的恶性膨胀，乃至到了“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晋书·五行志》）的程度。

第三阶段为晋元康、永嘉年间(291—313年),以裴頠、郭象为代表。“贵无”论的畸形发展和嵇康、阮籍的纵情任性之说,造成浮华放荡的社会风气,危及世族集团统治本身的稳定。于是,裴頠针对这种背离名教的偏向,对于“以无为本”、“崇尚自然”的玄学观点提出了修正,著《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在裴頠“崇有”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综合了“贵无”和“崇有”的主张,提出“独化于玄冥之境”的论题,并深入论证了“名教”即是“自然”,从而统一了“名教”和“自然”的矛盾,把玄学理论推向顶峰。魏晋玄学发展至此,实际已臻终始。

东晋以后的玄学,已与佛教合流,南朝佛学还借玄学流风得以传播和发展。玄学直到初唐还有一定思想影响,但仅是余波而已,不占重要地位了。

王弼的“贵无”论

王弼(226—249年),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人。是汉末著名世族王粲的侄孙。何劭《王弼传》记:“(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辨能言。”被尚书何晏发现,赞为“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并向曹爽推荐,任命弼为尚书郎。当司马懿控制曹魏政权后,曹爽、何晏皆夷三族,王弼也受株连,被免职。同年秋病故,年仅24。王弼的论著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指略》、《论语释疑》等。在王弼的论著中,通过对有和无、本和末、动和静、言和意之间关系的抽象思辨,构建了一套系统的玄学世界观,反映了门阀世族的利益和要求。他是魏晋玄学理论的奠基人,在我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颇有影响。

汉初“黄老后学”、《淮南子》以至王充、张衡等对《老子》的“道”都在不同程度上作唯物主义的改造和论述,发展为元气自然论,以此来说明和阐述宇宙的生成和变化发展,为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生成和天体演化学说奠定了哲学理论基础。

至于王弼则从宇宙生成的研究转变为探讨万物产生及其变化的共同根据,力图从形形色色的现象世界之上和之后去探求其本质,从而提出了“以无为本”的观点,建立了“无”为最高范畴的玄学体系。

何晏说:“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列子·天端》注引何晏《道论》)王弼则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老子注》第四十章)何、王在此所说的“有”,是指有形有象的现象世界,也就是“末”。而“无”则是指有形有象的物质世界赖以存在的本体,作为共同的依据,它是“本”;一切有形的具体事物,都是“无”这个本体的体现。王弼还把本体“无”称之为“道”。他说:“道以无形无名成济万物”(《老子注》第二十八章),“道者,无之称也”(《论语释疑》)。这样,即把《老子》的“道”改造成了“无”,强调惟有“无形无名”,才能生成和主宰万物。

王弼这种“以无为本”的思辨活动,是与他传统的宇宙生成学说的质疑相联系的。他认为以往人们常用金木水火土“五物”和阴阳二气作为宇宙的本原和构成万物的始基,但在王弼看来,作为宇宙万物发生的共同根据,不应该是任何具体之物,也不应该有任何物质属性和物质特征。因为他认为有名有形的具体之物都是有限的,其属性也是有限的,“形必有所

分”（《老子指略》）。例如，音如表现为声，则有各种声调；象如表现为形，则有各种形态，自然也各有不同属性。“有分则有不兼”（《老子指略》），“名必有所分，形必有所止，虽极其大，也有不周”（《老子注》第三十六章）“分则不能统众”（同上书，第四十一章）。即认为任何有名有形的东西，由于受到一定范围和性质的限制，就不能成为众多事物的根据，即使最大的具体之物，它也不能包含万物、统御天地。因此，王弼认为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或根据的，只能是“无形无名”的“无”。他还进而对本体的“无”的性质和作用作了具体阐述：“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故能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经也。”（《老子微指略例》）正因为“无形无名”和“无”，不具有任何物质属性，不可感知，故而成为宇宙万物的共同根据（“品物之宗主”），能包容和主宰天地。

在这里，王弼虽然看取了事物的一般与个别这二者的区别，认为事物的一般寓于个别之中、没有个别就没有一般；但却把二者加以绝对化，并把一般看作独立的存在物。这样，王弼就把作为宇宙万物之本体的“无”作了唯心主义的虚构。

王弼把“无”作为宇宙万物之本体，进而探讨宇宙万物生存发展的条件，把“无”和“有”的关系看作是“体”和“用”。他强调说：“（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老子注》第三十八章）因为在王弼看来，作为有形有象的现象世界的“万物”本身，并不是独立的实体，必须以“无”为体，“无”才是万物生存发展的条件，所以，万物必须依据“无”才能发挥作用。尽管万物的现象世界多么珍贵和丰富多彩，都不过是以

“无”为体，表现了“无”的功用。可见，王弼“以无为体”、“以无为用”的思想实质，从根本上否认“万物”现象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自然也否认了“万物”的物质属性和物质作用是“万物”本身所固有的特征。

王弼把“无”和“有”的关系，也看作是“本”和“末”的关系、“母”与“子”的关系。他说：“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老子微指略例》）王弼在这里所说的“崇本”，即是“贵无”。因而他把“本”、“末”关系比作“母”、“子”关系。他说：“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老子注》第五十二章）由此，他提出“崇本举末”、“守母存子”的观点。他说：“守其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而邪不生。”（《老子注》第三十八章）相反，如若“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其末”，则“功虽大焉，必有不济；名虽美焉，伪亦必生”（同上）。可见，王弼如此强调崇本，在于他试图依据“以无为本”、“以无为用”的哲理来处理 and 解决社会问题。他认为抓住事物的根本，从治本入手，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所以，王弼把“崇本息末”看作是《老子》一书的精髓，是治国的根本，即所谓“夫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老子注》第五十七章）。例如对道德的建议，王弼认为仁义礼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感情的培养，不是单纯的宣传本身所能奏效的，而在于“用其诚，则仁德厚焉，礼敬清焉”（《老子指略》）。表面看来，“用诚”并不讲仁义礼敬，但实际上是在贯彻“崇本举末”的精神，企图从治本入手，而达到“仁义可显，礼敬可彰”的目的，这体现了王弼兼综儒道的学术途径，同时也反映了以王弼、何晏为首的玄学家在为曹魏政权重整纲常名教作努力。

此外，王弼还把“无”和“有”的关系，说成是“一”和“多”、“寡”和“众”的关系。他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已。”（《老子注》第四十二章）又说：“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周易略例·明象》）这表明王弼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万物万形”的现象世界具有统一性的本质。但是，他却抽掉了“万物”统一的物质基础，把“万物万形”的现象世界的统一性归结为没有任何物质规定性的本体“无”。王弼这种唯心主义的思辨，无非是想把一多、寡众之间的关系，说成是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关系。如说：“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同上），认为能够治理众人的，不可能是众，而只能是极少数人。王弼在注释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时，就一语泄露了其秘密。他说：“贯，犹统一，……譬犹以君御民，执一统众之道也”（《论语集释》），从而暴露了王弼“贵无”论的哲学思辨的内在本义。

王弼还从“有之所始，以无为本”的基本观点出发，对万物运动变化产生的根据予以说明。他并不否认现象世界的运动变化，但却认为要和现象世界的发生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他说：“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老子注》第十六章）他认为万物的现象世界都是从“虚无”的现象，王弼进而得出“虚静”是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这一结论。

而且，王弼还强调“无”的本体世界是绝对的、静止的，而变化万千的现象世界则是相对的。他说：“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

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周易·复卦》）他在这里所说的“天地以本为心”，即是强调天地以“无”为本体，它是绝对的、静止的；任何万物运动的现象只是相对的、暂时的，正如讲话是暂时打破了沉默一样。故他认为“复”就是返归本性，因为任何运动现象都要归于“静”的绝对本体。因此，他要求在千变万化的现象中把握不动、不变的本体，以不变应万变，以静而制动。

王弼这种以静为动本、以静制动的形而上学的动静观，导出了他的“静为躁君，安为动主”（《周易·恒卦》注）的政治原则。他要求统治者善于以静制动，“息乱以静”，并认为“静者”是“可久之道”（同上），如若违背这一原则，“离其清静，行其躁欲”、“任其权威”，则“民不能堪其威，则上下大溃矣！”（《老子注》第七十二章）为了防止矛盾激化以至“上下大溃”，王弼主张“自然无为”，强调“名教”出于“自然”，认为“立名分以定尊卑”，制定礼法名教是完全必要的，是合乎“自然”的。王弼认为，如能这样，就可“无为而治”。可见，王弼企图把“自然无为”的哲学来缓和阶级矛盾和世族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逃避杀身之祸，这反映了世族统治者“常畏大罗网，忧患一旦并”（何晏诗）的心理状态。

王弼在认识论上强调“求本以知末，不舍本以求末”（《老子注》第五十二章）的总原则，他认为应通过认识本体去把握现象世界，不应舍弃对本体的认识去追逐现象。至于如何认识本体，王弼提出了“修本废言”和“得意忘言”的具体认识原则。

所谓“修本废言”，即主张从自然中去体认本体的原则。王弼在《论语释疑》中，通过解释《论语·阳货》“予欲无言”这一句话，阐发了“修本废言”的认识原则。他说：“‘予欲无言’，盖

欲明本，举本统末，以示物于极者也。”他认为孔子讲“予欲无言”，即提出了“明本”的认识原则，指出了“无言”是“明本”的方法和途径。因为在王弼看来，圣人树立言论进行教化，目的在于晓于事物的本性，但言论的流弊又往往容易导致烦琐以至掩盖事物的本性。而且，王弼认为本体是超言绝象的，言论只能说明有限的具体事物，并不能说明本体，“名号则大失其旨，称谓则未及其极”（《老子指略》）。故而他提出“修本废言”的认识原则，即主张从自然本身中去直接体认，认为这样就能在无言、无不言的状态中“以淳而观”（《论语释疑》），直接把握宇宙的根本。这表明王弼的“修本废言”的认识原则是强调本体不能用概念来把握，这就否认了理性的认识作用，而陷入了神秘的直觉主义。

所谓“得意忘言”，即主张从圣人留下的经典中去体认本性的原则。因为王弼认为，圣人创制《周易》的旨意就是对本体的认识。至于如何才能领悟圣人制《易》的旨意，王弼根据《周易·系辞传》“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和《庄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的观点，提出“得意在忘象，得意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的认识理论。这是王弼就《周易》的意（卦意）、象（卦象）、言（卦名、卦辞、爻辞）三者的关系提出来的。他把“意”作为认识的对象，而“象”、“言”则作为认识的媒介手段，并把它们加以区别，明确主要在于了解认识对象的义理（意）。这对于把握《周易》的精神实质、不拘泥于封象和卦爻辞，克服汉儒的烦琐学风和象数比附方法，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王弼的本意在于强调“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

忘也。”(《周易略例·明象》)这就把“忘象”、“忘言”看作是“得意”的前提条件,形而上学地把认识对象和认识的媒介手段割裂并对立起来,中断了认识的深化过程。这种“得意忘言”的认识论,无疑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唯心论。

总之,王弼之“贵无”论标志着由汉代的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由神学经学向思辨哲学的转变,它代表并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趋向。它通过本末、体用、动静、一多和寡众等范畴,探讨本体世界“无”和现象世界“有”所构成的多重关系,说明人们认识的深化,对于我国古代理论思维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

嵇康、阮籍的“自然”论

嵇康、阮籍是魏晋玄学思潮第二阶段竹林时期的主要代表,他们稍晚于何晏、王弼。

嵇康(223—263年),字叔夜,谯国铨(今安徽宿县西)人。著作有《嵇康集》。阮籍(210—22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著作有《阮嗣宗集》。他们在政治上与曹爽集团有密切的联系,而与司马氏集团相对立。他们的思想既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也反映了他们自身理想和现实对立矛盾的极为愤激和痛苦的精神状态。

嵇康、阮籍处于曹魏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政权异常尖锐激烈的时期。这时,以司马氏为代表的门阀世族势力已盛,依附曹爽一派的世族官僚何晏、桓范、邓飏等多被诛杀,政权实际已落入司马氏之手。司马氏以标榜名教为借口排除异己,甚至把舜禹的禅让和汤武吊民伐罪的故事都作为夺取曹魏政权的

理论依据。司马氏狡诈残酷的面目和手段，说明其所作所为已经完全撕下了“名教”的面具。怀有“济世之志”的嵇康、阮籍，面对惨酷而令人愤慨的社会现实，使他们原先对于自然与名教相结合的思想信念濒于破灭，于是心态失去了平衡，从而由理想与实现的矛盾转向名教与自然的对立。嵇康在《释私论》中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阮籍则站在“自然”的立场，发表公开抨击名教礼法的言论。他说：“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甚至大骂名教礼法为“乱危死亡之术”（《大人先生传》），还把礼法君子比作裤虱。嵇康则公开“轻贱唐虞而笑大禹”，“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集·养生论》），还借老庄哲学的形式，抨击“仁义”、“名分”禁锢人心的祸害。他们清谈不仕，终日纵酒谈玄、放诞不羁。嵇康、阮籍之所以如此，只是为了发泄他们内心的愤慨和表示对司马氏专政的消极抗议。实际上他们并不真正反对名教礼法，只是抨击现实的名教违反了“自然”。他们推崇合乎“自然”的名教，就如嵇康所说的：“宗长归仁，自然之情”（《嵇康集·太师箴》），“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怀抱忠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嵇康集·声无哀乐论》）。可见，他们所推崇的合乎“自然”之名教，就是要使社会领域中的君臣等人际关系，能够像自然界的天地万物那样调适得当，做到“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这表明嵇康所说的“自然”，就包含着“名教”。他在本质上和王弼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他强调名教礼法应出于人的自然本性，没有虚伪欺诈，所以他大声疾呼要恢复“不须学而后能，不待借而后有”（《嵇康集·难自然好学论》）的“自然之情”。他不了解根本不可能有出自人的自然本

性的名教礼法,也不了解名教礼法从产生的那天起,统治阶级中并不都是笃信恪守的,他们都是用来治人和自利的,名教和虚伪欺诈是一对孪生兄弟,是无法分开的。这是使嵇康从精神上到理论上陷入痛苦和矛盾的重要原因。至于嵇康、阮籍的本意,则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鲁迅全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例如,阮籍在《乐论》中就充分肯定礼、乐在维护贵贱、尊卑的封建等级秩序方面的作用,说:“礼踰其制则尊卑乖,乐反其序则亲疏乱”。嵇康在《诫子书》中也以“忠臣烈士之节”来勉励他的儿子。

嵇康、阮籍是文学家,也是哲学家。他们愤世嫉俗的人生态度,使他们在哲学思想上更多地倾向于庄子的主观唯心主义。嵇康在自然观方面,虽然在形式上承袭了道家黄老之学的自然变化观点,认为万物是从“元气”、“太素”、“天地”的运动中产生的,但又认为“元气”、“太素”、“天地”只是虚幻概念的产物,并没有物质基础,仍然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精神。因此,他进而提出与“万物”相对立的神秘的“至物”来,并说:“‘至物’微,可以理知,难以目识”(《嵇康集·养生论》)。这种神秘主义的“至物”和老庄的“道”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指精神性的本体,其思想特征是把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分裂开来。嵇康认为,主观与客观、名与实之间往往是不相应的,加以事物的名号是相对的、主观的。他在《声无哀乐论》中认为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的感受,有的人听了感到快乐,有的人却感到悲哀;哭声不一定悲哀,歌声也不一定欢乐。人的哀乐是一回事,声音本身又是一回事。因此,“心之与声,明为二物”(《嵇康集·声无哀乐论》)。从而得出主观知识不能正确反映客观真实,

名实永远不能相符的结论，最后导致并无是非真理可言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这是曹操政权濒于崩溃前夕，原先依附于曹氏集团的“名士”们对前途悲观、疑惧的思想反映。

但是，嵇康对形式逻辑具有一定的修养，在论辩的逻辑形式上有相当贡献。嵇康认为在进行论辩时，首先要把握论题的基本意义(纲领)，才能统摄细节旁支(纲目)；其次，理论的依据，主要应当建立在“自然之理”上，然后可以借用古义来说明。当然，他所谓的“自然之理”，是从唯心论上来理解的“自然之理”是“得之于心”的东西。在其具体论辩中，嵇康又善于运用矛盾律和排中律，善于揭示对方持论中的矛盾，认为“矛盾无具立之势，非辩言所能两济也”(《嵇康集·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即相反的两个论点不能并存。嵇康在进行辩难时，还常设身处地，为论敌先阐数义，然后逐一破之，所谓“愿借子之难，以立鉴别之域”。此外，他还指出了一些逻辑上的错误，如把不同性质的事物通过牵强比附而作出推论和理由不充分而作出结论等。

裴颀的“崇有”论

裴颀(267—300年)，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山西绛县)人。生于西晋武帝泰始三年，西晋末“八王之乱”爆发，裴颀被赵王司马伦杀害。裴颀有政治远见，“博学稽古”，尤通儒术。自玄学家何晏、王弼倡起“正始玄风”之后，“口谈浮虚，不遵礼法”成了时代的风尚。到了元康年间(291—300)，玄风益盛。当时玄学家首领“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仿效”，于是放纵越礼的风气更为严重，“矜高浮诞遂成风

俗”(《晋书·王衍传》),从而造成“风教陵迟”,儒学不振。裴颀“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晋书·裴颀传》)。他对王弼、何晏的“贵无”论进行了抨击,受到“王衍之徒,攻难交至”,由于裴颀才学广博,“并莫能屈”。

裴颀在《崇有论》中,针对王弼的“无形无名,万物之宗”(《老子指略》)的“贵无”宗旨,提出“总混群本,宗极之道”(《晋书·裴颀传》引《崇有论》)。他在这里所说的“总混”,即是总和、混合之意。“群体”即指万有本身,这就是裴颀所强调的最高“宗极”的“道”,并且指出万有本身是“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他认为世界上各种有形有象的具体存在物,就是各自有生之物的本体,因而各有不同的性质和明显的区别。因而他的“宗极之道”,并不在万有之上,也不是“无”,而是万有的总和与混合。这就否定了玄学家王弼所鼓吹的“欲将全有,必反(返)于无”的观点。并且,他通过对“道”的辨析,批驳了何晏、王弼等人关于“无”是“万物之宗”的理论,指出何、王“贵无”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否认万有本身是宇宙的本体、是最高宗极之“道”,离开了万有的存在,也就无所谓“道”。裴颀这种“以有为体”的学说含有承认物质世界是绝对的合理内容。

裴颀还进而提出“自生必体有”的观点,他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崇有论》)说明在万物始生问题上,裴颀反对“贵无”论者把“无”作为万物发生的根源、万物是“无”派生的观点。他认为,“无”既然是没有,就谈不上是生万物之原;万物的产生只是“自生”,都是自己生成,以“有”为本体,如果“有”遗缺了,万物的生成必将受到损失。因此,“自生必体有”,实质就是“生以有

为已分”，并没有一个超物质的东西——“无”使它产生。这说明，万物产生的根据并不在万物之外，而在万物自身。这就从本体论上驳斥了何晏、王弼等人的“有生于无”和“以无为本”的观点。

裴颀认为，当万物产生之后，还必须凭借外部的物质条件（“外资”）才能生存发展，但外部的物资条件决不是“无”，而是“有”。他说：“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崇有论》）他强调成济万有的，并不在万有之外，而是万有之间的互济；虚无丝毫无助于万物的生存，只有万物之间的互济，才是万物生存发展的条件。这就批驳了王弼的“贵无”论，而王弼认为万物需依靠“无”才能存在和发挥作用。

裴颀的“济有者皆有”的“崇有”观点，不仅说明了万物生存发展条件的互济理论，也是对于“自生必体有”思想的发挥。因此他说：“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崇有论》）这就是说，要成济一事物，都要依靠“有”，而不能依靠虚无。制事，就得用“心”思考，虽然“心”并不是事，但绝不能说“心”就是个“无”。通过制事和制器事例的问题的剖析，体现了“济有者皆有”的道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揭露了“贵无”论者“以无为本”、“以无为用”思想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裴颀的《崇有论》，不仅从正面阐述了自己的“崇有”学说，而且从理论上也清算了“贵无”论的错误。同时，还对“贵无”论在政治上和道德风俗上的严重危害性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裴颀从维护名教出发，指出玄学家们鼓吹“贵无之议”势

必“建贱有之论”，因为他们把“无”作为世界的本体，一切都以“无”为根据，那就必然会把名教礼制视为“未有”而加以忽视。因此，他说：“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忽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这就指出，“贱有”的结果，必将轻视和破坏名教礼制，使封建统治无法进行。魏晋玄学盛行的结果，确实形成了崇尚虚无、鄙视实际事务的社会风尚。在统治阶级中，普遍存在“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埤经实之贤”的想法，因而对脱离实际的言行评价甚高：“立言籍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造成不遵礼法，追求所谓“旷达”以至不顾廉耻和操守、道德沦丧的地步，这当然也有损于封建秩序的维持。正如裴颢所指出的：“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土行又亏矣。”（《崇有论》）裴颢出于维护西晋社会的稳定，对“贵无”论进行了抨击。

因而，他进一步认为，治理国家不能以“贵无”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应该遵循“济有者皆有”的思想原则办事，积极有为，做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身力任，劳而后飨；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志无盈求，事无过用，乃可济乎”，要求人们依据天时，分享地利，尽职尽责，劳而后得。这对于王衍等“贵无”论者的“口谈虚无、尸禄耽宠，仕不事事”的不劳而享的行为可谓是针锋相对的抨击。裴颢同时还认为，要用“仁顺”、“恭俭”、“忠信”、“敬让”等道德原则来规范人们的行动，克制浮华纵欲的违礼行为。这些主张虽然仍局限于儒家的

传统见解,但他由此而提倡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和严谨的作风,相对于纵性任性的人生态度和放荡不羁和“仕不事事”的虚浮旷达作风,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裴颢的“崇有”学说,从本体论上充分肯定万有的作用和价值,而与“贵无”论相对立,在崇尚虚无已成社会风尚的时代,能独树一帜,并对于当时及后人都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裴颢的“崇有”学说应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但也要指出,裴颢的“崇有”学说中所讲的“有”的观念,主要是指有形有象的具体存在物,还构不成哲学上的物质范畴。而且,他只讲事物之间互相依存的“互济”关系,而未涉及事物之间相互转化的重要关系,这就导致他的万有“自生”说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说明不了万物自身最早究竟是怎样产生的问题。这就为后来的玄学家郭象宣扬的“独化于玄冥之境”的神秘主义的独化自生说留下了地盘。裴颢针对何晏、王弼、王衍等的“贵无”论和嵇康、阮籍“自然”论的玄学所煽起的一股虚浮旷达之风,树起“崇有”的旗帜,以维护名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否则会使玄学的发展走上了另一条与现实越离越远的道路。但裴颢的“崇有”学说,毕竟论证了所谓“众理并而无害,故贵贱形焉”的封建等级秩序的合理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甚至把封建礼教之类的东西也归入了标志各种具体物质存在的“有”的概念之中,混淆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质的区别,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明显暴露了他的局限性。

郭象的“独化”论

郭象(252—312年),字子玄,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正当西晋门阀士族集团的特权统治已趋巩固、更加骄淫腐化之时,郭象被“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晋书·郭象传》),成为门阀士族特权势力的代表人物。他引述向秀的《庄子注》,别为一书。在其著述中,他总结了玄学思潮发展中产生的“贵无”和“崇有”等内部争议,并吸取了当时《庄子》学研究的思想成果,把玄学理论推向高峰,适应和满足了门阀士族“超然心悟”、“忘形自得”的精神需要,是魏晋玄学思潮发展的最高阶段。

郭象在总结和综合玄学“贵无”和“崇有”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万物独化于玄冥”(《齐物论注》)的理论。他认为,万物世界既“非无之所化”,也无“真宰使之然”(同上),这对于反对宗教神学的造物主,是有积极因素的。但他却并未由此而走向唯物论,而是利用王充“物偶自主”的命题来完善他的“万物独化”的玄学唯心主义本体论的论证。郭象的所谓“独化”,是指现象界一切事物是独自地、孤立地、无所依凭地生成变化的;所谓“玄冥”(《庄子》),原指一种晦暗不明、浑然无别的神秘境界,郭象则借以指本是玄之又玄的绝对的至我。他认为万物的产生和存在,都是“块然自生”(《庄子》)、“掘然自得而独化”(《大宗师注》),是偶然的,无任何条件和原因的。它们之间是各自孤立而没有联系的,其生存变化也是“不知所以因而自因”(《齐物论注》)、“独生而无资借”,“生死出入,皆欻然自耳”(《庚桑楚注》),因此,它们是神秘而不可捉摸的。

郭象的“独化”论，虽然否认了“造物主”的神学目的论，形式上也否认了“无”不能生“有”的精神本体论，但它通过神秘主义的无因论而陷入了命定论。他说：“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独化也。人皆以天为父，故昼夜之变、寒暑之节，犹不敢恶，随天安之。况乎卓尔独化，至于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则死生变化，维命之从也。”（《大宗师注》）这说明郭象是把“物各自生”以及“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都看作是神秘而不可抗拒的“命”的安排，即所谓“天性所受，各自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养生主注》）。这种集偶然和必然于一身的“独化”论，实际上是更为精致的唯心观点。

郭象的认识是从性分论出发的。他认为，万物生而具有各自的“天性”，所谓“物各有性，性各有极”（《逍遥游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养生主注》）。因而，在认识论上，郭象也同样认为，人们的认识能力也各有分限，所谓“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齐限”（《养生主注》）。由于性分的先验性，故而智愚的差别是“天性”早就决定了，且不可改变的。他说：“性各有分，故知（智）者守知（智）以待终，而愚者抱愚以至死，岂有能中易其性者也。”（《齐物论注》）因此，非性分赋予的知识和能力，主观努力是不起任何作用的。“生之所知，岂情之所知哉？故有情为离（离朱）旷（师旷）而弗能也，然离旷以无情聪明矣；有情于贤圣而弗能也，然贤圣以无情而贤圣矣。”（《德充符注》）这就是说，人们虽然主观上想成为离朱、师旷和圣贤这样的人，但由于性分所限，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达到。所以，郭象要人们在进行认识活动之前，一定要明白认识取决于性分这一道理，不要超越性分的认识能力去勉强干什么，要使自己的认识活动

限制在性分的范围之内。正如他所说的：“知人之所为者有分，故任而不强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极，故用而不荡也。”（《大宗师注》）

人们的认识既然由性分的先验性所决定，因而郭象认为人们后学的学习，不能给人们增加任何性分之外的知识和能力，只是完成本性的一种手段，使性分之知由潜在变为现实，即所谓“学习之功，成性而已”（《列御寇注》）。因此，他对人们后天学习，并不持积极的态度，反而认为学习要运用智慧会造成“心神奔驰于内，耳目竭丧于外”的劳形伤神的恶果。所以，他认为“坐忘”是获得知识的正确途径，即做到“形同枯木，心若死灰，物我两忘，身神为一”（《刻意注》）。这实际上是要人们停止一切感觉和思维活动，做到所谓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冥然自合”。可见，郭象所提倡的“坐忘”，纯粹是一种反对理性思维活动的神秘主义直觉。

由于郭象坚持人们的认识取决于性分的观点，因此，他进而认为人们能知的仅限于性分之内的，而性分之外的则不能、不可知。“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故止于所知之内而至也。”（《齐物论注》）这就必然使郭象的认识论具有不可知论的特征。而事实上，郭象的确把人们的认识活动范围严格地划分出可知和不可知的界限，极力反对人们超越性分去外求知识，并且强调超越性分去求知不仅不能增添更多的知识，反而会失去本性之知。这就如同让圆的学方，让鱼学飞，学到最后是连自己的本性也会丧失。郭象反对人们超越性分去外求的另一理由，则认为性分之内是有限的，而性分之外是无限的，“以有限之性寻无极之知，安得不困”（《养生主注》）。因此，他要求人

们应该“足性而止”(《马蹄注》),不要超越性分去外求知识。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知与不知在认识主体中统一起来。郭象提倡这种“性分之外”不可知的认识论,实质上是在宣扬蒙昧主义,为门阀士族集团的特权统治所欢迎。

郭象还从“性分”论出发,强调人们应该以各自的“性分”来作为判断其现实活动和社会生活是否合理的标准。相反,如若超越了各自的“性分”,就会破坏了等级秩序、社会发生争乱。因此,郭象进而把门阀制度下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社会职能等,都说成是先验的性分,是永远不能变更的,而要求人们依据这种“性分”去规范行动。他说:“夫民……性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不可废者耕织也”(《马蹄注》),认为男耕女织就是农民衣食之性的体现。作为君臣,也是由“性分”所决定,“夫时之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齐物论注》)。他强调,凡是合乎“性分”的,都是合理的。并且认为,对财富的需求也有“性分”之别,“质小者所资不得大,则同大者所用不得小”(《逍遥游注》),强调要按各人的性分来分配财富,才可以做到“货财弗争”(同上)。

郭象为了使人们不产生非分之想,安于“足性而止”,还用“大小之殊,各有定分”(《逍遥游注》),“以小求大,理终不得”的说教去麻痹人们,企图使人们懂得“各安其分,大小俱足”的玄学“真理”,以消除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发生。

郭象还通过“圣人”的形象,提出了“自然”和“名教”相结合的理想政治。他认为,在政治生活中崇尚“自然”应体现在精神境界上,“常游外(笃名教)以冥内(任自然)”,“仰万机而淡

然自若”(《大宗师注》)。而在实际事务中又必须坚守名教,克服“贵无”论鄙视日常事务而削弱统治的弊病。郭象这种以“自然”与“名教”相结合的理论,调和了“贵无”和“崇有”的矛盾,并使二者相结合。这样,既有维护名教之利,又有纵情任性之乐,充分适应和满足了门阀士族特权统治的需要。

总之,魏晋玄学,是我国魏晋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理论学说,是讲宇宙“自然”和社会“名教”之关系的理论。因此,从哲学的高度来论证社会政治学说,就形成了魏晋玄学理论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以道、儒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玄学,较之汉代儒家的神学经学更为精致。它对我国后来的唯心主义理论的深入,起了很大作用。它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我国古代理论思维的进步,同时对后世理论思维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三、反玄学思想

在魏晋玄学思潮兴盛之际,出现了一些进步思想家,如杨泉、欧阳建、鲍敬言等,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玄学理论进行了批判。

杨泉的《物理论》

杨泉,字德渊,梁国(今河南商丘)人。生卒年不详,大约活动于公元三世纪末,是三国时吴国的“处士”。西晋灭吴后,杨泉不愿在西晋为官,拒绝征聘,隐居著书。他的著作有《太玄经》十四卷,又有自然哲学名著《物理论》十六卷。另有集二卷、

录一卷,宋代时均已散佚。清人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有《物理论》的辑录一卷,尽管零碎,但仍保留了杨泉思想的梗概。另外,清人王仁俊也有辑本(包括补遗各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

杨泉继承了王充的唯物主义自然论和无神论的思想,同时也吸取了“浑天说”、“宣夜说”的宇宙天体理论的成果。他从元气自然论出发,把天体概括为“地有形而天无体”(《物理论》)。他说:“气发而升,精华上浮,宛转随流,名之曰天河,一曰云汉,众星出焉”(《物理论》),从而直觉地接触到了天体的起源问题。杨泉认为,宇宙空间充满元气,别无他物,天地之形成,也是因气的作用而表现为不同的物质形态。故他说:“元气皓大,别称皓天。皓天,元气也,皓然而已,无他物焉。”“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气也,水土之气,升而为天。”“夫地有形而天无体,譬如灰焉,烟在上、灰在下也。”(《物理论》)杨泉还进而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说明日、月、众星的形成,认为阳气凝而为日,阴气凝而为月,众星出于银河,而银河又是水土之气的精华所形成,从而把物质性的元气看作是宇宙的本原。

至于杨泉所提出的“所以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气也”的观点,说明他似已观察到水与气的不同形态的转化,认为形成天地的气也就是水所变化的气。显然,他这种看法是以张衡的“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浑天仪图注》)的观点为的。因此,他曾把水作为蒸吐元气的具体来源。如说:“夫水,地之本也。吐元气,发日月,经星辰,皆由水而兴。”(《物理论》)但杨泉并不是“水”一元论者,他还强调水由地生,而地是由元气凝结成的,如他说:“地发黄泉,周伏回转以生万物。

地者，天之根本也。”（《物理论》）杨泉还认为，自然界万物的形成和变化，都依存于“气”的“自然之理”。如“激气成风，涌气成雨”（《意林》引《太玄经》）；“积风成雷，热气散而为电”；“石，气之核也”；“土气和合，庶类自生”等等。他这些见解，虽并不符合科学，但他却试图说明宇宙万物的形成和变化是以“气”为“自然之体”和“自然之理”的根据的，这就与玄学家们的“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的世界观相对立。同时，也是对超自然的“使之者”神的否定。

此外，杨泉还继承了桓谭、王充的形随神灭的观点。他说：“人，含气而生，精尽而死。死，犹渐也、灭也。譬如火焉，薪尽而火灭，则无光矣。故火灭之余，无遗炎矣；人死之后，无遗魂矣。”（《物理论》）他强调火灭先“遗炎”，人死无“遗魂”，坚持了桓谭、王充以来的无神论的形神观，这对于正与玄学合流的佛教神不灭论，可说是迎头痛击，启迪了后来何承天、范缜等人的反佛斗争。

同时，杨泉在《物理论》中对“名士”们所煽起的清淡玄风作了抨击，指出凭靠“谈者之口”、“爱憎之心”来品评人物，是不能发现真正人才的，反而会培养一批“冠尧之冠，行桀之行”的虚伪浮华之人。因此，他对玄学家们的“虚无之谈，尚其华藻”十分反感，把它比作犹如春天的青蛙叫和秋天的蝉鸣那样絮烦而令人生厌。针对虚无玄谈，他很重视工技和生产的实际知识，强调“良农之务”和“工匠之巧”在改造自然中的作用。这些，显然是与玄学家们所鼓吹的“无为无造”的思想是完全相对立的。

欧阳建的《言尽意论》

欧阳建(270—300年),字坚石,渤海南皮(今河北沧州)人。据《晋书》记载,他“雅有理想,才藻美瞻,擅名北州”,“甚得时誉”,曾任历山县令,尚书郎,冯翊太守等官职。后在统治集团内讧中,被赵王司马伦杀害。他的哲学著作,仅留下一篇《言尽意论》(见《艺文类聚》卷十九)。

“言”和“意”的关系问题,早在《易·系辞》中就已提出来了。《庄子·外物》篇中就有“言不尽意”的不可知论的思想。到了魏晋时代,“言意之辩”就成了哲学上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表面上看来,这是讨论语言能否反映思想内容的问题,但实际上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即客观世界能否认识或反映的问题。当时,荀粲等玄学家提倡“言不尽意”,认为“象外之意”是不能由人们的感官或思维来认识的,因而语言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这是一种不可知论。欧阳建的《言尽意论》就是针对这种“言不尽意”的不可知论进行驳难,同时也是对王弼的“得意忘象”理论的否定。

首先,《言尽意论》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因为“言不尽意”者认为认识对象是只能“意谓”不能言传的绝对本体(“无”)。虽然这个本体是玄学家们虚构出来的,但他们的名理清谈“莫不引此为谈证”。因而他们把言意关系看作只是认识工具同绝对本体(“无”)的关系。欧阳建为了否定他们虚构的“谈证”(本体“无”),把言意问题还原为心物(名实)问题,也就是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作为人们认识的客观对象是不依赖人们的概念和语言而独立存在的。他说:“形不

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俊称而黑白已彰。”他指出，先有方圆之形，然后才有方圆之名；先有黑白之色，然后才有黑白之名。这就说明事物的属性(形、色)是事物自身所固有的，客观事物的形、色是第一性，而主观的名称、概念(语言)仅是事物以及事物规律的反映，是第二性的。而且，“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既然客观的物理变迁了，主观的名、言也自然随着变迁。这就为他的认识论奠定了唯物论的基础。

第二，欧阳建进而论证“言”(语言、概念)的作用，以批判“言不尽意”的唯心主义观点。他说：“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他认为人们认识了事物之理(客观规律)，不用语言(概念)就不能表达出来。客观存在的自在之物，不用名称概念也不能加以区别，人们的认识也就无法表达和彼此交流。因此，他强调，“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他充分肯定了名称概念(语言)对辨别事物、表达思想的社会功能，说明概念是能够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变化的，这就否定了玄学家们的“言不尽意”的不可知论。

第三，在语言概念(主观)和事物(客观)之间的关系上，欧阳建认为语言概念是根据客观事物而产生的，但它却并非事物本身，并认识到它们二者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语言、概念对于复杂事物的反映有时是近似的、不完全的。而玄学家也正是利用这一点加以歪曲，宣扬所谓“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企图从片面夸大认识工具(语言、概念)和认识对象的差异性来否认

主观认识客观的可能性。欧阳建针对这点，强调“言”和“意”的关系“犹声发响、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他从总体上肯定了“言”、“意”二者的一致性，认为语言、概念是能认识和反映客观事物的。在“言不尽意”论调十分流行之时，敢于独树一帜，坚持朴素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难能可贵的。

另外还需提一下生活在两晋之际的鲍敬言的“无君论”。他的生平、著作都不可考，仅在两晋之际的葛洪所著《抱朴子·诘鲍》篇中引述了他的思想。他倡导“无君论”，对为门阀世族统治服务的玄学，给予了猛烈的抨击。从哲学的角度来看，鲍敬言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出发，用自然万物的天然平等来论证封建等级制度的不合量性。他说：“夫天地之位，二气范物，乐阳则云飞，好阴则川处，承柔则以率性，随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无尊卑也。”他认为天地是由阴阳二气所形成的物质，阳气云飞起来便成为“天”，阴气如川水流止便成为“地”，由此而化生万物。因而他断言：天地和自然万物一样，没有所谓尊卑上下之分，都是物质。至此，鲍敬言进而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玄学家所制造的关于“名教”出于“自然”、“名教”与“自然”统一等玄学理论，指出并不是因为有了天尊地卑才有君臣，而恰好是由于有了君臣上下，才把尊卑的观念赋予了本来无所谓尊卑的天地。这在古代历史上是非常精辟的社会观点。它从天地自然平等关系出发揭露了封建等级制的不合理性，并认为这种不合理性是违反人性和天地自然之理的，从而，也否定了所谓“名教”出于“自然”等玄学理论。他还进而揭露和反对君权神授的理论，主张消灭国君，建立一个“无君无

臣”，没有剥削，没有军队、刑法，人人都有土地能自耕自足、安居乐业、衣食丰足的理想社会。这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

四、魏晋南北朝的佛学思想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它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魏晋以前为输入时期，以翻译佛经为主；东晋南北朝为传播时期；隋唐为兴盛时期，形成了中国独创的佛教宗派。

值得注意的是，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获得广泛传播的过程中，一些著名的僧侣将佛教的宗教世界观和修行理论与我国的学术文化传统和习俗心理相结合，提出了许多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学理论，使佛教开始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

魏晋玄学与佛教“般若”学

在汉代，人们只是将佛教当作流行的神仙方术来看待，它与儒家的谶纬迷信思想相溶合而开始流传。到了魏晋时期，佛教在玄学思潮的影响下，又与玄学合流。一些著名僧侣，不仅以玄学论述佛学，而且还借用佛学来阐发玄学。当时传入中国的大乘佛教，是以《般若经》为中心的大乘空宗学说，它以客观唯心主义观点论证物质世界的存在都是虚幻。所谓“般若”，是印度佛教专用名词的音译，它是指一种具有神秘意义的智慧，它不是用来认识客观世界的知识，而是专门用来体会佛教最高精神本体的特殊智慧（“圣智”）。由于受玄学的影响，佛教僧

侣所宣传的佛教般若空宗学说，基本上是以玄学的理论为出发点的；因此玄学中的不同观点，也导致佛教般若空宗产生不同的流派，有“六家七宗”之说。六家中，“本无”派的影响最大。有的又在“本无”之外分出“本无异”一派，故又谓七宗。但是，就其哲学的基本倾向，可以归纳为三派，即以道安为代表的“本无”派，以支愨度为代表的“心无”派，以支遁（支道林）为代表的“即色”派。其他如“识含”、“幻化”、“缘会”三派，其观点与“即色”派大体相同。

以道安为代表的“本无”派主张“诸法本性自无”，基本是按何晏、王弼的“贵无”派的“以无为本”、“崇本息末”的观点来理解和阐述佛教“般若”学的“空观”理论。据昙济《七宗论》中对道安思想的引述，道安认为在万物之前，世界是一个空无状态，所谓“冥造之前，廓然而已”，因而他提出了“无在元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的观点。在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的根本问题上，他同玄学的“贵无”派一样，把具体的物质世界说成是虚幻的，而把“空”、“无”的抽象精神本体说成是世界万物的根本。所以，他要人们“崇本息末”，不要执着于物质世界，而要认识和返复到世界“本无”的境界，即所谓“宅心本无”状态。

以支愨度为代表的“心无”派主张“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见僧肇《不真空论》），强调只要主观上心如太虚、不滞于物，就符合“般若”学的“空观”理论。至于外物，因“物是有”，故可承认“未尝无”。此派的竺法温，甚至承认“有为实有，色为真色”，强调“有形不可无”（《心无论》），见安澄《中论疏记》，显然是受了玄学的“崇有”观点的影响。据安澄、元康、吉藏的解释，此派的宗旨主要是“内止于心，不空外色”，“空心不空色”，

“物上不起执心，故言其空”。从而得出了心无色有的结论，表明“心无”派的重点在于否定内在的精神现象，但却肯定了外在的物质现象而具有唯物论的嫌疑，因而遭到了“本无”派的法汰、昙一等人的围攻，批评它为“邪说”。

以支遁(支道林)为代表的“即色”派。当时，支遁在玄学界因他名士风度最重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对《庄子·逍遥游》的阐述，被推崇为发展了观点，受玄学的“独化”论的影响较大。他著有《即色游玄论》，主要反对“心无”派的不空外色的思想，侧重于否定外在的物质现象。他提出“色不自空，虽色而空”的观点，强调物质现象(“色”)是没有自性(“不自色”)的假有，所以“虽色而空”。他虽然否定了物质世界的真实性，但从“般若”空观理论来看，认为它还空得不彻底，因为它还保存了假有，没有进一步论证这种假有也是空的，故批评者说：“但知言色非自色，因缘而成，而不知色本是空，犹存假有也”(《肇论疏》)。

“本无”、“心无”和“即色”三派各自对“般若”空观理论的阐述，并不完全符合印度佛教“般若”学的本来含义，但由于受中国魏晋玄学思潮的影响，开始具有了中国思维方式的某些特点，分别与玄学中的“贵无”、“崇有”与“独化”三派自相呼应。“本无”、“心无”和“即色”三派对“般若”空观理论阐述上的差异，可以说是玄学内部的争论在初期“般若”学研究中的反映。

佛学通过与玄学的合流，影响逐渐扩大。“般若”学的研究，通过玄学作为桥梁，也很快进入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鸠摩罗什及其弟子僧肇等就在关中形成了一个“般若”学的研究

中心；道安的弟子慧远等在庐山也形成了一个佛学基地；竺道生在建康（南京）则力图把佛学理论和通俗教义调和起来，创建他的“涅槃佛性”学说。南北朝的佛学各有特点，为中国学术文化的研究扩展了新的领域，促进了理论思维的深入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僧肇的“般若”学

僧肇，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卒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他少年家贫，以代人抄书为生，“遂因缮写，乃历观经史，备尽坟籍”，尤好老、庄。他后由玄学转向“般若”空宗，研读《维摩诘经》，并出家为僧。20岁时，已崭露头角，闻名于关中。后拜在著名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门下，与僧融、僧睿、竺道生等同为鸠摩罗什的高足，被称为“四圣”。他以更为彻底的唯心主义观点，对魏晋以来的玄学和“般若”学的各派理论进行批判性的总结，建立了他自己的“般若”空宗的哲学体系。他是东晋南北朝时期最著名的佛学理论家，是中国化的佛教哲学体系的奠基人。他的主要著作有《不真空论》、《物不迁论》和《般若无知论》等，均收入《肇论》一书。

僧肇研究了魏晋以来“般若”学的各派理论，认为都未能如实把握“般若”空观关于“空”的内涵真谛。他在《不真空论》中分别批出各派的缺陷所在。他认为，“心无”派偏于空心，只是简单地从主观方面排除外物对心的干扰，而没有从根本上否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即所谓“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即色”派，只偏重从物质现象不能自己形成以说明它不

是物质的,而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物质现象本来就不是真实的,即所谓“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本无”派,则偏重于空无,再三论证“无”是万物之本,简单地认为“非有”就是没有“有”,“非无”就是没有“无”,漠视了假有的存在。因此,僧肇进而指出以上三派都是把“有”和“无”对立起来,而以“无”解“空”,没有真正掌握“般若”空观的理论实质。

僧肇认为,“般若”空观的真谛在于“即万物之自虚,不假虚而虚物也”。这是僧肇在《不真空论》中阐述的根本观点和核心命题。其意就是强调应从万物本身去认识它的虚假不真。他反对在“有”之外或“有”之上还有一个“无”的本体的说法,或是否认假有、幻相的存在而另立一个与这相对立的虚无。由此,僧肇认为“般若”空观理论并非把“有”和“无”对立起来,也不是以“无”解“空”,更不是简单地否认客观事物的“有”或“无”的现象,而只是认为无论“有”或“无”的现象存在,都不是真实的,而是虚幻的,即所谓“象非真象”、“象而非象”。既然现象的存在并非真实的存在,而不过是作为假象、幻相而存在,故他说:“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如若一种幻觉产生了人像,并不是没有幻化人这回事,而只是说幻化人并非真实人而已。所以,僧肇强调的“空观”理论,所谓“色之性空”。他这种“性空”论,并不是简单地否认客观物质现象,而是巧妙地通过既把事物现象和假相加以混淆,同时又把事物本质和现象加以割裂,从而使事物现象不反映事物本质来否认事物现象的真实性,进而把事物现象说成全是假相、幻觉,最终达到彻底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

此外,僧肇还根据佛教“缘起”说来否定事物的客观实在

性。“缘”是指事物存在的各种条件。由于僧肇认为事物不具有自身客观存在的本性，只是根据各种条件（“因缘”）而后存在，因而它不是独立的、永恒的存在，不是真实的“有”，所谓“有非真有。虽有，不可谓之有矣”。但它确实又由“缘”而起，又能简单地说它是不存在、是“无”，所谓“万物皆无，则不应起。起则非无，以明缘起故不无”。最后还是把客观物质世界归结为“非有”、“非无”的“性空”。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诡辩逻辑。

僧肇还从名实关系的方面来说明万物的“不真”，并提出他的“假号”理论。他强调，既然事物本身是“不真”的，那么，给物取个名，其名也不因此而实。所以，从物的名称去认识物，物没有与这名称相当的实，可见它不是名所指的物；如从物去探求名，名也没有达到反映物的实际，可见它也不是物的名。因此，名既不符它的实，实也不符它的名。名与实既然都互不相当，哪里还有什么所谓实有的万物呢？！“故知万物非真，假号久矣”。他认为，万物本来就虚幻不真，称它为“物”，只是一种假的称号而已。在僧肇看来，在以往名实关系的争论中，即使认为名决定实，名是第一性的，这种认识他仍认为是不彻底的，因为它毕竟肯定了有真实的东西的存在。只有把一切客观存在都当作虚幻不真的“假号”，才是彻底的“真谛”之见。实际上，僧肇的“真谛”，就在于彻底否认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而要引导人们去承认和追求在“不真”、“空”的现实世界背后，还有一个“真”、“不空”的彼岸世界。

“即动而求静”的动静观。僧肇想融合佛教中既要肯定现实世界的生死流转，“诸行无常”，又要追求永恒不变的“极乐

世界”这二者的矛盾。因此，他在《物不迁论》中提出了“即动而求静”的动静观。他说：人们离开动和变去寻求静和不变，而是要在变动中认识不变。他不是简单地否认事物的变化发展，而是采用唯心主义的诡辨手法来达到否定客观事物变化发展的。例如他以“昔物不至今”为理由，企图说明事过境迁、时不再来，一切都在变。但是他进一步辩析说，以上观点恰好证明了“静而非动”，事物是不变的，“物不相往来”。显然，他是形而上学地把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概念绝对化地分割开来，认为过去的事物只存在于过去，不存在于现在，因此不应从现在向上连续到过去。反之，现在的事物也只存在于现在，因此也不应从过去连续到现在。这就否定了不同时间的联系和发展，从而否定了客观事物的发展。

又如他认为事物是“刹那生灭”的，即随生随灭的，没有一刹那时间的停留，因此事物的变化只是给人留下一些不连贯的片断幻象。僧肇就把事物在变化过程中的不稳定性片面地加以绝对化，从而否定事物变化的真实性，以进一步达否认客观物质世界的真实性。这就是僧肇“即动以求静”的实质。他旨在维护佛教的所谓永恒不变的彼岸世界的信念，以引导人们无视并放弃现实斗争，向主观精神的世界去寻求解脱和安慰。

僧肇在他的《般若无知论》中探讨了认识问题。与他在《不真空论》中所阐述的“性空”的本体论相配合，强调佛教所要认识的对象、途径与世俗人是不相同的，有本质的差别。他把世俗人的智慧称为“惑智”，而“般若”则是一种具有神秘认识能力的特殊智慧，故称“圣智”。僧肇认为，一般世俗人所认识的

对象,只是具体的客观存在,而这个对象不过是虚假的幻象(“不真”),执着于对这些幻象的认识,得来的只是一种使人产生烦恼的“惑智”,达不到对真理(“真谛”)的认识。“般若”(“圣智”)所要认识的对象,则是“实而不有,虚而不无”的非有非无的“空”,即佛教所谓的世界本质或本体。

僧肇认为,对于这样一种不同于一般事物的、非有非无的世界本体,是不能用一般的认识方法去认识它的,不但感性认识对它不起作用,就是理性认识也不是可能达到的。只有依靠“般若”的“圣智”去体会,也就是用不同于任何感性或理论的神秘主义的直观(“照”)去领悟“真谛”,正如僧肇所称颂的“圣人以无知之般若,照彼无相之真谛”。

僧肇所宣扬的“般若无知”,实质上是一种带有严重神秘色彩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因为,在他看来,佛教的“真谛”不同于一般事物那样是一种具体对象,而是“无相”的,所以,认识“真谛”只能用“无知”的“般若”。而这种“无知”的“般若”却是“无所不知”的“真知”,但它并不是依靠什么对象或条件才产生,而完全是自我产生、本来就具有的。所以,僧肇称这种“无知,故无所不知”是“圣心”“独觉冥冥者矣”,即“圣人”心中自生的神秘的认识能力,能对“性空”的世界本体以直观认识。所以,僧肇的“般若无知”论,更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

可见,“般若”学的传播,至僧肇而集其大成,并建立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般若”空宗的哲学体系,它在理论上则是为出世主义的宗教世界观作论证的,其最后归宿是宗教神秘主义。但是,它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却又促进了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发展。它的影响局限于社会上层,包括当时的知

识阶级,但统治阶级更为需要的却是对人民群众的麻醉剂,因而,继“般若”学之后,则是涅槃学获得广泛的传播。

慧远的“法性不变”论

慧远,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生于东晋成帝咸和九年,卒于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据《高僧传》记载“少为诸生,博综六经,成善《庄》、《老》”,对儒、佛典都颇有研究,后拜东晋博学的道安为师,研究佛学理论。离道安后,在庐山东林寺聚徒讲学,号白莲社。庐山遂成为南方著名佛学基地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有《沙门不敬王者论》、《三报论》、《明报应论》、《法性论》等,后来被收集在《弘明集》和《庐山慧远法师文钞》中。

慧远出道安的“本无”论基础上,于《法性论》中提出了“法性不变”论。他所说的“法性”(即“佛性”),是指佛教最高的精神本体。他说:“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所谓“至极”,即佛教哲学宣扬的最高精神本体,即“法性”。他认为,这种最高的精神本体是以永恒不变为“性”的,人们要达到佛教的最高修养境界就必须体认这个本体。也就是说,佛教的最高本体,就是一种超脱于现实世界的、永恒不变的最高精神境界,即所谓“得性以体极为宗”。他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对这一思想阐述得更为具体。他说:“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尘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则生不灭;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冥神绝境,帮谓之泥洹(涅槃)。”“涅槃”,意为“圆寂”,是佛教提倡的一种绝对安静、无思无念的最高精神境界。他认为只有体认佛教的最高精神本体的人,才不会以生死牵累他的精神;只有能根本超脱尘世和世俗生活的人,才

能不受各种情感的牵累。这样,才可以达到“冥神绝境”,停止一切思虑和情感活动而进入“涅槃”境界。

此外,慧远还企图解决佛教教义和中国传统思想之间的矛盾,从而论证佛教教义与中国政治和传统思想之间的一致性,强调所谓“释迦之与尧、孔,发致不殊,断可知矣”(《沙门不敬王者论》)。

慧远还从佛教一切皆空的观点,结合中国传统思想,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佛教三世轮回的因果报应说的迷信思想。他不是简单地讲有一个主宰者在司善惩恶,而是从主体自身的精神活动中自作自受来论述因果报应关系。他说:“无明为惑网之渊,贪爱为众累之府”,“本以情感而应自来,岂有幽司”(《明报应论》),即认为人之所以遭受不幸的恶果,皆是由于愚昧“无明”和“贪爱”等情感所造成,并非由一个主宰者在赏罚(“幽司”)。他这种佛教说教就比一般的传统迷信“福善祸淫”之说要精致、隐蔽得多,其欺骗性和思想毒害更为深刻。而且,慧远的形神相异的神不灭论,也为佛教的三世轮回的因果报应说提供了理论。

竺道生的“顿悟成佛”说

竺道生,钜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大约生于东晋穆帝永和十一年(355年),卒于南朝宋元嘉十一年(434年)。他少年时即从竺法汰出家,后又拜在鸠摩罗什门下。他才思敏捷,“关中僧众,咸谓神悟”(《高僧传》),鸠摩罗什的四大著名弟子(“四圣”)之一。后到建康(今江苏南京)传播佛教。他对《般若》、《涅槃》经都很有研究,尤善《涅槃》。他把般若实相与涅槃

佛性二说相结合,又吸收玄学的思辨方法,提出自己的佛性“顿悟”学说,对佛教哲学的中国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主要著作有:《维摩经义疏》、《妙法莲华经疏》、《泥洹经义疏》、《涅槃三十六问》等。

竺道生是当时佛教涅槃学的代表人物,其学说主要是阐发关于涅槃佛性思想。这种佛教学说的主要特点是不单纯停留在对世界精神本体的概念分析上,而是进一步论证世界精神本体实相就是佛的法身,而把佛的法身和众生所具有的佛性统一起来,着重阐述众生成佛的原因、根据等问题。他从《泥洹经》的所谓“佛身是常,佛性是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教义中得到启发,认为佛性(即佛教的最高精神本体)就存在于每个人的本性之中,人人皆有佛性,因此只要一旦返归本性,即可见性成佛,所谓“佛理常在其心,念之便至矣”(《大正藏》三十八卷),故他提倡“顿悟成佛”学说。可见,这种“顿悟成佛”说的实质是一种对宇宙本体的唯心主义体认,也是对自我本体即佛性的神秘主义直观。他这种“顿悟成佛”说,既不像小乘佛教那样,成佛要累行修行、积累功德,又不像支道林等人所主张的那样,成佛要经过若干阶段。竺道生还根据人人皆有佛性的道理,提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的观点(“一阐提人”是梵语音译,指作恶多端、不可救药的人)。这表明竺道生的佛性涅槃学在于鼓吹佛性本有,因而在宣扬佛教信仰主义和扩大佛教影响方面,起了更大的作用。

他这种“顿悟成佛”说,对于受苦难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可谓是一帖巧妙的宗教麻醉剂,它能欺骗人民群众甘心忍受剥削压迫,把一切希望寄托于“顿悟”成佛,幻想尽快进入公平

而幸福的理想“天堂”。这种既省时省力、又不化费任何代价的“顿悟成佛”说,对于那些希望永远过奢侈享乐生产的门阀士族来说,更是求之不得的。因此,竺道生的“顿悟成佛”说,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支持,流传颇广。后来,唐朝佛教禅宗的明心见性、顿性成佛的学说,就是竺道生的“顿悟成佛”学说的继承和发展。竺道生的“顿悟成佛”说,对唐以后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思想

道教创始于东汉时代,是中国固有的宗教,其思想渊源较为古老,内容也很庞杂。它和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多神教、巫和巫术)有着一定的继承关系,并从秦、汉代的道家那里附会黄老修真养性之说,从方士和某些今文经师那里拾取了图讖和神仙方术。又在佛教的影响下,形成了有一定的理论和仪式的宗教。

道教最初由于依托先秦道家学派,奉黄帝、老子为教主,所以又称“黄老道”。它最初流行民间,有“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两大支派,属于原始道教。

原始道教的教典是《太平清领书》,即后世称谓的《太平经》。它内容很繁杂,基本上是宣扬有神论的宗教唯心主义,并和维护封建秩序的纲常伦理相结合。但是,其中也有一些篇章揭露和指出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和统治者的残酷,多少反映了劳动人民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思想,和主张自食其力、要求生存权利和公平均等的思想,以及对未来太平社会理想世界的

憧憬。因而对于后来利用道教在民间进行活动的张角、张修和张鲁都产生过一定影响。

原始道教在东汉末年多活动于民间，多用符篆为穷人治病，往往与农民起义相结合；到三国时，道教逐渐被封建统治阶级所控制和操纵。魏晋以来，玄学、佛学日益兴盛，而道教在理论上却相形见绌，因而促使道教渐向义理化发展，不如此便会走向衰败而湮没。自东晋到南北朝，道教不断革新，把民间的道教改造为门阀士族统治服务的、并具有一定理论体系的道教派系。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葛洪、寇谦之和陶弘景。

葛洪的道教神学理论体系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是汉魏以来道教理论的集大成者，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理论家，他的著述很多，反映他的道教神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作是他的《抱朴子》中的《内篇》。

“玄”、“道”、“一”的道教哲学本体论是葛洪的神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是道教哲学本体论。他在《抱朴子·内篇》中，首论《畅详细》，提出了以“玄”、“道”、“一”为宇宙本体的理论。他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认为“玄”是超自然的存在，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而且，它不可感知、不可捉摸，神通广大，“乾以之高，坤以之卑，云以之行，雨以之施”，都是“玄”的作用。不仅如此，“玄”还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其高则冠盖于九霄，春旷则笼罩于八隅”，“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吐纳大始，鼓冶亿类，回旋四七（二十八宿），匠成草昧”。这即是说，“玄”是孕育元气、铸造天地星宿乃至万物生成的根据和原动力。他强调宇宙万物一刻也不能离开“玄”，

“故玄之所在，其乐无穷；玄之所去，器毙神逝”。可见，“玄”已被葛洪描绘为超出一切具体的“器”、“神”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神秘物；这个神秘物只能是宗教神学者头脑中虚构出来的神秘本体。正因为如此，他对“玄”的描绘只能是“玄之又玄”，既无任何质的规定性，“方而不矩，圆而不规，来焉莫见，去焉莫追”；又无任何量的规定性，“增之无益，挹之不匮，与之不荣，夺之不瘁”。所以，葛洪认为，对于这个高不可登、深不可测的“玄道”，只能“得之于内”，通过内心的冥思苦想去探索，并且认为“其唯玄道，可与为永”。这说明，他之所以反复论证“玄道”是超时空的永恒存在，正是为长生不死的神仙道教制造理论根据。

葛洪又将“玄”称作“道”，把“玄”和“道”完全等同起来。如说：“道者，函乾括坤，其本无名。”（《道意》）“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范畴两仪，胞胎万类，酝酿彝伦者也。”（《明本》）“道”同“玄”一样，成为天地万物以至伦常产生的本原，也是动、静、降、生运动形成之根据，即所谓“方者得之而静，圆者得之而动，降者得之而俯，升者得之而仰”（《道意》）。而且，“道”同样是无所不在而没有任何质与量的规定性。所谓“以言迩，则周流秋毫而有馀也；以言乎远，则弥纶太虚而不足焉。为声之声，为响之响，为形之形，为影之影”（《道意》）等等。

葛洪又将“道”称之为“一”。他说：“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谓也。”（《地真》）他认为老子所描绘的“道”，就是“一”。因此，“一”也同样是宇宙万物生成和运动的根据。所谓“一能生阴阳、推步寒暑。春得一以发，夏得一以长，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地真》）。可见，“玄”、

“道”、“一”是同一的，只不过是神秘本体的不同称呼而已。

葛洪从宗教信仰出发，进一步把“一”更加神化，提出“守一存真，乃得通神”（《地真》）的宗教神学思想。因为，在他看来，“一”是最真实的本体，故他也称之为“守阃一”。他认为，人如能“守之不失”，则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可以“陆辟恶兽，水却蛟龙，不畏魑魅挟毒之虫。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一之大略也”（《地通》）。所以，他把“守一存真”看作是通向神仙之境的根本途径；认为如能“守一存真”，就可像神仙那样料事如神、无所不知，即所谓“人能知一，万事毕。知一者，无不知也。”（《地真》）至于如何才能守住“真一”，他提出“养其心以无欲”（《地真》），即要人们通过宗教禁欲主义的修养，以求“守一存真”、达到神仙境界。可是，葛洪所指的“道”、“玄”、“一”，完全是一种宗教神秘主义的精神本体。葛洪就是这样，通过对“道”、“玄”、“一”神秘主义的精神本体的论述和神化，促使人们对这一精神本体的追求，而达到对神仙道教信仰的确立。

葛洪还从宗教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上论证神仙不死、鬼怪实有的宗教世界之存在。他用聋子听不到雷声、瞎子看不见日月星辰之光的比喻，来证明人们虽然看不见神仙和听不到神仙的声音，而神仙世界是存在的。他所谓的“不见鬼神，不见仙人，不可谓世间无仙人也”（《论仙》），纯粹是一种诡辩。因为神仙只是道教徒头脑中虚构而成，神仙的存在与否，并不取决于目盲、耳聋，而是客观实际证实了它的不存在。此外，葛洪还企图以人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而“天地之间，无外之大，其中殊奇，岂遽有限”（《论仙》）为理由，论证长生不死的神仙之存在。这是有神论者和宗教徒在论证“神”的存在时，所惯用的理

论根据，葛洪并不例外。他企图利用人的认识的有限性与客观世界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把自己虚构的一切不实之物（如神仙之类），都归之于人们有限认识之外的无限世界，以此来作为他们反驳否认神仙存在观点的依据。任何事物是否存在或人们的认识是否正确，要靠实践来检验，而葛洪的认识理论，恰好是建立在诡辩论和主观推测之上，不能证之于客观实际。因而，他所鼓吹的神仙世界，只能是骗人的宗教宣传。

“有因而无生焉，形须神而立焉”的形神观。葛洪认为形须神而立，固形乃可以养神，神不离身则可以永生。因此，他有时把“形”、“神”关系比喻为“堤”和“水”、“烛”和“火”的关系。他说：“故譬之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靡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至理》）从这段比喻中，似乎可得出“形存则神存”、“形竭而神灭”的结论。但是，葛洪之所以如此强调炼形的重要，其目的是为了“使神”（或“精灵”）不离其身，从而到达长生不死，肉身成仙，这正是道教神仙理论的重要特点，与其它宗教幻想灵魂入天堂显然不同。而且葛洪提出所谓“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至理》）的形神观，把“形”说成要依赖“神”才能确立而不朽，最终还是强调精神是第一性的、形体是第二性的，其根本，还是唯心主义的。而强调炼形，也只是为了成仙之需要。

葛洪在传播道教神仙理论的活动中，还注意把遵守封建伦理纲常摆在极重要的地位，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道德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对俗》）。这就把道教的修炼和维护封建纲常统一起来，从而确立了道教的神仙理论体系。

寇谦之和新天师道

寇谦之，字辅真，上谷昌平（今属北京市）人。生于晋哀帝三年（365年），卒于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九年（448年）。他在道教发展史上的主要成就是改革五斗米道，是北魏新天师道的创始人。他早年就爱好仙道，修张鲁之术，后又师成公兴，入嵩山修道，“守志嵩岳，精专不懈”。这时正值北方鲜卑族拓跋部统一北方，建立了北魏政权，为了消除汉人由于民族隔阂而产生的反抗，因而实行了与汉族同化的政策。在宗教政策方面，由于五斗米道系汉人的宗教，所尊奉的神皆是汉人所认为的本民族的神，因此也表示信奉道教，受道教符箓，借以表明魏（北魏）是受天命、继正统而做皇帝。所以，他们采取了尊道抑佛的宗教政策。而且，此时的五斗米道弊端较多，已面临衰败危机，如若不加改革，就无力与日渐兴盛的佛教势力相抗争。

根据《魏书·释老志》的记述，寇谦之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就神道设教，制造宗教神话，诡称遇到太上老君，封他为“天师”，并令他“清整道教”，从而取得了改革五斗米道和创建新天师道的合法权利。为了使自已承继张天师的地位合法化，他取消“天师”、“祭酒”之位的教权世袭，强调“天道无亲，唯贤是授”，“诸道官祭酒，可简贤授明，不复按前父死子系，使道教不显”（《老君音诵诫经》）。

同时，他宣示“新科之诫”，“专以礼度为首”（《魏书·释老志》），把遵守纲常名教作为首要信条。寇谦之在《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中，教人“不得叛逆君王、谋立国家”，“于君不可不忠”，并要求贫苦百姓安于贫贱，“戒勿以贫贱求富贵”。他还号

召道徒遵循“臣忠、子孝、妇贞、兄敬、弟顺”等伦理纲常。这样，就把原始道教中某些人民性的思想完全排除在外，而与封建礼教思想紧密结合起来。

此外，寇谦之还提倡轮回报应之说。他改变了道教只要炼形即可长生成仙的教义，引入佛教“生死轮回”这样，认为修持者前世之善恶，会影响今身修行之成效；今世之善恶，又影响于来世。他说：“本得无失，谓前生过去已得此戒，故于今身而无失也。”（《太上老君诫经》）他还在《老君音诵诫经》中用“六道轮回”以警世，说谁要是“反逆”、“诳诈万端，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太上老君就要“大恚怒”，把他打入地狱，“罪重者，转生虫畜”，甚至延及三生都要投生为畜牲。

寇谦之还改革教仪教规，主要是“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魏志·释老志》），并将服饵修炼之术与符水禁咒之术合而为一。

总之，经过寇谦之的“清整道教”，在教义上吸取儒、释思想，提倡礼度及规诫，以约制信徒身心，使炼形诸术居于辅助地位，使新天师道与皇权相结合。因而，道教更加取得了统治阶级的崇信和扶持提倡。北魏太武帝就自号“泰平真君”，宣布“崇奉天师，显扬新法”，“亲至道坛受符”（《魏书·释老志》），并且定道教为国教，还仿效佛教寺院在各地大修道教宫观，宣扬道教教义。寇谦之也以“师”和“国师”的身份宣称奉命“辅佑泰平真君（指北魏太行帝）”（《魏书·崔浩传》）。至此，寇谦之最后完成了从民间的原始道教到统治阶级的官方道教的转变。道教在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下，也与佛教一样，盛行一时。

陶弘景的道教思想

陶弘景，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君，丹阳秣陵（江苏南京市）人。生于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56年），卒于梁武帝大同二年（536年），谥贞白先生。在他10岁时，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他喜好读书、博学多才，不到20岁时，便任宋诸王侍读。后因“求宰县不遂，永明十年（492年），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南史·陶弘景传》），遂退居句曲山（茅山）修道。他一生勤于著述，内容广及道教、儒学、道家、医药等方面多达200余卷。其中最著名的道教经典有《真诰》、《登真隐诀》、《养性延命录》及《真灵位业图》等。

陶弘景是位著名的道教学者和医学家。他创建了颇有影响的道教茅山宗。他在道教理论的研究方面，颇为努力，提出过一些看法。他也把“道”看作是天地万物生成的根据。他说：“道者混然，是生元气。元气成，然后有太极。太极则天地之父母，道之奥也。”（《真诰·甄命援》）这种超越元气、又先于元气而存在的“道”，只能是神秘的精神本性，这种宗教唯心论的世界观，即成为道教的理论基础。

他在修真养生问题上，主张形神双修、养神与炼形并重。他说：“人所贵者，盖贵于生。生者神之本，形者神之具。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毙。若能游心虚静，息虚无为，服元气于子后，时导引于闲室，摄养无亏，兼饵良药，则百年耆寿是常分也。”（《养性延命录》）他强调各种护养之道，都要贯穿适中精神，所谓“能中和者，必久寿也”（同上）。这即是陶弘景的茅山宗所主张的修真养生的基本理论。后来，隋唐五代茅山宗道教

便继承了他的修持理论和方法。陶弘景是以茅山《上清》经法为主,并兼容诸道派之要法,力阐道教,但他又主张儒、释、道三教调和,兼容并包。在他所撰的《茅山长沙馆碑》中,就明确提出“万物森罗,不离两仪所育;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的观点,表明了他调和三教的思想倾向。他出于对佛法的敬重,还援佛入道。据唐释法琳《辨正论》卷六《内异方同制旨》说:“(道士冲和子和陶弘景)常以敬重佛法为业,但逢重僧,莫不礼拜,岩穴之内,悉安佛像。自率门徒受学之士,朝夕忏悔,恒读佛经。”可见,陶弘景是道佛双修,而以信奉道教和从事道教活动为主。同时,他也融儒入道,以儒家《中庸》的性命说来解说道与性的关系。如说:“人体自然,与道气合,所以天命谓性,率性谓道,修道谓教”。今以道教使道必须遵守封建的伦理道德,此乃成仙的主要途径。陶弘景还参照封建宗法等级制,编造了新的神仙等级系统。这就说明宗教神秘的幻想世界,此乃成仙的主要途径。陶弘景还参照封建宗法等级制,编造了新的神仙品级系统。这就说明宗教神秘的幻想世界,不过是现实世界的曲折反映。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互争正统地位的斗争不息,佛、道之争,更是激烈。陶弘景则采取三教调和、佛道双修的态度,其意在创建一种以道教为主体、兼容儒、释的道教茅山宗派,以调和社会思想的矛盾,维护封建统治。

六、范缜的《神灭论》

范缜,生卒年代约为公元450—515年,字子真,舞阴(今

河南泌阳北)人,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无神论者。他少孤家贫,学习非常刻苦,敢于坚持真理,绝不随波逐流。《梁书》中说他“卓越不群而勤学”,“恒芒屨布衣,徒行于路”,“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反映了他的一些真实情况。在南朝齐、梁两代先后当过宜都(今湖北省宜都)、晋安(今福建省福州市)太守、尚书左丞等官。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政治上动荡不定的时期,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统治阶级为了麻痹人民的斗志,追求虚幻的福荫,拚命提倡佛教。流毒所至,举国若狂。以致出现“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情游,货殫于泥木”的怪现象。范缜继承了前人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公开宣传无神论思想,批判佛教的种种观点。

在齐朝的时候。范缜同信奉佛教的竟陵王萧子良曾经进行过一次激烈的辩论。争论的焦点是有没有所谓的因果轮回。萧子良质问他:你不相信因果报应,那么世界上为什么有的人富贵,有的人贫贱?范缜便回答说:人生下来,好比一树之花,风吹花落,有的落到“茵席”之上,有的落到“溷粪”之侧。人生到富贵或贫贱的不同家庭,正像落花,哪里有什么前生决定的因果关系可言呢?这番话,有力地批判了佛教因果报应的观点,也把萧子良驳得无言答对。

范缜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便写出了充满战斗气息的唯物主义杰作《神灭论》。全文用问答体裁对有神论者的种种谬论,特别是佛教的“神不灭论”,逐条进行有力的批驳。文章一开头就对物质第一还是精神第一这个哲学上的根本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回答。针对佛教徒所鼓吹的人有生死而灵魂永在的谎言,范缜断然宣称:“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

“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意思是人的肉体是本质的东西，而精神则是人体的一种功能。所以人体生存，精神就存在；一旦人体死亡，精神也就随之消灭了。他把人的肉体同精神的关系，用刀口同锋利作了极为形象的比喻。指出人的精神对于肉体的关系就好比锋利和刀口的关系一样：刀是一种客观物质，锋利是刀口的作用。离开了刀口就无所谓锋利，怎么能说精神能够离开肉体而存在呢？他还进而分析了人的知觉和精神活动是人体内各种器官的功能，如手能感觉痛痒，眼有视觉，耳有听觉，而更高级的思维活动则是由心主管的。尽管由于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范缜没有能够摆脱心脏主管思维的误解，但是他却正确地阐明了感觉、思维从属于人体的唯物主义观点。这在 1400 多年前各种宗教和唯心主义派别猖獗的时候，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神灭论》的流传，打破了佛教笼罩下思想界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使那些依倚佛教作为护身符的反动统治者惊惶失措。历史记载说：当时“此论出，朝野喧哗”，震动了整个舆论界。萧子良曾召集一批熟悉佛教经典的和尚，诘难围攻范缜，妄图驳倒《神灭论》，但是论战结果，仍以失败告终。萧子良无可奈何，便采取卑劣的手法，一方面指使人用“神灭非理，恐伤名教”的大帽子压他，同时派人私下劝说范缜放弃无神论，答应给他高官厚禄。范缜不为所动，并义正辞严地宣布决不“卖论取官”，表现了维护真理的坚定立场。萧衍（梁武帝）即位后，宣布佛教为国教，更把范缜视为眼中钉，亲自给范缜加了一个“违经背亲”的罪名，借故把他流放到广州去了。

范缜的神灭论思想，继承了王充的唯物主义传统，是汉晋

以来无神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对自然现象,有深刻的观察和认识,用以论证自己的唯物主义论点,克服了以前一些“神灭论”学说在理论上的许多弱点。在认识论上他提出了“即物而穷其理”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在逻辑思维方面,也有许多贡献,确实不愧为我国古代的杰出思想家。

当然,和所有古代唯物主义者一样,一当涉及到社会现象时,范缜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比如,他把社会上的贫富现象,归结为偶然的因素;又把所谓“圣人”和“凡人”的区别,说成是由于形体和器官上的差异。这些地方,还是摆脱不了宿命论的影响,尽管如此,他对发展唯物主义思想的贡献,还是要充分肯定。

七、魏晋时期的经学

魏晋南北朝时的学术思想,虽然已由玄学思潮替代了两汉经学,而且佛教、道教均十分活跃,并盛行于当世,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各朝政府依旧设立太学(国子学),儒家经典仍是太学生修习的主要科目。经学的研究始终没有中断,而且出现了(玄)学、王(肃)学之争和玄学经学阶段,并表现出南北经学的不同风格。

魏晋经学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127—200年)统一了今古文学,从而结束了汉代今古文相争的时代而一统天下。曹魏、晋初时,学问渊博的王肃(195—256年)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

遍考诸经,广泛吸取了贾逵、马融之学以及荆州学派的宋忠之学,自成一派,并凭借司马氏的权势,使他的经注和其父王朗的《易传》皆被列于官学,取代了郑学的地位。王学经注多是驳郑之作,其中纠正了郑玄不少的荒诞之说,弥补了郑学的疏漏。王肃对郑玄经学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圣证论》一书。此书一出,引起了王学与郑学之争。其中虽有经学不同见解的争论,但更多的是带有政治色彩。因为王肃是司马氏集团的经学大师,又是朝廷典章礼制的重要顾问。曹髦为帝时,主郑学而非王学。一次,他亲临太学问难博士经义。《尚书》“稽古同天”一句,郑注:“尧同于天”;王注:“尧顺考古道而行之”。博士庾峻以王肃为长,曹髦以为郑注符合孔子本意,借此以抑制司马氏。后来,随着曹髦的败亡和司马氏的当政,郑学失势,而王学则备受青睐,兴盛于西晋,但到东晋时,王学又被郑学所压倒。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王肃注经只是对郑玄经注的修正和补充,并未提出一个推动时代发展需要的、崭新的哲学体系,用以代替郑玄的经学。

但是,曹魏、晋初出现的王学,却动摇了郑学在人们心目中的至上权威,使人们对旧的章句之学发生怀疑,从而为玄学经学的成长提供了自由发挥见解的思想条件。

玄学经学可以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周易注》,即是玄学经学建立的旗帜。玄学经学是玄学的一部份,是玄学家用道家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的注说。它不拘章句,重在义理,更多的是发挥注释者自身的见解。他们多从性理着手,发挥玄理。如王弼的注《易》,即一扫汉代的象数之学,专以阐述形器之上的本体之理为务。他们完全突破了

郑、王训诂经学的汉代传统，而使经学发生了崭新的变化。这不能不对两晋经学发生影响。西晋虽重王学，东晋虽重郑学，但何晏、王弼的玄学经学亦流播其间。

两晋经学在创建新注上也很可观，值得论述的，首推西晋杜预著的《春秋左传集解》和《春秋释例》。杜预崇尚《左传》而贬《公羊》、《谷梁》，自立体例，不同前人。其特点为：（一）视经为史，将《春秋》与《左传》按年相配，合而释之，并常以《左传》纠正《春秋》之误。（二）以《春秋》义例为周公之遗制，由孔子加以发择，用来匡正时弊，而有《左传》变例，这样，周公的地位就在孔子之上。（三）不一味袒护君权，常为臣下辩解。（四）杜预，撰著《春秋经传集解》，下功夫极深，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并与汲冢《竹书纪年》相印证，完成《左传》最精密完备的集解，深受唐代大经学家孔颖达的赞许。因而，其他注家隐没，而杜注独行于世。杜预《左氏》学，不属于玄学经学，而是在继承古文经学传统基础上有所开创。

东晋时，受玄学经学直接影响的是韩康伯注的《系辞》。他用玄学解《易》，是对于王弼《易》学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所以，南朝刘宋以后，人们将韩注与王弼注合为一书。在这玄学经学之外的，当时要数经学大家范宁，为世所重。他的《春秋谷梁传集解》一书，颇有成就。他向来批评玄学，指出“王（弼）何（晏）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晋书·范宁传》）。因此他集解《谷梁》，正是为了扶植名教、对抗玄风。他认为：《春秋》乃“不易之宏轨，百王之通典”，“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春秋谷梁传集解序》）。范宁解释《谷梁》的特点是：（一）不主一家，广集博采，兼用三传，对

郑玄、何休、服虔、许慎、杜预等的经注，皆有所引证。(二)偏重古文经学和郑学。(三)特重杜预《左氏解》。(四)常有责君之言。(五)以《传》文纠补《经》文的失误。(六)直评《谷梁》错失，不加曲护。并用宗法礼制为标准区别华夷，不同意《谷梁》以民族地域为标准扬华抑夷，其识见胜过《谷梁》。此外，干宝《易》学也自成一家。他注《易》兼顾象数玄义与从历史的人事上立论，对于宋代程、朱和苏氏《易》学都有影响。

魏晋时代的经学，由于派别杂多，未能形成统一的局面而像汉代那样在学术思想界占据绝对优势。但它却打破了汉代经学固陋僵化的弊病，丰富了经学的内容，为后来的经学发展准备了条件。而且，这时期的经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唐孔颖达作《五经正义》，所用魏晋人经注有三，汉人经注有二。世传《十三经》，除《孝经》注是唐玄宗所作外，汉注与魏晋注各居其半。其中晋注就有：王弼、韩康伯注《周易》，何晏集解《论语》，杜预集解《左传》，范宁集解《谷梁》，郭璞注《尔雅》。此外，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亦系魏晋作品。

南朝经学

东晋以后，中国形成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南北地区地域文化上有明显的差异，经学的崇尚与风格亦有很大的不同。概括来说，南朝经学重魏晋传统，北朝经学重汉末传统。南北风尚虽说“互有不同”，也只是相对而言，并非绝对二致。例如南北在《诗》、《礼》上，就流行同样的注体，南朝亦重郑学，北朝亦有王肃之学，河南及青、齐之间儒生多讲王弼《易》注，齐地多习杜预《左氏》。南北儒者的交往，也从未间断。

南朝宋代元嘉年间，立儒、玄、史、文四学，雷次宗、朱膺之等主持儒学，开馆授徒。宋时最重视《礼》学。雷次宗明《三礼》，其《礼》学造诣与郑玄齐名。何承天将先前《礼论》八百卷删减合并为三百卷，传于世。《宋书·礼志》记，朝廷礼制多用郑注，何承天《礼论》亦用郑玄而斥王肃。然而宋代士人亦钦慕魏晋玄风。颜延之为国子监祭酒，就很重视玄学，著《庭诰》论《易》，分别汉《易》与玄《易》的不同，意在贵玄，说明王弼《易》学在宋代确有影响。

齐代经学，虽说以汉代经学与魏晋经学并重，但除《易》、《左传》之外，汉代经注占据多数，玄学经学处于劣势。齐代《礼》学亦较发达，官学有王俭，私学有刘濬，堪称大家。王俭任国子监祭酒，又为尚书令，著《古今丧服集记》、《礼义答问》等，对于朝廷礼仪事，多有议定。齐朝廷修定礼乐，多依郑玄，偶采王肃。刘濬为一代大儒，刘绘、范缜、司马筠、贺玚等皆出其门下。《南齐书·刘濬传》记他拒绝做官，“儒学冠于当时”，“所著文集，皆是《礼》义，行于世”。

南朝经学以梁代为最盛。梁武帝虽重释、道，但也重儒学。据《梁书·儒林传》记，天监四年（505年），下诏开五馆，建立国子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以明山宾、沈峻、严植之、贺玚、陆琏为博士，各主一馆，每馆有数百学生，射策明通者即除为吏，“十数年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又遣学生往何胤处受业，并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天监七年（508年），又诏皇室贵胄就学儒业，武帝亲自祭奠儒圣并为讲经，一时经学大兴。梁代明经学者甚多，除上述者外，尚有伏曼容、何佟之、范缜、司马筠、崔灵恩、太史叔明、皇侃等人。

梁代经学有如下特点：（一）对以往经学各派都很重视，也有所取舍，学风较为开放和自由，玄学的影响较大一些。（二）由于南朝门阀士族讲究宗法血统、远近亲疏，直接关系到爵位与财产的承袭。因此，南朝重视经学在宗法礼制方面的应用，即重《礼》学，梁代尤甚。（三）仿效佛教讲经说法的方式，在治经的方式方法上，讲疏或义疏的体裁最为流行。它既不同于汉代的传注或一般的集解，也不同于玄学经学的玄理发挥，而是介于义理与训诂之间的一种经学著作形式。

梁武帝也是位经学家，一生撰著经义凡 200 余卷，又根据《五经》制礼作乐。他的经学思想含有佛道成份。

梁代经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还有皇侃的《论语义疏》。它是在何晏《论语集解》基础上，广采博引而后形成的。其特点是：（一）该书博采众引，所引资料，多至有 30 余位学者的注疏，反映了当时经学求同存异的风气。（二）与何晏《论语集解》比较，该疏的玄学倾向更为突出，在义理深度上更接近于王弼、郭象之学，同时还杂以佛学。（三）常用问答体揭示歧义，并能在集众说之后断以己意，自树新说。（四）该书中还保存有关于《论语》早期的结集的重要资料，以及许多在魏晋之际已佚亡的诸家注说，故使这部书具有效高的史料价值。

陈代经学可视为梁代经学的余绪，经学大儒周弘正、张讥、沈文阿、沈洙、戚兖等经历了梁陈两代。陈代亦重《礼》学，经师参与朝仪的改定。沈洙、戚兖、贺德基皆是《礼》学专家。陈代经师又多喜老庄，能玄言。例如周弘正幼“能《老子》、《周易》。”（《陈书·周弘正传》），是南朝“三玄”之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讥“笃好玄言”，顾越“善谈名理”（均见《陈书·儒林传》）

等等。

总观南朝经学，是比较开放的，它不拘守一家之说，但受玄学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由于此时三教并立，流派众多，尚不能产生出一种足以统领全部文化的儒家哲学体系，所以，也影响到南朝经学在思想上的统一。

北朝经学

当北魏与北方掌权的少数民族贵族入主中原之后，当务之急是加速封建化过程，尽快熟悉儒家经典，按照封建纲常名教的模式建立国家制度和培养贵族子弟。据《魏书·儒林传》记述：“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399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人”，“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魏孝文帝喜好儒术，“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于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在他执政时期，经学最盛。

北朝经学传授的重点在于训诂典章制度方面，而河西文化、关陇文化原是直接承接汉代经学、特别是郑玄之学的。因此，南方的王肃之学和玄学经学的学风在北方影响不大。于是，形成北朝不同于南朝的经学的风格。《魏书·儒林传》记述了当时的情形：“（郑）玄《易》、《书》、《礼》、《论语》、《孝经》，（伏）虔《左氏春秋》，（何）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王肃《易》，亦间行焉。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驥于刘义隆世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研究室。”可知北魏盛行汉学，主要是郑学，也有晋代经学参其间。

北魏经师众多，著名者有常爽、刘献之、徐遵明等人。常爽著《六经略注》，《魏书》本传录其《序》文，文中对六经性质作用的论述，来自《礼记·经解》与《汉书·艺文志》，足证汉学的影响。刘献之认为学问重在修身，立身行事“要以德行为首”，学者要“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让”，否则，“博闻多识，不过为土龙乞雨，眩感将来，其于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强调学识与德行的结合，这正是儒家的一贯传统。刘氏注“三礼”、“三传”、《毛诗》，行于世。徐遵明是北方大儒，在诸经师中影响最大，他遍通《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春秋》，其主要成就是传经，他培养了一批熟悉训诂之学的弟子，为后来北方诸经之传作了贡献。

北魏经学内部也有非郑玄而尚王肃，或兼综二家等情况。如，《魏书·礼志》记述，孝文帝令群臣议鬯祭之义，并下诏说：“王（肃）以鬯祿为一祭，王义为长。郑以鬯丘为鬯，与宗庙大祭同名，义亦为当。今互取郑王二义。”《魏书·李谧传》引李谧《明堂制度论》，指责郑玄的明堂论是“攻于异端，言非而博，疑误后学”。这说明北魏经学内部，并非完全死守郑玄章句，也有不同的独立见解。但是，北魏经学的主流则是注重事物的训诂考辨，而不尚玄谈。正如李谧所说：“余谓论事辨物，当取证于经典之真文；援证定疑，必有验于周孔之遗训，然后可以称准的矣。”（《魏书·李谧传》）他对明堂制的考证，其方法就是以《礼传》为据，以训诂为方法，博采众说，评判其正确与否，然后“参其同异，弃其所短，收其所长，推义图察，以折厥衷”（同上）。这是北人治经的典型的态度的方法，它与南朝玄学经学显然不同。

北齐经学可说是北魏经学的继续,其师承脉络和传统情况,在《北齐书》和《儒林传》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北齐经学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徐氏讲郑玄《周易》注,传卢景裕,卢传权会,权传郭茂。其后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青、齐之间,多讲王弼《周易注》。徐氏又通《尚书》,为郑玄注,传于李周仁、张文敬、李铉、权会等人。“三礼”亦出徐遵明之门,下传李铉等人,李铉传刁柔、熊安生等,安生又传孙灵晖等人。其后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毛诗》学者多出于北魏著名经学家刘献之之门。献之传李周仁,李传董会度、程归则,程传刘敬和等人。《春秋》服虔注于河北,亦出自徐遵明之门。姚文安、秦道静兼讲杜预注。河外儒生,皆重杜氏。至于《论语》、《孝经》,则皆为诸生通习。总括来看,北齐经学是以徐遵明所传郑玄经学占据优势。

北周也很重视经学。据《周书·儒林传》记述:“求阙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卢景宣学通群艺,修五礼之缺;长孙绍远才称洽闻,正六乐之坏”,说明北周开国之初,即在重建汉代经学确立的纲常名教和礼乐制度。到周武帝执政时,经学为继北魏孝文帝之后的又一发展高峰。在佛、道兴盛之际,周武帝即以儒学为先,曾集群臣亲讲《礼记》。他得知南梁著名经学家沈重,通晓《诗》、《礼》及《左氏春秋》,即致信并派使者去南梁邀沈北上。保定(561—565年)末年,沈重至北周京师,“诏令讨论‘五经’,并校定钟律。天和(公元566年—572年)中,复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2000余人。”(《周书·儒林·沈重传》)可见周武帝对经学的崇尚。沈重著作多关《礼》学,从其《礼记义疏》佚

文中,可知他颇能领略儒家经典的基本精神。如他疏讲“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于蔬,是忠敬不足所以致然也,君与臣富贵已过极也”(《玉函山房辑佚书》)。他强调君臣应各尽其职,不应“政教烦苛”贻害百姓,基本符合儒家调节社会政治关系的宗旨。

熊安生为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通五经,尤精“三礼”,为北齐国子博士,曾为北齐公卿释讲《周礼》疑义。周武帝平齐入邺,亲临其家邀请,“至京,敕令于大乘佛寺参议五礼。宣政元年(公元578年),拜露门学博士、下大夫”(《周书·儒林·熊安生传》)。其弟子后来有名者有马荣伯、刘焯、刘炫等。据《周书·儒林传》,熊安生有《周礼义疏》20卷、《礼记义疏》40卷、《孝经义疏》一卷,均已亡佚。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礼记熊氏义疏》4卷。从中可以得到熊安生治经不拘一格的方法。如他用《老子》疏通《礼记》。除常据郑玄之义外,还广引《春秋》、《谷梁》、《尚书》、《大戴礼》、《周易》等书,然后疏通经文大意,阐明己说。他注经方式,类似于皇侃《论语义疏》和《礼记义疏》,具有综合南北经学的倾向,对唐初经学的统一有所影响。

总之,南北朝的经学崇尚和其风格,是有所差异的,即所谓“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世说新语·文学篇》)。《北史·儒林传》也有类似概括:“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具体来说,则是“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弼),《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预);河洛:《左传》则服子慎(虔),《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

（《北史·儒林传》）这就是说，除了《诗》、《礼》南北同遵毛、郑以外，一般来讲，南朝经学多主魏晋传统，采用魏晋以来的新注多；北朝经学重汉代传统，遵循汉代的旧注多。由于汉代的旧注比较烦琐，所以说他们“深芜”、“广博”；因为魏晋的新注能突破汉代训诂经学的束缚，比较有一些新颖的见解，所以说他们“清通”、“约简”。

因此，到了隋代，随着南北的统一，南北的学风也逐渐合流。到了唐初，即有了“经学统一时代”（清末皮锡瑞语）的出现，产生了孔颖达等人所撰的《五经正义》这部具有深远影响的巨著。

第二节 魏晋 南北时期的科学与艺术

一、岁差的发现

我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得最早、有很多光辉成就的国家之一，差不多历代都有对天文历法作出贡献的优秀天文学家、治历家。东晋的虞喜，是我国古代对天文历法有重大贡献的杰出天文学家、治历家。虞喜在天文学上最大贡献是发现岁差。

虞喜，字仲宁，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县）人，生活在两晋

之际,生死年月不详,只知死时 76 岁。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父亲虞察曾任东吴的征虏将军。东晋时,他的弟弟虞预爵封平康县侯,官至散骑侍郎。但他本人却始终不肯做官,东晋政府曾多次征聘他出任博士、散骑常侍等官职,他都谢绝。他既不肯做官,所以一生高尚邈世,不钻营世务,而专心研究学问。少年时代,他就博学好古,年老时仍“皓首不倦”,“专心经传,兼览讖纬(之学)”,凡所注述数十万言。他以勤奋求学、刻苦钻研著名,时人称他“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在天文学方面,他“钻坚研微”的卓越成就,是发现了岁差。

所谓岁差,就是冬至点(冬至时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逐年变化的数值。地球是一个椭球体,又由于自转轴对黄道(太阳每年在天空移动的路线,即地球轨道面和天球相交成的大圈)平面是倾斜的,地球赤道(地球表面上距离南北极相等的各点连结而成的大圈)那里的突出部分受到日、月等吸引而引起地轴绕黄极作缓慢的移动,大约 2.6 万年移动一周,由此产生岁差现象。这种变化非常缓慢,冬至点在黄道上大约每年西移 50.2 秒,71 年 8 个月就差 1° ,依我国古代所用的度数,就是 70.64 年差 1° 。

晋代以前,我国天文学界还不了解岁差现象。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以为从冬至到冬至 1 周岁(岁周)就是太阳在众星间运行 1 周天(天周),天周和岁周不分。当时使用的古历(四分历)把回归年长度定为 $365\frac{1}{4}$,也把周天划分为 $365\frac{1}{4}$ 度。那时测得的冬至点在“牵牛初度”(在二十八宿的牛宿起点的附近)。人们认为冬至点的位置一经测定,就不会变化,所以到西

汉初年刘歆重编《三统历》时仍然沿用冬至点在“牵牛初度”这个数据。但是，刘歆已开始怀疑这个数据，经过实测，含糊其辞地说“冬至进退牛前四度五分”（即认为冬至点已不在牛宿初度的位置，差到4'多）。东汉时，贾逵经过实测，说“冬至在斗”（即冬至点已从过去的牛宿移到斗宿）。他们两人已发现冬至点位置的变化，但还不知道是岁差。东晋时，330年（晋成帝咸和五年）左右，虞喜把古代星宿位置和当时的位置相比较，发现两者不同，因而发现了岁差。他在我国天文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冬至点有缓慢的移动现象，认识到太阳的1周天并不等于冬至的1周岁，应该“天自为天，岁自为岁”，把周天和周岁分开。太阳从今年冬至起绕行天空1周，到明年冬至时还没有回到原来恒星间的位置，还不到1周天。他把这个现象叫做“岁差”。古代也把这种现象叫做“恒星东行”或“节气西退”。

虞喜根据自己的观测分析，定出每50年冬至点在黄道上要西移一度，也就是认为岁差每50年差 1° 。这是我国天文学上的一个重要发现。发现时间虽然比古希腊天文学家依巴谷（公元前125年）迟了400多年，但其数值却比依巴谷所定每100年差 1° 的数值精密。

由于虞喜首先发现了岁差，南朝的祖冲之和隋代的刘焯得以用岁差来改进历法，恒星年（太阳连续两次经过某一恒星所需要的时间）和太阳年（太阳连续两次经过春分点所需的时间，也叫回归年）才有分别，使以后的造历更加准确，开辟了我国天文学史的新纪元。

虞喜对天文学的贡献，除了发现岁差外，还在335—342年（成帝咸康元年至八年）间撰写了《安天论》，在天文理论方

面提出了自己的卓越见解。

魏晋以前,我国古代关于天体运动的学说,主要有盖天、浑天和宣夜三家之说。盖天说是远古最为流行的天圆地方说,起初以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后来又发展为“天似盖笠,地法覆盖,天地各中高外下”的说法。具体说法又有所不同,有的说“天如车盖,游乎八极(八方极远之外)之中”;有的说“天形如笠,中央高而四边下”;有的说“天如欹(斜)车盖,南高北下”。这种说法,主要说明众星的运行,认为天是圆形,如同覆盆,地是方形,如同棋盘,天向旁边转动好像推着石磨左行,日、月右行,随着天向左转动;所以日、月实际是东行,由天牵着它们向西落下。浑天说是来自盖天说而又修正、发展盖天说的一种完整的宇宙模型的学说,认为天地的形体好像鸡蛋一样的圆形,天包在地外,如同壳之裹着蛋黄,“周旋无端,其形浑浑然,故曰浑天”,日月星辰附在天壳上随天周日旋转。这种说法,主要说明地球的位置,认为地好像鸡蛋黄一样悬在天壳内,天比地大,一半覆在地上,一半绕在地下,所以从地上看附在天上的二十八宿,一半看得见,一半看不到。宣夜说的“宣”是“明”的意思,“夜”是“幽”的意思,也可叫明幽说。这种学说,主要从哲学角度说明天的性质。它认为“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就是说天是没有形质的,不是固体的天壳而是无限的宇宙空间,日月星辰等“七曜”(日、月与火、水、木、金、土星)依靠“气”自由地浮生在空中,各自按照其特性进行运动。这三家的说法虽不尽正确,但各有其可取之处,特别是宣夜一说提出了一些与实际情况符合的创新见解。

魏晋以后,一些天文学家又在盖天、浑天、宣夜三说的基

础上提出三种新说。三国时吴人姚信基本上继承天圆地方说的体系,提出了偏重说明冬夏气候变化与昼夜长短不同的“昕天论”。东晋的虞耸也基本上依据天圆地方说体系,提出了“天形穹隆如鸡子”的“穹天论”。虞喜则“因(根据)宣夜之说”,提出了他的“安天论”。盖天、浑天、宣夜、昕天、穹天、安天六家之说,后人合称为中国古代的“论天六家”。安天论是对宣夜说的发展。它认为“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地无穷;但“天确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静之体”——天地是有一定形体的物质。这一点不同于宣夜说的“天了无质”之说,它反对天圆地方的说法,认为天地的形体“方则俱方,员(圆)则俱员,无方员不同之义”。它也反对浑天说关于日月星辰附着于固体天壳的说法,认为天上日月星辰的各自运动,和地上江海之有潮汐运动、万物之有行藏活动一样,都有自己的特性。虞喜的这种安天论,是宇宙无限性的理论,是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宝贵财富,是我国古代天文理论上的重大成就。

二、《禹贡地域图》和《佛国记》

两晋时期,地图学、地理学取得了新的成就。西晋的地图学家裴秀主持编绘了《禹贡地域图》,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制图原理——“制图六体”,为我国传统的制图学理论奠定了科学基础。东晋的高僧法显远赴印度、斯里兰卡等国考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撰写了具有重要地学价值的《佛国记》。

裴秀(223—271年),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

人,青少年时代就好学,有风操,能属文,时人称誉说:“后进领袖有裴秀。”在西晋王朝建立过程中,他改革官制,创制朝仪,广陈刑政,成为“儒学洽闻”、“留心政事”的高官。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他担任了西晋王朝的“司空”官职,在位4年,不仅成为西晋初期的“当时名公”,而且成为在地图学上有较大贡献的著名地图学家。

裴秀担任的司空“职在地官”,主管全国的户籍、土地、田亩、赋税和地图等事宜。当时西晋政府收藏的地图有两类,一类是绘制比较精审的吴蜀地图。在司马昭灭蜀前,曾撰访吴蜀地图,按照这类地图进军蜀土时“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无)或有差(差误)。”另一类是汉代简陋的行政区图——“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这类地图“各不设分率(没有比例尺),又不考正准望(方位),亦不备载名山大川。”图形粗略,不可依据;有的甚至是“荒外迂诞之言,不合事实,于义无取。”而当时保存的先秦时代的《禹贡》一书中的山川地名,又因“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闾昧。”为了改变当时地图和地理学上的这种状况,适应西晋王朝“混一六合,以清宇宙”的一统天下的需要,裴秀认为必须提高绘制地图的水平,编绘出精审详实的全国地图。

要编绘出精审详实的全国地图,首先必须掌握绘图的科学原理。在京相璠等绘图人员的协助下,裴秀总结了前人关于地图和地理学的丰富知识,参看了当时绘制得比较精审的吴蜀地图,提出并论述了“制图之体有六”。他论述制图六体说:

“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就是说,第一要有表示地区长宽大小的比例尺,以表示判别出地图与原地形、地物相

比缩小的程度。

“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就是说，第二要有确定彼此间的方位关系，以正确绘出地图各个部分之间的相对位置。

“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就是说，第三要测算出两地之间的道路里程，以定出两个地物之间的距离。

“四曰高下(低)，五曰方邪(斜)，六曰迂(曲)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校验)夷险之异也。”就是说，第四、五、六要测算道路里程的高低、方斜、曲直，因地制宜，求得两地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

他认为全面运用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这六条原则，就能绘制出精确的地形图。

裴秀运用“制图六体”这一套制图原则，对《禹贡》一书中所记述的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之 9 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晋之 16 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陋，以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道路等，都作了查对核实和注解，绘编成西晋的全国地图——《禹贡地域图》(简称《地图》)18 篇。与此同时，他又把西晋原有一幅由 80 匹缣(绢)绘制的《天下大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缩制成比例约为 1:1800000 的《地形方丈图》(简称《方丈图》)。缩制的《方丈图》，携带、披阅起来都比原来的《天下大图》方便。

裴秀提出“制图六体”并运用它绘制《禹贡地域图》，在我国地图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制图六体”是我国传统的制图理论。它主要讲求比例尺、方位和距离的准确性。运用它编制地图，大大提高了精确度，基本上符合近代绘图的科学原

则。这套原则直至明清仍为地图学家所遵循运用。其中如讲求比例尺、方位和距离的准确,迄今还是测绘平面地图所必须遵循的科学原则。

在裴秀对我国传统制图学理论作出重要贡献之后,东晋的法显又对我国的地学、佛学和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法显(约 334—420 年),平阳郡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人。本姓龚,3 岁时就度为沙弥(童僧),20 岁受大戒,逐渐成为精通佛学的高僧。他法名法显,姓释氏,人称释法显,又因为他是平阳人,也称为“平阳沙门(出家修道者)”。他是我国佛教僧侣“西行求法”陆去海回的第一人,最早成为世界著名的佛教翻译家、佛学家和旅行家。

西汉末年以后,天竺(今印度)的佛教逐渐传入中国。天竺和西域(今新疆一带)的僧侣不断东来传教。但他们传译的佛经,或经本不全,或传译失真,在佛学研究中常常发生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魏晋时期,中原经常战乱,佛教开始盛行,中国僧侣为了深入研究佛学和广泛传播佛律,希望亲赴西天——天竺留学,到佛教圣地求法取经,形成了西行求法的运动。最早开始西行求法的,是曹魏末年的朱士行,但他只到了当时的于阗(今新疆和阗),并未到达天竺。两晋时期,西行求法的僧侣一时涌起,但是先于法显到达天竺的人也极少。为了使佛教戒律(法规)“流通汉地”,法显决心“乘危复险”亲去天竺“求戒律”。

399 年(后秦姚兴弘始元年,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 月,年已 60 多岁的法显开始踏上西行求法的征途。他和慧景等 5 人

从长安(今西安市)结伴出发,行至张掖(今甘肃张掖),宝云等5人又随之同行。他们从敦煌西走,经过“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长达1500里的戈壁流沙,到了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乌夷(今新疆焉耆县)。又经过“中无居民,涉行艰难”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了于阗。然后沿着昆仑山北的古道前行,越过险峻的葱岭高原(今帕米尔),渡过新头河(今印度河),经过北天竺、西天竺(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到达中天竺、东天竺、南天竺(今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法显在中天竺、东天竺、南天竺共住了5年,从事“学梵书、梵语,写律”,“写经及画像”等求律取经、研究佛法和巡礼佛教圣迹活动。

在天竺求律取经结束以后,法显就取道海路东归。他从多摩梨帝国(今孟加拉国)乘船经海上西南行,到了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在这里停住了2年,继续求律。411年(义熙七年),他乘船东归,到了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亚爪哇一带),停住了5个月,乘船准备回到广州。但是,途中忽然遭遇“黑风暴雨”,船在海上随风漂流,漂过台湾海峡、长江口,一直漂到青州长广郡(今山东即墨)的牢山(今青岛劳山)。412年(义熙八年)7月,崇信佛教的长广郡太守李嶷,知道“沙门持经像乘船泛海而至”的消息,派人迎接法显登陆。次年七月,法显从这里由陆路南至东晋都城建康。

法显西行求法从陆路跋涉山川西行,从海路漂洋过海东归,历时15年,行程数万里,遍游中亚、南亚和东南亚34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僧侣西行求法的著名先驱者。东晋时期的人就称赞他说:“自大教(佛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法)显之比”,“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唐代高僧义净称赞说:“观

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法）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王路”。法显确实是“创辟”了陆去海回的“荒途”，并是后来唐代玄奘（俗名唐僧）西行取经的先驱者。他从印度和斯里兰卡带回许多重要的梵文佛经、佛律，回国以后，就在建康道场寺进行翻译和传播。大约在 416 年（义熙十二年），他和觉贤等共同译出《摩诃僧祇众律》一部，《方等般泥洹经》（也称《方等大般泥洹经》或《大般泥洹经》）6 部。他是驰名中外的佛教翻译家，对中印特别是中斯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他在斯里兰卡住了 2 年，他的名字就成了中斯友好的代名词。迄今斯里兰卡还有一个“法显洞”，就是当年法显曾经住过并保存下来的古迹。

法显在翻译佛律、佛经的同时，又把他的西行经历写成了一部 9500 多字的《佛国记》（又称《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或《法显传》等）。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外长篇旅行传记，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旅行记之一，在文学和地学上都有重要价值。

《佛国记》以精炼明畅的文笔，朴实简明的语言，生动具体地记述了当时中国东晋、印度、斯里兰卡等地的地理面貌和风俗人情。它记述了当时印度阿育王建立的石柱及其铭文、雕刻艺术，是我们研究印度阿育王时代历史的珍贵资料。它对中国东晋、印度、斯里兰卡的山川形势、物产气候、经济生活等情况，作了简明真实的描述。如描写葱岭高原地带的地形、气候及物产等情景说：“葱岭冬夏有雪……顺岭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

描写印度河平原的地形是“两岸皆平地”，中印度的气候是“寒暑调和，无霜雪。”斯里兰卡“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这些关于中亚、南亚自然地理景物的描述，在开阔中国人民的地理视野和丰富中国人民的世界地理知识等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部著作，在我国历代的佛教经录和经藏中都被收入，除了我国学者外，外国学者也纷纷从事翻译、整理、研究。它已被先后译成法文、英文和日文，成为研究亚洲历史和历史地理等的重要文献。

三、《抱朴子》与炼丹术及早期化学

炼丹术也叫炼金术或点金术，是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追求“长生不死”而炼制丹药的一种方术。这种方术起源于战国时代，发展于秦汉魏晋。晋代的葛洪，是一个“穷九丹之秘术”的著名炼丹家。他总结了前人的炼丹理论，也总结了本人的实践经验，写出了《抱朴子》这部完整的炼丹术著作，记载了当时炼丹术中的不少化学成就。

葛洪(281—361年)号稚川，丹杨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少年时家贫，但他好学不倦，自己亲自砍柴卖钱买纸墨，夜间写书诵习。更好寻书问义，遍览典籍，因而以儒学和好“神仙导养之法”知名。他的从祖父葛玄，在孙吴时从学于方士左慈，号曰“葛仙公”，把他的炼丹秘术传给学生郑隐。葛洪又从郑隐那里学得炼丹术，“悉得其法”。后来又拜广东南海太守鲍玄为师，学习道家的神仙之术，并和鲍玄的女儿结了婚，承袭了鲍玄的道学，并“兼综练医术”。他曾参加过西晋镇压石冰起义的

活动,但他“不论功赏”,曾到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他在青年时就从师学习炼丹秘术,年老时为了炼丹又“老而忘倦”。他听说交趾有丹,求为广州句扁令,东晋皇帝认为他资高,任句扁令太低。他却说:“非欲为荣,以有丹耳。”为了炼丹,他“谢浮荣而捐杂艺,贱尺宝而贵分阴”,取得了重大的化学成就,受到了世人的称颂。他“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到广州罗浮山炼丹,并继续著书立说。他自号“抱朴子”,意思说自己是个朴实的人,他写的主要著作也叫《抱朴子》。

《晋书》的《葛洪传》说葛洪“博学洽闻,江左绝伦”,学识广博在当时的江南是无人可比的。又说他“精辩玄赜,析理入微”,精通玄妙的炼丹秘术,说理细致入微。他的《抱朴子》一书,分为《内篇》和《外篇》。《外篇》50卷,主要讲儒家的应世之道。《内篇》20卷,主要讲道家的“内学”,也即论述炼制金丹、仙药等炼丹术。这部书和东汉炼丹家魏伯阳写的《周易参同契》(简称《参同契》),同是世界上最早的重要炼丹术著作。

我国古代炼丹家烧丹(丹砂)炼汞(水银)的目的是迷信的、荒诞的,它所依据的许多理论是唯心主义的;但他们的理论有一部分是对的,特别是他们的采药、制药、炼丹实践活动提供了对自然现象进行观察研究的机会,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在化学方面取得了若干重要成就。

水、火、木、金、土“五行”相生的理论,是我国古代炼丹家烧丹炼汞所依据的基本理论。葛洪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他说:“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认为物质变化是自然界的规律,一切物质都可以变,在适当的条件下金银也可以用其他别的物质变成。所以他说:“何嫌金银不可以异物作成乎?”《抱朴子

·内篇》中的《金丹》、《仙药》、《黄白》等篇，就是叙述这些物质变化的。《金丹》篇主要是叙述用无机物质炼出所谓长生的“仙丹”的。《仙药》篇主要是论述植物性的“五芝”（指长在枯树上的一些肥大的菌类）可以延年益寿。《黄白》篇主要是讲所谓人造黄金和白银。其中所讲的一些无机物质的化合、变化等理论，是合乎化学原理的、科学的。

《抱朴子·内篇》更详细地记述了前人和葛洪自己炼丹的方法和技术，记载了他们观察到的许多化学现象和所取得的科学成就。这些成就是：

一、火法炼丹的成就

中国古代炼丹的方法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火法。这种方法，是带有冶金性质的无水加热法，大致包括煅（长时间高温加热）、炼（干燥物质的加热）、炙（局部烘烤）、熔（熔化）、抽（蒸馏）、飞（又叫“升”，即升华）、伏（加热使药物变性）等法术。东汉魏伯阳的《参同契》中已讲到这种火法炼丹，称为“火记”。这本书中有《火记》600篇，但已失传，无法查考其内容如何。而《抱朴子·内篇》中却有所记载。

炼丹术最早常用的药品材料是丹砂、汞、铅、硫等。丹砂就是红色硫化汞。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墓中曾出土200多粒丹丸，大小如绿豆。根据化验，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硫化汞。炼丹的方法一般就是火法。红色硫化汞一经火烧加热就会分解出汞（水银），汞和硫黄化合就生成黑色硫化汞，再加热使它升华，就又恢复红色硫化汞的原状。所生成的汞，是金属物质却呈液体状态，圆转流动，容易挥发，显得神奇。炼丹家想利用它制成具有神奇效用的“还丹”，即所谓“神丹”。秦汉以来的炼丹家想制成

“神丹”，反复炼丹，对汞的变化十分熟悉。西汉时的《淮南万毕术》一书中就说：“丹砂为颢(汞)。”东汉的《参同契》一书描写了汞容易挥发和容易同硫黄化合的特性，也指出它在丹鼎(化学反应器)中升华后“赫然还为丹”的情况。《参同契》用诗和隐语的形式说：“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将欲制之，黄芽为根。”

这里的“河上姹女(少女)”，指的是汞(水银)；“黄芽”是指硫磺。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水银受热就升华，但遇到硫黄则化合成硫化汞(丹砂)而固定下来。葛洪的《抱朴子·内篇·金丹篇》又更明确地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说，天然的红色硫化汞(丹砂)受热就分解出水银，水银和硫黄不断加热又变成红色的硫化汞。这就说明当时既可以用天然红色硫化汞(丹砂)制成水银，又可以用人工方法制成人造红色硫化汞(丹砂)。这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与天然物质完全相同的人造物质，是炼丹术在化学上的一项伟大创造。

汞的一个特性，就是能和其他金属生成“汞齐”即汞的合金；而汞齐蒸去汞以后，又可重得那种金属。古代炼丹家们早已对汞的这种特性，对汞和其他金属形成汞齐的作用，有所研究，有所发现。晋代以前的炼丹家已认识到汞和其他金属形成汞齐的作用，并制成了铅、锡等金属的汞齐。西汉的《淮南子·天文训》说：“明镜”要“粉之以玄锡”。所谓“玄锡”就是铅汞齐，古代用作制铜镜的抛光剂。东汉的《参同契》说：“太阳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华，转而相亲，化为白液，凝而至坚。”说的就是汞和铅形成铅汞齐的作用。“太阳流珠”指的是汞(水银)，“金

华”指的是铅。这首诗说的是水银和铅可以制成固体的铅汞齐。当时对铅和它的化合物也很有研究。汉代以前,已知用铅制造化妆用的颜料铅粉。这种铅粉最早叫“粉锡”,也叫“胡粉”。所谓“胡粉”就是“糊粉”,即“和脂以糊面”之粉。它是碱性碳酸铅。《参同契》说:“胡粉投火中,色坏还为铅”,就是说铅粉遇到赤热的火,就被还原为黑色金属铅。当时已知铅粉中含有铅,铅粉遇到热,铅就放了出来。晋代除用铅制造铅粉之外,还用它制备黄丹,即三氧化二铅。《抱朴子·内篇·黄白篇》说:“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脱色)之以为铅。”这里所说的“丹”是指“黄丹”、“铅丹”(或叫“广丹”)。这是说金属铅受到强热可以变成赤色的黄丹即三氧化二铅,黄丹被炭火还原又能分解出铅。

在冶金方面当时也可能有一些发明创造。《参同契》中认为“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抱朴子·内篇·黄白篇》说:“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药,炼人身体,故令人不老死。”因为炼丹家们认为服用金、银矿物之类“不朽”的物质可以使人的血肉之躯也同样“不朽”、“不老死”,所以他们设法用人工方法炼制药用的金银。汉代以来,就有炼制黄金的记载。《抱朴子·内篇·黄白篇》记载葛洪的老师郑隐曾对葛洪说过他曾与左慈在庐江铜山自造过“黄金”,并记载了一些制造金、银的故事。如华令思起初投药成银,后又投药成金;李根煎铅、锡造银;程伟妻投药于汞成银,等等。还说金、银可以用“异物”作成,“神丹既成,不但长生,又可作黄金。”说明当时已经能用铜、铅、汞等贱金按不同比例炼成了若干种黄色或白色的合金,即人造

的“黄金”、“白银”。这种炼金活动，直到宋代还在进行。

二、水法炼丹的成就

炼丹家一方面用火法把金石药炼成固体的丹，另一方面也用水法把金石药溶解成为液体。他们在溶解金石药的长期实践中，对水溶液中的复杂化学反应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许多化学知识。炼丹术大丛书《道藏》洞神部众术类记载了古代炼丹的《三十六水法》，保存了晋代以前炼丹家溶解 34 种矿物和两种非矿物的 54 个方子。《抱朴子·内篇·金丹篇》也记载了许多同类的丹方。这些古方，说明当时水法炼丹处理药物有好多种方法。

一般说来，用水法制备药物需要准备华池，即盛有浓醋的溶解槽（或用缸、盆之类代替），醋中投入硝石和其他药物。硝石古称“消石”，因为它能“消化七十二种石”，在古代炼丹中十分重要。它在酸性溶液中提供硝酸根离子，起类似硝酸的作用，可以溶解许多金属和矿物。这种在醋酸中加入硝石，也就是把酸碱反应和氧化还原反应统一起来加以运用，在化学史上是一种创造。《抱朴子·内篇·金丹篇》中有“金液方”，说只要把黄金连同药物封在华池中静置 100 天，就会慢慢溶解而“成水”。在当时能溶解黄金、出现溶解金的方法，这是化学史上的一项巨大成就。

水法炼丹的另一重要发现，是水溶液中的金属置换作用。古代炼丹家有金属互相“转化”的理论。西汉的《淮南万毕术》中曾经记载：“曾青得铁则化为铜”。《抱朴子·内篇·黄白篇》说：“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曾青”是一种美丽青色的硫酸铜。这就是说，当时已经观察到铁

和硫酸铜溶液中的铜离子起置换作用、生成金属铜的现象。

古代的炼丹术是化学的原始形态,是近代化学的先驱。它所用的实验工具、设备和药物成为化学发展初期所需要的物质设备。它所取得的化学成就也为近代化学奠定了基础。中国的炼丹术起源很早,到了晋代日益发展。葛洪是当时著名的炼丹家,成了我国炼丹术中承前启后的炼丹人物。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赠李白》的诗中说自己“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葛洪的炼丹成就和著作,对中国唐宋以后的炼丹,对阿拉伯的炼丹,都起了重大影响。

四、《脉经》、 《甲乙经》和《肘后方》

两晋时期,我国的医学科学也有所发展。其主要特点,是在疾病认识和医方创制等方面的较大进步,出现了一些医学专著。其中影响较大的名著有《脉经》、《甲乙经》和《肘后方》。

《脉经》是魏晋时人王叔和编著的。王叔和,名熙,生卒年代不详,约在公元3世纪前半期。他曾任太医令,博好医学经方,“穷研方脉,精意诊断,洞识修养之道”。他在医学上的主要贡献,一是整理了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使这部重要医著流传于世;二是综合了战国以来有关脉学的知识、经验和文献,编成《脉经》一书。这本医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脉学专著,对后世中外脉学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

脉诊是我国古代医学在诊断疾病方面所采用的一种独特诊法,春秋战国时期已达到相当水平。《黄帝内经》和《难经》等

医著已详细论述了脉诊。《脉经》中综合了前代有关脉学的知识和经验,第一次把它们集中起来,完整地叙述了 24 脉,并对 24 脉的性状逐一加以比较明确的描写。所谓 24 脉,即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等 24 种脉象。这些脉象反映脉位。所谓脉位,就是用手指端去切脉所觉察出来的脉搏表现最明显的部位。“浮”是指用手轻按就可以觉察脉搏、重按反而减弱的脉象。这种脉象表明病在“表”,常见于外感病初起,机体和外界致病因素(外邪)相抗争于肌表。在生理病理上,多由于心搏排血量增加、血循环加速、血管弹性阻力降低、桡动脉充盈度增大所形成。相反,“沉”却是指轻按不能觉察、重按才能觉察的脉象。这种脉象表明病在“里”,阳气衰微,常见于心脏病患者。在生理病理上,多由于心搏排血量减低,血压下降、末稍动脉血减少、血管弹性阻力增加而产生。《脉经》把这些脉象集中起来加以论述,这就大大便利了临床医生的掌握。后世虽然发展到 28 脉,以至 33 脉,但最常见的还是《脉经》中所说的 24 脉。

《脉经》还开始初步肯定了关于寸关尺三部脉的定位诊断。所谓寸关尺三部脉的定位诊断,就是左手寸部主心与小肠、关部主肝与胆,右手寸部主肺与大肠、关部主脾与胃,两手尺部均主肾与膀胱等。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仍为后世医生所继承。

《脉经》不仅在国内医学界有影响,而且在国外也有影响。隋唐时期,《脉经》等书已传到日本等国。公元 14 世纪,波斯的一部载有中国医药的百科全书中,就包括脉学,特别引述了《脉经》及其作者王叔和的名字。

《甲乙经》的全称是《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或《黄帝针灸甲乙经》，也称《针灸甲乙经》。作者皇甫谧(215—282年)，字士安，号玄晏先生，魏晋之际的著名学者，著有《帝王世纪》、《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史学著作。他42岁时得了风痹疾，半身不遂，开始学医，并准备《甲乙经》的编著工作。

《甲乙经》是根据《素问》、《针经》(即《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书的内容编辑而成的。皇甫谧在自序中说自己“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他撰集的这本医书，虽名为《针灸甲乙经》，实际上把中医的基本理论也都概括在内了。

针灸疗法是我国古代人民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医疗方法。春秋战国时期，针灸疗法已经相当普及，医疗质量已经显著提高。秦汉时期，已出现了一些针灸学专书。皇甫谧进一步总结了前代针灸治疗的经验，特别是对于每种疾病的针灸取穴，以及每一“俞穴”的主治病症范围，都作了详细而有条理的归纳整理。所谓俞穴，又称“孔穴”、“穴位”或“经穴”。《针灸甲乙经》共记有经穴总数六百五十四。这是一部比较系统的、也是我国目前保存最早的重要针灸学医著。它不仅对国内后世针灸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被视为中医针灸学之祖，而且也在世界上也受到很大重视。如日本701年的《大宝律令》中，明确规定用《针灸甲乙经》等作为学习医学和针灸学的必修课程。1136年高丽政府也正式规定《针灸甲乙经》等是学习医学针灸的必修课程。

皇甫谧的医学著作，除《甲乙经》外，还有一卷著名当时的

《寒石散论》，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后世的《巢氏病源》中保存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肘后方》是两晋之际炼丹家葛洪的一部医学著作。

葛洪的医学著作原有《玉函方》或称《金匱药方》百卷，是选集各家著作和搜集各地流传的验方而分类编辑的，但没有流传下来。以后，他又因为本书部头太大，觉得“非有力不能尽写”，于是又仿照各家“备急方”的体例编了一部《肘后救卒方》，共 3 卷 86 篇（或称四卷）。所以《肘后方》又称为《肘后要急方》、《肘后备急方》或《肘后救卒方》。这是一部药方书。葛洪认为这些药方“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他的目的当是使乡间病人遇到急病也可自己采方治疗，以解决仓卒之间无医可求的困难。

《肘后方》经南梁名医陶宏景加以整理，把原来的 86 篇改编为 79 篇，又增补了 22 篇，合成 101 篇之数，并附会佛家“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之说，把书名改为《肘后百一方》。一百一病又分为三类：一类是“腑脏经络，因邪所伤”的“内病”；一类是“四肢九窍，内外交媾”的“外发病”；一类则是“假为他物，横来伤害”的“他犯病”。后来，金代的杨用道，又把宋代《证类本草》中的附方补充进去，称为《附广肘后方》。现存的《肘后方》就是经过陶、杨二人整理和补充后的本子，但也只存 68 篇。

现存《肘后方》共分 8 卷，1 至 4 卷是陶宏景所说的“内病”，包括中恶、心腹痛、伤寒、时气、中风、水病、发黄等急性病；5 至 6 卷是“外发病”，包括痈疽、疮疥、耳目等病；7 卷是“他犯病”，包括虫兽伤、中毒等病；8 卷是百病备急丸散和牲畜病等。书中所举各病，主要是卒发急病；治疗方法除简单易

得之方药外,也用灸法。所举方药中,简单而又实用的占多数,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其中如葱豉汤、三黄栀子汤等仍为现今中医常用的有效药方。这部医药著作,在实用上有相当的价值。

五、祖冲之与“祖率”

祖冲之(429—500年),字文远,祖籍范阳郡道县(今河北涿源北)人,后迁居南方。他年轻时,就爱好天文和数学,33岁时就编制出最先进的农历法。那时正是南朝刘宋的大明年间,因而名为《大明历》。

《大明历》,是以祖冲之的长期天文观测作基础制定的,比以前的12家古历都精确得多。祖冲之应用了东晋天文学家虞喜首次发现的岁差原理,计算出1回归年是365.24281481日,同近代科学测量的结果比较,1年只差50秒。他又测出月亮环行地球1周(交点月)的时间是27.21223日,同近代科学家测量比较,相差还不到1秒。他还改革了置闰方法。以往19年置7闰,这样每200年比实际多出1日,造成历法同天象不合。他采用391年置144闰的方法,使之更符合天象实际。这些,在天文历法史上,都是重大的改革和进步。

祖冲之在中国天文学史上是一颗巨星,在世界数学史上,也是古代数学家中的巨擘之一。他采用割圆术的科学方法,计算出圆的直径同周长的比,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最精确的圆周率。

割圆术,即把圆形分割成内接的正多边形,利用求正多边形总边长的方法,去求得圆周长度的近似值。始初从正6边形

开始,再求正 12 边形、24 边形……,边数一倍倍增加,依次算到正 24576 边形,才能得出上述的圆周率近似值。当时,不但没有今日的电子计算机,连算盘也还没有发明。祖冲之是用筹码进行演算的,十分繁难。然而他计算的圆周率比今日通常使用的 3.1416 还精密得多。

圆周率的近似值用分数形式表示,早在祖冲之以前就有人提出,那就是 $\frac{22}{7}$,但它的分数值是 3.1428571,在其第 3 位小数以后就同圆周率不相符合了。祖冲之认为它过于粗疏,称之为“疏率”。他自己经过反复测算,测得 $\frac{355}{113}$,其分数值是 3.1415929,这数的 6 位小数都与圆周率相符,是圆周率的最佳渐近分数,称之为“密率”。

一千多年后,荷兰工程师安托尼兹以及德国人奥托,也求得这个圆周率近似值的分数。欧洲数学史家当时还不知祖冲之早已提出过“密率”,误以为首次提出的是荷兰人,故而称之为“安托尼兹率”。日本数学家有人主张应改称为“祖率”。在祖冲之的祖国,今天人们已习惯地称其为“祖率”。

祖率,原只是祖冲之的数学研究成果之一。他曾把其研究成果总汇成一部著作,叫《缀术》。《缀术》的命运同《大明历》一样,在祖冲之生前未显于世。大明历被搁置了 48 年,它被采用颁行时,祖冲之已逝世 10 年。《缀术》则是在祖冲之死后的 100 多年,才为唐朝的国立太学列为必读的《算经十书》之一。此书最难,学习期限规定为 4 年。《缀术》后来东传。据说 12 世纪时,日本与朝鲜也曾把它列为教科书。可惜,这书终究失传了。

祖冲之科学成果的价值,直到近代才被逐渐重视,20世纪50年代,他被公认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六、北朝地理学家酈道元

酈道元(466?—527年),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北魏末,他先后出任过太守、刺史等地方长官,读过许多书,走了许多路,足迹遍及长江以北的大半个中国。他热爱祖国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热爱祖国的历史文化,到处寻访名胜古迹。他知识渊博,曾给《水经》作注释,其书名曰《水经注》。

《水经》原是汉朝人桑钦著的,记录了中国古代的137条水道,成为一部河道学的专著。但它只有1万多字,记述过简,且有不少错漏。此书清朝人考证是三国时人的作品,也可备作一说。酈道元就是以此书为纲要,把记述的水道增加到1252条,每条水道,一一穷源究委,记述其流经的山陵、原隰、城邑、关津,以及地理沿革。注文中最富特色的是那些同水道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人物,传说与神话,以及历史遗迹、文物和碑石等记载。北魏以往的几千年中国故事旧闻,从这部书的注文中大都可以窥见概略。因此,它的篇幅也增加到30万字,比原著扩大20倍。《水经注》,名为注释,实为创制,它是部独具风格的综合性地理巨著。它与南朝史学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唐初学者李善的《文选注》,被合称为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三大名注”。《水经注》被称为名注,除其内容的特色之外,则是因酈道元的文笔美妙动人,其精彩的篇章,又像诗,又像画。

郦道元的不朽文笔，在历史岁月中哺育过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作家，至今，仍被选作大、中学的文学教材。正因此，郦道元的《水经注》在现代被作为古典文学巨著出版，作者的名字也被列入著名文学家辞典之中。

《水经注》使我国学者对于祖国水道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切于实用的；作者文笔的优美，又为实用增添了不少方便。

《水经注》虽以文学特色著称，然而，它毕竟是部地理科学著作，受到历代科学工作者的珍重。由于它的记述翔实可靠，在今天也仍是国家与地方进行水利建设、城市规划以及制定远景蓝图时的重要参考文献。特别是在考古和历史研究方面，发挥着其特有的重要作用。比如，它在易水条下，记载了古代燕下都城址，对寻找和考证这座古城遗址起了很大作用。它在科学上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也曾出过这样的大笑话。

山西省雁北地区，在大同市以东约 30 公里的地带分布一火山群。火山口历历在目，火山弹也比比皆是。中国地质学家早年曾去考察过，认为是些死火山。20 多年前，有位外国火山专家也来考察，断定那是个休眠的火山群，它们在 1500 多年以前还曾喷发过。其文献根据就是《水经注》。

《水经注》的漯水（古代流经雁北地带的桑干河与其下游永定河的统称）条下曾记载：“水导源火山西北流，山上有火井，南北六七十步，广减尺许。源深不见底，炎势上升，常若微雷发响。以草爨之，则烟腾火发。”

这样的考察结论与文献证据，引起当地居民的震惊，惶惶不已。当地的大规模基本建设，从此都不能不顾及这一潜在的

威胁。

火山脚下的人们过了大约 20 个不得安宁的春秋。一个春天，他们在火山脚下发现一座汉墓，即 1700 年前的古墓，墓室与遗物都处在火山灰上沉积起来的厚厚积土层中。接着，又发现周代陶片、新石器时代的石斧，以及数万年以前鸵鸟在这里蹒跚遗留下来的蛋片化石。这些不会说话的材料确凿地告诉人们：大同火山群自有人类在这里定居以来，未曾喷发过，是座死火山。后来，又进一步从地质学角度得到了确证。

那么，难道《水经注》上记述的火山不确凿？这部科学著作不科学？仔细检校，原来那位外国专家的论文中，把《水经注》讲的火山的地理位置弄错了，把在大同以西 30 公里弄成在大同以东 30 公里，东西混淆，张冠李戴了。

大同以西有无火山？据实地调查，那里没有火山的任何迹象。然而，在某些地方，每当雨后或雪后，那里确有云雾蒸腾。原来，几千年来，这里都存在着地下煤层自燃的现象。郦道元见山上有火，故称之为火山。可这同现代的火山的概念是不同的。这一点，不只那位外国专家弄错了，中国许多学者也弄错了。

科学家们细查郦道元的全部注文，发现他还记载了煤层自然引起的其他种种现象。比如注文中有“南崖下有风穴，厥大容人，其深不测，而穴中肃肃，常有微风。”风穴，就是地下煤层自燃后地层下陷形成的进风口，又是煤层得以燃烧的条件。郦道元大概曾亲临风穴踏勘，不然，他怎能写得如此真切，有“肃肃”、“微风”的感受呢！

郦道元不识煤层自燃的道理，却以科学家的态度如实地

记述了所见所闻。当然，他的注文也不能说绝无错漏之处，但其态度是严肃而谨慎的。正因如此，它才为科学家们所信赖，成为一部科学名著。

七、农学家贾思勰

《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一部农书。作者贾思勰，山东益都人，曾经做过北魏的高阳太守。这部书的写作，可能在北魏末东魏初，即公元6世纪30年代或稍后，距现在已经1400多年了。

贾思勰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家。他在写这部书的时候，研究了前人有关农业的著作。搜集了民谣农谚，访问了有经验的老农，在实际生产斗争中作了细心的观察和比较；从书本知识到调查研究，从理论到实践，都没有放松。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引用的古书有一百五六十种，绝大部分现在都失传了，靠了它才保留下来一鳞半爪。他以农谚为据，对农业生产知识作了生动的说明；向老农请教，更使得这一著作具有丰富深刻的内容。

《齐民要术》全书92篇，分为10卷，和当时通行的文体一样，分正文和自注，正文约7万字，自注约4万字。在《齐民要术》这个题目下，作者也自注了一番。用我们现在的话翻译出来，这4个字的意思，就是“人民群众谋生的重要方法”。它包括了农艺、园艺（蔬菜和果树的栽培）、林木、畜牧（家禽、家畜的饲养）、养鱼和农产品制造（如酿造、食品加工）及其他农业、手工业等；其中，农艺和园艺占了重要的篇幅。从西周以来，我

国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已经获得的知识和技术，在《齐民要术》中，都作了总结性的叙述。

在农作物的种植方面，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早就注意了天时和地利，贾思勰进一步指出：“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否则，便要像“到泉水里去砍树，到山顶上去捉鱼，只能空手回来”，或者像“逆着风向泼水，从平地往坡上滚球”，用力多而收效少。他正确地提出要按照季节不同、气候不同和土壤特性不同，来进行不同作物的栽培和管理，也就是“看天、看地、看庄稼”。

在“顺天时，量地利”的原则下，他把栽种的时间，按照不同的农作物，分为上、中、下三时。例如，种谷子，二月上旬为上时，三月上旬为中时，四月上旬为下时，等等。他又把地利分为上、中、下三等。例如，谷子以绿豆、小豆为底（即前茬作物）为上；以麻、黍、胡麻为底为中；以芜菁为底为下；而且同一农作物因地力和季节不同，播种量也要随之而不同。

在强调因地、因时制宜的同时，他对土壤的改良和耕作技术（耕、锄等）也十分重视。他提出要经常保持土壤中所含有的适量水分，要增强土壤的肥力，要利用作物吸收养料的不同，进行作物的轮作、间作、混作和套作。他首先总结了耕地的深浅是按不同情况来决定的经验，他说，“初耕欲深，转地欲浅”；又说，“秋耕欲深，春、夏欲浅”。深耕的好处是可以根除杂草，防止病虫害，又能多吸收水分，疏松土壤，农作物的根扎得深，就能长得好。这是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生产所积累起来的知识，贾思勰总结了这些知识，提出耕地在什么情况下要深，在什么情况下要浅。

贾思勰在耕作技术方面,还有许多极宝贵的经验总结。

在蔬菜栽培方面,他认为应该高度利用土地,生产上要粪大水勤。在果树种植方面,他详细介绍了嫁接法,书中的接枣法和现在河南新郑枣区所用的方法相同。在家畜的饲养方面,他注意了喂料和喂水。他说,喂料喂水,要适合牲畜的特性;做到了这一点,牲畜就没有不肥不壮的。他引用民谣“羸牛劣马寒食(清明节)下”(瘦牛弱马过不了寒食)来说明牲畜过冬,喂不好就要造成死亡。对于肉用家畜,他提倡“阉割法”,这种方法,我们现在还在使用。

《齐民要术》中还介绍了 20 多种做酒的方法,详细说明了酿造的过程。食物加工和烹调,这时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食物的加工有果酱,有果仁粉,有干果,有蜜拌,等等。

贾思勰的故乡山东,是我国古代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从西晋末到北魏统一北方的百余年中,这个地区经历了长期的战祸,但劳动人民在坞壁武装自保的情况下,从事生产劳动,为大族豪强提供财富。每一个坞壁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北魏统一北方之后,长期的安定为这种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均田制”实行,自耕农生产的积极性有所提高,农业在这一时期,获得了较大的进展。《齐民要术》反映了这一情况。粮食作物的品种被记录下来的相当丰富,以粟而论,便有 86 种之多。果物有 10 大类,作者说:“种数既多,不可一一列举。”蔬菜不但品种多,产量也大,有一顷一顷地种的,有一车一车卖的,有的蔬菜种子一收 100 石。干椹的收获,“大家”(大地主)多到 100 石,收得少的也有几十斛。红蓝花、梔子之类,靠近城市的好田,一年种一顷,摘花时 1 天要 100 个劳动

力,每年收益值绢 300 匹。在畜牧业方面,生产规模也不小,以羊为例,一家养羊千只,需要多少喂料,怎么种这些喂料,书中都有详细的说明。

来自塞外的鲜卑人、高车人具有丰富的畜牧知识。《齐民要术》从这些知识中吸取了营养。关于用乳类加工制成酥酪、用羊毛制成毡毯的技术等,显然是这些塞外部族生产经验的总结。

生产斗争为贾思勰的科学活动提供了不尽的源泉。

贾思勰在农学方面的成就超越了他的前人。在他以后,我国几部重要的农书,从他那里吸取了重要的养料。

八、南北朝时期的石窟艺术

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统治者的崇佛,在北方各地大量修建佛窟,因此发展了石窟艺术。石窟艺术是雕塑和绘画的结合。最著名的有山西大同云岗石窟,始凿于公元 453 年(北魏兴安 2 年),今存 40 余窟,大小佛像 10 万多,最大佛像高十几公尺,气势雄健、古朴,早期的昙曜五窟具有明显的印度犍陀罗艺术影响。洛阳龙门石窟,开凿于公元 459 年(太和 19 年),其中最出色是古阳洞和宾阳洞,佛像庄严、整洁,更接近现实。规模最宏大的是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千佛洞),开凿于公元 366 年(前秦建元 2 年)。因为这里石质疏松,不适于雕刻,所以佛像皆为塑像,洞壁为大型彩绘,壁画虽以佛教故事为题材,但由于无名艺人的精心创造,有的也反映了社会现实,千佛洞是我国古代的艺术宝库。此外还有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

永靖炳灵寺石窟等，也很有名。

北朝雕刻艺术是我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明珠，云岗和龙门石窟造像代表了它的最高成就。

现在山西大同市西 30 里，有一座武周山，山南断崖峭壁，东西绵亘着一个 2 里长的石窟群。这就是驰名世界的云岗石窟。大同市过去是北魏都城平城的所在地，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是当时我国佛教的一大中心。

云岗石窟保留到现在的洞窟有 40 多个，其中较大的 20 多个。在现在的编号中，从第 16 窟到第 20 窟，开凿得最早，称为“昙曜五窟”，是由一个叫昙曜的和尚主持开凿而得名的。开凿工程开始于魏太武帝的儿子文成帝，数以万计的各族人民和雕刻家参加了劳动，文成帝以后，还继续开凿了 40 多年。

“昙曜五窟”在石窟群的西头，每一窟都有 1 尊大佛，有的站立，有的盘坐，气象庄严雄伟。现在第 20 窟的顶和前壁都已倾圮，只剩下 1 尊“露天大佛”，鼻高、唇薄、目长、耳大垂肩，不象佛经里描写的佛像，也不像汉族人的样子。昙曜建造佛像，为的是替魏道武帝以下的皇帝求“冥福”，这些大佛就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北魏初诸帝的形象。

石窟内部壁上和门楣之间，雕镂着大大小小的佛像、菩萨像、供养人像，大的两三尺，小的不过 1 寸；有 7 个佛像并列的叫做“七佛”（释迦和他前世诸身的六佛），有 1 千个佛像分别排成整齐的行列的叫做“千体佛”（千体表示释迦的无数化身）。此外，还有伎乐，有飞天（又叫做天人），有奇禽怪兽，有名花异草。有的石像沉思默想，有的俯仰顾盼，一颦一笑，都富于内心的表情。第 8 窟中有 1 个口衔小珠的猛禽，半蹲半立，爪

趾雄健，形状有点象孔雀，佛经中叫做“那罗延天”，是古代印度人想象中的灵异。

石窟群中最大的一窟是现在编号的第6窟，开凿在魏孝文帝时。洞口有一座4层的大楼阁，洞内从地面到顶高20米，中间矗立1个大方塔柱。塔柱的主要部分刻了佛像。佛像的长裳下部翻转飘扬。“昙曜五窟”中佛像的服装紧紧地贴着躯体，和这种宽缓的形象不同。这是鲜卑人进一步汉化的反映。第6窟又是云岗石窟中最壮丽的1个，窟内有17幅表现佛经故事的浮雕，人物动态和人物与背景的关系明显地表现了借鉴外国之后的汉族传统艺术的风格。现在编号的第5窟中，有1尊大佛是云岗石佛中最大的，高约18米，脚长大约4.6米，中指长约2.5米。第五、第六两窟，据说是孝文帝为了纪念他的父母而建造的。

云岗石窟的雕刻，虚构了一幅封建统治的和谐图。大佛像高大雄伟，象征着皇帝，其他石像各按品级一个比一个低，环绕着大佛，仿佛为了大佛的存在而存在。自然界的山和水，动物和植物，人世的苦乐悲欢，都一一被理想化了。担负着沉重苦役的“侏儒”（短小、壮健的一种造像），也那么洋溢着欢乐。统治者借助于美妙的宗教艺术，引诱人们忘记现实世界中的苦难，顺从皇帝的旨意，起着“潜移默化”的麻醉作用。这正是北魏在完成了“武功”之后维护其统治的需要。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佛教的中心随着南迁，石窟的建造也从武周山移到了洛阳的伊阙。

伊阙在洛阳南面25里，伊水自南而北，两岸山崖峭立。西岸是龙门山，东岸是香山。北魏开凿的石窟寺都在龙门山，最

著名的是古阳洞和宾阳洞。

古阳洞是在 495 年开凿的，洞北壁上现在还留下一幅北魏贵族穆亮在这一年写刻的铭记。498 年，比丘（募化僧）慧成正式营建古阳洞石窟，造了 1 尊石佛，为他的父亲求福。洞内布满了许多佛龕，佛龕旁边镌刻着铭记，记录了造像人的姓名和建造的年月与动机。这些铭记是佛教史的重要资料。它的书法为前人所重视，有一部分编成《龙门二十品》，作为学习书法的范本。另一个由一组石窟组成的宾阳洞，公元 500 年开始建造，继续了 20 多年。它布局的完整，规模的宏大，雕像的精美，在北魏首屈一指。

走近宾阳洞口，便看见 1 座方坛，坛上有 1 尊佛像，佛像的两旁有两个罗汉和两个菩萨像。5 尊雕像构成 1 组，成为整个洞窟的中心。佛像的面容清癯，含着亲切近人的微笑。洞壁上布满了浮雕和装饰。浮雕有四层，上层是维摩、文殊对问图，中层是佛前生的故事，下层是帝后礼佛图，最下一层刻着凤、龙、河、树等 10 个神像。浮雕的明净、柔和与佛像的庄严、厚重构成了奇异的和谐。最精美的《皇后礼佛图》早在抗日战争前，就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所盗去，陈列在他们的博物馆里。这是帝国主义劫夺中国人民宝贵文化遗产罪行的铁证。

石窟艺术随佛教传播来到中国，经过了一二百年的时间，在北魏末年达到了成熟的阶段。石窟艺术的光辉成就，是我国各族艺术家和劳动人民高度的艺术才能和智慧的反映。

九、顾恺之的“三绝”

顾恺之是东晋时代一位杰出的画家。因为他在绘画创作和理论两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他的艺术成就有很高的评价。

顾恺之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 245—306 年（东晋永和元年至义熙二年）左右，他活了 62 岁。是江苏无锡人。他的父亲顾悦之，先做过扬州别驾，后来任尚书左丞，官职很不小。顾恺之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少年时代就有机会受到充分的教育，具备了文学、艺术的基础修养。公元 363 年（兴宁元年），一个很有权势的人物桓温做了大司马兼扬州牧；他任用顾恺之做他的大司马参军。年轻的顾恺之的才华很受这一位大官僚的赏识，有时还和他在一起谈论书画。

顾恺之在桓温部下时候，曾跟随桓温到过长江中游的荆州一带，也可能就在这一时期到过四川和湖南，因为他写的《画云台山记》的云台山是在四川，他还写过《湘中赋》和《湘川赋》。江浙一带风景优美的地区像会稽、天台等地他都游览过，并且写了描绘这些地区风景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都没有保存下来，现在只能从一部分文献资料中看到一些片断。他游览这些地区的时期，虽已无法确定，但是他从亲身游历中丰富了对大自然的感受，扩大了眼界，充实了热爱祖国的情感，这对他的艺术成就具有巨大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

公元 392 年（太元十七年）以后，他又做了荆州刺史殷仲堪的参军；为殷仲堪画过肖像。这时顾恺之已经 50 岁左右。但

在桓温死后到任殷仲堪参军以前这一段时间,关于他的具体活动的资料很少。公元 339 年(隆安三年)殷仲堪被杀,逼杀殷仲堪的是桓温的儿子桓玄。顾恺之和桓玄也有往还,大约这时他还在荆州。公元 404 年(元兴三年)桓玄死后,他才回到扬州。大约在公元 405 年(义熙元年),被任为散骑常侍。这时他已年过 60。据文献记载,他有时还月夜做诗,一直到天亮。

顾恺之在青年时代就博学有才气,诗、文、书、画都很精通。同时性情很坦率,很自负,又富有幽默感。因此在当时被人称誉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

明代著名的书学兼鉴赏家董其昌,经鉴定认为《女史箴图》上面所写的《女史箴》也是顾恺之的手笔,很像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写的《洛神十三行》,可见顾恺之对书法有很深的修养。他并且还著有评论书法的《书赞》,已经失传。在文学方面顾恺之写过不少赋,像《雷电赋》、《观涛赋》、《冰赋》、《箏赋》、《凤赋》等等,也写过不少诗、传记和游记一类的文章。这些诗文也已大多散失,但我们从一鳞半爪中,还可以看出他在文学创作方面表现了极为丰富的想像力,他很长于描写优美的风景和运用生动的比喻。例如他的《四时诗》:“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把这四句诗译成现在的口语,就是:春水充满了江河湖泊,夏天的云彩好像许多奇异的山峰,秋月发射出皎洁明亮的光辉,冬日的山岭上挺立着孤傲的青松。原诗一共只有 20 个字,却能够很形象地表现出大自然在不同季节的美和特征。

说顾恺之“痴绝”并不是说他真像傻瓜;而是由于他很直率和性格幽默,对自己的才能很自负,但也能欣赏别人。具有

这种性格的人生活在长期被封建礼教所束缚的社会里，自然会显得与众不同，由此就有人用“痴”来形容他。不过把“痴绝”和“才绝”、“画绝”放在一起，可见人们还是欣赏他的“痴”，认为这一种“痴”有它真纯可爱的地方。

以下几个传说是和他的“痴”有联系的。有一次，顾恺之给人家画扇面，画了嵇康、阮籍的像，但都没有画眼珠，就把扇子送给人家。扇子的主人就问他，为什么不画眼珠呢？他回答说：“怎么能点眼珠？点了就要说话，变成活人。”另一次，顾恺之把一橱柜的画寄存在当时的大官僚桓玄那里，这些画都是他自己最得意、最珍惜的作品，因此在橱柜上贴了封条，题上字。可是桓玄揭开封条把画都拿走，再把封条贴好。等到顾恺之自己打开橱柜时，看到封条仍在，画却一张也没有了，他坦率地说：“由于我的画太好了，能够通灵，所以变化而去，正和人成了仙一样。”这两个传说可能已经被后人夸大了，不过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顾恺之多么看重自己的绘画艺术，乃至以为自己的画可以“通灵”。同时也可以说明他怎样重视表现人物的精神和性格。

在他晚年做散骑常侍的时候，和谢瞻（是当时有才华的诗人，传说他六岁就能作文）一同值夜班，两个人相约在月下做长诗，都不睡觉。起初谢瞻隔一会就称赞顾恺之几句，顾恺之很高兴，告诉谢瞻自己在用功的时候就忘记疲倦。到了深夜，谢瞻想睡觉了，就叫人代替自己，还照样隔一会就称赞顾恺之几句；顾恺之因为专心做诗，始终没有发觉，坚持做诗直到天亮。

他的“画绝”的确更为重要，他在绘画创作方面也是多面

手,当时流行的宗教画、肖像画、历史故事画和以文学作品的内容为题材的绘画,他都很擅长,也能画动物,像龙、虎、狮、豹、鹰、雁等。山水画在当时还处在萌芽阶段,可是从《画云台山记》可以想象他在这方面已有显著成就。他在绘画创作中很重视构思、人物性格和神气的表现。他既继承了汉代绘画的优秀传统和民间画工的丰富经验,也吸收了随着佛教艺术传入中国的一些外来技法,并且创造了新技法,树立了独特风格。

在绘画理论方面,他留下 3 篇著作:《论画》、《魏晋胜流画赞》和《画云台山记》。因为年代久远,传抄多有错误,所以文章里面有不少地方较难理解。尽管这样,还是很值得注意,因为它们是我国最早的、比较全面的绘画理论。

十、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321—379年),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出身于南迁的北方世家。他是位杰出的书法艺术家,曾任右将军,故人称王右军。右军书法,“飘若浮云,矫若惊龙”,集前人之大成,开一代新风,为中国书坛之冠,故后人又誉其为“书圣”。

“书圣”,少时沉默寡言,不拘一格,也没什么特异的天才。早期的书法,与其朋辈相较,不但无杰出之处,且还略逊一筹。但是,他那刻苦学书,坚韧不拔的精神,却是朋辈们无人可以企及的。

相传王羲之学书十分刻苦。他学习、吃饭、走路,无时无刻不在揣摩字体的间架、结构以及笔法,边想就用手在身上边

划,久而久之,衣服都被划破了。

羲之学书往往全神贯注,以致达到忘情的程度。一次,他正在埋头练字,饭也顾不上吃。家人把饭给他送到书房,他不加思索地用馍馍蘸着墨就吃了起来,还说好香好香。当家人发现时,他已弄得满嘴墨黑,自己还不知道呢。

羲之经常临池书写,就池洗砚,时间一长,池水尽黑,故称“墨池”。现浙江的永嘉西谷山、绍兴兰亭,江西的临川新城山、庐山归宗寺等地,都有被称作王羲之“墨池”的名胜。这“墨池”传说的可靠性姑且不论,右军学书曾经下过一番苦功夫,那是确实无疑的。

王羲之以锲而不舍的精神,积数十年之功,终于“暮年方妙”,达到了超逸绝伦的书法艺术高峰。

右军书成,朝野视为墨宝。

相传,羲之游于山阴蕺山地方,见一老婆婆卖扇。竹扇粗疏,无人购求。羲之遂在竹扇上各写了五个字。婆婆见扇子被人弄得墨迹斑斑,不大高兴。羲之告诉她:“你就说这是王右军写的,每把少了百钱不卖。”百钱高于市价多倍,然而,当人们知是右军所书,顿时购求一空。

日后,婆婆又来找羲之写扇,他但笑而不答。他乃江南一代名士,其墨迹在当时也是难以求得的。

山阴一道士,深喜王右军书法,恐求之不得,就养了一群白鹅。

原来,王羲之性爱白鹅。昔时,会稽有位孤老太太,养一白鹅,鸣声悠远,颇为喜人。羲之曾令门人去购求,主人不卖。王羲之欲买不成,就邀集亲友同去老人家中观鹅。老太太听说名

士来造访，遍寻家中，无物为礼，就把鹅杀了，准备款待王羲之。王羲之乘兴而来，见鹅在釜中已熟，怅然不已，为此惋叹多日。

山阴道士的鹅，养得洁白肥硕。王羲之听说后，果然乘船来看，意欲买鹅。山阴道士说：“如此好的鹅，贫道是舍不得卖的。但愿奉送给您，希望您给写部《黄庭经》。”羲之爱鹅心切，慨然允诺。欣然命笔，俄尔即就，载鹅而归。这就是欲问右军书法妙如何，“换尽山阴道士鹅”的一段佳话。

右军墨迹很多，最著名的当推《兰亭序》。兰亭，是会稽山阴的一处古老名胜，那里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兰亭左右有弯弯的曲水，自古游人颇多。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正值“禊节”。这天，王羲之邀集谢安（即后来淝水之战东晋一方的决策者）等41人，到兰亭过禊节，饮酒赋诗。彼此相约，以觞盛酒，置于潺潺的曲水之上，任其顺势漂流，各人分列曲水之旁，依石而坐，觞流至谁面前，谁就当即赋诗一首，若作不出，则罚酒3觞。那天，曲水流觞，“一觞一饮”，共得佳作40余篇，编为一集，王羲之为之作序并书，故称《兰亭序》，又叫《兰亭集序》，或《临河序》、《禊序》、《禊帖》。该序共28行，324字。这序，王羲之本是信手写来，字体潇洒流畅，气象万千，成为中国行书的绝代佳作。

后世，唐太宗李世民珍爱右军书法，从王氏后人手中访得《兰亭序》墨迹，视若神品，当即令书法名手赵模、冯承素等人勾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他生前对《兰亭序》玩之不倦，曾多次题跋，死后又将其随葬。后昭陵被盗，《兰亭序》真迹也就从此失传了。

王羲之的行书代表作被李世民毁掉了，但在初唐由于李世民的大力提倡、推崇，遂形成争相临仿王书之风。这样，原只是江南书体正宗的王羲之真书，遂一跃而成为全国书体的正宗，并影响中国书坛 1000 余年。

古代墨迹，书于纸绢，历经一千几百年，是很难保存下来的。谁知在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间，还先后发现晋人王羲之、王献之（羲之子）及王恂的三纸墨迹。王羲之的为《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为《中秋帖》，王恂的为《伯远帖》。这三纸墨迹被视为稀世之珍，独辟阁室，藏于内府，所藏之室，亦被命名为“三希堂”（今北京故宫西路养心殿）。

200 年后，在清王朝覆亡之际，这稀世的“国宝”又散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得知“三希”中的“二希”（《中秋帖》与《伯远帖》）流落香港，政府遂不惜重金买回。现为故宫博物院所收藏。《快雪时晴帖》现在台湾。

第三节 三国 两晋南北时期的文学

一、诗 歌

至东汉末年，建安时期，以曹操、曹植、曹丕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邺下文人集团和蔡琰等继承和发扬了《诗经》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其诗歌创作充满伤时悯乱，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风格苍凉、刚健、遒劲，颇见风骨，这是整个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令人振奋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风格被誉为“建安风骨”。“三曹”和“七子”俱有不少风骨之作传世。

建安以后，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正始之音虽然真实地反映了三国鼎立时期的社会现实，但建安时期那种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减弱了，诗歌中流露出伤时悯乱与全身远害相混杂的情调，令人感伤不已。特别是司马氏集团取代曹氏集团的统治地位后，因政治原因，中国知识分子的厄运接踵而来。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得好死的时期，嵇康、向秀、谢灵运、谢朓、郭璞、鲍照等诗坛精英，都白白地做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个时期到底被杀了多少人，我们已无法统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数目是怵目惊心的。乱世多才是祸根，全身远害、明哲保身的思想充斥着整个文坛，

这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尤其表现得突出。诗人们多不关心世事,崇尚虚无,畅谈玄理,发言不着边际成为时尚;纵情山水、恣意游乐、归隐田园等林下风流蔚然成风。

西晋初期,一方面拟古风气盛行;另一方面追求辞藻典雅、对仗工整、用典也成为时尚。这一时期的诗歌被称为“太康体”。诗歌创作从此“采缙于正始,力柔于建安”“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从而失去了建安、正始诗歌慷慨任气,感兴而发的深厚内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其中左思的成就最高,钟嵘《诗品》评其诗为“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代表作《咏史》8首不仅开创了借古人古事以咏怀抱的先例,对后来李白、杜甫等人的咏史抒情诗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晋末年、东晋时期,玄言诗、游仙诗盛行,“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诗品》),诗人们畅谈玄理、崇尚老庄蔚然成风,体现了当时比较压抑的政治气候。代表作家有孙绰、许询、僧支遁、王羲之、郭璞等人。而陶渊明出淤泥而不染,一曲“归去来兮”之后,便“采菊东篱下”,以其清新,自然的诗风,开创了一个诗歌流派。不仅给死气沉沉的东晋诗坛带来新的气息,更对唐代孟浩然、王维等人的山水诗产生了重要影响。

到刘宋时期,山水诗的兴盛逐渐取代了东晋流行的玄言诗,其中谢灵运号为大家。他大量地创作山水诗,不断地探索山水诗的技巧,逐渐使山水描写由附庸玄言诗到蔚为大国、演变成山水诗,开拓了中国诗歌史上一个新的题材领域。山水诗而外,鲍照的拟古乐诗和七言诗颇有成就,特别是其七言诗,

以其深刻的内容和灵活的形式,为文人七言诗的发展树立了典型,开辟了道路。从此,七言诗体在南北朝文人诗歌中日渐繁荣起来。

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时期,新体诗的特点是讲究声律和对偶,是古典诗歌从比较自由的“古体”逐渐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有周顒、沈约、谢朓、何逊、阴铿、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等,其中以谢朓成就最高。

北朝文人诗坛与南朝的繁荣景象相比显得比较冷落,北魏末到北齐时期,才出现了号称“北朝三才子”的温子升、邢劭和魏收。他们的诗歌主要取法于南朝齐梁诗人。

南北朝后期,南北诗风呈现出合流的趋势,而对推动南北诗风合流贡献最大的当数庾信。庾信入北以后,以其南朝诗歌积累的纯熟技巧,描写深沉悲郁的乡关之思,融南朝诗歌的精密华美与北地民歌的质朴慷慨为一体,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开拓了文人诗歌的崭新境界。庾信的诗歌在格律方面也更为精美成熟,初步具备了唐代格律诗的格局,其晚年诗歌无论在意境,风格和形式格律等方面,都具有“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的重要意义。

从诗歌的题材上讲,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整个诗歌发展史上令人遗憾的时代。但尽管诗人们不关心世事,而在诗歌艺术的追求和造诣上显得非常执著。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沈约的“八病说”、鲍照的七言格律诗研究等都显示了诗人高深的艺术功底。这为唐诗的繁荣和发展作了质和量的积累。就连李白、杜甫、王维这样的大家都对谢灵运、谢朓、陶

渊明、庾信等推崇备至，所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正是这样的真实写照。

魏晋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继续得到发展，出现了《木兰辞》、《采莲曲》、《西洲曲》等优秀作品。

二、散 文

东汉末年以迄隋朝，中国社会重新陷入大动荡，大分化时期，其间虽有西晋和隋的短期统一，但这对于长达四百余年的魏晋南北朝来说，的确太微不足道了。散文在这一长期的历史大动荡中也可谓升沉起伏，命运多舛。

东汉末年在镇压黄巾大起义过程中，各地豪强地主趁机扩大自己的力量，割据一方。黄巾起义失败后，社会又陷入了军阀混战和割据称雄的局面。文人们伤时悯乱，对社会形势的认识和了解颇为深刻。另一方面，乱世出英雄，不少有志之士很想有所作为，建功立业，结束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因此，散文创作和当时的诗歌一样也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汉末散文作者仍以“三曹”和“七子”为代表。

曹操被鲁迅称为“改造文章的祖师”。作为在动乱中纵横捭阖，逐鹿天下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主张文学为政治军事服务。因此一方面利用行政手段戒浮华，尚刑名，要求文章简略严明，突破清规戒律、直抒胸臆；另一方面，他又以文人的身份自行创作，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其文章风格自然、豪爽、坦率、通脱、无所拘忌而又自然成文，其名文《让县自明本志令》、

《唯才是举诏》、《请增封荀彧表》等，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曹丕即魏文帝。政治上雄才大略颇似曹操，而手段上颇遭非议。但其写诗为文却颇具文人本色。其文大多为真情流露之作。《与吴质书》堪称名文。其《典论·论文》，不仅文思通畅，而且以政治家的眼光开宗明义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文学走向自觉时代的响亮宣言。因此，称曹丕为一代文宗，毫不过分。

三曹中，曹植成就最高，曹植是曹丕之弟，兄弟二人围绕王位的继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因此其诗风和文风均以曹丕登基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深得曹操喜爱，对前途充满信心，发而为文则意气风发、辞采飞扬、锋芒毕露，如《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曹丕登基后，一连串的打击和迫害向其袭来，怀才不遇，忧生患死之情郁结于心，发而为文，不免抑郁沉重，哀婉曲折，此类文章如《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等。

“七子”中以孔融和王粲的成就最高。孔融字文举，孔子二十世孙。在当时颇负盛名，连曹操也要让他三分。他的文章代表了典型的建安文风，大胆无忌，辞气飞扬。《论盛孝章书》、《难曹公表制酒禁书》、《荐祢衡表》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王粲一生四处飘泊，饱经忧患，其文颇多忧思感慨，并以辞赋见长。

“七子”而外，蔡邕也是著名的散文作家。

魏晋之际，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权力之争是这一时期的政治主题，受政治影响，文风也为之一变，当时的散文作者主要有两派：“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以何晏、王弼、夏侯玄为代表，文章清峻简略，文质兼备，虽意在阐发道象之

旨，而风格却接近法家。后者以阮籍，嵇康为代表，这些人多与魏室有宗亲、姻亲关系，愤慨于当时的司马氏专权，遂隐遁竹林，纵酒为乐，藉此不与司马氏合作。他们倡言老庄，用“自然”来反抗司马氏集团的所谓“名教”。由于心怀愤激，发为文章，也多“师心”、“使气”之作；又由于满腹忧惧，所以又多韬晦避世之作，所以整个文风可以用“愤世嫉俗，忧生患死”来概括。著名的文章有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嵇康的《养生论》、《与山巨源绝交书》，刘伶的《酒德颂》等。

西晋太康，元康之初，文坛上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他们慑于正始文人之祸，不敢再犯名教，只在辞藻上下功夫。文采华丽，不关心现实内容。象陆机的《吊魏武帝文》、《辩亡论》等都体现了这一特色。当然其艺术成就还比较高。

东晋著名散文作家有孙绰、许询、王羲之、陶渊明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融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在当时举世畅谈玄理的氛围中，说出“一死生为虚诞，齐彭觴为妄作”的惊人之语，堪称文章精品。

真正代表东晋散文最高水准的还数陶渊明。其文如其人，真淳自然，略无雕饰。既没有建安文风的慷慨激昂，也没有正始文风的“师心”、“使气”，更没有两晋文坛上的骈辞俚句，而纯之以平和。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指出“再至晋末乱世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平和。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其著名的散文作品有《五柳先生传》、《与子俨等疏》、《桃花源记》等。

由于偏安江南的东晋及以后的宋齐梁陈等朝名士在政治上无心进取，于是文墨之事成了他们的重要寄托，而且这个时

期,在文坛上颇负盛名的人大多出生于士族阶层,因而文坛的贵族化倾向特别明显。这个时期的典型作者诚如鲁迅所言“文雅的庸主”、“柔媚的词臣”,宋齐梁陈几代帝王几乎个个重视文学,而且很多身兼作者,著名的如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陈后主等都领一时风骚。由于帝王的提倡,众多词臣便云集宫廷,沈约、任昉、江总、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等都名躁一时。宫廷文人的地位决定了他们为人必定“柔媚”,相应地其文风也必然“柔媚”。适应这群贵族文人的需求,骈文便迅猛地发展起来。南朝时期的骈文形式技巧比魏晋更精巧,在句法上不仅讲求对偶,而且对仗必须工整,并分了言对、事对、正对、反对等诸多类型。句的字数也趋向骈四俪六,声律上要求平仄配合,“辘轳交往”,其他还有用典、比喻、夸张、物色等各种技巧。当时文坛上有文笔之分,而当时风尚又重文轻笔。作家们纷纷采用“绮縠纷披,宫徵靡漫”的骈体形式去写原本应由散体文去表达的内容,导致了骈文的畸形繁荣。使骈文成为南朝最具典型性的文体。除“庸主”、“词臣”外,还有几位“才秀人微”的作者,如鲍照、江淹等。他们没有门阀背景的依靠,倍感歧视和压抑,反倒因此而取得独特成就。

鲍照是刘宋时最杰出的骈文骈赋作家,他是典型的才秀人微之士,史不立传。《瓜步山揭文》、《登大雷岸与妹书》是其重要的骈文作品。齐代重要作家当首推孔稚圭。其《北山移文》寓言夸饰,妙想天开,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南朝文人之盛以梁为最,《南史·文学传序》称“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才秀之士,焕乎云集。”以君主论,梁氏父子数人,都有专集传世,且多有佳制。以宫廷文人论,彬彬之盛,一时称

最,沈约的《修竹弹甘蔗文》、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吴均的《与朱元思书》都是散文史上的佳作。梁朝最著名的作家当然还数江淹和庾信。二人的主要成就在骈赋方面。江淹的骈文水平代表了梁朝最高水平,而庾信的作品则是南朝骈文的最高峰。正如杜甫所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整个南北朝时期,骈文的畸形繁荣,使散体文门前冷落,但并未停止创作,在史传文学,学术著作中散体文仍然有不被遗忘的角落。这一时期著名的散体文作品有范晔的《后汉书》、酈道元的《水经注》、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

三、初期小说

小说是以塑造人物为中心,通过特定的时代背景中的矛盾冲突展开情节,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体。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小说都不是最早产生的独立文体,但它以其容量大,反映社会现实深广,故事情节性强,人物形象性强,相比于其他文学样式,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后来居上的派头。

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也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就出现了“小说”一词,在《庄子·外物》篇中有“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当然此中“小说”一词还并不是指一种文体,而是指浅薄琐屑的言论。桓谭在其《新论》中有“若其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理身家,有可观之辞”。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小说家”列为九流十家之末,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

书》中著录小说十五种，一千三百八十篇，这些作品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见于著录的小说作品。

其实，中国小说发展史可以上溯到上古神话和历史传说。神话故事以神为中心，历史传说虽然有现实人物为根据，但也往往被涂上了神异的色彩。这些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可以说是我国志怪小说的源头。在我国先秦古籍中有很多关于神话和历史传说的记载，其中保存神话最多的是《山海经》，当然《穆天子传》中也不少。先秦时代是我国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的辉煌时代，留下了很多堪称经典的散文著作，象《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中大量的记事成分，都写出了一些重要人物的言论行动，这对后世的小说创作有不小的开启作用，魏晋以后的轶事小说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小说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了令人兴奋的局面，这个时期，写小说蔚然成风，不仅作品的数量多，而且内容也非常丰富，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盛况。根据作品的内容，魏晋南北朝小说可以分为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两类。

志怪小说的产生，主要是上承古代神话传说，和秦汉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宗教迷信流行有很大关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已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社会上宗教迷信盛行，神鬼故事不断产生，志怪小说的创作也就出现空前的盛况，重要的志怪小说有托名东方朔著的《神异经》、《十洲记》、郭宪的《汉武帝洞冥记》、王嘉的《拾遗记》、荀氏的《灵鬼志》、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幽明录》、王璞

的《冥祥记》、吴均的《续齐谐记》、颜之推的《冤魂志》等，其中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堪称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压卷之作。《搜神记》中保留了很多优秀的民间传说，如《干将镆邪》、《韩凭夫妇》、《宋定伯捉鬼》、《李寄斩蛇》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志怪小说是富于中国特色的小说体裁，用非现实的故事题材，来表现人们的愿望和理想，富于浪漫色彩。它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唐代的传奇小说，宋代以后出现的专门谈狐论鬼的小说流派，都与志怪小说一脉相承。

轶事小说上承先秦以来记言、记事的诸子和历史散文的传统和汉末以来清谈、品评人物有关。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具为人间言道，遂脱志怪之牢笼也”。这段话扼要地说明了轶事小说产生和兴盛的社会历史根源。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轶事小说有《西京杂记》（托名汉代刘歆所作）、《世说新语》、《笑林》、《解颐》、《启颜录》等，其中代表轶事小说最高成就的当数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刘义庆是刘宋王朝的宗室，袭封临川王，《世说新语》是他门下文人采集众书编纂润色而成。梁时刘孝标为此书作注引用古书达四百余种，更加丰富了此书的内容。

《世说新语》按内容分类系事，分 36 门，其内容大部分是写魏晋“名士风流”，其中有不少篇章揭露了司马氏集团的腐朽，残暴与荒淫。在艺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它：“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明代

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世说新语》是记叙逸闻轶事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先驱，是后世小品文的典范，对后代文学产生过深远影响。

魏晋小说中的很多故事被后来历史诗文作家改造和运用，成为诗文中的典故，或戏剧家、小说家创作的素材。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 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并未因中国的分裂战乱而中断，即使在十六国那样大混乱时期，与东西方的关系也仍在继续，尤其是由于海上交通的发达，与南亚各国的关系却更加发展。

两汉开辟的丝绸之路，除了原有的南道、北道，这时又新增了中道，中西交通更为发达。这一时期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的国家，除了中亚、西亚的康居、大宛、大月氏、波斯（伊朗）、吠哒，远至欧洲的大秦（罗马帝国）。229年（魏明帝太和三年），大月氏贵霜王朝遣使来洛阳，被魏赠予“亲魏大月氏王”名誉称号。波斯位于丝绸之路上，波斯萨珊王朝为发展丝绸贸易，不断遣使来中国。解放后先后在新疆吐鲁番高昌左城、广东英德县浚洸北郊石墩岭南齐墓及河北定县北魏古塔塔基中，都发现过萨珊王朝银币，说明波斯与中国经济、文化往来的密

切。继东汉桓帝时大秦使臣官敦来中国之后,226年(吴孙权黄武五年),又有大秦商人秦论来建邺,西晋武帝时大秦再次派遣使臣来中国。北魏时洛阳设有“四夷馆”,“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有的胡商“乐中国土,因而宅焉,不可胜数。当时从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绸、铜器,输入的有火浣布(石棉布)、水银、玻璃、药材和汗血马。中国的养蚕技术,在六世纪末通过波斯传入大秦,从此欧洲开始知道养蚕。

由于海上交通的发达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与佛教发源地的印度往来更加频繁,不但信使经常不断,而且僧侣的往来尤为密切。四百年间,印度僧侣来中国传教译经的有70多人,中国僧侣往印度取经的也达八九十人,其中以法显的活动最为突出。法显于399年(东晋隆安三年)从长安出发,历经河西走廊及西域诸国,穿越艰险的沙漠地带与帕米尔高原,到达印度。他先后在印度及狮子国住了多年,由海路经苏门达腊,绕南海、东海回国,413年(东晋义熙九年)返抵建康。他回国后所著《佛国记》一书,记录了古代中亚、印度、南海的地理、历史、风俗,是研究这些地区国家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法显为古代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友谊作出了贡献。428年(宋元嘉五年),印度笈多王月爱遣使到建康访问,并致书宋皇帝说:“愿两国信使往来不绝”。法显在狮子国曾见到中国产的白绢扇,可见两国早有经济往来,东晋义熙年间(405—418年),狮子国赠帝玉佛像一尊,像高4尺2寸,玉色洁润,雕刻精致。428年(宋元嘉五年),狮子国王给宋皇帝信说:“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说明两国关系的密切。

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也很密切。地处今越南中南部的占婆国，中国史书称之为林邑。林邑与东晋南朝经常友好往来，常赠中国金银器、香料和布等，中国的造纸、纺织技术这时也先后传入那里。中国与扶南（柬埔寨）的关系也很密切，三国时吴国交州刺史曾派遣中郎将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扶南，他们归国后，康泰著有《吴时外国传》，朱应撰有《扶南异物志》，记载了这些国家的地理风貌。之后，扶南也不断遣使臣来中国，在东晋时曾赠中国以象牙佛像、珊瑚像和犀牛、驯象、琉璃器皿等物，中国则回赠以高级丝织品。

中国与朝鲜有长时期的友好往来，这时又有新的发展。当时朝鲜半岛分为高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三个国家都与中国经常有使节往来，进行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南朝（宋）时高丽王一次就赠南朝（宋）马 800 匹，南朝（宋）也给他们回赠了礼物，高丽王还曾派人从中国取去五经、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纪》）、《晋阳秋》等许多书籍，中国的医药、历法也随之传入。中国十六国时期，佛教也从前秦传入高丽。百济王在南朝时也曾遣使向梁求毛诗、佛经、工匠、画师，梁完全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朝鲜的乐器和乐曲，这时也部分的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音乐。由于朝鲜地处中日两国之间，朝鲜三国与中国关系的密切，也促进了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并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中介。

早在两汉，中国与日本就发生了外交往来，三国时，238 年（景初二年），邪马台国王卑弥呼遣使至洛阳，赠曹魏以牲口、班布，曹魏回赠给他们绢、罽、刀、铜镜等物，以后 10 年间，两国使者往来达 6 次。南北朝时，日本又多次遣使来中国。长

期的友好往来,加强了经济文化的交流。西晋以后,中国人开始流移日本,中国的织工、裁缝师、陶工、厨师带去中国的先进技术,中国的养蚕缫丝方法,也传入日本,472年,日本大和朝下令在日本栽植桑树,日本的丝织业开始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儒经《论语》等书,也由朝鲜传入日本,儒家思想在日本逐渐发生影响。梁时,印度的佛教也由中国传入日本。